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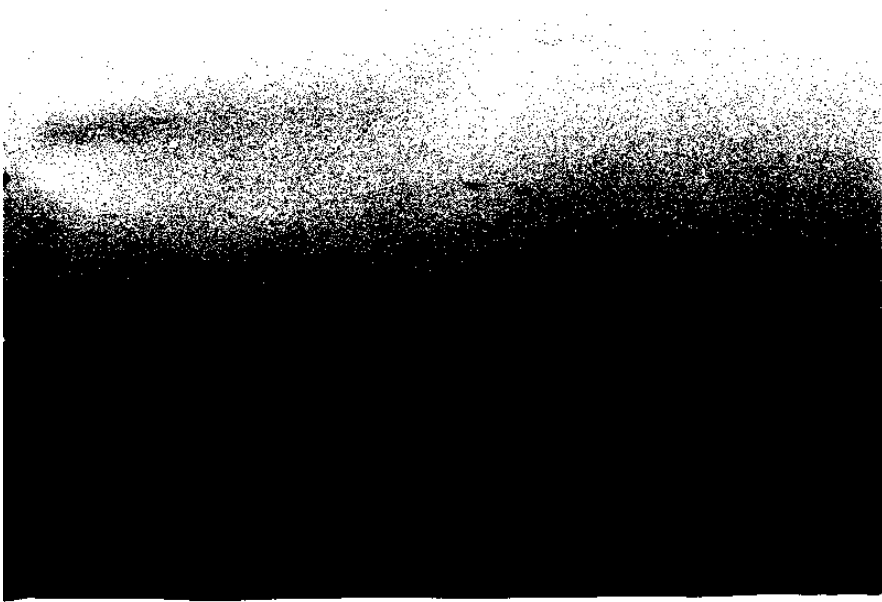
92
K257.2
1
2

辛亥革命在各地

李先念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92
K257.2
1
2

辛亥革命在各地

李先念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目 录

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	冯天瑜(1)
缔造共和的历史壮举	
——八十年后评首义·····	皮明麻 萧志华 李怀军(18)
从准备、胜利到失败	
——湖南辛亥革命叙略·····	刘晴波 周国兴(33)
辛亥革命在陕西的前前后后·····	邵宏谟 沈传忠(50)
江西辛亥革命综述·····	聂国柱 易芳霖(67)
山西辛亥革命纪事·····	刘存善(92)
重九起义	
——辛亥革命在云南·····	谢本书 吴显明(109)
贵州辛亥革命述略·····	陈隆德(122)
辛亥上海光复纪略·····	沈渭滨 杨柳青 杨勇刚(136)
辛亥风云浙江潮·····	胡国枢(150)
辛亥南京光复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	
大总统·····	蔡鸿源 刘晚宁(161)
江淮大地推翻帝制的伟大壮举	
——辛亥革命在安徽·····	陈德辉(175)
同盟会在广西边境三次武装起义·····	沈奕巨(189)

福建辛亥风云.....	范启龙(203)
烽火遍南粤 欢跃迎光复	
——记广东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	丁身尊(223)
巴山蜀水的革命风暴.....	隗瀛涛 何一民(241)
伊犁辛亥革命起义始末概述.....	杨柳风(262)
山东辛亥革命风云录.....	马素珍 弓 强(282)
甘肃地区辛亥革命综述.....	孟国芳(306)
奉天辛亥革命述论.....	武育文(320)
吉林辛亥革命纪略.....	孙 邦 于海鹰(340)
黑龙江地区辛亥革命综述.....	辛培林(354)
河南仁人志士在辛亥革命中.....	袁 蓬(374)
直隶辛亥革命述评.....	杨小波(385)
辛亥革命时期北京民主运动简述.....	侯宜杰(403)
辛亥革命与内蒙古政治.....	郝维民(416)
辛亥革命与台湾人民.....	徐荫山(429)
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	刘蜀永(440)
孙中山与澳门.....	陈树荣(479)
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作用.....	方雄普(496)

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

冯天瑜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军起义,通往湖广总督督署的几条街道枪声大作,继而炮声隆隆。翌日清晨,武昌黄鹤楼警钟楼顶飘扬着一面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这些惊人的消息顿时飞传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早已如同一堆干柴的中国大地,因这星星之火而立即腾起熊熊烈焰^①。

自1895年兴中会员陆皓东广州举义开始,十几年来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云南、安徽、湖南等省举行过多次武装暴动,但就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而论,都不能与武昌起义相比拟。武昌起义首次夺占了一座省城,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了职能的革命政权,在全国人民面前活生生地树立起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全国各地革命者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推向辉煌的高峰。因此,这次中国历史上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以武昌起义爆发的辛亥年命名,而武昌起义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辛亥首义”。

武昌首义事起仓促,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这次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民军在湖南

^① 冯天瑜, 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所长, 教授。

等省的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精锐的北洋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余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考查19世纪末叶以来湖北出现的新的经济土壤、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便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一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势力深入湖北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其锋芒所及，由粤、闽、江、浙等沿海地区渐入腹地，而号称“九省总汇之通衢”的湖北，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湖北逐渐由深处堂奥、风气古朴的内陆省份，演为“商贾辐辏，白哲人种联翩并集”的列强势力圈竞争之中心点^②。

西方殖民者对湖北大举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开商埠，设领事，向华中腹地打入楔子；（二）圈占租界；（三）设立银行，控制金融；（四）兴办工厂，输出生产资本；（五）辟航道、筑铁路、控制交通；（六）西方列强对湖北不仅进行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而且还配合以传教为主的文化渗透。

从19世纪中叶至辛亥革命前，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湖北无孔不入的渗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固然是十分深重的，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西方殖民者所不曾料想到的结果——

世界上最古老最坚固的帝国，因受了英国资本家纺织品的影响，八年来已处于社会革新的前夜，这种社会革新对于文明无论如何应有非常重大的结果。我们欧洲的反动派，在最近的将来势必向亚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跑到这个最保守的堡垒的门口，那时候，安知他们在那里不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Republique

Chinoise——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这几个大字呢? ③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将在中国发生的天才预见,被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史所证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这场革命是在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刺激、影响下发生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恰恰是列强渗透的中心点之一——湖北,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

二 后期洋务建设的中心地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北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重点,而且也成为清朝洋务建设的一个新中心,这使得湖北跻入“开风气之先”省份的行列。

洋务派的后期代表张之洞(1837—1909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此后,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晋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以前,除两次短期署两江总督,一次入京编纂学堂章程外,一直督鄂,在近二十年时间内主持了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湖北新政”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建立近代文教设施,大量派遣留学生;(三)改革军制,组训新军。恰在此期间,李鸿章的北洋势力经过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其赫赫势焰大见低落,而张之洞在华中地区惨淡经营的“新政”的诸方面,更为举国朝野所瞩目。

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费无量数之苦心,经无量数之痛苦,铢积寸累”④,湖北终于以一隅之地,耸中外之视听,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新中心。张之洞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⑤。

张之洞督鄂前夕,湖北除西方列强为出口服务建立的一些加工厂以外,大量存在的还是设备简陋、规模狭小的手工作坊。19

世纪末期，湖北大地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规模宏大、带有近代色彩的工矿企业。机器的使用，标志了生产领域里的一个全新的技术变革。湖北制铁厂尤为令人瞩目，它那“烟囱高过大别山（龟山）”的炼铁炉，“其机力之宏大，运动之灵巧，火力之猛烈，迥非向来土炉人工所能到”^⑥，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钢铁联合企业，而且还是远东最早的现代化钢铁厂。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铁厂出铁之日，“上海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知各国”^⑦。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也惊呼：汉阳铁厂的崛起，“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⑧。

“湖北新政”的另一大项——兴办具有近代色彩的文教事业，就张之洞的本意，当然是为洋务事业培养人才，但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知识分子队伍。从这批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看，大多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接受了若干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学说，如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以及民主共和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列强蚕食鲸吞、清廷腐朽昏聩的社会现实刺激下，很容易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中外历史反复证明，资产阶级的革命，往往是由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头搞起来的。从湖北的情形看，资本家直接投身革命的几乎没有，而在那些由新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中，却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英勇的革命者，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高唱道：“美矣哉学生之位置！”“重矣哉学生之位置！”“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之大陆上。”^⑨他们在辛亥革命和以后的革命运动里，发挥了启蒙者和先锋战士的作用。

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从支撑清廷半壁江山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兴办的学堂和派遣的留学生中源源涌出，其中许多人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这当然大出乎那位“文襄公”的预料之外。据张继煦后来说，1906年冬，张之洞奉诏入京陛见，黎明在朝房与军机

大臣王文韶遇，王偶语张在湖北办教育为天下先以誉之。张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冷笑，从袖中取出《湖北学生界》一册给张看。张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鄂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⑩

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对于湖北大举兴学及派遣留学生，也颇怀隐忧。1907年，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⑪而几年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慈禧的嗅觉是十分敏锐的。

“湖北新政”的又一大项——新军编练，造成了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式军队。新军较之中国的旧式武装，确有其“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废戈矛土枪，代之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第二，训练、编制仿效欧、日；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补充新的成分；第四，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第五，士兵文化水准显著提高，如1905年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秀才”^⑫，知识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是以往任何旧式军队所没有，这就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条件。此外，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北洋军是清廷的中央军，主持者袁世凯又力图将其造成封建色彩浓厚的私家武装，这种素质决定了它在辛亥革命中，以及在此后若干年内，一直是一支反动的武装力量。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则比较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派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加之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一种私家武装。凡此种种，使得湖北新军成为清末反清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

组练新军是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他整军经武，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这里包含着保卫祖国的意义，但更主要的是

企图用近代军事技术维护封建制度和清王朝，使之在“内忧外患”交迫中不致倾覆崩溃。然而，同“兴实业”、“办教育”一样，张之洞苦心经营湖北新军，也走到了他的主观愿望的对立面。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成为武昌首义的发动者，士兵的多半在起义爆发后站到革命党一边，而且，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陕西的李载熙、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

三 湖北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及其特点

20世纪初叶，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地区，一是江浙，二是广东，三是湖北。湖北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与湖北民族资本的形成，有着内在联系；而辛亥武昌首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所呈现的独特格局，正体现了领导这次运动的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

19世纪末开始形成起来的湖北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的不同，又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这样两个阶层。

一般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阶层。凭借这一特殊关系，他们获得一定的开办和发展新式企业的特权，以及较为优越的积累和扩大资本的条件。在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队伍中，颇负盛名的有宋炜臣、刘歆生、刘子敬、邓纪常，典当商吕遵先，百货、匹头商徐荣廷亦当属于此列。而在这些巨富豪商中，宋炜臣、刘歆生分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

以宋炜臣为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封建势力的庇荫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宋炜臣不同，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刘歆生，走的是依赖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势力的道路。

至于吕逵先和徐荣廷，则另有特色。他们一方面经商，另一方面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政治投机。如《武昌保安社绅实录缘起》谈到吕逵先，是这样说的：“地方行政疑难解决者，君致片语，即折纷事”；而徐荣廷则由于是黎元洪的“拜把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不仅担任了武昌商会会长，官钱局总办，而且还从大维公司手中，强行夺得丝麻四局的承租权。黎元洪任大总统后，徐荣廷更混迹于官场，以湖北四局总办、黎元洪家乡富绅、总统拜把兄弟身份进京，长住总统府，并由黎元洪介绍认识了徐世昌、张作霖等。^⑤

宋炜臣、刘歆生尽管同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但由于他们发展的道路有异，因此，政治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以宋炜臣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经济势力，是在封建政权的羽翼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他们和封建政权也存在着矛盾，但远远未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因此，他们并不赞同“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也不想打倒他们所“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⑥。他们的政治态度，与19世纪中叶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逢迎、胆怯的表现颇有相似之处，而与具有无畏的、强烈革命风貌的法国资产阶级比较起来，则大为逊色。

以刘歆生为代表的一部分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由于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受世界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因此具有较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于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变革的活动，常常持赞同和较为积极的态度。例如，在保路运动中，刘歆生就曾被推选为“湖北商办铁路协会”的副会长，领导拒款运动，甚至为此受到清政府“严斥”。在立宪运动中，刘歆生也较为积极地投身其间，成为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的“湖北宪政同志会”成员。但直到此时，宋炜臣还对挽救清廷抱着一丝幻想。1912年1月25日，商务总会开会筹议重建汉

口市面办法，宋炜臣发言云：“汉口也惨遭兵燹，应行重建，然财政颇为困难，莫如请黎副总统转请大总统与清政府开正式谈判，以其内帑赔偿汉口之损失，方以善策”^⑩。以后，宋炜臣又与袁世凯建立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宋因此“取得道台头衔”，后又“拥袁称帝最力，并因替袁各方疏通说项，耗费甚巨，私人已有亏空”^⑪。

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与上层相比，人数较多，其社会基础也比较广泛。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政权的联系不太密切，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多方面的阻挠和压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努力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建立联系，以期获得“保护”，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比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来，中下层资产阶级较富于革命性。

资本薄弱，市场狭窄，是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共有的致命弱点。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可以利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密切联系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却不得不更多地依凭自己的气力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苦斗。因此，当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很快地站到了革命派一边。辛亥革命首义以后，汉口商团和武昌保安社的成立和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主动地承担维持首义之区地方治安的任务，帮助军政府稳定局势。阳夏战争中，汉口商团又担负起后勤工作及战地救护工作，部分商团团员甚至“荷枪助战”^⑫，瑞澂电告清廷“武汉军民同变”，正反映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武汉各阶层民众欢迎革命到来的热烈情景。

四 湖北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发动工作

19、20世纪之交，湖北出现了近代大机器工业，形成了新的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军队。这一切，都

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必不可缺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这种先决条件并不能自发地变成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打击力量。使上述物质基础活跃起来、沸腾起来，并朝着反清革命的方向运行，必须有催化剂起作用。而湖北党人比较自觉地担负了这个“催化剂”的职责。他们充分意识到湖北在灾难深重的祖国所处的重要地位。“吾楚昔之为天下重也，不过割据时代以及内乱冲突取其地居上游，足为用兵之孔道而已。”^⑧“湖北之在今日，固中国之中心点也。洪杨揭竿以来，武昌陷者三，汉阳陷者四，前波未完，后浪还催。天津之条约成，而西方诸大邦，又逐逐焉逼处于此。……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⑨更加可贵的是，湖北革命青年面对这“震天撼地之风潮”，反对“闭关而怀楚”，并以新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行者自命，他们明白地宣称：“湖北省，湖北学生演其输入之文明之舞台也。”^⑩在以后的岁月里，湖北党人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用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为武昌首义铺平了道路，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壮剧。

湖北党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孙中山为领袖、以同盟会为主要组织的全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湖北先后出现的多种革命组织，无论与同盟会领导中心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却无一不景仰孙、黄的，他们没有提出过什么独立的政治纲领，基本上都是接受并宣传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的思想，以此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共进会的领导者孙武甚至还冒称孙文的弟弟，在群众中造成很大影响。武昌首义后，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都热切期望黄兴前来主持一切。这些都说明，湖北党人同当时各省党人一样，如水之赴壑、江之汇海，齐集于孙中山民族、民主的革命旗帜下。

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武汉被镇压，促使湖北的爱国志士抛弃改良主义，走上革命道路。自此以后，他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一个组织被破坏了，另一些组织又建立起来，一批人倒下

去,更多的人跟了上去。首先是吴禄贞等人于1903年在武昌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并确立了“运动新军”的方针,派遣知识青年潜入新军,为湖北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石。此后,吴禄贞奉调赴京,受其影响者如刘静庵、胡瑛、张难先等于1904年建立科学补习所,并与湖南革命党人联络,拟于慈禧太后“万寿节”发难,后因事情泄露,科学补习所的成员被通缉,组织只得解散。1906年,刘静庵等人又成立日知会,主要任务在灌输知识,开展革命宣传,后被人告密而遭破坏,刘静庵等九人被捕,长期关押,存者亦风流云散。湖北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沉寂时期。1908年,湖北新军任重远、杨王鹏、章裕昆等又倡组“军队同盟会”,后因任重远等调往四川,会务停顿。同年底,杨王鹏等将军队同盟会改组,外避目标,内策自治,定名为群治学社,一时之间,革命活动又蓬勃发展。由于群治学社成员刘尧激、李六如等参与围攻杨度,为外间所注目,在1910年秋改名振武学社。又因协统黎元洪令亲信侦知杨王鹏有革命嫌疑,遂将杨王鹏等逐出湖北。1911年1月,振武学社成员联络益知社、神州学社、武学研究会等革命小团体,组建文学社,由蒋翊武、王宪章、刘尧激、詹大悲等负责。此后会务一日千里,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重要组织。

与文学社并存的共进会鄂部总会,是从东京共进会派生出来的,又合并了德育会、忠汉会、自治会、竞存社、将校研究团等小组织,刘公、孙武是其主要领导。共进会注意到新军士兵有许多破产劳动者,不少是会党分子,所以在发展组织和联系活动时,利用了会党的传统形式,如求神问卜、换帖拜把的方式。此外,共进会还广泛联络各州县的哥老会、三合会等民间反清秘密组织,对武昌首义起了策应作用。共进会与文学社一直存在矛盾,但在大敌当头之际,终能抛弃前嫌,携手联合,组成统一的指挥部,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任未来的军政府总理。又在武昌小朝街设立军事总指挥部,负责武装起义事宜;汉口长清里设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定旗

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政府的工作。这样，两个组织共同领导了武昌起义。

总之，湖北革命组织发轫于花园山聚会，正式建立组织为科学补习所，再接于日知会，而由文学社、共进会收其成。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即所谓“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不企求以壮烈的一死去耸动视听，认为吴稚、王汉那种“十步之内，血火红飞”的“暗杀主义”不足以成大事；他们不屑于以华丽的言谈文字去博取虚名，也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走着一条更加艰苦踏实的道路：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不厌其烦地从事具体的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

湖北党人埋头苦干的韧性战斗精神，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艰苦深入地从事新军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上。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正在于党人扎扎实实地抓了枪杆子，而且成效显著。这是其他各省党人甚至同盟会总部所不及的地方。

早在1904年春，科学补习所骨干成员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等聚会武昌，谈及革命进行方略，他们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动摇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②。他们的一致看法是，“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③。刘静庵、张难先等先后投马队营、工程营为兵，开党人入伍的先河。另外，正当有的同盟会成员迷恋于海外宣传，不愿（或不敢）回国进行艰苦工作的时候，同盟会湖北分会负责人余诚尖锐指出：“革命宜在国内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④余诚身体力行，带病回国，致力于团结湖北各革命组织，尤其注意发动新军，直至病重身放。在此前后的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多由“莘莘学子”一变而为“桓桓武夫”，在新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如杨王鹏原在湖

南入伍，因发动革命被驱逐，又到武昌入陆军四十一标三营为兵，以一介书生，长期过着艰辛的行伍生活，冒着巨大的危险，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又如留日学生刘尧徽亦入新军当副兵，做了出色的组织工作，以他单薄的身体，本难以坚持卒伍生活，但他志在大举，“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⑤。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富贵，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全部私产；当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高风亮节，令人景仰。

同其他省相比，湖北党人的军运工作还有组织严密的特点。如振武学社、文学社机构相当健全，社长下设文书、会计、评议等部，各级领导选任或推任，实行单线联系，“至有不同营之社员相见，彼此不知同为社员”；发展成员也由日知会时期的重在军官阶层，变为重在贫苦知识分子和士兵，亦有少数经慎重挑选的下级军官，这样就保证了组织的纯洁，减少了被破获的可能。党人又在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文学社称组，共进会称支队。共进会和文学社还先后在各标（团）、营、队分设代表，一旦举义，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有完备的指挥系统。

湖北党人的宣传舆论工作，也以踏实深入为特点。虽然他们很少探讨革命后的建国方略，对“平均地权”等民生问题也不太关心，政治上比较幼稚，甚至认为革新政治是其他同盟会员的事，这种弱点正是导致起义后迅速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湖北党人对于当前的任务——“武力推翻满清，达到民族平等地位”则是十分明确的，并为此而做了广泛的鼓动工作。

早在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时期，湖北党人便意识到，要“唤起革命”，必须“灌输知识”，他们在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中广为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书刊，“各校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反清救亡的思想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

层。湖北党人还注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或者举办公开讲演，如日知会利用基督教合法地位，“每星期日开演说会一次，听者达千余人”；或者在交谈中“迎机启示”、“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还采取编歌曲、吟诗联句、放映幻灯、做游戏、问出身经历等方式，启发民族情绪，宣传反清革命；或者开设酒店于军营附近，在饮酒吃饭之际，相机传播革命道理。党人还到潜江等县的饥民中进行鼓动，携带革命读物，每值村镇演戏集会，或杂入人丛，或登台演讲，收到良好效果。1909年以后，革命党人先后掌握了几种报纸，如群治学社的《商务报》、文学社的《大江报》，对武汉官厅黑幕有所披露，尤其是新军内部的不法和贪污舞弊等事，一经士兵到社申诉，即予详细登载，痛加抨击。如某标统（团长）克扣军饷，《大江报》将其劣迹形诸报端，民情哗然，迫使当局不得不将该标统革职查办。为扩大在士兵中的影响，《大江报》给“各营队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又征得黄花岗诸烈士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附报分送。新军士兵接受这种切身的和理论的宣传教育，“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⑤

湖北党人的宣传舆论工作，中心点在“救亡”。“拯救民族危亡”的号召，在列强欺凌，政府卖国求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能拨动各阶层民众的心弦。当人们的民族解放意识一旦觉醒，就会爆发出无可阻遏的力量。新军之所以能实现“抬营主义”（即整个部队成建制地争取过来了），散漫的会党之所以能发动起来；市民愿为党人慷慨解囊；武昌起义后，参军的青壮顿时达数万人之多；阳夏战争中，汉口市郊农民主动扒掉铁轨，阻止清军进犯，刘家庙之役，民众揭竿而起，协助民军痛击清军，武汉三镇市民向革命军送精食水果，煨肉汤送上前线者，不绝于途……。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党人多年来所做的“促睡狮之猛醒”的鼓动工作。

善于把握时机，掀起革命高潮，也是湖北党人熟用的斗争策略。如杨度游说铁路国有，湖南饥民抢米风潮，汉口人力车夫被

英水兵打死等事件，都被党人紧紧抓住，作为发动各阶层群众的良好契机。特别是在保路风潮中，许多党人参加群众集会，发表演说，痛斥清廷卖国，有的当场斩断食指，挥写血书，翌日各报莫不竟载此种爱国断指消息，人心为之振奋。辛亥年间，詹大悲、黄季刚、何海鸣在《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富于煽动性的文章，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绝境”，“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倡言推翻现存的清朝统治，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局恐慌万状，查封《大江报》，逮捕詹大悲、何海鸣，更激起群众怒火，整个武汉三镇的革命气氛达到了爆发点。

湖北党人为起义所作的细致深入的准备，还表现在这类事情上：辛亥前一年，在武昌三道街成立数学研究会，名义是研讨数学，实为搜集财政经济材料，调查湖北一年收入数字，及银钱、钱票和物资储存多少，以备掌握政权时，财政方面可以胸有成竹。

概而言之，湖北党人虽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均有重大弱点，但他们比其他各省党人更出色地尽了革命实行者的责任。他们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埋头于发动工作。尤为突出的是，成功地实现了“借矛夺盾”的计划，将清廷倚为股肱的新军争取过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武昌起义就是党人发动的新军起义。到1911年秋天，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②。其他有些省的党人也致力于发动新军，但像湖北党人这种强有力地掌握了新军各级组织，使之能及时转变为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则是绝无仅有的。

同盟会总部很早就确立了武装推翻清廷的战略。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点。然而，黄兴等人多次策动起义，都是通过输入武装人员的方式发难，以至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

南河口起义等均遭败北。但武昌起义却一举成功，原因在于湖北党人在当地军队和社会有扎实的根基，将工作做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地步。正如蒋方震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所指出的：“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

因为湖北党人的汗水和碧血凝结成深厚的根基，因为他们乘势待时，筹之有素，所以，尽管在起义前夕发生了不测之变，然而，革命士兵发挥了主动精神，在领导机关被破坏的情形下，使起义基本按计划举行，而且一声枪响，各营并起，一夫左袒，三军尽甲。经一夜激战，即攻克督署、藩署等衙门，进而攻克汉阳、汉口，击溃张彪、荫昌的反扑。以后又与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军展开武汉争夺战，相持于大别山（龟山）麓、长江汉水之滨，阻止了清军的南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得除直隶、河南、甘肃以外的南北各省纷纷“易帜独立”，老大的清帝国终于皇冠落地。

在武昌首义中，党人所显示出来的实力，已不是徐锡麟策划光复军起义、熊成基安庆举事、倪映典发动广州新军暴动、黄兴领导黄花岗之役所能比拟的。这当然离不开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四川保路风潮对清廷注意力的吸引，离不开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指导，也与外省支援相关（如湖南派遣部队参加抵御北洋军的“阳夏之役”），但湖北党人前赴后继，进行长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则是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辛亥武昌首义的金字，是由湖北党人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

张之洞治鄂以来聚积的物质力量——近代工业、新军、新阶级和新知识阶层，在湖北党人辛勤不懈的努力下，一并转变为向清朝发生统治危机的区域猛然打击的铁锤。清廷整个统治链条随之解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厦终于轰然崩坍。

以武昌起义为高峰的辛亥革命，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更加复杂错综的一页。无论以后的历史出现怎样的曲折和回流，然而，辛亥志士那种“使我国民主自由独立之国旗，高悬于灿烂庄严之新世界”的宏伟理想，却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奋斗不息。

-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5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② 《叙论》，《湖北学生界》第一期。
-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2页。
- ④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2，第2页。
- ⑤ 《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 ⑥⑦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四，第22—23页。
- ⑧ 《东方杂志》，第七年第七期，第66页。
- ⑨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二期。
- ⑩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第15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⑪ 《高高原随笔》。
- ⑫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7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⑬ 盛龙轩：《我所知道的徐荣廷发家情况》，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未刊稿。
- ⑭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⑮ 《东方杂志》第5期，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 ⑯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六十五号》，载《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
- ⑰ 《武汉火柴工业历史资料》（未刊稿）。
- ⑱ 见《汉口各团联合会协助军民纪实》，《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45—266页。
- ⑲ 《湖北学生界》第一期，张继煦：《叙论》。
- ⑳㉑ 同上，《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
- ㉒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
- ㉓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 ㉔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余诚传。

- ⑤ 同上书，刘复基传。
- ⑥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23页。
- ⑦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2页。

缔造共和的历史壮举

——八十年后评首义

皮明麻 萧志华 李怀军

八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场震古烁今的革命运动。在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华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辛亥革命无疑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义最完全也最深远的一次革命运动。它带来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在这次一举倾覆清王朝的革命巨澜中，武昌首义则成为触发革命高潮的浪峰，武汉地区则成为革命前期的主战场。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汉，高涨亦在武汉，而且不可讳言的是，失败也很快发生在武汉。这场革命已过去了八十年，时间风雨的冲刷越加显示出当初革命运动的历史价值，也磨露出它的教训和不足。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当我们深情地在武昌起义门，在球场路辛亥革命烈士墓，在阅马场湖北军政府旧址凭吊先烈和先贤时，这场早已逝去的运动，仍然以巨大的魅力唤起人们对它的再认识和深层的理性反思。

—

武昌为什么成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首义之区，成为最早爆发革命的主战场，一直是学者们穷心探索的。“亡清必楚”的确

皮明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萧志华，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李怀军，武汉市科委办公室副主任。

成为客观的历史。学者们在以往的探索中，常常从同盟会多次在南方和西南边境发动起义失败，常常从中部同盟会转而谋长江革命的战略等诸多方面，来论证武昌起义的历史动因。这些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应该从武汉自身来剖视这场革命的“内力”。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做过。不过，缺乏系统化、深层化。武汉构成革命爆发地和主战场的历史必然性，植根于晚清时武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土壤中，植根在这一土壤中形成的革命力量、革命危机和革命觉醒上，具有多重背景。

从经济的背景看，武汉地区商品经济的兴盛和活跃，成为革命力量、革命运动生发的温床。武汉是晚清时期近代工商业崛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从而为革命因素的生长铺垫了广阔的经济土壤。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在武汉三镇的扩大，武汉在国内的地位呈上升趋势。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帝国主义在武汉兴办工厂、洋行，使武汉进出口贸易迅速膨胀。紧接着，武汉又成为洋务运动在内地的最大中心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相当规模，在辛亥革命前，武汉先后创建的工厂达一百二十多家。汉口的商贸和工业在晚清时超过广州、天津，仅次于上海。

武汉为九省通衢。明末清初，汉口即为有名“船码头”，但均系土码头，只能停靠木船。晚清时，由于开埠和轮船航运兴起，芦汉铁路竣工，被赋以现代形象。自从1872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开辟汉申线和1875年英国太古轮船公司首航汉口港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昔日全仗木帆船的长江水运为之一变。外国和本国十几家轮船公司在武汉营运，上至宜昌，下至上海，南至长沙、常德，北至江水沿河的仙桃等镇，武汉可谓是一个四通之港。这就大大扩展了武汉的水路客运和货运，加强了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和转口港的地位。1907年，大阪轮船公司开始直接在汉口与神户、大阪通航。次年，日本邮船公司在汉口与神户间直接通航，后来又延长至横滨，使武汉不仅以转口港，而且以直接输入港显

示出优势。

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使武汉从陆路贯通北方，不仅运输速度大大加快，运物数量亦空前增加，包括河南北部都纳入以武汉为中心的商业圈。“京汉铁路使汉口与河南密接，从来天津商圈之内奄有河南北部者，铁道完成后忽南人于汉口之商圈，且与北京之交通亦趋便利。”以汉口进出口总额而言，1901年始终徘徊在四五千万两，1902年突破一亿两大关，此后持续增长，1906年为109660247两，1907年为127829261两，1908年为133148921两，1909年为137789874两，1910年为152199000两。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说：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广东，今宜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外来人艳称东洋芝加哥不置。

同时，自1898年开始，经三年之功，武昌方面修建了武丰堤、武金堤和沿江防水墙，使市区减轻了水患。1902年，我国将武昌自开为商埠。特别是1905年汉口市郊修建了三十五华里的后湖长堤（张公堤），使后湖广大低地，从渍水状态中解脱，大大拓展了汉口市区的范围，汉口狭窄的街市区成倍扩大，为汉口形成近代都市提供了必要的地理条件。

由此可知，由于水陆交通的近代化和地理条件变化等因素，武汉在当时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都会。武汉这一都市地位，使其具备造就一大批有近代民主意识和革命觉醒的知识分子群、新军士兵群的条件，也具备吸引、聚结、隐藏各种革命组织、革命分子的条件。

从政治背景上看，在这一时期，武汉政治地位也得到加强。武昌向为湖广总督驻地，湖北省省垣，华中重镇；汉口的经济地位日见提高，其对湖北、华中乃至全国的政治影响也日益扩大。此时的武汉，五方杂处，华洋荟萃，租界林立，新军“称雄”，进一步成为清政府镇抚中原的要地。

随着武汉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各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

化。到本世纪之初，特别是1905年以后，武汉成为社会矛盾尖锐的地区。许多社会矛盾呈激化状态，人民群众自发反对官府横征暴敛、抗捐抗税，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政治暴力、经济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在动荡的社会土壤中，人民群众反清意识强化，革命组织、革命力量迅速成长，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当时革命力量的内部积蓄，形成一股地下潜能，并进入到一个临界点，随时都可以引起“爆炸”。武昌起义正是由于反动军警的倒行逆施而触发了这一场“内爆型”的革命。由于革命力量积蓄雄厚，使反动当局不能遏制、扑灭，当革命爆发时就能支撑大局。其实，爆发革命之处，在全国多有所见。不过因为内外原因，革命爆发后不能持久，倏忽之间即被扑灭。武昌起义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首发，而且在于坚持，在于取得胜利。因此，我们与其说探索武汉为什么成为首义爆发之地，倒不如说探索武汉为什么在首义中能成为胜利之区。我们认为，这种胜利归根结底是武汉地区形成了一股由革命组织、新军士兵、人民群众觉醒所形成的历史合力，这种合力相对大于镇守武汉地区的反动势力。当然，这种合力与全国各地革命力量的总体支持是分不开的。

从文化背景看，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为基础，两湖地区在祖国内地当时已成为革命思想文化传播较快较广的地区。在上世纪末，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汉地区大兴洋务，其根本立脚点乃以“忠孝为本”、“中学为体”，旨在维护和加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他办厂矿、练新军、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却在客观上为武汉地区先进分子接触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湖北地区迅速地成为一个数以万计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他们迥然不同于满口“子曰诗云”的旧式文人，他们探索新文化、新思想，不少人牢固地树立“革命排满”、“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成为湖北地区革命政治力量中的骨干。湖北留学生在1906年达到一千三百多人（占全国四分之一），为全国之最。其中不少人

在海外沐浴欧风美雨，亲承孙中山先生教诲，走上了革命道路。

两湖地区早期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田桐、孙武、刘成禺、李书城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和孙中山发生联系，有的人在日本或欧洲和孙中山的接触中，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对孙先生蹶而从之。这些人士都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在武昌花园山，在两湖书院，在武汉三镇秘密机关，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散发成百上千册的革命书刊，如《猛回头》、《警世钟》和《民报》等，使广阔的江汉大地上形成了一股革命的思潮。

湖北的革命组织从早期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辛亥革命时的文学社、共进会，都具有新的革命意识。当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湖北留学生大批入会。同盟会多次派人在湖北发展组织，并和湖北的日知会等团体建立密切的联系。

革命在武汉爆发，不是偶然的。其内因深藏于武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土壤中。这一系列深刻的内部因素所凝集成的历史合力，形成了武昌起义这一场埋葬清王朝的“地下爆炸”。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但他们主要是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这种外铄式的革命因缺乏“内在基础”，形成不了力量优势，均告失败。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运动革命，在内地积蓄革命力量。但起义时，因内部因素不够深厚，莫不失败。武昌起义则是一场内爆型的革命。它是本地区厚积内部力量，在地表下形成熔岩终于涌出地表，引起火山爆发。

当然，仅仅具有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能使革命成为现实。在革命条件成熟时，革命组织、革命力量能不能发挥能动作用，点燃起革命火焰，是使革命从可能走向现实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表现出历史的主体精神。他们发挥主动性，自觉地走向了革命运动的前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一直在发动武装起义，他们的努力具有引发武昌起义的作用。由于当

时孙、黄都远在国外，不可能具体捕捉中部革命的机遇，抓住革命的突破口。在这方面，两湖革命党人表现出历史创造者的主动性。他们并不是理论上对孙、黄有所超越，而是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具体把握革命态势，形成了革命的紧迫感，不失时机地充当了革命的驱动器。从他们在紧迫中所作出的选择，以及军力聚结、军事部署和战斗行动中，可以看到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很高的革命觉醒，也有一定的斗争水平。

湖北革命党人长期楔入新军，联合会党，在秘密状况中掌握了相当实力的武装，为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创建于1896年的湖北新军，到辛亥时，总计一镇、一混成协，约一万五六千人。新军教习洋操，装配洋枪，本是巩固清政府在湖北统治的得力工具。革命党人在长期流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因此潜入新军，作艰苦的工作，发展革命力量。1904年，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胡瑛等就从军入伍，后来“秀才当兵”、“留学生从军”亦大有人在。革命党人进入新军后，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辛亥革命前，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革命党人和革命同情者占新军三分之一，达五六千人之多。他们在武汉地区长期进行斗争，积蓄了经验和力量。正是他们这种自觉的革命意识和主动精神，才使革命发动成为现实。

二

武昌起义，是早有酝酿的。但又是缺乏周密筹划，也来不及周密筹划下发生的。从深刻的内因和长期的革命准备以及近期的酝酿而言，革命发生并非偶然。因此突发论、偶发论不能解释这一段历史。然而触发革命火焰，又离不开一系列偶然事件。

1911年10月9日上午，汉口宝善里十四号革命机关，由于操作不慎，引起炸药爆炸。这一偶然的爆炸竟成为引发革命烈焰的火

星。革命党人被逼上梁山，毅然发难，并且只能仓促上阵，不能按预计的时间表进行。炸弹案发生后，敌人侦骑四出。当天邓玉麟立即从汉口渡江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将宝善里十四号孙武被炸情况告知蒋翊武和刘复基等人，并表示当晚非起义不可，否则，明日又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蒋翊武当日才从岳州返汉，经过讨论后，他表示：“再无别法，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于是在10月9日下午5时以总司令名义于小朝街八十五号发出了“本军今晚10时起义”的命令。不料事泄，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捕，蒋翊武逃走。起义命令未能顺利送到南湖炮队。南湖信炮未发，武昌城内外各营无法响应。10月9日晚起事的计划便未能实现。但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所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地动员起来，他们盘马弯弓，执戈待命。10月10日凌晨彭、刘、杨三烈士被杀害，革命党人迅速传递消息，相约发动起义。当天傍晚工八营打响第一枪后，革命党人闻风响应，一起动作，形成了浩荡的革命大军。

在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革命党人却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他们中大多均为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就是他们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首义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雄姿。

他们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攻打督署的正确战略决策，并全力以赴地克敌制胜。当起义大火熊熊燃起时，清朝湖广总督瑞澂和清军统制张彪还倚仗手中掌握三千人的军队、二千人的警察，妄图固守督署，作垂死挣扎。在这个关键时刻，革命党人作出了攻坚摧敌的正确决策，决定向清廷在华中的首脑机关——督署发起总攻击。

10月10日晚上11点，进攻的战斗开始打响。民军虽因兵力不足，无功而返，但毫不气馁，决意继续进击。午夜后，民军又发起进攻。第三路之熊秉坤部，担任正面进攻，挺进至保安门正

街，遇敌伏击，马荣、熊秉坤等组织敢死队百余人，力挫敌锋，一举攻占保安门。第一路民军攻势亦凌厉，迅克紫阳桥，越过王府口，与敌激战于长街旁（临近督署）之大都司巷。民军拼死占据大都司巷，逼敌退至督署东辕门。此时南湖炮队已进城，并在中和门、蛇山上建立阵地，发炮袭击督署。署中官役惊恐万状，多越墙而逃。残余敌军固守督署辕门。民军勇士王世龙取煤油、木柴，爬上钟鼓楼亭放火，火势大作，照亮督署前旗杆，民军炮队得以瞄准射击，轰毁督署房屋多处。民军十余人冲进辕门，被守敌排枪所阻。民军又一勇士纪鸿勋提煤油一桶，跃入督署厅旁放火。火势燎及大堂，残敌见巢陷穴崩，作鸟兽散。总督瑞澂早已派人打穿督署后面围墙，仓皇出逃，登上楚豫号兵舰。10月11日拂晓，民军通过竟夜苦战，占领了武昌全城。从工程营发难，到此时还不过十二小时。

如果仅从人数对比来看，二千多人的革命军面对五千人的反动军队仍处于劣势。但革命军奋力崛起，一鼓作气，而清军则猝不及防，军心涣散。兵力、军心、民气及战略措施的正确等一系列因素，使民军终于克敌制胜。

11日，阳夏光复。革命政权在三镇确立。

1911年10月11日，武昌红楼的铁栅栏前面，并排悬挂着两面武昌起义军十八颗圆星的白色义旗，十二名起义军官兵护卫在大旗之下。这一天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在这一天的下午1时许，首义的革命党人，咨议局议员及绅商代表，齐集在红楼，开会讨论组织革命军政府。会议推举的军政府都督为黎元洪，民政总长为立宪派汤化龙。

军政府的建立，是胜利和光荣的行动，但是居于这个政权中的军政首脑却是在清政府的荫庇下曾经显赫一时的军官黎元洪、立宪派的要人汤化龙。这就种下了革命失败的苦根。黎元洪、汤化龙在晚清湖北的政坛上，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现代政治、军事、文化知识的上层人士，他们也不乏爱国心，而且也有一些好的政

声。但他们毕竟是旧营垒中的头面人物，或者对旧营垒脉脉含情，而与真正的革命是从来无缘的，本质上是反对的。他们置身革命政权机构，或附和革命，都是被迫的，而且迟早要发生离异和背叛的。

势如暴风骤雨的武昌首义、阳夏光复，给清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清王朝先后派出荫昌、袁世凯督军南下，剿灭革命。在汉口、汉阳展开了规模巨大的阳夏激战，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而繁华的汉口则遭受到一场大火，使大片闹市化为瓦砾。武汉人民在革命中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又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由于全国各省响应起义，宣布独立，清王朝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不久，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给岌岌可危的武昌带来了转机。于是才得以实现南北议和，组织新的合同性政府。

西方列强积极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停战，为袁世凯绞杀革命创造了条件。11月30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告诉他英国出面调停，令新任汉口兵备道黄开文同汉口英国领事商办。

就在黎元洪出逃的当天，英领事派英人盘恩由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到武昌晤黎元洪，商谈停战。盘恩说武昌成日受炮火威胁，百姓恐慌，领事馆已同清军商谈，建议停战三日，只要同意停战条件，只要在协定上盖章，双方就可停战。停战条件规定：从12月2日上午8时起至12月5日上午8时止停战三日；在停战期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双方行动由各国驻汉领事监视。因黎元洪出逃时将督印带走，遂由吴兆麟、孙武作主，照刻了一个印，盖在协定上，算是达成了协议。

正在逃亡途中的黎元洪听到了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喜出望外，次日就从王家店返武昌。刘公、张振武因黎元洪不同大家商量，弃城私逃，主张通电弹劾，但被其他人所劝阻。

停战原定三天，至12月5日。在英国领事斡旋下，继续停战三

天。到9日，黎元洪和各省到汉口开会的代表，又议决各省停战十五天。停战范围除陕西、山西、四川三省另议外，扩大到全国各省，由独立各省派代表与袁世凯派的代表进行谈判。若于十五日内谈判不决，再延长十五日。同时，黎元洪将停战条件分别电告各省都督一律遵守。

由于汉阳失陷，黄兴又返回上海，上海成为革命党人活动中心。各省留沪代表和江、浙、沪都督急不可待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事遭湖北集团反对，不果而散。旋因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声势大振，各省革命党人一致同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从这天起，改用公历，并确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黄兴等九人为国务员。由武昌首义而触发的辛亥革命，至此夺得了创建中华民国、推翻君主专制的胜利。

三

武昌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昌首义摧毁了清政府在华中的统治中心。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并形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那么武昌首义则是掀起这一高潮的最猛烈的浪峰。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也是以武昌起义作为决定性的战役的。这一起义来得快，来得猛，其胜利之速是历史上所罕见。起义伊始，就捣毁了清王朝在两湖的反动统治中心——武昌城。这样就一举给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腹心地区打破了一个大缺口。

武昌首义给清军的重创，消灭了清王朝大股有生力量。首义

的军事行动，包括起义战斗和稍后的阳夏战斗，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军的大会战，是整个辛亥革命链条中关系全局的战略决战。在首义战斗中，工八营发难之后，抢登楚望台，组成了数千人的起义大军，通过一夜的浴血奋战，光复了武昌。紧接着，在清廷十万火急地先后以荫昌、袁世凯督师会剿武汉时，民军迅速扩编，开赴汉口江岸刘家庙前线，迎战沿京汉路南下的清军，夺得了前线告捷的胜利。在清军源源增兵的不利形势下，民军奋勇抗击，在汉口三道桥、刘家庙、球场路、大智门、歆生路（江汉路）、张美之巷（民生路）、硃口、玉带门和汉阳蔡甸、三眼桥、琴断口、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黑山、龟山、四平山、梅子山、兵工厂等地发生激烈的争夺战。汉口、汉阳虽在两个月的激战中失守，但战果很大，共杀伤清军在万人以上，并且最终保卫了武昌。在战斗中，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支前。农民拿起扁担助战，工人和市民纷纷从军入伍，爱国的资本家如蔡辅卿（汉口商会会长）、李紫云（商会负责人）等主动捐款，还组织商团配合民军作战，以大量粮米供应军需。正是由于军民同心，协同作战，才给清军以迎头痛击。

武昌首义引起了全国响应。全国各省纷纷脱离清王朝而独立，又支援了武昌起义，巩固了首义战果。在武昌首义后十二天，湖南、陕西发生起义，宣布独立。在一个多月里，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独立后的湖南等省援军开赴武汉前线，直接支持了以武汉为主要战场的革命战争。后来武汉战局恶化，江浙革命党人攻克南京，给岌岌可危的武昌局势带来了转机。从全国革命广泛的政治联系上看，武昌起义的胜利不只是一种地域性、局部性的胜利，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创造出的英雄业绩，是全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一个突破，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全国的革命。

武昌首义创造了湖北军政府，开共和立国之先声。湖北军政

府诞生在首义硝烟之中。它在初建时不啻为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雏型。军政府前期的实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它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司法独立、维护和发展工商业等进步政策。所以这些都体现了革命民主精神，取得了人民拥护，也引起了各省的注视。

武昌首义也是对清廷进行总攻击的突破口，给清王朝的覆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历史前提。武昌首义和全国响应的风暴，使清政府摇摇欲坠。当时宣统皇帝溥仪才六岁，由其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握政柄。1911年12月6日，载沣在革命的压力和各种政治因素作用下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辞掉监国摄政王。到1912年2月13日，清帝不得不正式退位，从此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1月1日，从海外归来不久的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昭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虽然实际上只存在了三个月，但其意义是深远的。从此以后，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想作皇帝的独夫民贼虽一再出现，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所有这些都是武昌首义、全国响应的政治形势下形成的。武昌首义打响了击落封建君主王冠的第一枪。武昌首义的炮声，既是清王朝灭亡的丧钟，也是报道共和政权即将诞生的礼炮声。

四

但是武昌起义创造的也不是一天云锦，它存在严重不足和缺陷所构成的斑斑阴痕，而且最终辛亥革命不能不归于失败。

无可讳言，武昌起义是存在事起仓促、布置不周的缺失的。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图谋在武汉发难，将革命风暴中心从祖国南部转到长江中下游，这种决策是深具战略识见的。

但是联络工作并未完全就绪（黄兴此时尚在香港），湖北革命

党人就决定八月十五日起义（1911年10月6日），而且一系列偶然事件又冲乱了预定的起义计划，打乱了起义的时间表。而清吏的狂捕滥杀又成了一种催化剂，把人人自危的革命党人“逼上梁山”。因此10月10日，革命者乃仓卒起事。许多人在论及这一起义时，指出“初无全算”，“仓促上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实说得恰当些，并非无通盘之全算，而是算而不周，或算而被打乱，乃至事态紧迫，形成“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之势，只能匆忙发难。

同时不能不看到，起义领导核心是不健全、不坚强。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但此时正寄迹美国，不可能亲自来领导起义。武汉革命党人决定请黄兴来汉主持大计是完全正确的，但黄兴滞留香港，黄兴未到而起义已发生。武汉地区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因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被破坏，首义的前一天走避京山。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已在宝善里被炸伤，而躲在同志家中养伤。这一来，不仅全国革命党人公认的革命领袖孙、黄不能亲率义军，就是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蒋翊武、孙武亦不在起义火线上。结果在工八营发难，占领楚望台时，成群龙无首之势，偶然中把吴兆麟（曾参加日知会）请出当了起义军临时总指挥。到第二天成立湖北军政府时，由于黄兴未至，蒋翊武远遁，孙武负伤，刘公在汉口，无人为首。革命党人中有一部分原先就对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之“知兵”、“宽厚”、“重视知识分子”有好感，并在小范围中议论过黎在起义后出任都督。因此成立军政府时，拥黎为都督，而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则被推为民政总长。这样一来，新成立之湖北军政府，一方面象征新政权的诞生；另一方面，这个新政权一开始就为旧党所盘踞，乃至革命党人大权旁落。当然黎元洪、汤化龙任职军政府，对稳定起义后的武汉政局，号召本省和外省社会各阶层人士附从革命，以孤立清朝反动派，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如果在革命党人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控握大权的前提下，争取和团结黎、汤一类上层人士归附

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缺乏这种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状态中，良莠不分地招收过多的旧人员，特别是将黎、汤抬上军政府最高领导层，这就不能不包藏祸机了。辛亥革命在武昌首胜，也将在武昌失败，于此已露端倪。果然后来黎元洪屈服于袁世凯压力，利用都督之权，网罗旧党，排斥革命党人，把那些拥他上台的天真烂漫的革命者抛进血泊之中。这一切表明，湖北军政府从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包藏着严重的内部危机。革命党人的首义是光荣的创举，但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又是软弱、动摇，易于和旧势力妥协，不可能把斗争进行到底。

教训的另一个方面是：革命党人的现代政治、现代文化意识明显不足，革命理论准备相对薄弱。不能不承认，武昌起义人士具有实行家的优良品格，而缺乏高层次的思想家、政治家的素养。而在武昌起义后的历史变局中，革命党人意志消退，内部分裂。湖北的文学社、共进会发动起义时是具有首创精神和冒险犯难的牺牲精神的。为了共谋大举，两组织捐弃前隙，实行联合。但两者原先分途并进，暂时的联合很快瓦解。在首义胜利后，两组织处于散乱状态，相互间又发生政争和权争。孙武在密谋起义时是有功的，但起义后为了谋取权利，跟随黎元洪干了一些坏事和错事。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较普遍存在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情绪，这种情绪像流行病一般也浸染到武汉，不能不使武汉一部分革命党人形成可悲的停滞和倒退，革命党人相当普遍地表现出“排满革命”的局限性：他们满足于清朝皇帝的退位，只要汉人当总统哪怕是袁世凯也行；对于国家的共和、富强丢在脑后，而兴之所寄则在叙勋、授禄，上功劳簿，偃然高卧于名利场中。一部分思想蜕化的革命党人如蔡汉卿等投黎之麾下。另有一些不肯附黎的革命党人则横遭迫害，如蒋翊武被逼走，张振武、祝制六遭杀害，大批革命党人遭到裁汰。这种情状，蔡济民在《书愤》一诗中，入木三分地作了揭露：“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黎元洪背离了革命党人推举他的意愿，成了革命

的对立物。在全国范围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压迫下，辛亥革命半途夭折。独夫民贼袁世凯篡夺了政权，把整个国家又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至于湖北军政府在军事上指挥上的失误，在施政中未能力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未能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切实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未能抵制和识破袁世凯的窃国阴谋，而且后来唯袁之命是从，如此等等，均为革命过程中所留下的深刻教训。

武昌起义的缺陷归根结底是暴露了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动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具有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他们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又因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存在联系，惧怕劳动人民，所以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并不否定这次革命作为一块丰碑耸立在中国近代史上。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宏观历史看，由于它推翻了延亘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清朝末年国家面临瓜分豆剖的险境时开共和国之先声，其赫赫功业，永昭日月，耿耿浩气，与世长存！当然，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也深刻地显露出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挽救中国的历史教训，昭示出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当初参加了辛亥革命或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的一批先进分子，及时地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在两湖地区涌现出如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就是杰出的代表。是他们承上启下，开拓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中国革命从艰难曲折中引向胜利的航道。

从准备、胜利到失败

——湖南辛亥革命叙略

刘晴波 周国兴

辛亥革命运动，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或改良的运动”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比较正规、明确和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各界人民进行的“全国规模的运动”^②。在这次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中，湖南是一个极关重要的省份。在1894年孙中山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之后，黄兴是继起的先驱者，他于1903年秋末创立了华兴会，以后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导者；相毗邻的湖南、湖北两省，在革命运动中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区域整体；特别是在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紧要关头，湖南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响应，解除了武汉战场的后顾之忧，并立即派军援鄂，对巩固起义后刚建立的武昌革命政权，推动全国各省响应，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湖南人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英勇斗争，写下了壮烈的可歌可泣的一页。今天，在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鼓舞我们为振兴中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斗。

刘晴波，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周国兴，湖南省民革机关干部。

一 戊戌变法前后的湖南形势及其影响

辛亥革命运动是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并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先后失败的过程中曲折前进。那时，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清朝政府的丧权卖国，使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灾难深重。清朝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祖国被帝国主义“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局，以“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⑧，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开展了爱国救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辛亥革命所处的形势和历史背景。

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开展了广泛的斗争。尤其在戊戌变法前后，湖南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形势，这对辛亥革命在湖南的酝酿准备有着显著的影响。

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在全国是很为突出的省份。当康有为酝酿变法图强之际，浏阳人谭嗣同在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后，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变法维新主张，而且加以实行。在长沙，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刊行《湘学报》，创办时务学堂（蔡锷是当时的一个学生），设立南学会和发刊《湘报》。这个期间，变法维新的著名人士云集湖南，维新空气很为浓厚，一时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范文澜语）。同时，湖南开始创办了一批新型的工矿企业，资本主义经济在蔚然兴起。维新变法的人们在力图争取新的形势和新的前途。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清廷的顽固守旧派绞杀了这次变法运动，谭嗣同等殉难。这次政变震动了全国，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在全国和湖南都促进了反清革命力量的加速成长。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些人转向保守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而多数人则更为觉悟，认为君主立宪途径行不通，只有像孙中山所

倡导的那样，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才是救亡图存的道路。社会思潮从改良转向了革命，这个急剧变化影响到当时全国的青年一代，而湖南的青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年以后，与谭嗣同为总角之交的浏阳人唐才常，同湖南人林圭、沈荇、秦力山等以及各省志士，在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的联络和影响之下，以两湖和安徽为基地，于1900年8月发动了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还没有完全摆脱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但它采用较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形式来挽救民族危亡，这标志着戊戌维新改良主义道路的基本结束，成为以后同盟会领导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先声^④。在湖南，谭嗣同等发动的维新运动和唐才常等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尤其是他们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在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鼓舞了黄兴等青年们的革命斗志^⑤。

这里需要说明，在有些论著中，关于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对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影响，有所忽视，好像戊戌变法的改良运动和托名勤王、志在革命的自立军起义，与辛亥革命运动没有关系或关系甚微。事实是，没有戊戌变法失败后所产生的革命与改良两种道路的分野和斗争，没有自立军的武装起义及其被镇压的极为现实的教训，就很难促使革命力量的逐步壮大和清朝的日趋孤立，从而导向武昌起义和帝制的推翻。毛泽东同志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人民反抗斗争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从历史事实的连续性、继承性的意义上论述的。正由于辛亥革命所处的是更为前进的时代和更加丰富的斗争内容，才使它成为在比较正规、明确和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湖南人民的斗争

辛亥革命运动准备阶段，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全国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湖南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1. 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留学生群与华兴会的成立及长沙起义

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知识分子（包括留学生）、会党、华侨和清军中的一些士兵（包括部分中下级军官），他们分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在这些中坚力量中，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①又说：“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②湖南，在戊戌变法前后也逐渐形成着这个“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这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而涌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赴日留学，到1902年已形成高潮。据1904年统计，湖南留日学生达401人，占全国留日学生的百分之十四强，以后又有显著增加^③。这些留学生除少数人以外，一般地多具有很大的革命性，有一定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④，很多人或先或后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毕永年、郑宪成等最早参加了兴中会；秦力山于1901年参加创办《国民报》刊物，“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两大主义”；次年冬，杨毓麟又以“湖南之湖南人”署名，撰写了《新湖南》一书，明确主张“排满革命”、“改造社会”，他并与黄兴、樊锥、梁焕彝、周家树等，刊行了《游学译编》杂志；1903年，陈天华发表了《猛回头》、《警世钟》。这种留学生运动的兴起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鼓吹反清革命的作品与活动，在全国和湖南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同盟会的成立作了理论和思想上的一些准备。

1903年秋末华兴会的筹建，标志着湖南革命组织上的重大发展，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黄兴于1902年6月抵达东京留学，次年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同年夏回国策动反清革命。1903年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他和留日学生及省内

知识分子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翁巩、秦毓璠等，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公举黄兴为会长，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起义中所提口号），公开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隐寓“扑灭满清”之意，在革命方略上“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以策动武装起义^⑩。华兴会会员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分布省内外，他们多就地设立秘密机关或分支机构，联络各方。此外，还建立了同仇会、爱国协会、新华会等外围组织。

华兴会成立后的一次重大斗争是组织长沙起义。黄兴等人在1904年春初，着重联络会党，与具有“同一排满宗旨”、拥众二万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协议，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预定于是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以武备学堂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在长沙发难，省内各地在浏阳、衡州（今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今邵阳），以会党和部分华兴会骨干为基础，分五路响应。为实现这个宏大计划，华兴会在筹款购械、进行反清宣传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黄兴并派宋教仁、陈天华、周洪业、周维桢、杨毓麟等人分赴鄂、赣、川、桂等省联络，在浙、沪、宁也作了响应准备。但是，因为事先泄露消息，这次起义于是年10月初归于失败（马福益于次春遇害）。然而可以看出，这时的华兴会已成为领导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起义风声震惊两湖，波及国内外，如孙中山所说，“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⑪，影响是不小的。

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后，华兴会的一些成员流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兴会和湖南留日学生在中国同盟会的建立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兴鉴于华兴会地域性起义的失败，加强了“非联合各省革命党员组织一大团体，决不足以推翻满清”的思想^⑫，于1904年在湘、滇、直（隶）、苏、豫等省籍留学生中组织了革命同志会，以壮大革命力量；宋教仁等在1905年6月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发刊词中满怀激情地赞美可爱的祖国，“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

前曰，支那万岁！”庄严地号召留学界“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当孙中山抱着“招集同志，合成大团”的信念，在1905年7月抵达日本以后，经杨度、宫崎寅藏分别介绍，于7月下旬第一次与黄兴会晤。兴中会和华兴会的两位领袖，“商议国家大事”，情意欢洽^⑤。这次会晤，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富于重大意义的，从而促进了各省革命力量的大团结，加快了建立中国同盟会的步伐。

在兴中会、华兴会和其他各省革命者赞成联合的基础上，1905年7月30日，召开了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商定了会名，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推举八人为章程起草员，其中有湖南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三人。8月20日举行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孙中山由黄兴提名为总理，黄兴由总理指定任执行部庶务，居于协理地位，并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移作同盟会的机关报（后《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方封闭，改出《民报》）。在同盟会成立过程中，黄兴和他所领导的华兴会，确实起了显著的作用。据同盟会最初两年（1905—1906）会员统计，在979名会员中，湘籍有158人，占百分之十六强，在各省中仅次于广东籍会员人数。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在它的组织与领导下，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 同盟会成立后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1905年，全国的反美爱国斗争进入高潮。湖南在禹之谟等的策动与领导下，青年学生和城市市民首先开展了抵制美货运动。特别是在学界的革命活动，尤为活跃。是年底，在湖南学生中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同盟会中杰出的革命家和宣传家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大森湾愤激投海自杀。不久，同盟会骨干之一益阳人姚洪业，在上海办理中国公学过程中，因官绅阻挠，于1906年3月忧愤自沉黄浦江。陈、

姚忧国自杀，以冀引起国人的觉醒，在湖南学生和各界中产生巨大反响。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及留日返国的宁调元，首先倡议公葬陈、姚于岳麓山，以表彰义烈。这年5月23日（闰四月初一），二人灵柩运抵长沙。同盟会分会冲破清方官吏的层层阻挠，发动学界、军界一万多人，举行公葬仪式。公葬队伍长达十余里，高唱哀歌，渡河至岳麓山，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这是对清朝统治者的一次政治大示威，激扬了民心，扩大了革命影响。毛泽东同志在1919年说：这是湖南学生界“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④。清地方当局对这种革命形势很为恐慌，不久逮捕了身兼湖南教育会长、商会会董和湖南学生自治会干事长的禹之谟，次年2月6日将他惨杀于靖州西门外。禹之谟的牺牲，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光辉榜样。

1906年秋冬爆发萍浏醴大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同年春，同盟会本部派遣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黄兴告以“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他们联络会党、发动矿工，制定了起义计划，以萍浏醴为中心，各路响应。12月4日大起义全面爆发。起义领袖龚春台声称“奉中华民国政府令”，以都督名义发布檄文，声明“必破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必建共和民国”、“使地权与民平均”^⑤。这次大起义坚持近一月，清政府用数万军队镇压，起义遭到失败，起义人民先后被杀者达万人，刘道一、蔡绍南英勇牺牲。大起义虽遭失败，但声势浩大，震动了长江沿岸各省。特别是它的檄文，鲜明地反映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第一次举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与旧式会党起事有原则性的区别。这次起义出现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对全国民主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湖南在1909年遭受水旱虫灾之后，1910年春荒时节，长沙及其他县份出现了大批饥民。在严重的米荒危机笼罩下，这年4月14日，长沙爆发了“抢米”大风潮，众多的泥木工人、手工业

者、贫民和城郊农民参加了这一斗争。全城罢市，饥民群众焚烧了巡抚衙门、外国领事馆、银行等等。清朝统治者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立即派军镇压，并从湖北调来常备军五营，杀害了木匠刘永福，拘捕数百人。长沙“抢米”风潮虽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群众自发，没有统一领导与严密组织，在军队中的同盟会员（如陈强、陈作新等）也没有配合行动，失去乘势发动起义的时机，但它迫使统治者购运粮食，设场平糶，同时也推动了湖南地方各属（如宁乡、益阳、常德、湘潭、浏阳、醴陵、岳州等地）的反压迫、反饥饿斗争。

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川汉、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引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湖南、湖北、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为此，在1909年6月，湖南留日学生创刊了《湘路警钟》杂志（后改为《湘路危言》），湘路集股会等出版了《湘路新志》、《湘路周报》，宣传“拒债”、“集股”、“商办”，以收回路权。旅外各地湘人与省内相配合，掀起了规模广泛的保路运动。至1911年春，清政府与英、法、德、美银行团签订合同，出卖了粤汉、川汉路权，湖南各团体于5月13日召开万人大会，要求收归商办，各校纷纷罢课，风潮席卷长沙。湖南地方当局采取高压政策，企图遏止这一运动。但革命风暴已经逼近，各阶层进步人士也转到革命一方，纷纷参加运动。立宪派因为国会请愿无甚结果，多数人也与清朝统治宣告决裂，使清朝统治阶级更加孤立。在黄花岗起义的巨大影响下，革命形势在迅速发展，而保路运动已成为武昌起义的序幕。

三 辛亥革命湖南光复

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湖南最早响应。这是革命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奋斗的结果。

从华兴会组织长沙起义到同盟会领导的各次斗争，为辛亥革命做了准备。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南各种革命团体和联络机关纷

纷出现，虽然成分不一，但在推翻清朝这个目标上，互相配合，共同推动了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在长沙文明绣业女校，曾杰等组成了同盟会湖南分会的总机关；作民译社、定忠客栈、振楚学堂、贾太傅祠等处，是同盟会员邹永成、袁剑非、林伯渠等人主持的机关；其他如铁路学堂、实业学堂、陆军小学堂、明德学堂等处以及军队中，都有革命党人在活动。1911年7月末，为了策动在长江流域起义，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33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黄兴对长江上下联成一气、力争武汉的计划，积极赞成。在同盟会中部总会协助下，湘鄂两省革命党人为推动起义高潮，曾有共同规划：以两湖为发难地，如湖北先行起义，则湖南即时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时响应^⑥。谭人凤、焦达峰等在湘鄂之间进行联络。因此，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湖南革命党人更加紧了活动。其中焦达峰、陈作新作出了积极贡献。

焦达峰，浏阳人，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后与张百祥（四川人）、孙武、刘公（均湖北人）等另组共进会，是同盟会的一个“行动队”。他回湖南后，联络同盟会员，组织秘密机关，并与湖北联络。在湖南，他着重联络会党。陈作新，在湖南舟日学堂读书时参加同盟会，后在新军四十九标充排长、教官。在“抢米”风潮中被革职后，他寄居长沙李培心堂，着重运动新军。10月12日湖北革命军代表胡燏槐到长沙，要求湖南立即响应。在此后的三天中，焦、陈等革命党人与黄瑛、左学谦等立宪派人士连续举行会议，共商发难办法，原定18日（八月二十七）晚举行起义，因城内驻军未能按时响应，遂改期举行。21日（八月三十）焦达峰颁布了特别命令十六道，宣布于次日举行起义。

根据焦达峰的起义动员令，10月22日（九月初一）上午8时开始，彭友胜率四十九标、五十标各一部由北门攻城，安定超、李金山各率四十九标另一部及炮队由小吴门攻城。至下午3时，起义新军分别占领了军装局、咨议局。旋同盟会员在咨议局决定，

由焦达峰等率领一部新军，直冲抚署一带。清巡抚余诚格在大堂上，悬出大“汉”字白旗，伪装投降以为伺机潜逃的缓兵之计。从新军入城到攻占抚署，没有遇到清军强力抵抗，帝国主义者企图干涉的阴谋也没有得逞。这说明了革命形势的成熟。起义军将抚署改为“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次日复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被举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发布了檄文。长沙光复了，人民取得了重大胜利。

长沙起义胜利后，湖南宣告脱离清廷独立。接着，岳州、衡州、宝庆、常德各属，不旬日间，都已光复；郴、桂、永等州，也先后反正。在各地光复过程中，有的是在革命党人或会党进攻时清吏出逃（如宝庆、衡州）、迎降（如新化），有的是都督府派人前往招抚（如常德），有的是同盟会人士策动新军起义（如岳州）；这些特点说明，长沙光复，革命声威所播，清地方官吏不敢顽抗，各地可以传檄而定。至10月30日，除湘西外，革命风暴席卷全省。各地光复标志着辛亥革命在湖南的胜利，宣告了清朝专制统治在湖南的结束。

湖南光复后，都督府立即派军队援鄂，大力支持首举义旗、战争紧急的武昌革命政权，在全国这是首要的省份。首先以四十九标为基础，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由王隆中率领于10月28日乘轮北上；以后又陆续派遣几批援鄂部队，分别以刘玉堂、甘兴典、刘耀武为标统，总计兵力达十六个营。湖南援鄂部队，在以黄兴为总司令的武汉保卫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在湖南的胜利，各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清朝在湖南的统治被推翻，一时“光复”、“反正”，成为人们交谈中最新鲜的名词，很多人剪去了象征清朝统治的发辫子；当湖北革命军代表在湘乡驻省中学演说时，激情的学生“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⑩；何劲等在教育会演说“中华民国之盛事及满（清）政府之弊政”，听众鼓掌如雷；破除对君主专制的迷信，在群众思想上开辟了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

途径。人民欢迎起义，在长沙光复之际，“各商民人等欢迎义师，……致送猪马牛羊者，络绎不绝”^⑧；在教育会坪召开的庆祝会和全城的提灯游行中，出现了热烈场面，演讲、唱戏，高歌武昌起义，街道上挤满了人群。当焦达峰所委西路招抚使杨任（晋康）抵达常德时，商民悬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⑨。尤为醒目的一个新气象是群众踊跃投军，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长沙起义后几天，为了援鄂，连日招募军队，三日之内，即“达六万人”，其中有农民、城市苦力和会党群众，而青年学生更为踊跃，几日之内，募学生军一军^⑩，毛泽东同志当时对这次学生投军印象深刻，后来在延安回忆说：当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军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由于他“决定（到湖北去）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所以没有加入学生军^⑪。同时，在长沙起义当日，起义军首先将负隅顽抗的清巡防营中路统领黄忠浩在小吴门斩首示众，对捕获的长沙县知事沈瀛、营务处处长申锡绶等反对革命的顽固分子，一并处死；次日晚又将清藩司署拒降图谋暴乱的卫队弹压缴械，革命秩序初步建立，社会各业也基本稳定。这几天，新任都督焦达峰为“博采民意”，“接见民众无晨昏”^⑫，各团体相率前往都督府致贺：“齐声欢呼”^⑬，革命政权已初步建立。社会上一片新的气象，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对新成立的都督府倍感亲切，对建立共和国满怀希望，同时也正在思考探索着新的前途。

四 辛亥革命在湖南失败的特征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辛亥革命不久失败了。总的来说，辛亥革命在湖南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同其他省份基本一致。然而，就具体情况而言，辛亥革命在湖南的失败，又有不同于他省的特征。

（一）某些立宪派人士与清朝政权的潜在势力相结合，采用武装流血手段，迅速发动了政变。

长沙起义前夕，立宪派就开始了积极的活动。他们以长沙自治公所、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等为据点，以湖南咨议局为大本营。倚恃势力雄厚，富于政治经验，又有合法身份和地盘，在惊恐革命已经爆发之余，出于立宪请愿和保路运动中对清廷的失望不满，声称不反对革命和有条件的支持革命，并与革命党人联络商议，有所行动；同时又与清政权的潜在势力结合，以图乘机掌握政权。如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说：“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政长官同心协力而后可。”^⑧于是立宪派先央求有军权和矿业力量的黄忠浩“宣布革命，自任都督，以维桑梓”，因黄探知武汉战争民军失利，不敢投机^⑨，于是立宪派又与同盟会人士相联络，参加了辛亥革命行列。这对于孤立湖南清政权、促进长沙起义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立宪派惧怕革命的思想本质和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在湖南辛亥革命中，也必然产生消极作用和严重恶果。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段落中。

首先，立宪派反对暴力起义。10月13、14日，以焦、陈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主张采取长沙“抢米”风潮时的暴动手段，立宪派人士黄瑛等就“力劝其勿扰秩序，至于流涕”^⑩，原定10月18日起义计划落空后，立宪派也不相信革命党人的力量，并对焦达峰表示不满^⑪。

第二，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立宪派开展了有计划的夺权斗争。起义当晚推举都督时，立宪派本拟以谭延闿充任，由于革命党人特别是新军代表的反对，没有得逞。焦、陈被举为正副都督，是革命党人的胜利，也是立宪派的挫败。从此，立宪派由政治暗斗逐步转到公开夺权。10月23日以原咨议局议员为主干的立宪派，迫使焦达峰同意设立参议院，以谭延闿为院长，该院组织规则表明，其用意在于限制、削夺都督的权力。接着又于都督之

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负责人多为立宪派成员，实际上控制着湖南的政权。至此，立宪派实现了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与此同时，立宪派进一步在政治上打击以焦、陈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诬蔑焦、陈为“会匪”、歧视新军，以离间革命政权与各方关系。

第三，在革命党人进行了一定反击之后，立宪派进而积极准备谋害焦、陈。面对立宪派的一系列夺取政权活动，焦、陈等警惕不够，也缺乏掌握政权的经验，“一意出师援鄂为务”^⑧。10月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之一谭人凤回到了湖南，他看到参议院“总揽全权”，“焦达峰仅一笼中鸟而已”，因而愤然质问谭延闿，主张“撤消参议院”^⑨。同盟会会员中的坚定分子与焦达峰、陈作新等主张采取坚决行动予以反击，但另一些人则主张妥协，因而未能有所作为^⑩。由于立宪派与革命党人的矛盾趋于表面化，立宪派知道在革命处于高潮的情势下，没有武力不能夺权，他们遂在已经联络、收买旧军官和政客的基础上，深夜在荷花池召开秘密会议，旧军官蒋国经、梅馨、何瑞琮(五十标一、二营和炮队管带)、黄忠浩余党(黄忠绩、廖铭缙等)以及谭延闿、陈炳煥等汇聚在一起，决定由梅馨策动五十标起来杀害焦、陈。但这个阴谋为五十标的目兵同盟会员邓超、丁惠黎等得知，立即由安定超、李金山等商讨紧急措施，决定镇压叛乱，保卫都督府。这些革命士兵，为保卫湖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作出了贡献，使立宪派的这个阴谋一时未能得逞。

第四，立宪派发动长沙流血政变，焦、陈殉难。湖南援鄂部队，于10月28日出发，长沙防务空虚，立宪派利用这个时机进一步策动政变。次日湖南各界召开欢迎湖北军政府运械代表任震大会，焦达峰因受立宪派逼迫，“力辞都督，愿赴前敌”，“但合座慰留”^⑪。在革命党人建议下，在焦达峰主持的各界会议上，通过取消参议院的决议，谭延闿被迫辞职，革命党人在反篡权阴谋上取得了一步胜利，焦、陈也加紧组织二批援鄂部队。然而由于两

派矛盾已经激化，立宪派先以准备就绪，即于10月31日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们制造北门外和丰公司挤兑纸币风潮，诱使陈作新前往调处时，在铁佛寺前，梅馨预设的伏兵突起将陈乱刀砍死。接着梅馨又指使部队冲进都督府。正在商讨续援湖北事宜的焦达峰，不畏凶险，挺身而出，愤怒地指出：“今咨议局绅董，煽动黄某(忠浩)残部造反，已杀副都督，今又欲杀余，梅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竟为若辈所算。”^⑤遂被执牺牲。立宪派即刻拥立谭延闿为都督。

第五，立宪派乘机扩大势力地盘，夺取湖南各地政权。同盟会力量在省内各地缺乏统一计划和领导，在长沙的上层人物于流血政变后又软弱妥协，因而立宪派势力很快伸展到地方各属，夺取了政权。常德、宝庆、衡州各属，湘潭、郴永、湘西等地的起义活动和革命果实，至年底基本上为立宪派和清残余势力所攫取。

长沙政变，表明刚取得胜利的湖南辛亥革命已经基本失败，同时也标志着湖南政权逐步转向军阀统治的开始。正如当时有卓见的革命党人所感慨的那样：“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二) 长沙流血政变后，新都督谭延闿从立宪派首领逐步转化为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湖南开始了以“共和”为名的南北军阀统治。

焦、陈被害，虽然立宪派弹冠相庆，甚至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也“欣喜无量”地祝贺^⑥，但是也激起了军、学各界和会党群众的极大义愤。谭延闿是一个圆滑的官僚，在这种情势下，为了统治湖南，他采取了逐步向实力割据演变的以下步骤：

1. 为缓和群众的革命义愤，一方面除续派甘兴典等率军援鄂外，又把长沙政变归咎于“乱兵”，声言要为焦、陈“厚殓”，铸造“纪念铜像”，另一方面遇有革命党人“乘机起事”，就命令军队“即行袭击”，同时加紧夺取和镇压各地革命政权，以逐步稳定统

治秩序。

2. 谭延闿不做寡头都督，在统治秩序稍定之际，他提升梅馨为独立第二协协统，旋升第五师师长，并赏所部杀害焦、陈凶手五百金。谭延闿进而掌握军权，然后，就不再出兵援鄂，只是坐观武昌起义的成败。

3. 谭延闿在以孙中山为首与袁世凯谈判的南北议和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统治湖南的地位，及至袁世凯篡权以后，谭延闿首先通电拥戴，被任为湖南都督，以立宪派和清朝残余势力相结合的湖南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后来谭人凤说：谭延闿以辛亥革命时“维持湘省之劳”，掩盖了“贻祸湘省”的行径。梅馨后来在自述中也供认：“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⑧

以谭延闿为首领的湖南立宪派，勾结清朝潜在势力策动了长沙政变，从此湖南陷于军阀统治，这就是辛亥革命在湖南失败的显著特征。

(三) “二次革命”在湖南于无声息中流产。

1913年7月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尾声。当时袁世凯窃权独裁，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孙中山、黄兴等人酝酿起兵讨袁之际，国民党人在湖南已展开斗争。他们建立了“公民会”、“外府联合会”、“公民团”（又合并为“湖南公民联合会”）等组织，谭人凤也奉黄兴命返回湖南活动，一时社会上反袁独立空气浓厚。然而时已籍隶国民党的谭延闿，却密函黎元洪说：“如湘省独立，即服毒自杀”，先取得谅解。及至江西、广东、上海宣布反袁独立，黄兴并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谭迫于反袁形势，不得已于7月17日宣布湖南独立。名为独立，实则按兵不动。至讨袁失利，谭延闿先杀害了坚持驱谭反袁的刘崧衡等。黄兴自南京出走后，谭随即取消湖南独立。他在先已拟就的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二次革命”中湖南宣布独

立，无甚作为，于28天内流产。孙中山分析“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说：“同党人心之涣散”，“组安(谭延闿)更反复于三湘”，确系实情。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同志从它的性质、群众基础和领导权等等方面，都作了深刻论述，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对其领导人物也有崇高正确的评价，不因时代、阶级的局限性苛求于前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总结了经验教训，在马列主义指引下，继续奋勇前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回忆说：辛亥“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在将革命不断推向前进的过程中，湖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一次又一次地奋起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务，从而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明大道。

①②③⑦⑩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27—528和627、1359、523、604页。

④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载《辛亥革命》(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下同)，第85页。

⑤ 参阅刘泱泱：《试论自立军起义》，载《求索》1981年第3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114页。

⑥ 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⑦ 贾维诚：《清末湖南留日学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载《求索》1981年第3期。

⑧ 刘揆一：《黄兴传记》，载《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⑨ 孙中山：《革命起源》，载《辛亥革命》(一)第10页。

⑩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六册第1357页。

⑪ 宫崎龙介编《宫崎滔天全集》(日本平凡社1971年版)第一卷，第282—283页，译文见《黄兴年谱》第49、50页。

- ⑭ 《湘江评论》第四号。
- ⑮ 《辛亥革命》(二)第475—477页。
- ⑯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36页。
- ⑰⑱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6、117页。
- ⑲ 郭孝威,《湖南光复纪事》,载《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2编。
- ⑳㉑ 邹鲁,《杨任传》、《焦达峰传》,载《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编。
- ㉒⑳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2编第302页。
- ㉔ 《湘省大汉报》第三号,标明“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六日发行”。
- ㉕⑳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1912年北京铅印本)。
- ㉖⑳⑳ 栗勘时,《湖南反正追记》,载《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
- ㉗ 黄瑛,《自述》诗注语。
- ㉘ 冯自由,《湖南都督焦达峰》,《革命逸史》第2集。
- ㉙⑳ 谭人凤,《石叟牌词》。
- ㉚ 章炳麟,《焦达峰传》。
- ㉛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

辛亥革命在陕西的前前后后

邵宏谟 沈传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为之振奋，大江南北闻风响应，揭开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帷幕。

陕西是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省份之一，在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即1911年10月22日，陕西的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掌握新军发动了西安起义。陕西新军起义，波及晋、豫、甘三省，影响至于宁、青、新等地，是全国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的资本主义虽然不甚发达，但社会矛盾尖锐，反清思想源远流长，同盟会建立较早，而且是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活动的。同时，陕西地处西北，清朝统治力量薄弱，会党势力强大，活动激烈，特别是在新军中，这就给同盟会争取会党、联络新军创造了条件。因此，陕西能够最早响应武昌起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的。

一 辛亥革命前夕的陕西社会

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八国联军之役后，彻底向外国侵略者屈服投降，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陕西人民的生活，已陷入极端痛苦的境地，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邵宏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沈传忠，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一）沉重的皇差负担及新政开支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逃到西安，在国难当头、陕西又遭严重旱灾的情况下，仍然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自支应局开局之日起，到乘舆莅陕之日止，不到一月，开销达29万两白银^①。驻蹕期间，仅太后、皇帝御膳费一项，每日需银约200余两，可买3800斤麦子^②。1901年10月，两宫回銮，沿途皆铺黄沙，30里设一行宫。每到一县，除迎送外，还需进燕菜一碗。回銮皇差，陕西省支银31万两^③。而且一年多搜刮陕西人民的财物，装车3000余辆。两宫之奢侈及其对陕民榨取之苛重，可见一斑了。1902年，清政府开始分期支付《辛丑条约》的赔款，其额为23159000两，陕西人民分担60万两之多。另外加上宁强、三边两教案的赔款，总计达70万两以上^④。同年，陕西又奉旨推行新政，仅军饷一项，年支达92万余两^⑤，其他新政开支，为数也不少。

（二）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

为了支付以上各项庞大款项，陕西的封建统治者，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掠夺。

首先是增加差徭银的征收，名曰“赔款差徭”，规定每亩地丁正银1两，加收4钱，随粮带征。但有的县份，官吏以种种借口，加收至5钱、7钱不等，最高的竟达1两之多。^⑥

其次是盐斤加价，这是清政府敲榨陕西人民最残酷的手段之一。1901年，陕西巡抚李绍棻以筹备赔款为名，请准山西潞盐入境，每斤加价4文；甘肃花马池盐入境，持有甘省厘票者，每斤加价8文，无票者加价16文，其他杂项附加尚不在内。后来又一再增加，因之盐价不断高涨，由光绪初年的每斤十六七文，涨至二十九年（1903年）的六七十文。有的地方，甚至涨到百文，比当时的面价还高五六倍以至十余倍（面价每斤12文）。盐价暴涨，

“民多相率淡食”。①

再其次是征收土税，即鸦片烟税。清政府为了向人民榨取，强令人民种烟，然后再按亩征收重税，美其名曰“以征为禁”或叫做“寓禁于征”。这一灭绝人性的措施的施行，使陕西烟田大增。据巡抚恩寿奏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西平坡烟田竟达53万余亩。

随着新政的推行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地方捐税愈来愈多，名目也愈来愈巧，什么“铁路捐”、“烟筒捐”、“驴头捐”等等，千奇百怪，不胜枚举。而且捐到各县，层层官吏又中饱私囊，因此，人民的负担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同时，庚子以来，陕西连遭水旱灾害，灾区达六十余州县，尤以关中为甚。阡陌凋敝，饿殍载道，饥民成群结队，纷纷向富豪之家就食，名曰“吃大户”。史称“天府之区”的关中，在三年饥馑之后，农民弃地流徙，十室九空。据抚部上报，仅关中的临潼、白水、三水（旬邑）、淳化、礼泉五县，新增荒地共224022亩。就这样，清廷并没有减轻对人民的压榨，而是“无年不加捐，无款不剥民，乡民饮血茹苦，久已积不能平。”②

（三）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

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以后，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争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陕西内地。1908年，英、比等帝国主义勾结清朝统治者，阴谋抢夺西潼铁路的修筑权。同年，日、德等帝国主义又联合要求与清政府合办延长石油矿。不久，美国、俄国也跟踪前来争夺。陕西的地方官吏，在帮助帝国主义镇压了宁强、三边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后，教会倚仗帝国主义的特权，活动更加猖獗，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因此，陕西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空前激化。

（四）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庚子以后，陕西人民的抗捐、抗税、闹教（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以及保护路权、矿权的斗争，如火如荼，燃及全省各地。

1903年，定边、靖边人民在任汉洸等领导下，“委官设职”，“制作旗号”，密谋闹教^①。同年6月，平利县洛河的人民群众，因为不能忍受教会的欺凌和压榨，在江湖会首领何彩凤的领导下，屯聚洛河之太白庙，竖起“兴汉灭洋”的旗帜，声称“要攻教堂，杀尽教民”。洋人告到清廷，要求派兵“剿办”。闹教群众终于被陕安总兵姚文广镇压下去，江湖会首领三十余人被处斩，死伤群众数百人。这场重大的反教斗争，称为“洛河教案”^②。1905年春，周至沙云屯、马家滩群众以窦明堂为首，掀起反洋教斗争，又酿成周至教案^③。同年，哥老会首领梁和尚联合会党数千人，并策动巡防队在安康发动武装起义^④。

1903年，凤翔、岐山、宝鸡等县农民群众在李猪娃、晁黑狗、王摇摇等领导下，掀起了反对盐斤加价的斗争，分别捣毁了各地的官盐局和官钱局^⑤。1906年10月，扶风县张化龙等发动群众千余人，反对铁路捐和盐斤加价，率众向县衙“交农”罢耕。渭南、华州（华县）农民群众闻风响应，也结队赴县“交农”。此后，蒲城、富平、华阴、大荔等县农民也相继掀起“交农”运动^⑥。1908年11月28日，米脂县苗元庆、李生荣等人，领导人民群众反抗“烟筒捐”的征收^⑦。

1907年到1908年，绅、商、学各界，又掀起了保卫路权、矿权的斗争，挫败了帝国主义勾结清廷攘夺西潼铁路修筑权和延长石油矿开采权的阴谋^⑧。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陕西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为辛亥革命响应武昌起义，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 革命思想在陕西的传播 与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自甲午和八国联军之役后，陕西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开始涌现。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腐败专制的清朝政府，决不能与西方各国相抗衡，只有实行革命才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种革命思潮形成的历史演变源远流长。

（一）革命思想的渊源

在陕西传播反清思想，坚持民族意识最早的是关学宿儒。清末宣传民族意识的先进人物是三原朱光照（佛光）。朱自称是明朝秦王的后代，不肯俯首事清，毕生从事教学。他继承“关中三李”（李二曲、李因笃、李柏）的学说，以传播民族精神为己任。甲午战争以后，朱佛光目睹外患日深，认为救国之道，当以经学与科学并重。1897年，他与孙芷沅在三原创设“励学斋”，广购书籍报纸，以劝导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寻求救国之道路，从而开了西北结社的风气。其时，正是康有为改良主义学说风靡天下的时候，朱佛光撰写了《康氏纠谬》一文，指斥康有为政治主张的错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朱佛光愈加坚信反清的革命思想，当他闻知中国同盟会成立，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演说，即劝他的学生加入同盟会，响应于西北。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学生倾向革命。陕西革命党人中一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多出其门中。

于右任受朱佛光的启迪，接受西方的新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他深感“朝廷之不可恃”，认为只有“革命才能不自囚”，慷慨高歌鼓吹反帝反清的革命思想，“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搥金齐奋起”。他的诗由友人出版刊印，题为《半哭半笑楼诗草》，广为散发，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1904年于右任遭到清政府的追捕，被迫出走上

海。在上海，他集合同志，以报纸为阵地，先后创办了《神州》、《民呼》、《民吁》、《民立》诸报，有力地揭露清廷的卖国罪行，公开鼓吹革命，推动反清斗争。

在人民群众中比较广泛的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则是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才逐渐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活动。

（二）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成立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陕西在日本留学的三十余人中，有井勿幕、康宝忠（心孚）、白秋陔、宋元恺（向辰）、薛骏（麟伯）、李元鼎（子彝）、茹欲立（卓亭）、曹澍（雨亭）、张铤（拜云）、张炽章（季鸾）、杨铭源（西堂）、徐应庚（朗西）、彭世安（仲翔）、赵世钰（其襄）、陈同熙（会亭）、尚镇堂（殿特）、党积龄（松年）、郝朝俊（立丞）、张蔚森（荫亭）、吴聘儒（希真）、马步云（凌甫）、南兆丰（雪亭）等加入同盟会。康宝忠任总部评议员，并为陕西主盟人。同年冬，井勿幕、徐朗西、张铤、马凌甫、张蔚森等奉孙中山之命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徐朗西去了上海，井勿幕、张铤等回到陕西，宣传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革命力量，先后发展王颀（子端）、焦冰（子静）、李异材（仲特）、李良材（桐轩）、师守道（子敬）、马彦（羽中）、惠象贤（春波）、刘淦（介夫）、任尹（师竹）、柏惠民（筱余）、邹炳炎（子良）、高明德（又明）、樊毓秀（灵山）、薛炎（正清）、刘宝濂（楚材）、马文明（开臣）、胡应文（定伯）、康炳勋（寄遥）、王授金（梦简）等三十余人为同盟会会员，奠定了同盟会在陕西建立组织的基础。1906年，于右任赴东京为《神州日报》筹集资金，亦加入同盟会。是年夏，井勿幕二次赴日本，和赵世钰遍访本省留学生，并联络外省同志开展宣传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于同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推白秋陔为会长。陕西留日的学生在同盟会陕西分

会的领导下，与国内同盟会员的革命活动相呼应，传播民主思想，声援人民的革命斗争，对陕西的革命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08年重阳节，井勿幕由日本二次回陕，遍访渭北各县及西安等地，联络有实力之会党及刀客等，与国内同盟会会员李仲特、焦子静、郭希仁、吴希真和会党的首领吴虚白等二十余人秘密组织了一次祭黄陵的活动。在祭文中宣布了“誓共驱逐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的宗旨和“共赴国难，艰巨不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誓言，体现了同盟会员的思想和行动趋向一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同盟会员的日趋增加，同年冬，又在西安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选李仲特为会长，将革命工作的重点移向国内，从此，陕西的反清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比较一致的行动。

（三）同盟会在国内外创办革命刊物建立革命团体

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在东京先后创办了《秦陇》、《夏声》、《关陇》杂志。《秦陇》杂志以党积龄、郝朝俊、马步云、张蔚森分任总经理和事务、会计、印刷；《夏声》杂志社是杨铭源、李元鼎、赵世钰等组织的；《关陇》杂志社是谭焕章、崔云松（迭生）、郝朝俊等组织的。这些刊物热情地宣传革命思想，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勇猛地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径，秘密地运回国内发行，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潮流的发展。在国内，同盟会员与进步知识分子张瑞玘（衡山）、张渊（深如）、南风薰（琴轩）创办的《兴平报》（后改为《帝州报》），郭忠清（希仁）、王铭丹（敬如）、贺绂之等创立的《丽泽随笔》，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盟会建立的秘密团体和工作据点，在西安有张铎组织的教育总会，钱鼎（定三）、党仲昭（自新）、张钊（伯英）等创设的武学社，郭希仁、曹树勋（印侯）成立的声铎社，焦子静、薛麟伯、张拜云、吴星映、邹子良等开办的公益书局、正道书局、健本学堂、女子学堂等。在外县有各县的教育分会、三原的勤公社、蒲城的良友

社、泾阳的柏氏花园、同州的师范学堂、耀州的庙湾牧场、宜君的马栏山铁矿等秘密工作据点。这些团体和秘密工作据点，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聚集反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以公益书局为例，它附设印字馆，除运销一般文化读物外，主要是推销日本、上海等地出版的革命书刊和革命人士的著作，有《民报》、《夏声》、《关陇》等杂志，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等。它还秘密翻印、发行其他革命宣传刊物，起了和进步人士、青年学生联络感情、沟通思想的桥梁作用。此外，同盟会还利用一些合法的机构如驿传房、咨议局等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四）同盟会领导的学生运动

辛亥革命前，陕西较有影响的学校，在西安有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农业学堂、法政学堂、西安府中学堂，在渭北有三原宏道学堂、同州中学堂、蒲城县小学堂等。同盟会在这些学校的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会员，进行革命活动。其中1908年发生的“蒲案”影响最大。1907年，蒲城县教育分会成立，推同盟会员常自新（铭卿）为会长。教育会成立后，在县城小学堂进行活动，并以提倡“天足、兴学、戒烟、息讼”为掩护，宣传民主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县教育分会的活动引起蒲城知县李体仁的惊恐和注视。1908年8月，李体仁派遣亲信为学堂管理员，以监视师生活动，遭到反对未遂。9月，李体仁借故迫使常自新等辞职，激起全体师生罢课示威，并宣布成立“自治公学”以相对抗。李体仁便以县教育分会“鼓动学生图谋不轨”为名，捣毁了教育分会机关，逮捕了常自新和学生三十余人，严刑审讯，常自新和学生均遭毒打，致死学生一人，激起全省教育界的公愤。三原宏道学堂首先罢课，声援蒲城的革命师生，接着各地学生和知识界纷纷抨击

地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行径。省城的师范、高等、陆军等学堂的师生代表，在省教育总会集会抗议，并以教育总会名义发出三项决议：（一）各学堂一致罢课，声援“蒲案”师生；（二）推举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三）坚决要求惩办李体仁。次日即到巡抚衙门请愿。西安各界人士还隆重地为“蒲案”死难学生原斯健举行了追悼会。留日的陕西学生发出了《致〈夏声〉杂志社书》，要求申明公理。陕西在京的一些开明官员亦联名上奏，要求严惩李体仁。在群众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李体仁撤职。“蒲案”斗争的胜利对陕西各界的革命情绪和运动起了很大的鼓动和推进作用。

1910年，西安的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新成立的农业学堂和纪律极严的陆军小学堂，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课。其中农业学堂罢课的时间最久，影响很大，成为进步力量向反动统治势力展开的一次激烈的斗争。罢课表面上是学生对教学和生活管理不满而爆发的，实际原因是对当时政治现状的不满。罢课得到西安各校的声援，同盟会员高等学堂的马彦翀、师范学堂的寇胜浮、健本学堂的胡景翼都代表各该校向罢课学生表示慰问。教育会为此召集大会，教育会长兼咨议局副议长郭希仁严正陈辞，罢课学生代表张义安痛哭流涕，以头撞壁，表示必死的决心，全体罢课学生也纷纷质问，坚持不屈，终于迫使当局接受了学生的要求，将不学无术的教职员全部撤换。这一斗争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广大学生的斗志，并且给革命队伍造就了一批新生力量。学生张义安、王盈初、郑伯奇等在这次斗争中参加了同盟会，在同学中散播了革命种子。⑩

（五）同盟会在会党和新军中的活动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时，根据孙中山在南方发动革命的经验，便作出了联络会党、新军、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并决定以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开的“通统山”为基础，与哥老

会共组“同盟堂”，商定“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园香”四句联络隐语。会后，钱鼎、党自新等参加哥老会，进行团结争取工作。1910年7月，同盟会、哥老会和军学各界代表井勿幕、钱鼎、胡景翼（笠僧）、李仲三、张云山（凤岗）、万炳南等三十余人，号称三十六弟兄，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集会，歃血为盟，共图大举。并成立了反清统一组织“三合会”，为西安起义作了思想、组织的准备。

同时，同盟会积极加强掌握陕西新军的工作。陕西新军系1909年由原常备军改编而成，有步兵两标（团），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连）。改编后名为陕西陆军混成协（旅）。在新军的下级军官中，原有同盟会会员张作栋、彭世安、张光奎、朱彝铭四人。1910年春，同盟会员张凤翔（翔初）等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陕，到新军中任职；同盟会员钱鼎、张筠、党自新、曹位康（建安）等人从陆军保定速成学堂相继毕业回陕后，亦按所学兵科分发到新军各营任职，他们组设武学社为秘密革命机关，革命力量在新军中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但是，新军混成协的实权仍把持在巡抚恩寿的亲信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的手里。王毓江极力排斥压制留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不让其掌握兵权，并培植党羽，广设密探，对新军严加控制，给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1910年11月，同盟会员彭世安、张光奎等联络军界三十余人，列举王毓江贪污款项、滥用私人、贪污受贿等十大罪状，托咨议局转恩寿查处，恩寿坐视不理。同盟会又派人控告于陆军部，咨议局亦上诉于清廷资政院。强烈的反抗声浪，迫使恩寿撤了王毓江及其党羽十余人之职。王毓江被赶下台后，继任者毛致堂同情革命，将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张凤翔、张靖卿等依次升级，使他们在新军基层中获得号令、调遣之权，同盟会又在官兵中逐渐扩大革命影响，积聚力量，为新军起义奠定了基础。

三 辛亥革命在陕西的经过

1910年，井勿幕从南方归陕，召集宋向辰、邹子良等同盟会骨干，在泾阳柏氏花园水榭亭开会，传达孙中山鉴于南方起义屡遭失败，欲改从西北发动的方针。会议讨论并草拟了会章、党人通讯方法、问答术语等。会后并向西安和各地会员分别进行联络和传达。此时，全省会员已发展到近千人，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全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特别是在四川人民保路斗争的鼓舞下，陕西革命党人起义的勇气和决心倍增，工作十分活跃。当时西安街上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歌谣，甚至有“八月十五举义”的传说。清廷官府惊恐万状，一面对外封锁消息，一面加紧满城的防务，调运新式枪炮，增加旗兵，整修城墙。同时将一部分新军调往外县，与地方的巡防队换防，阴谋分散新军的力量，并派遣密探侦察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准备捕拿。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西安新军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消息传来，西安立即响应。10月22日清晨，同盟会和新军、会党首领三十余人，在西郊林家坟秘密集会，共商起义事项。会议推举张凤翔为首领，钱鼎为副首领，决定即日起义。会后，大家立即回营，准备行动。上午10时左右，陕西新军在张凤翔、钱鼎、张钫等率领下，分三路进城，首先夺取南城附近东县门的军装局。这天是星期天，护理巡抚钱能训和各司道以及军事参议官等都在咨议局开会，驻防军军官照例放假休息。张钫率队进抵军装局，守卫的巡防营少数官兵从后门逃走，革命军首战告捷，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随即分兵占领巡抚衙门。钱鼎等率队进城，控制了鼓楼等制高点，并组织陆军学堂学生，攻占藩台衙门，保护藩库。

战斗开始后，驻防旗兵西安将军文瑞从咨议局逃回满城，即令紧闭城门，布兵和革命军对峙。其他清朝官吏，闻风丧胆，纷纷逃至商民家中躲藏，巡防营全部反正。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城厢。城内的学生、店员及哥老会众，纷纷剪去辫子，臂缠白布，以示响应。

当日晚，张凤翔约郭希仁、常铭卿、王子端、李元鼎等在军装局组设革命军总司令部，商定用“秦陇复汉军”的名号，刊刻“秦陇复汉军总司令部图记”。

10月23日黎明，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翔下令进攻满城。满城在西安城内东北角，面积约占全城的四分之一，是驻防旗兵及其家属的驻地，守城旗兵约五千人，负隅顽抗。张凤翔亲临指挥，哥老会头目刘世杰（俊生）、马玉贵（青山）等冲锋在前，奋不顾身。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革命军攻占了满城，文瑞投井自杀，西安全城光复。同天，革命军用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翔的名义布告安民。其文曰：“各省皆变，排除满人，上征天意，下见人心。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特此晓谕，其各放心。”接着又以大统领名义发布檄文，号召各州县响应革命。并派遣各学堂学生回到各地宣传革命，组织民团，光复地方。

（二）秦陇复汉军政府的成立

经过各方协商，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推举张凤翔为大统领，钱鼎和万炳南为副统领。28日，秦陇复汉军总司令部移至高等学堂（堂址东厅门街，现为西安高级中学）。改设军令、民政两府和参谋、军需两处。后将军令、民政两府撤销，设总务府总揽一切，下设军政、财政、民政、外交、教育、实业、司法、交通等机构，委官执事。另设兵马、粮饷、军令都督和西、南、北各路安抚招讨使以及东西路节度使。11月22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印”。12月9日，军

政府改秦陇复汉军政府大统领为中华民国秦军政府大都督。

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在安定社会秩序方面：严禁抢掠，劝谕清军官兵向义归心，晓谕各码头兄弟努力同心光复各属州县，严禁挑拨回汉关系等。在财政经济措施方面：保护商业正常营业，整顿金融，整顿厘税，发行公债，举办筹饷彩票，劝捐劝饷，发展实业，奖励私人开矿和发展蚕桑事业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兴办师范，提倡女学，创办剧社等。在其他社会改革方面：通飭剪发，禁止缠足，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通告旗人自谋生计等。军政府的这些措施，对安定社会、维护秩序和发展经济、巩固新建立的革命军政府起了积极作用，收到明显效果。

（三）各州县响应及全省光复

西安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各州、县纷纷响应。首先是各地的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如耀州（耀县）胡景翼、白水曹世英（俊夫）、蒲城岳维峻（西峰）、华阴马耀群、同官姚振乾、蓝田杨茹林等，率众宣告起义。其次是哥老会党，如户县、商州（商县）、三水（旬邑）、兴平、邠州（彬县）、大荔、陇州（陇县）、商南、洛南、兴安（安康）、横山、榆林等地的会党头目组织武装力量，逐知县，杀恶吏，宣布光复。同时，清军中的进步军官也有率部起义的，如驻华阴庙的巡防营马队管带胡明贵，率部进入潼关，驱逐清朝官吏，据城反正。也有一部分清朝官吏和乡绅商议，响应革命，专差行文西安，表示归服军政府。也有慑于革命威力，全县文武官吏拱手投降的。数日之间，关中、陕北及陕南的安康、商洛等地五六十州县，义旗高揭，相继光复。

但是，汉中地区的光复，却经历了一番曲折。汉中镇总兵江朝宗与兵备道黄浩，据城固守，负隅顽抗。一面命令所属州、县组织民团，镇压起义学生，一面向清廷求援，对抗革命。直至1912年3月，军政府陕南招讨使张宝麟（仲仁）由安康溯汉江西

上，进兵城固，同时四川援陕同志军标统刘荫西率军进至勉县，汉中处于两面夹攻之际，江、黄才匆匆弃城，逃至古路坝，在天主教堂的庇护下，逃往北京。4月12日，革命军与清汉中知府吴廷锡谈判，成立“临时汉中自治公所”。5月，张宝麟进驻汉中，所属各州、县先后反正。

四 击退清军东西两路的疯狂反扑

陕西地处要冲，崤函千叠，终南横亘，陇山六盘，古所谓天险之地。武昌首义后，清廷本想以陕西、甘肃为基地，重振军力，恢复东南^⑥。不料陕西却率先响应，义旗所指，四境光复。清廷大为震惊，遂派大军从东、西两路合击，妄想一举扑灭陕西革命。陕西军政府为了粉碎清军的反扑，在东、西两个战场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战斗。

（一）东路战役

1911年11月2日驻守华阴庙的巡防营马队管带胡明贵率起义部队，夺取潼关后，11月4日，清廷所派豫军即进攻潼关，胡明贵英勇抗敌，由于犯敌势众，全军覆没，潼关失守。秦陇复汉军副统领钱鼎请命率军出击，不料行至渭南被当地土豪串通刀客严纪鹏等杀害。大统领张凤翔继派张钫为东征军兵马都督，领兵攻取潼关。张钫招收了严纪鹏、杨茹林及曹印侯等部之团勇，兵力大增。11月11日，收复潼关，继而乘胜追击，破河南阌乡，出函谷关，进抵灵宝，豫西“大侠”王天纵率众响应。清廷派赵倜率毅军步马炮十八营增援灵宝，两军相遇盘豆镇，革命军失利西撤，毅军追至潼关，革命军苦战三日，于12月1日退出，潼关再次失守。

为防敌人长驱直入，张凤翔亲自率军援救，并调井勿幕、陈树藩（伯生）等部从北路策应，一时军容大振。12月6日誓师于华阴城东门外，三面出击，直逼潼关。毅军力不能支，损失惨重，

弃弹遗尸，乘夜退出潼关，潼关二次收复。此时，井勿幕、陈树藩在北路进军，亦所向披靡，渡黄河，入山西，攻克运城，拟配合张钫向敌两面夹击，毅军闻讯，仓皇逃退。张钫率部追击，于1912年1月8日占领河南观音堂，前锋到达澠池。革命军隔黄河南北成犄角之势，使清廷重镇洛阳受到严重威胁。

毅军败退，失地四百里，震动中原。袁世凯惊恐不安，急令北洋军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第六镇协统周符麟调集大军，并配野炮、山炮五六十门，向陕西革命军扑来。革命军先后在澠池、观音堂、崤山、硤石等地与北洋军激战数次失利，1月15日退守函谷关，又与敌军苦战半日，不胜，雪夜退回潼关。1月16日，敌兵步骑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进攻潼关城，革命军誓死抵抗，战至1月19日，终因弹尽，被迫退出。潼关第三次失守。

潼关失守，张钫败走南山，井勿幕、陈树藩退往高陵，一时东路无兵防守，西安吃紧。但北洋军占领潼关后，并未西进。军政府急令西路援军回省，于1月24日冒雪出发，27日到达华阴，井勿幕、陈树藩复亦率部列阵于黄河东西两岸，张钫也在南山招收新兵数千，共约一万多人。正当井勿幕等计议再次收复潼关时，大统领张凤翔于2月12日东出视师，他在全国妥协气氛的影响下主张停战议和。不久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1912年2月18日，双方派代表在议和协议上签字，北洋军退出潼关。

（二）西路战役

前陕甘总督升允在西安起义时轻骑逃往兰州，清政府令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督办军务。升允调集甘肃马安良部及固原提督张行志部二十营，亲自率领，分道向陕西进逼，一路从长武入邠州，一路由固关入凤翔。1911年11月21日，升部马国仁率骑千余为前锋，向长武进犯。驻守长武的秦陇复汉军石得胜部奋起抗击，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长武失守。消息传到省城，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率向紫山的“向字营”八百精兵，亲赴西线督战，

并调王占云游击队驰援。但是，因援兵一部离心离德，分裂他去，致使增援力量削弱，酿成冉店桥（在长武县东二十里处）战役惨败。升允取胜后，率甘军快速东进，革命军在蒿店、监军镇等地堵御，皆大败。邠州、永寿相继陷落，张云山退守乾州。

甘军另一路崔正午部由平凉取道千阳，进犯凤翔。秦陇复汉军副统领万炳南率部十余营前往抵御，亦为甘军所败，千、陇失守，万炳南退守凤翔。张凤翔闻讯派王荣镇、杨茹林及曹印侯的“敢死军”支援。1912年1月10日，曹印侯率“敢死军”大败甘军于柳林镇，崔正午逃回千阳，未敢再犯。

张云山至乾州后，即封闭城门，全力固守，昼夜巡查，严加防犯，并亲临城楼督战，敌军屡攻屡败。升允无计可施，竟令管带罗开福到北门外跪地举枪诈降，妄图伺机冲进城内。张云山识破敌军阴谋，督队迎头痛击，诈降敌军仓皇逃走。诈降失败后，升允又暗挖地道，企图炸塌城墙，亦为城内发觉截击，未能得逞。敌军既不敢冒进，又不甘心撤退，相持到12月间，南北议和开议后，袁世凯电令升允休战，但升允密不发表，反而加紧攻城。张云山在城内人民全力支持下，守御益坚。敌军屡攻屡挫，伤亡惨重。升允无可奈何，只得绕过乾州，直趋西安，但到咸阳即遭革命军的迎头痛击，被迫退去。

陕西革命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浴血奋战，胜利地击退了清军东、西两路的疯狂反扑，有力地支持了甘肃、山西、河南等省的起义，稳定了西北的革命形势，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辛亥革命在陕西的胜利，是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一个重要的环节，它对于陕西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247页，1959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

② 《西巡回銮始末记》第3卷第185页，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书局出版。

-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248页，1959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
- ④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34页，1984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⑤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31页，1984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⑥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35页，1984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⑦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页，1961年9月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内部发行）。
- ⑧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33页。
- ⑨ 《秦中官报·秦事汇编》甲辰三月第2页，陕西课吏馆选印。
- ⑩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215页，1984年1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⑪ 《秦中官报·秦事汇编》乙巳三月份第四期第3页，陕西课吏馆选印。
- ⑫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67页，1961年9月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内部发行）。
- ⑬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13页，同上。
- ⑭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7页，同上。
- ⑮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7页，同上。
- ⑯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36页，同上。
- ⑰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2页，1982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⑱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123页，1957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西辛亥革命综述

聂国柱 易芳霖

一 前奏——萍浏醴起义

1906年12月爆发于江西省的萍乡县、湖南省的浏阳县和醴陵县的萍浏醴起义，是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遭清军镇压失败，但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激奋，因而有以后接二连三的历次起义，构成了以率先揭橥“中华国民军”^①旗号的萍浏醴起义开其端，以武昌起义竟其功的辛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又由于萍、浏、醴起义的活动多在江西萍乡，因而将这次起义，列入辛亥革命在江西之范围来叙述。

酝酿和爆发

萍浏醴起义，从1906年12月4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在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爆发，至1907年1月中旬，起义军余部在江西义宁(今修水)县境内被清军击溃而告最后失败，历时一个多月。

先是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

聂国柱，江西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兼文史办主任，江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易芳霖，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

立。10月，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号召无产阶级起义，推翻沙皇，建立民主共和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号召中国人民“闻风而兴起，效法俄国人民起来革命”^②。孙中山陆续派遣会员回国，从联络会党入手，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

约在1906年春，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等受东京总部派遣，回到湖南，“运动湘军，重整会党”^③。临行前，黄兴曾嘱咐：不能单纯依靠会党发难，因为“会党缺乏枪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而应该“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或者由“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为次策，“而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④此时，正值湘赣一带发生了如下两件事情，对革命时机的成熟有着直接促进作用：一是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因密谋在长沙起义事泄未成，辗转逃亡至萍乡车站被捕，惨遭杀害，激起了萍浏醴会党各级首领和会众的极大愤慨；二是1906年春夏，湘、鄂、赣等省发生特大水灾，湘江沿岸各县“数百里间，汪洋一片，茫无涯际，死者三四万，浮尸蔽江，被灾者三四十万人，皆冻馁交侵，四乡乞食。此次奇灾，为湘省二百年所未有”^⑤。随之而来的是农村普遍歉收，粮价昂贵，一日数涨。而帝国主义各国利用湘江水路和株萍铁路之便，加紧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吮吸着湘赣人民的膏血。官绅豪劣乘机横征暴敛，奸商囤积居奇，高抬市价，民不聊生，群情激愤。

刘道一、蔡绍南回国后见此情况，于是加紧活动，认真执行黄兴的指示，为萍浏醴起义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经他们筹划组织召开的重要会议有四次。

第一次会议是长沙水陆洲会议。刘道一回国途次，便约集同志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崧衡等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只船上秘密集会，“到三十八人”^⑥，会议根据黄兴的指示，把起义的策略方针、具体步骤和起义时间等重大问题，基本上确定下来了。

会后，刘道一留驻长沙，掌握全盘，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总部联络，蔡绍南则回江西萍乡上栗市，负责发动萍浏醴会党。

第二次会议是萍乡蕉园会议。当时，萍浏醴一带会党，大致有三派：即哥老会、武教师会和洪福会（亦称洪福齐天党），各大派中又有许多小派。哥老会自马福益被杀后，以龚春台、李金奇、萧克昌、冯乃古为首，各有会众数千人，主要活动于萍乡安源和湖南醴陵、浏阳南部一带；武教师会以沈益古、廖叔保等为首，会众数百人，以萍乡上栗市一带为最多；洪福会以姜守旦为首，会众数千人，以浏阳为活动基地。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后，通过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的学生魏宗铨与会党联系。魏是蔡儿时的朋友，遂以魏家在上栗市开设的“全胜纸笔店”为掩护，很快结识了萍浏醴一带会党首领。为了将各派会党组织起来，在萍乡蕉园洞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以延请道士替亡故友人作冥寿为名举行开山大典，将哥老会和武教师会联合为“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总机关设在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会后，各路码头官分赴各地，开堂散票，发展组织。

第三次会议是萍乡慧历寺会议。1906年7月，蔡绍南与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又在萍乡县属大岭下弹子坑慧历寺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密造武器火药，争取洪福会加入洪江会，并往日本谒中山先生报告请示举义日期等问题。会后，蔡绍南、魏宗铨前往上海，正拟东渡日本与同盟会总部联络，突然听到麻石发生事变。原来是年农历中秋，麻石开台酬神演戏，日聚万人，会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活动，不料三县官绅怀疑会党即将起义，立派巡防营袭击麻石。会党猝不及备，不战而散，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遭清军追捕，被迫在醴陵白兔潭投河殉难。蔡绍南、魏宗铨在沪得报，便将联络任务另交李发群办理，偕宁调元立即赶回，召集各路首领，讨论对策，仍订农历年底清吏封印时起义。兵分三路：“一据萍乡安源为根据地，一据浏阳、醴陵攻略长沙；一据万载、

宜春东出瑞昌、南昌，进取江南。”^④此时，上栗市群情激愤，重阳节千余人在栗江书院为李金奇殉难召开追悼大会，因事失密，会目许学生被捕，解往萍乡县署杀害。接着慧历寺机关亦被查封，形势急转直下，武装起义犹如箭在弦上，引满待发。

第四次会议是萍乡高家台会议。鉴于以上情况，是年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在萍乡上栗市以西的高家台，邀约各路码头官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对起义的时间问题发生争执。龚春台、魏宗铨等认为现时军械不足，与长沙的刘道一又失去联系，主张“稍缓以待后援”^⑤，而原教师会首领廖叔保和众多码头官则认为现在会党人数众多，联合各地友党不下十余万人，主张趁官兵未到，即时起义，“尽可一决胜负，坚持不再拖宕”^⑥。双方相持不下，至天明，仍未获结果。大会经久不决，人数愈聚愈多，会众终宵扰攘，莫知所从。激进分子廖叔保不愿再有任何迟疑和拖延，自率二三千人跑到麻石，高举“大汉”白旗，率先发难。事已至此，蔡、龚、魏等人势成骑虎，迫于形势，只得立即宣布动员。以洪江会总机关名义檄知浏东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飭知各县会党同时发动。就这样，酝酿已久的萍浏醴起义，比原定计划提前一个多月，于1906年12月4日全面爆发了。

经过和影响

起义爆发后，洪江会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⑦。公推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叔保为前营领带兼急先锋，沈益古为后营领带兼殿后指挥。起义军当即以“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令”的名义，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⑧，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实现地权与民平均，深受群众欢迎，因而军威大振。起义当天，便大举向浏阳高家头、萍乡上栗市进攻，并一鼓而占领之。

麻石发难消息传出，各路会党纷纷响应。

浏阳南部洪江会众数千人，响应龚春台部起义。

浏阳东部和北部的洪福会众数千人，在首领姜守旦率领下，也立即响应起义，愿与洪江会实行军事上的合作，但不受节制。自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旗号“洪福齐天”，并发布《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②，拟进逼浏阳县城，直逼长沙。

醴陵县参加起义的洪江会众除一部分农民外，还有众多陶瓷业工人和部分巡防营士兵。起义军分西、东、北三路，以西路为主，首领为李香阁，下分左右两军及水军，各有群众三千人，东路首领为瞿光文，北路首领为谭石基，各有群众数千人。

萍乡县安源，本是起义军计划中的根据地，有会众六千人，其中多为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由于安源产业重要，又有德国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在此，向有清军守护。起义爆发后，官军增兵防范。12月7日，醴陵会党头目袁兰亭奉命去安源与萧克昌联络，不幸被捕，使安源与醴陵之间失却联系。随后，萧克昌被清军诱杀，群龙无首，致使安源工人未能发挥战斗作用。

除安源工人外，萍乡方面的洪江会还有不少农民和十几个官办、商办煤矿的工人以及上栗、桐木一带的手工业工人，踊跃参加。安源周围及宣风、芦溪等处煤矿工人也纷纷奔赴前线，“矿井辞工者每日以百数计”。

此外，宜春、万载两县也有一部分会党群众响应起义。

以上几个地区，先后投入起义战斗的共约三万人，从而使义军迅速控制了江西省的萍乡、宜春、万载和湖南省的浏阳、醴陵等五个县的广大农村地区，其先头部队，竟到达湘潭县境。

轰轰烈烈的起义，在国内和国外影响极大。国内一些报刊开辟新闻专栏，逐日报道所谓“萍乡乱耗”、“萍匪乱事”^③。外国报纸也纷纷报道起义消息，日本报纸还发行号外，逐日报道和评论。旅日同盟会会员闻讯，纷纷向总部请求回国参加战斗。孙

中山先生回忆当时情形，曾写道：“丙午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师也。当萍浏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线，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④当时孙中山连日同会员商讨支持萍醴革命军的办法，派宁调元、谭人凤专往萍乡、醴陵联络，并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等回国组织起义，响应萍醴革命军。武昌日知会领袖刘静庵、张难先等得到萍醴革命军通报后，立即召集会议，密谋响应。在浙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也积极准备行动，以与萍浏醴革命军相呼应。

与此同时，清政府则惊恐万状。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吴重熹向清廷奏道：“该匪初起，势甚猖獗，所到之处，胁民为匪，云集响应；未到之处，谣言四布，人心惶惶。”^⑤一时间，“官私各电，报告匪警者络绎不绝。”^⑥湘赣两省巡抚请求清廷增兵镇压，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安源煤矿总办林志熙等，迭向湘赣两省巡抚和湖广、两江总督呼救。清廷闻讯，立即调动湘、鄂、赣、苏四省军队五万余人，向萍浏醴地区包抄，实行血腥镇压。

帝国主义者认为“此次事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一次地方性的骚乱”，“比无关紧要的骚乱要可怕得多”^⑦。因此，英、美、俄、法、德五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出动各类军舰二十多艘，分别驶往岳州、汉口、宜昌、九江、上海等地，游弋长江和湘江，视察动静，拔剑张弩，准备随时向中国人民动刀。

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起义者毫不畏缩，他们英勇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起义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2月4日到12日，这是起义军的进攻阶段。起义初期，当地虽有相当数量的清军，但敌不过人数众多、满腔愤怒的起义军；后来清廷虽陆续增调了大批军队，但到达有先后，刚到之时，阵脚未稳，难以发挥战斗力。因此，头几天中起义军到处进攻，所向披靡，多次大败官军。但是，起义军终究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不如官军。而且由于起事仓促，各股号令不一，外界

也一时接应不上，仅凭义愤和勇敢，自然难以持久。12月10日，驻守上栗市的义军五六百人被敌军突袭围困，虽奋勇迎战，坚持半月，但伤亡重大。后军统带沈益古一手执锅盖，一手提大刀，力战群敌，连杀清军十余人，使敌军心惊胆战，但终以势孤力竭，壮烈牺牲。于是上栗市陷落。12日起义军同时在醴陵和浏阳两个战场上失利，死伤惨重，军事首领多人战死。从此起义军开始衰落。

第二个阶段，从12月13日到20日，是起义军和官军之间的相持阶段。

12月12日起义军在醴陵、浏阳失利后，队伍被打散，分割于萍、浏、醴各处。在清军处处设防，多方堵截的困难环境下，魏宗铨、廖叔宝等率领洪江会起义军各部，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灵活战术，与敌军周旋，顽强战斗四十余次，消灭清军不少，义军本身损失也很重。最后义军在上栗市遭到原与同盟会有联系的江苏新军统制徐绍楨背叛性的围杀，廖叔宝等首领及会众一千余人壮烈牺牲，仅魏宗铨带少数人逃出，不久也被杀害。姜守旦所部洪福会起义军，在浏阳境内也曾与清军作战多次，12月20日，在平江县境内与清军大战，起义军败散，姜守旦率余部退入江西大宁（今修水）县境内。此后，起义只剩了余波。

第三个阶段，12月21日至1907年1月中旬，这是起义军战斗的尾声。战败的姜守旦余部退入江西义宁县后，到1907年1月14日被清军击败，全军覆没，姜守旦下落不明。至此，轰轰烈烈的萍浏醴起义最后失败。

这次起义，不同于旧式会党起义，明显地显示出同盟会的政治影响。以都督龚春台名义发布的檄文，强调除反清外，“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社会”^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国内却严重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在国外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可

侮、中华民族不可欺的高尚气概，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曲前奏。

二 九江独立

独立经过

1906年萍浏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海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光复会还在浙江、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1910年2月同盟会又发动了广州起义，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爆发了武昌起义，史称“辛亥革命”。十三天后，九江宣布独立。

九江之所以在江西首先响应武昌起义，这是与其地理位置分不开的。九江居长江中区，上接武汉，下通沪宁，信息灵通，风气早开。同盟会人在九江暗设机关，冀图联络各方党人，乘机大举。先是闽人林森在九江任海关文牍，粤人吴铁城家居九江（铁城之父在九江和牯岭均设有和昌办馆），他们与罗大侓、陈中瑞、徐秀钧、蔡公时、吴照轩、俞醒更、张世膺、沈元龄等经常聚会，进行革命活动，并组织一书报社于九江之八角坊为秘密机关，与外省相联络，输入书报，鼓吹革命。

接着，部分革命党人有鉴于萍浏醴等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强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于是，他们把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发动新军方面。九江方面也是如此。当时，驻九江的新军，有南京派来的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和南昌派来的第五十五标两个营。1911年农历七月间，有赵声部下之杨同志来九江运动起义，与驻九江的新军第五十三标排长何燮桂、顾英、黄锦龙、丁仁杰、胡爱德以及炮台炮目陈廷训等取得联系，曾进行密议，拟于八月十五夜与南昌之

工程队会同武昌方面同时发难。后接南昌韦兆熊密函，略谓清吏防范甚严，宜多派同志联络，再壮大力量，始可达目的。于是，以五十三标第一营队官刘世钧，第二营排长顾英，第三营排长何燮桂各负责联络其本营同志。不久，传来武昌机关破获消息，乃不敢轻动，决候南昌及武昌有发难消息再动。

此时，江西武备学堂出身、留学日本时曾参加同盟会的江西籍人李烈钧，因在五十三标中有许多同学和同事，他利用这种关系，也进行联络策反（九江光复时李烈钧不在九江，光复后两日才抵九江）。

1911年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日）武昌孙武（尧卿）等高揭义旗，举黎元洪为都督，风声所播，全国欢腾。九江方面，林森、吴铁城、罗大佳、陈中瑞、吴照轩、许森、徐起兰、蔡辰白、魏毓生、何瑞昌、何震生等人即酝酿响应，积极向新军联络。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突闻湖南已响应武昌起义，宣告独立。于是，有新军五十三标教练官黄子卿各方奔走，并商得标统马毓宝赞同，联合五十五标一营管带范绍先、二营管带何振达及炮台守将徐世法等共同举事。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二）晨6时，九江城内居民纷纷迁避，有人询问原因，便说今夜新军将起事。当晚8时许，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由炮目陈廷训发炮三响，接着又响一排枪声。城内道署卫兵听到炮声，知是起义讯号，即在头门举火内应，新军各营立即吹号集合，各军士都手缠白布，上印“同心协力”四字，荷枪实弹，分据各隘道，沿途枪声不绝，先攻道署。九江道恒保逃入租界，搭隆和轮遁上海。接着分队进攻各衙署。有军士想纵火焚烧道府两署，马毓宝立即命令制止，并派卫兵看守。又在道库搜获白银十余万两，查点数目后，也派人守护。夜12时许，进攻府署，九江知府璞良率领仆人荷棍棒守衙署，革军一举攻入，捕获璞良。璞求死，对革军说：“汝等排满，我满人也，万无生理。且我食君之禄，汝等即不排满，我亦当与城偕亡，断不偷生苟活。”^①革军管带张某见璞忠义，开始以礼相待，

劝其归顺，璞抵死不从，遂杀之。凌晨1时攻提法使行辕，因行辕在铁路公司，后户即南门湖，提法使张俭由后户乘舟逃走，其卫队四十人归顺革命。当革军来到电讯局，局员都赞成革命，仍照常供职，但不许替清廷官员发电。天既明，军士沿街巡逻，劝商人照常开市，合城安堵。

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三)早8时，城内外贴出文告，文意与武昌起义文告略同，并有黎都督字样。又于城内延支山高竖“马”字(马毓宝)、“徐”字(徐世法)、“陈”字白旗各一面。这时，城内外警察也同时响应，左手各缠白布。只有前由省派来的五十五标第二营(驻火柴厂)统带庄宁忠不肯赞成革命而潜逃，新军追之不获。城外秩序较为混乱，大码头协顺土店，在骚扰中被匪抢去铜元数十千、银元若干，由革军捕获三人，就地正法，并追回该店之损失。又当起事时，革军曾通知各教堂教士及租界外人，一律保护，切勿惊慌，所以外人都未离境。至于九江原有的常备军，本无举动，自从南昌派提法使张俭到九江督办江防，继而周树森监督炮台，限制出入，军心乃变，都说“当官的既不相信我们，我们如何出力”^②。适有湖北省军政府派员来游说，乃秘密集议与五十三标采取同一行动。

革军占领九江后，即于招商局码头竖立中华民国大旗，军、学各界以及城中商店均悬挂白旗及欢祝民国之小旗。此次起事，据陈春生撰《辛亥江西光复记》说“多由林子超擘画部署，又先得(海关)关员西人赞成，故着手颇易。初林被举为九江道，马毓宝为驻浔统领，徐世法为驻浔炮台统领，李云峰为驻浔副统领”^③。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在九江便宣告推翻了。

独立之后

九江独立之后，南昌、安庆尚未光复，内部组织也不健全，而马毓宝革命意志亦不甚坚决，于是有吴照轩、蒋群等强将马之辫发剪去，以绝其模棱两可之心。并着手组织机构，将原来的九

江道署改为军政分府。众举马毓宝为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都督。分军务、政务二部，军务部由马自兼，政务部由罗大任任部长，林森任副部长。另举张鲁藩为运输部长。李烈钧于光复后两日赶到，公举为参谋部长，蒋雨岩为副部长。又举吴照轩为政治参议，蒋群为军事参议，宛西庚任九江县县长。陈中瑞（霭亭）则襟怀淡泊，功成不居，在商界竭力赞助。

在军事方面，起事之前，五十三标即已密告驻瑞昌之第三营迅速开拔返浔，驻浔之一、二两营即向省方派来之部队进击，不久即击溃。排长何燮桂乘胜率兵占领九江上游之田家镇炮台，扼守长江隘口，于是长江交通断绝，汉口清舰接济中断。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三），清军守湖口的总镇杨福田调集炮艇，将与革军对抗，被革军击败，清兵举白旗投诚。革军乘胜占领湖口炮台和马当炮台，进一步控制了长江交通。

武昌起义后，清廷命海军提督萨镇冰调集军舰游弋于长江水面，为武汉清军之应援，并率舰多艘往武汉镇压革命。自闻九江独立，金鸡坡炮台被革军占领，惟恐燃料、粮食等无法接济，慌忙下驶，拟赴上海。当时带队的是海军司令黄钟瑛，统率有海筹、海容、海琛三艘巡洋舰；楚同、楚有、楚谦、楚豫、江元、江亨、江利、江贞八艘炮舰及湖鹏、湖鹞两艘鱼雷艇。当驶近九江时，金鸡坡炮台司令见兵舰停泊不定，恐其有异，连发炮击之。兵舰遂用旗语表示合作。马毓宝、李烈钧闻报，即令停止攻击。鉴于海军舰长、官兵多属福建人，乃商林森以同乡关系赴舰联系，并派参谋龚少甫（亦福建人）、卓仁机等同往，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合作，并负责筹发薪饷，各舰将士同意加入革军。于是在商会设宴欢迎。这时，马毓宝密使炮台司令戈克安将兵舰炮栓拆下。正欢宴时，黄钟瑛闻讯变色，立即令其同人回船准备作战。当时李烈钧认为革军战斗力不能与抗，采取和平解决。幸当时林森及龚少甫、魏子洛等人在座，即请舰方将领以福建同乡关系登台演讲，缓和空气，海军怒气稍平。复入座时，戈克安亦盛

气而来，李烈钧即笑慰之，并双方介绍，杯酒联欢。次日，李烈钧派人将炮栓送还舰艇，事遂解决。事后，革军要求每艘大舰拨出马克沁机关枪二挺，小舰拨出一挺，没有机关枪的拨出六至十支步枪，带同士兵配件登陆，以充实陆上军力，各舰艇都同意照办。这样，清廷全部海军便在九江起义参加革命，并通电全国要求清朝皇帝退位。马毓宝认为海军既已联合，便任李烈钧为海陆军总司令。

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由九江改姓名登大通轮船逃往上海。同日，海筹、海容、海琛、江贞等舰及鱼雷艇湖鹞由九江上驶。下午3时，海容进至武昌黄鹤楼下傍一小轮而泊，将所载机关枪运入武昌，接济革军。鱼雷艇湖鹞继续前进，遭到江岸清军发炮攻击。未几，海容驶近，急发炮猛击江岸清军炮兵阵地，只见尘沙飞扬，炮兵均殒。海容下驶至七里沟附近尚发炮不休，清军汉口以东之阵地几全被摇动。以后清军攻陷汉阳，挟龟山巨炮隔江攻击武昌，然革军有舰队为助，因而能据城固守，使清军终不得逞。又由于海军已全属革军，使袁世凯无力以图江南，只有停战议和。

此外，九江独立，影响了下游的安徽。先是安徽清廷巡抚朱家宝见形势不佳，伪称独立，将巡抚部院改为都督府。九江李烈钧据安徽留日同学胡万泰反映，知朱有诈，命黄焕章率步兵一团开赴安庆，包围抚署，放枪示威，逼走了朱家宝。不意黄部到皖后纪律废弛，兵士剽掠，箱笼山积，皖人来电九江告状。李烈钧决定亲往镇压，并率海筹、海容两兵舰及步兵一营随之。到皖后，皖人举李烈钧为安徽都督。李以出自民意，遂就任。当将团长黄焕章看管，并将肇祸人顾英枪决之。复令黄部士兵将所掠财物悉数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请商会派人会同发还原主认领。秩序井然，一时颂声载道。但皖人派别甚多，地域之见，非常严重，使李烈钧工作感到困难。此时，正值清廷所派之南下军队进逼武汉一带，战争剧烈。李烈钧应湖北黎元洪电请率师援鄂。及师抵湖

北孝感，而议和已成，李烈钧被孙中山任命为江西都督，遂返江西。

综观九江之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占领炮台，联合海军，有助于解除清军对武汉的威胁，对皖、苏两省之迅速光复，特别是对江西省会南昌之迅速光复，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整个辛亥革命至关重要的一环。

三 南昌光复 兵不血刃

九江独立后，全省人心震动，南昌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同盟会员的活动也更加积极。

早在1906年，孙中山便派黄格鸥、魏会英等回江西建立同盟会支部，黄格鸥被任为同盟会江西支部长。他是清江人，回到南昌，便在赐福巷成立了江西支部，展开了工作，积极办理会员登记和入会申请等手续。当时江西人民因受“维新失败”和“南昌教案”等事件的影响，很多人同情革命，因此参加同盟会的人很多，组织发展很快。1906年，江西编练新军，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李烈钧、欧阳武、胡谦、方先亮等先后任新军各营管带，官兵中都有不少富于革命思想的优秀青年。辛亥革命前夕，江西的新军几乎全操在革命党人手中。再加上夏之麒领导的江西陆军小学、俞应麓领导的测绘学堂和彭程万领导的测量司学员，共有四五百人，富有革命意志，受过军事训练，并发有枪支子弹，他们和新军结合在一起，已在酝酿响应革命。

武昌起义后，武昌同盟会的领导人孙武派丁笏堂（立中）携带文件回南昌，策动党人鼓动新军起义，声援武汉。丁回南昌后，即与党人秘密联系，进行策划。

其时，江西巡抚冯汝骥于武昌起义后亦召集僚属会商对策。即调步兵五十五标赴九江增援，特令臬台张俭赴九江督师，调上饶防营统领刘懋政迅率所部兼程限期赶到南昌加强城防，监视城

外新军和城内学生，还软禁新军混成协协统吴介璋于巡抚衙门内。对新军和陆军小学学生则进行“安抚”，集合一起讲话，说什么藩库现存库银二百余万两，粮盐仓储丰富，可以支持三年两载没有问题，并宣称从农历九月起，在省官兵一律发双薪，企图收买人心。又将过去用来镇压太平军的连珠炮摆在巡抚衙门大堂两旁，恐吓老百姓。并招募外地籍新兵一百名用来扩充卫队。可是就在巡抚衙门扩充的卫队中，同盟会即暗派童玉山、王有才、薛洪保等混了进去，他们在举事前即先夺取了连珠炮炮栓及军装库的钥匙。冯汝骥的欺骗、收买的怀柔政策完全破产。

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四），九江起义的捷报在南昌传开，《江西民报》大造革命舆论，发表社论并刊登九江、武汉方面的革命文件和布告。突然之间，风云变色，全城人士哗然若崩。清朝的军事参议官张季煜、陆军协统吴介璋，已有与革军联合之动机。

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同盟会南昌支部于新军工兵队召开秘密会议，到会二十余人，决定10月30日晚上起义。

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江西民报》发行红报，发表题为《满城风雨近重阳》的社论，文章开头一句便是“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是夜，南昌新军按预定计划起事。骑兵营排长蔡森率领爬城队于晚上11时30分，从顺化门外爬墙进城，首先发难，打响第一枪。炮营熊天觉，马营方先亮、李伯年等也同时响应。抚院的卫队和警察，因事先有联络，即从内部响应，用煤油烧燃抚院两侧的鼓楼、旗杆等，火光烛天。同时打开城门，接应起义新军入城。于是新军的骑兵营、工兵营、辎重队蜂拥进城，分头占领各重要据点。10月31日凌晨，巡抚冯汝骥已知新军起事，吓得心惊胆颤，从床上爬起来便召集各司道到抚院开会，他想派卫兵去通知，而卫兵已参加起义，他即令劝业道傅春官召集各界开会，而冯汝骥自己却从后门逃走，避匿于旺子巷（今后强路）民房内。至此，大小官吏相继逃避一空。城内五十五标新军、宪兵和武装警察队仅在营房内戒备，都未反抗。江西省会南昌，就这样

兵不血刃地光复了。破晓之后，参加起义的新军各部和各学校负责人在陆军小学开会，商讨善后事宜。决定由陆军小学和测绘学堂的学生维持治安。守城的各部，一律悬挂白旗，手缠白布，作为起义的标志。

四易都督

南昌光复的当天晚上，各界在商会集会，决议拟请巡抚冯汝骥参加革命，并选举其为都督。于是转到江西咨议局集会，并邀冯汝骥到会，说明“如冯巡抚赞成革命，由各界推任都督，不但治安无忧，且可匕鬯不惊”。但冯汝骥思想顽固，说他“以末秩受清朝厚恩，蒙任封疆重寄，既不欲违背潮流以糜烂地方，尤不能受各界推戴为国之叛臣，即请咨议局代表人民公意，另推都督，以维持治安”，并表示他“可以完全避让，即日离城赴浔北上”^④。于是匆匆返院收拾行装，出章江门登某小轮开赴九江。（至九江后，被彭学道、卓仁机等发现，挟其上岸，住花园招待所，不数日，吞鸦片烟膏自尽。）

11月1日（农历九月十一），同盟会召集各界负责人在合同巷万寿宫商会举行会议，决定：（1）通电全国，宣布江西独立；（2）通过以新军第二十七混成旅协统吴介璋为江西都督；（3）公举刘凤起为民政部长，熊天觉为参谋长。又推雷恒为财政部长，李瑞清为文事部长（由副部长熊育锡代理）。当天，吴介璋正式宣布就都督职。并派吴宗慈为都督府秘书长，夏之麒为参谋厅厅长，朱寿同为军务厅厅长，王禄之为总务厅厅长等。于是清朝在江西的统治，遂完全被推翻。暂以铁血十八星旗代替国旗。并发布檄文昭告全省。暂改行黄帝纪年（辛亥年为黄帝纪元四六〇九年）。规定以青蓝布衣为礼服，废除作揖、跪拜的封建礼节，剪掉男子拖在背上的长辫。同时，按照新军组织，着手整顿和改编军队。根据党人计划，下令查抄部分最反动的贪官污吏如石守谦等的财物。但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却没有什麼变革，而且扩军购械，还加重了人

民的负担。尤其是吴介璋没有应付好当时复杂的人际关系，如吴在光复前曾被软禁，与军事参议官张季煜意见很深，后张赞成革命，光复后关系难处；同时吴又与五十五标新任标统冯嗣鸿及从上饶调来的防营统领刘懋政尔虞我诈；混成协骑兵营排长邹恩灏也参加了反吴的行列，因此吴介璋在工作上捉襟见肘。

11月12日（九月二十二日），江西军政府忽接一信，内称孙文、黄兴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留日毕业生彭程万（当时充江西测量司司长）摄理赣军都督等语。又传诚恐军民不肯承认，已派敢死队一百人进城，预备施放炸弹。以致旧藩署内军民两部颇形恐慌。旋即在军政府召开会议，新军五十五标营兵上子荷枪排列四围。会上邹恩灏报告：“我在武昌时曾谒见黄克强先生，谈到江西光复后人选问题。我提出彭程万为适当人选，黄克强先生说此事已在海外开会同意，并发给了印信，托我带回江西。”^④（后查明印信系邹恩灏伪造，旋邹在九江被马毓宝枪毙）。到会各人均无异议。彭程万表示“吴都督既已离职，暂时出来维持局面”。并于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发布就职告示。吴介璋任江西都督仅十三日。

彭程万接任江西都督后，局面仍然混乱，据欧阳武的回忆录说：“我找到彭都督的办公室，看见好多军官包围彭都督，要他写条子，这个要钱，那个要官，闹得不可开交……当时江西虽已独立，但五个都督分立，除在南昌的称为全省都督外，在九江的称为九江分府都督，在萍乡的称为萍乡分府都督，广信、赣州两地也是一样，各占一方，形成割据。各截留所辖县份的钱粮厘卡款项作为军饷，不足的还要向省城都督府要。光复前南昌只有陆军步兵一标，马、炮兵各一营，工、辎兵各一队。光复后，南昌新增步兵四团，还有一些义勇军或独立营等，名目繁多，其中有些只有三五支枪，有些仅是背马刀的队伍。服装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帽子上扎英雄结，扮成黄天霸的模样，满街可见。军纪之坏，则更使市民头痛。彭都督在这种混乱局面下，无法维持地方治安。”^⑤

这时，武汉起义已有月余，清廷犹作垂死挣扎，派袁世凯统军反攻武汉、南京，企图扑灭革命火焰。彭程万接任都督后，正值湖北、江苏先后请援，乃派巡防统领冯嗣鸿部开赴武汉援鄂，派巡防统领刘懋政部开赴南京援宁。因该两巡防统领所属部队，原是绿营改编的，纪律废弛，彭程万恐酿成兵变，糜烂地方，乃设法乘机调开。不料因此引起起义新军的不满，因为他们原已决定了组织义勇队，由蔡森率领援鄂。于是，他们秘密开会酝酿倒彭迎马，推定方先亮、蔡杰、蔡定波三人去九江，迎马毓宝来省做都督。蔡森则留省管理部队。彭程万得知消息，他即自动取消都督，并电劝袁州、饶州、赣州三处都督一同取消，让马毓宝做江西都督，以谋江西省政的统一。彭程万做江西都督仅三十余日。

马毓宝任江西都督后，因为身体多病，政务废弛，显得懦弱无能，而许多自命对光复有功的人，骄纵豪奢，马也不加约束，以致民怨沸腾。九江、南昌各界人民推举代表，赴南京向孙中山请愿，要求撤换马毓宝，江西省临时参议会也电报控告，并请改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依照江西民意，免去马毓宝的都督职务，任命当时在湖北任北伐军第二军军长的李烈钧为江西都督。

马毓宝在工作上虽然一筹莫展，但对都督一职仍然恋栈。他在军队中原掌握有相当实力，尤其是在九江有他的基本队伍，做江西都督后，又与洪门会联成一气，实力更厚。得知易督消息后，即密谋抗命拒李。同盟会党人发觉了马毓宝的阴谋，便提出了“杀猪宰马”的口号，积极在其军队中进行倒马活动，由刘世钧带领队伍，把九江卫戍司令部包围缴械，将马毓宝的心腹九江卫戍司令朱汉涛打死，解决了马毓宝的基本武力。马毓宝失去了抗拒力量，只好溜之大吉，任江西都督不过三个月。

李烈钧在武汉奉到命令，乃与黎元洪、孙武等协商，抽调欧阳武、龚少甫、李明扬、吴懋松、郭寿山、卓仁机等的部队，还

有楚同、楚豫等兵舰，统率陆海军回江西接任。船过樵舍时，内河水师发炮射击，李命舰队排炮示威。抵南昌时，李烈钧命令楚豫舰长身穿海军大礼服，乘马先行，李率卫队殿后，入南昌城，备受欢迎。

2月下旬，李烈钧正式就任江西都督，改组都督府，任命钟震川为内政司长，魏斯旻为财政司长，王侃为司法司长，胡泽为交通司长，宋育德为教育司长，李国梁为工商司长，胡蕙为外交特派员（不设司），江西政权，遂完全为同盟会人所掌握。

江西在四个月内，四易都督，人事变动频繁，不少人乘机贪污掠夺，使李烈钧就任都督后最感棘手的就是省库空虚，财政支绌。盐封、厘封已被马毓宝搞罄，官银钱号早已被劫一空，加之各县情况复杂，解款不至。于是李烈钧邀徐秀钧帮助整理财政，开办民国银行，发行地方纸币，活跃金融，开设公典。并派黄缉熙为西岸樵运局局长，大抓盐运盐税，克服了财政上的困难。于是，李烈钧有了扩充军备和以后与袁世凯作斗争的经济基础。

又洪门会原是反清复明的一种秘密组织，但品类不齐。清朝末年，洪门会首脑彭木香、洪宝林、陈细鬼、梅福祥等都因案关押在狱，光复后他们释放了出来，秘密进行组织活动，遍及全省。吴介璋的民政部长刘凤起，原是保皇党人，他的个人野心很大，企图掌握兵力，作为政治资本，在全省各地组织民团。洪门会通过民团的组织，大肆发展，骚扰地方，民怨极大。马毓宝不能解决问题，乃用“调虎离山”之计，派彭木香统领民团，驻扎铅山河口镇。李烈钧为了统一政权，开展了同洪门会的斗争，借词召彭木香来省开会，当场将彭木香拘押审讯，判处死刑；又接受人民控诉，将南昌洪门会首脑洪宝林交军法捕审，执行枪决；同时下令将民团解散。当时舆论都认为这是李烈钧的一大功绩，特别是博得上层人士的称许。

准备反袁

李烈钧督赣之时，袁世凯窃国夺权的野心日益暴露。孙中山

的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标志着袁世凯的阴谋初步得逞和辛亥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败。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是宋教仁的主张，宋认为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在临时参议院中占多数的第一大党，就可由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但李烈钧却不以为然。

李烈钧对袁世凯一向不满，他认为应重视袁手中的武力，不能产生幻想。督赣以后，他重视扩充军队和提高军队素质，先后接收陆军速成学校，开办了讲武堂，聘请夏之麒为讲武堂堂长，训练军事干部，积极扩充军队。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李烈钧便将大总统府的警卫军林虎部队，请准调来江西，改编为江西第一旅，以林虎为旅长。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令各省缩编军队，李烈钧拒不接受，坚持江西要保存军力，结果，江西仍编成两师一混成旅。任欧阳武为第一师师长，龚师曾为参谋长，林虎为第一旅旅长，余维廉为第二旅旅长；任刘世钧为第二师师长，徐定青为参谋长，赵复群为第三旅旅长，蔡森为第四旅旅长。

又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不久，李烈钧为了表示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于1912年10月，特邀请孙中山来赣，拟以南昌为反袁大本营。当时孙中山以“大总统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名义来江西视察。在南昌市举行盛大庆祝欢迎会，全市一片欢腾，万人空巷，夹道欢呼。孙中山检阅部队并发表演说，他说计划于十年内建筑二十万里铁路，愿国人努力赞襄，俾底于成。当时没有国歌，群众欢迎时高唱“二十万里路走龙蛇”^②的歌，盛况空前。孙中山路经九江，看到帝国主义者利用九江城墙，大悬广告，便问九江警察厅长周兆麟：“城墙上各国遍竖广告牌，是否已向我国租用？”孙先生听说各国并未投租，当即指示：“按照外国法律，在某处竖立广告，既要得主人同意，还须缴纳一定的租金。”^③周会意，回厅即向各国领事发出通告，限三日内把各种广告牌撤销。各国领事和洋行皆置之不理，到了限期，周即派警将全

部广告牌拆掉，同时收回了租界铁门的启闭权。各国领事提出交涉，周兆麟赴省见李烈钧报告此事系按中山先生指示办理的经过，李烈钧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嘉奖他说：“外国人控告你，说明你的处理是很好的。”

此时，李烈钧向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袁世凯的阴谋。同时，暗中派了徐秀钧到各省联系，并赴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各处活动，收集了许多关于袁世凯阴谋活动的情况，更增强了他对袁的憎恨和反袁的决心。

袁世凯企图镇压国民党在江西对他的反抗，设法收买了曾经参加过九江起义的戈克安，任戈为九江镇守使；又暗使曾经充任过马毓宝的混成旅旅长余鹤松携款来赣运动军队，制造内部矛盾，在孙中山离开江西不数日，策动了南昌兵变。李烈钧派欧阳武镇平叛乱，余鹤松逃往北京，袁世凯对李痛恨，即派余为陆军部参议，以示否定李的作法。后袁世凯又派汪瑞闾为江西民政长，因汪曾是李烈钧在武备学堂时的老师，李回国后，汪又曾函荐李充新军营长，因此袁拟用汪以制李。但李听说汪系由袁世凯任命才来，便故示冷淡，拒不接见。江西各报，也因汪当时交往全是前清遗老，大肆谩骂。江西省警察厅厅长周希颐 and 江西水上警察厅长蔡锐霆同对汪说：“请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赣境，否则我们不能负保护你生命安全的责任。”^⑨汪见此情况，当夜即潜回北京，袁世凯得到汪的报告，更加痛恨李烈钧了。

就在1912年冬，袁世凯为了“讨伐”江西，调北洋第六师李纯部开入湖北。李烈钧接徐秀钧密电报告此一情况后，立即调原驻赣南的第四旅蔡森部，驻萍乡的第六团李定魁部，驻九江的第九团周璧阶部，驻湖口的第十团李明扬部及第一旅林虎部，开驻瑞昌；第三团伍毓瑞部开驻德安；炮兵第一团刘稜部开驻永修，准备应付作战。

是年12月，李烈钧得知袁世凯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镑，作为发动内战之用的情况后，通

电各省，揭穿袁世凯的黑幕，坚决反对“善后”借款。

1913年1月，李烈钧为了准备对袁作战，决心肃清内部，乃派第一师师长欧阳武、混成旅旅长方声涛准备解决九江镇守使戈克安部。戈克安在九江宣布戒严，准备抵抗。后来袁世凯派王芝祥来赣调解，戈克安自动离职。

这时，袁世凯决心用铁血手段扑灭民主势力。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车站遭暴徒袭击，重伤逝世。“穷究”结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凯，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宋案”真相公布，群情愤慨，全国倒袁之声日益高涨，各省都督一致表示同情，积极进行倒袁准备。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派黎元洪兼任江西都督，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后代行都督职务）。于是，李烈钧乘小轮到湖口，转乘日清公司凤阳丸离职去沪。

南昌光复，兵不血刃，同盟会员在新军中起了积极策动响应作用，但同盟会在江西并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资本成为一支有力的领导力量；各界群众对“革命”并无认识，只求大局早日安定，把希望寄托在前清官僚和旧式军官的赞成革命之上，当然是靠不住的。在当时下无群众基础，上有北京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虽有李烈钧等少数人的忠心拥护孙中山，但亦无济于事。辛亥革命之在江西，已是狂澜既倒，难于挽回了。

四 尾声——湖口讨袁孤军应战

李烈钧到达上海后，即与孙中山积极商议讨袁计划，动员各省兴师讨袁，发动第二次革命。当时，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有些领导人对武装斗争全无信心，主张听从法律解决。国会议员则舍不得离开北京的议席。只有李烈钧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他为了策划倒袁，不断派人四出联络。但这时的国民党已不是清末从事革命时的同盟会了，党员大多数都留在北京迷恋“合法斗

争”。袁世凯在6月9日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后，又于30日免去安徽柏文蔚都督职。孙中山因而更加愤怒，即于6月上旬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人会议，商议讨袁问题。会上孙中山谈到由哪省先行发动，大家都默不作声，独李烈钧起立发言，自告奋勇，愿由江西首先发难。于是大家公推李烈钧为讨袁总司令。李烈钧当即回江西，于7月7日到达湖口，即着手编配部队，拟定作战计划，召集各部队首长开军事会议，面授机宜。李烈钧自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兼正面军司令，派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左翼军司令，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为右翼军司令，原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参谋长。同时江西省议会召开讨袁大会，除推定李烈钧为江西讨袁总司令外，并决定欧阳武为江西都督，宣布江西独立，于7月12日通电各省讨伐袁世凯。

江西通电发到各省后，黄兴便在南京强迫江苏程德全于7月15日宣布讨袁，响应李烈钧的讨袁军。谭人凤在湖南策动谭延闿于7月17日通电宣布独立。接着，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相继独立。7月20日，袁世凯下达“讨伐”令，以冯国璋、张勋两部进攻南京，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率李纯、马继增等部进攻江西，并令郑汝成、汤芑铭率领海军向江苏、江西两省协助作战。讨袁之战，于是即在湖口、九江、芜湖、南京以及长江下游一带发动起来。

江西欧阳武这时也调了驻省会的第四团吴安伯部驰赴前线增援。原驻宜春、萍乡一带的第六团李定魁部，早在李烈钧督赣时调去九江。蔡森的第四旅，向驻赣南各县，奉命集中开拔，但迟迟不动，稽延时日；第七团夏尚声部，则表示要8月初旬才能开抵南昌，再赴前方；而邻省情况亦复如此，如湖南、广东两省援军，迟迟没有开到，致使李烈钧鏖战湖口多日，死亡枕藉，得不到援军换防接战，因而前线不支，遂下令撤退。黄兴亦于8月初旬，在危急中自南京出走。

失败告终

九江、湖口失守后，前方作战部队退抵德安、永修、星子、都昌、鄱阳等地。这时，安徽、湖南相继取消独立，形势变化，士气不振。李烈钧乃于8月下旬下令作战部队，退抵永修山下渡南岸及新建吴城镇、都昌姑塘、南昌王家渡等处。此时，在南昌的欧阳武召开秘密会议，认为此次战争，国民党没有统一的指挥，独立各省仅以空电声援，按兵不动，单靠江西一省的兵力，决难抵抗拥有强大兵力的袁世凯，固守南昌，凭城作战，徒使地方蒙难，人民遭殃，遂决定将第一师司令部撤退到吉安。军次樟树镇，欧阳武又宣布：“我是吉安人，既不愿在南昌作战，破坏地方，使人民痛苦；我更不愿在桑梓作战，使我留千古骂名。”^⑩遂决定从此不再参加作战，并赠送参谋长龚师曾现洋500元，以资解散幕僚，他自己则伴同幕友中的乡亲回吉安去了。

形势急转直下，李定魁的第六团在九江被袁世凯利诱，投降于段芝贵。李烈钧作战失败，率步兵三团到达南昌，见欧阳武已去吉安，便委派第三团团长方毓瑞为南昌卫戍司令，数日后又派伍毓瑞代理江西都督，而李本人则到湖南，由谭延闿设法用装煤炭的日本货轮暗中把他送出，到日本去了。

林虎当时有“飞将军”之称号，他在前线作战失利后，带领部队经由德安、永修、奉新、修水方面撤入湖南，将军械弹药及一切装备，概行缴交湖南省政府。湖南都督谭延闿给他银元10万元，用作解散部队之用。之后，他即乘日本军舰直到日本去了。

伍毓瑞高举着反袁旗帜，一直支持到袁世凯任命李纯做江西护军使行将到达南昌前夕，他才离开南昌，由浙江逃往日本。第四旅旅长蔡森，则在李纯占领南昌后，率部向李纯投降。支队司令黄旭、宪兵司令廖伯琅、步兵第四团团长方伯安等，均不幸被俘。方伯安被押在陆军监狱，到袁世凯死后，才得到释放。黄旭、廖伯琅则于1913年11月在南昌光荣殉难。

李纯占领南昌，就任护军使后，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苛征暴敛，压榨人民，猖獗已极。早年由孙中山派回江西赣州的魏会英被捕遇害。已在吉安青原山削发为僧的欧阳武（释号止戈）亦被下令缉拿。欧阳武见刘世钧的父亲已被捕，恐由自己累及父兄，乃投案自首，被解赴北京，囚禁于陆军监狱，判刑8年，后经他哥哥四出活动才释放。徐秀钧则早在湖口起义后，即被袁世凯指为“乱党”而逮捕于天津，被押回九江后，禁锢在九江锁江楼上。李纯派军法处长将他严刑拷打，审问他：“你们乱党还有哪些人？”徐秀钧回答道：“除国贼袁世凯及其狗腿子外，都是我们的党人。”^①军法处长命令他跪下，徐秀钧态度强硬地回答说：“我是国事犯，可杀而不可辱。”^②结果，杀害于九江南门口火帝庙侧空场。

称为“二次革命”的湖口讨袁以失败告终，它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之在江西，其前奏为一曲悲歌，其尾声则喇叭声咽，整个主旋律基本上是悲壮的。说明变革社会的革命，有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江西这幕巨大的史剧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他所代表的阶级），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对待革命，有的人英勇，有的人坚贞，有的人投机，有的人背叛，有的人数者兼而有之，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江西和全国一样，推翻帝制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整个辛亥革命，毕竟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

①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萍乡市政协、浏阳县政协、醴陵市政协合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第85页。

②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页。

③ 《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第9页。

④ 刘揆一：《黄兴传记》。

⑤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页。

- ⑥ 曾省斋：《丙午萍浏醴革命始末记》。
- ⑦ 邹鲁：《魏宗铨传》。
- ⑧⑨ 《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第62页。
- ⑩⑪⑫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6页。
- ⑬ 同上第7页。
- ⑭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 ⑮⑯ 《江督端方、赣抚吴重熹会奏萍乡革命军起事情形折》，《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第162页。
- ⑰ 1907年5月31日《捷报》。
- ⑱ 《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第57页。
- ⑲ 《辛亥武昌首义记》卷上第4页。
- ⑳㉑㉒ 吴宗慈编《辛亥革命光复大事记长编》，江西省文献委员会印行本第22页。
- ㉓ 同上第35页。
- ㉔ 彭程万：《江西光复和光复后的政局》，《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07页。
- ㉕ 欧阳武：《江西光复和二次革命的亲身经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11页。
- ㉖㉗ 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36、337页。
- ㉘ 同上第338页。
- ㉙ 同上第341页。
- ㉚㉛ 同上第343页。

山西辛亥革命纪事

刘存善

一 山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赔款割地，帝国主义无休止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卖国求荣，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各阶层人民的代表人物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于是相继出现了人民群众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官僚买办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运动，特别是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以及它后来组织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都给山西知识分子以启发和鼓舞。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洋务运动的开展，山西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出现了第一个近代工业——日产五百小筒火柴的太原火柴厂，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又出现了拥有新式机器九部、35马力蒸汽机一部、工徒百余人的山西机器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山西确立了。在要求改革的呼声之下，清政府开始推行所谓的新政，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到国外留学，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1901年，猗氏县的景定成（字梅九）等四人被保送到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1902年2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恢复了山西武备学堂，3月又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西斋（理科）由英国浸礼会教士李提摩太和教崇礼主办，并在上海设立了译书

刘存善，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院。他们在翻译和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传播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于是，山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羡慕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结合中国当时出现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便希望按照英国和日本的模式，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由圣君贤相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但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则要求革命。

山西多数知识分子是通过阅读革命报刊，接受了革命思想的。1903年，上海《苏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倡导革命和排满，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以景定成为代表的倾向革命的山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读了这些文章以后，便把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君主立宪的政纲，“看得不值一文钱了”。当年冬，景定成作为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6人中的一员，到日本东京上了本乡第一高等学校。先于景定成来到日本在振武学校学习的灵石人何澄在谈话中菲薄康、梁，主张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启发景定成走上了革命道路^①。

1904年，山西巡抚张曾敳在清政府允许下，派了五十名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有师范学校的刘懋赏、王国祜、孟元文，山西大学堂的李庆芳、陆近礼、谷思慎、荣福桐、王用宾、张起凤、邵修文、景耀月，山西武备学堂的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黄国梁等人。接着又去了一批自费留学生。他们到东京以后，分别进入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两个预备学校——神田经纬学校和振武学校。山西学生组织了山西留日同乡会，景定成当选为第一任会长。何澄和景定成劝新来的学生剪辫子，因为清政府不让剪辫子，而日本人又骂留辫子的中国人是“豚尾奴”，敢于剪辫子就是革命的表现。

这些留学生在山西时，听到的政论主要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那些改良主义的东西，但在东京，不仅可以听到革命宣传，而且《革命军》、《驳康有为书》、《猛回头》、《警世钟》、《逐满歌》等鼓吹革命的宣传品都可以看到。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富士

见楼对中国留学生发表了抛弃君主立宪、把中国建成共和国的演说。他批判了康、梁的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不能躐等而为共和”的庸俗进化论观点；指出“救中国要从高尚的（指革命）下手，万莫取法乎中（指立宪）”，“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他说：“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要“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②这使许多留学生接受了革命道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比较激进的有谷思慎、景定成、王用宾、何澄、景耀月、王荫藩等人。

为了宣传革命，景定成等人创办了《第一晋话报》。景于1905年还回国提倡天足和禁烟。不过这时他们还没有明确的宗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强烈要求革命的山西留学生，纷纷申请入会。到1905年底，参加同盟会的有谷思慎、王荫藩、何澄、荣炳、王用宾、景耀月、温寿泉、张瑜、乔煦、阎锡山、荣福桐、井介福、崔潮、张呈祥、丁致中、赵戴文和李蕻。谷思慎被任命为同盟会总部执行部调查科负责人兼陕西省会员入会主盟人。王荫藩、荣福桐、景耀月为山西省会员入会主盟人。同盟会山西分会设在东京，受国内北部支部（烟台）领导，负责人先后由谷思慎、王用宾、荣福桐等领导。他们积极发展会员，到1906年，单在日本入会的就有五十多人。因1905年回国，1906年才入会的景定成在《罪案》一书中回忆说：“同盟会原来发起于南方同志，西北方面除张溥泉（张继）外，最初加入的，还算山西人占了多数。”^③

从此，山西的同盟会员就开始了有组织地进行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

二 山西同盟会员以武装斗争为中心进行革命活动

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

权”。它向人们宣示，同盟会要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

山西同盟会员根据这一方针，总结历史经验，为将来的国内起义提出“南响北应”的战略设想。景定成回忆说：“我常和同志谈太平天国遗事，说当年失败的原因，固然在于意见不齐，病根由于诸人权利心重，责任心轻，这是中山先生说过的中肯话。我以为洪、杨倡义南方，虽说据了天下一半，北方到底没有一省响应，所以清政府能缓缓地用北方财力，兵力，去平灭它。我们今日第一要事，就是专从南响北应下功夫，极而言之，北响南应亦无不可。同人颇以为然。”同盟会员杨少石也有这种设想。他对景定成说：“革命若从南方举起，不知几时才能到北京。我们从陕西、山西下手，出来一支兵，出井陘截取京汉铁路的中心，一支兵出函谷直据洛阳，与南师握手中原，天下不难立定。”^④这一设想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1912年9月19日他在太原视察时，在太原商学界宴会上说：“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都督阎君谋画，令阎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响应。”^⑤

由于山西表里山河，地势险要，又处于清廷肘腋之间，可在关键时刻予清廷以致命打击，所以山西同盟会员都把“北应”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在振武学校学习准备进入士官学校的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参加了孙中山在学军事的同志中发起组织的“铁血丈夫团”^⑥；学习体育的王建基等同志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研究军事学问，练习操法和射击，准备回国后在绥远建一根据地，将来响应南方起义，出兵张家口，以拊清廷之背。^⑦

山西的同盟会员认识到“秀才造反百年不成”，为了进行武装斗争，必须掌握武装力量，于是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省内并以发动军人参加革命为主要目标。1906年，荣炳奉派回国，在山西武备学堂和新军中发展王嗣昌、应芝、常樾、赵守钰、张煌、王梦弼、金殿元等加入同盟会。这次活动使同盟会打入山西新

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当年底，荣福桐回省传达了同盟会总部关于“加紧革命活动，准备实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与会同志商定除在太原等地壮大实力外，还应在清廷鞭长莫及的绥远西部开展工作。^⑧会后，王建基等到包头一带进行活动，1907年在萨拉奇发动起义，由于条件不够成熟和力量悬殊而告失败，徐翰文（字西园）牺牲，王建基被捕。^⑨这是同盟会在北方进行武装暴动的第一次尝试，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1909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山西留学生毕业回省。同盟会员阎锡山、仇亮、张瑜、乔煦、马开崧、李大魁等分别在陆军小学堂（武备学堂改称）和督练公所等军事部门任职，使同盟会在山西军事机关的力量大为增强。这年11月，清廷陆军部召集留日学生在京会试。结果山西的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相当中尉）的军衔；名列上等的黄国梁、阎锡山、张瑜、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辎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⑩这次考试使各省军人中在日本入盟的同盟会员聚首一堂，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对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考试之后，陆军部发布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军校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山西当局根据这一指示，提升温寿泉为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革命同情者）、阎锡山分任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五标和第八十六标教练员（相当副团长）。不久，又分任黄国梁和阎锡山为两标标统（团长），同盟会员常樾、马开崧任教练员，南桂馨任军需，张瑜、乔煦任管带（相当营长），王嗣昌、张德荣、张煌、刘汉卿、应芝、王缙绪等任队官（连长）。从此，同盟会员基本上掌握了山西新军的领导权。^⑪

同时，山西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同盟会员杨彭龄是师范生，在胶东随同宋教仁起义失败后，被派到山西工作，打入第八十五标二营当兵，后升正目（相当班长）。他宣传

革命思想，在提高觉悟之后，把左队的另外八个正目，介绍加入同盟会，并与他们拜为结义弟兄，九个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⑧二营右队的二十四同盟会员也拜为结义弟兄。其他各营也都有类似活动。这样，新军从上到下，就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了。

此外，山西同盟会员也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斗争。他们在东京锦辉馆政闻社邀请梁启超讲话的大会上，配合其他同盟会员赶走了梁启超，把宣传君主立宪的会议变成宣传革命的讲坛。他们领导山西各界人士从英国福公司手里赎回平、孟、潞、泽的煤铁开采权。他们还在借禁烟之名杀害农民四五十人的“交文惨案”中，坚持斗争，直到清政府将山西巡抚丁宝铨开缺为止。在这些斗争中，同盟会员得到了锻炼，也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山西同盟会员很重视宣传工作。在《第一晋话报》停刊之后，又出版了《晋乘》。1909年，景定成和杜羲有天黄昏后在长安街头看见两星东西辉耀，杜顺口说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受到一卖浆者和警察的赞叹，很快传遍全城。长安的同盟会员又编了“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⑨这些民谣不胫而走，成了河东和关中一带群众的口头禅，坚定了他们反清的决心和信心。

景定成与陕西同盟会员井勿幕的革命友谊特别深厚。井在太原说：“他日革命，如须秦军帮助，我必率偏师……下河东矣！”^⑩这成了秦陇复汉军后来光复运城的先声。

经过五六年的艰苦斗争，山西起义的条件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三 太原新军起义，山西军政府成立，结束了清王朝在山西的专制统治

武昌起义以后，山西的同盟会员跃跃欲试，但当局为防止革

命，新军平时是不许携带子弹的。因此，大家都在积极准备，伺机行事。

山西巡抚陆钟琦也在焦急地进行防范。当时清军在山西的兵力，除归化城的绥远将军所辖部队外，在外长城以南有大同、太原（驻临汾）两镇。陆钟琦先是命令太原镇总兵谢有功亲自率兵巡视河防，以防陕西革命军东渡黄河，又命大同镇总兵派兵保卫太原。后来又命令第八十五标开往蒲州，第八十六标开往代州，以调虎离山，分散太原的革命力量。^⑤并且命令第八十五标先行出发。

部队出发执行任务，没有子弹是不行的。陆钟琦被迫答应发给子弹。10月28日下午黄国梁率标本部先行出发前，在寓所与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南桂馨等商定，一、二两营领到子弹后即行发难。这一决定迅速传达到新军官兵中的同盟会员中间。当晚，在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焯等的领导下，组成以杨为队长的先锋队，并公推第二营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司令。

10月29日凌晨，姚以价宣布起义，下达攻击命令和应守纪律后，率第八十五标第一、二两营及三营部分起义官兵，埋伏于太原城新南门附近，天明趁开城门之机即一拥而入，先锋队及二营主力攻占巡抚衙门，打死巡抚陆钟琦和协统谭振德，一营攻占新满城，子弹库和军装局亦为起义军占领。^⑥驻在城内的第八十六标当确知上述消息并在子弹库领取子弹后，阎锡山才以保护抚署为名，派兵驱散抚署附近的巡防队。

当天中午，在省咨议局召开的会议上，阎锡山当选为都督，温寿泉被选为副都督。随即组成军政府，年号仿武昌用黄帝纪年为四千六百零九年，门前悬八卦太极图旗，将军队扩编为四个标，一标标统张焯，二标标统苗文华，三标标统刘汉卿，四标标统张瑜。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赵戴文为参谋长，率一标开赴娘子关，防止清军来犯；刘汉卿为南路军司令，率部南下河东；张瑜为北路军司令，率部北上大同。^⑦

民军出发前到藩库领取银两，见银就拿，后来由拿变抢，被打散的巡防队和一些坏人也趁机加入。入夜进一步焚烧藩库及活牛市、大中市、通顺巷等处钱庄、银号并抢劫财物，彻夜火光烛天。^⑧10月30日，阎锡山才派兵镇压，又组织学生军站岗巡逻，秩序才逐渐恢复正常。

四 燕晋联军的组成和清军入据太原

太原起义后，清廷即令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进军山西，镇压革命。吴部吴鸿昌第十二协11月2日到达井陘前线。吴禄贞系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即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密谋起义，夹击北京。11月2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吴认定袁为革命大敌。11月3日，吴禄贞到达石家庄，即派何遂到娘子关与山西民军联系。11月4日，吴禄贞与阎锡山在娘子关会谈，决定成立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任参谋长，并决定山西民军两个营开赴石家庄，然后联络张、蓝会师北京。

当天，吴部截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械和粮服，吴又致电清内阁，弹劾陆军大臣荫昌等在武汉前线治军无状，要求严行治罪。山西民军一个营开赴石家庄，共同执行截断京汉路的任务。吴的行动，引起清政府的恐慌和仇视。时在河南的袁世凯因不能到京赴任，更是恨之入骨，遂派人收买吴的卫士长马蕙田，于11月7日晨一时许，将吴刺杀于石家庄车站。^⑨一项雄图大略，付诸东流。

11月14日，清政府派渠本翘为山西宣慰使，进行诱降。11月15日又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曹锟第三镇兵保护他到山西赴任。阎锡山派乔煦率二标增援，景定成向阎建议：“袁奴远交近攻，欺人太甚！惟有一战，不可退让，胜则长驱北上，败则分兵南北，另作计划。”阎锡山同意景的意见。12月9日，两军交战，12日

清军占领娘子关。山西民军退返太原，按原定计划，阎锡山、赵戴文等率部北上，温寿泉、杨彭龄、景定成等率部南下。^②

民军离开太原后，原来的清政府官员立即复辟，用原印信布告安民。护理巡抚李盛铎成立巡防队三旗以及民团等，并致电张锡奎：“三晋官民重见天日，无不额首称庆。”12月24日，以梁善济为首的太原官绅代表又到石家庄欢迎张锡奎。^③

1912年1月6日，第三镇第五混成协协统卢永祥不顾议和停战命令，率步兵第一标王丞斌部及马三队、山炮工辎各两队进占太原。1月10日，张锡奎在武卫右军统领王汝贤率右营的保护下，也由石家庄到达太原。三镇兵身穿灰军装，人称“灰老鼠”，后来南下平阳府（今临汾市），路过赵城时，肆意抢掠，庐舍为墟，直到1912年3月底始全部撤走。赵城人民为了不忘这一段惨痛历史，曾铸卢永祥铁像跪于赵城南门内瓮城西侧，背部刻有赵城名士张瑞玘所作《铁像铭》以记其事。^④

五 晋北革命和大同起义

武昌起义前，晋北的同盟会员，崞县的续桐溪、弓富魁，五台县的康佩珩、赵三成，定襄县的齐宝玺、贺炳煌，忻州的石莹、许之翰，代州的李嵩山，繁峙的任涌，静乐的武泽霖，岢岚的赵萃珍、赵萃瑛，大同的李德懋、刘干臣等，已在广泛地开展革命活动，特别是续桐溪、弓富魁等在下层群众中团结了许多号称“光棍”的好汉，李德懋等在大同总兵衙门士兵中发展了同盟会员，为起义准备了条件。

武昌起义后，大同镇总兵王得胜派人押送步枪二百枝到雁门关，同盟会员李嵩山纠集农民在岱岳镇将枪全部夺获，攻占应州并山阴县城，后被清军镇压，李嵩山及其弟泰山牺牲于大同。^⑤

太原起义后，阎锡山派北路军总司令张瑜北进大同。晋北各地同盟会员纷纷响应。崞县的续桐溪和弓富魁等在阎锡山的同意

下，联合附近各县成立了忻代宁公团，以续为团长，康佩珩为副团长，赵三成为参谋长，弓富魁为统领，赵丕廉为粮台督办，十天左右组织成一支农民武装，奉命配合北路军司令张瑜北取大同。^②双方商定，张瑜下代州出雁门关，忻代宁公团出茹越口，在大同会师。

大同同盟会员在太原起义后，得悉大同镇总兵又向雁门关送枪80枝，即派高宝银、王芝等25人，在岱岳镇将枪夺得，结果又被清军镇压，19人被杀害，迫使大同同盟会负责人李德懋等撤离大同。但是留在城内的同盟会员仍在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初十日）夜，宋世杰、李国华率部分同盟会员和群众，在孙占标等的内应下，攻入镇台衙门。大同镇总兵王得胜逃往宣化。大同知府李德炳和知县葛尚德躲进耶稣教堂，大同镇步兵第一旗加入起义队伍。大同宣告光复。12月1日，临时军政府宣布成立，选举李德懋为都督，李国华为副都督代行都督职务，宋世杰为虎贲将军，负责军事活动。

大同起义后，清政府派记名总兵陈希义率毅军一部收复大同，其先头部队郭殿邦部于12月5日到达城东八里的古城村。同日，支援大同的续桐溪率领的忻代宁公团，已由西门进入城内，会同李国华、宋世杰等起义官兵共同守城。由运城和太原赶来支援的同盟会员王建基和贾英及其所率民军，于12月10日在大同城南四十里的绣女村，与毅军激战，王、贾均牺牲。

大同起义，拊清之背，清皇室十分恐慌。时南北议和正在进行，野心家袁世凯别有打算，拟利用大同民军作为逼迫清帝退位的手段，所以大同清军后来又增援了淮军杨荣泰部，但并不发起攻城，每日射进城内的炮弹亦不爆炸。双方相持四十多天后，清山西护理巡抚李盛铎派人到大同进行调停，双方达成协议。1912年1月17日，起义军撤出大同，忻代宁公团撤回崞县（今原平县），宋世杰率当地起义军驻口泉一带。

大同议和后，淮军入城大索三日，家家被抢，户户受害。宋世

杰闻讯于1912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初八日）带领起义军占领西半城，组织起民团与商团两支群众武装，于27日夜将淮军赶出城外。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清帝退位，袁世凯仍着淮军镇守大同，宋世杰起义军被编为一个营，受杨荣泰节制，后编入晋军。^⑧

六 晋南光复与河东军政分府的建立

晋南重镇平阳府由清军太原镇总兵谢有功镇守。陕西起义后，他将所部马、步七旗集中临汾，又奉命巡视河防，在运城遇到潞安协台兼太原镇前路巡防帮统陈政诗。陈先期回到临汾，拟募新兵七旗，巡防各地。

太原起义后，当地同盟会员侯少白等，密谋起义，由于陈政诗回到临汾，起义夭折。

山西民军南路军总司令刘汉卿于1911年11月19日率部南征。时陈政诗驻防霍州，侯少白说服韩信岭守军管带尹冠业，让民军通过韩信岭，陈政诗逃往绛州。12月5日，民军不战而克平阳，以刘拱璧为平阳府代理知府，牛如虎为镇台。

刘汉卿继续南下，在侯马南之隘口与北上的谢有功部遭遇。民军受挫，刘汉卿牺牲，民军退洪洞。谢有功进入平阳，杀死军政府办事人员和新募民兵一百多人。

运城（河东）一带革命力量雄厚。太原起义后，在北京的同盟会员王用宾、刘绵训、邵修文等绕道回到运城，一面与当地同盟会员尚德等，组织民团，一面由张士秀、王用宾赴陕求援。1911年12月31日，井勿幕实践前言，与陈树藩率秦陇复汉军进抵运城郊外，1912年元旦攻入城内。运城监掣府陆叙钊被击毙，河东兵备盐法道余燾逃亡。同盟会员与地方绅士公推张士秀为民团总司令，王用宾为民政长。

娘子关失利后，山西军政府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由杨彭龄任行军都督。到河津，景定成赴陕求援，杨彭龄被迫出

走，李鸣凤自任五路招讨使，率部于1912年1月1日，到达运城郊外，闻运城已告光复，遂驻军北相镇。

南京临时政府对山西革命极为关心，特派王北方（伯芳）到运城视察。大家认为，阎锡山北上杳无消息，副都督温寿泉尚在河东，为了统一指挥，应组织军政分府。当即一致通过，以尚德为军政分府秘书长，台寿民为参谋长，军队编为两个旅，李鸣凤任地方民团与会党人员编成之旅的旅长，张士秀为河东民政长，总理民政及盐政事宜。从此，河东各县均在军政分府统辖之下，各县县官多由民政长遴选同盟会员担任，军政分府宣布豁免旧欠钱粮，释放在押罪犯，取消县衙门三班（早班、壮班、快班）六房（吏户礼工刑兵），废除跪拜礼节，免除县官坐轿出衙由穿黑衣戴红帽的衙役手拿“肃静”“回避”牌鸣锣开道的恶习，辞退衙门里的绍兴刑名师爷。官民接近，面貌一新。

此时，清军尚盘据于绛州、平阳等地，河东军政分府遂以张起凤为平阳镇守使，以李鸣凤为民军总司令，率部出征。1912年1月7日（农历辛亥十一月十九日），攻克绛州，将清军统领陈政诗正法。12日，民军包围平阳，双方相持不下。不久，卢永祥部进驻平阳，双方议和，划定势力范围，互不侵犯。

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清帝宣布退位，对峙局面始告终结。1912年夏，河东军政分府宣告结束。⑤

七 归绥地区的革命活动和阎锡山在绥包

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西部地区，清末叫做归绥道，是山西省的四道之一，设有绥远将军。当时的绥远将军是蒞岫，其下重要官员有归化城副都统麟寿，归绥兵备道咸麟。部队有巡防队八旗，俗称外八旗，统领为周维藩。

在归绥道的丰镇、萨拉奇、包头等地，同盟会员李德懋、弓富魁、王建屏、王虎臣等做了许多工作，在蒙族知识青年中发展

经权、云亨等加入同盟会，又在下层群众中团结了许多“英雄好汉”，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员杨瑞鹏由北京回到归化城，曾动员外八旗统领周维藩起义。周为合肥人，翰林，曾赴日考察军政，虽接近过先进事物，但非同盟会员，对于起义犹豫不决。部下有些旗却闻风起义，由于缺乏得力领导，胡乱放了几枪，即转入后山。其中由曹富章、张林等率领的约二百人，企图在包头立足。杨瑞鹏此时正在包头与同盟会员郭鸿霖、王鸿文、王定圻等策动清军管带王紫绶、谢若霖响应革命。当时驻包头的五原厅（相当县）同知樊恩庆伪装同情革命，郭鸿霖等以学董或咨议局议员的身份，建议樊恩庆允许曹富章等的起义部队进入包头，宣布独立。樊佯许，阴与王紫绶、谢若霖及清真寺阿訇设下圈套，于1911年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日）举行欢迎宴会时，发起突然袭击，当场击毙曹富章、张林等四十余人，当地人士除李士元、李茂林、王肯堂等乘乱逃脱外，郭鸿霖、王鸿文等均被捕牺牲。

在丰镇，王虎臣曾劝丰镇厅同知章同起义，遭拒绝。农历十月中旬，农民出身当过兵的赵喜泰和宦门子弟郑作霖首先发难，打进陶林城，攻占宁远（凉城）。后被蒙古队击溃。大同起义后，弓富魁通知王虎臣在丰镇起义，以作策应。1911年11月13日，起义军攻入城内，章同潜伏在一口棺材内派人向大同清军陈希义求援。起义军闻清兵将至，主动撤出，王虎臣一路行至得胜口被清兵击溃，王牺牲。清军管带王国士进入丰镇，会同章同，杀害同情革命者三十余人。丰镇起义亦告失败。

阎锡山北上到五寨，孔庚来会。他接受孔的建议，通电全国，声明北伐。后经保德至河曲休整，以孔庚为总司令，王家驹为总指挥，于1912年1月13日（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进占包头。阎以“秦晋蜀北伐先遣军大都督”的名义，布告安民，改包头为包东州，以同盟会员杨瑞鹏之父杨守性为包东州民政官，蒙族同盟会员云亨为绥远将军，经权为归化城都统，安祥为归绥道道尹。

1912年1月20日，山西民军东进占领萨拉奇。1月26日，继续东进，两军相遇于刀什尔（今陶思和车站），民军奋勇冲杀，王家驹骑马往来指挥。清军管带发义见势不可挡，乃集优秀射手专打指挥官。王家驹阵亡，民军退往托克托。时南北议和接近成熟，民军遂停止前进。^②

八 南北议和与阎锡山执掌山西政权

武昌起义，清政府派兵占领汉口后，袁世凯发出和平试探，英国公使朱尔典等出面调停，双方同意停战议和。在和会正式开会以前，袁提出民军不包括秦、晋以及北方起义各军在内，意在消除他的肘腋之患。因而黎元洪于1911年12月9日宣布的停战条件第三条是：“因秦晋蜀三省电报不通，恐难即时停战，是以所有以上停战条件，与该三省无涉，惟停战期内，两军于该三省各不增加兵力或军火。”这种妥协给山西人民带来极大不利。袁世凯和曹錕利用这一点，不仅增加兵力和军火，而且于12月12日攻占娘子关，并将北方革命军统称之为土匪，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意在借剿匪而消灭山西民军。12月17日，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复电袁世凯，指出清廷早已以土匪诬我民军，今又概称北方民军为土匪，是民军不能接受的；清军“此次攻袭娘子关，于停战期内而不停战，意若置诸土匪之列，其为诬罔，岂复待言”！豫晋秦陇四省协会代表会见伍廷芳，请其要求清方代表唐绍仪转达袁世凯，命令秦晋两省清军立即停战。袁借口电讯不通，于12月18日，电复伍廷芳可以用他的名义通知各地清将，在休战期内不得开仗。当日下午南北议和举行第一次会议，伍廷芳提出，湖北、山西、陕西等地均应一律停战，得到袁的正式承诺，始能举行正式会议。双方在12月27日的会议上议定：自1911年12月31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早8时起，所有山西、陕西……等处之清兵，五日之内，一律退出原驻地百里之外。袁对这些条款，都复电承认。但

是，清军第三镇第五混成协协统卢永祥仍率部于1912年1月6日进占太原。张锡奎亦于10日到达。对此，袁又以“太原传教西人地位危险”，“所派之兵只为保护西人，并非有战争之意”，来进行粉饰。^②

袁世凯背信弃义的罪恶行径，山西军政府代表南桂馨在南京亦面请孙中山电袁驳斥并力争山西为起义省份。孙中山说：“虽有此议，我们绝不承认，宁可和议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你们尽可放心！”^③

经过反复折冲，袁世凯的阴谋未能得逞。南北议和日有进展。驻军于托克托的阎锡山得此消息，又接到山西巡抚李盛铎等邀他回省的信，遂否定孔庚等东取归化（今呼和浩特市）的意见，决计南旋。1912年2月9日，阎率部由托克托南下。^④

1912年2月12日，南北议和结束，共和告成，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8日（农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阎锡山率部到达忻州。深恐革命党人处于他卧榻之旁的袁世凯，于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失败之后，又生毒计，于当天致电李盛铎、卢永祥和武卫军统领王汝贤：“阎锡山军队……勿令其回驻太原……阎如果擅自进行，望即督飭各营严加抵御。”^⑤阎锡山只得留驻忻州。

为了取得山西的统治权，阎锡山知道必须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于是一面派袁的门生定襄人董崇仁赴京向袁疏通，一面又向孙中山求援。孙中山电袁：“山西屡电，请转知撤退太原兵，召还晋省都督。查前清兵在晋，确有野蛮举动，大拂舆情。现在中国一家……若晋督还晋，李盛铎仍为民政长，则一是安谧矣！”^⑥

在孙中山的力争下，加上阎锡山向袁输诚效忠，袁世凯始于1912年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1912年4月4日，阎锡山率部回到太原。

辛亥革命在山西，至此告一段落。山西的同盟会员、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不仅推翻了清王朝在山西的封建统治，而且对结束我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和建立中华民国起了重大作用。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到太原视察时曾对此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何也？广东为革命之最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⑩

① 景梅九：《罪案》，北京京津印书局民国十三年版，第13—23页。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卷第51—52页。

③ 景梅九：《罪案》第52页。

④ 景梅九：《罪案》第53、58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471页。

⑥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第55期。

⑦ 景梅九：《罪案》第54页。

⑧ 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

⑨ 李冠洋：《山西乡老座谈山西辛亥起义》，《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

⑩ 《并州官报》1909年12月3日，第109号。

⑪ 樊象离：《同盟会在山西的活动》，李冠洋：《山西乡老座谈山西辛亥起义》，《山西文史资料》第1、19辑。

⑫ 郭登瀛：《参加起义先锋队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

⑬ 景梅九：《罪案》第125—126页。

⑭ 景梅九：《罪案》第103页。

⑮ 侯少白：《辛亥革命山西起义纪事》，《山西文史资料》第1辑。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第55期。

⑯ 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郭登瀛：《参加起义先锋队的回忆》。

⑰ 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⑳ 王定南：《辛亥革命太原商民遭受抢劫的情况》，《山西文史资料》第9辑。

㉑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0年第1版第196—208页。

㉒ 景梅九：《罪案》第235—236页。

㉓ 《山西革命军见闻记》，原载1911年12月27日天津《大公报》，转引自《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山西辛亥革命函电汇存》，《山西师院学报》1958年第2期。

㉔ 张瑞玑等：《声斥卢永祥的几篇旧存文稿》，《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

㉕ 周戒：《回忆李嵩山兄弟的壮烈牺牲》，《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

㉖ 牛诚修藏稿：《山西忻代宁公团北伐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辑。

㉗ 大同市政协：《大同辛亥革命纪要》，《山西文史资料》第1辑。彭继先：《辛亥大同的守御与和议》，《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

㉘ 尚德：《辛亥革命河东光复纪实》，赵肇寰藏稿，《河东革命记》，薛笃弼：《太原起义和河东光复的片断回忆》，分载《山西文史资料》第1—4期。

㉙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内蒙古辛亥革命史料》。

㉚ 《中国革命记》第13册。

㉛ 南桂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2辑。

㉜ 张树帜：《山西辛亥起义日记》，《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

㉝ 《袁世凯致李盛铎等电》，《山西师院学报》1958年第2期 第183页。

㉞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8页。

㉟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0页。

重九起义

——辛亥革命在云南

谢本书 吴显明

辛亥云南起义，是云南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它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两百多年的反动统治，结束了长期的反动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实行了某些进步的改革，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辛亥云南起义，是全国各省区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省份之一，具有浓厚的地区特点，这是与云南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

一

19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的魔爪很快伸进了云南。地处西南边疆门户的云南，那时介于法国所属印度支那和英国所属印度、缅甸两大殖民地之间，成为英、法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后门”^①，也是它们之间进行激烈争夺的场所。远在18世纪，英、法两国就开始窥视云南地区。19世纪初，英国侵入缅甸以后，计划开辟印度、缅甸到云南的交通，以便侵略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一带。英国多次派调查队、武装探测队等，入侵云南，制造事端。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以后，也企图进一步入侵云

谢本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省历史学会会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研究员。

吴显明，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文史办公室主任，省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南，什么探测队之类的活动，络绎不绝。法人古德尔孟在其《云南游记》一书中别有用心地说：“云南之气候温和，尤似法国南境，于法人尤为相宜。其矿产之富，物产之饶，较诸越南奚啻霄壤……，吾望他日火车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于云南全省。”^②其侵略云南之野心，不打自招。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进一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云南成为英、法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在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侵略、压迫下，不仅从来没有屈服过，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辛亥云南起义以前，就曾有过杜文秀起义，李文学起义，马嘉理事件，刘永福抗法斗争，反对英国侵占猛乌、乌得的斗争，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反对英法霸占七府矿产的斗争，昆明人民的抗法斗争，反对英国入侵片马事件，周云祥领导个旧矿工起义等事件。

清末的云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帝爱国运动不断有所酝酿。1904年，在云南有“誓与满清偕亡”为主的“誓死会”成立。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赵伸、李根源等立即加入了同盟会；稍后加入同盟会的留日学生还有：罗佩金、殷承璈、叶荃、赵复祥、唐继尧、刀安仁、黄毓成、张开儒、庾恩暘等数十人，并创立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吕志伊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还兼同盟会评议部评议。次年1月，孙中山、黄兴接见云南留日学生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袭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③

1906年4月，《云南》杂志创刊。该刊大量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的卖国罪行，号召人民进行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同盟会云南支部派杨振鸿等人先期回到云南，先后创办“兴汉会”、

“滇学会”、“敢死会”、“死绝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并在防营、新军中发展组织。1906年后，云南即开始有同盟会组织。

“一时以昆明、腾越（今腾冲）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这样，云南就成为策划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④1908年，同盟会在云南境内，领导了河口起义和永昌（今保山）起义，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觉醒。

1909年云南陆军讲武堂重建，大批留日学生和同盟会员，被聘任为教官，如李根源被任命为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庾恩赐、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皆为教官。虽然讲武堂总办先后为胡景伊、高尔登，但一切听李根源“主办，决不牵制”^⑤。第二年，李根源继任总办。这样，革命党人事实上掌握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权，并使它成为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培养革命人士的基地。辛亥云南起义前夕，讲武堂学生大批分配入伍，或到新军中见习，从而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相配合，协同进行工作。“这样，部队中的士兵就被革命党人所掌握”。^⑥1911年春，蔡锷从广西调到云南，被任命为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他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⑦；并表示对同盟会，“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⑧。

云南的革命形势成熟，已处于箭在弦上的关键时刻。

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云南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兴奋异常，准备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之消息，传遍滇中，人民如醉如痴，一般志士欲舞欲狂。”^⑨嗣后湖南响应武昌起义，川黔动摇，滇省革命志士积极行动起来。为了

准备起义，在昆明的革命志士连续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

10月16日，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琳、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人召开了第一次秘密会议，筹备响应武昌起义有关事项。会议决定联络“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以及“同议可共事革命之人员”，并决定以后邀请蔡锷参加秘密会议。10月19日、22日、25日、28日，云南同盟会员又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决定“联络官兵，期与可靠之官长逐层组织小团体，且与歃血为盟，以坚其信用，而为有把握之举动”。第三次秘密会上，互相通报了各自工作进展情况。第四次秘密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将“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的纸条火化调于酒中，分饮之以结同心。第五次秘密会上，决定于10月30日深夜在昆明发动起义，并推举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④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还进行了比较严密、细致的分工。会后与会人员分头进行准备。

昆明起义即将爆发前夕，滇西腾越起义却于10月27日先行爆发。腾越起义的领导人为同盟会员张文光、刀安仁（傣族土司）等。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文光星夜从缅甸回到腾越，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决定10月27日在腾越发动起义。

10月27日午后7时，张文光亲自率领革命党人及新军士兵，打响了第一枪，经过一昼夜战斗，起义军占领了腾越。清军腾越总兵张嘉钰吞金自杀，腾越关道宋联奎投降，腾越厅同知温良彝潜逃，腾越起义宣告成功。28日，成立了滇西军都督府，张文光任第一都督，刀安仁任第二都督^⑤，以“九星旗”为军政府旗帜。军政府文告，要实行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之大计，一要驱除鞑虏，二要恢复中华，三要建立民国，四要平均地权。^⑥

腾越起义是云南响应武昌起义的首次起义，比昆明起义早三天。滇西军都督府是云南地区出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权。根据杨振鸿生前制定的“滇西起义，推动全省”的方针，

张文光为推动全省革命事业的发展，分兵三路，向保山、大理方向进军。昆明起义成功，建立了云南省军都督府以后，派出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全权处理滇西问题。经过努力，滇西军政府撤销，全省统一。云南军政府在处理滇西问题时，特别肯定了张文光的两大功绩，一是“在腾倡举义旗，商民安堵”，二是“又能力顾大局，共保治安。”^⑩和平处理滇西问题，是云南军政府稳定省内局势的重大措施。

腾越起义给正在准备中的昆明起义以新的刺激。10月29日，蔡锷到昆明巫家坝，与七十四标及炮标各营管带和革命志士，商议落实起义计划。10月30日蔡锷正紧张筹备之际，忽见“城内大火冲天”，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⑪原来，10月30日晚8时许，昆明北较场七十三标第三营所部排长黄毓英等派兵抬子弹，做起义准备，被值日队官唐元良追究，甚至鞭打士兵，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唐元良，并杀死了另外几个反动军官，于是起义提前几个小时由基层发动起来。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日，所以辛亥昆明起义，史称“重九起义”。

起义爆发后，李根源立即赶到北较场，率领七十三标起义士兵攻破北门，向五华山和军械局发起进攻。蔡锷在巫家坝闻讯，立即召集所部，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起义士兵高呼“革命军万岁”，即整队出发攻城，并向督署等地发起攻击。

云贵总督李经羲、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等企图顽抗，组织力量进行反扑。重九之夜，昆明战斗异常激烈。起义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如讲武堂特别班学员、七十四标第二营排长朱玉阶（朱德），起义时升任连长，身先士卒，率队参加攻打总督署，很快缴了督署卫队的械，李经羲不得已仓皇逃走。讲武堂甲班二期毕业生、七十三标所属排长文鸿逵，在进攻五华山时，奋勇当先，“被敌人机关枪扫射，胸部中弹如蜂窝，壮烈牺牲”^⑫，“计其所受枪弹，在万粒以上”^⑬。起义军领导人之一李根源，在指挥中跳战壕扭伤了脚，不能行走，仍继续指挥战

斗。蔡锷则一直亲临前线指挥，直到战斗结束。战斗至第二日中午，起义军攻上昆明市内制高点五华山，占领总督署，李经羲被俘，靳云鹏化装逃走，钟麟同自杀，镇本部参谋长杨吉祥、参谋处总办王振畿因反对起义，均被击毙于江南会馆，昆明重九起义宣告成功。

在辛亥昆明重九起义的战斗过程中，革命志士牺牲150余人，负伤300余人，敌方死200余人，伤100余人。^④所以可以认为：“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⑤由于辛亥昆明起义是经过比较激烈的战斗，对旧政权的打击，相对彻底一些，这对云南新政权的建立及其实施的政策，不能不产生积极的影响。

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迅速光复，辛亥云南起义获得了重大胜利。

三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所在地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

云南军都督府一成立，即发表声明，宣告起义宗旨，“在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同时提出了共和政体的政纲。^⑥云南军政府发布了《讨满洲檄》，重申了同盟会的纲领：“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声明：“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⑦

云南军政府成立时，府内置一院（参议院）、三部（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以李根源为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总长，韩建铎为军务部总长，殷承瓛为参谋部总长。后将一院三部改为一院（参议院）、二厅（政务厅、参谋厅）、一司（军务司）。

辛亥云南军政府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省一级政权机关，其组织是比较完备的，政策也符合人心，社会安定。蔡锷曾回忆说，在起义过程中，全省各地虽“历经血战”，然而“均为时甚暂，秩序立即恢复，内外无间”，“同胞率能和衷共济，士民翕然归向，用是乱麻芥丝，迎刃以解。”^②因而，“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匪，或苦饷，而滇中宴然。”^③又据辛亥云南军政府财政司长袁家普回忆：“余在滇前后三年，未尝闻过枪声。尤可怪者，蔡公都督任内，全省土匪为之绝迹。”^④

辛亥云南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雷厉风行加以贯彻，这样“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矣”^⑤。其改革的主要措施，可作如下归纳。

第一，在省内政务方面，大量更新人事。都督府从都督到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同时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和其他官吏，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蔡锷说，辛亥云南军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⑥。至于地方行政，虽暂沿府、厅、州、县名称，但对府、县同城者，则裁县而由府兼摄县事；改腾越厅为县，为日后统一县治创造条件；在沿边地区设立十处行政委员，为改土设流打下基础。

在国家事务方面，蔡锷主张维护“国权”。他认为：“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不伸！”“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维护人权之保障。”^⑦因此他建议强化中央权力。

第二，在财政方面，整理财源，节俭开支。云南系边远山区省份，生产比较落后。在清代，云南岁入不过300余万两，而岁出需600余万两，故每年由部库拨款及邻省协济160余万两外，尚不敷100余万两。辛亥起义后，虽秩序较好，省库幸未损失。但是，各省独立，协饷暂停，中央亦不能协济，加上支援邻省，支出浩繁。为此，军政府决心增开财源，节俭支出。首先，整顿厘税，

剔除陋规，使厘税收入点滴归公。其次，开设富滇银行，并设分行于下关、昭通、个旧各处，基金充足，纸币流通亦有了保证，财政信用提高。再次，检查会计，设会计检查厅，凡预算决算皆财政司编制，而用款之当否则必经会计检查厅之检查。此外，还有裁撤浮冗机关，举办救国公债，遣散军队，节俭俸节等。这样，“综计节流所入，不下百万，开源所入，约计当二百万之谱”。滇省财政“尽可自立，不必如李合肥（李经羲）之逢人乞贷，哓哓纠缠也。”^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锷曾带头两次减薪。都督的薪由每月600两（元）减至120元，再减至60元，只相当于营长的薪俸。“此时都督俸金之艱，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⑨由于蔡锷带头，极力提倡节俭，正如朱德回忆，使“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⑩。

这样，辛亥云南起义后，由于全省安定，加上军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云南财政在民国元年（1912年）不仅没有发生赤字，反而节余滇币近20万元^⑪。这在云南财政史上是罕见的。

第三，在教育方面，特设学政司（后改教育司），并将原有视学四员增至十员，新增学堂120所。注重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于曲靖、昭通、蒙自、普洱、永昌、丽江等地分设初级师范六区，并对师范生实行三个月的军事教育；同时注意外语学习，考送欧美及日本留学生一百余人。

第四，在实业方面，根据省内特点，先从盐务、矿务入手，进而经营农桑、畜牧、工艺等事，整顿盐务，以扩大销路；推广矿业，拟定云南矿务暂行章程，以开放为宗旨。还在昆明设立矿物化验所、地质调查研究所，尤着力于保护和开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注重农林，设立云南农务总会、农业局、蚕林实业团，订定垦荒、森林、畜牧章程，并改良种棉、制茶之法；同时提倡工商，设立全省模范工厂，整顿商品陈列所，举办劝业工厂，开拓市场。

第五，在交通方面，对铁路、电线、邮政、航运和公路等，

都有所规划。云南地处边远，交通闭塞，军政府的规划，对改善云南交通很有好处。

云南军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地方政权所作的重大努力。

云南军政府在对内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还先后派出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这是因为，在辛亥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中，在西南地区以云南为最早，内部也比较安定；而在同一时期，全国以至西南的四川、贵州和西藏，都还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派出滇军支援邻省的反清斗争，既为革命所需要，云南亦有可能。

四川由于人口众多，地势重要，因此迅速解决四川的动乱，促成四川响应辛亥起义，是革命派和独立各省的共同要求。其时黄兴、黎元洪、谭延闿等“前后自湘、鄂来电，敦囑援蜀，以解鄂危”^⑧。已响应武昌起义的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也致电云南，请求滇军援蜀。因此，云南军政府于1911年11月11日讨论了“援蜀案”，决定组织援川军一师，以韩建铎为师长（又称“援川军总司令”），下辖两个梯团，分别以谢汝翼、李鸿祥为第一、二梯团长，并于11月14日从昆明出发，向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前进。入川滇军于次年（1912年）5月返回昆明。

滇军援川的同时，云南军政府为了声援武昌，乃决定组织北伐军。其时，黄兴曾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⑨黎元洪亦通电各省，希望“星夜兼程来援”。^⑩云南北伐军以唐继尧为司令，1912年1月28日从昆明出师。旋因清帝退位，北伐已无必要，唐继尧乃率部入黔，支援贵州以刘显世为首的立宪派，并夺取了贵州都督职务，屠杀贵州革命派于贵阳螺蛳山等地。滇军北伐出兵本是合理的，然而唐继尧却卷入贵州党争，镇压了贵州新军和代都督赵德全等有功人员，“杀赵督并坑新军千余人，次第杀害反正诸人”^⑪。

1912年夏，云南军政府又任命殷承瓛为滇军西征司令官，率军进藏，参与镇压西藏大农奴主的叛变，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入侵

活动。滇军入藏，取得了重大胜利，北京政府曾嘉奖蔡锷：“该都督调度有方，将士奋勇用命”。^⑤年底，入藏滇军返回昆明。

四

辛亥云南起义是全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义成功及其建立的军都督府实行的一系列较为进步的政策，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云南人民彻底实现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对云南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因为如此，几年以后，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目的的护国战争，首先爆发于云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辛亥云南起义有自己的特点：第一，起义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是由同盟会云南支部经过策划，召开多次秘密会议，认真准备之后，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爆发的。第二，武装夺取政权。起义是经过激烈战斗，运用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政权，建立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地方政权。第三，革命旗帜鲜明。云南军政府发布的《讨满洲檄》，重申了同盟会的纲领，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它表明云南起义的鲜明革命旗帜。第四，领导人是爱国民主主义者。新政权的主要领导人是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他们大多为同盟会员，即使不是同盟会员的蔡锷，也是颇具爱国民主思想的人，并在起义前即投身于革命事业。第五，改革初见成效。云南军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的安定，又保证了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地方政权所能够进行的努力。第六，为支援邻省作出贡献。云南军政府在自己还比较困难的时候，为了支援革命，派兵援川、援黔、援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从大的方面应予肯定。当然，新兴的云南军政府也存在着软弱性和若干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一，唐继尧入黔对革命派的屠杀；第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理人袁世凯抱

有幻想；第三，在改革中没有涉及土地问题等。

辛亥云南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光荣记录，历史功绩是不朽的。朱德曾著诗歌颂道：“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庆开场。”“靳逃钟死人称快，举出都督是蔡愕。五华山上树红旗，出师两路援川鄂。”“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兄弟。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⑧

①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合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4—125页。

② 转见云南留越学生：《云南警告》，《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

③ 李根源：《云南杂志选辑·序》，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④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页。

⑤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1第17页。

⑥ 素庵、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概况》，《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7页。

⑦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第379页。

⑧ 詹秉忠、孙天霖：《忆蔡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⑨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⑩ 据李根源说，起义文告署名，蔡愕为正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见《记云南起义》，《新编曲石文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⑪ 滇西军都督府现存文件，没有提到第二都督，然而辛亥老人之回忆录，不只一人提及有第二都督之设立，如张天放：《辛亥腾越起义的历史回顾》，《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60页。

⑫ 《滇复先事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页。

⑬ 《西事汇略》，《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522页。

⑭ 谢汝翼：《光复滇省事略》，《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3—4页。

- ⑮ 李鸿祥：《增补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146页。
- ⑯ 孙种因：《重九战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47页。
- ⑰ 冯自由：《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革命逸史》第6集第221页。
- ⑱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 ⑲ 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6页。
- ⑳ 《滇军政府讨满洲檄》，《辛亥革命》第6集第261页。
- ㉑ 蔡锷《致梁启超函》（1912年3月3日），《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 ㉒ 蒋百里：《蔡公行状略》，《蔡松坡集》第1463页。
- ㉓ 袁家普：《蔡公遗事》，《蔡松坡集》第1458页。
- ㉔ 周钟嶽：《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页。
- ㉕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辛亥革命》第6集第226页。
- ㉖ 蔡锷：《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会上的演说词》，云南《华南新报》1912年5月6日。
- ㉗ 蔡锷：《致梁启超函》（1912年3月3日），《蔡松坡集》第310页。
- ㉘ 周钟嶽：《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
- ㉙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6页。
- ㉚ 万湘徽：《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11月版第183页。
- ㉛ 张肇兴：《援蜀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99页。
- ㉜ 黄兴：《致周震麟谭人凤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页。
- ㉝ 黎元洪：《致各省都督》（1911年11月17、18日），《黎副总统政书》。
- ㉞ 张百麟：《黄泽霖传》，《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457页。冯自由：《贵州代都督赵德全》，同上，466页。

⑤ 《国务院电蔡锷滇简江等获胜嘉奖》（1912年9月9日），《民元藏事电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8页。

⑥ 朱德：《辛亥革命杂咏》。

贵州辛亥革命述略

陈 隆 德

武昌首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继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潮。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地处偏僻、经济落后、文化晚开的贵州，却走到了革命的前列，成为较早响应武昌首义，第一个较为彻底地由革命派和平接管省级政权的省分。贵州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这一特殊现象，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一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分，各族人民向来有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自鸦片战争后，贵州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发动的声势巨大、延续近二十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同时，也从未停止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仅1861年和1862年，就连续发生了《北京条约》签订后全国第一个教案——青岩教案（又称贵阳教案），第一个直接杀死外国传教士的开州教案，以及1869年的遵义教案等闻名中外的教案斗争。帝国主义者柏兰1903年在伦敦英法水银公司财务会上声言：“贵州风气未开，外国人深入内地游历颇为危险……最可畏者八百余万居民。”^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贵州人民反帝斗争的精神。

陈隆德，贵州省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和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为了聚敛钱财，偿还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赔款”，也为试图加强统治力量，以及缓和人民斗争情势，清政府下令各地推行所谓“新政”。本来十分贫瘠的贵州，为推行“新政”开办各类学校、招练新军、训练警察、建立官办企业等，一时期财政赤字猛涨，加之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赔款贵州每年也得摊20万两，至1910年“预算不敷亦在百万以上”。这样庞大的开支，自然也只能“仍取之民耳”^②，全部转嫁到了人民头上，大大超过了本来就贫穷的贵州人民的承受力。斯时贵州已是“四民愁叹，十室九空，市井萧条僂焉，不可终日”^③。

封建官僚的腐败之风也十分盛行。辛亥革命前的最后一任贵州巡抚沈瑜庆的巡抚职，就是在京城“以两万金为某亲王寿”而活动来的，他到贵州后变本加厉，明码标价地出卖官职，“开方便之门，行纳贿之政”，公然让自己的外甥郑某当介绍人卖官。上行下效，州县官吏“如蚁之赴膻”，此风全省盛行。^④自然，买来的官比科举出的官更不中用。

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和腐朽无能、投降卖国的行径，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20世纪初，在贵州境内又掀起了一次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高潮。而且，这一时期的斗争大都以武装起义为主要形式。仅1910年巡抚沈瑜庆上报清廷“聚众抢劫，抗拒官兵等案，共七十三起”^⑤，其中大都是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统治的斗争。辛亥革命前夕贵州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高潮，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种人民群众自发的斗争情绪，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斗争汇合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成熟和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潮，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⑥

二 新思想的传播

贵州经济文化落后，固然为接受先进文化带来了障碍，但它同时也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封建统治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往往把统治的重点和主要力量放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而投入到偏远落后地区的统治力量则相对薄弱。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着令各省编练新军时，在统治中心的省要求编练四镇，而贵州则明令编练一镇，且实际上时至辛亥革命，贵州也仅练成新军一标（一镇三协，一协三标，标相当于团）。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军队，贵州与发达省分的差距之大，可见其统治力量的相对薄弱。甚至朝廷还变相将贵州视为发配处置“犯上作乱”人员的不毛之地，维新大员李瑞棻变法失败后原被发配新疆，后改遣回原籍贵州便是一例。加之贵州偏僻、交通不便，从京城来的封疆大吏，骑马坐轿要近两月时间才能抵达省会贵阳。这客观上也为其统治带来了困难。

另一方面，由于天高皇帝远，封建官僚的腐败之风更盛。虽然清政府对贵州投入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但各级衙门官吏和地主豪绅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不但未有减少，反而有过之无不及，促使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这种封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和人民反抗情绪十分高涨的状况，不仅为先进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也为先进思想的接受创造了条件。因此，一旦先进思想传入后，很能得到响应。这也是贫瘠落后的贵州，之所以能步入革命先进行列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与全国各地一样，新思想的广为传播，与清政府推行新政有关。矛盾异化的作用使新政实施的结果悖离了统治者的主观愿望。1901年至1911年间，贵州共办各类新式学堂636所^⑦，其中不乏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之类，但这些学校兴办在“新政”的旗下，为装潢门面也不得不开设部分算术、格致、

地理等“新学”课程，有的学校还在教学中不同程度地宣传了反帝爱国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青年学生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的过程中，促进了世界观的改变，不少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其由封建文士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后来成了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力量。诸如陆军小学、公立通省中学、优级师范、法政学堂、乐群小学、乙巳小学和光懿女子小学等，还成了进行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大兴办学的同时，还出现了一股留学热，仅1905年，全省就有官派或自费留日学生151名。许多留学生在海外受到先进思想影响，如于德坤、平刚等人在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接触中，成了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同盟会成立后，于德坤为评议部议员、平刚为贵州分会会长）。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极大作用。贵州资产阶级政党自治学社，就是通过留日学生平刚居间介绍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可见，办学堂、兴游学，在客观上起到了培养、造就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⑥

传入贵州较早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大约在1894年前后，维新改良思想便传入贵州。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贵州有95名举人参加，他们大都成为维新思想在贵州的传播者。戊戌变法前，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以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便比较广泛地在贵州知识界传播。变法失败后，《公车上书》及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仍在贵州秘密流传。

在贵州倡导新学和传播维新思想最力的，当推贵州学政严修，于1897年在贵阳创办经世学堂；维新大员、梁启超的内兄、原礼部尚书李端棻，变法失败后赦归原籍贵阳，主讲贵州经世学堂；贵州百层河厘金局总办吴嘉瑞，1898年在贞丰组织仁学会。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开明知识分子所宣传的维新思想，在当时闭塞落后、封建势力浓厚的贵州，对启发民智、帮助人们开拓视野，树立新的世界观，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其中许多人最终接

受革命思想作了铺垫。

1900年后，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开始传入贵州。章太炎的《馘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及《民报》等宣传革命的书刊，辛亥革命前已在贵州广为传播。但是，由于贵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达，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而且其上层与封建势力关系密切，有严重的依附性，其中下层又为清廷预备立宪的骗局所惑，对封建统治者存有幻想。贵州知识分子大都受过传统的封建主义教育，封建意识浓厚，加之全国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与贵州有联姻关系，其内兄李瑞棻原为礼部尚书，也是在全国都有影响的维新大员。因此，直至1909年，维新改良思想，特别是梁启超的立宪思想，仍在贵州知识界十分盛行。仅平刚、张恣、彭述文等少数知识分子及新军中的少数先进青年放弃了维新思想，转而追求民主革命学说。

三 资产阶级政党和进步团体的出现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20世纪初年，封建经济关系及封建思想文化在贵州仍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是，历史在向近代文明过渡的进程中，依然在这里辗下了深深的轨迹。1840年鸦片战争后，贵州与各省一样，跌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至辛亥革命前夕，贵州已沦为英、法、德、日等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原料、倾销商品的市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入侵，改变了贵州历史发展的常规进程，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与发展。虽然贵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才形成，时间上比发达地区晚了四十来年，经济实力也相对薄弱，但是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它一经出现后，其代表人物，一批新兴资产阶级包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便开始活跃在贵州历史舞台。

也由于贵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较晚，力量薄弱，因此，

在政治斗争中，资产阶级保守性的一面表现得更明显。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贵州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争取立宪改良的基础上，直至1910年秋其中下层才在全国革命高潮的推动和自身斗争的实践中，开始放弃改良立宪思想，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贵州最早的革命团体是张恣、平刚、彭述文等人发起组织的科学会（其成立时间目前未见直接资料记载，据间接资料估计，当在1904年至1905年初）。“其目的有二，一修学，一革命也。”

“将藉研究科学，广集同志”宣传革命^⑩。1905年5月平刚因写讽刺慈禧的对联被官府责打手心后，愤走日本，并与在日本的其他科学会成员漆运钧、胡肇安等加入了同盟会，成为贵州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其余同志在省内坚持宣传与组织革命。1906年12月，得平刚等留日同志的支持，科学会决定发起武装起义，以响应萍浏醴起义。不幸两次策划都因走漏消息而未果。为避清政府追捕，张恣出逃四川，其余骨干“或走保定，或留湖北，皆以隐身军界为韬光之计，贵州激烈派之革命，至是遂寂然声销矣”。此后，1908年贵州陆军小学进步学生席正铭等组织的历史研究会，名为研究历史，实际是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革命团体。但是，无论科学会或历史研究会，其联系面都仅限于省垣的部分学生和新军中的先进分子，无力对全省革命产生较大影响，更未形成一个领导中心。

组织和发动贵州辛亥革命的是贵州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自治学社。但它成立时只是一个主张改良立宪的爱国团体。1907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更加暴露了其瓜分中国的野心。10月22日，周素园主办的《黔报》上刊出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警告一则，引起了贵州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其时，自少年时代即受进步思想影响的法政学堂学生张百麟（字石麒），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就商于同志，决定成立组织，即公开发表《瓜分警告之警告》和《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以征集同志组织社团，合力救亡。于1907年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相馆汇集同志三十余人，决定

成立一爱国团体，并以“自治学社”名称获准在官方立案。至此，自治学社宣告成立，第一批社员三十三人，推张鸿藻和张百麟共同负责社务。因张百麟自认为原籍长沙，既非黔籍人，不便号召，因辞不就社长职，后推钟昌祚为社长。实际上张百麟始终是公认的领袖和各项活动的实际组织策划人。^⑩

自治学社成立后所宣布的纲领和其早期活动，都未超出改良立宪的圈子，其社章中就明确提出：“本社以预备立宪，催促立宪为宗旨”，“认定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为希望立宪之方法。”这与清廷为缓和矛盾所宣布的预备立宪的内容和步骤都是一致的。其早期的活动主要是兴办学堂、发行报刊、争夺议席和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其中又特别重视培养法政人才和进行法律知识方面的宣传。这些活动，都是严格按照其“预备立宪，催促立宪”的宗旨来进行的，实际上是在履行梁启超的“新民”说和“秩序革命”观。

自治学社在组织发展上采取了“宽以求众”的方针，确定“本党支柱平民，解除一切制限”，不分阶级、男女、种族、宗教，只要赞成自治主义者均可吸收加入。同时，又以反帝爱国和资产阶级民主相号召，还有清政府立案批准的合法外衣，所以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中下层资产阶级和一般市民的拥护和积极参加，社务发展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全省府、厅、州、县共六十四各单位中，就有四十七处建立了自治学社分社，社员达一万四千多人。三年后即增至十万之众，成为贵州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

1908年，经彭述文的介绍，张百麟写信给在日本的平刚，要求“加入东京同盟会，作为贵州分会”，经在日本的同盟会贵州支部研究决定，“共认自治社为同盟会同志，而与之通消息”，并赠送《民报》十余册^⑪。自治学社在组织关系上与同盟会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但是，在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自治学社并未接受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仍在追求和平改良、预备立宪的幻想。

自治学社的活动虽然未超出改良立宪的范围，但是，作为资

产阶级中下层力量的发展，却触动了一批立宪派上层人士的利益。当时在贵州有一部分接受维新思想的地方绅士和与封建主义关系紧密的资产阶级上层，他们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在参与新政的活动中得到了一些实利，控制了贵州商界和文化教育界。其代表人物有官僚出身的唐尔镛、任可澄（两人均为清末举人、内阁中书），以及贵州头号企业主华之鸿。自治学社的发展，尤其是自治学社办学堂、开报馆，打破了他们长期垄断教育、操纵舆论的一统天下；自治学社在地方影响的扩大和在议院选举中的得利，更是他们所不容忍的。于是，他们勾结官府，千方百计压制、迫害自治学社，并于1909年成立了宪政预备会，试图以政党形式与自治学社抗衡。

宪政预备会的成立，标志着贵州立宪派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并开始了贵州历史上的两党之争。他们从争夺教育经费、校址开始，到操纵宣传舆论和各种民意机构的选举，以及对对方头面人物进行攻击。从形式上看大有水火不容之势，但实质上也只是两党在预备立宪范围内的争权夺利，并没有绝对不相容的政治立场。贵州辛亥革命后的代都督赵德全在1912年1月致黎元洪的电文中也认为“两党皆以催促宪政进行为宗旨，但自治主急进，宪政主渐进；而尤有异者，宪政多贵绅，自治多寒士”。^⑩这与当时的实际是相符合的。在自治学社未转化为革命派之前，自、宪两党的斗争，实际上只是以自治学社为代表的立宪派左翼与以宪政派为代表的立宪派右翼，为了争夺预备立宪头功的权利之争。

四 自治学社的革命化与革命前的准备

1910年秋，平刚根据孙中山“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以壮声势”的指示，回到贵州“即与张百麟商量整顿贵州革命力量，预备起事”，^⑪标志着自治学社开始转向革命，其以后的行动已成为同盟会领导的全国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自治学社的革命化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首先它毕竟是个爱国团体，成员又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代表着贵州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其初期受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严重，因而思想及活动水平局限于走立宪道路，但清末各种社会矛盾运动，必将推动一切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走向革命道路。具体说，促使自治学社革命化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第一，自治学社在组织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了反清革命力量。首先是自治学社加入同盟会后，虽然是一种松散的组织联系，但同盟会的革命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在自治学社内部产生了积极影响。黄泽霖读过同盟会寄来的《民报》后，即“请开秘密会议于百麟住宅，提议准备革命事件，遂决计采急进主义”^④。其次，1908年根据平刚的建议，张恣等原科学会成员加入了自治学社，他们有武装反清的情绪和经验，对推动自治学社走上武装革命道路起了重大作用。再次，大批哥老会成员参加自治学社，也是推动其走上武装反清道路的重要因素。哥老会是清末民间的秘密反清组织，在贵州分布较广，影响较大。哥老会的组织形式“公口”几乎遍及全省各县，自治学社主要负责人张百麟早年即与哥老会有联系，他结识的许多哥老会成员，大多成了自治学社骨干。在自治学社第一次印发的250余社员名单中，就有不少是哥老会成员，他们吃苦耐劳“分赴各县联络、组织分社的人，大部分是由有关哥老会成员的社员去进行的，并且多以当地的哥老会成员为主要对象”^⑤。数以万计的哥老会成员加入了自治学社，奠定了自治学社武装反清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第二，自治学社在争取立宪的实践中，逐步认清了清政府虚伪的嘴脸和腐败的本质。自治学社成立伊始，即努力于促进立宪与开展“爱国救亡”旗号下的各项活动，寄希望于与清政府“协同救亡”。1908年至191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由立宪派掀起的请开国会的高潮，自治学社都积极响应，三次全国性的请愿活动，自治学社都派出代表全力以赴。其结果得到的只是清政府迫于各方

面压力而提出一个基本上由皇室成员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至此，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无遗，自治学社期望和平改良的幻想彻底破灭。其间，1910年自治学社凭着爱国救亡的热情，积极响应天津商会提出的筹还甲午、庚子赔款的号召，提出在全省筹办国民捐的意见，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但此举却被宪政派攻击为篡夺贵州财权和兵权，从而遭到了清政府的冷遇，无疑对自治学社是个打击。加之1911年对自治学社态度温和的贵州巡抚庞鸿书，由于宪政派的暗中活动，被迫离开贵州，新任巡抚沈瑜庆上台后，更加靠拢宪政派，排斥自治学社。同时加紧与帝国主义勾结，提出借四国外债修筑贵渝铁路，逼迫咨议局通过，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自治学社深感与这样的政府协力救亡已不可能，从而放弃了与清政府合作的幻想。

第三，立宪派上层的排斥、攻击是促使自治学社革命化的重要因素。贵州立宪派的上层主要是宪政派，他们与全国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有较多联系，自认为是正宗的立宪派。出于门阀观念和资产阶级上层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排斥打击，竭力削弱自治学社的力量，甚至多次密告自治学社为革命党，鼓动清政府捕杀其主要负责人。这些行为使自治学社感到在立宪派内部显得孤立无助，开始向外寻求依靠的力量。于是在省外主动向同盟会靠拢，在省内把组织发展对象主要放在基层群众中。

第四，受辛亥革命前夕蓬勃高涨的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首义的爆发，更直接促使了自治学社将武装起义的准备变为行动。

自治学社实现了由立宪派向革命派的转化后，即开始着手革命的准备工作的。第一，组织发动会党，使之成为自治学社的革命武装力量。于辛亥春、秋先后两次由张百麟召集已参加自治学社的哥老会重要成员，研究部署训练武装力量，组织会党军，策应武装起义的计划。第二，加强新军、陆军小学、巡抚卫队、巡防队等贵州武装力量的动员、争取工作，确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

务。对各路武装力量都指派专人作动员争取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不仅壮大了革命力量，也减少了革命阻力。第三，派遣社员分赴省内外进行联络，了解情况。在省内遣派社员各回本县策动起义，同时派遣社员到北京、长沙乃至到东京与同盟会总部等各方面进行联系，使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及清政府的动态，能及时掌握。第四，为适应准备武装起义的需要，在自治学社内部作了必要的组织调整。1911年9月，成立了以张百麟为首的总揽起义计划的十人委员会，作为准备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由张百麟、黄泽霖、谭璟、张泽锦、陈守廉、陈康、廖谦、王炳奎、周凤文、胡刚组成。下设三个委员会：一是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军事行动，张百麟为委员长；二是民政委员会，负责准备建制、规划等方案，周素园为委员长；三是交涉委员会，负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谭西庚为委员长。

自治学社由立宪派转化为革命派的时间虽然比较迟，但在辛亥革命前夕毕竟还是实现了这一飞跃性的转变，并通过一年来的革命准备，使之终于具备了领导贵州人民进行民主革命资格，为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五 起义经过及贵州军政府的建立

通过自治学社的组织、动员工作，革命条件日益成熟。自治学社曾打算在10月6日发动起义，但因子弹购储未完成，遂打消计划。后又拟于10月22日趁巡抚沈瑜庆到南厂检阅新军时，枪杀沈瑜庆发动起义，又因沈瑜庆心存戒备，先令收去新军枪弹后，才前往检阅，起义计划又告落空。适值湖南独立，消息传来，贵州人心更为震动。为解决子弹问题，自治学社多方筹划，终于通过贿赂大兴寺弹药库守官，得枪54支、子弹17箱，即分送新军与陆军小学。

10月30日，云南起义的消息传到贵州，贵州革命情势更加高

涨。巡抚沈瑜庆令各司道加紧防范，宪政派任可澄乘机献策，建议沈瑜庆速电召兴义原巡防营管带刘显世募徒手兵一营，兼程赴省，予以武器装备，以镇压革命力量。同时嗾使巡抚下令捕杀自治学社负责人张百麟等八人，以弭祸于未然。沈瑜庆召刘显世进省的电报刚发出，电报员即将电文密报张百麟。为打乱清政府当局镇压革命的部署，自治学社派黄德铤以省咨议局代表身分游说沈瑜庆，略谓：当前局势只是两党之争，当局不可过激处理，恐激出变端。沈瑜庆将信将疑，未敢贸然下令捕杀自治党人。

11月1日，自治学社为减少革命阻力，宪政预备会见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于是采纳中间派开明人士蔡岳建议，自宪两党达成妥协，共谋贵州独立。自宪两党妥协的成立，一方面为自治学社领导贵州辛亥革命减轻了压力，减少了障碍，但同时也为宪政派钻入革命阵营，并在革命后勾结滇军军阀唐继尧颠覆革命政权留下了隐患。

11月2日，蔡岳邀张百麟、任可澄等往见沈瑜庆，陈述贵州和平独立意见，沈不从。席间张百麟发现任可澄与沈瑜庆有某种默契，感到事态发展不妙。第二天（11月3日），沈瑜庆纳绅耆郭重光所谓自保之策，即：既不保清，又不革命，只图自保，可采取半独立形式，拟由郭重光在11月4日假咨议局宣布自保办法。并授意郭重光组织自保武装。所谓自保之策，实则企图延缓革命爆发之计，待刘显世兵进贵阳和郭重光自保武装成立，即捕杀自治党人，扼杀革命。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等深感形势严峻，起义时机刻不容缓，乃毅然决策：于11月4日咨议局开会宣布自保办法时，兵劫沈瑜庆，转移政权。

起义决定迅速传达给各革命武装力量。当天（11月3日）晚上，陆小学生因不慎泄露起义机密，校方察觉后密报沈瑜庆。陆小学生为对付当局弹压，乃首揭义旗。新军奋起响应，推举教官（副标统）杨苾诚为指挥，整队出发，部署战斗。沈瑜庆闻陆小师生和新军起义消息，即令全城戒严，并派巡防营中路分统胡锦

棠带队包围监视陆小。旋即巡抚卫队、巡防营等也纷纷响应起义，沈瑜庆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不得不手书承认贵州独立，交出政权。

11月4日，大汉贵州军政府宣告成立。

贵州军政府采取联立内阁制，由各党派、团体派代表参加。11月4日，各方面代表一致推举张百麟为都督，张以自己不懂军事为由固辞不就。5日各方面代表改推杨苾诚为都督。6日，通过贵州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确定各部门人选，组成贵州军政府。贵州军政府由都督府、行政厅、枢密院三部分组成。都督府专管军事，都督杨苾诚，副都督赵德全，下设参议厅和参谋、副官两处，军政、执法两部；枢密院赞划军事、指导民政，以张百麟为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暂设枢密员七人，下设秘书厅和军政、财政、学务、实业、交通、民政六股；行政厅主办民政，以周素园为总理，下设民政、财政、学务、实业、交通五科。同时，改咨议局为立法院，谭西庚、朱焯为正副院长；以会党力量为基础设巡防军，黄泽霖为总统，下辖东、南、西、北、中五路分统。

贵州军政府建立后，即组织在贵阳的各府厅州县同乡联合会，各举代表一人，由军政府委派回籍策动反正。不过一月全省均告光复。

虽然贵州军政府在贵州历史上只存在了短短的三个月，便被宪政派和地方官绅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所颠覆。但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实施，它为今后贵州历史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贵州独立后，使全国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又发生了一次有利于革命阵营的变化，它对全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对清政府是又一次沉重打击。贵州地处西南中枢，它的独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势力从湘到滇连成了一片，对以后广西和四川的独立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也是贵州各族人民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大贡献。

-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第113、114页。
- ② 《贵州通志·前事志》四十三,第6页。
- ③ 《贵州通志·前事志》四十二,第20页。
- ④ 周春元等主编《贵州近代史》,第105页。
- ⑤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日贵州巡抚沈瑜庆折》
- ⑥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5页。
- ⑦ 周春元等主编《贵州近代史》第92页。
- ⑧ 冯祖貽、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第34页。
- ⑨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3页。
- ⑩⑪ 《于德坤》《革命人物志》第一集,台北版。
- ⑫ 《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4页。
- ⑬ 平刚《贵州光复史事》,载《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 ⑭ 张百麟《黄泽霖传》,载《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
- ⑮ 胡寿山《自治学社与哥老会》,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472页。

辛亥上海光复纪略

沈渭滨 杨柳青 杨勇刚

上海是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的国内中心。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后，上海又成为东南地区革命形势的重心所在。上海的辛亥革命，不仅对于全国革命高潮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南北议和及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 辛亥前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活动

20世纪初年上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并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是与上海数十年来迅速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开埠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列强蜂拥而入，他们在上海强行开辟了数倍于上海旧城面积的租界地，设置了具有充分行政权及部分立法权的工部局、公董局，具有议会性质的“租地人会议”（后改称“纳税西人会”）和武装巡捕、领事法庭等殖民统治机构，并迫使清政府默认了他们对租界地的行政、立法、司法及税收等大权，把上海迅速变为半殖民地城市。与此同时，上海凭借其特殊的政治和地理位置，对外贸易、航运业、工商业、金融业及市内交通、通讯设施迅速发展，新式学校、西学书籍、近代报刊等纷然杂陈，逐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杨柳青，上海市化工局党校教师。

杨勇刚，上海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讲师。

步成为近代中国多功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较为典型的近代化城市。上海社会的迅速半殖民地化，使得近代中国两大矛盾在上海的表现尤为集中和尖锐，民族资本的较快发展孕育了一代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地位的资产阶级，近代文化事业的兴起和西学的传播，造就了大批近代知识分子，这一切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上海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活动由来已久。如果说1902年4月中国教育会的成立，是上海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端，那么1903年7月“苏报案”的发生，则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活动风起云涌，而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对上海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在日益高涨的群众斗争开始有所规划和领导，为民主革命大风暴的到来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1894年11月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主要在南中国一隅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由于1895年10月策动的广州起义未发而先败，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国外，加上甲午战败之后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运动高涨，因此革命党人在国内的影响未能迅速扩大开来，甚至“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指革命党人——引者)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①。直至1900年10月革命派发动广东惠州起义之后，由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国人对清政府从失望到憎恶，才开始注意革命党人的活动，“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指革命党人——引者)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民主革命活动开始发生和发展起来。

最初在上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是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在上海倡议成立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抗议校方压迫学生掀起退学风潮，兼任该校教习的蔡元培同情学生，亦愤而辞职。为帮助退学学生继续就读，团聚进步青年，中国教育会于11月21日决议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任

学监，聘请蒋维乔、叶瀚、吴敬恒、黄宗仰、章太炎等人为义务教员。加入爱国学社的不仅有南洋公学退学生，还有其他地方因闹学潮而退学的进步青年。爱国学社教员讲学“多述明清兴废之事”，他们每月还要在张园举行一次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⑤。次年初，爱国学社又争取上海《苏报》倾向革命，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按日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使之成为反清革命的舆论阵地。

1903年4月上海再度掀起拒俄高潮。先是1901年3月上海绅商各界为反对沙俄企图永远霸占我东北地区，曾两次集会张园，要求清廷力拒俄约，以保危局，由此推进了全国规模的拒俄运动，迫使沙俄与中国代表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意在一年半时间内分三期从东北撤军。但是，直至1903年4月沙俄不仅未从我国东北撤军，反而增兵安东，重占营口，并再次提出侵权要求。4月27日、30日，上海各界人士千余人又两次集会张园。爱国学社革命党人积极介入。蔡元培等在会上发表演说，并倡议设立国民公会。正当集会演说进入高潮之际，闻讯留日中国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爱国学社立即筹组上海拒俄义勇队，不久又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入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等近百人。是时，留日青年革命家邹容回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其《革命军》一书于5月底在上海刊行。6月，《苏报》相继刊登章士钊的《读〈革命军〉》、张继的《祝北京大学堂学生》、柳亚子等人的《驳〈革命驳议〉》、章太炎的《〈革命军〉序》等反清革命文论。与此同时，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在上海发表，黄兴由日本东京抵上海作短暂停留。一时间，上海革命党人风云际会，反清思潮汹涌澎湃。

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早在爱国学社师生集会拒俄之时，清统治者即密谋予以镇压。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燾电告外务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邪说，已飭查禁密拿。”次日，清廷下令“严密查拿，随时

惩办”^④。经上海道袁树勋与租界当局交涉，6月30日，中西警探巡捕闯入爱国学社，逮捕了章太炎。7月1日，邹容应章太炎之召，自动到巡捕房投案。7月7日，《苏报》馆和爱国学社被查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但是，中外反动势力的高压并不能遏制革命思潮的发展，相反却刺激了上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的进一步高涨。8月，又一份宣传反清民主革命的新报《国民日报》在上海创刊，次年《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革命报刊相继问世。1904年11月，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组织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参加者有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赵声、吴春阳、黄炎培、秋瑾、刘师培、李燮和等著名革命党人。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入会誓词，是一个比爱国学社更为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不久，黄兴又抵上海，于10月27日亲自主盟，吸收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并成立同盟会上海分会，委任蔡元培为会长，设秘密机构于吴淞中国公学及老西门宁康里健行公学。从此，上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盟会上海分会成立以后，原光复会的部分成员仍以光复会的名义从事暗杀活动和联络浙皖等地会党、新军筹划暴动，其他革命党人则在上海主要从事反清革命舆论宣传和争取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活动。

从1905年到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十多种报刊，主要有：《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这些报刊以不同的风格，去适应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力求民主革命的思想普及一般市民，深入上海人心。其中尤以《民立报》的影响为大。《民立报》是在《民吁日报》被迫停刊后于1910年10月创办的，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太炎等先后担任主笔，主要撰稿人还

有叶楚伦、张季鸾、陈其美等。《民立报》公开倡言民族主义，鼓吹革命精神，热情支持各地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运动，以其言词激烈，高昂直露，深受读者欢迎。《民立报》日发行量最多时达二万余份，成为当时国内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报刊之一。

在争取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方面，革命党人特别注意做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如沈缙云、叶惠钧、王一亭、李平书等人的工作。其中沈缙云是上海信成银行经理，在拒俄运动期间，他与部分绅商“愤国势之不振，学问之欠缺”，又“鉴于国民躯体羸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诟，欲图强国必先强种”，倡议上海南市商业体操自治会，鼓吹尚武精神，1907年又担任上海南北市商会董事和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后改为自治公所）议董，积极从事上海地方自治活动，在上海士绅和资本家中有较高的威望。他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一度资助过《民呼日报》等报刊的发行。1910年10月，沈缙云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代表进京参加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遭拒绝后极为悲愤，深叹“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人事已尽，请自此辞”^⑥，即束装返沪。后在右任等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叶、王二人均为上海自治公所议董，在革命党人陈其美影响下，于1911年初正式加入同盟会。此外，革命党人还对社会其他阶层群众进行了组织动员工作，在1911年2月组织成立了由青年学生、下层警官为主体的“中国敢死团”，6月又发起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以联合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各界团体。

随着上海及长江流域反清革命活动的高涨，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当时，宋教仁、居正、谭人凤、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人物也不满于孙中山等全力经营广东的方针，他们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主张“早自为计”。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等便提出了成立一个专主长江流域革命的机关。7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同盟会分会长会议上，宋教仁又提议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提出“发难宜中，不宜偏

僻，战期宜短，不宜延长，战区宜小，不宜扩大”的策略方针^⑥，得到与会者谭人凤、赵声、居正等的赞同。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三十三人，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以及《总务会暂时章程》、《分会章程》，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为总务会干事，分执庶务、财务、文书、交通、会计五部，并以史家麟、吕志伊、范鸿仙、谭毅君为各部候补人（其中史家麟兼庶务、会计两部）。8月2日再次会议，公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以《民立报》为机关报。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表示：“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无可冲突也。”^⑦《中部总会章程》规定：“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设在上海，以便于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对同盟会总部是一种独立的行动，但在客观上有利于上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力量的加强，也有助于推动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从此，大江南北、东西各省反清革命交相呼应，互为奥援。

二 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的成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消息传至上海，宋教仁立即电邀黄兴速来上海，共商响应之事。10月12日，陈其美在杭州召集革命党人会议，谋划上海及苏浙起义。同时，中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及时大量报道有关武昌及各地革命的消息，上海群情振奋。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席卷上海。

武昌起义后，中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把精力集中在领导督促各地革命党人起兵响应、支援武昌方面，上海起义之事则由陈其美与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等具体筹划。

10月17日，李燮和举行会议，认为上海起义不得苏杭响应，

事终不成，决定分途进取，由王文庆往杭州，章梓赴江宁，柳承烈、张通典去苏州，李燮和与尹锐志等则在上海招募敢死队，组织光复军，争取驻沪清军与警察。会后各自分头行动。当时，驻扎在吴淞、上海的清军警中有不少军官是湖南籍人。李燮和便通过同乡关系进行秘密联络活动。他先争取了吴淞巡官黄汉湘，接着由黄汉湘介绍与闸北巡逻队官陈汉钦接触，再由陈汉钦牵线与驻沪巡防营管带章豹文、巡防水师营管带王建雄以及江南制造局附近炮兵营哨官成贵富等人建立了联系。此外，李燮和还与上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吴淞警务区长杨承溥等相会，争取他们支持革命。这样，李燮和将上海及其附近的清军警串通起来，基本控制了淞沪军警，“静待后命以应起义”^⑧。

10月24日，陈其美与沈缙云、范鸿仙、叶惠钧和即将赴武昌的宋教仁等在《民立报》馆会议，具体讨论上海行动计划。“决议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⑨，决定由沈缙云、叶惠钧、王一亭去争取上海自治公所总董、上海商团最主要领导人李平书。

上海商团是上海资产阶级政治性武装团体。1907年5月，时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领袖总董李平书等为维持地方秩序，经请上海地方当局允准，将上海沪学会体育部、商余学会、商业体操会、商学补习会、沪西士商体操会等组成临时商团（后定名为南市商团公会），由李平书任会长。不久，上海各行业商团纷纷成立。1911年4月，由上海南北商团公会发起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由李平书任会长，沈缙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虽然全国商团联合会并未真正组成，但上海各区、各行业商团从此联合起来，成为上海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武昌起义后，上海商团领导人颇为犹豫，一方面力图急起响应，不守闭关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因大局未定，仍想审察情势以为进止。沈缙云等接受陈其美指令后，即向李平书试探，并晓以大义，敦促其共谋上海光复要事。10月29日，经沈缙云介绍，李平书在成都路贞吉里寓所与陈其美相

见，他陈述了商团及自治公所的保民宗旨，并表示“彼此随时协商，互相尊重主义”^⑩。李平书的倾向革命，带动了自治公所前任议长沈恩孚、时任议长吴馨及中区商团团长莫锡纶、自治公所议员王引才、警务长穆杼斋等，使得上海自治公所、上海商团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由立宪转向了革命，商团成了上海辛亥革命中反清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日，陈其美与李平书、吴馨、叶惠钧及刚从欧洲抵沪的钮永建等人集议，确定了“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行动方案。同日，上海商团集于沪南九亩地，举李平书族侄、革命党人李英石为临时总司令。

经过半个月的发动联络工作，革命武装组织就绪。11月2日，陈其美、李燮和会于《民声丛报》馆，决定11月3日午后4时，分闸北与上海县城同时发难，得手后再攻取吴淞；闸北方面以反正的巡警为主力，由陈汉钦任总指挥，商团接管沪宁车站，以防清军南下；县城内由商团保卫地方治安，并派队接管清道、县两署；最后集中力量攻打江南制造局。会后，陈其美、李燮和即分头进行部署。

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先是中午时分，闸北方面由于负责传达起义指令的陈汉钦被警方察觉，并与侦探队队官汪景龙发生争执，汪发枪击陈不中，局中警士大哗。适遇隔壁民房不慎失火，巡警局长姚捷勋误以为革命党已发动起义，仓皇逃走。陈汉钦乘势集合警士，提前起事。巡警、商团均臂缠白布，出队巡逻，各军营地也都易帜反清，闸北地区未经战斗即被起义军（统称民军）占领。随后，闸北商团速派队伍接管沪宁车站，掌握了上海与外界联络的重要陆上通道。

上海县城方面，11月3日上午陈其美、李平书、沈缙云等在斜桥西园召开会议，决定下午4时在九亩地举行誓师大会，宣布反清独立。会后，商团受命分段出防，维持地方治安。此时闸北起义胜利消息传出，上海道刘燕翼、上海知县田宝荣逃出县城，避入租界，其他清文武官员也纷纷出走，城内军警则转向革命。

起义军未遇抵抗，即占领城厢。

就在上海县城发难的同时，陈其美自率敢死队员二百余人，从南市出发，进攻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位于南门外高昌庙，占地数百亩，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厂之一，有清重兵把守。下午5时，敢死队乘制造局放工之际，冲入局内。驻守清军拚死抵御，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员被打死一人，打伤二人，后面队员遂欲撤退，顿时阵势大乱。慌乱中，正在指挥的陈其美被局中守军俘执，首攻制造局失利。李平书闻讯后即赶到高昌庙，企图以自治公所、县商会名义作保，要求释放陈其美，但被拒绝。李平书回自治公所后，即与王一亭等协商。王一亭表示“进或亦死，退则必死”，与其引颈待戮，不如为国殉身，若此事成功，“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⑩。李平书得众人支持，随发令再攻制造局。李燮和得知陈其美被俘，即召陈汉钦，令诸营民军会师以援。11月4日凌晨，李燮和率巡防营、沪军营、闸北警士、水师营会同商团及敢死队，发起了二打制造局的战斗。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激战，民军终于攻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清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乘小火轮逃往租界。至此，上海完全光复。到11月7日，上海周边宝山、松江、青浦、崇明、嘉定、南汇、奉贤及川沙等县厅也相继宣告反清独立。

上海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即按照同盟会方略，筹组革命政权。还在起义过程中，陈其美等人曾以“上海军政分府”的名义发布宣言和告示，并委任李平书为民政总长。11月6日下午2时，上海各界代表近六十人在县城原海防厅署集会，筹组军政分府，推选都督，会议由李平书主持。会上有人提议，上海为交通大埠，仅有军政分府不够，应另行举一沪军都督，招集大队雄军北进，以定国是，并为我东南门户之备。与会者表示赞同，陈其美即提出预先拟就的都督府人选名单，以陈其美为沪军都督，李燮和、陈汉钦、钮永建、章梓、李英石、叶惠钧、黄郛、俞凤韶、杨兆崧、沈翔云为参谋。11月7日下午，沪军都督府正式成

立。沪军都督府直辖司令、参谋、军务三部，受都督之指挥、命令，执行主管事务。另设外交、民政、财政、交通、海军五部，但不由都督府直辖，部长也不由都督任命。沪军都督府都督及各部正副部长名单如下^②：

都督：陈其美

司令部 部长：陈其美 副长：盛典型

参谋部 部长：黄 郛 副长：刘基炎

军务部 部长：钮永建 副长：李英石

外交总长：伍廷芳

民政部长：李平书

财政部长：沈缙云

交通部长：王一亭

海军部长：毛仲芳

以上沪军都督府主要领导人中，除伍廷芳为社会名流，毛仲芳为清海军起义将领，盛典型身份待查外，其余八人均均为革命党人。这表明，沪军都督府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革命政权。

三 辛亥上海光复的意义

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的成立，是上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长期坚持斗争的结果，也是武昌起义和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各省起义推动的结果。同时，它又对首义地区的安定和其他省区特别是苏浙两省的反清斗争，起到了促进作用。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武昌起义后，“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③。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的成立，成为辛亥革命的转折点，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光复，促成了苏浙独立和加快了攻占南京的进程，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革命区域。

上海是江苏大埠，扼长江入海口。江苏进出口货物全靠上

海集散，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全以上海为中心，所以“淞沪光复，而江苏震惊，人心思汉，土崩势成”^④。11月4日上海光复后，李平书率民军五十余人连夜北上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独立，程不得不俯首应命。次日，江苏即宣布脱离清廷。浙江素与江苏休戚相关。11月3日陈其美即派蒋介石、陈泉卿等人率数十人南下杭州。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光复会成员尹维俊(女)、张伯岐也于4日率敢死队到杭州协助起义。11月5日，杭州光复。南京地处大江之滨，气吞三河，势控两江，夺取南京一直是中部同盟会着意经营之所在。11月中旬，沪军都督陈其美电请江浙都督与沪军共组联军，会攻南京。12月2日，南京为联军攻占。

苏浙光复，南京攻克，江浙革命区域的出现，使得已经独立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与下游连成一片，不仅大大减轻了清军对武昌地区的压力，而且造成了长江流域的强大革命形势，底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大局，使清政府东南半壁尽失，迅速走向覆灭。

第二，上海光复，切断了清军的军火补给来源和南北交通，迫使清海军反正，从而在军事上直接支援了武昌起义，为各省迅速光复创造了条件。

清军的军火来源，除直接购自西方列强外，在国内主要靠汉阳枪炮厂与上海江南制造局，其中尤以江南制造局为最大的军火工业。武昌起义后，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军控制，上海光复，江南制造局又为革命军占领。由此，清军军火补给被切断。清政府的陆上运输，主要靠京汉、粤汉及沪宁、沪杭铁路大动脉。武昌起义后，京汉、粤汉两线交通中断，上海光复，又使沪宁、沪杭两线切断。清政府南北陆上交通的彻底阻断，使北方经济几陷瘫痪。

武昌起义后，清海军由萨镇冰统长江舰队赴汉口，其中一部分军舰留泊上海，以为策应。上海光复后，李燮和曾亲登泊驻吴淞的清舰艇，促成策电、建安、钧和、楚有、登瀛洲、辰宇、湖鹗各号舰艇反清起义，使得萨镇冰舰队首尾难顾，加上舰队官兵

同情革命，最后在九江宣布反正。清海军的倒戈，对清军是一大打击，而“自海军来归，革军声势遂一大振”^⑤。

第三，上海光复，使以张謇为首的江浙立宪派加速了倒向革命的步伐，清政府在政治上进一步陷于孤立，从而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

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争取立宪的运动中，成立于上海的以江浙人士为主的预备立宪公会，是最有号召力的一个立宪团体，它曾促成和参与了1910年1月、6月、10月三次全国性的赴京国会请愿活动。其首脑人物张謇，在武昌起义后还到南京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派兵赴武汉镇压革命；又到苏州代程德全起草奏疏，吁请清廷速开国会。上海光复大局已定，张謇认识到：“夙昔所主张，亦无容喙之地，其必趋于共和者，盖势使然矣”^⑥，表示拥护共和革命，并致电袁世凯，规劝他及其他清廷将领归顺革命。

第四，上海光复，使革命领导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为南北议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武昌起义前夕，武汉革命党领导机构已被破坏，起义胜利后，又无足资号召的人物，因此武昌难以保持革命重心的地位。上海则是同盟会中部总会所在地，在武昌起义前就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国内中心。上海又是华洋巨埠，既有广阔的租界可以利用，又有江浙财富之区为之拱卫。上海在中外关系方面，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西方列强宣布对辛亥革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不少革命党人把上海看作是谋求列强外交支持的最有利地区。因此，当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武昌召开不久，便转移上海继续开会。后来的南北议和也在上海进行。革命领导中心逐步移向上海。

正在美国的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途经伦敦、巴黎回国，于12月21日抵香港。当时，广东都督胡汉民建议孙中山留在广东活动，孙中山则坚持前往上海、南京，他认为：“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

难就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⑩。随即与胡汉民等直驶上海。12月25日晨，上海十六铺码头欢迎人群云集，陈其美派“建威”号兵舰到吴淞口迎接，并与黄兴及各省代表亲往码头等候孙中山的到来。当孙中山乘坐的轮船靠近码头时，岸上人群一片欢腾。次日，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等在哈同花园宴请孙中山。席间，大家认为只有孙中山堪当民国大总统之位，对孙表示了无限敬仰。当晚，孙中山在寓所召集同盟会领导人专门讨论组织民国政权事宜，陈其美等支持孙中山采用总统制的主张。12月29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北上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宣告诞生。

①② 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9页。

③ 《南洋公学的一九〇二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73页。

④ 《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408页。

⑤ 《沈绶云先生年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2页。

⑥ 徐血儿《宋教仁先生传略》，《宋渔父》，第一集，前编第2页。

⑦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页。

⑧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七册，第42页。

⑨ 沈焕唐《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48页。

⑩ 《通敏先生行状》，参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论文集》上册，第822页。

⑪ 伍特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51页。

⑫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07—309页。

⑬ 《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第208页。

⑭ 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七册，第47页。

⑮ 张恂伯《辛亥海军举义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七册，第475页。

⑯ 《九月二十三日拟会程德全囑杨廷栋进说袁世凯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92页。

⑰ 《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9页。

辛亥风云浙江潮

胡国枢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它如狂飙巨风席卷中华大地，荡涤了二千余年封建帝制，为古老中国的新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风云际会，人事机遇，使越国古地素有“文物之邦”美称的浙江，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地区。辛亥革命在浙江蓬勃兴起，犹如八月钱江大潮，拔山倒海，汹涌澎湃，势不可阻。它以自身历史的逻辑的无穷力量，弹奏出了一曲壮美的爱国主义颂歌，给人启示，令人振奋！

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蕴蓄着无限生机。深厚的文化沉积，人民反对外力压迫、侵略的光荣传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出现，几千所“新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办，西学东渐带来的近代世界文明……从四面八方汇集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一代新人在成长，一幅新的历史画卷在展开。如果说，辛亥革命从总体上没能普遍地动员人民群众，那么，相对地说，浙江却是“唤起民众”比较广泛的省分。

辛亥革命运动在浙江，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互相密切联系的阶段，或者说是三个互相紧密衔接的层次，构织出一幅绚丽多姿的革命画图。

第一阶段 学界之觉醒与光复会的 建立(1900—1904)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浙江出现了办学高潮。十年间，全省

胡国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创办了各类新学2165所，其中小学1890所，还有中学、师范、职业学校^①。本省最早的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堂也于1901年10月，在求是书院基础上建立。清王朝“新政”创办学堂的初衷是培养为它服务的人，维护封建统治，“立学宗旨无论何种学堂，均以忠孝为本”^②，然而，文化教育的发展，启迪了民智，为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学校成了维新改良、反清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浙江又地处沿海，历史上对外交往频繁，近代宁波、温州、杭州更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与门户。由于民气开通，浙江是本世纪初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多的省分之一，1902年到1903年之间，浙江在日本留学生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湖北、湖南，高出广东五成，比四川多一倍^③。1903年3月，在东京的浙江留学生已达到130人^④，成为东京日益高涨的留学生爱国运动的一支劲旅。内外有利条件，使这一时期浙江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松动气象，在杭州、绍兴、金华等地，办起了《觉民报》、《浙江五日报》、《绍兴白话报》、《著作林月报》、《艺林新报》、《萃新报》等报刊，它们以鼓吹新思想、批评旧习俗为己任。1903年，东京的浙江留学生办的《浙江潮》，更是同类刊物中的佼佼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学界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经过曲折而痛苦的途径，完成了从崇拜康梁的维新改良思想向反清革命思想的转变。如余杭章太炎早在1899年，已与受保皇主义羁绊的“中国议会”断绝关系，“宣言脱社，割辫与绝”^⑤。他写的《解辫说》是一份选择革命之路的宣言书，接着他又在《客帝匡谬》一文中，检讨自己保皇改良主义的错误。与此同时，1901年杭州求是书院国文教习孙翼中，以《罪辫文》为题启示学生，这时的青年学生“已多印有民族革命思想，对此课题正好发挥”，因而发生了学生作文本上将“本朝”字样改为“贼清”的事件，几乎引起轩然大波^⑥。1902年4月15日，江浙教育界进步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翰林出身的绍兴人蔡元培担任会长。这个团体的宗旨是“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

之基础为目的”^⑦。它“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⑧，实际上成了国内最早鼓吹民主革命的组织，“隐然成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⑨。这年冬，蔡元培等又在上海办起了爱国学社与爱国女校，他的反清革命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蔡子民办爱国学社与群弟子大声讲革命，四出演说，亦无所讳”^⑩。1903年4月11日，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矛头所向敌我分明，已明确指出要革的是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命，而不是反对满族同胞。同年5、6月间，章太炎撰写了脍炙人口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系统地、淋漓尽致地驳斥了康有为把立宪之宝押在“不辨菽麦”的“载湉小丑”光绪皇帝身上的可悲思想。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言论、行动，反映出浙江知识界中进步人士的爱国救亡、反清革命思想的成熟。

浙江知识界觉醒的重要标志是1904年冬光复会的建立。光复会是立基于浙江、肇始于东京、诞生在上海的以知识分子为主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那时去日本学习的浙江籍学生，也与全国各省去青年一样，好多都是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东渡留学的。他们在国内深受明末进步思想家朱舜水、黄梨洲等的影响，尤其是受到黄梨洲的战斗的启蒙主义的熏陶。在日本，又碰上明治维新后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和欧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学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他们以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为己任。1903年，沙俄妄图长期霸占我国东三省不肯按约撤兵，法国又想染指我国南方边缘省区，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与国内学生一道，展开了拒俄、拒法运动。然而，他们的正义行动不仅得不到清王朝统治者的支持，而且被指斥为以拒俄之名干革命之实，“日日在东京练军，祸且不测”，对回国学生“照会各督抚，令所在缉拿”^⑪。当时爱国学生在海外是没娘的孤儿，受人歧视，一回国内又成为罪犯，备受迫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留学生们的思想迅速变化，被逼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光复会就是回国

的浙江留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在上海组织的秘密革命团体，“定名曰光复会，群推蔡元培为会长”^②。

光复会是继兴中会、华兴会后成立的又一著名的辛亥革命团体，“它吸收党员的方针，都是从教育界和知识分子方面着眼，所以起初入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以学界中人物为多”^③。光复会的创立表明浙江近代史上新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觉醒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生力军，活跃在20世纪初的浙江及东南各省的政治舞台上。

第二阶段 会党的联络与浙 皖起义(1905—1907)

把浙江的众多会党引上辛亥革命轨道，成为革命的一支突击力量，是光复会深入发动的结果，也是浙江辛亥革命运动的一大特色。

浙江的会党源远流长，相传最初是明末遗民为了坚持反清而秘密形成的^④。19世纪中叶，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剧，浙江原有的天地会系统的会党相当活跃。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会党虽一度沉寂，但并未绝迹，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20世纪初浙江各地会党蜂起。辛亥革命运动时期，全省较著名的会党不下二三十个，而且人数大增，如双龙会“年余之间，会员骤增至二万人”^⑤，龙华会“党徒号称五万人，实则二万数千人”^⑥，平阳党“羽党万人”^⑦。浙江的会党大多分散在广大农村与小市镇，成员多为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与城市贫苦民众^⑧。它的优点是受苦最深，革命性强，缺点是山堂林立，十分涣散。早在光复会建立以前，浙江志士陶成章、魏兰（云和人），已注意会党这支力量，他们深入浙西、浙中、浙南山乡腹地，跋山涉水，调查研究，联络会党，“于是，金巨严处温台六府秘密会党之情形，尽为成章所探知矣”^⑨。接着，徐锡麟也深入嵊县、诸暨、东阳、义乌等地，与当

地会党首领结下深交^②。陶成章还曾与龙华会首领沈荣卿、张恭合谋制订了浙江起义计划，以准备接应黄兴等的华兴会长沙起义。光复会建立后，蔡元培把发动浙江会党的重任委托给陶成章、徐锡麟、敖嘉熊(平湖人)三人。从此，光复会与一些重要会党如龙华会、双龙会、白布会、终南会、平阳党等进一步建立了密切联系。敖嘉熊在嘉兴创办了“温台处会馆”，成了光复会联络浙北、浙南会党的枢纽。另一方面，对会党成员进行启蒙教育，通过大量运送报刊，灌输革命思想。一时间，《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新山歌》以及《浙江潮》等进步书刊充塞城乡小镇，“外间输入不足”就“自相翻印，私相分送”^③。有的会党如龙华会还成立戏班，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光复会联络会党，不仅扩大了革命力量，使原来封建习性浓厚的会党逐步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同盟军，更重要的是使浙江好多闭塞的山村农民，眼界大开，“甲辰(1904年——引者)后，内地革命风潮大炽，农工平民亦多自相聚议，以谋举革命之事业者”^④，于此可见，会党的运动，实质上也是一部分农民与集镇贫民之发动。浙江当时所以能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为世人瞩目，实有赖于会党下层社会之加入。

浙皖起义是浙江会党的一次大动员。徐锡麟、陶成章等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培训人才，在当地富商许仲卿的慷慨资助下，于1905年9月23日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内设普通班与体育专修科，后者专招会党成员给以六个月的军事训练。学堂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这样“大通学校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藪”^⑤，成了浙皖起义在浙江的大本营。浙皖起义在浙江主事的是秋瑾。1906年12月，徐锡麟在去安庆任职以前，曾与光复会同志在杭州密商，并与秋瑾约定，安徽、浙江两省同时举义^⑥。1907年2月，秋瑾正式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对起义作了进一步部署。她三次去浙东，多次到杭州，发展组织。为了适应起义的武装斗争，她迅速使光复会组织军事化，“大通乃改约束，颁号令，分光复会职

员为十六级”，以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任协领，以下分统、参谋等职“由洪门首领任之”，“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而下及于绍兴之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五县，实为其中心”。5月，她又将会党组建为光复军，“编制各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纪号”。又制定了起义具体计划，“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应之，俟杭城清兵出攻金处，即以绍兴义军渡江以袭杭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杭城不拔，即返军绍兴，入金华，道巨州，出江西，以通安庆”^⑤。并定“五月二十六日”（公历7月6日）发动，“未几改为六月初十日”。但是，由于嵊县、武义、金华等地起义活动过早暴露，为清政府觉察，徐锡麟被迫在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仓促发难，当场击毙了安徽巡抚恩铭后，“率领学生占据军械所，孤军无援，陈伯平阵亡，锡麟与马宗汉同日被捕”，锡麟不屈死难，被剖心祭恩铭。“清廷震惊，大索党人，于是大通学校遂陷于四面楚歌之中”^⑥，秋瑾于六月初四日被清政府逮捕，六月初六（公历7月15日）黎明，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恩铭是死于革命党人手下的第一个清朝封疆大吏，他的丧命使清室要人坐卧不安，出入寒心。秋瑾是被清朝处决的第一位女中豪杰，社会舆论更倒向革命一边，从此以后，清朝宫廷再无安宁之日。徐锡麟、秋瑾大义凛然，“赤心虽破，虏志亦降”^⑦。在浙江，浙皖起义余波不息，有“绍兴之义师”，竺绍康、王金发、裘文高等志士“屡假其名为号召，清兵屡为所败”；“处州之义师”，缙云等地志士“特为起义军，以谋复仇”；“金华之义师……先起于东阳县属之南马，复集于马陵山”，“四处联合者四千余人”，“各路义军，共举起事”，“浙东之地，所谓上八府也，尽皆震动。其影响遂及于浙西之杭嘉湖三府，于是嘉湖之盐枭杰魁，均求附于革命党人”，“浙西皖南皆有急而思逞之意”，“浙西一带之枭党……大举暴动，连蹂躏浙西江南之诸府，声势震撼”，“清军守备千总以下被诛者数百人，虏兵之前后战死者，不下三千人”^⑧。浙皖起义，部署规模之

壮观，影响之广大，于此可见。

浙皖起义虽然失败，而革命的火种已深埋于人心！烈士功绩，彪炳千秋，“英烈牺牲见热诚，无人不知徐锡麟”，“愁风愁雨国人愁，碧血轩亭万古留”！^⑧

第三阶段 新军之运动与浙江光复(1908—1911)

浙皖起义被镇压下去后，革命走入低潮，但革命党人的努力始终不懈，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革命力量迅速恢复，到武昌起义以前，江浙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同盟会在上海市民中，学界、商界、会党中建立了一定基础。光复会的一些志士在浙江难以立足的情况下，潜集沪上租界静待时机。早有秋瑾苦心经营在前，陶成章奔走擘划于后，这时以嵊县人尹锐志、尹惟俊姐妹出面开设的锐进(俊)学社，明日发行书报，实则是光复会的上海联络总机关。他们的工作更为出色，影响及于淞沪驻军，为后来攻打上海制造局、光复上海出了大力^⑨。

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杭州，浙江革命党人立即紧张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911年11月4日起义，5日光复了杭州。如此快捷，自非一日之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然其直接的原因却是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成功，掌握了武装力量，有了自己的枪杆子。

编练新军原是清政府的“新政”内容之一，目的是增强其统治力量。浙江于1900年创立了武备学堂培训军官，1906年改编旧防营，成立浙江步兵第一标(团)；又创办了弁目学堂，训练班一级军人，筹备第二标。这二标成立后，编为陆军第二十九混成协(旅)的八十一标、八十二标。1910年，混成协扩充为镇(师)，全国序列重编为第二十一镇。历史发展往往不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浙江的新军不仅没有成为巩固封建王朝的工具，而且成了在浙江推翻清朝统治的主力军。出现这一状况，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

与会党成员加入新军，使军队成分发生了变化，而且新军的骨干和军事学堂的负责人有的自己就有反清革命思想，如弁目学堂负责人、第一任二标标统蒋尊簋早在1905年东京留学时就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思想倾向对部队有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是从1907年开始，光复会、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暗埋了革命种子。1907年，秋瑾为准备起义，在杭州运动新军将校27人，发展为会员。“孙中山亦派黄郛、赵正平、吴思豫到浙运动将校入同盟会，其时将校中入会者，为顾乃斌、冯炽中、葛敬恩等。”^④不久，“双方联络一气”，在杭州新军中结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1909年夏，浙江革命党人借安葬秋瑾的机会，在杭州会商，鉴于徐锡麟安庆发难无军队响应，致遭失败，决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⑤。他们还重新形成了浙江革命领导核心，又发展了一批军官、目兵入会。正由于在浙军二标中积蓄了这么多的革命力量，所以武昌起义的消息真似吹绿钱江两岸的春风，一下子形势大变，浙江革命党人立即奋起响应。这时，光复会的陶成章已回到上海指挥，派李燮和（湖南人）来杭催促王文庆（台州人）及早发动。^⑥同盟会的陈其美不仅自己来杭部署，还派姚永忱（吴兴人）、黄郛（杭州人）等先后来杭联络。10月下旬，浙江新军中革命党人开会，推童保暄（宁海人）为起义临时司令官，并任命参加起义的干部，朱瑞、顾乃斌分任一、二标司令官。在发动的前一天，上海革命党人又派来了由王金发、蒋介石、张伯岐、孙贯生、董梦蛟、蒋著卿等率领的敢死队到杭助战^⑦，其中队员112人是同盟会从奉化栖凤招募来的青年渔民^⑧。11月4日傍晚，按计划发动，“一标由笕桥出发，二标从南星桥出发”，分别驰援主攻机械局与抚署的敢死队，其他各部起义新军有马队、炮队、工程营、辎重营、宪兵营、督练公所、陆军小学堂、讲武堂，以及警界、学界、路界、法政界、巡防队等，各按分工投入战斗，出现了浙江新军起义、社会各界热烈响应的生动局面。革命军人多势众，一个晚上战斗，攻占了军械局、抚署，活捉了巡

抚。为了加强领导，革命党人推举支持起义的八十二标统带周承夔(海盐人)为浙军总司令，由省咨议局人士从上海请来了在拒款保路运动中声望卓著的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立宪派领导人汤寿潜(萧山人)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陶成章任省参议会总参议。5日下午，被围困的忠于清室的驻杭旗营，自知寡不敌众，在革命军的隆隆炮声中缴械投诚，杭州全城光复。

杭州光复是光复会、同盟会策动新军，联合各界，共同战斗的凯歌，一举功成，八方响应，随即各府相继易帜，浙江全省大定。其时，南京清朝总督铁良、提督张勋据幕府、乌龙之险，顽抗死守，如南京不下，武昌革命军有被清军包围反扑之危。江浙革命党人决定组织江浙联军攻取南京。浙军支队由朱瑞、吕公望等率领，是联军主力，在战斗中奋不顾身，攻乌龙山、克幕府山、战马群山、破孝陵卫，所向披靡。尤其是强攻天保城的战斗中，光复会从仙居山区招募来的会党青年充任敢死队^④，肉搏拼刺，格斗十二小时，杀出了威风，终于突破了清军最后防线，攻克金陵。“南京城馆长江锁钥，武昌地扼南北要冲”，得此两地为之犄角，革命党人便可问鼎中原，遂为中华民国奠定东南半壁江山，立下了巨功。浙江在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由此开其端，而日益为国人所青睐。

辛亥革命运动中，浙江人民谱写下一曲响彻云天的爱国主义颂歌，鼓起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反帝反封建怒潮，浩荡声势，确似钱江八月大潮，尤胜钱江八月大潮，为雄壮的辛亥风云助势添威，推波逐浪！正如一首描绘钱江潮的古诗所写的：

罗刹江头八月潮， 吞山挟海势雄豪。
六鳌倒卷银河阔， 万马横奔雪嶂高。
自是乾坤通气脉， 应非神物作波涛。
吴儿弄险须臾事， 坐看平流济万艘。^⑤

岁月奔流，江涛滚滚，潮涨潮落，过了八十个春秋。辛亥革命

早成历史陈迹，然而我们回顾这段璀璨岁月，仍然后味无穷，常忆常新。当年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万千志士，碧血丹心，献身为国，义无反顾，其心志如晴空之秋月，其气势犹贯日之长虹。他们那种“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多”^⑩的崇高精神，同日月之光辉永照后人。

今天，我们的伟大民族正挺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上，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浙江——祖国东海边的明珠，你又将发出几多光彩，为中华振兴，争来几多荣光！

① 清宣统元年学务公所编《浙江教育统计图表》。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7页。

③④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82页。

⑤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吉》第25期。

⑥ 蒋绍裳《浙江高等学堂年谱》。

⑦ 《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订章程》。

⑧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辛亥革命》(一)第48页。

⑨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6页。

⑩ 《章太炎先生在狱中佚闻录》，《辛亥革命丛刊》卷一，第394页。

⑪ 《浙江潮》第五期第8页《党祸又作》。

⑫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55页。

⑬ 陶冶公《光复会的组织与发展》，《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46页。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18、54、20、43、24、56、12、28、47、46页。

㉔ 胡国枢《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会党》，《杭州师院学报》1981年3期。

㉕ 吕公望《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近代史资料》第105页。

㉖㉗ 陶成章《秋瑾传》，《辛亥革命》(三)第61、62页。

㉘ 章太炎《锡麟学校赞》，《章太炎全集》(五)第353页。

㉙ 陶永铭《纪念光复会80周年有感》，《绍兴市政协纪念光复会80周年专刊》第20页。

⑳ 尹锐志《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88页。

㉑㉒ 顾乃斌《浙江革命记》，黄元秀《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均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98、499、517页。

㉓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七)第152页。

㉔ 张任天《忆光复会王文庆》，《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6页。

㉕ 应梦卿《奉化渔民参加光复杭州敢死队记》，《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90页。

㉖ 据张任天先生回忆，与笔者谈话记录。

㉗ 张舆《江潮》，《西湖诗词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㉘ 许柏年《秋瑾烈士未发表的诗》，《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8页。

辛亥南京光复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蔡鸿源 刘晓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江苏后，清政府的新军及广大民众群情振奋，纷纷起来响应，在短短的20多天中，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清江浦（今淮阴）、山阳（今淮安）、扬州、海州等地也迅速宣告光复。之后，各省军队组成江浙联军云集南京，一举攻克这座江南重镇，为中国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江苏光复前的社会经济状况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清朝政府的统治、剥削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掠夺下，广大民众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中已蕴积了极大的反抗情绪。在辛亥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就已在全省各地广泛地开展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活动也已深入到清朝的统治工具新军中，特别是在初级军官和士兵中，革命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广大爱国官兵一直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经济上，江苏南部地区的农业一向比较发达，但在1911年秋，苏南地区遇上了几十年未曾有过的水灾，田禾淹没殆尽，灾

蔡鸿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
刘晓宁，江苏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

情严重。而清朝统治者为了向帝国主义支付巨额赔款，仍然要按往年一样向农民收租，广大农民不堪负担，因此，苏南一带普遍爆发了农民的抗租和抢米风潮，最著名的一次是无锡、常熟、江阴三县边区发生的声势浩大的“千人会起义”事件。在苏北地区则逢大旱。从辛亥年春季至秋季的八九个月中，大部地区没下过一场透雨，许多县滴水未下，池塘干涸，颗粒无收的农户到处都是，以至饿殍遍野而无人过问。成千上万的饥民联合起来，发起了“吃大户”和抢粮运动，甚至捣毁县城，杀死县官。清朝当局进行残酷镇压，这就更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导致了清政府政治、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清朝政府“可以比作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只要有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江苏各地光复 南京陷于孤立

上海于1911年11月4日光复后，沪军都督陈英士即派出民军官兵50余人乘车赴苏州，与新军联络，宣传革命大义，并策动驻扎在城内外的新军官兵举行起义。清江苏巡抚程德全于11月5日晚召集苏州官绅商议，宣布反正，竖起了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府的大旗。原清朝江苏提法司护理藩司左孝同反对革命，只身潜赴南京向清两江总督张人骏请兵求援，其他的清政府追随者纷纷逃匿。11月5日，苏州全城高悬白旗，满贴“兴汉安民”的标语，程德全正式就任中华民国苏军大都督。苏州正式宣告光复。这是继上海光复后，江苏第一座光复的城市。

苏州光复后，革命党人立即派人到无锡进行发动。无锡地方的绅商人士早已秘密组织了钱业商团，这时又策动了城内清朝驻军江湘营队官严守中立。之后，即组成光复敢死队于1911年11月6日上午袭击了无锡、金匱两县的县署衙门。当日下午，无锡全

城宣告光复，秦毓璠任军政分府总理处总理。

6日，常州清江防营统领恽祖祁接程德全的电报后，宣布响应光复。何健任军政分府司令。同日，太仓、昆山光复。

镇江光复是1911年11月7日。当辛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镇江后，驻扎在镇江的旗人军队，为报复计，大肆捕杀革命党和民间的反清人士，激起了广大军民的极大愤慨。

位于长江咽喉部位的镇江，是南京的门户，挟象山、北固山、金山、焦山、颯凉诸险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清政府对该地防守十分重视，在此常驻有一万余精锐的旗兵和巡防队，后又调新军第九镇(相当于师)第十八协(相当于旅)驻镇。武昌起义后，第九镇官兵准备响应。新军第九镇的军官，多系江南陆师学堂及预备学堂的毕业生，他们都学得了许多新的知识，接受了不少新事物，思想开明。士兵大多是征募而来，秀才、高小及初中生甚多，且富有爱国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受到赵声、熊成基的革命思想熏陶，革命精神高涨。由于官兵们的文化素质和军事素养都较高，因此清政府很是嫉恨，第九镇官兵无时不处在被监视控制之中。

在新军第九镇十八协三十六标(相当于团)一营管带林述庆的带领下，第九镇十八协全体官兵于11月7日夜宣布起义，响应武昌，围攻镇江城，林述庆自任镇军都督。旗兵无力抵抗，都统服毒自尽，其余官吏纷纷逃匿，少数违抗者被歼。11月8日，旗兵全部缴械投降。与此同时，驻于长江江面上的清巡防水师也宣布响应起义，投向革命军。

镇江光复后，从长江上游东驶而下的镜清、保民、建安、江亨、江贞、楚同、楚观、楚谦、楚泰、联鲸、飞鹰、登瀛洲及“张”字号等13艘南洋海军的舰艇，到达镇江江面。广大海军官兵早已赞成共和，在镇军与之接洽后，毅然宣布投向革命。林述庆即将诸舰艇改编为镇军舰队，“镜清”舰管带宋文翔为海军总司令，吴振南为都督府海军处长，同时，将第九镇十七协攻打南京失利

后退到镇江的部队，改编为镇军第一师。

11月8日至15日，苏南地区的常熟、江阴、宜兴、吴江也先后光复。清江浦（今淮阴）的驻军为第十三混成协，该部炮队和辎重营官兵长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于11月4日夜间发动兵变，围攻道署，清淮扬海兵备道夷良逃遁，遂由江北军事参议官蒋雁行出面，召集并约束起义官兵，要其各回营房，切勿滋事。11月6日，蒋雁行与地方各界人士商议光复事宜，大家一致拥护光复，公推蒋为江北大都督。11月7日，蒋雁行召集十三协管带以上军官在提督衙门开会，正式宣告淮阴光复，成立军政分府，同时，传檄山阳（淮安）及淮、扬、徐、海各县反正，并令派人前来开会。

11月8日，山阳召开光复大会，由周实、阮式二人先后发表演说，强调光复的理由，痛斥了山阳县令抗拒光复的行动。

通州（今南通）僻处江北，时江北一带田地崩坍，地方人士正在发起筑隄保坍运动。清两江总督端方曾许诺拨款帮助，但新任总督张人骏不顾人民疾苦，钱款拖着不给，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慨；同时，各种苛捐杂税地方也不堪负担。上海光复后，光复军特派曾住狼山右营游击的许宏恩来到通州，接洽光复大计，光复军的军舰也由沪兵临通州城下。清狼山镇总兵张士翰在地方士绅劝说下，表示归顺后离去，其部下高竖起白旗。11月8日，通州宣告光复，成立军政分府，张警为总司令，许宏恩为军政长。

11月9日夜，镇军都督林述庆派徐宝山到达扬州。次日黎明，徐宝山即宣布扬州光复，同时成立扬州军政分府。扬州光复后，徐宝山又先后出兵光复兴化、泰州、阜宁、盐城等地。

1911年11月22日下午，清海州盐防营官兵暴动，十多名士兵武装入城，攻入海州衙门。州官陈宗雍藏匿，其护兵响应起义，当日就光复了海州，何锋钰任民政长。

至此，长江南北的江苏大部地区已宣告光复，革命势力连成一片，南京益形孤立，成为孤城一座。

新军第九镇首攻南京失利

南京是东南之重镇，连江带湖，山岭逶迤，扼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的交通，为长江天堑之险要之处，自古就有龙蟠虎踞之称，历史上曾有九朝建都于此。南京的得失，对于清政府和革命军都是至关重要的。清政府是志在必守。革命军虽然据有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但对南京是志在必得，只有夺取了南京，才能与武昌方面遥相呼应，革命的成果才能稳固，战略上也可形成对北方清政权的对峙之势。

驻防南京的新军为第九镇十七协三十三标和三十四标，另有骑兵第九标、炮兵第九标、工程兵一营、辎重兵一营，共约5000人。第九镇三十三标原标统赵声，经常向官兵们鼓吹革命，后被端方撤职查办。但他留下的革命种子，已在官兵们脑海中扎了根。早在辛亥年的秋季，清廷即命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的机关枪队随原两江总督端方入川镇压人民起义。当部队溯江西上抵达武昌时，正值新军第八镇举行起义，一改决定加入民军作战。遂由周汉臣为敢死队长，在大智门一线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的战斗。

武昌起义后，在南京的第九镇官兵马上就开始私下密议准备响应。清两江总督张人骏早就对九镇官兵疑虑重重，八镇在武昌发难后，张人骏更是对九镇倍加防范，必欲翦除而后快。但要缴九镇的械，又恐激起兵变，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在各个方面对九镇加以掣肘。新军九镇打靶剩余的子弹，被清江宁将军铁良、江防营统领张勋悉数收缴；九镇的4门大炮、6挺机关枪，也被清军强行收回，江防营又选派三营精锐部队，部署在三十三标驻地附近，随时准备行动，并将大炮架在标房后面的猫儿山上，狮子山要塞的大炮也指向了三十三标。

鉴于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南京城中同情革命的士绅马相

伯、伍兰荪、樊增祥等人向张人骏建议，将新军全部调驻城外。这对于双方都是求之不得。清当局马上采纳了这一建议。10月30日，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楨率领驻扎在南京城内的全部人马，移驻距城60里的秣陵镇。

第九镇一到秣陵关，官兵们就摩拳擦掌，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士气十分高涨，未经上级许可，他们就向部下下达了命令，马刀刺刀一律开口，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杀向南京。驻扎在镇江、江阴的三十五标、三十六标官兵也是跃跃欲试。

这时的九镇部队，子弹大部被收去，每名士兵仅剩三粒子弹。统制徐绍楨数次派人去上海赶运子弹枪械。人尚未回来，九镇官兵就急不可待地向南京城开拔而去，作进攻的准备。11月7日午后，三十三标、三十四标等部的先遣骑兵抵达南京南郊的花神庙。晚7时许，步兵开始向雨花台炮台发起攻击，另以一部向西迂回攻击水西门。官兵们勇猛地向前冲击，前锋已进至距雨花台炮台仅1000公尺的地方。这时，官兵们的子弹早已打完，面对强敌，他们仍一个劲地向前猛冲。在清守军炽烈火力打击下，新军伤亡甚重，但不少官兵仍手持刺刀马刀，带着伤呐喊着冲入敌阵。指挥官朱履先挥舞着指挥刀，身先士卒，高喊着“杀”、“冲啊！”有的官兵已经登上了雨花台炮台……在清军的疯狂反扑下，登上炮台的官兵全部阵亡。清军又以猛烈的炮火打击九镇官兵，阵地前顿时尸横遍野。九镇官兵经过几次无火力掩护、无子弹还击的冲锋后，终因损失太大，再也无力量组织新的攻势，只得且战且退，沿着宁镇大道向镇江方向退去。

组建江浙联军

首攻南京失利后，第九镇三十三标、三十四标官兵撤至镇江集中。上海同盟会总会获悉了攻打南京失利的消息后，认为南京是江南以至中国南部的战略要地，决议组建江浙等各省的部队为

江浙联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南京，通电已光复的各省，速派军队增援。并推选原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人马。

各省援军纷纷到达镇江。由上海运至镇江的弹药已如期到达，湘鄂两省军政府的200万两饷银也已解到。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楨属下，有苏军司令刘之洁部3000人，浙军司令朱瑞部3000人，镇军司令林述庆部3000人，沪军司令洪承典部（包括上海义勇商团和学生军）千余人，粤军司令黎天才部近千人，镇军柏文蔚部2000人，扬军徐宝山部2000人，江西民军千余人，广西民军1500人。以后陆续开到的有，吴淞军政分府光复军3000余人及沪军女敢死队、浙军敢死队数百人。据不完全统计，各省会攻南京的总兵力，约30000人。另有海军舰艇近20艘。

清军驻防南京的兵力为：江防军张勋部步骑炮兵20营，王有宏巡防营10营，赵会鹏部巡防兵5营，督署卫队1营；另外又征召了2500人，新编10营；江宁将军铁良驻防旗兵一标，炮兵一个营。总兵力约20000余人。

江浙联军的作战部署为：以镇、浙、沪等军为主力，由东路出击，先扫清外围马群、孝陵卫等据点，再夺取南京的制高点天堡城，然后突入东部及东北部各城门，此为中路；以苏军主力在雨花台佯攻，牵制敌有生力量，伺机攻入聚宝、洪武各门，此为南路；以镇、浙等军一部攻占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炮台等外围要塞，清除攻城时的威胁，形成对南京的火力包围，此为北路；以海军舰艇在长江上作策应炮击，掩护登陆，阻截清军在江上的南北往来；以沪军为总预备队。另由镇军李竟成部组成江北支队，在长江北岸由六合向浦口攻击，截断张勋军的后路，阻止北方清军的增援。

再次攻打南京城

11月24日清晨，两军前哨战首先在马群、孝陵卫一线打响，

张勋亲率江防军数千人出城拒战。初战的联军将士如猛虎下山，骁勇异常，粤、浙二军左右包抄，大败张勋辫子兵。至下午3时，联军一部乘兵舰在乌龙山下登陆，海军则在江上遥射掩护；另一部骑兵已冲至乌龙山炮台。民军仅放数枪示警，清守军官兵事先早已受到镇军的策动，已将炮栓卸下藏于“楚泰”号兵舰中，故一枪未放，当即竖起白旗宣布反正。

25日清晨，民军乘势攻占城北幕府山炮台，下关东西两炮台亦宣布反正，马群、孝陵卫阵地也相继易手。张勋见势不妙，于26日倾7000兵力出城，试图夺回孝陵卫等外围阵地和炮台，激战中，联军伤亡很重。正在双方胶着厮杀时，沪军统领洪承典率预备队1500人赶到。各军重振士气，一举将张勋军包围，击毙清军统领一名，击毙击伤清军近3000人，生俘数百人，缴获大炮数十门。张勋率残部败逃入城。

张勋军连遭败绩，遂缩回城中，时而紧闭城门据守，时而发兵袭扰，并利用优势炮火轰击距城附近驻扎的联军阵地和营房。联军几路人马已进逼金陵城下。26日，联军潜至城下，用炸药猛炸朝阳门（今中山门）。张勋又派出步兵五营，炮兵一营在距城仅数里的孝陵卫一线，与联军展开拉锯战。这一仗，张勋又损失千余人，投降500人。

与此同时，南路苏军刘之洁部已肃清城南雨花台的外围据地，正在猛攻雨花台炮台；另一支联军敢死队突入城西北的狮子山炮台，将军火库炸毁；已被联军占领的幕府山炮台亦向狮子山炮台、北极阁制高点等处遥击，直接命中多发；泊于长江上的海军舰艇也不断向狮子山轰击。张勋令狮子山炮台予以还击，岂知官兵早已心向革命，所发炮弹有的落在军舰周围，有的落在幕府山山脚下，就是打不中目标。张勋立即将几名士兵斩首，换了人仍是这样。狮子山炮台等据点几面受敌，狼狈不堪。

战至27日，江浙联军已先后攻占南京外围的乌龙山、幕府山、孝陵卫、狮子山等要塞据地，又以此为依托，用重炮猛轰北

极阁、富贵山、仪凤门、太平门、洪武门、水西门等城内外的军事要地及总督署、将军署、明故宫等清军重要设施。张勋军伤亡惨重。

天堡城血战

早在11月24日，江浙联军的镇军、浙军、沪军就按照统一部署，开始攻击天堡城。

天堡城耸立于南京东郊紫金山西峰，怪石峻峭，形势险峻，高屋建筑，易守难攻，战术上为阵地之锁钥，是南京用兵的必争之地。能占天堡城，则可俯瞰南京，唾手可得。所以南京流传着一句十字兵谚：“欲得南京城，先夺天堡城。”张勋亦设有重兵把守，为江防营一营，旗兵600，装备有机枪4挺，重炮十多门。联军仰攻6日未下，反而损失惨重。

至11月30日，联军重新进行了部署。沪军先用重炮猛轰天堡城工事，紧接着，镇、浙、沪三军分路出击，夹攻天堡城之清军。镇军第三十五标首当其冲，猛攻紫金山之正面，试图一举夺城。清军据险抵抗，加上火力凶猛，镇军伤亡太大，只得暂时退出阵线。天堡城清军见联军攻势甚猛，急用电话向城中张勋求援。张即派出援兵数千出城策应，刚出太平门就遭到联军的伏击，遂狼狈退入城中。

浙军统领朱瑞看到镇军首攻失利，急中生智，下令悬赏官兵，（一）夺城之官兵，为攻取南京的第一头功；（二）夺城之官兵，每人赏洋50元；（三）伤亡者，加倍抚恤；（四）伤亡者，即在天堡城上铸铜像，立纪念碑、列官职姓名。号令一下，各营将士自告奋勇者甚众。朱统领当下挑选了200人，编为两队，一队由张兆辰率领，从白骨坟沿东湾上中茅山，攻天堡城之侧背；一队由叶仰高统率，由明孝陵圆通寺直插紫金山主峰，居高临下，击其东端；镇、沪各军则潜攻其山南后背。

10日下午，镇军管带杨韵珂率军仰攻天堡城，一据点敌军被地

面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眼看就要被攻破。清军龟缩在阵地上高喊：“我们投降。”杨管带即令停止射击，并亲率一排人上前洽商，清军数十人亦迎上前，双方相距仅十多步。一清军士兵忽高喊：“如肯降我，每月给十六元。”联军官兵大怒，斥其反复无常。一士兵说：“请杨管带来评评理。”杨挺身上前。敌兵听说有一管带，一齐放枪，杨韵珂身中数十枪，一头栽倒在地，断气前尚大呼：“不夺得天堡城，不要收我尸。”

至晚7时许，天堡城上下一片漆黑，联军想借着夜幕的掩护夺占天堡城。忽然，清军从城上用探照灯向下直射，同时枪炮子弹倾泻向下，联军官兵猝不及防，牺牲不少，大部分人被堵在城下动弹不得。正在这时，张兆辰率十余名敢死队员从山北峭壁处攀上，奇袭清军的左翼，清军大败，山南军始得抬头，趁势攻上天堡城东端。

两军在黑暗中的肉搏拉锯战，一直进行到凌晨1时许。这时，叶仰高率部攻占了城下的一个小山头，并夺得山炮一门，机枪一挺，正欲乘胜追击。忽然，敌一阵乱枪打来，叶仰高中弹数发，当即身亡。众将士听说叶长官战死，齐声高呼着他的名字冲上天堡城。

与此同时，联军在城北的幕府山、乌龙山等炮台部署了从上海首批运到的24生的大炮，向城内的北极阁等处猛轰。北极阁与天堡城遥遥相望，是城中的制高点，也是清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清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防军统领张勋等人，都常驻北极阁指挥战事，并有电话直通天堡城。北极阁炮弹一落，连阁的屋脊都被轰塌，清廷要人顿时慌作一团，纷纷仓皇逃下山避弹去了，天堡城与总枢纽的联系也告中断。

12月1日黎明前，联军在镇军连长季遇春的率领下，以肉搏方式逼近了天堡城的核心部位，终于彻底打垮了清军的最后顽抗。季连长第一个登上了天堡城的城垣，将士们在乱石堆中竖起了一面巨大的白旗。这时的时间是：12月1日6时40分。天堡城之

战，民军阵亡管带1人，排长2人，士兵160多人。

天堡城攻占后，民军拟利用制高点的优势向城内各要地发炮。由于战斗残酷，山上仅存有一门完好的德国山炮。于是，由第九镇神炮手于魁掌炮发射。于曾与德国炮兵参赞比试过实弹射击，于夺得了锦标。这一次，于魁居高临下，稍作调整后即作试射，第一发炮弹就命中城东太平门外的江防营富贵山炮台。接着，又向富贵山炮台连射20多发，直打得营房崩塌，江防营炮兵一哄逃下山来。

其时，联军连夜将从上海运到的24生的大炮运入南京近郊的藤子树高地，猛轰太平门城楼（清军瞭望哨）、富贵山、北极阁等据地，巨炮威力无比，清军的斗志彻底瓦解。

南京胜利光复

天堡城易手，南京自然不保。12月1日，苏军刘之清部攻占雨花台炮台，发炮轰击聚宝门、洪武门等城南各门。张人骏、铁良自知大势已去，只得请出美国领事及南京鼓楼医院美籍院长马林，向江浙联军乞和，所提条件为：不伤百姓；不杀旗人；准令张勋率部北上；准令张人骏、铁良北上……徐绍楨拒绝了第三条，又向马林提出：暂拘张勋，俟临时政府成立后再释放；张勋部全部缴械徒手出城；联军派员监视张军遣散，张勋搜刮人民的80万两银须全部交出。此4条一直未见清方答复，这时，张人骏、铁良已躲到泊于长江上的日本兵舰上去了。于是，联军于12月2日发起总攻击。镇军从天堡城瞰射太平门，清军巡防营的张连升、赵荣华等将领自知无力再守，遂率部3000余人，由马林作中介人，开太平门投降，镇军一举入城。接着，苏军攻破聚宝门，粤军攻入仪凤门，浙军攻入朝阳门，各省光复军、敢死队、炸弹队等亦先后入城。南京于12月2日胜利光复。

张人骏、铁良乘日本兵舰逃往上海。张勋率残兵2000余人，

出汉西门绕道大胜关渡江狼狈北逃。在江面上，遇到海军处舰艇的有力堵截。到达浦口后，遭到镇军柏文蔚部的迎头痛击。镇军李竟成部组成的江北支队，亦由六合向浦口的张勋军攻击。两军缴获枪械辎重无数及十多万元，一直追杀到临淮关才收兵。从此，浦口以北，临淮关以南的大片土地，悉为民军占领。张勋军逃到徐州才站稳脚跟。

南京光复后，各军将领共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统一指挥江苏军政大事。时正值武昌形势危急，黎元洪已退至洪山一线，遂急电南京派兵增援。联军立即派出粤军黎天才部，并拨张连升、赵荣华两部，合编为一师，以黎天才为师长，星夜赴鄂，使局势得以缓和。

此后，从南京到武汉的长江流域已全部为革命军掌握。南京的光复，巩固了武汉的地位，大大地加强了革命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光复后，12月4日，上海都督陈其美联络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等人，召集已光复各省的留沪代表举行会议，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将南京定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

12月12日，十七省代表到达南京，连日来，在江苏咨议局紧张地讨论临时大总统的人选问题；并于17日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从欧美回到了上海。12月29日上午9时，各省代表云集江苏咨议局，正式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省代表为：奉天吴景濂，直隶谷钟秀、张铭勋，河南李馨，山东谢鸿焘，山西景耀月、李素、刘懋赏，陕西张蔚森、赵士北、王有澜、俞应麓、汤漪，浙江汤尔和、黄群、陈时夏、陈毅、屈映光，福

建潘祖彝，广东丘心容、王宠惠、邓宪甫，广西马君武、章勤士，湖南谭人凤、邹代藩、廖名缙、宋教仁，湖北马伯援、王正廷、杨时杰、居正、胡瑛，云南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四川萧湘、周代本等45人。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规定，每省只有一名代表权，以得票2/3以上者当选。候选人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结果孙中山得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投票结束后，与会者高呼：“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共和万岁！”也是这一天，正式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定公元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由上海启程，乘火车前往南京，车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时，均受到当地军民的隆重欢迎。直至下午5时许，火车才抵达南京下关车站。17省代表、各军将领、各界人士及各国领事均前往欢迎。这时，南京各炮台鸣礼炮21响。

孙中山下车后，又换乘小火车直赴位于城东的两江总督署车站。下了小火车，又转登一辆蓝色绣花彩绸马车。车队以军乐队高奏凯旋曲为前导，直抵两江总督署大门。

两江总督署的辕门前，华灯高照，如同白昼，红彩绸与翠柏交相辉映。门楼下，人头攒动，各省代表和各军将领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孙中山的马车一到，大家纷纷上前表示欢迎之意。孙中山一手持帽、一面微笑着与大家握手寒暄。

欢迎仪式后，孙中山在黄兴、徐绍楨二人一左一右陪同下，健步走进了总督署大门。代表和将领们鱼贯而入。

晚10时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正式开始。总统府的大堂暖阁，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和十八星旗高悬，各省代表和将领以及各界人士、外宾200多人肃立着。这时，司仪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起军乐。大堂上，孙中山面朝南，笔直地站在正中，表情自信而庄重。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立于左侧，黄兴、陈其美、徐绍楨立于右侧。17省代表和军政要员、外宾分为两行，

列于左右两阶。

孙中山在与会者的注目下，健步上前，举起右手，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宣读了大总统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紧接着，胡汉民代读《宣言书》，徐绍桢受各省代表与陆海军人委托，向孙中山致颂词：“尊重共和，巩固自由，举满、汉、蒙、回、藏各族，覆于平等之政，众意所属，至诚爱戴。”之后，孙中山致答词，表示将“竭尽心力，勉副国民公意”。

17省的一位代表双手捧着大总统印上前，郑重地呈递给孙中山。这时，全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中华共和万岁”的口号声经久不息。孙中山激动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大家辛苦了！各位将士辛苦了！”接着，孙中山又宣布了中华民国的五项施政方针。这时，位于北极阁炮台等处的礼炮发射100响，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清朝两江总督署诞生了。

1月2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通电全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之始。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它推翻了260多年的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中华民国。武昌起义的胜利之花，在南京结下了丰硕的果实。从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江淮大地推翻帝制的伟大壮举

——辛亥革命在安徽

陈德辉

在伟大的辛亥革命中，安徽的革命活动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革命前，安徽革命党人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安徽成为“中江革命的策源地”。1907年至1908年间，同孙中山在两广发动的6次起义相呼应，安徽先后爆发了徐锡麟、熊成基两次声势浩大，震动全国的武装起义，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皖籍烈士吴越在北京车站谋炸清廷五大臣，有力地揭穿了和打击了清廷“预备立宪”的骗局。还有许多江淮儿女，为了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抛头洒血，前仆后继，“舍身取义者，史不绝书”。武昌首义后，安徽各州县纷纷独立，淮上军崛起寿州，光复两淮，阻击张勋北窜，抗击倪嗣冲南犯，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在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斗争史上，安徽人民曾经用鲜血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辛亥革命爆发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

辛亥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一连串野蛮的侵略战争，极端腐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陈德辉，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列强对中国“虎视鹰瞵”，“蚕食鲸吞”^①，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清政府为了支付侵略者的巨额战争赔款，维持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和浩繁的军费，以及推行所谓“新政”的开支，向人民强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从1899年到1910年的11年间，清政府向人民搜刮的“财政收入”，由每年白银8000万两猛增到3亿两^②。安徽每年上交给清政府的7项常捐即达186.25万两。各族人民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尤其在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军阀、官僚、豪绅和外国教堂的手中，地租和高利贷更加严重，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水利长期失修，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1911年严重灾荒，“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死者约四五十万”，“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吃人肉之惨剧。”^③在这种情况下，安徽各地爆发了相当规模的抗捐、抗租斗争和抢米风潮，有的发展为饥民暴动。据官方记载，1910年“凤颖一带饥民为会匪所煽，聚众抢掠，其势渐及燎原”^④。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展到安徽，掠夺矿山和铁路，帝国主义者在他们掠夺的矿山里，以极其野蛮的方法剥削和压迫矿工，侵扰和蹂躏附近居民。甚至枪伤无辜，霸占民妻，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帝国主义掠夺矿山，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矿业，也引起他们的反感。因此，由他们领导和发动的收回利权的斗争广泛开展，全省以收回铜官山矿权的斗争达到高潮，全省民众一致奋起，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挫败了英商凯约翰掠夺铜官山的企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帝国主义势力还以传教为名，依仗特权，巧取豪夺，强占土地，鱼肉乡里，因而教案纷起，反洋教斗争不断发生。安徽1869年至1911年发生规模较大的教案达30多起。有的教案导致群众武装起义。

正是这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50年初发表的关于当时国际形势的论文中所预料的那样，经过革命，“中华共和国的出现，这是西

方侵略在中国必然要引起的结果”^⑥。

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先感觉到深重的民族危机，他们在海内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宣传活动，建立了兴中会、同盟会组织，为辛亥革命进行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安徽革命志士也遵循这种革命轨迹，在省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

1902年安庆青年知识分子陈仲甫(独秀)、潘赞化等在安庆北门的藏书楼(图书馆)发起爱国演说会，是安徽革命宣传活动的开端。他们组织青年励志学社，聚集一批爱国志士谈论国事，揭露时弊，探索拯救国家的途径，还以抵御外侮为由，组织该会成员进行军事训练。事为清政府侦知，陈仲甫等遭通缉，藏书楼宣传活动被扼杀。

1903年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抗俄国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的爱国民主运动。安徽陈仲甫等人奋起响应，他们以“皖城爱国会同人”的名义，发布了《安徽爱国会知启》^⑦，尖锐揭露了沙皇妄图侵占东北三省的狼子野心，号召一切爱国志士立即行动，投入这场斗争。5月17日安徽大学堂及武备、怀宁、桐城各学堂的学生和一些爱国志士在藏书楼举行拒俄爱国演说会，适逢大雨滂沱，与会者仍坚持不散，“众情踊跃，气象万千”^⑧。这次运动同样遭到清政府的镇压。

创建学校，兴办教育，借此鼓吹革命，培养革命人才，是当时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芜湖的安徽公学。该校创办于湖南长沙，1904年迁回芜湖。由于创办人李光炯和校务主持人卢仲农都倾向革命，因此当时的一些革命志士云集于此。先后在该校任教的有陈仲甫、刘申叔(师培)、柏文蔚、陶成章、张伯纯、苏曼殊、江彤侯等。他们把公学讲坛

作为鼓吹革命的场所，校园里洋溢着浓郁的革命气氛。在这些教师的影响下，学生中涌现了不少革命活动分子，如刘文典、金维系、刘少熙、孙万乘等，后来都成为安徽地区辛亥革命的中坚。安徽公学还同东京同盟会本部及上海、南京、安庆、合肥等地的革命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影响其他地方的许多学校，如安庆的尚志学堂，寿州的蒙养学堂、芍西学堂，桐城的崇实学堂，合肥的城西学堂等，使他们也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这样，安徽公学就不仅成为中江流域新文化的摇篮，而且成为这个地区的革命思想传播的中心。所以冯自由说：“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⑧1906年清政府拟逮捕公学师生多人，侦察密布于校外，环境非常恶劣，革命党人先后离开公学，芜湖革命热潮为之中落。

革命党人在兴办学校的同时还创办了许多报刊宣传革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安徽俗话报》，由陈仲甫担任主编和重要文章撰稿人。该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向广大人民宣传爱国思想。如该报刊登《瓜分中国》一文写道：“……照他们瓜分图上，说是俄国占了东三省，还要占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德国要占山东、河南，法国要占云南、贵州、广西，日本要占福建，意大利要占浙江，这靠着长江的四川、两湖、三江几省，就分在英国名下了。”^⑨这张报纸办得极有生气，正像蔡元培所说，《安徽俗话报》“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⑩。

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同时，革命志士着手建立革命组织。1905年7、8月间，建立的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是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取名岳王会，其寓意是崇拜和效法岳飞精忠报国，抗击异族的精神来奋勇推翻清王朝统治。由安徽公学的教师陈仲甫、柏文蔚联合学生中常恒芳等组成，陈仲甫任会长。后来由于岳王会骨干分子工作变动，该会分为三部：芜湖为总会，陈仲甫任会长；南京分部和安庆分部，分别由柏文蔚、常恒芳任分会长。这三部中，安庆分部较为活跃，常恒芳把新军中不少人吸收到岳王会中来，并成立了外围组织“维新会”。他们经常秘密组

织会员阅读《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扬州十日记》等革命宣传品，越发坚定了大家的革命斗志。后来在几次起义中牺牲的著名烈士熊成基、范传甲、倪映典、宋玉琳等都是岳王会会员，可见岳王会组织是起过很大作用的。

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始于1905年，那时安徽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纷纷回国，在安徽各地发展同盟会组织。安庆、合肥、南京都成立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发展了一批会员。岳王会会员绝大多数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寿州成立的信义会、颍州成立的安仁会都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同盟会在安徽辛亥革命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中坚和领导作用。

两次震撼全国的武装起义

1907年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是一次影响很大的义举。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家为富商，又有田产，但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毅然抛弃优裕的家庭生活，投入随时有杀身之祸的革命工作。他在《正气集》中明确表示要为推翻已沦为洋奴的清朝统治者而献身。他曾参加光复会，原想联络会党起事，后来改变主张，筹款捐了一个道员的官衔，到安徽任职，准备打入敌人内部，取得兵权，相机起义。他初任陆军小学会办，不久改任巡警学堂会办。他与在浙江绍兴的秋瑾相约，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然后占领南京。不料起义计划泄露，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遂决定提前在安庆起义。1907年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安徽省的高级官员都随安徽巡抚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当徐锡麟以进呈学生名册为由接近恩铭时，突然从靴筒中取出双枪，向恩铭射击，恩铭身中7弹，不久毙命，文武官员仓皇逃散。这时徐锡麟大声号召巡警学校学生“快从我革命！”率领革命党人马宗汉、陈伯平及学生数十人冲出学校，进占军械所。很快清军将军械所包围，双方经过激烈战斗，陈伯平当场牺牲，徐

锡麟、马宗汉等20余人被捕。在敌人的刑场上，徐锡麟威武不屈，慷慨陈词，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⑩，侃侃而谈，大义凛然。当晚徐锡麟从容就义，不久马宗汉也遇害。徐锡麟壮烈牺牲，许多革命党人书写挽联哀悼。安庆起义失败后，秋瑾很快在绍兴被捕并英勇就义。她在《绝笔书》中写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⑪徐锡麟领导的这次起义，在清廷引起极大的震动。清廷官吏如同惊弓之鸟，朝野一片惊慌。北京的慈禧接到警电后也惊恐万状，命姜桂题率一营兵马保护颐和园。

在徐锡麟和秋瑾遇害后的第二年，即1908年，熊成基又在安庆领导和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如果说，徐锡麟、秋瑾起义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则“熊成基是第一个依靠新军士兵来发动一次起义的人。”^⑫新军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开始编练的新式军队。1904年安徽招募武备练军300余人；所选士兵皆身材合格，年少识字者，“青年有志之士，纷纷应征”^⑬。熊成基和许多革命党人都乘机投入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熊成基，字味根，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曾先后加入岳王会和同盟会。他加入新军不久就到南京的南洋炮兵学堂学习，毕业后，任炮兵排长，后调安庆新军三十一混成协任炮兵队官（相当连长），并被推为安庆岳王会的主持人。他在新军中加紧革命活动，谋划反清起义。1908年秋，清政府调集湖北、江苏、安徽的新军到太湖会操，熊成基等准备乘机在安庆发难，但事泄未成。同年11月清帝载湫和那拉氏先后病死，熊成基等准备乘统治集团惊惶失措之机发动起义。11月19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秘密集会，公推熊成基为安庆革命军总司令，决定当晚起事，并由熊成基拟定颁发了13条作战密令，对起义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晚9时，在城外的新军炮营和马营1000余人按时举火为号，冲出营房，击毙反动军官，杀奔安庆城下。但是，安徽巡抚朱家宝已有准备，他下令紧闭城门，并派重兵防守，以致城内革命党人无法接应。城外起义部队只得硬打

猛攻，伤亡惨重。双方激战一昼夜，20日清水师5艘兵轮开抵安庆，向起义部队发炮轰击，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且已精疲力尽，饥寒交迫。熊成基只得分两路向庐州方向撤退，在清军追击下，起义军抵达庐州时已不满百人。熊成基只得遣散余部，分头逃避。起义失败后，清军残酷进行镇压，遇害军人和学生达300余人。熊成基在起义失败后，到东北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哈尔滨谋刺载洵，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在狱中，他慷慨陈词“吾愿以一腔热血，灌自由之花”，“我愿继我而起者，大有人也”^⑤；表现了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坚贞气节和浩然正气。

这两次武装起义是在江淮大地上响起的一声春雷，它虽然失败了，但却震撼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唤醒了亿万民众，加速了革命进程。

皖籍志士在外省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安徽革命志士在外省还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吴越在北京车站谋炸五大臣。

吴越，字孟侠，安徽桐城人。早年就读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时曾加入兴中会，后又创办两江公学和《直隶白话报》积极宣传革命。他爱国心切，“每与谈及国亡种削之势，辄仰泣不止”^⑥，决心为革命而献身。他在《与妻书》中明确表示“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⑦。1905年，清廷为了缓和革命气氛，愚弄人民群众，放出“预备立宪”的空气，并派载泽等五大臣进行所谓“出洋考察宪政”。吴越得悉这一消息，怒发冲冠，决心炸死五大臣同时以身殉国。在舍身赴义的前一天晚上他奋笔疾书，写成4000余字的《意见书》^⑧，深刻揭露清廷的骗局，表达了自己杀身成仁的原委，妥善地安排了后事。然后从容地怀揣炸弹，奔赴岗哨林立的北京火车站。他夹在仆人中间混进车站，踏上五大臣乘坐的包厢。当他从怀中取出炸弹，燃着引信，正要

向车厢内掷去时，不料列车发动，车厢相撞，炸弹震落地下爆炸，“轰”声巨响之后，烟雾弥漫，车穿地陷，吴越当场壮烈牺牲，五大臣中3人受伤，其时正阳门人喊马嘶，一片混乱。五大臣逃回官邸，清廷受到极大的震动。吴越好友、“北方暗杀团”成员马鸿亮事后撰文道：烈士壮举虽然“未能命中，然而夺祖龙之魄，振志士之气，声闻全国，名震环球……武昌义举遂覆清祚，皆此一弹首发其难，有以速之成也。”^⑩著名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曾怀着沉痛心情写下《吊吴烈士越》诗一首，其中有“皖中志士名吴越，百炼刚肠如火烈。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⑪

辛亥革命前，爆发了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孙中山称之为“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⑫参加此役的江淮子弟就达97人，知名殉难者有宋玉琳、石德宽、程良烈士。他们被捕后慷慨陈词，昂首赶赴刑场。程良烈士，年方28岁，受审时大声骂道：“余与清奴，无可言者”，遂缄口不言，时有“哑党人”的传说。^⑬

皖籍志士在省外的革命活动还有万福华刺王之春于上海，孙毓筠刺端方于南京，倪映典率部起义于广州，他们在祖国各地，为了民族独立、国家振兴，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安庆、庐州、芜湖等地光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革命洪流很快席卷全国。这时，皖籍革命党人吴旻谷、王天培、胡维栋、韩著伯、李乾瑜、史沛然等纷纷聚集安庆，筹划革命起义。他们凭借过去的工作基础，发动新军第六十一标、六十二标及陆军小学

堂、测绘学堂联合于10月30日晚举行起义，但因事机不密，总指挥又临阵畏缩逃走，起义中止。10月31日驻集贤关的新军六十二标在革命党人的带领下，重新发难，逐走统领，夺取子弹，进攻安庆，但因安庆防备较严，义军武器不足，起义失败。

但是，这时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全省许多州县已义旗遍举，“安徽巡抚之政令，此时已不能出安庆城门一步”^⑧。安徽邻省江西、江苏、浙江也都先后独立。在这种情况下，省咨议局同安徽巡抚朱家宝磋商独立问题。朱家宝原极顽固，但他此时得到袁世凯的密电：“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⑨，因而顺水推舟，表示同意。于是，在11月8日，咨议局宣布安徽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其间革命党人因不满朱家宝窃踞都督职位，曾将都督大印索去，但不久又被朱唆使流氓夺回。军政大权仍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同盟会员吴旻谷亲去九江，请兵援皖。不料派来由黄焕章率领的二千浔军，军纪极坏，来后即勒索巨额军饷，未达目的即纵兵围攻都督府，劫夺军械所，焚烧藩署，洗劫藩库和商店，并枪杀责斥他们罪行的革命党人吴旻谷、毕大怀，引起全省人民极大愤慨，黎元洪致电江西都督，将浔军撤回九江。浔军走后，革命党人组织了“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维持社会秩序。不久召集临时省参议会，选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局势稍稍安定。

庐州(今合肥)地处江淮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年同盟会员吴旻谷曾在此建立同盟会分支机构，奠定了革命基础。武昌首义后，上海同盟会派孙万乘(字品骞)到合肥主持同盟会合肥分会，与当地革命党人相结合，秘密策划庐州光复。他们一方面派人运动西乡自卫队参加革命，开入城内，以壮声势，并号召在外地的学生赶回合肥，制造革命舆论，扬言拥有炸弹，将采取行动，造成革命气氛；另一方面，说服合肥县总团练长袁斗枢去劝说庐州知府穆特恩、合肥县知事李松圃、江防营管带季雨农归顺革命势力。经

过晓以大义，明以利害，除穆特恩逃走外，李松圃、季雨农均愿归顺革命。于是1911年11月9日在天后宫召开大会宣布庐州独立，成立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任总司令，方悖言为副司令，下设民政、巡警、财政、参谋、执法5部。军政分府成立后，即推动庐州府属各县独立，并整顿、充实武装力量，准备北伐。

芜湖是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光复皖南必先光复芜湖。早在1904年，芜湖曾举办“安徽公学”，刊出《安徽俗话报》，播下了革命种子。武昌首义后，本省寿州、安庆、庐州先后光复，对芜湖有很大影响，通过报刊宣传和“迪智群”^⑥的革命活动，革命气氛热烈。此时，从上海、武汉、合肥等地派同盟会员吴振黄、刘醒吾、阚岚溪等来到芜湖，以江口大方客栈为秘密机关，把“迪智群”等革命组织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方面，争取当地青帮势力支持革命；另一方面派人同拥有军事实力的巡防营统领李葆龄谈判，以委任李为“芜湖海关监督”为交换条件，使李归附革命。11月10日芜湖宣布独立，成立了皖南军政分府，公举吴振黄为革命军司令，刘醒吾为参谋长。皖南军政分府成立后即派兵先后光复了宣城（宁国府治）、当涂（太平府治），其他州县均接踵传檄而定。

淮上军崛起寿州，光复两淮

寿州是皖北重镇，位居淮颍之冲，有“皖北锁钥”之称。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员张汇滔以“信义会”名义，程恩普以“安仁会”名义在寿州、颍州（今阜阳）等地开展革命活动，扩大革命力量。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寿州后，淮上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士绅张汇滔、王庆云、袁家声、张纶、王占一、李诱然、岳相如等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寿州光复计划，决定于11月5日起义。他们一方面把自己掌握的武装在4日前分别部署在寿州北门、南门和东门外，作好武力光复的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咨议局张纶等头面人物

向清政府州县衙门和清军头目进行劝降和分化瓦解工作，争取和平解决。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知州魏业裕、知县孙绍英^②、总兵李定明于4日夜先后弃城逃走，于是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兵不血刃，连夜占领了寿州城。11月5日，居民从睡梦中醒来时，寿州城头已遍插革命旗帜，街头巷尾张贴了起义军总司令的安民告示。

紧急着革命党人大力进行扩军，四乡农民闻讯后，剪去辫子，赶来参军的蜂拥而至，一两天之内，革命军即扩充到两万余人。革命党人召开会议，确定起义军改名为淮上国民军，设立总司令部，推举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全军编为13个军统，军统下设支队、营、连。淮上国民军共有18个步兵营、1个马队营、2个炮队营。

淮上国民军经过整编和简单训练后，从11月9日起即分兵数路，浩浩荡荡，向两淮进击。

一路由袁家声、杨穗九^②、岳相如等率领进行东征，兵锋所至，攻无不克，先后光复了怀远、定远、凤阳、凤台、蚌埠、五河、泗县、灵璧、天长、濉宁等地。

一路由权道涵、段云、王占一等率领，向南进军。其中王占一、吴寿民所率部队在庐州协助孙万乘消灭一营扰害百姓的清军残兵后，先后攻克棠县、无为、舒城、含山等地；权道涵、段云所率部队也攻克六安、霍邱、霍山、英山等地。

一路由张汇滔、孙多荫率领步兵、炮兵2000余人西征颍州。在颍上，粉碎了知县孙镜仁的顽抗，强攻入城。淮上军到达颍州时，程恩普等革命党人已领导淮北革命军在颍州宣布独立。两军汇合，分头出击，先后光复了蒙城、涡阳、太和等地，淮上军势如破竹，革命声威直达河南边境。

在辛亥革命的暴风雨中，淮上军崛起寿州，挥师两淮，以简陋的武器，不足的给养，全凭革命热忱，英勇作战，成为驰骋淮北大地的一支劲旅，连克22州县，为革命立下殊勋。接着，他们

又在蚌埠阻击北逃的张勋，在颍州扼制南犯的倪嗣冲，喋血沙场，光照日月。

张勋由于1917年企图复辟清王朝而臭名昭著。在以前他一直是清廷的忠实走卒。1911年南京光复时，他在顽抗失败后率部沿津浦路北逃。淮北军得悉后，派两营兵力集结蚌埠进行阻击。两军在蚌埠小南山附近展开激战，淮上军虽然士气高昂，但终因武器简陋，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张勋部也遭受重创。淮上军在此次阻击战中表现了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后人将阵亡的88名将士遗体安葬于小南山，并在山颠修建了“淮上国民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倪嗣冲原任清政府河南布政使。袁世凯在1911年10月复出后，即疯狂镇压革命，他在派段琪瑞、冯国璋南下猛攻汉阳的同时，派倪嗣冲于12月9日率武卫军5000人入皖镇压安徽革命。倪军陷太和后，违背南北议和协定，围攻颍州城，发炮狂轰颍州城墙，多次发起冲锋，淮上军英勇抗击，奋战4昼夜，倪军终未得逞。后来倪嗣冲勾结城内原清廷反动军官，暗开城门迎进倪军。淮上军仍坚持巷战，直至15日下午张汇滔方率领残部突围，颍州沦陷。倪嗣冲在破城后，进行疯狂屠杀，凡未走脱的淮上军革命官兵，全遭惨杀。颍州拒倪之战，淮上军牺牲将士达1700余人，他们为辛亥革命立下了千古不朽的功勋。

辛亥革命在安徽的失败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南返上海，宣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⑧。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安徽都督孙毓筠发表北伐檄文，分两路进行北伐。

一路由柏文蔚派出的卢慈甫率领的援颍支队，与段志超率领的皖军北伐队等部队会师正阳关，组成联军，沿颍水北上讨伐倪嗣冲。起初曾大败倪部于颍州东乡，后倪部援军赶到，联军不

利，败退正阳关。不久双方议定罢兵停战。另一路，由柏文蔚指挥的北伐联军沿津浦线讨伐张勋，先后光复固镇、宿州，2月11日攻克徐州，张勋率残兵逃往山东。南北议和告成后，两路联军均班师。

南北议和后，安徽革命内部经过纷争，先后于1912年1月和4月分别由孙毓筠和柏文蔚督皖。柏文蔚就任都督后曾想有一番作为，在实行议会选举，发展教育事业，改革金融政策等方面有所建树，特别是在全省范围内雷厉风行地进行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孙中山在安庆视察时说：“贵省禁烟办法，实可为各省模范也。”^①

1913年为了反对袁世凯企图建立独裁统治的罪恶阴谋，安徽都督柏文蔚联合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史称“讨袁四督”)发起癸丑讨袁之役。但不久就遭到失败，柏文蔚被迫出国。倪嗣冲于1913年8月28日率兵进驻安庆。从此，安徽进入了最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振奋了民族革命精神，安徽人民也曾有天地昭苏、日月重光之感。柏文蔚主皖期间，也曾进行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建设。然而，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辛亥革命后“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②。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要想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只能是幻想，多少志士仁人为此屡遭失败而抱恨终天。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长河里大浪淘沙留下的历史结晶，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③。

① 《兴中会章程》。

② 尚明轩：《孙中山传》，第31页。

- ③ 张廷襄,《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卷10。
- ④ 《安徽民变档案》,见《辛亥革命》(三)。
- ⑤ 转引自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原载196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 ⑥ 《苏报》1903年5月26日。
- ⑦ 《苏报》1903年5月20日。
- ⑧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光复会·安庆起事之失败》。
- ⑨ 《安徽俗话报》创刊号。
- ⑩ 《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第二编。
- ⑪ 陶成章,《浙案记略》,载《辛亥革命》(三)。
- ⑫ 徐双韵,《记秋瑾》,载《辛亥革命》(四)。
- ⑬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 ⑭ 《建国月刊》第七卷第一期。
- ⑮ 陈春生,《熊成基谋刺载洵始末记》,载《辛亥革命》(三)。
- ⑯⑰ 《民报》第三号。
- ⑱ 《天讨》,系《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于日本刊出。
- ⑲ 《辛亥革命史资料选辑》(上)。
- ⑳ 转引自《纵横》,1990年第3期第36页。
- ㉑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集,上海民智书局,第1054页。
- ㉒ 《黄花岗战役》,载《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四册。
- ㉓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载《辛亥革命》(七)。
- ㉔ 安文生,《安庆光复经过》,载《安徽文史资料》第五辑。
- ㉕ 辛亥革命时期的话剧团,成员多参加革命。芜湖光复后,该团编剧齐月溪任皖南军政分府秘书长。
- ㉖ 一说魏绍英。
- ㉗ 一说杨穗久。
- ㉘ 转引自《安徽近代史》第389页。
- ㉙ 《民主报》1912年10月27日。
- ㉚ 《孙中山先生十讲》,载《总理全集》中册。
- ㉛ 《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3节。

同盟会在广西边境三次武装起义

沈奕巨

广西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同盟会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有3次在现今广西境内(解放后钦廉地区划归广西)，现将这3次武装起义的背景、缘由、经过和结果综述于下：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汇集了17省革命英俊，联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次年，入盟者已逾万人，分会遍及全国各省和世界五大洲，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均具备，同盟会便由宣传、组党进入直接冲击清朝反动统治的行动时期。同盟会的领袖们为武装起义积极进行规划和准备：第一、确定武装起义的战略方针——“两广首义、各省响应”，革命由南向北发展；第二、制订《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等11个文件，用以指导各地武装起义和起义时宣传革命宗旨之用；第三、派员调查两广、川、滇以及长江各省，收集情报和联络驻军；第四、派遣同盟会员回国联络会党，运动清军，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冬黄兴入桂林郭人漳营策动“桂中革命”。1906年12月同盟会员策动湘赣哥老会举行萍乡、浏阳、醴陵起义。萍浏醴起义事前同盟会总部并不知道，及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员纷纷到总部请缨回国杀敌，有痛哭流泪者。自经此役，同盟会员回国发动武装起义者已相望于道。这种情况说明，同盟会总部偏处东京，已落在形势后面，不能就近领导国内革命，必须把指挥机关移近国内。环顾当时中国四周，都是帝国主

沈奕巨，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义及其殖民地，兴中会时代孙中山曾利用香港、台湾作跳板发动广东起义，已遭到英日当局的禁止，现在必须另觅新的地点了。

一 河内总机关的设立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徇清廷的请求，“礼送”孙中山出境，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黎仲实、胡毅生等先后到达越南，在河内甘必达大街61号设立总机关，发动粤桂滇三省武装起义。

孙中山为什么要选择河内设立起义指挥部呢？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是贯彻“两广首义”战略方针的适当地点，越南北部密迤我国两广、云南，国境线长达1300多公里，从东可沿海岸出广东，向北越镇南关可入广西，向西经河口则达云南。孙中山想从越南出击，在南方割据一块根据地，成立军政府，号令全国响应。

早在1902年，孙中山应法国印度支那总督稻美的邀请，赴河内参观博览会，同其秘书长哈德安会谈。孙中山提出以越南北圻作为运输武器、人员进入中国的通道，遭到了拒绝。但法国同意革命党人进入北圻去接触中越边界的游勇（按：游勇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是失业士兵组成的武装集团，是清末广西会党大起义的骨干力量，法国想通过革命党招抚游勇，不再扰及越南，孙中山想利用游勇反对清朝，故达成此协议），并有一定的活动自由。

“1902年河内之行，为孙以后在边境地区开展活动打通了一个关节。”^①到了1905年10月，法军“中国情报处”头子布加卑，登轮求见孙中山，声称“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遂请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天津参谋部派出武官七人，归予调遣”^②。法国殖民者动听的语言和主动合作，引起孙中山的幻想，他认为法国是友好国家，其统治下的越南是革命党人自由活动的天堂。

1907年初，河内总机关计划在潮州、惠州、钦廉、镇南关4地同时举义。为了领导方便，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起义委托同盟会香港分会负责，钦廉、镇南关起义则由孙中山、黄兴亲自领导，其目标是夺取南宁建立军政府，然后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有两广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③

为了筹集武装起义的经费和武器，河内总机关在越南华侨中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募捐和购运武器工作。先把越侨中28个天地会堂口统一起来，集体参加同盟会；又在工商学界发展会员，充任各分会领导。把1902年建立的河内兴中分会改为同盟会河内分会，又在海防、西贡、堤岸、顺化成立分会，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其中河内、海防两个分会具有特殊意义。“海防一埠华侨工商不到三千人，一晚捐资得万余元；河内一埠华侨不满千人，所捐亦八千余元。彼等一闻义师之起，则争先恐后，从军者有人，出钱者有人。”^④河内、海防成了支撑起义的两大基地，越南华侨中还涌现了一批热心革命、共赴时艰的义士。河内黄隆生多次接受任务运粮济款上前线，不避艰危，最后被驱逐出境，毁家纾难。西贡银行买办曾锡周、马培生，有求必应，毫无吝色，多次捐献巨款，为南洋华侨之冠。堤岸黄景南是卖豆芽小贩，每天把所得存起来，倾其一生积蓄献给革命。黑旗军遗将梁正理，据越南左州自立，黄明堂到其辖地设机关招得同志数百，梁并借给枪械。越南华侨为边境起义提供了财政、兵员、军需购运、通讯联络等多方面的援助。

为了建立武装起义的队伍，河内总机关大力招募广西会党流亡人员和边界游勇。1902—1905年广西爆发会党大起义，受到清朝残酷镇压而失败，一部分残存的游勇武装转移到边界两侧，一些幸存的会党首领和骨干逃往越南。这些人流浪国外，生活无着，同清朝官绅结下血海深仇，复仇思想强烈，极易接受革命宣传。而他们又是虎口余生，身经百战，熟悉内地情况，勇敢强悍，正

是同盟会所需要的战斗人员。胡汉民说，河内“地界于两广、云南，故会党游勇之头目多流寓于此，王和顺之外，黄明堂、梁兰泉、关仁甫、梁少廷等，皆出入边界有名声能聚啸者也。河内同志以先生字逸仙为日新楼，为饮食营业，乃不啻招纳亡命之所。……先生乃使予与汪精卫为诸人演讲革命宗旨，指导其各种任务。对于会党，则晓以革命军纪，纠正其恶习，复审查其性质与所有实力，而分别使用之。”^⑥王和顺是广西会党首领，黄明堂是边界游勇头目，关仁甫是滇南会党首领，梁兰泉、梁少廷是清军逃弁，这些人都在1907年加入同盟会，得到孙中山的任用，通过他们去收集会党游勇，组成起义的基本队伍，担任侦察敌情，策反清军、突击作战等任务。

中越边境崇山峻岭，路径丛杂，只有河内有铁路达云南河口和广西镇南关，海防有轮船通芒街，经东兴入钦廉，这3地是交通便捷的边防要塞；便成了革命党人进攻的目标，因此有两次钦廉起义，镇南关起义和河口起义。（河口起义不在本题范围，略而不述。）

二 防城起义

当革命党人在越南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廉州群众抢粮和钦州三那抗捐，成为起义的导火线。1907年春，清吏以办学为名，征收糖捐，激起钦州那彭、那丽、那思三乡人民的反对，众举刘思裕为首，成立“万人会”，歃血为盟，抗捐到底。其时同盟会员邝敬川、梁少廷、梁建葵已潜入三那进行鼓动，群众反抗愈烈，武装对抗清军数月。6月，清朝派郭人漳率兵3营，赵声率新军1营附炮队从北海登陆，袭击三那。群众遭到残酷屠杀，抗捐武装隐伏山中，派邝、梁为代表到河内向孙中山求援。孙中山认为是绝好时机，一有民变武装主动请战，二有受革命影响的郭、赵两部驻扎钦廉。于是，武装起义的计划形成了：第一步从日本购运武

器，“占据防城至东兴沿海之地，为组织军队之用……可成正式军队二千余人，然后集合钦州各乡团勇六七千人，而后邀约郭人漳、赵伯先二人所带之新军约六千余人，便可成一声势甚大之军队”^⑥。第二步“全军北趋，以取南宁”^⑦。

孙中山委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入三那收集抗捐武装，负责指挥起义。命黄兴入钦州郭人漳营，胡毅生入廉州赵声营，运动郭、赵响应，均得到首肯，又派人到各乡联络团练起来配合。王和顺化名张德馨，居赵声军中多日，商量起兵韬略。赵声开启军事委员的证明送王入三那，三那父老像亲人一样迎接王和顺。先期入三那的梁少廷、梁建葵率部来会，刘思裕之侄刘渊明也率部来归，共得几百人枪，在群众掩护下潜伏等待战机。

三那抗捐时，广西派1营军队“越境助剿”，事平驻在防城县。该营官兵多招自绿林，哨官刘廷辉、李耀堂和县署亲兵接受革命运动，愿作内应。孙中山批准了防城的计划。1907年9月1日，王和顺率200多革命军在防城北部的王岗山树旗起义。防城县令宋渐元向廉钦道王瑚告急请兵，王复电令镇静，有“贼到兵亦到”之语。4日，革命军奔袭防城。防城是新建的县，无城垣，县署有座炮楼，由亲兵把守，广西两哨防军驻在县署两旁。革命军在刘辉廷、李耀堂和团总唐甫珠的接应下进攻县署，亲兵不抵抗，遂破之，全俘守敌，杀知县宋渐元以下16人，开监狱释放犯人。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文》、《招降满清将士布告》，阐明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宣布革命军的宗旨和政策，人民耳目一新。《防城县志》载：“是役王和顺为党军都督，梁瑞阳为副，梁少廷佐之。王和顺变名张德兴，布告安民，秋毫无犯，商民感张都督纪律严肃，醢资宰猪，备海错酒食礼物，献张都督犒军。”居民皆燃爆竹欢迎，各乡群众纷纷携械投军。

另一路起义部队是关仁甫、詹岐山在上思组织了200多人，开去接收东兴(防城县的边镇)。东兴驻有清军两营，受革命党人

运动，树青天白日旗表示举义。但关仁甫不能依约接济饷械，起义官兵疑悔，将旗降下，放枪一排，伪报赶走革命党收复东兴。关仁甫接应不成，便把队伍拉到防城会合。

革命军占领防城后，从日本购置武器没有运来，王和顺不气馁，留下邝敬川、唐甫珠守防城，自率大队千人(枪一半)冒雨向钦州进军，扎营于离州城20里之涌口，等待郭人漳响应。郭人漳临阵变卦，唆使革命军去打南宁。黄兴借名出巡去见王和顺转达郭意。王和顺认为南宁没有内应，攻坚徒致失败，坚持要打钦州。黄兴只好答应内应，回到城中，紧急布置郭军中的革命同志王德润、陶表封、曾传范等半夜打开城门迎接革命军。廉钦道王瑚发现郭军不稳，亲自加兵把守城垣，调郭军出城外。王和顺领兵来到，看见城上灯火辉煌，知有变故。不久黄兴派人密报城中有备，请王转取灵山，期赵声响应，以带动郭部继起。哪知革命军撤离后，郭人漳就派兵攻陷防城，向清方抢报头功，并杀害同盟会员霍时安以灭口，掩盖他和革命党人的关系。黄兴机智地逃离郭营，返回河内。

9月7日革命军向灵山挺进，“沿途团民加入作战者三四千人，有张拾义之妻亦率数十人来会合。军行所至，鸡犬无惊，所经乡村，争备粥饭，以故军粮无匱”^④。9日革命军抵灵山，城外六峰山炮台和环秀桥为敌先占，革命军凭着3架云梯攻城，坏了两架，刘梅卿等二三十名勇士率先冲进城内，后续部队进不来，他们据屋巷战了两昼夜。城外部队猛烈攻城3天不下。赵声奉命率军增援，他怕同革命军遭遇，战则自相残杀，遂改走山路，用心十分良苦。由于敌援大集，革命军退过河南，向官屯、淶水撤退，经廉属北通、花会厂、五王山，绕回钦州罗蒙、小董。王和顺把队伍分散，各乡团散归原地，梁瑞阳、刘辉廷、李耀堂各领数百人分地驻扎。王和顺返河内向孙中山报告和请示办法，再不回来，防城起义遂告一段落。

王和顺离队后，革命军和群众武装在十万山下的那勤、大寨，

在钦东三那，钦西那桑、那棉，在灵山那楼，同清军浴血苦战了半年，一直坚持到黄兴率军再入钦廉，但已经损失得差不多了。这是防城起义的余绪。

防城起义是由群众抗捐斗争发展起来的，起义的基本队伍也是由抗捐武装所组成，在起义中一定程度地发动了群众参战，应该说在同盟会10次武装起义中，防城起义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一次，本来可以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可惜王和顺过早遣散队伍，轻易退出革命基础较好的钦廉地区，致使群众武装失去领导，各自为战，被清军各个击破。

三 镇南关起义

钦廉起义枪声未停，镇南关战鼓又响了。镇南关是广西南疆的一个关口，扼中越大道要冲，地势奇险，四周山峰都有炮台营垒，沿线是纵深防御工事。关城西侧的右辅山高入云表，耸立在群山之中，长达二三里，山上有镇南、镇中、镇北三座巨型炮台，拱卫着镇南关，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号称边军精锐的陆荣廷荣军，驻守在镇南关、隘口、凭祥一线，这是中越边境最强固的要塞，时人称为第二旅顺口。

河内总机关对广西边境军事活动，1907年春夏就开始了，先派关仁甫以招募滇越铁路筑路工人为名，入镇南关运动驻军管带黄福廷、防营总教练易兴龙、龙州厅幕友陈晓峰以及左江各土司。7月，为了配合王和顺防城起义，孙中山嘱关仁甫在镇南关起事，“易、陈鼓动驻军，不幸事泄被害，第一次起义遂告失败”^⑩。

河内总机关复派梁兰泉运动清军。梁原是清军管带，久驻边防，与清军将佐有旧谊。梁兰泉招集流浪在越南的会党七八十人，于8月初企图越境入内地，“经清朝官吏知觉，密告法国官吏，称为劫盗，法国官吏捕获之。讯供皆称欲回广西举义，并非行

劫。法国以其系犯国事，一概开释，逼令离境”^⑩。越境举事又失败了。

河内总机关探得镇南关附近那模村有一股游勇，首领是黄明堂、李佑卿、何伍，勇敢强悍，既抗清军，也打法军，法人无可奈何。孙中山派人前去招抚，晓以民族大义，黄明堂等皆诚服，愿听指挥。适王和顺从钦廉返回河内，孙中山便委王为都督，负责攻打镇南关；又命黄明堂从左州拔队出镇南关相配合。11月10日，王和顺离河内慷慨赴战地，到那模村同黄明堂、李佑卿、何伍商定11月18日起事。到时游勇不听指挥，队伍不集，起义发动不起来。

孙中山改任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冯祥为司令，李佑卿为副司令，何伍为支队长，共负镇南关起义之责。王和顺率一支军队攻袭水口关以配合。此外，还发动了内地凭祥、宣化、上思、思州等地民军响应。右辅山驻有两哨清军，哨长李福南和士兵都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运动愿为内应，革命军还派了3人进炮台工作。1907年12月2日零时，革命军400人集结在越南那卜出发，据说有越南革命党和菲律宾独立军参加，购置有驳壳枪、电光灯和纸炮等战具，以那模村游勇80余人作先锋，越过国境经弄瑶、弄怀两村，从西面爬登右辅山，革命军翻越悬崖峭壁，攀藤钩树而上，起义官兵到半路迎接，第一梯队顺利进入镇北炮台，第二、第三梯队也鱼贯入据镇中、镇南炮台，缴获16生的大炮4门，7.5生的大炮10门，步枪400余支和大批弹药。革命军占领三炮台时，点燃纸炮投进煤油箱去燃爆，配以鼓角齐鸣和杀声，震惊了静寂的边关，敌人茫然无措。曙光初照，右辅山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旗帜，三炮台互打旗语祝贺，百里边疆一片欢腾，游勇纷纷前来参战。革命军派人拿旗下山令清军管带黄福廷插上镇南关去，黄福廷临阵爽约，杀死军使，据关城和革命军对抗。

预定镇南关起义的当晚，河内总机关的同事们彻夜不眠，焦急地等待消息。孙中山说：“几年的辛苦，如果在这方面成功，那

就是将来发展的端绪了。一想到这里，我时时刻刻心里有如听着镇南关方面的炮声”。^①2日上午接到攻占镇南关的电报，大家呼喊“万岁”。4日，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胡毅生、日人池亨吉、法国退伍炮兵上尉狄氏等，从河内乘火车到同登，骑马入那模村，连夜点火把攀登右辅山。黄明堂列队欢迎革命领袖的到来，孙中山在鼓乐声中检阅革命军，发表振奋人心的讲话，犒赏起义官兵，群情雀跃，想不到在这战火纷飞的山头上有如此热烈雄壮的场面。

5日清晨，孙中山巡视阵地，命令各炮向敌军轰击，数炮就击中了陆荣廷的大营，各炮齐发，清军阵地上浓烟滚滚，木石横飞，毫无还击能力，孙中山情不自禁地参加发炮，并为伤员包扎。他激动地写道：“余自乙未广州失败以来，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国之土地，与将士宣力行阵间。”^②又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③表现了一位伟大革命家的爱国情怀和战斗热情。

革命军虽然占领了右辅山制高点，但黄福廷盘据着镇南关城，革命军下不了山；陆荣廷、陈炳焜陈兵摩沙、隘口，堵塞了革命军前进的道路。而山上缺枪、缺弹、缺粮、缺水，不能持久作战。孙中山和诸人密商后，决定速回河内筹款集械，组织援军，嘱黄明堂等将士坚守5天待援。孙中山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探发现，法国勒令孙中山离开越南，至使革命军陷入弹断援绝的境地。

6日，清政府下令把广西巡抚张鸣岐交部议处，饬各将领协力进攻，克期收复。龙济光、陆荣廷两部清军4000多人，向右辅山三面迫进（法国不让清军入越南境，故不能形成四面包围），发动了3次强攻，均被革命军粉碎，清军伤毙400多人，革命军牺牲20多人，负伤60多人。陆荣廷派陈灵五上山劝说革命军撤退。血战至9日，坚守5天的期限已到，革命军弹药打光，粮水俱缺，便于晚上全军退入越南境内，集结在燕子山休整待命，部分将士被法

军押送至新加坡。革命军撤退下山时，忘记把炮台上的青天白日旗取下，何伍的徒弟、13岁小战士冯细说，军旗是一军灵魂，不能落入敌手，遂飞身上山，盘旋于杆上把旗取回。然而龙济光、陆荣廷谎报力战攻破炮台，骗取了奖赏和晋升。

镇南关起义以奇兵突袭占领要塞，但不能突破敌阵向龙州、南宁前进，取得内地军民配合，陷于孤军困战，在清军优势兵力反扑下失败了。但是它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号称雄关天险被革命军一举攻破，少数革命军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血战7昼夜，在同盟会军事史上尚属首次。这种英勇顽强的精神震慑了清朝政府，振奋了全国人民。

四 钦廉之役

1908年3月上旬，孙中山被法国驱逐出越南，移居新加坡，中越边境的武装起义交由黄兴、胡汉民负责。行前，孙中山同河内机关部制订谋取滇粤之策：一路由黄兴筹建军队再入钦廉，取南宁为革命基地；一路由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镇南关起义之众，攻略河口，图取云南。为什么革命军要重入钦廉？第一，钦廉会党英勇善战，群众基础较好。第二，防城起义余部还隐伏在十万大山中坚持斗争，许多革命村庄还在武装反抗清军。第三，钦防是郭人漳的驻地，黄兴对郭有幻想，郭军中有一批革命同志，可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黄兴以海防为基地，在芒街设立前线机关，派谭人凤入东兴郭人漳营联络。郭以为革命军财政富足，想一脚踏两船，答应暗助弹药，并约好了交接地点和方法。黄兴向法商购得驳壳枪百数十支，冯自由在香港购得子弹，由海防同盟会员偷运入境，转运到前线装备部队，组织了长枪队、驳壳枪队和炸弹队。革命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涨。1908年3月27日，黄兴率黎仲实、梁少廷、梁建葵、詹岐山等防城起义余人和越南华侨200多人，高举青天白

日旗，列队吹号，在东兴附近大路村跨过北仑河进入国境，经河舟到那勒，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黄兴的告示，村民燃爆竹欢迎，途中和一队清军相遇，一触即溃。

29日下午，革命军行抵小峰，打着郭军的旗号，清军哨官率队出迎，全部被俘。两营清军闻讯逼近小峰，依山为阵，革命军从后山突破敌阵，清军大溃，600多人只剩下50余名残卒。这是首战小峰获得全胜。

30日，革命军在途中遇清军1营，清军退入村中据宅顽抗，黄兴叫群众出屋，喝令投掷炸弹，伤毙敌军百余，残敌解衣卸械而遁。31日，革命军行抵大桥，两营清军追来，革命军以排枪射击，敌一营官中弹倒地，两营皆溃。自此以后，清军闻革命军之声即偃旗息鼓避开。这些挨打的清军都是郭人漳的部队，郭恼羞成怒，不但不履约资送弹药，还调兵攻打革命军。

4月3日，革命军列阵于钦州马笃山，清军龙督带率兵3营来攻，革命军居高遥击。清军地形不利，大困，龙督带中弹落马，清军死伤甚众，军官先遁，3营皆溃。阵擒清军30多人，哨官两名，这是入国境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革命军连战皆捷，声势日盛，正想从大葦、那楼两处进入广西，郭人漳和参将王有宏率兵3000追来，采取包围式。革命军处境不利，黄兴组织敢死队在黑夜中摸入郭军驻扎的村庄投掷炸弹，清军惊扰，四散逃命，缴获郭人漳的军旗和坐马。黄兴写信给郭人漳说：“君与吾党主义，本表同情，徒以误会而致相战，亦属不得已之举。军旗关于君之责任綦重，故特奉还，聊表缺憾而申友谊。马则暂请见赐耳。”^④接着又在钦境大寺龙王岭、那蒙绿留村大挫清军，钦人梁少廷、梁建葵出力不小。

革命军七战七捷，缴获快枪四五百枝，队伍壮大到600多人。从此革命军纵横于隆雁、陈圩、那悞、马路圩、绿柳、凤岗一带，穿插于20000多清军之间，如入无人之境。孙中山赞扬说：“克强（指黄兴）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

带，转战数月，所向无敌，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而大著。”^⑩

为了配合钦廉方面的军事行动，负责河内机关部工作的胡汉民，对广西清军开展“纸弹”攻势，以南军大营的名义，分别致信给荣军统领陆荣廷及其部将陈炳焜、幕僚赵竹君。致陆荣廷信中略谓：近者中华国民军已兴于两粤之交，所至人心归附，满清诸将疲于奔命，岌岌自守，此真是大有为之机……信中劝陆乘机起义，诛龙济光，据龙州、太平，共图光复大业。致陈炳焜和赵竹君的信中，促他们坚定陆荣廷反清的决心，以实践去年输诚的诺言。（按：这两信反映了一个事实：1907年陈炳焜、赵竹君经梁兰泉介绍，曾秘密到越南会见胡汉民。陈炳焜说：“统领陆公，素有大志，同镇文武，相视莫逆，中国有事，边防之军，必不为天下后。”^⑪赵竹君说：“柳州之役^⑫，荣军奉命数月延迟，盖革命党真无举动，始肯用武，虽有深心而未遇机会。”又说：“日本留学生以服官满洲者为奴隶，而矢口自许国民，国民、奴隶非目前可定，亦止待判决于将来。”^⑬故胡信中有实践输诚诺言之语。）这些书信发出后没有回信，也不见陆荣廷有什么行动。这些军阀没有革命思想，看风转舵，投机取巧，当革命没有明显胜利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冒险反清的。这些书信只起到一点作用，陆荣廷为了保存实力和留条后路，和革命军互不相攻，遭遇也不放枪，在整个钦廉战役中保持壁上观态度。

革命军流动作战40多天，弹药耗尽，将士疲惫，战斗力渐不如前，初期见敌即扑的勇气减少了，开始出现奔溃逃亡现象。5月2日，当革命军进至小董以北和广西交界之地，前有龙济光重兵截堵，后有郭人漳跟尾恋追，部队天黑迷路，自相惊扰，被敌人冲散数段，溃不成军。黎仲实、詹岐山、梁少廷等各带少数人循着山间小路，昼伏夜行返回越南，越国界时又被法军捕杀不少。黄兴与部队失去联系，带着30多人北行，到南宁七圩分散求生，黄兴南下广州湾，乘船到海防，于5月9日脱险回到河内。这位忠

勇的革命家还未洗去征尘，又马不停蹄奔赴河口督师了。

钦廉之役在同盟会10次武装起义中，是军事上打得最漂亮的一役。革命军人少械精，锐不可当，数万清军望风而逃，充分反映革命党人以一胜百的英雄主义精神。但他们忽视了以根据地作依托，陷入单纯军事观点和无后方的流动作战，弹药得不到补充，部队得不到休整，以致久战力尽，失败得很惨。这种先胜后败的经验教训，促使了同盟会不断修改武装起义的方针和战略。就广西边境3次武装起义来看，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军事斗争的启蒙课，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失败为成功之母。同盟会在广西边境武装起义的失败，引起革命党人的反思。他们觉得输入式的武装袭击，成功希望甚小，必须深入内地发动革命，才能生根立足。故1907年以后，在日本、香港、广州的广西籍同盟会员，纷纷奉派回广西工作。与此同时，大批外籍同盟会员应聘到广西编练新军。在本籍和外籍同盟会员的通力合作下，广西各地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开展了革命宣传，掌握了新军，联络了大批会党武装。1911年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消息传来，广西的革命力量闻风而起。10月29日，数千会党和民变武装起于湘桂黔边境，攻占怀远县城，桂林震动。10月30日，同盟会领导梧州市民自动起来宣布独立。10月30日晚上，桂林新军准备起义，因下暴雨水阻而改期。11月5日，潯州五县民军万人起义，首先攻占平南，向府城集中。广西清吏内外交迫，发现自己坐在火药桶上，被迫接受咨议局的和平请愿，被迫接受同盟会提出的“广西独立，新军北伐”的条件。11月7日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广西独立，通电全省和平易帜，咨议局即选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广西成为第九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

① (美)杰弗里·巴洛《孙中山与法国人，1900—1908年》第六章。

②⑩⑮ 孙文：《革命原起》，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11、13、14页。

③ 1907年10月8日，孙中山致邓泽如等函，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46—347页。

④ 1907年10月16日，孙中山复张永福等函，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48页。

⑥⑬ 《胡汉民自传》，第十一节。

⑦ 1907年9月13日，孙中山致宫崎寅藏函，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42页。

⑧ 邓慕韩：《书丁未防城革命军事》，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548页。

⑨ 关仁甫：《四十年来革命回忆录》载《逸史》第一卷第二期。

⑭ 1907年8月23日，孙中山复张永福、陈楚南函，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38页。

⑪（日）池亨吉《支那革命实见记》。

⑫ 《支那革命实见记》序，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76页。

⑬ 刘揆一：《黄兴传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291、294页。

⑯ 《胡汉民致陈舞卿书》，载台湾《开国文献》第一编，第13册，第327页。

⑰ 指1904年陆亚发起义。

⑱ 同⑯，第326—327页。

福建辛亥风云

范启龙

福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福建是明末清初反清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也是清政府统治势力最后到达的地区之一。后来长期坚持在长江以南进行反清斗争的天地会便创设于福建。^①福建又是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乡，鸦片战争以后，福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地为民主革命作出贡献。在20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高潮中，福建人民也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

清朝光绪年间，福建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地主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土地高度集中，人们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辛丑条约》后的摊款，加上清廷的其他搜刮，使人民的负担日愈加重。福建除了向老百姓征收捐税外，没有别的财经来源，于是，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便纷纷出笼，竟多达70余种。^②

20世纪初年，福建天灾连年不断。人祸加天灾，真如火上浇油，弄得人民无以为生。自1901年至1911年，每年都有各种灾情，其中较突出者如：1907年“泉州府地方大疫流行，死亡者日必数十人”^③；1908年厦门“入夏至今，时疫盛行，人皆朝不保夕，每日死者约数十人”^④；同年9月下旬，漳州府龙溪、南靖两县暴

范启龙，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雨成灾，决堤5800余丈，冲塌民房29000余间，溺毙人口600余名，被淹良田68000余亩，塌城270丈，“遍野哀鸿，呼号惨切”^⑥；1909年9月15日，“福州及长门、马江一带飓风大作，计闽侯、长乐、连江、闽清、福安各县倒塌民房2800余间，桥梁400余座，坍塌堤岸1400余丈，溺毙大小人口1000余人，沉坏船只500余艘，淹没田园5000余亩，衙署、公所、营房、城垣均多坍塌。灾情之重，灾区之广，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见”^⑦。

福建人民遭受天灾和人祸的逼迫，在生活无着、求生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背井离乡，忍痛冒险向海外谋生。据《海关册》记载，厦门一地在1905年前后，“每年出口人数约在十万人左右”^⑧。辛亥革命时期，“旅外闽籍侨数已在六百万人以上，几占全闽户口四分之一也”。他们在海外“皆能勤奋忍勉，息息不休，所得赁银则寄回本国”养家糊口。^⑨

福建虽然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最早侵入的省份之一（《南京条约》中开放五口通商，福建即占了福、厦两口），但是由于自然条件较差（丘陵地带，农产品不足，交通仍停留在徒步肩挑阶段），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20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在全国初步发展时期，福建全省只兴办了20多家商办工矿企业，它们的规模都很小，资本一般只有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多的也不过数百万元，使用工人数目一般只有几十人或百把人，没有一家达到500人以上（当时福建唯一一家拥有500工人以上的大厂是官办的福州船政局）；它们主要集中在福、厦二地，且其中一些项目尚未完成，有些则创办不久便因故停业。所以辛亥革命前福建的近代工业是相当落后的。^⑩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帝国主义者对福建虎视眈眈，步步加紧侵略。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把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省变为它的殖民地，紧接着便强迫清政府宣布不把福建省让与或租给其他国家的声明，将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进入20世纪以后，它加快了侵闽的步伐：“1902年成立

的福建武备学堂，除了总办孙道仁，从总教习到助教都是日本人”^⑩；它通过台湾银行多次在闽发行有彩债券^⑪；1907年，日本西本愿寺僧人苇原竟以“持有驻闽日领事照会，向兴化府要求照耶稣、天主各教一律保护……于7月18日举行开教式”，正式开堂布教^⑫。日本外务省还强词夺理地宣称福建境内的铁路与日本“关系殊深”，强迫清政府同意敷设包括福建在内的华南铁路^⑬。

与此同时，法、英、美、德等帝国主义也纷纷插手，企图在福建大捞一把。法国妄图攫取建、邵、汀三府矿权，激起闽人的强烈反对。它们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为了缓和彼此间的矛盾，不得不采取某些调和措施，如将厦门鼓浪屿定为公共租界。据厦海关税务司阿理嗣说：“本口洋人多寓鼓浪屿，因恐一国忽创为租界，故请将此岛作为公共地界……定于(1903年)三月十六日开办。”^⑭

面对外来侵略的加剧，福建人民站在民族立场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1905年，福建人民掀起反美爱国运动。是年5月14日，在沪福建商领曾铸(少卿)邀闽帮商人至泉漳会馆集议，就抵制美货的办法作出决定，并通电全国。^⑮厦门商会当即行动起来，“公议于七月初一日起实行不购美货，不用美物”^⑯。福州则由施兰英女士出面“广招女同志，运动妇女社会不用美货，赞成者极为踊跃”^⑰。

同年，厦门还发生了群众围攻海关署事件：“自常关归并洋税司兼办，设立新章，加索规费，贪图罚款”，“于零星小物搜查科罚十分苛刻，如一匹布、五筒碗之类”，至“乡人不敢上街购物，各行生意萧条”^⑱，终于激起反抗，出现了“八月初一日必须罢市”的揭帖。至时“同安强徒成群……乱攻关署，毁坏总巡公事房，并捣碎海关舢板多只”。当时，不仅地方官员统带“兵勇弹压”，连泊港的英国兵船“费见尼阿”号也立即“提兵一队登岸”。这场斗争最后虽被血腥镇压下去，但厦门的权政也不得不有所让步，包括将嘉税务司撤换，以平息民愤。^⑲

20世纪初，福建仙游、惠安、漳州、福安等地陆续爆发反洋教斗争，规模最大的是1906年的漳浦教案。缘因民教尖锐矛盾，人们群起“纵火焚烧天主堂”，漳浦卢县令“暗令家丁多人保护洋教士改装逃至县署……同其幕友逾后垣出，匿于某绅家”，群众“拥入县署”搜寻，“将县令捆绑，问其要人”；接着，便打开县监，“囚犯百余放走一空……又焚毁耶稣堂及医院等”。闽督崇善急调各处大兵前往镇压，将领导人张婴捕杀。最后，“英教士已开单向县索赔十万两”，法天主教也进行了勒索。^②

福建人民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同时，还进行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如1902年，兴化府莆田村民趁祈雨抗旱之机，“焚毁厘卡、盐馆”；仙游村民便“张贴揭帖……乘机起事”。他们“麋集数千人，声称须将各项捐输永远停免，逼令县官允从”^③。1904年，“云霄厅因贾捐闹事，激成民变”^④。1907年，建阳县五谷会暴动，“全城失守，知县被戕”^⑤。1909年，汀州府新军激怒乡民，被“聚众绑其哨官，尽抢其枪炮军装”^⑥。

由于社会不安，物价飞涨，又激发起多次罢工、罢市、罢课斗争：1905年，福州烛伙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集体罢工^⑦；同年6月下旬，龙岩州某乡民挑米出售，盐局巡勇疑系私盐，竟“持刀砍中要害，立时毙命。州城内外各铺户以及各居民闻之咸抱不平，各铺遂一律罢市……居民愈聚愈众，约有数千之多，立将盐局拆为平地”^⑧；1908年，漳州师范学堂某学生无故“被警局拿办，各学堂一律罢课”^⑨；1909年6月，海关新委员姚步瀛上任后强行加征税收，泉州“各店户愤甚，一律罢市”。^⑩1911年，省城福州发生了“轿夫反抗警捐，聚众暴动”事件：9月17日，城台聚众四五百人罢不抬轿；18日下午，轿夫们将“沿途警岗捣毁……所有商店也闻风响应，相率关门，立即罢市”；他们包围巡警道衙，“道署头门暨六所均焚毁”，终于迫使闽督提牌当众宣布“扛轿免捐”，斗争取得最后胜利。^⑪

通过一系列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福建人民科学地总结

出一个规律,通过民间流行的酒令体现出来:人们“以手中小指代表老百姓,食指代表官府,拇指代表外人。老百姓怕官府,对方食指一出来,小指就输了;官府怕外人,对方拇指一出来,官府就输了;外人怕老百姓,对方小指一出来,拇指又输了”,^⑨十分形象地归纳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

继孙中山先生创立兴中会后,20世纪初年,革命小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福建青年也积极行动起来。南京水师学堂福州籍学生郑权因痛感祖国沦亡,而具民族自决思想,“尝托名著《瓜分惨祸预言记》及《福建之存亡》等书,冀以大声疾呼,警醒国人之迷梦”。他和福州桥南的至亲好友郑祖荫等人志同道合,经常书信联系,研究如何开通风气事。1902年春节期间,郑权由宁返榕,2月27日以纪念孔子为名,召开演说会,在仓前山古榕书院组织益闻社,这是福建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陈零生等旋往长乐县成立分社,取名益群社,总社和分社都附设阅书报所,供人阅览,进行革命宣传工作。^⑩同年,“永泰人黄展云创办蒙学堂于福州,组织励志社”。在教员方声涛的影响下,励志社的10名同学“决心参加革命活动,各用‘汉’字为号,作为隐名……称为‘十汉’”^⑪。

接着,林斯琛和刘元栋等又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在福州仓山下渡十锦祠设立藤山文明社,购置书报供人阅读,“实为革命同志与哥老会、三合会交通总汇之区”。^⑫为了进一步联系会党组织,进行反清斗争,又派人加入哥老会复明山堂。1903年便自立共和山堂,由邹燕庭、林斯琛分任正副龙头,积极与各山堂联络,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弃“复明”而立“共和”,用近代革命思想改造会党组织。

1903年,益闻社创办益闻学堂,次年改为益闻两等学堂。“教

员多由社员自担义务，而借以灌输革命理想”。这时蒙学堂也改为官立侯官两等小学堂，提倡革命宗旨，与益闻互相应和。不久，蒋筠在福州城内玉山涧办观我学校，吴杰臣等办开智学校，郑汽辰等办铺前学堂，杨子玉等办普文学堂，张海山等办西城学校，这些学堂、学校都是福州的革命摇篮。后来，连清政府所办的高等学堂及师范、法政、武备等学堂，也毫无例外地逐渐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场所。^⑨1904年夏，省城的武备、师范、大学、高等、两等各学堂学生千余人在益闻学堂集会，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推举侯官学堂学生黄光弼为总代表，林月樾副之，学生们通过组织团结起来了。

1903年春，林森等人在上海三山(福州)会馆成立旅沪福建学生会，“表面为征求同志，挽回福建权利的集会，而实则革命同志集会及办事之机关”。1906年该会在福州设支会，并在上杭街设立福州说报社，除展阅书报外，“社员每星期轮流讲演时事，借以唤醒国人”，“会中所用信笺，不用光绪年号，而用黄帝纪年”^⑩。

1905年春，在古榕书院成立汉族独立会，“所有会员皆各社团、各学校中最急进分子”，郑权、郑祖荫分任正副会长，“会章森然，违者杀无赦”^⑪。

1906年夏，同盟会福建支会成立，孙中山任命郑祖荫为支会会长，林斯琛为总干事。“遂将汉族独立会取消，全体会员依同盟会誓词，加入为同盟会会员”。这年是丙午年，福建同志为了便于联络，又创“丙午俱乐部”名称。^⑫

同盟会福建支会为了开展工作，1907年在古榕书院设桥南公益社(简称桥南社)，后迁梅坞。该社表面上办理劝葬、戒烟、施医、救火等公益事业，实际上是革命的总机关和策源地。1910年秋，它曾和立宪派共同创办《建言报》，该报“始终为同盟会福建支部所掌握，是反对清朝统治的宣传工具”。它先由同盟会员张海珊筹办和主持，继由刘通接办，“最多发行量有六七百份”。^⑬桥南社还附设体育会，由冯金荣任教练，集合仓前山英华、福音、培元

等书院的青年学生，“定期在麦园顶而训练之”。福州起义时的炸弹队、洋枪队、学生军，便是以他们为骨干组成的。⑧

1908年，革命党人在仓前山天安寺设闽南救火会，由刘元栋负责，这里常成为集会处所。英华书院祁暄等人又组织警醒社，用以联络南洋侨胞参加革命，“曾发刊警醒、民心各报，以资鼓吹”。⑨同年，连江县透堡乡“为农村自卫的需要，组织了广福会（后改称光复会）练习技击，会友计一百五十余人”。第二年，推举党人吴适做大哥，“大家开了盛大欢迎会，行摔碗杀鸡盟誓的仪式，此时会友已增至三百余人”。经吴适的宣传教育，大家表示“一致听大哥的命令，参加革命”。⑩

1908—1909年间，成立了福州社会办事处，“为指挥各社团，遇事一致行动之枢纽”。⑪

当时，清政府在福州的兵力除驻防旗兵外，主要是同光年间左宗棠带领入闽的湘军。清廷改革军制后，福建新军编为第十镇，原湘军将领孙开华之子孙道仁受任统制，日本士官学校第3期毕业生、同盟会会员许崇智为协统。1911年春，彭寿松加入福建同盟会，“寿松既湘人，又湘军将门后人，有更深渊源，且系哥老会中人”。他认为“革命须靠武力，争取武力必须从军警下手，而同盟会难于吸收会员，乃设军警特别同盟会，运动湘军”。他的侄儿彭荫祥积极配合，由寿松出任会长，“至（农历）九月初，军警全部加入矣”。⑫

省城以外的主要府县，也陆续有党人开展活动，如旅沪兴化府人黄绶、黄纪星出资设达文社于上海，印行各种新书，曾为郑权出版《瓜分惨祸预言记》和《福建之存亡》二书；又发动兴化人参加旅沪福建学生会。接着，党人回莆田城内马巷创办醒社，宣传革命。又在顶务巷设励青小学堂，在府学明伦堂办兴郡简易师范科和小学堂。1903年更成立癸卯学社。这些都是传播革命的机构。⑬

同盟会福建支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地向全省各地开展活

动：厦门同盟会主持人是新加坡归侨施明，以鼓浪屿救世医院为据点。1907年他曾介绍王兆培入会。^④ 厦门同盟会会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1910年王兆培赴台北医学校学医，吸收同班的台南籍同学翁俊明为会员，两年后台湾同盟会会员增至30余人，它的外围团体复元会则有会员76人。^⑤ 1913年领导台湾起义的罗福星则是1906年于旅途中在厦门加入同盟会的，这都说明闽台之间的亲密关系。^⑥ 泉州同盟会主持人是许卓然，领导机关设在奎章巷内，附有体育会、保安会等外围组织。^⑦ 漳州的主持人是陈兆龙，“由于禁令森严……活动并无成果”。1910年奉孙中山命从菲律宾回国的庄玉夫妇在漳州“共同筹资创办技术专修学校于乌衣巷谢氏祠堂，郑无涯也创办了普及阅书报社和普及业余夜学于南门，作为宣传革命和教育青年的机构”。^⑧ 汀州府的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康绍麟、丁仰皋等人，专程返汀配合汀郡中学教员刘家驹等开展工作。汀属上杭县各学堂也秘密传播革命思想，济南人李宗尧在稔溪乡开体育社，进行革命活动。^⑨

福建各地的有志青年陆续建立革命团体，特别是加入同盟会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通过斗争，锻炼了队伍，总结了经验，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首先是进行从英国领事馆收回福州仓前山天安寺房产的斗争。1908年，同盟会福建支会决定在福州城台各地筹设救火会，桥南天安铺也于当年4月20日设立闽南救火会，会址设在天安寺内。早在1855年，英领事曾向天安铺居民李光第等租用天安寺附近双江台后面的空旷山园两段，盖造领事署。租约中四至的界址十分明确，与天安寺毫无关系，“中间经过五十四年，双方均照约履行，相安无事”。但住在寺内的英领署职员和听差曹、齐、张三户为谋私利，竟“蒙耸英领事与救火会混争”。英领不顾事实地公然向地方官发出照会，反诬救火会“擅行侵占大英国汉府之租界……犯有极大背约之重罪”。在任的吕观察和马支司一味迁就，出面劝导救火会暂时迁离天安寺或更换名称，以缓和英领的逼迫。

主持救火会的中坚分子是同盟会会员，他们既婉词辩护，又将前后租约绘成图说，呈请有关部门派员履勘，并联名向外务部申诉，指出“以福建之公产，办福建之公益”是合情合理的。当地报纸不断将交涉情况及时披露，而救火会又把全案经过印订成《福建英领事混争天安寺纪实》寄往省内外，请求援助以争回国权。

上海环球学生会派陈丙台为代表来闽协助，省外各福州同乡会也函电交驰，以作声援。福州各社团特别是青年学生、码头工人及商店店员都群情激奋，以罢工、罢市来推动政府进行强硬交涉。全城群众情绪激昂，如决江河，不可遏止。英国驻华公使闻讯，不得不派麻穆勒参赞来闽，会同闽臬鹿廉访偕洋务会办林和叔观察勘办。在事实面前，麻穆勒不得不承认确有侵占行为，并据实报由英公使电令驻闽英领承认“闽南救火会以闽人公产办地方公益，毋庸迁徙”。一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之久的轩然大波，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在清代对外交涉案件中极为罕见的。④

其次是抓住两位福建籍留日学生蹈海事，大造舆论以发动群众。福建师范学堂学生陈海鲲于1903年赴日本留学，他深痛庚子以来国事日非，过沪时与林森等相处数日，对国事忧愤已甚。当舟次马关时，思及《马关条约》，触景生情，疾首痛心，毅然蹈海自尽。福州人陈天听当甲午战败时，曾愤而欲拔剑自刎。1908年5月，他在日本留学法政毕业，乘日轮“博爱丸”回国，听某朝鲜人谈及日本对华的种种箝制，便拍案而起，对在座一日本人叱曰：“我不能坐视日本对华侵略，你能杀我则已，不然请与我同死。”要拉其同往船头，日人绝衽而逃，天听即蹈海死。

在日本的福建留学生为二陈召开了追悼会，林觉民用一昼夜时间代陈天听写了一页慷慨激昂的绝命词，陈承泽草拟了大会宣言。1911年春，同盟会福建支会在仓山泛船浦广东会馆为二陈补开追悼大会，彭寿松剪下发辫附挂挽联上，此次追悼，影响颇大。⑤

再次是海内外福建籍革命党人对辛亥广州黄花岗之役的巨大贡献。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等人商议，以“前仆后继，无少馁却”的精神，决定卷土重来，组织先锋队，在广州再发动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十路大起义。福建留日学生闻风而动，议定由林文赴香港参与筹备，林觉民回福州准备响应，二林同船抵香港。嗣黄兴主张取消响应计划，在广州全力以赴，林觉民遂依林文建议回福建召集志士赴粤。经过同盟会支会的动员，闽籍志士40余人(包括连江光复会成员20余人)在林觉民带领下分两批由马尾乘船出发，所用旅费是由闽籍同盟会会员王孝总和陈懋复到台湾请林薇阁应急募捐2000日元解决的。^⑤

方声洞原计划留在东京接替林文的工作，但他不愿错过参加起义的机会，借运送弹药赶到香港。他的哥哥声涛、姐姐君瑛及两位嫂嫂曾醒和郑萌，都参加起义准备工作。起义前夕，林觉民和方声洞都给父亲、妻子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绝命书。这次起义未能按原计划十路同时发动，连名义上的四路也没有实现，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冲入了总督衙门，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失败。方声洞当场牺牲，林觉民受伤被俘，在法庭上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说，然后从容就义。^⑥后来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留有姓名的福建籍烈士便有19人(其中连江9人)。近年经福建省博物馆调查考证，牺牲的闽籍志士应不少于23人，生还的也有十多位。^⑦福建革命青年在这次轰动全国的起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闽革命同志既痛亡友，益伤国事，决心继承烈士遗志，以促革命成功，他们派林斯琛赴沪，访谭人凤、陈英士等筹组南部机关。闽藩尚其亨见彭寿松锋芒毕露，“欲以利禄诱之”，介绍他去汉口找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实际上

是想借刀杀人。彭赴汉后却“与张振武等取得联系，旋向端方托词回闽接着。即从事运动军队……又运动哥老会各山堂联合为一”。武昌首义震动全国，寿松即偕李质文赴上海有所商议，质文曾学制手掷炸弹，二人旋即返闽。因财力奇绌，影响工作开展，斯琛向总部电借10万元，10月下旬汇到，于是革命进入发动阶段。⑤

福建新军统制孙道仁对革命初甚犹豫，经斯琛托洋行买办蔡展庞通款，孙见全国形势急剧变化，军队几乎全部站到了党人一边，而旗人又对自己产生疑忌，不得不顺从。11月5日，郑祖荫、林斯琛等代表同盟会邀请孙道仁至闽江下游夹板船上研讨起义事宜，协统许崇智也与会。会上研究了起义计划：在城内花巷设司令部，由许崇智担任前敌总指挥，商定孙道仁担任光复后的闽都督。这样，福建新军都成了革命军。⑥

当时的闽浙总督松寿和福州将军朴寿，都是满人，布政使尚其亨则为“尚可喜的后裔，是个最滑头的官僚”。松寿颇庸碌，拿不出主意，朴寿很顽固，坚决反对革命。起义前夕，因城内居民拥挤，为减少伤亡，党人预颁告示力劝满员归降。朴寿统率捷胜营旗兵2000名，他一面力谋战备，加紧布防：总督、将军两衙门各集卫兵数百，门口另安置大炮两尊，将枪弹运贮旗人街，并装置巨炮，凡13岁以上男子每人给枪一支，弹若干发，女子每人小刀一口，“遇着革命军起事，便和他死战”；并派捷胜营分布各城门加班站岗，严加盘诘面生之人出入。一面将所积存的贵重物品装入16个大皮箱，雇工挑出城外，趁轮他去。附近的居民为求安全而跟着迁徙，城台各店纷纷停闭，旗兵粮食也开始配给。朴寿见事机已迫，决定先发制人，拟于11月9日派旗兵一营攻占桥南社总机关。又令“满绅文楷组织杀汉团一大队，兵额500名，分成两队，一为大刀冲锋队，一为汽龙洋油放火队”，企图“大肆杀戮，为同归于尽之谋”。⑦并电调延建巡防统领徐镜清率一团兵力回省垣联防。许崇智获悉，马上寻访与镜清最有交情的湖南同乡贺泽远赶赴洪山桥拦阻劝导。徐对朴寿虽有知遇之恩，但以部下多数

倾向革命，只好依从。

民军为确保胜利，除动员已加入军警特别同盟会的屏山军械库员兵偷凿墙垣，于6、7两日晚秘密输送军火外，又组织了学生敢死炸弹队、学生洋枪队、学生体育队、学生商团队、民团联合救火队、民团义勇队及闲散官兵先锋队、差遣队等。总之，敌我双方已一触即发。

10月下旬，福州流言甚多，居民一日数惊。11月初，咨议局见革命党人已掌握着主动权，立即作出决议，劝松寿让出政权。党人原定12日起事，由于“一切应备之枪弹、旗帜、印信及各种文告，早已惨淡经营，十分周备”，便决定提前于8日晚间进行。于是，桥南总机关部将盖有红色“公权”二字的白布臂章分发给起义人员，^⑨并密传口令“子女”两字，以便联系。许崇智立即严密布置，是晚率队上于山，因“于山俯瞰旗界为必争之地，敌人失此先着，已成为困守一隅之局”。彭寿松也率炸弹队登于山助战。洋枪队则由刘通等统率，分别保卫仓前山领事馆区和外国侨民。于是，朴寿狗急跳墙，派遣旗兵数百名，手持水龙灌上煤油，拥入津门楼、鳌峰坊、军门前、台江河堤及观音井一带，沿街纵火。党人除逮捕处决纵火犯外，派炸弹队数十人冲入旗汛口，掷弹袭击。

9日凌晨，随着起义号炮的轰鸣，水部城楼起火，将军衙署旋被炮弹击中。北门方向也响起繁密的枪声，民军及时占领了屏山高地及弹药库，义勇队旋即搬运弹药至于山观音阁使用。“旗兵因革军占据于山，遂皆埋伏散布在法政学堂前后及洋楼上，从楼内开炮轰击革军。于山革军亦开炮回击，战有五六时之久……嗣革军炸弹队一人直趋法政学堂掷一弹，登时洋楼倒塌，轰死压死旗兵数十人，于是旗民退溃四散”，^⑩红十字会当即整队入城，在狮子楼武圣庙内设临时医院，进行救护。

起义开始，彭寿松即率炸弹队由水部进城，直扑高节里，策应城内的民军。驻防长门统领经总机关部电邀，派兵400及大炮4

尊趁夜入城。炮兵迭向旗界射击，旗营初虽顽抗，后见界内民房起火，兵员伤亡惨重，10日晨便伪竖白旗以求缓和。当民军停火时，数百旗兵又从九曲亭蜂拥而至，5次企图抢夺大炮，但终被民军击退。

满军既败，逐渐退却在街上，民军以布旗大书“弃械者免死”悬各城门，旗兵纷纷弃械逃生。总督松寿得知失败，即微行出署，至盐道前高开榜画店吞金自尽。民军司令部将他殓殮后，新军统制孙道仁以礼祭之。15日，孙道仁又以闽都督身份为他开了追悼会。将军朴寿9日晚战败后，匿于旗员明玉家中，被敢死队员擒至司令部，“厚以饮食，处以洁室，给以役使，告以优待”。但他贼心不死，于10日趁满军抢械放火之机逃走，而重被追获，“遂循士卒之请，即行正法”。朴寿的罪状公布后，满军官兵缴械投降者更多，司令部当即发出“赈米五十石(供煮糖粥、咸粥让降兵食用)，每名先给银一元，并许妥为安插。所有投诚满官皆待之以礼，其身命财产均无损失”。^⑧旗营都统胜恩、统领德润也具禀投诚，孙道仁予以温慰，事定后资送其全家回籍。战事既定，当晚由桥南总机关部以民军司令部名义发出安民告示。福建支会选举彭寿松等10人组织参事员会负责领导工作，寿松任会长，陈承泽为秘书。

11日上午10时，同盟会福建支会全体人员，由梅坞桥南社总机关执旗捧印整队往都督府(旧总督衙门)，^⑨城台沿途居民夹道观看，鼓掌声、欢呼声和花爆声响彻一片，各公司商铺均悬旗欢祝。既入都督府，即开会议定组织军政府，由参事员会会长彭寿松往花巷司令部请孙道仁到府正式担任军政府都督。由参事员会向他授旗、授印，并宣读照会，继而孙都督宣誓。接着，参事员会又议定了各部职员人选。福州光复后，鉴于军警特别同盟会和福建支会属于并行机构，为了统一领导，经郑祖荫与彭寿松协商，决定合并，取消军警特别同盟会，而同盟会会长的职务却让给了彭寿松。21日下午正式在桥南社召开宣布联合会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临时参议院来电通知改用公历，福州于3日补行庆祝元旦典礼。21日撤销参事员会，成立政务院，公举彭寿松为总长，林斯琛、郑祖荫任副长，秘书长陈承泽，下设叙官、法制、印铸、统计4局和民政、外交、财政、军务、司法、教育、交通、警务8部。④闽军政府是由各式人物混合组成的，为首的是旧军阀孙道仁，同盟会会员占多数，还有立宪派人物。但辛亥春刚入籍的湖南人彭寿松却掌握着实权。

省城福州光复，为全省人民反清革命树立了榜样，基本上形成登高一呼、全闽响应的局面。但各府厅的情况不同，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

第一类是由都督府派员宣抚传檄而定的，有延平、建宁、邵武、福宁和福防四府一厅：福州光复后，彭寿松的侄儿荫祥自恃有功，冲入都督府索求显位，寿松请道仁畀以延建邵道之职，他便雄据延平，将所带随员均委为该道属之府县；孙道仁又派延建地方司令官统领巡防各营徐镜清至建宁府，驻扎镇署；叙官局则派张祖汉为邵武代理知事；福宁知府智格（满人）闻风连夜由后港乘船逃走，县令叶湘（南昌人）由陆路逃福州回江西，地方各界推绅士王邦怀暂代霞浦县知事，民元孙道仁委胡桂高为福宁知府；前福防厅姚步瀛得知民军起事，即欲潜逃回籍，道仁以其官声素佳，慰留其暂摄海防篆。⑤

第二类是革命党人先已夺权、都督府随即派人宣慰的，有兴化、泉州、漳州和厦门三府一厅：兴化府新军管带万国发（湘人）与党人早有联系，待机而动。福州光复时万在省城，12日晨由其弟鹏程以国发名义宣布易帜。孙道仁旋派炸弹队队长林师肇回莆宣慰，委湘人余文藻为兴化知府，万国发兼任兴化协镇，后升标统。⑥泉州党人公选林翀鹤、吴增为正副会长，在城乡募集300余人组成保安会，设营考棚，进行训练，与驻防湘勇对峙。道仁派宋渊源率部赴泉安抚，旋又开赴南安、安溪、永春等地。⑦福州

起事时，漳州镇总兵正在北京，汀漳龙道尹何成浩被文案宋善庆迫走。10日晚党人朱润卿等携带铁烟罐伪称炸弹，威胁狱吏开监尽释囚犯。次日哥老会首领张仪率队至道尹公署要清军缴械，漳州即告光复，漳州镇总兵护理刘勋因响应革命得以留任。23日都督府派刘蔚赴漳料理军事，陈培锐任漳州道，管理地方行政事宜。⑧ 厦门党人起事前，道台庆蕃（满人）和提台都已潜逃。15日，张海珊率领同盟会员和几千群众（左臂均缠扎盖有“革命军”印记的白布条），冲入道台衙门并占领之。次日军政分府成立，张海珊任统制。28日孙道仁派原鸿逵为厦门道尹，成立参事会。⑨

第三类是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复遭旧势力反攻，经都督府派员处理才扭转局面的汀州府：汀州的光复和整个汀江流域有密切关系。光复前，广东大埔县人刘家驹任汀郡中学数学教员，涂演凡在上杭兰溪乡立本两等小学任教，都积极宣传革命。汀、杭虽属山城，但早已有同盟会员活动。11月中旬大埔光复后，党人即组织民军，推举原上杭稔溪体育社教练李宗尧为司令，向汀江上游进发。18日汀州才得知省城光复，次日上杭宣布“独立”，刘家驹即发动青年学生于21日在府城竖起独立白旗。可是一批旧官吏和地主豪绅竟勾结游勇樊彪，煽动旧军人企图篡夺政权。党人急修书邀请李宗尧民军入城，驻永定公所。12月4日，樊彪等人围攻民军，巷战4昼夜，刘家驹突围求援，被杀害于水东桥上。后来仅李宗尧等少数人逸脱，牺牲者达52人，合葬于东郊苍玉洞右侧。接着上杭也发生反革命屠杀事件，劣绅们煽动地痞流氓捣乱，炮击大埔民军驻地百获堂，“被害者四十二人，伤重回家死者四人”，民军负责人童国珍（梅县人）也被杀。汀州变乱消息传到福州，都督府派刘茂森率部赴汀安抚，樊彪逃往上杭，被当地民团捕获处死，上杭匪首郑传书也被就地正法。汀、杭两县都为死难烈士召开了追悼大会。⑩

福州光复后，开智学堂学生得悉广东、浙江都组织学生军准备北伐，也发出倡议并立即行动起来，各校学生闻讯，踊跃报

名。12月20日在东岳庙报到集中，23日正式编队，除淘汰幼弱外，共400余人，编成1个大队，下分4个中队。南京陆军部长黄兴委派吴挺为福建学生北伐军总队长，加紧训练。民元1月15日，福州各界举行劳军大会，赠送学生军白布大旗1面，上写“祈战死”三字，并送“征东饼”数万块，干粮袋数百个。17日学生军整队出发，将女子北伐炸弹队(有成员10余人)改为红十字女子看护队，至海关埕码头乘船赴马尾。18日，学生军换乘“万象号”商船赴沪，转往南京，改编为南京陆军入伍生队第2营，何浩然任营长，归南京留守司令直接指挥。此后一面训练，一面警卫南京，历时9个月才奉令裁撤。^⑩

福建都督府成立后，公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了安定民心，于11月20日发表施政方针：“一切均以薪至共和为旨。”并接连两次颁发《告全闽伯叔兄弟文》，宣布“厘金及清宣统二年以前旧欠钱粮现已悉数豁免”；提倡“以节俭为宗旨，先从行政长官之薪水公费，减为至薄至轻，而每日办事时间复不能如前此之短促”，将“从前奢侈之习，无谓之费，从此革除”。^⑪

在外交方面，照会领袖领事，请其“确守中立，承认本军队为战斗团”；并“通飭各州府县教士及游历人士，即日返省，暂就仓前山居住，以便保护”；指出“所有闽口新常各海关，应暂由本都督府监督……请其一体查照。”^⑫通飭各府县“所有教堂财产以及一切物件，如有造册交地方官看管保护者，应按件点收，妥为保护”。^⑬

在内政方面，主张汉满一视同仁，相安无事，希望勿为谣言所惑；颁布八旗户籍登记暂行章程；通飭各府厅州县速将前清所颁关防克日缴销承领新印；裁各府首县及改厅州为县；主张乡村办学普及教育；为延揽贤才特设延贤馆；设立福建银号发行钞票以资流传；宣统年号小洋、银元未经备铸换用以前准一律通用；制止奸商囤积粮米抬价渔利；严禁官吏差役谋为不法并贿赂勒索；严禁私种罂粟私开烟馆；令飭下游各属严禁嫖婢恶习；福州城台内外交

通频繁，南城一门夜间勿庸关锁，其余六城暂仍其旧，通告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商民合行欢祝，通告定期举行文官考试等等。嗣又颁布了《福建临时议会选举章程修正案》52条，规定议员名额90名，由各州县选出60人，侨籍选出15人，同盟会福建支会选出15人组成(后增外省旅闽专额10人)。^④

福建都督府还转发了孙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下达的命令：一律遵用阳历，一律剪辫，各省都督府所属之行政各部改称为司，各省长官名称改归一律(称为都督)，恢复各种人权(如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并优娼隶卒等)，官民称呼勿沿旧习(将大人、老爷改称先生、君)，劝禁缠足，等等。^⑤

总之，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为巩固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福建都督府也以新政权的姿态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一时福建的面貌和全国一样焕然一新，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福建人民的心中。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因此，随着孙中山的让位和袁世凯的窃国，福建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①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第163—164页。

② 严臻，《福建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杂捐类》第3—19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④ 《中外日报》，1907年9月28日；1908年9月2日；11月29日；1905年4月26日；1907年9月26日；1905年5月15日；7月31日；7月23日；8月7、29日；1906年2月24日；3月2、4日；1904年5月9日；1908年9月18、19日；1909年8月1日；1905年5月31日；1908年5月27日；1909年6月16日。

⑥ 《福建通纪》卷二十，《清十》第35页。

⑦⑧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

⑨ 张遵旭，《福州及厦门》1916年版(下)第33页。

⑩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58页。

⑪ “内田外务大臣致土谷驻福州副领事电”1912年3月7日第3号，见《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84页。

- ①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第45册。
- ②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380—391页，第388—389页。
- ④ 《申报》1905年7月20日。
- ⑤ 《左海公道报》卷一第13期第16页，《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391页，《福州文史资料》油印试刊本(三)第59—61页。
- ⑥ 陈遵统等编《福建编年史》(油印本)第十册。
-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 《福建辛亥光复史料》，1940年福州建国出版社印行。
- ⑱ 郑贞文：《辛亥革命与福建党人》，见《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第37—38页。
- ⑲ 刘通：《记建言报》，见同上。
- ⑳ 吴适：《参加辛亥广州起义及被捕经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七)，第234—235页。
- ㉑㉒ 刘通：《辛亥福建光复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57—458页。
- ㉓㉔ 朱焕星、林君汉：《辛亥莆人革命事略》，见《莆田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4页。
- ㉕ 王兆培：《厦门辛亥革命的一个据点——救世医院》，见《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
- ㉖ 陈三井：《罗福星暨台湾志士与辛亥革命》，见台北版《传记文学》1981年4月号。
- ㉗ 罗秋昭：《罗福星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出版。
- ㉘㉙ 《泉州光复史事拾零》，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75—480页。
- ㉚㉛ 《辛亥漳州光复前后》，见《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20—122页。
- ㉜㉝ 《辛亥革命在汀江流域》，见《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 ㉞ 《外交报汇编》第21册226期第19页；郑贞文、林家骥：《清末福州人民反帝斗争史话》，见《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14页。
- ㉟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开国战史》上册第396页，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3月出版。
- ㊱ 《林觉民》、《方声洞》，见《民国人物传》第四卷。

⑤ 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邓华祥、郭文德：《黄花岗起义烈士知多少》，见《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⑥ 刘通：《福建光复的回忆》，见《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

⑦ 《福建辛亥光复史料》第42页。但《史料》认为孙道仁在会上由彭寿松主盟加入了同盟会。郭公木说：“参加革命与加入同盟会是两回事。我访问过同盟会元老刘通，据说，孙氏加盟是在新政府成立以后。”此说比较可靠。（见《辛亥福州光复几个问题的调查研究》，刊于《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据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见台北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福建光复》）所述，商议孙道仁任闽督时，彭寿松持异议。渊源“担任起草闽军都督府大纲，参照责任内阁制，于都督府内特设参事委员会，劝彭任会长，借以调济”，但寿松野心不死，“当起义时，渠所组之便衣队协同活动者，均缠有白布臂章，墨书彭都督三字，人所共见”。

⑧ 郑权：《福建光复史略》，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杨琦：《福州于山战役》，见《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

⑨ 据《福建辛亥光复史料》云：“‘公权’者汉族独立会发号施令之印信也。……如有通信召集，但书日时及地点，而印以小章，则会员便能应召而至。”光复时党人“各缠白布臂章一条，而臂章之上，均印有红字‘公权’，大盈寸，是‘公权’两字不独行用其名，而且行用其实矣”。而桥南总机关部则是同盟会福建支会的总机关。1912年4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后，南返广东，曾路经福州，20日上午至桥南社少憩，亲书“独立厅”3字（见郑贞文：《孙中山先生来闽》，刊于《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福建省博物馆今尚保存着复制的横匾。

⑩ 张铭绅：《中华共和开创史》稿本，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⑪ 郑权：《福建光复史略》。

⑫ 据《福建辛亥光复史料》载，“闽光复时所用旗帜，以红色为地，中嵌十八星则以青绒为之，取十八省同时革命意也”，“都督印信长五寸半，阔四寸，中刊‘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之印’十二字”。

⑬ 《福建辛亥光复史料·光复前后各府县之情形》，《霞浦文史资料》第五辑第12—13页。

⑭ 丘庶兢：《厦门辛亥革命前后》，见《福建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14—116页。

⑮ 林炳、杨琦、郭叔敏：《福建学生北伐军》，见同上第59—68页。

⑦ 郭孝成，《福建光复记·附录福建之外交文件》，见丛刊本《辛亥革命》(七)第283页。

⑧ 《中华民国开国九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福建光复·重要军政措施》。

⑨⑩ 以上政令文件，都见于民国元年春季各期《福建公报》(藏于福建省图书馆)。

烽火遍南粤 欢跃迎光复

——记广东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

丁身尊

广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生长在这里，并在这里进行过长期的革命活动，传播了民主革命的种子，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反清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之役，1900年惠州之役，1907年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等），唤起了群众的觉醒，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展，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起义烽火遍南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爆发了，革命形势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①，各省纷纷独立响应，迅速在全国掀起革命的高潮。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热烈地投入响应武昌起义的斗争中去。

同盟会南方支部（1909年成立，设于香港，胡汉民为支部长）决定在广州和东江、北江、西江及韩江等地区组织5路武装起义。广州地区由胡汉民、朱执信负责；东江地区由陈炯明、邓仲元负责；北江地区由何克夫、徐维扬负责；西江地区由苏慎初

丁身尊，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负责；韩江地区由姚雨平、张醴村等负责。但事变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这一计划部署。

10月25日，黄兴派同盟会员李沛基等炸毙由北京来粤上任的清廷广州将军凤山，全城清吏震栗，宣布戒严。10月30日，王兴中、叶玉山、张旋乾等起义于新安（今宝安县），清游击吴敬荣及新安知县投降，新安县遂告光复。11月5日香山县（今中山市）前山新军营长、同盟会员任鹤年率领新军起义，香山亦告光复。并分兵向广州推进。

陈炯明和邓仲元于11月1日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他们组织了一支民军叫“循军”（惠州为古循州），陈任总司令，邓任参谋长。这时群众激于推翻清廷的革命热情，旬日之内，参加民军即达数千人，除部分枪支武器外，其余使用戈矛、铁棍、扁担、锄头等不计其数。另外，同盟会员王和顺也在东江组织民军“惠军”起义，拥众数千人。起义民军直扑惠州城，同清军展开激战。初时，驻守惠州的清军陆路提督秦炳直仍想顽抗，后慑于民军声势浩大，且驻守惠州城外飞鹅岭的清军巡防营洪兆麟部又反正，只得于11月9日献城投降。秦属下的湘军全部由陈炯明改编。仅半月之间，惠州所属各县即先后光复。

与此同时，广州附近及各地民军纷纷起义。如张禄等起义于广州近郊石井；谭瀛、胡汉贤、何吕侠等起义于广九路；黄明堂、杨万夫、谭义等起义于江门、新会；陆领、陆常、周康、冯扶汉、张炳、邓刚、麦锡、梁璧联、麦梁等起义于顺德；陆兰清、陆兰福、黎炳球、黎义等起义于南海、三水；李福林、李湛、李雍等起义于番禺；林君复、郑彼岸、莫纪彭、何振等起义于香山；廖竹彬、关仁甫、石锦泉、钟伟生等起义于惠州、海丰、河源、东莞；郑昭杰等起义于石龙、增城；张醴村、孙丹崖、谢鲁倩、陈励吾、梁金鳌等起义于潮汕；徐维扬、龙裔楨、冯国威等起义于北江；萧文赏、张蔚然等起义于大埔；温种远、李思唐等起义于梅州；顾启汉、熊长卿等起义于肇庆；苏慎初起义于高州；彭瑞

海、陈冠民、彭中英等起义于化州；唐浦珠等起义于钦州、防城，等等。^②总之，当时民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省各地，成为燎原之势。民军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中群众力量的表现，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在广州城内秘密设立指挥机关，以指挥和联络民军包围广州。于是，广州附近各县及东江、北江民军，在起义后即直逼广州，对广州形成包围之势。

一贯以血腥镇压革命著称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在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面前，初时仍想负隅顽抗，继则企图利用某些封建士绅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搞广东“和平独立”，由他任都督，龙济光任副都督，把持广东政权不放。后“张鸣岐闻革命军（即民军）声势浩大，微服遁走，同城司道府县以次文武各官员，均先后遁走”^③。龙济光也“力辞不就”，不敢窃据副都督职。接着，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于11月9日被各界人士推举为广东都督，由港抵穗就职，广东遂告光复。

过去人们喜欢用“兵不血刃”、“和平独立”来描绘广州的光复。事实上，如果没有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没有各地民军的广泛起义，并对两广的政治中心广州形成包围之势，广东地区的清廷统治集团就不会分崩离析。其中最突出的是一贯以残酷镇压革命而臭名昭著的刽子手水师提督李准，鉴于大势已去，向革命党输诚反正；统制龙济光则表示“无可反对民军之理由”，采取中立态度。在此情况下，张鸣岐乃畏惧弃职潜逃，藏匿于沙面英国领事馆，然后逃往香港。所以，广州的光复，表面看来是“兵不血刃”，实质上是革命武装起义的直接结果。当然，省城广州的光复，又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民军的起义和驻军的反正，加速了各地光复的进程。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多数地方的光复是顺利的，但也有不少地方出现了革命党人遭到镇压的事件（如革命党人郭典三在揭阳率起义军迫清军巡防营缴械时，被清军反扑而牺牲；阳江革命党人谭宝桓、庞爱群、莫会侯率起义军进攻清

朝游府衙署，被清军巡防营统领符开明率部反包围，起义军寡不敌众，谭、庞、莫3人及起义军100多人壮烈牺牲，符开明还残酷地将谭、庞、莫3人首级斩下泄恨，等等），更说明了革命成果的取得是以流血牺牲作为代价的。

从各地民军的广泛起义，到包围广州，再到广东光复，大批民军进驻广州（约五六十股，共10多万人），反映了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

人民群众以极其高涨的热情迎接了广东的光复。广州“城厢内外各商店，均高揭三色国旗，有书‘新汉万岁’者，有书‘民国军万岁’者。爆竹如雷，欢声雷动，剪发者尤众。……五羊城中，焕然一新世界矣！”^④其他地区，均普遍呈现出欢庆高潮。

11月17日，广东成立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军政府，除由胡汉民任都督外，还由各团体代表会议推举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军政府设8部1处：蒋尊簋、魏邦平长军政部，李煜堂、廖仲恺长财政部，伍廷芳、陈少白长外交部，黎国廉，伍籍磐长民政部，王宠惠、汪祖泽长司法部，王宠裕、利寅长实业部，梁如浩长交通部，丘逢甲长教育部；朱执信等17人组成枢密处。

军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内容包括了“废除苛捐杂税”、“严禁烟赌”、“兴办教育”，等等。

军政府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安定社会秩序两大问题。为此，军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由于张鸣岐等清吏潜逃时，将省库囊括一空，他还预言：“革命党即得广东，不能守三日也。”故光复之初，广东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形势非常严峻。政府初建，百废待举，在在需款，且大批民军云集广州，给养浩大，还要供应北伐军军饷，等等。因此，军政府不得不把解决财政问题列为“第一要政”。当时任都督府总参议兼财政部副部长的廖仲恺，协同李煜堂成立筹饷局，筹得港币8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继又召集省城各行业商会首脑会商，力促各商界早日恢复营业；确定货币流通办法；整顿各项厘捐税

收，并将原清政府粤省官局库存纸币1200万元，另盖财政部印发行，取得商会的承认通用；还发动募捐（军政府成立仅二月，华侨及各界人士即捐款达74万多元）。这些措施，解决了军政府财政困难，使局势得以稳定下来。至廖仲恺解职时，省库收支还略有节余。

光复初期，革命热情与动荡局面交织一起，鱼龙混杂，斗争尖锐复杂。反革命组织阴谋推翻新政权，黑暗势力乘机进行破坏。一时，广州社会秩序混乱，盗匪横生，劫杀案频发。面对这种局面，胡汉民上任之初，即任命陈景华为民政部长兼省会警察厅长。陈景华是有魄力的华侨革命党人，他接任之后，首先建立了一支有素质、有效率的警察队伍，采取严厉手段，打击和镇压了穷凶极恶的“百二友”、“救世军”等抢劫集团和反革命组织，从而使广州社会治安在短期内迅速好转，安定了社会秩序。他还采取革旧布新、兴利除弊的措施，如拆除广州市内街闸，便利交通，美化市容；把街头夜间照明油灯统一改装为电灯，使夜间大放光明；严禁娼妓；创办女子教养院和孤儿教养院，收养了数百名不堪受虐待的婢女、侍妾、童养媳、尼姑、幼妓和无父母抚养的孤儿及受拐卖的儿童等，分班受教习艺；建立户籍制度，开始普查人口，等等。他上任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这个非常时期的省会，办理得井井有条”，呈现出“地方平静，百废兴举”的气象。

12月16日，建立了临时省议会，成为“代议政治”的主要象征。在120名议员中，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其中同盟会代表20名，军团协会代表21名，华侨代表12名，师生代表9名，“自治团”代表1名，各地区代表57名。并规定在120名议员中，女议员应占10名。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且在当时全国也是唯一的。临时省议会提出了不少福国利民的建议，对政府工作也起了监督、促进作用，反映了一定的民主精神。

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军政府，并寄以深厚的期望。海外华侨

也从人力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社会风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如人们自动地剪除发辫，废止跪拜，鄙弃缠足、纳妾等陋习，反对迷信，热衷于兴办实业，等等，显示了革命运动带来的变革和新气象。

广东北伐军的丰功伟绩

广东光复后，军政府即组织广东北伐军出师北伐，战功显赫，为全国辛亥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篇章。

当时全国革命高潮已形成，东南及西南各省次第光复，但清朝政府仍在作垂死挣扎，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由袁令其亲信冯国璋率北洋新军南下，攻陷为革命军所占的汉口、汉阳，情况危急；而苏浙联军又屡攻南京未下，故武汉和上海方面迭电广东出兵支援。广东军政府乃决定组织广东北伐军北上，以老同盟会员姚雨平为总司令，开赴京沪一带，支援长江下游各省的革命斗争。

广东北伐军是一支兵精、械利、战斗力强的劲旅，在当时各省北伐军中首屈一指。这支军队共约8000人，以光复时起义的新军、防营为骨干，加上民军、华侨及学生等组成。编制分两旅辖4个团及机枪、辎重、工程、卫队各1营；还有学生地雷队、华侨炸弹队（后改为营）、宪兵队、卫生队等各1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女同盟会员宋铭黄等20多人组成了北伐女子敢死队，亦随军出发。装备有：退管炮18尊（当时广东全省只有54尊，皆系德国制造的最新式大炮），步枪子弹300万发，机枪子弹50万发，炮弹一万余发，实力颇为雄厚。其重要官佐除总司令姚雨平外，还有：副总司令马锦春、参谋长陈雄洲（到南京后改由张文继任）、高级参谋林震（后调任师长）、副官长李民雨、秘书长叶楚伦、经理部长邹鲁、军需部长姚海珊、管理部长姚右军、军法部长陈耿夫、军医

部长陈任梁，以及旅长张我权、隆世储，团长张桓杰、吴庆恩、曾伟范、张定国等。

广东北伐军于1911年12月8日由广州分3批乘船北上，军威雄壮，曾发布誓师檄文，表示要发扬太平天国运动“洪军举旗，蔚郁风云；赤符所指，涤荡胡氛”的革命传统，指出当时革命形势虽已“义师四举”，声势浩大，“然北未捣幽燕之巢，南未歼汉襄之贼，吾将士岂能戢矢镞剑，不与中原豪杰共竞斯功耶？”表现了北伐军将士的战斗决心和高昂的革命精神。

广东北伐军由海路抵达上海后，当时南京已告光复，乃改乘火车进驻南京，驻扎于石碑亭巷协统衙门待命。

12月25日，孙中山由欧洲回抵上海，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由南京到沪欢迎。孙中山向姚询问广东北伐军兵员及装备情况。姚据实以告，并要求补充枪械弹药。孙中山说，革命军队有这样的枪弹实力，已甚充裕，不需要再补充，并列举欧美各国革命军以少胜多的战例予以勉励。还指示姚要督率士卒勤加训练，使皆能弹无虚发，战无不胜。孙中山这些鼓励和指示，给广东北伐军以莫大鼓舞。

12月29日，17省代表举行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此之前，南北双方已于上年12月18日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了“南北议和”首次会议。这时被苏浙沪革命联军逐出南京，败退至徐州的清军江南提督张勋，在清军倪嗣冲部的配合下，违反“南北议和”中的停战协定，沿津浦路南犯，大肆烧杀淫掠，严重地威胁着南京革命政府的安全。孙中山乃下令北伐，由粤、浙、镇、淮诸路革命军组织联军，分兵3路北伐。中路由广东北伐军担任，沿津浦路北上进击清军，设总司令部于长江北岸蚌埠车站，以林震为前线总指挥。

1912年1月25日，张勋由徐州以火车运清兵2000余人突袭固镇车站。时守卫车站仅革命联军镇军部100余人，虽据险抵抗，但张

勋部从两翼包围，而联军援军未至，镇军寡不敌众，只好撤退，固镇遂为张勋部所攻占。

27日，广东北伐军和浙军赶到，部署反攻。28日晨，双方激战于三里湾。张勋部用大炮猛烈轰击。广东北伐军英勇作战，以大炮及机枪密集还击，使张勋部伤亡惨重，慌忙挤上火车北逃。广东北伐军又击毁其机车头，伤毙敌甚多，并击毙敌军1名标统。张勋仓皇败退北甯，退据宿州。广东北伐军及友军遂攻克固镇，获出师初战大捷，缴获敌人大炮1尊及枪械一批。

接着，广东北伐军乘胜追击。2月3日，与清军激战于宿州之东。时清军除张勋部二三千人外，尚有北洋军五镇步兵4营、炮兵1营、骑兵两队，以及山东巡防军千余人参战。清军在装备上，尤以骑兵和炮兵占优势。战斗开始时，清军先用骑兵向粤军两翼冲锋，妄图将粤军压倒。粤军用机枪密集扫射，使敌骑兵纷纷坠地。清军继用野炮进行轰击，由于野炮射程远，不利于近战，不能发挥威力。粤军士气旺盛，频频冲锋前进，且以射程较近的山炮助战，使敌军伤亡累累。是役自拂晓激战至下午3时，清军大败，退出宿州。粤军乘胜北进，追至徐州南面之夹沟。计是役歼敌千余，俘虏数十人，收降兵百余人，缴获军械马匹甚多。这是广东北伐军出师以来第二次大胜仗，也是最激烈的一仗，是役使清军闻风丧胆，惊呼“民军（即革命军）不怕死”。

经此一役之后，张勋派徐州知府陈毓崧前来乞和。由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和浙军总司令朱瑞等电示孙中山后，要求清军退出徐州100里以外，始允议和。但张勋仅答应由夹沟退至曹庄，以夹沟、曹庄间成为中立地带，妄图以此作缓兵之计。2月10日双方代表谈判于符离集车站。11日和议破裂。广东北伐军复挥师北进，一举占领徐州。张勋败走济南，复北走兖州。粤军追至韩庄（在苏鲁交界处，距徐州约50公里）而止。

广东北伐军出师以来，连获固（镇）、宿（州）、徐（州）三战大捷，英名远播，威震京津，有力地拱卫了南京革命政府的安

全，给清政府以有力的打击。清廷感到大势已去，遂于2月12日宣告清帝逊位，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

广东北伐军虽然连战皆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并未能鼓舞革命党人把北伐进行到底的决心，因而未能挫败大野心家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的反革命阴谋。这是由于革命党人软弱和妥协的结果。

孙中山是较为坚决主张北伐的。他于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4日即电令广东代都督陈炯明继续出兵北伐，在电报中指出：“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民军，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⑤ 他并表示：和议一破裂，将亲统大军北伐。并与陆军部长黄兴拟订了6路进军，直捣北京的北伐计划。^⑥ 但当时形势已不容许这样做了。因为早在他归国途中，南北议和已经开始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和议更在加速进行。当时同盟会的领导层中，存在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清帝退位，君主专制制度废除，大功便告成了。他们对袁世凯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立宪派人更是推波助澜，鼓吹让位给袁世凯。帝国主义则多方威迫利诱，以促成袁世凯上台。这样，“非袁莫属”的妥协空气便占了上风。孙中山在内外交通的情况下，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当然，他初时对袁世凯的反革命本质，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于是，广东北伐军在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便退驻南京，更名为讨虏军，以后又改编为第四军（辖第二十二、二十四两个师），由姚雨平任军长。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撤销，改设南京留守府，由黄兴任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和改编驻守的各省北伐军队。由于财政经济极为困难，军费支绌，拟借外债，而外国银行团又提出苛刻条件，乃由黄兴等发起国民捐，以资救济。广东北伐军自军长姚雨平以下将校均参加减薪捐饷。此举虽表明革命将士为国分忧的高尚风格，但究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则借口财政困难，不发给南方革命军军饷，

以迫使革命军队解散。革命党人没有看透袁世凯的阴谋，便自行裁兵缩编。广东北伐军本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本已有成议，岂知又为陈炯明所阻挠而中辍”^⑦。姚雨平乃于5月12日首先发出裁军节饷的通电，决定解散广东北伐军。黄兴及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等革命党人均表示赞许。胡汉民于5月16日致南京姚雨平电报中说：“裁一分兵，即少担一分饷，亦可少借一分债。……若能全师遣散，解甲归田，不特为吾粤军人之望，且功成身退，高风所在，抑亦全国观感所关。”^⑧可见当时革命党人进行裁兵缩编，一方面固然出于财政困难所致，另一方面亦存在着“功成身退”，认为革命已告成功，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幼稚思想所造成的。而袁世凯等则一方面不断加强其反革命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则对革命党人自行削弱革命武装感到高兴，假惺惺地对革命党人裁兵缩编予以赞扬。如同年5月23日袁的亲信、陆军总长段祺瑞致电姚雨平称：“公首倡解甲之议，以身作则，敬佩无涯！”可谓老奸巨猾之至。

广东北伐军在南京解散后，当官兵们在下关出发回粤时，孙中山亲到下关送行，同军官一一握别，并赠送每位军官旅费50元。表现了革命领袖对北伐将士的关怀和惜别之情。

当时姚雨平等北伐军将领考虑到“炮兵训练实不容易，乃保留炮兵一营，调回广东，詎知该营回抵虎门时，即被陈炯明派兵缴械”^⑨。一支革命劲旅，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落得如此下场，实属时代悲剧。

广东北伐军自出师以来，阵亡将士20人，伤病而死者34人。1912年3月，将上述54名烈士葬于南京莫愁湖畔，名曰建国粤军烈士墓。孙中山亲题“建国成仁”四字勒石。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作有一联，联曰：“渡江军子弟八千，淮上收功，破虏永除专制政；流血健儿二十，国殇不死，雄风长在莫愁湖。”^⑩

革命党人的严重错误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广东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而民军则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威武雄壮的角色。但曾几何时，民军即遭到革命党人的解散和镇压，并从此受到许多诽谤之词。这真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据辛亥革命老人李朗如、陆满的回忆说：“广东各地民军的成分，据我们了解，绝大多数是农民，尤其是以被地主压迫和被剥夺了土地的贫雇农占多数，也有部分小手工业工人，或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工人，因为生活困难而参加了民军的。总之，参加民军的人，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劳苦大众。此外，还有一些是从清军起义转变过来的。”^⑩从这一忆述中可以看出，民军的成分，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这些人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同盟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领导下，觉悟起来，纷纷投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革命主力军的作用。

过去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说民军组织纪律性差，扰乱社会治安。这实际上是对民军的否定。尤其是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以此对民军进行攻击，更是不遗余力。另外，更多的人则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以致形成长期以来对民军的偏见和误解。

事实的真象如何呢？当时“各路民军，自广东宣布独立后，先后进入广州，分驻城厢内外。……与居民杂处，而对居民甚少骚扰。他们军饷，由政府发给，每名每日二毫。”^⑪胡汉民回忆说：“民军当时号称十万，外报造谣，遂若全省扰攘，不可向尔。然余与竞存（陈炯明）常摒去卫士，徒步而行，执信、毅生等，则始终无卫随之人。斯时之秩序，盖以革命之空气为之护持。民军之至不谨者，亦无公然违令作恶之事（石锦泉最蛮悍，尝欲毁

拆城隍庙，谓以辟迷信，商民大哗，陈景华（警察厅长）以都督令制之，即止。又屡次搜捕私藏军器，及满清旗帜军服者，皆令解送陆军军法处，分别处置。于军政府之行政用人，更不敢有所干涉请托。故当时商民凛凛（然）于民军，而后滇、桂军披猖于粤东时，则皆叹曰：‘民军不易及也’。”^⑩由此可见，民军进城初期，是颇富有革命朝气的，一般纪律是良好的。所以当时广州的社会秩序是安定的。如都督胡汉民、副都督陈炯明敢于“常摒去卫士，徒步而行”，就是最好的证明。及至1923年初，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入粤后，滋事扰民，包烟开赌，截留捐税，人民怨声载道，对比之下，皆说“民军不易及也”，这又是最好的证明。

至于当时民军首领中被称为“最蛮悍”的石锦泉，对他应如何评价呢？他搜查私藏军器及清朝的旗帜军服，应属于打击反革命势力的行为，而且把收缴的东西送军法处处置，这是无可非议的。他以破除迷信为由，欲拆毁城隍庙，引起商民不满，当属过火行动。但在当时革命空气弥漫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为数众多的民军中，也混进了一些品质恶劣、为非作歹的坏人，给社会秩序造成某些混乱现象，但只是民军的局部问题。另外，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生活趋于腐化，挥霍享乐，这也是不良的倾向（但这不光是某些民军首领，而是相当多革命党人的普遍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应该给以教育整顿的。

总的说来，民军是同盟会领导和组织下的主要革命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广东各地的光复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主要方面。但由于民军受小生产者阶级地位的局限和影响，又带来了狭隘性、散漫性和保守性的一些缺点，这是次要方面。抓住民军的一些缺点来否定民军的革命作用，是错误的。

解散和镇压民军，是革命党人的严重错误。在这方面，陈炯

明成为突出的代表人物。

陈炯明夤缘时会，被革命高潮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他是靠搞民军起家的，但当他当上副都督和代理都督，掌握了军政大权之后，立即排除异己，用武力解散和镇压了其他民军，开始暴露他的政治野心家面目。

1912年2月26日，陈炯明扣留了由胡汉民任都督时期代石锦泉等民军首领向日本三井洋行购买的一批军械。石表示反抗，陈遂命令其亲信乘夜将石逮捕枪毙，并镇压解散了石字营民军。

接着，陈炯明以陆军巡逻队进入广州东堤、南关王和顺“惠军”地盘，与“惠军”发生争执为借口，派兵4路包围“惠军”驻地，激战1昼夜，将“惠军”加以解决，毁坏了不少民房，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后各路民军除驻广州河南的李福林6营福军外（因朱执信的坚持而保留下来），均遭到解散。计当时仅广州一地被解散民军即达9万余人。

至4月初，陈炯明又以枪杀石锦泉的手法，逮捕和枪杀了老同盟会员、杰出的革命宣传家、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引起在粤同盟会正直同志的愤慨。潘达微专为此事写信责问陈炯明。《广州公言报》及《佗城独立报》两报为黄世仲、王和顺鸣冤叫屈。陈炯明则变本加厉，封闭该两报，并把《佗城独立报》主持人陈听香逮捕枪毙。^④为此，广东省临时议会曾电中央弹劾陈炯明违背临时约法中有关人身、言论自由等规定，“剥夺人民生命，箝制言论自由”。陈炯明不服，极力为自己辩解，反谓陈听香“伪造事实，直是依附叛军，鼓众煽乱，非以言论受罚也”。极尽强词夺理之能事。^⑤

另外，陈炯明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如派人对光复连阳的“复汉义军”进行围剿，委派光复时反正的南韶连总兵吴祥达（吴是镇压庚子惠州起义的刽子手）为潮梅绥靖督办，密使吴在汕头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当场惨杀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又派人捕杀

光复大埔县有功的三合会首领温阿拱，等等。就连为革命立下了卓越功勋的广东北伐军，在“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后，本拟调回广东，也为陈炯明所阻挠而不得已予以解散，其中炮兵营回到广东即遭陈炯明派兵缴械。但对清朝的爪牙、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龙济光所统率的“济军”，则“优礼有加”，照旧加以保留，让它安稳地驻扎在广州的观音山（即越秀山），并亲自到观音山拜会龙，委任龙为副绥靖经略，把龙引为心腹，“每对人言，有我陈炯明三字，龙济光就服从了”^⑥。随后又让龙把这支反革命军队带去广西梧州，以致“二次革命”时又打回广东来。

陈炯明这种镇压民军、残杀同志的行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第一、使广东同盟会组织因此发生分裂。如当时被通缉和被排挤的民军首领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廖竹彬等，聚集于澳门，拟组织“扶正同盟会”，拥孙中山的哥哥孙寿屏为首领，以对抗陈炯明。事为孙中山获悉而及时加以制止。但从此这一分裂状况无法弥合，大大地削弱了同盟会的力量。在“二次革命”讨袁中，王和顺甚至一度跟随黄士龙投靠袁世凯，助袁分化瓦解广东陆军。王和顺这一变节行为，当然应受谴责，而陈炯明也不能辞其咎。

第二、陈炯明口口声声说解散民军是为了“保全治安”，但实际上，“民军被遣散后，各携自备武器回到家乡，有的因地少人多，无从耕作，生活发生困难，迫得又变为土匪的占了大多数，因而弄到遍地皆匪，各属治安都无法维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河道纷歧，易于散集藏匿，更为猖獗。这是陈炯明为排除异己，扩充个人势力，遣散民军所造成的”^⑦。及至1912年4月底胡汉民由南京返粤复任都督，鉴于全省匪风炽盛，又设立了全省总绥靖处，以陈炯明为总绥靖经略，并在全省分4区设置绥靖处，以剿办盗匪。而在这些盗匪中，不少就是被解散的民军，可谓自食其果。

第三、陈炯明解散和镇压民军，严重地打击了人民群众在辛亥革命高潮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积极性，是造成“二次革命”广东讨袁（世凯）缺乏群众基础，因而迅速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广东是国民党在南方各省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省份，光陈炯明就拥有两师一旅的正规军，此外还有警卫军和地方部队。但由于陈炯明不赞成孙中山、黄兴等发动的讨袁运动，不作任何军事部署，且解散和镇压民军之后，失去了群众力量的支持。所以陈炯明虽为党人所迫于1913年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以响应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和黄兴在南京举兵讨袁。但当龙济光奉袁世凯之命，于7月30日率“济军”三千由梧州向广东进攻时，陈炯明在西江的防线即不战自溃。驻肇庆的肇军统领李耀汉降袁，宣布脱离陈炯明，就任袁任命的肇阳罗镇守使。当时，由琼崖镇守使任上回广州的邓仲元，拟在三水至花县一带部署抵抗，以保卫广州，卒因陈军高级将领已为袁派人所收买，军心哗变，无力挽回。至8月4日，陈炯明手下的第二师师长苏慎初宣布取消广东独立，炮轰都督府，自立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一闻炮声，即仓皇偕副官黄强，携带巨款避居于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在法国神父的庇护下，乘坐法国炮舰逃往香港，然后转赴新加坡。苏慎初只做了3天都督，就被部下推翻下台，由独立旅旅长张我权继任都督。张也只做二三天便下台了。11日龙济光的“济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便占领了广州。广东的“讨袁”就这样失败了。事后孙中山总结广东的失败时说：“初则陈炯明利用袁氏之力，夺胡汉民之位，其后钟鼎基欲与陈争都督，苏慎初又与钟争，张我权复与苏争，纷纷相争相杀，而龙济光乃得收渔人之利。是我党之败，自败也，非袁败之也。”^⑤

当时广州商会曾打电报欢迎龙济光入粤，电文中竟有“粤自胡（汉民）、陈（炯明）秉政，民不聊生”之语；当龙带领“济军”抵达广州时，“全城商店一连两三天大放爆竹欢迎”。有人贴出对联，其中有“喧天爆竹，反颜结新主之欢”之句，正是当时情况

的写照。④可见人心转变之快，足以发人深省。

当然，陈炯明解散和镇压民军的行为，在辛亥革命时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当时其他各省亦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革命高潮中，对群众力量的错误态度。甚至以发动民军著称的同盟会骨干朱执信，当时也是主张解散民军的。当“陈炯明代行粤督之后，即与朱执信共同商定裁散的办法，照朱执信的拟议，其愿自动解甲归农者即发给恩饷以示鼓励，其不愿遵守者则以兵力临之”。但朱执信与陈炯明出于排除异己的政治野心有所不同，他曾设法保留了一部分民军（如李福林部），并曾设想建议政府设立合作农场，以安置被解散的民军，以免为患地方，但卒未能实现。⑤就连当时远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也连续致电广东，严厉谴责王和顺等民军首领，而对于陈炯明镇压民军的行为，反而大加表扬，称赞为“坚强不挠，办理尤其合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幸也”⑥。这说明孙中山同其他革命党人一样，对于民军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当然，孙中山的主观愿望，是想以支持陈炯明来加强广东同盟会的团结和稳定广东局势，但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助长了陈炯明的政治野心，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继续举起讨袁的革命旗帜。为了组织讨袁的武装力量——中华革命军，革命党人又想到民军的作用。朱执信和邓仲元等被派回广东重新组织民军起义讨龙（济光），屡起屡仆，收效不大，其影响已远不及辛亥革命时期之民军。整个反袁斗争，反让护国军占了上风。陈炯明虽和中华革命党分道扬镳，亦于这时由新加坡回到东江发动民军和驻军起义，组成讨逆共和军讨龙。及至袁世凯一死，中华革命军和陈炯明的“共和军”，又宣布解散或改编。至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以肃清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又派朱执信、周之贞回到广东发动民军响应。最后朱执信于9月21日牺牲于为调解东莞民军与虎门炮台起义守军冲突的流

彈中，殊可叹惜。

综观革命党人和民军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大敌当前，革命党人要联合民军，以反对敌人；稍得胜利，他们就要抛弃民军，甚至镇压民军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弱点和局限性，也是他们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

① 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第796页。

②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中有关各地民军起义记述。

③ 《番禺县续志》第42卷。

④ 郭孝成：《广东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七册，第231—232页。

⑤ 《致陈炯明电》，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7页。

⑥ 《咨参议院陈述作战方略文》，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0—51页。

⑦⑧⑨⑩ 姚雨平：《武昌起义后广东出师北的经过》，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86—189页。

⑪⑫ 李朗如、陆满：《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231—223页。

⑬ 朱子勉：《辛亥革命广州光复前后杂记》，见《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页。

⑭ 《胡汉民自传》，见《革命文献》第三辑。

⑮ 冯秋雪：《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106—107页。

⑯ 《拿办黄世仲令》，见《有关陈炯明资料》。

⑰ 钟德贻：《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

⑱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27页。

⑲ 朱子勉：《辛亥革命后广东政局的演变》，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第380页。

② 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第139—141页。

② 民元3月19日《复陈炯明嘉慰解决王和顺部电》，见《国父全书》第473页。

巴山蜀水的革命风暴

隗瀛涛 何一民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最突出的事件是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军起义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发生并给全国革命运动以重大影响，起了“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历史作用。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①

一 辛亥前夜的四川社会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以保路运动和同志军起义为主要内容的四川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是四川各种爱国力量和革命力量的大汇合；各族人民此起彼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盟会在四川的多次武装起义，为它作了历史的准备。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采取“以华治华”、“扶植满洲政府”等新的侵华政策，企图“托保全之名，行灭国之实”，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大好河山已预备为世界万国公共之牧马场、殖民地，我四亿万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亦已为釜底游魂，瓮中枯鳖。”②

“四川古称天府，沐天然恩惠，物产丰饶，且地下包藏无限

隗瀛涛，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一民，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

之宝藏，故欧美人无不垂涎”^④，无一不妄图把四川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俄人既由蒙古、新疆等地以侵入陕甘，则以地势易于南下之故，其必有得陇望蜀之心矣。法人既据有两广滇黔，亦有席卷四川之势，其不肯专让俄人南下牧马可知矣。而英人据有长江流域诸省，蜀为江源，必不肯让诸他人以握高屋建瓴之形势，且其通西藏，志在窥蜀，则此时西上瞿塘峡，东出打箭炉，而四川已在其范围内矣。”^⑤ 20世纪以来，中国门户洞开，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四川的侵略，抢夺航运、铁路、矿山主权，开办工厂、洋行、公司，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四川社会经济遭到了破坏。据粗略统计，至辛亥革命前，四川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包括国产机纱）的比重已达52%左右，棉布消费中洋布的替代率也达11%左右。四川自然经济结构开始瓦解。与此同时，一个以通商口岸城市重庆为中心的洋货分销网和土货购销网开始形成，从而将四川纳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买办商业剥削网中，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环。

与帝国主义在四川疯狂侵略掠夺的同时，清王朝也加紧了对四川人民的残酷压榨，各地官吏巧立名目，滥兴捐税，竭泽而渔，腴削民众，骇人听闻。据载：“庚子之变，拨款日增，摊派各省，名曰新捐输。于是，四川于常捐输外又有新捐输……视正赋几十倍矣。”^⑥ 新税增加，旧税加重，四川已是无物不捐，“污秽至屎尿，微贱至……土倡皆有常捐”^⑦。各地官吏借机牟利，肆行贪渎，任意舞弊，勒索追比，大刮民脂。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下，川省人民“同处黑暗地狱中，久无天日……焚溺于水深火热，弗知何日能拔者”^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四川民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一有倡议发难之人，遂成星火燎原之势”^⑨。据不完全统计，辛亥前10年，四川民众的自发斗争达220多次^⑩。在风起云涌的民众反帝反封建自发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在四川蓬勃兴起。

1905年，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四

川留日学生纷纷加入。据《革命文献》所录，1905—1906年同盟会在册会员有960人，川籍会员达127人，占会员总数的13%，仅次于广东和湖南。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的指示下，同盟会总部先后派遣了几批川籍会员回川，发展成员，建立组织，进行革命宣传和武装起义活动。在川籍同盟会员的努力下，1906—1911年间，成、渝两地分别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四川大多数州县也都有了同盟会的分支组织。

同盟会四川分会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一是发动武装起义。

重视革命舆论宣传工作，是同盟会的一个鲜明特点，四川同盟会组织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宣传工作：1. 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口头宣传。口头宣传革命，既方便快捷，又生动有说服力，现身说法，往往产生出人意料的奇效。如同盟会员谢奉琦被捕后，在狱中和刑堂上也不忘宣传革命，“听者皆各往往泣下。供状慷慨万言，阐排（满）革（命）义蕴尤透”^④。2. 传播、散发革命书刊。四川同盟会会员将大批革命书刊（如《民报》、《革命军》等）秘密输入内地散发，对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人是“读未终，即愤慨填胸，倚天拔地，毅然以推翻满清，光复汉族为己任”^⑤。3. 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如卞薰办《重庆日报》，朱蕴章、杨庶堪等办《广益丛报》。以蜀人言蜀事，用四川人民所受的苦难来激发四川人民的反清革命意志，这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促进人们猛醒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伊始，就以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职志，把革命战争提上行动日程。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黄兴等人主持下制定了《革命方略》，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四川同盟会根据《革命方略》和孙中山、黄兴的指示，在四川“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新军，发动起义”^⑥。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前，由四川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达9次，有彭县之役，江油

起义，泸州、江安起义，丁未成都起义，叙府、隆昌之役，郫县、龙潭寺、崇宁起义密谋，广安之役，嘉定之役，黔江之役。辛亥前，除同盟会总部所领导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外，各省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莫如蜀多，也莫如蜀激。然而这些起义有的未发即败，有的是刚举义旗就遭镇压，有的是虽然占领了城镇，但却不能坚持长久，最后都功败垂成。清政府虽然镇压了同盟会所发动的各个孤立的起义，但却不能遏制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一个接一个起义的发生，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朽和软弱无能。因此，同盟会的起义从战略上不能算完全的失败，因为每一次起义都在思想上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在组织上发展了革命力量，推动着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为日后四川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发展到武装起义准备了历史条件。

二 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兴起和发展

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保路运动。

掠夺路权是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输入资本的重要手段。从19世纪末起，列强展开了争夺中国铁路建筑权的激烈竞争。四川僻处西南，交通不便，因而各国“均以借款造路为请”，“蓄意覬覦”四川铁路，“计求强取，百端纷扰”。进步的、爱国的四川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坚决反对外国对四川铁路主权的掠夺，他们认为“四川铁路入他国手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远隶属于他国之日也”^①。因此，他们倡导自办铁路，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自办川汉铁路。次年，“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1905年，铁路公司由官办改成官商合办，1907年又改成商办，立宪派士绅掌握了铁路公司实权。川汉铁路公司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非中国人股份概不准入股”，“倘转售或抵债与非中国人，本公司概不承认，股票作废”。川汉铁路资金来源分为“认购之

第二阶段，1911年6月17日——8月24日。

6月中旬，铁路借款合同传到四川，报纸争登，各界传阅，舆论益愤，人心悲痛。6月16日，川路公司召集在成都的股东及团体代表开会，“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大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⑤。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保路同志会内设参事会，推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常驻议员皆作参事，此系内幕机构，对外不宣布。同志会另设总务、文牍、讲演、交涉4部，各设部长一人。保路同志会实际以立宪派人为领导核心，因而他们力图把运动限制在“破约保路”、“文明争路”的范围内。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保路斗争开始同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保路同志会一成立，群众争相入会，不到一月，入会者“不下十万众”^⑥。成都各条街道、学校、团体和省城外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分会，“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⑦。四川的绅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都投入到保路运动之中，连老人幼童、家庭妇女、僧尼道士、伤残病人也加入斗争行列，川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也群起响应，甚至连许多士兵、警察、官吏也对运动持同情、支持态度。四川各阶层的爱国力量不分地域和职业、不分民族和宗教文化信仰，汇入到了保路斗争的洪流之中。

立宪派人士希望通过发动群众，以“文明争路”的形式给予清王朝以压力，迫使清王朝做出让步。然而反动的清朝统治者决心与人民为敌，他们不仅不“俯顺舆情”，倾听民众的呼声，反而指责保路运动的领导人煽动民众酿乱。四川派到北京“叩阍请愿”的代表，尽管四处奔走，声嘶力竭，泣陈川中危局，结果不但未能挽回“天心”，反而成为待罪囚徒，被解押回川。严峻的事实表

明，“文明争路”行不通。于是保路运动在人民大众的推动下，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1911年8月24—9月7日。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运动形成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罢税、罢租、抗捐抗粮的斗争风潮。

四川群众性的罢市罢课斗争自8月24日由成都开始。是日，保路同志会将清廷命川督赵尔丰“遏乱萌而靖地方”的电文内容在大会上披露，顿时，“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跌足声，演说声……满场热焰欲烧”^④。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同志会决定立即罢市罢课以抗议。传单一出，成都全城的大街小巷一律闭户，百业停顿，万众一心。成都附近的州县和重庆等地闻讯立即响应，影响所及，“南起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⑤。然而清政府对四川人民的要求一口拒绝，宣称铁路国有政策无可更改，并严令赵尔丰对运动实行弹压。这无异是扬汤止沸。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和保路同志会决定进行抗捐抗粮斗争，宣布从即日起“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担任外债分厘”，“不买卖田地房产”^⑥。决议一出，“万众附合”，使清廷“二千数百万之岁入顿归无着。四川一切行政固惟束手，而京部、洋偿、解协等款，全无所出，贻误实大。且滇、黔、新、甘、边藏向皆仰给于川者，亦将坐困。川一动摇，中央根本，西南半壁，无不受其影响”^⑦。四川人民与清王朝的矛盾斗争日趋白热化，人民群众进一步冲破了立宪派所划的“文明争路”框框，在一些州县开始出现捣毁清政府横征暴敛机构的行动。甚至在立宪派控制的报刊上也出现了“大泽恨无陈涉起”之类的激烈言论。主张同清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宣传品也公开出现，有人提出：“倘有那不肖官吏来捕捉，鸣锣发号我一窝蜂。一家有事百家齐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钢刀快砍不完七千万人脑壳，哪怕尸骨堆山血流成河。有死

心横竖都战胜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收兵鸣锣。”^②这反映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四川已遍布干柴，一引即燃，革命形势已经成熟。

保路运动一开始，四川革命党人就清醒地认识到“与政府言法律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③。因此，他们采取“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参加到保路运动中，一方面利用保路同志会作为合法的斗争工具，揭露清政府的反动卖国，“使人人知清政府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另一方面，又积极联络、组织会党、团练，筹建保路同志军，以发动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5月底，成、渝两地的同盟会代表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商议同盟会在保路运动中的立场、态度、对策，会议决定成立保路同志军，发动革命。会后，同盟会派出若干会员分赴各州县，“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同盟会的革命斗争与群众性的保路运动相结合，使资产阶级革命在四川获得长足的进展。为了进一步把保路运动引向反清革命，把同志会改为同志军，同盟会还联络会党于7月在新津召开了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脑会议，初步确定了起义的原则。8月4日，同盟会、哥老会又在资中罗泉井开“攒堂大会”，决定了起义的领导人、起义的时间和具体策略。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不仅加强了同盟会与四川会党的联合，巩固了同盟会在联合阵线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也决定四川辛亥革命的进程。同盟会以成立同志军的形式，把群众自发斗争纳入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统一了起义的指挥和步调，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开始向武装反清的革命转变。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囚禁了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9人，又下令封闭《西顾报》、《启智》各报馆，并四处张贴告示，杀气腾腾地宣称：“只拿首要，不问平民……拥挤上院，格杀勿论”^④，发出了大屠杀的信号。成都民众听说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人心大愤”，成百上千的群众，扶老携幼，潮水般地涌向总督衙门，要求赵尔丰释放蒲、罗诸人。嗜血成性的赵尔丰下令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一时间，子弹横飞，群众纷纷倒

入血泊之中。

横陈街头的尸体和淋漓的鲜血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凶残野蛮，也惊醒了全川人民，他们对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这样，以“成都血案”为转折点，四川保路运动由爱国运动发展为反清革命。

9月7日当晚，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在数百片木板上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等字样，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锦江之中，及时地发出了起义的讯号。华阳、新津等地的同志军闻警，立即举义，连夜开赴省城，在东郊、南郊一带与清军进行激烈的战斗。“自是西南附近数十州县，更迭起民团赴省”，“革命党人遂结合同志军呼号而起”^⑤。

同志军起义初期，兴起的同志军以成都16属为主，进攻的目标是成都，“无论党人（同盟会员）、民军与保路军都以保路同志军为标志”，“不及三日，聚集在成都周围的保路同志军多达数十万人”^⑥。同志军在数日内与清军进行大小战斗数十百次，规模较大的有武侯祠之战、红牌楼之战、犀浦之战、三渡水之战。战斗十分激烈，重创清军，迫使赵尔丰关闭城门，陷于坐困之地。同志军进攻成都十余日，但因武器窳劣，力量分散，缺乏训练，因而不能攻下成都。于是同志军主要负责人决定按罗泉井会议的部署，分兵攻略各州县，以州县包围成都。经过调整，同志军开始从分散到联合，先后成立了东、南两路同志军总部，上川南同志军总部等，并直接打出了反清革命的旗帜，如东路同志军“各军皆树旗四面，文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将保路之面具揭去，而树同盟革命军之旗帜”^⑦。这时同志军起义从川西地区发展到川南、川东、川北地区。随着同志军的扩大，与清军的战斗更加激烈、频繁、残酷，出现了新津保卫战、大相岭阻击战、雅安围城战、自流井之战、犍为之战等著名战役。保路同志军起义很快从汉族地区燃烧到少数民族地区，松潘、茂汶、汶川一带的藏、羌人民首举义旗，巴塘、里塘的藏族人民也相

继举义，凉山地区的彝族、回族、藏族人民也纷纷参加同志军，积极展开反清斗争。同志军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摧毁了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为革命政权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9月28日，在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下，荣县革命政权宣告成立，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地方政权，比武昌起义早十余日。此后，各州县纷纷效仿，宣告革命独立，建立军政府。四川同志军起义引爆了武昌革命，随之十余省相继革命独立。全国革命的形势反过来推动着四川的武装斗争，四川革命形势出现持续发展局面。11月，清朝官吏只能集中兵力镇守成都和重庆等少数城市，各州县革命政权的建立有如雨后春笋。由于各地革命党和革命群众的力量不平衡，由于各种社会力量对革命的态度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因而新建立的政权除成、渝军政府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会党力量组成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地方旧政权，建立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新政权。此种类型除荣县军政府外，蜀北军政府、涪陵军政府、内江军政府等也具有代表性。第二种类型是拥有地方实力的立宪派和地主士绅，为了自己的生存，顺应同志军起义，从而捷足先登，或与革命派共同建立新政权。如自贡、威远、东乡、达县、大竹、资中等县新政权。第三种类型是不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权。辛亥革命时期，在四川一些州县的独立过程中，一批清吏、军官、团练头子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革命前极端仇视革命，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镇压革命。革命爆发初期，他们又拚命抵制革命，扼制革命的发展。然而，当革命以不可抗拒之势横扫一切，清王朝的崩溃已不可逆转时，他们就摇身一变，附和革命，拉起“反正”的大旗。这样，他们居然也成了革命功臣，以首义之士自居，窃据新政权的要职。实际上“大清”的旗号不过换上“大汉”的招牌而已，新政权没有革命的气氛，在一些地区，新政权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屠杀革命者，劫掠抢夺，滥杀无辜等事件时

常发生。面对这种现象，革命党人或予以反击，或采取妥协。这种类型的新政权有泸州、巫山、奉节、宜宾、邻水、万县等，它们的存在，成为辛亥革命不能彻底的障碍之一。

1911年11月22日，重庆的革命党人发动政变，和平接管了重庆，是日建立蜀军政府，选同盟会员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通电全国，宣布独立。蜀军政府是同盟会重庆支部建立的资产阶级省级政权，其组织结构是根据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模式来建立的，其成员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

蜀军政府的建立把四川革命独立推向了高潮，“先是成都未下，各道皆疑惧观望，一闻重庆独立，道、府、州、县相继响应”^②，“川东南五十七州县，皆闻风反正”^③。

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和重庆独立，使在成都的赵尔丰十分震惊，他看到清朝大势已去，与其坐以待毙，让革命党人推翻自己，不如主动把政权交给立宪派，因为后者具有更大的妥协性，行动更加温和。经过双方讨价还价，达成互相妥协的协议。11月27日，赵尔丰宣布将四川政权暂时交给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同时，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蒲殿俊任都督，原清军陆军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同日凌晨，奉派到四川来镇压人民革命的钦差大臣端方在资州被所带的湖北新军诛杀，起义鄂军带着端方的首级沿着长江返回武汉。消息传到成都，给新政权以极大鼓舞，人们额手称庆。

大汉四川军政府是立宪派与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毫无权威。因而封建势力趁机兴风作浪，会党徒众的劣性也恶性膨胀，成都陷入一种半无政府混乱状态。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旧巡防军官兵和土匪，疯狂地洗劫了成都，立宪派所建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只存在了12天就在反动派的枪声中寿终正寝了。人们和平的梦想破灭了，民众在劫后余灰中哀嚎、呻吟。在这关键时刻，尹昌衡、董修武等人毅然受命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重新稳定了

局势，建立了四川军政府。

四川军政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进步力量和全川人民反复辟斗争的产物。军政府成员中6/10都是同盟会员，军政府的重要职务如都督、总政务处长、军事巡警总监、财政部长、参谋部长、外交部长、民政部长都由同盟会员担任。其组织机构也是以资产阶级党人规定的地方军政府为模式，在它存在的几个月内，颁布和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法令和措施。如平定叛乱，诛杀复辟头子赵尔丰，恢复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整编旧陆军、巡防军和同志军；发行军用票，废除苛捐杂税，奖励实业；改革教育，破除旧风俗和社会恶习；和平解决满城旗民问题等。四川军政府虽然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和弱点，但从总的方面看，它基本上没有违背同盟会的方针政策，而且在关键时刻以毫不留情的革命手段挫败了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保卫了革命成果，推动了革命的深入发展，表现了较强的资产阶级革命性。

1912年1月27日，成渝两军政府的代表初步达成合并协议，先后经两军府讨论批准，盖章生效。2月17日，四川军政府致电孙中山等人，报告四川统一经过。四川统一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3月9日，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正式成立，尹昌衡、张培爵分任正副都督。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资产阶级共和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3个月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袁世凯攫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结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摆脱失败的命运。1912年7—9月，袁世凯的走卒胡景伊先后攫夺了四川的军政大权。四川辛亥革命失败了。

三 四川辛亥革命的特点

四川辛亥革命是全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发展和失败与其他省区有着共同的规律。但由于中国各地社会经济不平衡，因而各地的辛亥革命也各有其特色。四川辛亥革命与其他省区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

1. 从保路爱国运动发展到武装反清革命。

四川辛亥革命是以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的保路爱国运动为开端，以发动同志军起义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的失败而结束。保路运动最先在湘、鄂、粤三省兴起，并很快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但在清王朝的分化瓦解和高压下，三省的保路运动声势日渐减弱，没有成为革命的导火线。四川保路运动虽然兴起最晚，但发展迅速，声势最浩大，斗争最激烈。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四川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会给四川群众提供了联合和组织起来的纽带和合法斗争的场所。广大群众在保路同志会的宣传鼓动下而获得觉醒，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的卖国有了比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从而使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热情和勇气高涨。人民群众义愤的星星之火，在保路同志会“鼓风机”的作用下，燃成熊熊的燎原之焰。广大群众表示：“我们团体不散，联合胶漆共一班，组织分会要完善，彼此和气结一团。”^①一方面是清王朝的一意孤行，决心镇压四川人民的爱国运动，另一方面是四川人民的觉醒，他们以保路同志会为纽带，汇成了巨大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保路运动从“破约保路”、“文明争路”的和平请愿，发展到罢市、罢课、抗粮、抗捐的激烈斗争。当反动派举起屠刀血腥地镇压人民群众之时，四川保路运动由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向反清武装起义的转变已成为历史的必

然趋势。这次革命是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帝爱国是它的中心课题，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④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特点。

2. 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能独步一时，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广大人民参加。四川人民所以广泛地参加保路，与川路集股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在川路公司所征集的路款1645余万两（截至1911年）之中，“租股”计有950余两，占总额的57%以上。租股征收的对象不仅有地主，而且有为数众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因而川路路权的得失同全川各个阶级，包括很大数量的农民在内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牵连。所以保路的号召在四川特别能鼓动人心，能够极大地把群众引到公开同清廷对立的方面，使保路斗争成为全省群众关注的政治大事。

保路运动之所以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并能不断地向纵深处发展，还同运动的组织领导者重视并出色地进行社会性的政治宣传有关。他们把保路爱国的主张切实地普及到广大群众之中，从而唤起了广大群众的爱国反清热情。保路同志会一成立，立即成立讲演部，对群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一方面派出大批讲演员和学生分赴各州县城镇乡村，对民众进行演讲宣传；另一方面又大办报刊，除原有的《蜀报》、《启智画报》等，又新创办了《西顾报》、《白话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这些报刊都面对广大群众，文字通俗易懂，趣味性浓，以教育和动员群众参加保路运动为中心，以传达保路同志会的方针方法为主，以揭露帝国侵略，抨击专制政府和买办官僚盛宣怀等人卖国卖路为核心内容，有强烈的爱国性和战斗性，对广大群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据《保路同志会报告》载：许多人“望本报几如望岁，及得

报展读，涕泗横流，且阅且哭”。思想上的觉醒要求政治上的解放，爱国民主潮流在全川涌起，群众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各地同志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一切都导致了四川保路运动向纵深发展。

3. 武装斗争范围广，规模浩大，斗争激烈。

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的规模宏大、范围广泛，与辛亥革命时期其他省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和斗争相比可谓名列前茅。同志军总人数无法准确统计，因为一方面同志军非常分散，另一方面同志军人数也在不断增减，一些地区的同志军则是旋起旋灭。但从一些资料中也能窥其大概，如黄绶《四川保路运动亲历记》载：成都血案发后，“不及三日，聚集到成都周围的保路同志军，多达数十万人”。《蜀中先烈备征录》也称，东路同志军总机关在籍田铺成立后，“未几众达二十余万”。新津、温江、崇庆、崇宁、灌县、雅安、乐山、犍为等地的同志军均各在万人以上。四川百余州县绝大多数都建立有同志军，同志军起义遍及巴山蜀水。参加同志军起义的不仅有汉族，藏族、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也积极地投入反清起义的行列。同志军的成员十分复杂，几乎包括了当时四川社会各阶层的人：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城镇居民、劳动苦力、船夫水手、失业游民、破产农民、地主士绅、学生、教师、军队官兵、会党成员、民团团首和团练等，但从总的方面看，同志军仍是以农民为主体。四川保路同志军与清军的战斗大小数百次，十分激烈频繁和残酷。如1911年10月，数万同志军围攻雅安城十余日，大小战斗数十次，清军受创颇重。10月6日，清军分两路袭击同志军，同志军仓卒应战，牺牲2000余人，受伤被俘数百人。自流井之战旷时一月。犍为战役“发生十四次战争”，战斗极其残酷，同志军牺牲惨重。清军把被俘同志军“支解，先砍手足，继之挖心脏，后来抛在河里”^②。同志军不过是无数临时聚拢的群众，既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也缺乏锐利的新式武器，

再加上缺乏严密的编制和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因此同志军的单位战斗力远远低于正规的清军，这使它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同志军的战斗力虽然比不上清军，但是斗争精神和勇气，意志和毅力都远远超过了清军，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前仆后继，颠扑不羸，在最艰苦的战斗中和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表现了非凡的意志、勇气和毅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使四川获得革命独立。

4. 同盟会及会党的作用十分显著。

保路运动之所以能从文明争路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并向资产阶级革命方向发展，同盟会及会党的作用十分关键。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期。此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了时代的中心，掌握着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会党的作用，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后，与会党的联系日形密切。四川同盟会员熊克武等人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⑧因此，他们注意联络四川会党，通过会党动员群众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同盟会十分重视对会党灌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争取政治领导，并派一部分同盟会员参加到会党中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直接对会党做工作，对会党进行组织改造；同时也将会党中有革命意识的首领吸收进同盟会之中，担负同盟会的革命任务。四川著名的会党首领张百祥、余英、李绍伊、周鸿勋、刘天成、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入盟，在他们的带动下，各地会党首领也纷纷加入同盟会，或为同盟会所用。这样，同盟会与会党结成联合阵线，把会党引入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同盟会在四川武装反清的社会支柱。辛亥前，同盟会利用会党在四川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不仅加强了两者的联系，而且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把四川会党的自发斗争纳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上。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同盟

会采取同立宪派“明同暗斗”的策略，积极引导会党开展武装和渗入保路同志协会。这样，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以会党为纽带，集中了全川革命动力，为保路同志军的兴起作了准备。在四川辛亥革命中，同盟会的作用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同志军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同盟会策动的。新津会议、罗泉井会议，以及成都血案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发出起义信号的“水电网”，都是同盟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活动，各地同志军的建立也与同盟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第二、最主要的、最有影响的同志军领导人都是同盟会员或与同盟会有关系的会党首领。他们所领导的同志军是四川保路同志军的主体，决定着同志军的性质和革命的大方向。第三、同盟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已为多数同志军所接受。同盟会筹建同志军之初，就确定了同志军的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同盟会的纲领。因而同志军起义不久就揭橥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大旗，宣布“革命的目的是打倒专制腐败的清王朝，恢复汉族自由，解除人民的痛苦，不是争城夺地、争地争王”^④。同志军起义的过程中没有建立单纯的农民革命政权，或重蹈旧式农民战争覆辙而称王称帝，都是按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设立军政府。如果没有同盟会在四川的长期革命活动和发挥领导作用，四川辛亥革命就不会有这样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5. 四川革命爆发最早，而独立却较晚。

1911年，四川爆发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先于各省，比武昌起义早1个月零3天，吴玉章等人在荣县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也比武昌起义早十余日，这使四川辛亥革命十分引人注目。但另一方面，四川全省的独立却晚于鄂、湘、陕、晋、赣、滇、沪、黔、苏、浙、桂、皖、粤、闽诸省市，这是四川辛亥革命艰巨性的反映。四川新的社会因素不发达，旧的势力则十分凶恶、反动。四川总督赵尔丰以杀人众多而有“屠夫”之称。9

月7日，嗜血成性的赵尔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接着又调来大批军队，疯狂镇压同志军起义。四川清军虽然被同志军打得落花流水，但赵尔丰仍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吾蜀以发难最早之省，收光复之效乃在各省之后者，正以赵尔丰一人为横梗，蜀人士为其钳制不克展布”^⑧。四川人民不得不同清朝反动势力反复较量，殊死作战长达3月之久。赵尔丰直到山穷水尽，全无退路时才被迫交出政权。

四川独立最晚的另一个原因是四川新军没有能发挥作用。郭沫若指出：“假使四川新军里面真正是有革命性的人在那儿主持，四川早是已经独立的了。”^⑨四川同盟会成立后，十分重视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四川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不少，如中高级官佐程潜、方声洞、姜登选、叶荃等都是同盟会员。但是由于同盟会在成都的活动遭受挫折，未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故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很不团结，如同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同志军起义发生后，新军又处于赵尔丰的严密监视、控制之下，因而不能举义响应革命（除夏之时所部在龙泉驿起义外），甚至有的新军还参加镇压同志军（如镇压新津同志军），这就延缓了四川辛亥革命的进程。

6. 两个省级革命政权并立。

这一特点是四川辛亥革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同盟会在四川的组织建立以后，先后形成了三个活动中心，成都、泸州、重庆。1907年以前，四川同盟会的主要领导和骨干都基本上集中在成都地区，成都成为全省革命的中枢。但1907年成都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一些主要领导无法在成都立足，同盟会成都分会形同瓦解，党人乃自发地形成许多小组，各行其是地进行活动。这对辛亥革命爆发后，同盟会不能掌握成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产生了极大影响。成都起义失败后，泸州一度成为四川革命中心，但随着余英被捕牺牲，杨庶堪、张培爵等一大批同盟会领导和骨干迁渝

后，革命中心又转移到重庆，同盟会重庆支部大量发展同盟会员，并加强了与工商业界、秘密会党和军队的联系。在革命发生前，一个反清革命联盟在重庆形成，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王朝在重庆的统治势力，从而使重庆在革命高潮中和平独立，川东五十七州县闻风景从，重庆蜀军政府成为省一级的革命政权，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独立政权所承认。但由于四川革命力量发展不平衡，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因而紧接重庆蜀军政府之后，成都又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形成两个省级政权对峙的局面。但由于四川有统一之势、无分离之形，因而在革命派掌握了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后，成渝两政权终于合并。

结 语

四川辛亥革命是由群众性的保路运动直接发展而来的，转变的标志是同盟会指导下保路同志军的建立和起义。保路同志军起义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推动了各省革命斗争的发展，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正是由于有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武昌起义得以一举成功，并得到全国的响应。正如吴玉章所写：“丧权卖国震人心，铁路风潮鼎沸腾。武昌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①四川革命党人和人民大众为四亿同胞“首先请命”，“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历史功绩是永垂史册的。

四川辛亥革命的风暴遍及巴山蜀水，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兴起于各州县，他们的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终于赢得了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地方政权的胜利。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它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都是巨大的。封建专制制度在革命的打击下彻底崩溃，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一时倡独立共和之声，震于耳鼓”。封建旧势力也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分化瓦解；传统的礼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代表——立宪派和革命派都进行了充分的表演，结果表明这个阶级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但不能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厄运。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新一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重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民主主义革命思潮以不可逆转的趋势蓬勃发展。

①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61页。

② 金沙，《过去之四川》，《四川》第1号，第2—3页。

③④ 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2号。

⑤ 《巴县志》卷四，赋役上，民国28年刊。

⑥ 秦枏《蜀辛》卷下，第2页。

⑦ 《蜀报》第12期，本省纪事。

⑧ 《光绪二十八年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

⑨ 陶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第366—37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⑩ 《蜀中先烈备征录》卷一，《谢左将军传》。

⑪ 同上书，卷四，《烈士刘启斌事略》。

⑫ 熊克武，《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

(三)。

⑬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0页。

⑭ 《宣统政纪》卷五十四。

⑮⑯ 三余书社主人编，《四川血》。

⑰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1号，著录。

⑱ 《资中县志》卷十，杂编·兵燹。

⑲ 《广益丛报》第九年第28期。

⑳ 《蜀辛》卷上，第6—7页。

㉑ 《赵季和电稿》卷四，《致内阁》。

㉒ 《西顺报》第41号，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

㉓㉔ 《辛亥四川革命纪事》，《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

㉕ 《成都绅民代表名单》，1911年9月10日，载《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 ②⑥ 黄绶,《四川保路运动亲历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 ②⑦ 曹叔实,《保路同志和保路同志军真相》。
- ②⑧ 张培爵,《蜀军政府始末》。
- ②⑨ 《巴县志》卷二十二,民国28年刊。
- ③⑩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0号。
- ③⑪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2页。
- ③⑫ 《四川保路运动档案资料选编》第284页。
- ③⑬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页。
- ③⑭ 同上书,第297页。
- ③⑮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1号。
- ③⑯ 郭沫若,《反正前后》。
- ③⑰ 吴玉章,《辛亥革命》。

伊犁辛亥革命起义始末概述

杨柳风

—

伊犁辛亥革命起义，是近代史上发生在新疆的重要革命事件。

清自乾隆年间平定天山南北、统一新疆之后，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度。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以后，为了巩固边防，曾向清廷奏议将新疆改为行省。但他在1880年被调离新疆之前，清廷尚未批准他的建议，因而未能实行。1883年，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再次向清廷提出将新疆建省的方案，同年经清廷批准，新疆正式建为行省，实行新、伊分治。伊犁设将军府，直隶于清廷。

新疆建省前后，正值戊戌维新运动，故有一个短暂的形势稳定时期。但清廷此时摇摇欲坠，政治腐败，贪官横行，苛捐杂税，盘剥勒索，致使民不聊生，百姓十分不满。加之清廷对英、俄帝国主义在新疆的侵略、扩张、掠夺的屈服，使得新疆各族人民深感欲对内摆脱压迫，对外抵抗侵略，非推翻清廷的统治不可。这种思想情绪在新疆的汉族中尤为强烈。

新疆的汉族有相当一部分当年随左宗棠进军新疆的湘军、淮军后裔。有些人则与哥老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其影响较深。

哥老会在新疆又名哥弟会。左宗棠进疆的军队中就有哥老会成员。塔城、伊犁、精河一带均有会党活动。伊犁起义中的领袖人物徐三泰曾任哥老会正山主，杨缵绪为副山主。当时，他们受国

杨柳风，原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副主席。

际上民主政治思潮和国内“反清灭洋”的思想影响较大。特别是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成立了“中华革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之后，有一些同盟会成员进入新疆各地，而伊犁则是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新疆除汉族外的其他民族倍受清廷的歧视，待遇极不平等。道光以后，由于新疆民族动乱此起彼伏，清廷对维吾尔族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政策，凡安集延人在伊犁寄居7年以上者方准编入伊犁回民户籍，但不许嫁娶置房；凡阿奇木伯克（新疆的伯克制度中的最高一级）以下至四品伯克及其对清朝尽忠有功的子孙，方准蓄留发辫，其余则不准；禁止百姓经营硝盐；禁止维族出边卡与外人来往；禁止各少数民族私入满族聚居地点——满城等等。此外，对封官晋爵亦限制极严，最高的一级阿奇木伯克从未授与维族，只授官到三品伯克，授爵则不过一等台吉。加之，横征暴敛，旗人官兵对少数民族的骚扰、欺压，凡此种种，当然导致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对清朝统治的痛恨与反抗。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播开去，很快各省纷纷响应，清廷不支，势将崩溃。当时新疆巡抚袁大化、伊犁将军志锐、亲王载瀚、甘肃都督长庚等曾密议企图在库伦或阿尔泰临时建都，迎接宣统前来，以偏安于一隅并对抗革命。这更促使了新疆响应辛亥革命的活动爆发。先是有些人联名劝袁大化起义以扼清帝之西来。袁氏不仅不为所动，反而视革命党人为土匪，依清廷为干城，而其手下一千人等则以侦察革命党人活动为能事，以向袁报告所获情报为升官晋级之道。袁大化遂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先后被杀害的革命首领及志士计有刘先俊、唐小云、陈光模、陈菊芳等143人之多。

刘先俊先是与在伊犁的万象春联系（万原名万长风，出关后改为万象春）。1907年，伊犁将军长庚调湖北陆军开赴伊犁时，万经同盟会介绍投军出关。万到伊犁后，因军、学两界多是新旧满营子弟，活动难以进行，遂改变方针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活动。

袁大化镇压迪化革命党人时，有湖北人贾鸿钧当时任督练处随员，因受别人口供牵连，在袁大化未加逮捕前，贾奔赴伊犁。后新、伊交战，贾充先锋攻打新军，被捕后遭杀害。

袁大化处置迪化革命党人之后，曾致电清廷内阁总理衙门报告经过，电称：“前闻匪首刘先俊等，因内地多事，特来此谋乱，人心甚为惶惑。旋据商民禀告，随即抓获伪总统唐小云、伪帮统陈光模等，皆随伪元帅刘先俊约期起事，以左臂白布为记，用黄红等色，大书悖逆字样。正在讯办间，初九晚突有匪徒百余人闯入城协守营，夺取枪械，裹胁营兵，扑犯抚署东营。……遂扑陆军炮营，志在夺炮登城，轰击各署，全城同受其害。经督队官邓玉山督兵击毙数名，始退。邓玉山及副兵温新合战亡。又击警察第一区，被营兵击走。……匪因各处皆未得手，又窜回协营。先已飞调陆军协标统王佩兰、曹用愿等带步队围攻协营。天曙，一面晓谕，一面炮击，遂缴械受命。……商民丝毫未扰。匪首唐小云、陈光模、陈菊芳均拿获正法。地方一律平靖……”迪化的革命活动被袁大化扑灭了。

不久伊犁革命起义便爆发了。

1906年秋，武昌日知会为清军所破，时有革命党人冯一（即冯特民）、冯大树等均为重大嫌疑人物，清廷索之甚急，不能匿居武汉。冯等与另一革命党人杨缙绪过往甚为密切。1907年，伊犁将军长庚奏请调南洋陆军一部来伊犁作为练兵基础力量，湖广总督赵尔巽奉命委任杨缙绪负责挑选官兵，组织队伍。冯等既遭清廷通缉，在当地无法立足，乃随杨缙绪选调之官兵中开赴伊犁。他们就是后来伊犁革命的领导骨干力量。

杨缙绪毕业于日本户山学校，在日本时即已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虽任职清廷，却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杨所挑选的官兵是湖北陆军第八镇的人员，计选有官长、学兵、士兵等800名。这些人员编成陆军步队、小炮队、野炮队、工程队。编成后于1908年1月7日由武昌出发，到同年7月15日抵达伊犁，作为训练示范队伍。在伊犁的锡伯、索伦、蒙古新兵则编为步、骑、炮、工、辎混成旅，升杨缙绪为旅长。

随杨缙绪来伊犁的革命党人除冯特民、冯大树外，还有郝可权、李克果、方孝慈、徐叔渊、章泽宏、周献臣、李英、兰少华、万长风、刘岐山、邱玉成、谭钟麟、黄云峰等，行至西安时李梦彪加入。他们成了伊犁革命的基础力量。

三

伊犁虽处西北一隅，但与俄国接壤，地位重要。加之气候煦和，物产丰富，人口较多，清初即为军事要地。乾隆平定准噶尔之后即置九城，驻重兵，故开化较早。清末将军长庚驻守伊犁，正值清廷面临戊戌维新运动之际，康、梁虽然失败了，但清朝也推行了一些所谓“新政”如兴学校、办工厂、辟道路、通汽车、安设电灯电话等，风气渐开，人心向往革新运动。革命党人抵此之后，通过种种活动，接受其主张，赞成其行动者日益增多。

杂于军中随同杨缙绪来到伊犁的革命党人，被杨缙绪安置在军队和各机关中，分头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影响逐渐扩大开来，这当然引起清朝的文武官吏所嫉恨。当时的府尹许国楨、镇台周玉魁即曾借口发生在绥定的群众赌博斗殴一事为由，报长庚称革命党人闹事，将程鹏飞、周启发枭首示众，党人万象春亦因此去迪化躲避。但革命党人并未因此而松懈斗志，减少活动。他们创办汉、满、蒙、维4种文字的日报《伊犁白话报》，并筹设学校作为宣传阵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当时

武昌方面曾约冯特民响应。时冯任协统部书记，势力尚不强大，未敢贸然行动。后虽有李梦彪运动陕籍军人，李辅黄运动鄂籍军人，冯大树运动当地伊斯兰教徒及绿营官兵，但准备仍不成熟。当迪化刘先俊起义时，冯特民曾拟策应，杨缙绪则主张慎重行事，由于认识不一致，故未行动。刘先俊在迪化起义失败后，伊犁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经过几年酝酿的伊犁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

伊犁将军长庚内调任陕甘总督之后，志锐继任伊犁将军之职。志锐原任杭州将军，1911年调任伊犁将军。他上任时，正值长江流域革命形势高涨，伊犁在全国形势影响下也人心思动，革命之火已在蔓延。志锐看到伊犁军队中有从南洋调来的官兵，他们与内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滋疑虑，终于采取措施，将杨缙绪协统及所属团营官兵全行解散，并计划将这些人遣回关内，以绝后患。在遣散时要求士兵将所穿的皮衣皮裤全部交回存库。杨缙绪以天气严寒，士兵不穿皮衣皮裤，势必于途中冻毙，恳求志锐先准士兵将皮衣皮裤穿至故地再行缴库。志锐却于士兵离开营地后，暗派四领队大臣率队于士兵经过之各个要道加以拦阻，强行将士兵身上之皮衣皮裤全部剥下，致使这些士兵挨冻而行。对遣回关内的军官，志锐又迟迟不发旅费。在此情况下，杨缙绪请求辞职，所有官兵怨恨至极，并同时引起平民百姓的同情与不满。杨缙绪乘此派党人冯特民、郝可权、李辅黄等积极活动，而管理南军火库之黄立中亦暗中加入革命行列，形势十分有利。冯大树、马凌霄等则联络当地宗教及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韩玉书联络哥老会首领四川人徐开泰（字三泰），李辅黄联络伊犁新军，杨缙绪利用尚未交上的协统关防，秘密委任徐开泰为义勇军团长（当时军标、镇标、绿营官兵中，入哥老会者大有人在）。这样，伊犁各军除新、旧满营外都运动成熟。宗教界及少数民族中的头面人物，经过宣传解释，逐渐消除了狭隘的与汉人挟怨的情绪，同情于革命（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其官兵曾有扰民行为，造成少

数民族中对汉人的怨恨情绪，当时尚未清除)。伊犁革命运动至此已基本酝酿成熟。

在这一时期，革命党人每晚集合于李辅黄家研究形势，部署工作。原定于1912年元月12日起义。正在加紧部署行动之时，传言四起，市民不安，而1912年1月2日兰州又发生军变，形势更加动荡，乃提前于1月7日在南门外炮营开会。到会的有69人，定名为铁血团，决定当天夜晚12时发动起义。当时公推统领杨缙绪为总司令，教练提调冯超为参谋长，冯特民任外交，冯大树任内政，黄立中主财政，陈金胜任联络，周献臣、李辅黄、谭钟麟、刘岐山等任军事。不意会场中有二锡伯族士兵逃走，恐事泄露，又改为9时起事。分工如下：郝可权攻将军署，冯特民攻北库，李辅黄为总指挥，负责占领东门，指挥北洋军官所带的城外军队入城响应（时新军驻于惠远城外2里左右，驻城内仅山、野炮各1队，兵力单薄，故派士兵百余人化装携手榴弹秘密入城为内应）。

当革命党人准备起义时，志锐不断接到报告。但志锐以城内外都是蒙兵驻守，又有军标50余营，认为镇慑有余，态度镇静。及至1月7日潜逃锡伯士兵与军标陈甲福、都司司云亭先后入告后，开始加以防备。志锐一面向城内各旗兵发枪，一面令陈甲福转告各官兵，许以发薪饷，分别部署于各要隘严加防守。并调蒙兵千余，屯驻于伊犁河岸以加强控制。

1912年1月7日晚9时，正值周献臣任标值日官，即命号兵吹号集合。时周任伊犁陆军步一标一营督队官，利用这个条件，率所属官兵先头出发攻入南门，占领南军械库，该第一营管带为满人，闻风而逃。李辅黄也占领了东门，队伍陆续进城。由于占领了军械库，各路军队得以从库中领取弹药，故实力充足。郝可权率队攻入将军署，志锐由后花园越墙而逃到东街马协领衙门。军标及各营房知大势已去，相约保护市街，各不侵犯，但北库在新满营正蓝旗协领蒙库泰管辖范围，不肯交出，并想据栅栏进行反击，周献臣、刘岐山被清兵击中身亡。革命军攻北库不下，而旧

式军械火药皆在库中存放，如城外驻扎各满蒙练军及绥定镇标防营的众多清军联合起来攻城，并取得库内军火，则革命军将处于危险境地。且城内居民多属旗民，城外居民多属维族及索伦、额鲁特、锡伯、察哈尔4部人民。他们对清朝的正统观念较深，对革命意义则不甚了解，若起而反抗，革命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势不能敌。幸志锐事先未及作好准备，故未敢动作。守北库的新满营的清军与革命军双方激战不已，相持不下。当时冯特民等主张用伊犁最大的24毫米口径后膛炮轰击，加以用煤油焚烧栅栏。杨缙绪则认为革命事业，首先在于得民心，用大炮、火攻的办法于巷战，势必伤及民众，对满营士兵也不宜多加杀戮，故主张仅向霍尔果斯方向发射几炮，借炮声威力，使其慑服投降。炮弹射出之后，惊动了边界对岸驻扎的俄国军队，他们原欲效同治年间借口干涉“回乱”，出兵占领伊犁之故伎，派兵一联队，由霍尔果斯河向伊犁暗中推进。而炮弹恰恰落于其部队之中，俄军以为我方早有准备，遂自动撤退。革命军乃得专心专力对付新满营。

在北库之新满营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革命军乃研究另取对策，决定由杨缙绪亲至卸任将军广福处，请其出为临时都督，仗其威望，促使新满营停火。

广福是锡伯族人，平时深为各方推崇。当时既老且病，推之再三，不肯就职。经杨缙绪等恳求，又不忍人民遭受战争的损害，于是答应出面维持。次晨，向众宣言和平解决。新满营对广福素来信仰其威望，当即停火。同时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推杨为会长，宣布五族共和之意义，战争遂告结束。接着以广福、杨缙绪名义召集都统及四领队大臣、新满营协领、佐领、革命军各首领、地方法团等在商务会开会，决定命新满营交出军装，命驻伊宁之锡伯营缴械。新满营在广福的保障下听命执行。锡伯营虽率学生400人、士兵千余拟由伊宁、惠远两面夹攻革命军，终因锡伯营领队大臣在革命党势力影响之下而听

命。杨缙绪遂提议，公推广福为临时都督。

1912年1月8日广福就职于商务会。所有新旧满营及四营部落诸长官均仍其旧，军标、镇标名义撤销，改编为新伊犁陆军第一师，师长由杨缙绪兼任。一面电南京政府，一面组织临时政府，并照会俄国领事。冯特民起草照会，于当日11时发出。文称：“照得敝国民军起义，响应武昌，推倒满清专制政府，改建共和国，系孙逸仙先生领导下整个革命。满清政府与各国所订条约继续有效，民军对于外国人生命财产一律保护。”俄领事复照承认民军。于是宣布五族共和，出示安民，大局遂定。

但当时志锐尚在逃，临时军政府司令杨缙绪乃出榜悬赏捉拿。榜示内容为：照得民军起义，为响应武昌，推倒满清专制，改建共和，今将军志锐、副都统希贤、吕巡捕、旗官春竹铭、孝昌等在逃未获，如有知情报信者，赏银十万两，获拿志将军解送军政府者，赏银二十万两，倘知情匿藏不报者与其同罪。志锐当时匿于乌协领处，乌恐受连累，其婿郑巨川在军政府充步兵团长，乃嘱其告密。冯特民、马步云带队前往捉拿，在乌协领衙门大堂东夹道内抓到志锐，拖至鼓楼东侧官钱局门前枪毙。春竹铭、吕巡捕亦于20日午后被拿获斩首示众于鼓楼。副都统希贤被冯特民、蔡大发等于当晚查获，革命党人本优待俘虏政策，将其释放并给以川资，经西伯利亚返原籍。

锡伯营领队富勒枯伦、索伦营领队奎禄、额鲁特营领队穆得春、察哈尔营领队博贵、老满营左翼协领勒西春、右翼协领德克奇吐、新满营左翼协领蒙库泰、右翼协领诺尼春、军标协陈金甲、都司马高陆等，均至都督府表示拥护新政府。尤以旧土尔扈特额王帕勒塔、伊犁维吾尔族首领玉山巴依等拥护最力。

计自起义至停战，革命军死亡者50余人，其中有督队官周献臣、队长刘岐山等。

军事停止之后，伊犁临时政府成立。前伊犁将军广福任临时都督，杨缙绪任总司令部军务部总长。其他任职成员是：

副司令：周德胜，安徽人，绥定县镇台。起义后入火药库放火自炸身亡，以示效忠清廷。

参谋部部长：贺家栋，伊犁知府，兼将军署文案。

参谋部副部长：徐心武，湖北人，哥老会首领。革命时欲联络汉、回乘机扰乱，被杨缙绪收抚参加起义。

财政司长：贺家栋兼。

财政司副司长：黄立中，安徽人，后补知事，军械局总办。

军务部部长：郝可权，湖北人。

军务部正庶务长：郑巨川，后充任步兵团长。

军务部副庶务长：李梦彪，陕西人。

外交司长：冯特民，湖北人，白话报总编辑。

外交司副司长：王伟彤。

民政司长：冯特民兼。

民政司副司长：黄希正，伊犁绅士，将军署文案。

平政院院长：冯大树，湖北人，日本警察学校学生。

前敌总指挥：李辅黄，湖北人，模范营步兵督队官。

第一标统：马凌霄，河南人，伊斯兰教徒，模范营步兵队官。

陆兵步兵旅旅长：陈金胜，湖北人，炮兵团长。

骑兵旅旅长：姜国胜。

炮兵团长：邓佐臣，湖北人，炮兵营长。

步兵第一旅第一团团长：邵端云。

步兵第一旅第二团团长：王题云。

义勇军步兵团团长：徐三泰（即徐心武、徐开泰）。

辎重队长：刘虎臣。

工程营长：张立山。

临时都督府一等秘书官：曾嘉祯。

临时都督府秘书科科长：曾一鄂。

临时都督府秘书科科员：贺镇鲁。

四

伊犁革命起义时，迪化仍在清朝巡抚袁大化控制之下。伊犁革命政府为了统一新疆，完成西北革命大业。须作进一步进取的步骤。于是在报告南京政府的同时，电袁大化促其响应共和。但袁大化顽固不化，死死忠于清廷，认为伊犁革命是叛变，骂杨缵绪为匪徒，干的是杀官劫舍的勾当。杨等面对这种局面，对袁乃不抱幻想，并组织东进支队，准备应付战争。袁大化复电表示愿以兵戎相见，即派旅长王佩兰率队向伊犁进攻。伊犁革命政府获此消息当亦派兵迎战。

伊犁起义时，伊犁将军广福已被清廷调任杭州将军，尚未赴任时起义爆发。广福于事变后于1912年1月8日电清廷内阁称：“……广福虽已交卸请假，因事机紧迫，万难坐视，出为排解，当即停战。查双方共伤毙三十人。志锐已被戕，印信遗失。中外国商民均未扰及，现在筹商善后方法。惟待饷殷迫，恳飭部由道胜银行拨二十万济急。”

新疆巡抚袁大化亦于1月9日致电内阁称：“……当囑省局电问细情，即无人应。已电飭精河参将飞速捷报，并派陆军马队一营前往侦探，俟得确耗再派全队往援。但兵少饷绝，省库空虚，若有变端，不堪设想。能否拨数万金，添招数营镇扎，以支危局……”

清廷内阁复电：“……多派营队驶往救援。至请拨款添营一事，现在部库竭蹶异常，万难兼顾，着该抚勉为其难，先行就地筹措，暂救目前之急，一面电商长庚（注：当时长庚任陕甘总督）设法陆续接济。”（1912年1月10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同日，又将伊塔道尹潘震电报转至内阁，其内容有：“……惠远陆军旗多于汉。广（指广福）既能出调停，即知其无能为。独

立之说，借广为招牌，擒兵必不认。饷械无出，岂能久。”认为拖以时日，临时政府将维持不下去。但袁暗中却积极备战，一面致电陕甘总督长庚、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额勒浑请取消独立都督称号，一面密召文武各官员，称不能为广福所惑，调集各军听候攻讨。

经过电报往返周折，清廷电长庚、额勒浑、袁大化：“对伊犁问题速商办法，如能和平了结，固属甚善，倘不服劝导，即派队前往，剿抚兼施，以保治安而消反侧。”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统治甘肃而效忠于清室的长庚，他只能对陕西的革命起到牵制的作用，根本无力向西出兵支援新疆的袁大化。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额勒浑则自顾不暇，他在致电清廷内阁的电文中，诉苦说：“塔城素无军队，虽有旗绿各营及满蒙各兵，仅可保守城池，且并不能征战。即现行招募，亦缓不济急，又无饷，又无械，如此情形，何以措手？领队尚未到任，无人接办，以目下论之，援变乱之伊犁而忽完全之塔城，非计之得也。再四思维，勒浑有守土之责……”至于阿勒泰，清廷为了安抚当地人民，发表巴郡王子帕勒塔为阿尔泰办事大臣。袁大化闻知发密电袁世凯加以反对，说：“帕勒塔曾游学东洋，性情未定，若仍忠王室固属有益，倘稍慕独立，大局愈难设想。”其实阿尔泰的局势并非任谁为办事大臣就能得到加强，那里的兵力仅能维持地方治安，甚至连这一点也难以完全做到。

五

伊犁临时当局已看到袁大化对伊犁的封锁及塔城的空虚这一形势，同时由于粮饷、军火与群众情绪等都不允许久处一隅，坐而受困，因此决定出兵东征，伊、新之间战争于是正式展开。

时袁大化已派王佩兰等率兵前来进攻，伊方乃任李辅黄为东进支队长兼步兵团长，吴炳乾、高怀忠、贾汉三为支队参谋，率

步骑兵各一团、炮兵一营及轻重队出发迎战于精河。伊军在精河与清参将刘海龙激战6小时，将刘军击败，刘军东逃退守固尔图，革命军队攻下精河厅（今精河县），革命军前卫独立骑兵团由钱广汉率领，乘胜率兵直迫固尔图。此时钱广汉与李辅黄意见不合，且有叛变趋向，伊犁得知此一情况后，杨缙绪即亲赴前线指挥。杨刚到精河，钱广汉与蔡乐善、李益顺、王永兴、郭锦章等率所统马队3营降敌，参谋吴炳乾、贾汉三、副队长秦又山等牺牲。钱广汉叛变后，会合王佩兰的军队将李辅黄所率东进支队全部包围于固尔图。但炮队因行动不快，未能如期到达固尔图，尚在包围圈以外。王佩兰、钱广汉闻知杨缙绪已到精河，即派骑兵1队由南山边向精河移动，企图将杨军包围。王、钱所派骑兵到达沙泉子时被伊方炮队发现，遭巨炮轰击，乃不得不退却。这时杨缙绪身边仅有卫队200人左右，李辅黄及所率队伍又情况不明，形势极为险峻。当时署伊犁将军额尔浑则于1912年2月24日致电内阁报捷，文称：“探得二十四日（民元二月十一日）早八点，新疆陆军协统王佩兰督军在四棵树迤西古尔图地方与伊犁贼匪接仗，官军异常英勇，战约四时，毙贼数百，伤贼无数，生擒百余，夺获枪械马匹甚多……官军伤亡不多……我军大获全胜。”并提出了下一步作战部署：“期早除灭。”在额尔浑当时看来，已经胜券在握了。同月，袁大化也在二十八日（公历2月15日）自迪化致电清廷内阁：“……擒获伪东进支队司令李仁同，正法枭示，余贼窜去，现飭王佩兰乘胜追剿。署伊犁镇周得全军亦赶到，俟过精河，再令周得全出登勒斯口，王佩兰出果子沟，察哈尔两翼并额勒浑兵出头台山路，三路进攻，贼必内溃。……又密招匪回队作内应，逆首贺家栋、杨缙绪不逃必成擒。预请飭下外部照会俄使，贺杨二逆俄国不得收留，余可从宽。”袁大化、额尔浑又进了一步，已经在料理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上述电文中所说的情况很可能被额、袁二人夸大了，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伊犁革命军的确处境相当危险。当时虽有炮队

退守精河，但要防御清军进攻，显然力量不够充足，于是众向杨缙绪建议退守伊犁。杨则认为如果退却将无法收拾，甚至有前功尽弃之可能。为了取得进一步的胜利，杨除一面急令察哈尔总管索大调旗练马队1000名，武装支援，并限2日内到达精河；一面令炮队严阵以待，又亲自率卫队骑兵在精河通往伊犁的要隘黑山头收容由前线溃退的官兵，计一昼夜收得1000余名。队伍集合之后，稍事休息、吃饭，然后杨缙绪向官兵宣讲革命的意义，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号召大家建立新功，并表示愿与大家共同奋斗，直到战死，决不回头。因之士气大振。杨将这千余人编为4个大队，每大队分为2个小队，每个士兵发给内包糖馅之棉花一团，进退以灯为号，晚间口衔棉花团视中央绿灯为记，向沙泉子急进，出敌不意，猛烈袭击。

王佩兰等当时判断错误，以为革命军在固尔图覆没，精河兵力单薄无力出击，因而对精河方面毫无戒备。不料革命军突然进攻，仓促之间应付不及，只得且战且退，奔至固尔图。革命军则一鼓作气，追至固尔图。此时察哈尔马队亦赶到，王佩兰等无力抵抗，乃向迪化方面逃窜。这一仗，袁大化方面伤亡甚重，革命军重要骨干方孝慈阵亡，马队营长李仁同、步兵营长李得胜、邱不成、参谋官高怀忠等数十人死难。

至此，双方军事形成对峙状态。

袁大化对于此次失败并不甘心。除派兵增援外，还派刺客企图暗杀革命领袖人物，同时又煽动各少数民族起来破坏革命阵营。杨缙绪因后方不靖，将前方防务布置妥当之后，返回伊犁坐镇。

革命军占领精河时，杨缙绪、冯特民曾向临时革命政府报告伊犁革命的经过，并请求中央政府劝袁大化毋轻启战端，承认伊犁革命政府并允许向俄方购买枪炮。黎元洪接电后致袁世凯，略谓：“……伊犁我军倡议，九城皆已光复，惟种类甚杂，故依人道主义，推前将军广福为都督以息兵端，新抚极力反对，等因，如

伊、新战祸一开，关系甚大，恐牵动大局，理合电达恳请转电新抚与伊犁，彼此妥为接洽，免起冲突，大局幸甚！”（民国元年2月21日）。袁世凯于1月22日复电称：“……尊见所虑极是，已电致新抚与前将军广福接洽，务弭战祸，以保大局。”2月23日黎元洪又电袁大化：“北京已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以增进民国幸福，阁下领袖西北，自不忍涂炭民生，招致外侮。且阁下亦为吾族俊杰，民国初立，尤需长才。闻伊犁已数电就商，愿及时有为，以安大局，特此忠告，希即谅察。”

袁大化在战不能胜，又有上面督促议和电报的形势下，不得不通电伊方要求议和。时杨缙绪已回到伊犁。

伊犁方面派冯大树、李辅黄、贺家栋、郝可权、徐建国、陈锦等为全权议和代表与袁大化议和代表开谈判会议于塔巴哈台。

经过谈判，双方代表皆趋向共和。袁大化迫于形势，于1912年3月8日通电正式宣布共和并电易帜，请求辞职，同时密保喀什道尹袁鸿佑任新疆都督。4月，北京临时政府发表袁鸿佑任命。

袁大化之所以密保袁鸿佑接任已职，是想使新疆继续控制在保守的旧势力中。因当时在新疆的旧官僚如布政使陈际唐、提学使杜彤、提法使宋敬熙等都先后离新东归，所以他想到了袁鸿佑。袁鸿佑接到任命电报后，在赴省城迪化上任途中，被哥老会首领魏得喜、边永福等杀死，原拟解往迪化的饷银20万两也被会党瓜分。

袁大化因袁鸿佑被杀，既不能离职脱身，也不能立即从迪化走掉，于是一面密保杨增新任都督，一面继续与伊犁谈判。但暗中却仍在进行破坏活动，唆使益恒山等煽动伊犁察哈尔左翼蒙古总管鄂王泰、副总管苏木彦等于4月暴动。杨缙绪速派炮队统带陈金胜、马队统带姜国胜进剿平息。

5月13日袁世凯主持的北京政府下令将广福改任为伊犁镇边使，任命杨缙绪为伊犁镇统兵，贺家栋为伊犁道尹。同月17日塔尔巴哈台参赞额勒浑电呈辞职开缺，任命毕桂芳为塔尔巴哈台参

贊，毕未到任前由塔城领队大臣文琦兼署。同月18日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尚未离开新疆的前任都督袁大化则委以督办南疆剿抚事宜的重任，所有省垣及南疆军队均归其节制调遣。这种措置使伊犁革命政府十分难堪，因为不仅降低了广福、杨缵绪的职位，而且大大加强了反动势力袁大化的权势，当然引起他们的极力反对。5月23日伊方致电上海各报馆转黎副总统，指控袁大化“于共和政体始则仇视，继则隐匿，旋又假认，终乃巧避，夸诈徘徊，毫无宗旨。即如国旗未改，顶戴未除，公文犹多都督、巡抚部院，外表如此，其他可知。”及至上述任命公布之后，贺家栋、冯大树、李辅黄又于5月31日在上海《民生报》上，公开指责政府措施不当：“各报馆鉴：近日国务院对于新疆诸事较满清政府的尤谬，分揭于左：塔城本系伊犁副都统分驻，今忽任命参赞大臣，谬一；此缺本可俟伊新协商统一后再议，乃不顾边局安危，骤易生手，谬二；兼署之文琦去腊到领队后，即有贪款不治舆情，新任桂芳亦未必来，太生枝节，谬三；南疆事多系因袁大化不实行共和，反诬为匪徒，谬四；官吏被戕，满清时亦必查其平日居官如何，分别劝惩，一概准奖，毫无公理，谬五；……伊犁都督系众公举，不待协商，遽改边使，谬七；伊犁道早已取消，今忽任官，谬八；旧制只有伊塔道，今忽改为伊犁道，谬九；……”同时揭露袁大化之丑恶面目，指出袁：“初闻宣布共和，大骂项城（注：指袁世凯）不忠，继知事去，遂假认，希图割据。后因人心离散，又欲由塔城赴俄道脱逃。”并指出国务院之所以采取上述荒谬任命，皆因袁大化一面之辞，呼吁舆论制止国务院受袁大化一人之愚弄。同日同报刊登贺家栋通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参议院、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各报馆、各团体，既指责北京政府又揭露袁大化，表示拒绝担任伊犁道尹职务。

袁大化被起用负责南疆剿抚事宜的这一举措，不仅受到伊犁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伊、新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1914年8月15日上海《民生报》报道新疆各团体对国务院公开偏

祖袁大化，认为是“大拂輿情，貽笑邻国……共和初基，尤胜专制”。

新任塔城参赞毕桂芳尚未到任，1912年7月间，塔城发生纷乱，前任参赞额勒浑逃走俄国之买卖城。毕桂芳要求北京拨款15万前往赴任，其理由是阿勒泰事少反而拨16万，塔城地位重要仅只有13万经费，“恐难措置裕如”。袁世凯批准酌量增加，企图以塔城牵制伊犁革命势力。

在舆论压力和伊犁方面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加之1912年6月3日夜蔡乐善所带陆军十八标第二营哗变溃散，袁大化于6月5日辞职离开迪化东行人关。袁东行之后，虽野心不死，仍继续活动，但已无关大局了。

六

杨增新既于1912年5月18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在袁大化离开迪化的当天即行接印视事。

杨增新上任之后，表面上主张共和，愿以和平方式解决新伊之间的争端。伊犁革命政府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亦不得不以和平手段来达到革命目的。

1912年6月间，省方派朱瑞墀、司得全为代表，伊方派贺家栋、李辅黄、黄立中为代表，经过反复谈判，于7月8日达成协议11条，内容主要是：新疆承认共和，伊犁首倡共和之军队及所有人员为中华民国共和党员；全疆统一，阿尔泰、塔城在新疆范围之内，公认杨增新为新疆最高行政官，重新组织全省机关，两方人员皆可推荐；广福都督将来辞职后，予以优待；将钱广汉、蔡乐善、李益顺、王永兴、郭锦章等作为公敌，不再留于新、伊军界；伊方战争中牺牲的人员加以抚恤，因参与共和而被新省拘禁者，一律释放等。以上条款亦称“塔城协商条件”，7月28日经伊方签字交杨增新，新、伊议和至此告一段落。

议和达成协议之后，在政府组织和人员安排过程中，杨增新表面上大讲新、伊一家，赞助革命党人，实则运用各种阴谋诡计，将革命党人分到各地，使其势力分散，然后逐个解决。

经过双方几个月的谈判，最后的人事安置如下：

1912年10月27日北京政府公报称：任命杨缙绪署理喀什提督，未到任前杨德胜暂行兼护。经杨增新电催，1912年12月13日，杨缙绪将伊犁陆军师长及伊犁镇总兵各印信及文件卷宗交给广福，即日启程南行喀什就职。伊犁陆军师长的遗缺，1913年3月6日经杨增新电呈北京政府请令广福兼任。

伊犁民政司长贺家栋调任新疆民政司长。1912年8月15日北京政府公报任命贺家栋为新疆民政司长兼南疆宣抚使。贺因受伊方少数人攻击，又以丁忧，遂请假并要求回原籍，9月9日北京临时大总统令：新疆民政司长贺家栋丁忧，着改为署任兼充南疆宣抚使。贺实际上并未上任，即辞职回籍。杨增新当然乐于同意，上报大总统批准，并给银10000两作为路费。伊犁财政司长黄立中任新疆省财政司长，北京政府于1913年1月6日发布命令，黄于5月4日到职，7月1日即辞职交卸，后东行入关。

谭钟麟调任塔城副将。

姜国胜调任哈密副将。

郝可权请假回原籍，杨增新发给3个月薪饷，旅费1000两，令其赴湖北考察军政并电黎元洪量才录用。

徐三泰发往甘肃交张巡抚使委用。后徐亦请假回原籍四川，杨增新也发给旅费，交四川将军量才录用。

伊犁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冯特民则任伊塔视察使兼伊犁镇边使署政治顾问。伊塔镇台则委李辅黄担任。

这样，杨增新就把伊犁革命力量以分散到各地的办法使之无法发展。伊方对杨增新的种种瓦解手段，虽然心中有数，但已无力加以抗拒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由于南北谈判达成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的协议，整个形势急转直下。

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临时大总统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从此开始。处在西北一隅的伊犁辛亥起义运动，既失去了北京政府在上方的支持，又受到杨增新在新疆的破坏，此时基本上已成了难鸣的孤掌，完全、彻底地被杨增新所消灭，已经是时间不久的事了。

未被调走的冯特民、李辅黄仍拥护广福为都督，在伊犁苦苦支撑（当时，广福的都督已被北京当局取消，改为镇边使，都督署已经改为镇边使署）。原设之军务部改为师团部，取消了参谋部，于镇边署内设军务厅，其他民政、财政、外交、参事各司、院仍然照旧存在，表面上为新疆统一，实际上保持着独立局面。但是，这种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伊犁历来依靠内地支持，并不仰仗本地财力，现在协饷断绝，全靠自己发行纸币，这种空头钞票当时已达200万之巨，情况十分严重，几乎已到无米为炊的境地。在争取北京政府支援已属无望的情况下，冯、李为了伊犁的生存，不得不设法谋取外援。于是以允许俄国在境内开矿、采木为条件向俄国借债500万。

杨增新对于伊犁的独立状态，当然如鲠在喉，不能允许。他一方面拉拢塔城、阿尔泰的文武官员以孤立伊犁，同时暗中监视冯、李的行动，曾以密电请北京政府调冯、李等去甘肃任道尹，又以重利诱惑他们去迪化任职，均遭冯、李拒绝。后发现伊方拟向俄国借款，乃抓住此事，于1913年2月15日向北京发电控告冯、李破坏新疆统一，别有用心，称：“现在伊犁军队只有一千数百人，是以暂能相安，令若五百万之俄款一旦借成，则以此巨款添兵购械，新疆二次革命之举动即在目前。……查伊犁人员，并无尊重中央之思想，其所以勉奉中央之命令，尚未显然反对者，以兵饷望中央接济，赖有此以为之操纵耳。今一旦借获五百万之俄债，不第新疆不能统一，即大总统命令亦有不能行于伊犁之时，关系新疆安危，实非浅鲜。……真俄款借成，伊犁益将有恃无恐，益与新疆为敌，边祸日亟，乱无宁日矣……”杨增新请北京

政府不予批准伊犁对俄借款。与此同时，杨增新还采取了以下的手段来对付伊犁：

首先是收买伊方人员为其所用，从内部进行分化离间活动，同时向杨随时密报。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匡时。匡时，湖北人，伊犁政府初成立时，李辅黄等聘其到伊犁参与工作，后趁被派往迪化时被杨增新收买。在新、伊谈判期间，他一方面挑拨伊方主要人员，进行离间，另一方面又鼓动冯、李与迪化对抗，从而削弱伊方力量，孤立伊方。这次向俄国借款一事，也是匡时刺探后密报杨增新的。

其次是派许国祯为伊犁道尹兼交涉员与伊方谈判改变伊犁独立局面，归属新疆，并进一步统一塔城、阿勒泰。

最重要的一手是派马得元一营兵力至距惠远城很近的绥定驻扎，待机行事。杨增新得到北京政府批准“冯、李横行不法，请除去之”以后，即命令马得元动手。1913年12月间，马奉令乘清晨开城门时潜入城内，将冯、李等于睡梦中拽至街头枪杀。

杨增新达到目的后，即于1913年12月14日通电南疆文武官员。内称冯、李“包藏祸心，意存破坏，并有潜谋暗杀情事，经广镇边使电告中央，奉令依照军法枪毙，现在新伊业已实行统一，地方安静”云云。

冯、李被杀害后，广福于12月28日又电国务院取消冯大树、武庆荣的伊犁驻京代表资格。

冯特民、李辅黄被杨增新采取卑劣残酷手段杀害后，伊犁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杨增新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变体制，裁减军队，安置人员，整理币制，以达到伊犁完全置于他的统治之下。

当时伊犁尚有广福维持的过去军政人员，虽然于1913年5月8日任命的新疆都督参谋长杨飞霞调赴伊犁任宣慰使，1914年1月北京政府又令将镇边使改为镇守使归新疆都督统辖，但杨增新因广福还有一定威望，未能立即动手改制。杨于同年1月24日致电北京政府：“……广镇边使德威素重，各界归心，虽在病假，暂

请勿庸开缺，借资镇慑。如该镇边使实在病重，万一不起，再请照大总统令实行改设伊犁镇守使一员，专管军队……”

广福于1914年2月1日病故，袁世凯于2月8日令以陆军上将例给以优抚，发给治丧费1万两，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

广福死后，同年2月6日在新疆与北京政府往返电报之后，北京政府明令撤销伊犁镇边使改为镇守使，并着将旧属伊犁将军的职权归新疆都督兼领，正式任命杨飞霞为镇守使并加副都统衔。2月8日又令该处军队统归镇守使节制，并办理各旗营及蒙哈事宜。

杨飞霞于1914年2月正式接职视事，除裁减军队，将伊犁陆军一师改为混成一旅外，并进行改组机关等方面事宜。从此，伊犁完全置于杨增新的统治之下。新疆归于统一，杨飞霞代表杨增新在伊犁以镇守使的名义开始了他的统治。

山东辛亥革命风云录

马素珍 弓 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告独立，脱离清廷。山东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的影响和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推动下，一度倡导和促成了山东的独立。尽管山东独立后来受到袁世凯的破坏和镇压^{*}被迫取消，但山东同盟会员在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下，仍然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相继发动了山东登州（蓬莱）、黄县、文登、荣成、青州、即墨、高密、诸城等地的起义，促成了烟台山东军政府的建立。山东的独立及各地起义，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一大批革命志士在中国历史上名垂千秋，万代景仰。

一 山东独立前的形势及革命党人的活动

19世纪末，腐朽的清朝政府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与帝国主义列强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清政府事事依赖于洋人，受制于洋人，成为“洋人的朝廷”（陈天华语）。山东受列强瓜分在甲午战争之后就开始了。甲午战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未几，德租胶澳，英租威海”，致使“鲁东父老日以怨清”，“少年更多感愤扼腕，忧伤时事，自庚子联军陷京师，国人皆知非覆满不足以救亡。”^①

马素珍（女）、弓强，山东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

为了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于1901年4月宣布推行以废科举、办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奖励实业、编练新军等为内容的“新政”；1906年9月又宣布“预备立宪”；次年又宣布建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

山东在推行“新政”和实施预备立宪中，以派员出国留学、编练新军五镇、兴办实业、设立咨议局尤为突出。从1904年始，山东抚部院派遣各科学学生赴日本留学，到1908年即达92人^②，留日学生大多数成为以后革命的骨干。1905年2月，袁世凯汰弱留强，增募壮丁，将山东原武卫右军先锋队改编为陆军第五镇，分别驻扎在济南和潍县，该镇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在山东独立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政”推行伊始，山东抚部院还采取了一些鼓励农工商各业发展的措施，从客观上刺激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后，胶济、津浦铁路的相继通车，进一步促进了山东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据1911年不完全统计，民族资本经营的厂矿企业就有66家^③。山东沿海的烟台、青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更快于内地。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山东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反封建、争权益的斗争。1909年6月，山东成立了咨议局。山东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这一合法阵地，进行了国会请愿、揭露时弊、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权益的活动。

清廷推行“新政”和实行“预备立宪”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挽救危局，结果却适得其反，进一步加深了封建统治的危机。提倡出国留学，使许多知识分子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制度，从而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鼓励兴办实业，不仅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打开了闸门，而且还造就了封建专制制度掘墓人。开设咨议局，使资产阶级立宪派有了抨击朝政的合法场所。而编练新军，则增加了财政开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直接激化了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危机。

《辛丑条约》订立后，山东的统治者把大量战争赔款转嫁到了广大人民头上，封建剥削日益加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德国

帝国主义又依仗《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加紧了对山东经济、文化、政治的侵略，致使各地“民变”频起，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1905年5月，莱阳县农民在曲诗文的领导下，揭竿而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捐武装起义，从者达五六万人。这次暴动“实因知县征收钱粮，浮收勒折……，近又借口新政，勒收亩捐、房捐、人口捐等，民不堪其苦”^④引起的。莱阳人民的抗捐斗争，得到了海阳农民的响应，在宋焯文的领导下，海阳农民也举行了抗捐抗税斗争。与此同时，山东工人阶级也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工矿主的斗争。1907年春，德人开设的坊子煤矿矿坑发生爆炸，一百多名中国工人遇难，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愤怒，罢工持续了数周之久^⑤。

在这种形势下，山东革命党人加紧了革命活动。

1905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创立后，留日山东籍学生纷纷加入。从1905年7月到1906年5月，山东留日学生入盟者即达53名，居全国各省同时期入盟人数的第四位^⑥。山东籍留日学生首批入盟的有徐镜心、徐镜古、刘星楠、陈保三、杨佩文、傅永昌等人。徐镜心被推为同盟会山东分部主盟人。徐镜心，字子鉴，山东黄县人，廪生，早年肄业于烟台芝罘毓材学堂，1902年转入济南高等学堂肄业，1904年赴日入早稻田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成为山东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颁令取缔中国留学生，以打击革命势力，激起留学生的愤怒，一部分留学生愤而回国。留学生回国期间，正值清廷废除科举之时，他们乃趁此时机，谋办学校、报馆、书店，以开通风气，宣传革命。

革命党人首先在山东各地创立了十多所公学，作为宣传革命、培养革命力量的阵地。影响最大的有，1905年同盟会员谢鸿焘、徐镜心在烟台创办的东牟公学，1906年同盟会员刘冠三在济南创办的山左公学。刘冠三，名恩赐，以字行，山东高密人；清光

绪二十八年考入济南师范学堂，1905年加入同盟会。山左公学建立后任校长。山左公学被清政府查封后，刘冠三到青岛，于1908年和同盟会员陈干创办了震旦公学。另有曹州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王鸿一，在曹州创立了自新学堂和曹州中学。这些公学，名为学校，实为革命党人往来机关。同盟会员以教学作掩护，大力宣传革命主张，发展同盟会员。经过艰苦的工作，在校学生大半加入同盟会，“致力革命者甚多”。尽管这些学校后来遭清政府及德帝的查封，被迫停办，然而革命思想已普及一般青年。

革命党人除创建公学外，还先后创办了许多揭露时弊、鼓吹革命的报刊。早在1906年秋，留日学生、同盟会员丁惟汾就在日本和另一同盟会员蒋衍升创办了《晨钟》杂志，并寄递国内。丁惟汾，字鼎臣，山东日照人，1903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赴日入明治大学学习法科专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徐镜心回国后，继为主盟人，成为后来山东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1906年，刘冠三、王訥在济南创办《白话报》。还有陈命官、齐带南、丁训初、李凤梧在烟台创办《渤海日报》。这些报刊，在宣传革命、启迪民智、倡导民主共和观念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以致数年之间，革命空气弥漫全省。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还建立了许多以研究文化为名的小团体，从事革命宣传。1911年夏，徐镜心、刘冠三在济南创办戏剧改良社，孙锡纯在烟台创立萃萃图书公司，乐志杰在青岛设书局刊印嘲讽历代皇帝、仇毁帝制的书籍，广泛传诵。

革命党人的活动，为山东独立和各地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山东独立经过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拥护革命的士兵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随后全国各省相继起义，宣告脱离清廷，建立临时

政府。山东同盟会员在如火如荼的全国独立浪潮面前，积极响应，力图山东举义。此时，山东籍的留日同盟会成员也纷纷回国，齐集省城济南。他们以济南各高等学堂为活动基地，在学界、商界、政界和新军官兵中开展活动，联合各方力量，准备举事。

山东咨议局中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加紧了活动。咨议局成立之初，内部就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秘书长张汉章为首的封建官僚顽固派，时称六二党^①，他们把持了咨议局大权，另一派是以于世峰（黄县人）、王訥（安邱人）、周树标（青州人）等人为首的立宪派，他们虽不主张实行革命，推翻清政府，但又不满清廷顽固派的专横，特别是不满六二党的专横跋扈，故尔能在一定时期内与革命党人结成暂时的联盟，共同反对清廷。他们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绅商、学界、政界上层中积极活动，力促清廷速开国会，早日实行君主立宪。

以山东巡抚孙宝琦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则是极力反对革命，维护封建统治。孙宝琦，字慕韩，浙江杭县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早年奔走于李鸿章门下，1900年为直隶候补道，1901年受袁世凯保荐，奉旨军机处记名，此后又两次出洋，历任驻法、日、葡等国公使，熟谙洋务，1908年任山东巡抚。因此，孙一方面与清廷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矢忠于朝廷，一方面又对清朝贵族的腐朽无能深感不满。武昌起义后，孙宝琦从维护清廷统治立场出发，电请清廷“解散现任内阁，另简贤能以维大局”^②，“实行公天下，宣布共和……保皇室奕祀之繁荣”^③。并建议清廷开仓散财“赈济灾黎”^④。孙宝琦的这些所作所为，在当时各界中颇具迷惑性，就连革命党人对孙也抱有幻想。在山东独立过程中，革命党人时时以孙的态度为行动的依据。因而，孙宝琦对革命的态度不能不影响着山东时局的变化。

在酝酿山东独立中，革命党人虽则积极奔走呼号，联合各界群众，向清政府发起猛烈进攻，但却未能理直气壮地勇挑独立重

担。他们非常天真地希望有一位出身显贵，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物出面奔走各界，联络和协调各派之间的关系。革命党人的这种想法，深为立宪派赞许。于是他们就把当时尚在北京吏部候补的夏溥斋奉为合适人选。夏溥斋，号渠园，山东鄄城人，其父系清朝官吏，官至云南提督。夏本人自幼接受了康梁维新思想，较为倾向革命。在京候补期间，常与一些归国留学生来往，在一起议论时局，抨击朝政，因此，他便成了山东独立前各派易于接受、众所瞩目的人物。1911年10月30日，济南各派互相联络，以山东省绅商各界和教育会的名义，向尚在北京的夏溥斋发了两次电报，敦促他火速回济“共谋大计，以保桑梓”^⑩。11月2日，夏赶到济南，3日山东各界开会欢迎。夏在会上就国内外形势作了一番演讲，博得与会人员的好感。会后，各派代表纷纷找夏陈述各自的主张。从此夏便穿梭往来于各派之间，扮演了联络、维系各界的角色。

11月初，济南盛传清廷拟向德国借外债3000万元，以山东土地作抵押，山东当局也准备向德国借款300万。于是民气愤激，一致要求咨议局开会，加以抵制。11月5日，济南各界人士在咨议局召开座谈会。会上，提出了由徐镜心等人事先拟定的《山东实现独立大纲》七则，要求立即组织临时政府，实现山东独立。会后，夏溥斋、丁世峰将《独立大纲》七则改为《劝告政府八条》。夏溥斋、丁世峰、周树标等人又面见孙宝琦，要求孙向清廷代奏，并声明，如三日内不答复，即宣布独立。孙宝琦恐众怒难犯，只得应允代为电达。次日，各界继续开会，众人纷纷指出独立必须马上实现，并推孙宝琦为独立交涉长。孙断然拒绝，并说：“我系清朝官吏，满清一日不倒，我须尽一日之责任。”孙宝琦的顽固态度激怒了众人，矛头齐指事事仰孙鼻息、不办实事的咨议局。会后，各界又发传单，议办民团，并酝酿推翻咨议局。

11月7日，各界代表再次集会，一致要求推翻阻碍独立的绊脚石——咨议局，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会”以取而代之。会上，

选举夏溥斋为会长，夏又提名原咨议局副议长于普源为副会长，丁世峰为秘书长。联合会乃成为山东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

11月9日，清廷复电山东八条。革命党人鉴于清廷已被迫接受《劝告政府八条》，欲早日促使山东独立，多次与丁世峰等人商议，联合行动。同时，革命党人发动各界群众掀起了更大的请愿浪潮。一连几日，各界代表不断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宣布独立，脱离清廷，闹得孙宝琦坐卧不宁，一再向清廷叫苦：“近日东省绅商学界倡独立之说，集众会议，汹汹不可遏抑”，虽“再三劝告不可独立，而大众不听。”^⑩

就在革命党人发动各界向旧官僚顽固势力发起猛攻之时，驻扎在济南的北洋新军五镇内部也起了变化。在此之前，革命党人就在五镇中宣传革命思想，鼓吹山东独立，一部分中下级军官逐渐同情革命，拥护独立。五镇统制张永成慑于革命声势，告病卸任，部分官兵便拥戴倾向革命的十协协统贾宾卿代理统制之职，贾便成了独立期间的显赫人物。

11月9日晚，五镇参谋黄治坤及其他四位军官一起到联合会找夏溥斋，要求山东独立。夏对五位军官的要求未做明确答复，只答应与“孙抚台商量，再作计划”。孙在听了夏的汇报后，仍顽固地表示“惟有以身殉职，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宣告独立”^⑪。孙宝琦虽在口头上如此坚决，但在来势凶猛的独立浪潮面前，也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在随后发给内阁的急电中表示“琦惟有相机因应，挽措危局”^⑫。此时的孙宝琦对待独立的态度是左右摇摆不定，他一方面表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又屡电请清廷将五镇归其“节制调遣”，“俾可联络而备缓急”^⑬，企图以武力对付日益兴起的独立运动。

此时，武昌已独立多日，革命军正急攻南京。山东革命党人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抓紧做贾宾卿的工作。11月10日，丁惟汾、周树标、杨明瀚、王讷等人赴五镇驻地谒见贾宾卿，劝他立即赞

成独立。贾慨然允诺，并表示愿意亲自去劝说孙宝琦，使其赞成独立。贾宾卿的表态，意味着五镇绝大多数官兵转向了革命党人一边，赞成独立的力量大为增强。接着，革命党人又运动立宪派，使其赞成并推动独立。12日晚，谢鸿焘、丁惟汾与夏溥斋、丁世峰反复协商，力主独立。夏、丁（世峰）二人仍左右徘徊，犹豫不定。谢鸿焘对他们二人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双方终于协商一致，决定11月13日召开大会，最后决定山东独立问题。

11月12日，革命党人按照计划召开各界会议，讨论有关山东独立的具体事宜。在各界代表的压力下，联合会负责人终于同意山东独立。在讨论孙宝琦的去留问题上，革命党人则接受了立宪派“仍留孙抚”的主张。最后会议决定，独立时，推举孙宝琦为大都督，贾宾卿为副都督，第二天召开大会，正式宣布独立。当日，革命党人还决定创办联合会机关报《齐鲁公报》，在第二天宣布独立时发行创刊号。

1911年11月13日，山东独立终于实现了。这天一早，各界按计划齐集联合会会场，孙宝琦应邀到会。大会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9点。会上，各界代表先后发言，要求马上宣布独立，而孙宝琦仍一拖再拖，拒不表态。这时，丁惟汾等同盟会员早已将会场各门完全把住，禁人出入。新军代表黄治坤则向夏溥斋大声喊叫，扬言孙宝琦再不同意独立，就要用武力解决。夏无奈，只得台上台下斡旋，孙宝琦也坐立不安。夏趁此劝告孙要认清大势。正在孙犹豫不定的时候，夏溥斋向大众高声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独立了。”当即全场欢声雷动，丁世峰将预先写好的《独立宣言》张贴在台上。宣言内容是：

第一条：自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年11月13日）山东全省人民与清政府实行断绝关系。

第二条：自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山东全体人民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

第三条：关于本省内部组织，分为议决、军事、行政三部，

和衷共济，俟北京底定，共和政体成立，实行变更。

全场高呼：“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接着，大会选举孙宝琦为山东大都督，贾宾卿为副都督。孙宝琦提出以联合会为临时议会，以抚署为临时政府，均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山东独立终于实现。

山东独立后，各界“莫不……额手庆贺，奔走相告，欢声若雷”，人民“之望独立也，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慕父母”^④。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联合会，提出建议，要求改革。顽固派对独立极度恐慌，独立的当天晚上，孙宝琦召开司道会议，“旗籍大员都相对无言，枯坐数刻，相率散去，至有大哭者”^⑤。独立后，原五镇统制张永成连夜逃走，各衙门的旧官僚、旧官吏不是逃遁，就是辞职。地方豪绅对独立也恨之入骨，旅京山东同乡对独立纷纷责难，并要清廷速派重兵来山东“戡定”大乱。当上都督的孙宝琦也屡电清廷，一再表白自己宣布独立，实属迫不得已，以洗刷“宣布”独立之“罪名”。

尽管独立后的大权被孙宝琦一手包揽，临时政府又是过去抚署的翻版，但在联合会特别是革命党人的敦促下，临时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施政措施。其主要措施有：与独立各省联络；通电各地维持秩序；通电各地钱粮饷项及各项公款不得随意动用；布告防止谣言；安抚驻德州、青州两处旗兵；通电德州机器局慎重保管；堵截张勋溃兵。

自山东独立之初，取消独立的逆流即在暗中酝酿着，至袁世凯上台，这股逆流便形成了强大的复辟力量。

11月6日，袁氏内阁组成。袁一上台，就把地近京畿的山东独立政权作为他破坏革命的第一目标，密委其心腹山东候补直隶州张广建、候补知县吴炳湘到济南观察动向，监视各派活动，挑拨五镇内部关系。而五镇大部军官多系袁之旧部，袁氏一出山，他们便蠢蠢欲动。独立后，五镇中各级军官皆思升迁，临时政府对其要求则一概拒绝，招致部分军官的怨恨。代理统制贾宾卿虽

赞成独立，但因实力不足，有后退之意态。张、吴二人便趁此机会，大使手腕，挑拨、煽动，五镇内“拥张（原统制张永成）反贾”呼声一时甚嚣尘上。同时又谣传袁世凯的嫡系张怀芝要来鲁，一部分士兵扬言要杀贾宾卿，贾吓得不敢回营，放弃了对五镇的控制。从此，在五镇内形成了一个以二十标标统吴鼎元、炮标标统张树元为首的反独立派系，贾被迫辞去统制之职，由吴鼎元代理，支持独立的军官和部队全部被孙宝琦调出，五镇完全被袁系军官控制。这时，除五镇外，巡防营统领聂宪藩在张、吴二人的挑拨、拉拢下，也倒向了袁氏一边。

袁世凯一手拉军队，一手拉孙宝琦，利用孙宝琦矢忠于朝廷的特点，对孙恩威并施，又打又拉，使孙对袁命俯首帖耳，亦步亦趋地按袁世凯的步调行事。

反动势力调整力量完毕后，乃由五镇中反独立的一派率先发难。11月22日，以吴鼎元为首的顽固派军官联名具稟孙宝琦，致函联合会，要求立即取消独立。24日，由顽固派军官一手操纵的“山东全体维持会”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孙宝琦、原咨议局中的六二党代表，还有济南商会会长汪懋坤以及一批上层绅士。反动军官在会场外架起大炮，“一对对着巡抚衙门，一对对着联合会”^⑧。在大炮的威逼下，会议当场决议：取消山东独立。孙宝琦当场也表示同意取消独立。就这样，为时仅十二天的山东独立宣告失败。

独立取消后，张广建、吴炳湘“即发兵围学校，夺操枪，散学生军，勒令还乡，更布密警，严伺前日之倡率独立者”^⑨。12月12日，张、吴派出清兵，袭击了革命党人准备武装起义的据点——“宜春轩”照相馆和“万顺恒”洋货铺，逮捕了革命党人刘溥霖、萧兰池等十余人，当场枪杀了另一革命党人蓝盛九。这一事件称为“宜春轩案”。

山东独立取消的消息传开后，南方“民军大哗”，对孙宝琦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为大加挞伐。在孙的原籍，“乡人大愤，议

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孙宝琦本人也自叹：“君亲两负，不可为人。”^④在此形势下，孙宝琦只得一面电奏清廷，恳请罢黜治罪，一面向袁世凯举荐胡建枢代理巡抚职务。迨张广建、吴炳湘升迁后，孙宝琦更不能过问省中一切事务，只好躲到外国人医院去养病。

山东的独立虽被取消，而革命党人并未就此停止斗争，他们或则南下，联络南方民军，请教斗争方略，或则奔走于山东各地，与原在山东其他地区活动的同盟会员一起发动了一系列震撼清廷统治的武装起义。

三 烟台光复

在山东独立的前一天，革命党人就已在烟台举义，成立了军政府。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对山东的整个革命形势，并没有多大影响。一是因为当时全国各省（尤其是南方）相继独立，山东各地的斗争，也是此伏彼起，风起云涌。清政府时已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二是当时的山东同盟会员中的徐镜心等人，对孙宝琦的独立一直就认为不可靠，主张再图革命。更重要的是，当时山东革命党人的主要力量和活动中心并不是在省府济南，而是在山东半岛——胶东一带。

在烟台及胶东各县，革命的主要力量仍是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员。山东早年的留日学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从胶东各地区选派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日本接受了自明治维新后逐渐发展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痛恨清王朝的腐败统治，矢志寻求废除专制、创建共和的救国之路。在50多名山东籍同盟会员中，就有33人来自胶东各县^⑤。同盟会在国内设立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其中北方支部的机关部就设在烟台。因而烟台成了当时同盟会员活动的根据地，在山东辛亥革命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1906年起，山东胶东各县的留日学生陆续返国，并在烟台一带活动。他们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机，建立学校，创办报刊，作为开展活动的依托。前面提到的由徐镜心、谢鸿焘、邹秉绶、李兴斋等人创办的东牟公学，实际上便是这样一个革命组织。该学校还设立了警察专科，由徐镜心亲任教学监督，培训革命力量。除此之外，齐芾南、丁训初、李凤梧等还创办《渤海日报》，为招揽商人，支持革命，还开办了图书仪器公司，由孙嘏臣主持经营。这些学校和报刊、公司，成为联络同盟会员，培养革命力量，开展活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的基地。

武昌起义后，在山东烟台的同盟会员谢鸿焘、刘冠三、孙嘏臣、栾星壑、萧廷枚等人，在徐镜心、丁惟汾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瓦解清军、争取独立的工作。他们联络了禁卫军管带虞克昌，统领署秘书倪显庭，《渤海日报》的李凤梧、丁训初，太古船行的吴仲芬，洋行雇员张子龄，天主教徒、水产学堂教员王耀东，尚志学堂教员杨哲甫，防营哨官宫树德等人。宫树德等还借助姻亲关系，对海防营管带董保泰晓以大义，使其同意帮助革命党人的活动，在举义时作为内应。同盟会还在会员杨德盛、李景升的寓所频频密谋举义大事。同时还派人在烟台海军学堂散发传单，在大街上张贴标语，以唤起同胞，创立共和，驱逐清廷。革命党人的活动和宣传，使当时驻烟清军中有很多下级军官和士兵同情革命，愿为革命效力。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清政府在烟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徐世光（当时清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之弟）日日惊惧不安，以重兵严加防范，同时电召在天津的舞凤炮舰开来烟台，以便随时逃跑。革命党人认为在烟台发动起义的时机已到，便聚集于杨德盛家中，决定了举义日期，并详细制订了行动方案。

1911年11月12日（农历辛亥年九月二十二日）晚10时左右，栾星壑、萧廷枚、杨德盛、张赓丰、丁训初等14人，携带手枪，

由毓璜顶李景升家中出发，兵分两路，突袭警察厅所辖第三区署和审判厅。他们先破坏了第三区的电话线，栾星壑等人则在街市中挥旗大呼：“革命党的大军到了！”迅速占领了审判厅，沿途缴枪十余支，法官数人臂缠白布，手举白旗出迎。这时，革命党人在审判厅外举火为号，董保泰等率防营士兵300余人应约前来接应。接着，他们又将所有人员分为5队，分头袭占电报局、邮政局、大清银行和兵备道道署。栾星壑等人先以电话警告道尹徐世光：“革命党大军已到，已经突破防营，防营兵已全部投降。”随后，带队赶到道署，只见大门紧闭，警卒已逃散一空，徐世光也已翻墙遁去。后知徐于当夜携眷逃入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的公馆，继又乘“龙裕”轮逃至青岛避匿。奔袭警察厅的一队到达时，厅长赵英汉已逃之夭夭，众警卒见警厅被围，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这样，革命党人在一夜之间，兵不血刃，倾刻收复海港重镇烟台。这也说明，此时清廷的统治，早已不得人心，到了一触即溃的地步。

革命党人占领电报局、邮政局后，严稽往来电报、邮函，并将光复烟台之举电告武汉、上海军政府，在大清银行检验计簿，封锁金库；召集各国驻烟台领使照会此事，并布告安民。黎明时分，虞克昌带领士兵80余人在街头巡逻，维持秩序。这一天，在省城济南，革命党人也促成了山东独立。

当日，同盟会倡议在烟台成立山东军政分府，并推举董保泰为司令，董坚辞不就。这时，舞凤舰奉徐世光之命驰抵烟台。东山海军管带、舰长王传炯见徐世光已逃，革命党人已占领烟台，便随机而变，以革命的支持者身份出现，莅会盛赞烟台光复，消惑众人视听，窃取革命果实。商会董事等社会头面人物又以烟台为水陆商埠，王为海军舰长，宜当此任为词，推举他为司令。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由于缺少斗争经验，竟也认为应当顺应“民意”，乃同意推举王传炯为烟台军政府总司令。同时还选出万坤山、李星轩为民政官，孙文山、张诚卿为财政官，虞克昌、董

保泰为军务科长，倪显庭、孙煨臣为交涉科长，李钟英、唐用珍、江文臣、王耀东为中文和英文的文案科长^⑧。在这些人中，仅有孙煨臣为同盟会员，其余在光复烟台中有很重大功绩的革命党人均被排斥在外，革命政权落入封建官僚、投机分子手中。

军政府于14日致电省府孙宝琦，报告烟台独立及选举情况，称“烟台已于今早联合军学界宣布独立，徐道逃，军政府成立，市面安静”。同日孙宝琦回电云：“……烟台系中外观瞻，甚赖执事维持地方秩序，以靖地方，即派员接洽一切……”^⑨一来一往之间，虽名为独立，但为朝廷看家护院之态依旧。

王传炯任司令后，并未真心倾向革命，他玩弄两面手法，骗取革命党人信任，毫无忌憚地任用私人亲信，同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虞克昌、董保泰等串通一气，排斥革命党人，同时脚踏两只船，同南北政府，皆通信使。至山东独立取消后，他更是迫不及待地向孙宝琦表明心迹：“……所谓原有起义之十八人，业已尽行解散……炯于连日推托不得后，始终以镇压地面，保护中外人民，严防匪徒等为宗旨。烟台独立之与不独立，实际上本绝无丝毫差别，不过徒经十八人之一番扰乱而已。今奏销东省独立，自系都督婉转求全之至意。炯当为东省人民庆幸。”^⑩王传炯死保清廷，反对革命及仇视革命党人的面目暴露无遗。当时革命党人按照原定计划，组成敢死队，请求王传炯出兵西征登莱，王非但推委不纳，还同孙宝琦密议驱逐同盟会员，迫令其还乡。形势对革命十分不利，甚至有人电请袁世凯：“目下，烟台地面无官无贼，若贵大臣及时奏简一道员，迅速赴任，则不烦一兵，唾手成功，而该处亦免土匪之扰。否则长期弃置，万一革军来占，异日另图收复，岂不费力！”^⑪在王传炯的控制下，革命党人备受排挤，革命势力遭到摧残，革命形势日趋险恶。

这时，刚刚由沪经青岛抵烟台的徐镜心，同烟台同盟会的同志们见了面，了解了烟台独立后的情况。

徐镜心是在山东独立后不久即同杨岷庄一起南下赴沪的。徐

因清楚地看到孙宝琦在山东独立时暧昧不明的态度，感到山东的独立极不可靠，意欲再图革命。徐镜心这种坚定不移的斗争意志和毫不妥协的精神，遭到一些反动士绅和立宪派妥协势力忌恨，清廷也阴谋加以迫害。于是，徐镜心乃于11月19日经青岛去上海军政府商讨进退方略。11月24日，徐镜心在沪联合各省同志，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共和急进会”，旨在“启发民智、组合政团”；30日又召开了旅沪学界山东同乡会，并通过了7项决议，其中有“与沪军政府接洽，请派兵舰北上，以扼清廷北洋运输之路，联北方各部之声气”，“电青岛刘冠三，合力西征”等内容。徐镜心还与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及胡瑛商定了山东战略方案：一旦有变，先据烟台，后取登莱，再图济南。徐镜心12月2日离沪北上，4日抵青岛后，便从刘冠三处得知了王传炯的恶劣态度以及迫害革命党人，妄图取消烟台独立的行径。

徐镜心同大家研究后，决定立即在烟台设立北部共和急进会，同时派人侦察烟台以西地区清兵驻防情况，筹集款项，在各地训练民军，准备西征登、黄。在急进会成立大会上，徐镜心、刘艺舟等人发表演讲，宣传南方及京津、东三省各处民军多次获胜，清军溃败的情况，大家情绪特别高涨。经徐镜心等人的活动，烟台革命形势有所好转，王传炯也假意同急进会接触。

为把烟台军权从王传炯手中夺回来，使之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急进会建议，改烟台军政府为烟台都督府。王传炯开始并未察觉其中之意，未表示反对，于是议定12月18日在毓材学堂召开会议。会上，推举王传炯为都督，左汝霖（同盟会员）为司令。同时与会的董保泰、赵英汉等人见军权归了革命党人，立即退出，率兵包围了学校，并开枪射击。这时革命党人已将王传炯扣住，董保泰手下的士兵也一拥而入，欲抓徐镜心。徐镜心临危不惧，厉声喝斥乱兵，声言如有不测，便拿王传炯是问。王传炯此时也只得命乱兵退出，后由日本驻烟台领使桑贞治郎调停平息。这次事件后，共和急进会遭到王传炯破坏，烟台革命形势处于低

潮。徐镜心等40多人赴大连，联络力量，图谋再举；栾星壑、蒋衍升赴上海见沪军都督陈其美请求援兵；丁惟汾、谢鸿焘到南京向黄兴求援，同时谒见孙中山，请示烟台都督易人之事。

王传炯虽得逞于一时，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却是迅猛异常。尤其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革命党人更是欢欣鼓舞，信心倍增。1912年1月，登州、黄县、龙口、荣成、文登先后独立，王传炯仓皇逃走。为了巩固山东的革命成果，支援黄县战事，孙中山又派胡瑛为山东都督，在烟台设立山东军政府，形成与济南的清政府的对峙局面。这时，被孙中山任命为关外大都督的东北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也率军乘三艘军舰来到烟台。到烟台的还有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的广东北伐十字军。这时的烟台，革命力量已十分雄厚，成为登州、黄县战场的后方和山东革命的大本营。

四 登州、黄县战事与文登、荣成光复

同盟会领导民军在蓬莱登陆以及在黄县同清军的战斗，在山东革命党人占据烟台，西征蓬黄、再图济南的整体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烈士徐镜心所著《光复登黄战事纪实》中记述：“黄县之光复，在当时特局部中一波荡耳！而其影响之大，直系于南北和局，且促成清帝退位之速。……假使无登黄之光复，则烟台都督府无由成立，北伐军曷由猝莅也。乃以渤海门户已失，恐我军直捣津沽，不得不遑遑退位，此海滨一隅之地，关于全局，盖有举足轻重者矣！”^④正如徐镜心所述，登黄战役给予清廷以致命的打击，加速了清帝的退位，具有重大的意义。

徐镜心在烟台时，即同急进会成员定下先取蓬黄、再图济南的进攻方略。在王传炯大肆破坏革命，急进会在烟台活动受挫，迁至大连后，夺取蓬黄的任务就更加急迫。当时徐镜心认为，蓬

莱、黄县一经打下，则断了烟台与济南的通路，王传炯困在烟台，也就不足惧了。故徐镜心由烟台赴大连前，曾到蓬莱与同盟会员孙丹林、柳仲乘等联系，命他们在蓬莱联络革命党人，做好举义的准备。

蓬莱为古登州，城北筑有水城，依山傍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此训练水师。因水城上的炮台前面是较浅的海滩，必须用偷袭的方式，里应外合，用小船接应，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革命党人做了充分准备，并约好了联络地点和电报暗语。然后徐镜心赴大连搬兵，孙丹林、柳仲乘等人则在蓬莱为举义做准备。

1912年1月14日^②，徐镜心、连承基、安静山、姜炳炎、丘特亭、刘艺舟等人率扮成旅客的大队人马约200余人乘日轮永田丸出发，孙丹林、丘丕振等5人已搭乘另一艘日轮龙平丸先行。次日（1月15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三四点钟，抵达蓬莱。夜色中，柳仲乘等人早已准备好舢板，接应民军上岸。民军乃分为两路，一路占据北山炮台，一路直扑住在水城的水师练营。这时守军俱在睡梦之中，革命军似从天而降，不发一枪，便全部缴械，并俘虏了水军统领王步青。登州知府光裕（满人）早已闻风逃走，蓬莱知县也避于民舍之中逃走。柳仲乘等人早已内应起义，州府衙门及电报局、自治会皆为革命军占领。至此，蓬莱全县已被收复。

当日，成立蓬莱军政府，众推徐镜心为都督，徐不就，乃推连承基为都督，徐镜心为参谋长，姜炳炎为临时总司令，丘丕振为鲁军司令。军政府分设军事、民政、财政、总务四科，由安静山、柳仲乘、宋赓廷、辛甄甫为科长。军政府当即召开会议，由财政部负责筹饷，主要由当地富室宋某和被俘的王步青负担，刘艺舟、丘丕振留守蓬莱，徐镜心、连承基、姜炳炎则率全体民军，开赴黄县，以实现西图济南大计。

黄县是山东辛亥时期酝酿革命较早的地区之一，徐镜心等很

多山东辛亥革命先驱都是黄县人。同盟会成立后，徐镜心、徐镜古、徐文炳、赵竹容等人相率加盟为会员，后多人回乡，联络王厚庵、张彦臣等人开办教育，宣传革命。他们在本县马亭村育英学校设立师范班，培养力量，为革命打下基础。同时，借口维持地方治安，以“冬防队”的名义，建立民间武装，招募队员，购置武器，加紧训练，为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在黄县酝酿革命的阶段以及以后的战斗中，山东省咨议局议员、黄县人王叔鹤起了重要的作用。叔鹤名治芑，字桓生，黄县菜园泊人，清光绪丁亥以廪贡肄业太学。在家乡开办学校，发展教育，并发起组织教育会，自任会长，后被选为山东咨议局议员，于辛亥春辞职返黄。王叔鹤原准备筹资赴湖北参加革命，但本县革命党人对他颇为推重，挽留其在黄县从事革命活动。

1月15日，登州光复的消息已传至黄县。王叔鹤、王曼生、李寅卿、张彦臣等人正在聚会议事，外面忽然有人告以登州有军人到，傍晚方知是登州革命军骑兵军官丘典玉与丘子厚及随从数人。虽然为避耳目，将一行人马暂时藏匿，但市人无不议论纷纷，称革命军先锋已到。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员们决定将计就计，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电请登州军政府派兵到黄，组织冬防队奔清兵防营缴械，并决定推举县令刘式镛为民政长、王叔鹤为副民政长，以及召开各界人士大会的事宜。

16日晨，接登州连承基复电，“即派兵300人去黄”。消息传开，人心大振，张彦臣、李寅卿等人即同冬防队教官山海滨等十几名队员直奔关帝庙防营驻地，喝令缴枪，防营士兵皆惊惶失措，呆若木鸡，营官穆广胜亦唯唯听命。遂将防营士兵20余人、枪械18枝交冬防队收编，革命军不战而捷。当晚，革命党人以县议会的名义召集各界人士聚会，商议欢迎民军之事。至晚9时半，姜炳炎率民军300余人马由登州开赴黄县。1月17日，召开全县大会，宣告黄县光复。

登、黄相继光复之后，远在烟台的王传炯竟电告清廷在莱州

(现莱州市，当时为掖县)的总兵叶长盛，透露了民军力量薄弱，可以轻易攻取的底细。清军得知这一消息后，于20日纠集600兵力，反扑过来，于21日拂晓抵县城外垣，并炮击城中，黄县商民大为恐慌。直至午后，徐镜心、连承基率民军来援后，清兵才退去。徐镜心等连夜布置军事，准备反攻。

在清军退走之后，姜炳炎竟畏惧清兵势盛，不敢进攻。徐镜心则认为，清兵是害怕才退却，我们有什么可畏惧的？乘胜追击，必可大捷。于是调集兵力，主动进击。但几次作战，均因士兵作战不力，耽误时间而失掉战机。徐镜心十分气愤。后经查询，才知士兵不肯用命的原因在于赏罚不明，战斗后未发犒赏。为平息士兵怨气，遂调姜炳炎回登州，由安静山接替司令。同时，由民政署急电烟台都督胡瑛，请求援兵。经在烟台的徐镜心、邹耀庭等人面见胡瑛，陈述危机，胡瑛始命沪军北伐先锋队刘基炎率兵千余人驰援，于1月25日到达黄县。鲁沪革命军汇合一处，力量壮大。休息一天后，即与清军于26、27、28日三天激战于黄县城北马镇，将清军赶出北马及黄山馆，获得初步胜利。

就在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时刻，鲁沪两军首领因各种原因产生的矛盾，发展到无法合力作战的地步。在此关键时刻，刘基炎竟不顾革命大局，下令部队全部撤回，径自开拔东返，连战斗最需要的炮兵也未留下。这时，连承基也以取援兵为名，东去蓬莱。后虽又带炮兵西返，也未发挥作用。而奉命前来增援的兵舰海琛号，停泊了六七日，竟没有士兵登陆，便无声无息地驶走了。在万般紧急的情况下，徐镜心只有自己掌握军队，布置防务，并亲自骑马外出侦察敌情。清军则趁机调遣兵力，反扑过来，对黄县县城形成包围之势。

至2月6日，大批清军将黄县西、南、北三面围住，用大炮轰击，形势十分危急！黄县军政府驰电南京、上海、烟台、登州告急。民政长王叔鹤特电告当局，历述危急状况，以求援助。求救之急电一日数发，但始终未有一兵一卒来援。革命军的战士在气

候严寒、缺少食品的恶劣条件下，英勇抵抗，死守待援。但最后终因夜间守城士兵倦极睡去，被敌人夜袭登城，黄县于2月11日失陷，徐镜心等退往登州。

清兵入城后，大肆烧杀淫掠，数十名被俘民军战士遇害。民政长王叔鹤被俘后，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被清军杀害。王叔鹤临刑前大呼：“我为革命而死，虽死犹生！”

黄县失陷前两天，张彦臣从登州乘蓝天蔚之海容号至烟台，检验所购买的枪械。闻黄县失守，张立刻约邹耀庭、徐镜古面见胡瑛，请求派兵收复黄县。12日，胡瑛接南京政府电令，乃命刘基炎率沪军西上援黄，但因风大浪涌，未得成行。第二天，刘又率军开拔至登州，由登州向黄县进发。黄县清兵闻沪兵来攻，吓得连夜逃遁，逃跑前将拘捕的28名革命党人杀害于城西圩外的吊桥下。沪军光复黄县后，王东垣代理了民政长。2月15日，南京政府电令，南北议和成功，举国罢兵。刘基炎遂未再追击清兵。沪军在黄县驻扎半年之久，于1912年秋撤出。

黄县起义不久，文登、荣成两县也相继发动了起义，建立了地方政府。1912年1月18日（农历辛亥十一月三十日）夜，在留日归国学生、同盟会员丛夔臣和进士林基奎的倡首下，联系学界多人，持少量兵器，进攻文登县署，逼走知县岳宝树，设立临时军政府。军政府一面电告武汉，以示响应；一面招兵募饷，以备抗清。文登起义遭到当地土顽劣绅的残酷镇压，他们抬出进士、度支部主事、从京假归的吕彦枚，当作招牌，大肆煽动，并纠集刁民、地痞、莠兵，围攻县城三昼夜。1912年2月10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拂晓，火焚城东门。丛等人在内无兵力、外无救援的险情下，只得与同人突出城东门撤走。结果，出城不足20里，即被捉住杀害。林基奎亦被杀。同时遇难者计59人。直到胡瑛派兵征剿，土顽复辟势力始灭。

荣成举义与文登同时。莱阳人左雨农受胡瑛之派，率光复军开到荣成，推翻了县知事刘文炳，建立了民国县府，推选当时进

步且素孚众望的刘鉴清为民政长，曲渭沧为司法长。光复后，左雨农奉命率军回烟台。此时，荣成的清朝地方官吏纠集地痞流氓以及被裹挟的农民一千余人，持土枪、长矛和短刀等武器，与革命势力相对抗。1912年2月11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土顽劣绅纠集的一伙匪徒蜂拥进城，俘刘、曲二人。13日，匪徒将刘、曲连同其他被俘的革命志士，拖往城西门外乱葬岗内，绑在柳树上，逐一击毙。经此惨案，荣成革命力量大受损伤。在匪徒生乱之初，赞助革命的李云宁曾赶至城内，要刘、曲二人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并连夜赶赴烟台谒见胡瑛，备陈荣成危局。胡瑛于2月13日（十二月二十六日）、3月5日（正月十六日）两次派兵开往荣成，剿抚兼施，将匪首擒拿，全县才告安定。

五 青州、即墨、高密、诸城等县的独立活动

正当登、黄、文、柴激战之时，山东辛亥革命的另一战场——胶济铁路沿线的青州、即墨、高密和诸城四县，在刘冠三、陈干、吕子人等同盟会员的领导下，也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

在上述四县中，同盟会员早就开展了革命活动。青州同盟会员在学界开展了筹备独立的工作。即墨的同盟会员魏殿光、鄆文翰创立了胶莱公学，后又创办了启新工厂、力业公司，从事革命活动。在诸城，同盟会员创办了农林学堂，宣传革命，并组织了歃血团、义勇军。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各县同盟会员起而响应，从过去的宣传、密谋，走上了武装起义、推翻清廷的道路。即墨同盟会员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急欲在本县独立，推举魏殿光及另一同盟会员周敦恂主其谋，积极做好发动起义的准备。他们制造炸弹，筹备粮糈，并组织精壮青年成立武装队伍。同盟会员的活动，为各县的独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在青岛的刘冠三等人也开展了力促各县独立的准备工作。首先，他们选择诸城作为根据地，并派同盟会员王麟阁到诸

城发动革命。王受阻后，刘冠三及其他同盟会员重又计议，最后决定兵分三路，在青州、即墨、高密起义，待三县独立后。会师诸城。其次，刘冠三先后派人到即墨、诸城，与当地同盟会员商议独立的有关事宜。省城济南独立取消后，在青的同盟会员公推刘冠三为山东都督。他们又与各县同盟会员加紧联系，并积极筹募饷械，发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员把起义目标首先定在青州。初在青岛酝酿时，会员赵象阙（山东寿光人）认为：“青州为本省心膺，下青州，西可直捣济南，东可控引胶沂，一举而全鲁俱震”，建议“率锐先往取之”。^②众深以为然，公推象阙为光复司令，王长庆为副司令，率民军袭取青州。民军来到青州城外，轻而易举攻下南城。再拟攻北城时，清兵早已做了防备。1912年1月18日，赵象阙遭清兵杀害。时已进城的王长庆势单力薄，只得退走。青州独立，未得起事，即遭扼杀。

青州独立失败后，即墨、高密同盟会员分别在同一天（1912年1月27日）夜间发动起义，十天（2月8日），胶西重镇诸城也宣布独立。独立后，即墨县同盟会员推举邑人孙毓坦为民政长，周教恂理财，宋兆麟司军事。高密则推同盟会员班启瑞为临时司令。诸城成立了军政分府，推王长庆为司令。

接连不断的独立活动，不但使清抚张广建坐立不安，同时也引起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当时的即墨属德帝势力范围。即墨宣布独立不到两天，在青岛的德国人便借口即墨“与外交极有关系，不能驻兵”^③，派马队130余人抵城中，迫民军出城。同时电告济南清抚，要其从速派兵，攻取即墨。张广建乃派张树元率清军前来攻城，民军只得且战且走。清兵入城后，“逐户搜，举城惊骇，鸡犬不宁，前后捕杀十人，悬首示”^④。即墨攻陷后，张广建又急电张树元“由即墨移得胜之师”前往高密进剿，高密民军只得弃城而走。而在诸城，未逃走的知县吴勋与天主教堂神父愿得相互勾结，向清防营密揭城内民军虚实。张广建又派沂州驻防营清军分三路攻诸城县城。民军虽奋力抵抗，终因清军内外夹

攻，力不能支而失败。2月12日，城陷。清兵入城后，俘杀军政分府参谋贾振琨、民政处长臧汉臣等300余人。当时城内“尸积成丘，血流为渠，乱兵暴掠”。刘冠三等人在青岛经营数年，选精储锐，至此皆被清政府摧残殆尽。诸城城破之日，正是清廷宣布退位、南北共和之时，革命志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结 语

轰轰烈烈的山东辛亥革命，从初期酝酿活动到山东的独立及各市、县的起义、光复，在短短的几年中，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声震北方大地。它是全国辛亥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接威胁了清廷的统治，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重视和赞许。一大批致力于革命的仁人志士，为了共和，为了革命，倾家财，舍性命，抛头颅，洒热血，在山东大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创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山东辛亥革命从始至终，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革命党人的斗争水平不断提高，由通过议会、和平争取独立，最终走上了拿起武器、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因此，山东辛亥革命对于牵制袁世凯派兵南下进攻民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在整个辛亥革命历史中，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山东人民在辛亥革命期间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今仍使人们引以为豪。

① 《山东文献》1卷3期，第12页。

② 《山东史志丛刊》1988年2期第34页。

③ 《山东省志资料》1983年2辑，第102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469页。

⑤ 《中国近代史》第42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⑥ 山东籍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人数，过去多依《山东近代史资料》2分册说法，“从1905年—1907年，不到两年达53人，”《山东文献》13卷3

期所登山东同盟会员从乙巳年六月七日徐镜心入盟到丙午年四月二十九日赵国璧入盟。前后计53人。此处采用该数字。

⑦ 关于六二党形成，有多种说法。一是夏溥斋《山东独立之前后》（《山东文史资料选辑》12辑）中：六二党“系议员六十二人，平均分配局中权力，原非政党组织，不过专为垄断把持。为一时权利结合的集团，一般称六二党。”二是《济南简史》一书称“山东咨议局分东府（登、莱、青）和西府（济、东、泰、武、曹、兖、沂）两大派。东府派议员较激进，西府派议员较保守。西府派六十二名议员组成多数派，把持局中大权。时称“六二党”。

⑧ 《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1期第23页。

⑨ 《山东近代史资料》2分册，第74页。

⑩ 同⑧。

⑪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12辑第23页。

⑫ 《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1期第27、30页。

⑬ 同⑪，第33页。

⑭⑮ 同⑫，第29、26页。

⑯ 《山东省志资料》1963年1期，第76页。

⑰⑱ 同⑪，第64、43页。

⑲ 《山东文献》2卷1期，第28页。

⑳ 《山东近代史资料》2分册，第77页。

㉑ 《山东文献》13卷3期，第10页。

㉒ 同上，1卷2期第91页。

㉓㉔㉕ 同㉑，第262、271、269页。

㉖ 引自《山东近代史资料》2分册第129页，《黄县革命史料》。该史料“说明”中记：“此篇以徐子鉴烈士所著光复登、黄战事纪实及赵竹容先生之调查稿为底本，参以张敬斋、袁旨言两先生口述编辑而成。”

㉗ 此日期根据《山东文献》1卷2期（第92页）所载邓谢兰馨所撰《辛亥山东举义史实》为据，同丁淮汾等修《山东革命党史稿》日期（1月2日）有异。参考黄县革命史料，登陆日期以1月14日为准。

㉘ 《山东文献》2卷4期，第18页。

㉙ 《山东文史资料选辑》12辑，第208页。

㉚ 《山东近代史资料》2分册，第245页。

甘肃地区辛亥革命综述

孟国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激起的革命浪潮，涌到甘肃，引出了一些波澜。当时的甘肃，包括现在的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辛亥革命对甘肃影响，要从陕西独立说起。

一 甘肃的反清起义

甘肃的反清起义，主要有宁夏起义，西宁反清暴动和陇东、陇南、河西的三陇起义。其中，宁夏起义的规模较大，它是由陕西的革命运动直接带动起来的。

陕西独立 武昌起义后，西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张凤翔（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任陕西陆军混成协司令部参军，兼代二标一营管带）、张益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任陕西陆军混成协二标教练官，兼代二标三营管带）、张钊（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时任该协炮兵营右队排长），以及哥老会首领张云山（时任该协司令部号官），于1911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发动全标官兵进西安，攻进满城，杀将军和副统，占据军械局。陕西巡抚钱能训潜逃。陕西革命成功，宣布独立。

宁夏起义 当时，宁夏是甘肃的一部分。宁夏哥老会首领刘华堂等，经常与陕西革命首领张凤翔等人联系。西安革命成功后，以鸡毛传帖促宁夏会党响应。刘华堂召集各山庄（帮会）首

孟国芳（女），甘肃省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

领及会友高士秀、马跃川等聚义，并秘密联络宁夏镇标军官刘复泰、袁宗刚和续备左旗号官黄建升等，约期起义。因帮会行动不慎，被宁夏县（现银川市）知县陈元骧发觉，于1911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将会党李麻花、吴说书、罗大辫子、贼狮子等十余人逮捕下狱。

11月16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邹遇极率众暴动，被标营千总李敬忠镇压，邹臂部受伤。

11月17日，灵武帮会首领高士秀、高登云在灵州（今灵武县）起义。率众千余人，先攻灵州守备衙门，夺取枪械，继而围攻州署。知州余重基，守备潘某，均逃匿。民军打开监狱，释放犯人，灵州光复。

灵州起义影响到宁夏府城。11月18日，清廷官员调新城满营副都统常连甲率驻防旗兵二千余人，全付武装，在府城东西大街示威游行，企图压服起义民军。11月19日晚，刘华堂、刘照葵等在宁夏起义。刘华堂邀集三十来人，冲入镇署，燃放爆竹，口喊杀声。当时，宁夏镇总兵张绍先到省城兰州述职未归，署内无人主持，员弁惊叫“革命军来了”，都越墙逃跑，库储军械全部被刘华堂等缴获。与此同时，宁夏巡警局巡官刘照葵、镇台衙门教官刘复泰，都是哥老会党，分别率警士和卫兵一百几十人，对空放枪，以示策应。起义民军杀了拒不反正的代理镇台贺明堂，争取续部左旗营官牟宪章投降，打开监狱，放出李麻花、沈疯子、罗大辫子及其他犯人。宁夏知县陈元骧开枪抵抗，逃匿乡村，被民军抓获处死。宁夏道台孙庭寿、宁夏知府庆隆各自逃匿，宁朔县（与宁夏县一同置于府城内）知县高彝，为人和善，群众拥护，得到宽大处理。其余文武官员及汉、唐、惠、清四渠委员，皆投降民军。

11月21日（农历十月初一），平罗县帮会首领马跃川、吴大炳、王之滨、蒲大爷等，响应府城起义。平罗参将谭华亭、守备刘某、千总周世斋和县知事李九波均逃走。未动刀枪，平罗光

复。距县城30里的黄渠，驻骑兵一营，被民军包围，侯官侯明俊顽抗，被民军击毙。

基于以上起义，11月21日在宁夏道尹公署成立宁夏军政府，公推宁夏道台孙庭寿为革命大元帅（始终未到任），刘华堂为总指挥，刘复泰为镇台，黄连升、牟宪章为标统，刘照葵为总参谋，张少棠为行军总稽查，胡宝森办理文案，王俊、王之滨分任宁夏、平罗两县的知县。军政府肃清了以前泄密的反动分子，惩办了乘机讹诈人民的首恶分子，赦免了知府庆隆，并保护其生命财产。时值冬灌季节，军政府令河西汉、唐、惠、清四渠总绅张坊，督促冬灌。因此，民国元年，宁夏各县农田饱满，夏粮丰收。

丹噶尔——西宁反清暴动 西宁在清朝是甘肃所辖的一个府治，清廷在此设有办事大臣。丹噶尔（今湟源县）是西宁道所属的一个厅。西宁道辖三县四厅，即西宁、乐都、大通三县，丹噶尔、巴燕戎（今化隆）、贵德、循化四厅。这一带的人民，不堪承受清朝官吏、地主和洋商的剥削压榨，在1910年秋，就有抢盐局等风潮。

湟源人李旺，做过盐贩，参加过抢盐局。当时到西宁活动的义和团成员裴道人，介绍他到山东裴老三（裴道人之弟）处习练反清灭洋的神术，并鼓动他在村中创立黄表会（亦称黄标会，俗称黄会），联络村民200多人。他们曾散发《讨满檄文》等传单、文告，其中有“推倒满清”等语。

1911年6月，李旺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李占云供为“皇上”，约定七月十五（农历）起事。丹噶尔厅同知康敷裕得息，一边申报西宁道和西宁镇总兵，一边纠集英、法、美、德十余家洋行的30多人，以及厅属巡警局警兵百余人，由洋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镇压李旺率领的群众。李旺、裴道人等被捕。西宁知县也欲镇压，激起李通云、董腊匠等拥李占云起事，起事农民受夹击，李占云、李通云等亦被捕。陕甘总督派西宁镇总兵马福祥会审，

李旺、裴道人等或处死或判徒刑。

其后，黄会在西宁做联络工作的乔寿山，继承李旺“兵马大元帅”名义，哥老会大爷任得慧继承“兵马副元帅”名义，在辛亥十月，提出口号，“响应民军起义，推翻满清，杀尽洋人”，并且联络董福祥部的兵士孙大旗（麻子）等人，聚众一千余人（亦说三千余人），在西川石灰沟、元山尔起义。

三陇起义 三陇泛指甘肃各地。在陇东。辛亥年十一月，灵台县佃农蔡普明（哥老会党）在西安光复后的第七日，发动陕甘边境会党60余人，会同五矩沟农民20多人，在胡家店揭竿起义。他们攻进陕西麟游县天堂镇北寺的盐局，捣毁了仓库屋舍，打死了局长，击散了缉私队。后因内部分裂而失败。

辛亥年十一月初，陕西革命军石得胜部占领长武。甘肃宁州（宁县）帮会首领彭四海、汪兆黎等聚众数百人在早胜镇起义。宁州知府周凤勋派人送制钱三百串助饷，并请彭、汪等入城主持州府军政事宜。彭等依托宁州，率众攻破合水，进攻庆阳，被驻军击溃，退往长武途中，又被马国仁、陈正魁等部围击，义军败散，彭四海因力竭被擒，遭到杀害。

在陇南。辛亥十一月文县北乡人民集合数千人，在马连乡贡生王洪巽领导下，围城三日，捣毁厘金局和税局，经理人叶树声事先脱逃。

是月，碧口、宕昌等处的厘税局均被民团胁迫停闭。

1912年1月26日（农历十二月初八），阶州（今武都县）农民何成海乘周围各县攻打厘税局之机，与姚永福、周天柱、何大旗集合群众数千人，围攻州城，要求撤销厘税，实行自治。知州谭焯与游击何宗普指挥城中兵勇，乘夜出城袭击，杀死群众数百人，姚永福、周天柱当场被杀，何成海逃往四川中坝，六月被捕杀。

在河西。酒泉北乡闻家圈农民听说武昌起义成功，在革命党人祁得隆鼓动下，聚众四五百人，编五个营，制五色旗两面，上

书“革命军”三个大字。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州，后杀道，官钱局里闹一闹。预定腊月三十举义。不幸，消息走漏，被官兵镇压。祁得隆被击毙。搜出旗帜、檄文及刻有“分办革命军”五字的印信。

张掖、武威亦因农民抗花税（即种鸦片税）聚众数千人起事。

辛亥革命前后，反清火焰燃遍西北各地，清王朝四面楚歌，朝不保夕。顽固保皇派长庚、升允倚仗尚能控制的甘肃一隅，进攻陕西、血屠宁夏，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

二 长庚、升允疯狂镇压革命

出兵攻陕 辛亥十月，武昌、西安相继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惟独甘肃在顽固保皇派长庚、升允策动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组织起反动武装，向陕西革命军进攻，战争延续了五个多月，给陕甘人民造成重大灾难。

长庚（满洲正黄旗人）1909年冬由伊犁将军调任陕甘总督，接替升允，执掌军政大权。升允（蒙古镶黄旗举人）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任命为陕甘总督，因在宣统元年上书反对立宪，说新政足以亡国，而被罢黜，闲居西安城北草滩。西安起义，先破满城，升允闻讯后逃至平凉，电请长庚调集甘军，“速为收拾，恢复陕疆”。长庚电请清廷起用升允为陕西巡抚，督办军务，统率攻陕各军。

长庚为了攻陕，改编、扩充了甘军。他采纳力主攻陕的提法使彭英甲的建议，倚重马安良所统的回军。在军事会议上，马安良说：“几个学生娃娃闹事，有什么了不起，我军一出，保能一马踏平。”长庚壮其言，特命扩充所部镇南马队为西军精锐军，募足步骑十六营。马安良利用民族宗教关系，在河湟一带招募回族、撒拉群众7000人，又动员官兵亲属约2000余人随军出征，谓之

“跟营”，准备“打捞”。马部11月5日抵兰州，接受长庚检阅。长庚将左宗棠所遗留的米福枪2000支，从德国新购进的毛瑟枪5000支，一并拨交马安良“援陕”。马安良的精锐军和经过改编的陆洪涛部振武军，孙恭部恭字三营，组成攻陕东路军，马安良为总统，由升允亲自率领，先行出发。彭英甲自告奋勇，请赴前敌效力，经长庚电奏清廷，改授陕西布政使，以东征军总营务处名义随军前进。

马安良、陆洪涛部进入陕境之前，因原提督张行志的壮凯军统领马国仁，已于11月21日攻占了陕西的长武。陕西革命军第五标第二营管带石得胜被俘。甘军进占冉店桥等处。陕军首领张凤翔调兵马都督张云山率部西行，迎击甘军。马国仁部不支，退回长武。12月13日陆洪涛部到达长武，与陕军鏖战数日，击败陕军，再占冉店桥。升允又督陆部追击陕军，捕杀陕军苟占彪、杨九如等，12月19日占领邠州城。陆部进窥永寿，被陕军第四标统邱彦彪击退。马安良的帮统马麒组织敢死队，与邱激战。邱部八千人，牺牲了七千，永寿被占。

其间，陕军仍占陇州、固关，甘肃的华亭、平凉吃紧。长庚令张行志总统南路军。崔正午所部五营四军，称骁锐军，属南路军。崔部于12月17日攻占固关，进攻陇州。南路只有陈正魁、吴连升攻占天堂寺，拟约会崔正午夹攻凤翔。升允等奏请奖马国仁、陆洪涛、陈正魁等人。

1912年1月1日，马安良进永寿谒见升允，请求攻打乾州。1月3日，陕军张凤翔从河南毅军赵倜手中，第二次收复了潼关，就挥师西进，驰援乾州，与西军激战于铁佛寺。三天中，经大小十数次血战，双方死伤均极惨重，形成对峙状态。马安良分兵袭击三水（旬邑），占了县城，被张凤翔部陈殿卿、李长兰、胡景翼赶出三水，逃返邠州。陕西民军见陵坡空虚，攻占了陵坡，马安良率护卫马队去救，被民军包围，所穿马靴上打了个弹孔。升允率队赶到，才救出马安良，夺回陵坡。马部攻乾州两个多月，用

了火攻、挖地道、扒城墙、诈降诸法，都不能破张云山坚守的乾州城。甘军被扼。

铁佛寺战后，升允率陆洪涛、马国仁部向醴泉推进。1912年2月17日（农历除夕夜），陆洪涛攻陷醴泉，率部向咸阳逼进。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长庚保密，不予公布，仍促攻陕。张云山将此消息用黄纸印成大幅传单，从乾州城上撒给围城的西军，使马安良部军心浮动，陆洪涛部闻讯也开始动摇。升允技穷，困于乾州十八里铺大本营。陕甘紧张的战事，急转直下，趋于缓和。此时，攻潼关的毅军和陕西革命军签订了停战协定。1912年3月2日，甘陕双方议和，3月6日陕西张云山在城外古庙中会见了马安良。马要求送回升允眷属，张云山如约办理，马安良遂解乾州之围，率部回甘。彭英甲按照袁世凯的电令，转令陆洪涛及南路张行志部，向甘肃撤军。一场由顽固保皇党发动的镇压辛亥革命的战争，历时五个多月，终告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东路军在各战场俘虏的民军不少，皆被升允一律斩决。连黎元洪、张凤翔派出的议和代表，也一并被升允杀害。马安良的回军所到之处，焚杀劫掠，更给人民留下了惨痛的灾难。随军“打掳”的人，掠取的财物无数，马安良引人注目，不敢经兰州省城，而令取道定西回河州。

马麒屠宁夏 宁夏起义成功后，满营火急派员向省方救援。当时，攻陕的马安良先头部队已到定西，马安良本人尚在兰州，长庚即令马安良分兵镇压。马安良派帮统马麒，马麒又以其弟马麟为前敌，随同分统马占奎，率马、兵六营，与陈必准所率的清军，分路驰宁。陈必准由黄河东经安宁堡抵金积，守灵武，防刘华堂渡河，马麟由黄河西经中卫，直扑宁朔，星夜急行军，包围了宁夏城。宁夏革命军政府于10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力量悬殊，无法应战，只得将围满城的民军连夜撤回，保守府城，希望西安方面来援。但民军士兵们尚未具备铁的纪律，一听西军大兵压境，军心涣散，自行瓦解。军政府首领见大势已去，无法挽救，刘华

堂、刘照葵、张兴、吴说书、胡宝森等急出北门，向平罗转移。平罗的马耀川、王之滨向河套逃去，灵州的高士秀、高登云退向安定边。马麟凶锋指向宁夏城南门，与已经反正的管带牟宪章接触。牟恐惧投降，并诱捕斩杀了黄连升、李麻花、夏梓等起义首领，向马麟请功。马麟将刘复泰、张伯铄、袁宗纲、马四宪及革命党人唐纪芳等惨杀。12月20日（农历十一月初一），西军由西门涌入，挥动屠刀，自小南门、西门起，沿街逐户，大肆屠杀，暴尸街衢，血水横流。直杀到第二天早晨原宁夏镇台张绍先进城，始要求马麟停止杀戮。据统计死伤平民1400余人。马麟放纵部队抢劫财物三日，有为抢妇女耳坠金环，连耳朵都割下来，40岁以下的妇女被奸甚众，奸淫掳掠，惨无人道。又借办理善后，捕获富有的人家100余户，极尽残暴掠夺之能事，勒索的大批财物，满载100余辆大车，运回河州家乡。宁夏遭受了数十年未有的浩劫。

12月21日，马麟派营长王某带领大队开往平罗。途经李岗堡时，地方人士和老百姓夹道欢迎，西军不分青红皂白，开枪射击，无辜平民死伤100余人。平罗小学校长雷章汉和士绅多人到城南门外欢迎，亦被砍杀。进城后，照样奸淫妇女，抢劫财物，杀伤平民八九十人。

灵武方面，据1912年1月26日长庚致内阁请代奏电称：“固原回绅马元璋谊切桑梓，稟明平庆泾固化道熙麟遣伊子马广武、仁武等带乡团八百人堵击。……马广武及宁灵回绅马学仁等诱杀贼目马玉赞，收复吴忠堡并大寨子。马广武、李自正旋往灵州，围攻十余日，于十月初八将州城克服，杀贼五百余名，并斩逆首马连弟”。

宁夏人民响应辛亥革命的壮举，就这样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时至今日，宁夏人民一提起马麟，仍是谈马色变。

三 黄钺在秦州独立，施行新政

黄钺是湖南宁乡人，同盟会员，受黄克强指派，以候补道资格来甘肃传播革命，相机起义。其父黄万鹏有功于清室，得赐世袭男爵，曾作过新疆提督，与陕甘总督长庚有旧交。故长庚委黄钺为督练公所总参议。陕西起义，升允电商兴师攻陕。黄钺闻讯，谒见长庚，痛陈利害，劝阻出兵。而署法司彭英甲、联合藩司刘谷孙、巡警道赵惟熙、劝业道张炳华怂恿长庚从升允计，举兵向陕。黄钺无奈，乃借长庚扩兵之机，要求驻扎陇南，名为堵截陕西革命军，实则准备夹击升允。长庚允许黄钺成立新军10营，名为骁锐军。兰州道彭英甲老奸巨滑，觉察黄钺的意图，向长庚进谗言：黄钺是革命党，不宜握重兵久居省会。长庚半信半疑，又不便收回成命，只令黄招步兵1营，拨崔正午的5营归黄统率，赴秦州（今天水）布防。彭英甲、赵惟熙暗中指使崔正午防范黄钺。黄钺在秦州虽欲起义，无如兵力只有数百，实力单薄，只得一方面派员与西安张凤翔、张云山及成都尹昌衡等联系，请求外援；另一方面由他的营长张晚松联系当地的进步青年董戒、肖润生、张衍荪、汪剑平、张锦堂、马鼎五、朱仲穆等准备起义。

1912年3月11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日）晨6时，黄钺在秦州起义。黄钺以秧歌社火队为掩护，兵分三路入城。一路入游击衙门，游击玉润（满人）发枪抵抗，被击毙，黄令礼葬，并保护其家财产。一路入贡院，内驻新成立的地方部队，拥有开花炮3门，单响毛瑟枪200余支等新式武器，当即缴械收编。一路入州衙，知州张庭武被虏。黄钺单刀直入道署，约巩（陇西）秦（天水）阶（武都）道尹向燊起义，向同意，即在道衙成立了军政府，发布了《甘肃临时军政府檄文》。黄钺任甘肃临时都督，向燊为副，刘文厚为招讨使，魏绍武为使署一等参谋官。都督署设立八大处，分理军政民财教育各事。董戒、肖润生、张衍荪等人相佐治。组

组织了敢死队，杜汉三任队长。黄钺治军严明，除玉润外，未伤一人，市面秩序井然。黄钺制订颁发了《甘肃临时军政府法约》五章三十五条，《甘肃临时军政府行事章程》十八条，《甘肃临时军政府及总司令部职官名录》等。并成立了区、社、村、甲等民主政治建制和教育会，革除旧的司法、财税制度，创立新的平等民主的体制。黄钺独立仅三个月时间，就推行了上述各项措施，可谓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可惜，被袁世凯支持的保皇党和反动派所扼杀。

黄钺在秦州所为，早被清朝的忠实走卒、知州张庭武觉察，他暗派心腹向长庚禀报。长庚即派马福祥保荐的马忠孝为统带，周务学保荐的刘文绣为统带，组成“讨逆军”向天水进兵。马忠孝所带的一营兵正好在黄钺反正的第二天到达距天水城2里的王家磨，扬言攻城。地方人士张世英、哈铸恐人民遭涂炭，征得黄钺同意，出城劝告，请其退往天水郡，相安无事。这时，四川同志军李树勋部由陕南来到徽县，黄钺得到支援。

如何对待黄钺独立，在省城兰州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用武力讨伐，以赵惟熙、马福祥、周务学、潘龄皋、张林焱、刘尔忻等为代表；另一种反对用兵，主张和平解决，以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为代表。

1912年3月15日，甘肃布政使赵惟熙代表全省官吏，咨议局议长张林焱代表全省绅民，致电北京袁世凯，承认共和。3月19日（农历二月初一日），兰州正式宣布共和，甘肃始挂中华民国国旗。长庚见大势已去，将陕甘总督的银质关防和王命旗牌12面，命公署戈什卡朱幼华用綵亭抬送给护理藩台赵惟熙。长庚用赵从藩库董福祥存饷中借给的2万两作路费，由黄河顺流而下，经绥远回到北京。兰州虽换了国旗，可一切旧制未改，翎、顶、花袍、马蹄袖盖，官场往来，依然如故。赵惟熙乘甘肃官绅们观望之际，投机袁世凯，被袁封为甘肃都督，于3月24日在兰州就职。赵惟熙惟恐黄钺独立在他之前，有碍于他的权位，故意颠倒黑白，

硬说兰州承认共和比天水早，黄钺不应独立，他一面电京肆意污蔑，一面发布文告，指斥黄拥兵倡乱，行同土匪。并以甘督名义，令崔正午5营移驻清水接应，刘文绣由陇州星夜移驻南河川、三阳川扼其北，马忠孝在王家磨、坚家河扼其西，李宗纲由凤县移至马跑泉二十里铺扼其东，罗平安由凤翔进驻天水皂郊铺扼其南。兰州潘龄皋、大绅刘尔忻和张林焱等发函指责黄钺独立。袁世凯听信赵惟熙的一面之词，责令黄钺取消独立。后经黎元洪、谭延闿等替黄辩白，秦州人汪剑萍、周尚志2人赴京上书，中央政府才电告黄钺结束秦州军政府，去京另候任用。秦、兰两方相持将近三个月，始终未以兵戎相见，与临时省议会议长李镜清拍案相争，力主和解，极端反对动武有关。黄钺提出14条解决条约，向崇又与赵惟熙商得优待条件，马福祥代表兰州，周昆代表秦州，于6月7日议定取消军政府，向仍任陇南道，军政府士兵归向接管，新政交地方人士接收。黄觉得至此是非已经大白，决计去职，应湖南谭延闿之邀南归。

军政府自3月11日成立，到6月7日取消，总共支银70000两，主要用以发放军饷，执事人员只酌发伙食费，未支薪水。经费来源是旧有公费、秦州丁粮和附近各县应解旧款，从未向地方和人民摊派勒索。

四 甘肃议会及李镜清被刺

1912年初，马安良围攻乾州不下。此时，清廷下诏，征求民意，甘肃咨议局长张林焱召集全甘在省绅士议事。会上，多数人主张继续东征，反对共和。兰州刘尔忻首先发言称，“清统万世，有议异者共诛之”。镇原慕寿祺、张掖王之佐等相继发言驳刘。后投票取决，仅二票主张共和。刘怒目视王、慕许久。张林焱、刘尔忻致电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并转伍廷芳：“查我中原民族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服教畏神，久成习惯。今改用君

主立宪政体，已越开明专制之梯级，尚恐难于急救范围。……公如能采及刍蕘，确定君主立宪政体，某等自当惟命是从，共襄新政。倘力持共和主义，则某等虽至愚极弱，实万不敢随声附和，肝脑吾民。亦惟有联合陕甘新三省及他省同志，共图保境，遥戴皇灵。”张林焱还将王之佐等致咨议局的停战书，出示长庚；刘尔炘则要长庚“以大逆不道之首正典刑”。长庚欲将王处死，后未实行。逼得王之佐与炮队管带梁国璋等在邓宗家密谋反正。后清帝退位诏下，王之佐、慕寿祺、水梓、邓宗等28人，又议决举代表谒长庚，请求宣布共和，电止东征军攻陕。长庚不见。后由马福祥征得长庚同意，才以地方名义，由布政使赵惟熙领衔电呈中央，承认共和。

之后，由王之佐、邓宗、水梓、慕寿祺等筹备组成甘肃临时议会，推李镜清为议长，刘尔炘、张林焱为副议长。候补道陈万言鼓动李镜清列举十大罪状弹劾赵惟熙。宁夏人民向议会控诉马麒在宁夏奸淫掳掠，惨杀无辜，李议长咨请赵督追究。赵借机挑拨关系，马麒即怂恿马安良刺杀李镜清。马部先在街上散发传单，说议会若不解散，将有轨外行动。刘尔炘仓卒到议会，要李走开。李说：“议长乃公民所举，弹劾官吏是其职责，若因军人一纸恫吓而走，不但负全省之托，个人人格亦所关联，至演成流血，有国法在，以身殉职，光荣莫比，绝不能移兰州一步，更不能移议会一步。”刘愤然曰：“你流血到城外流去！”李与刘有师生之谊，迫于无奈，即日召开议会，宣布辞职，单骑回临洮原籍。尽管如此，李仍未逃脱马安良的毒手。

6月下旬，马安良授意马麒指派马麟的营长、他自己的盟弟马同及兵痞5人，由兰州潜赴临洮，化装成乞丐，探明李的住处，于7月17日深夜，扑入李的寝室行凶。李惊觉后急抽壁刀格斗，砍死一人砍伤一人，终因寡不敌众，被乱刀砍死，年仅41岁。杀手截取李的一只右手，回报马麒。

李案发生后，激起甘肃省临时议会议员的公愤。赵督迫不得

已，将临洮县长撤职，遣散了驻该县的崔五马队，通缉凶手多日未获，只枪决了一个嫌疑犯。议会推议员李步瀛专程赴京，面见袁世凯，声泪俱下控诉马安良、马麒。袁虽感动，却无任何惩办措施。兰州仍为马安良控制。临时议员人人自危，相继星散。为缓和局势，马安良重新恢复了议会。然而，议长是张林焱，进步人士王之佐、邓宗、水梓等均被排斥在外。

省议会议员后来多成为国民党员。国民党人先期来甘肃，多是秘密活动。樊政、焦桐琴、王洁、胡登云等自湖北回甘，宣传革命，曾被政府一度监禁。到1912年8月，周之翰受国民党本部委托，会同同盟会员王之佐、慕寿祺、王国柱、王辅政等筹办党务。之后，同盟会与五大政党合并，改名为国民党，派马邻翼、蔡大愚、周之翰、王之佐、慕寿祺、邓宗等特派员组织。1912年11月28日，在兰州召开国民党甘肃支部成立大会，党员300余人。邀西军统领马安良为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王之佐、慕寿祺、孙鸿年为正副评议长，邓宗为政事部主任干事，王辅政为财政部主任干事，许季梅为调查部主任干事，柴桂芬为交际部主任干事，金翼乾等20余人分头担任各部干事。并在30余县成立了支部。

1913年6月，赵惟熙请假进京，内务司张炳华护理都督兼民政长。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张炳华勒令解散了国民党甘肃支部，封闭了党报《大河日报》，主笔聂守仁入狱，总编辑郑浚被通缉。

1914年春，北京政府调张广建来甘，接替赵惟熙，任陕甘筹边使，结束了赵在甘的统治。

五 结 局

赵惟熙当了甘肃都督。此人力主攻陕，亲手扼杀了黄钺革命，长庚自觉自愿地将陕甘总督印信交于他。

马安良总统甘肃军事大权。

屠宁刽子手马麒、马麟兄弟窃据了青海军政大权，建起宁海军，为害甘青近40年。并将升允供养在西宁，任其公开搞复辟活动，升允为马麒亲书“赤胆孤忠”横幅，褒扬他为清室效力。

彭英甲踊跃攻陕，谗言黄钺，被赵任为布政使。

封建遗老、保皇党张林焱，复被马安良扶植为议会议长。

其余军阀亦多摇身一变，跻入革命行列，加官晋职。张炳华任护理甘肃都督兼民政长，张行志任陇东镇总兵官，马璘任凉州镇总兵官（后调甘肃提督，继又为甘州镇守使），马国仁任秦州镇总兵官，马福祥任宁夏镇总兵官，吴桐仁、裴建准任肃州、河州镇兵官（后改称“镇守使”）。张广建来甘后，孔繁锦继任陇南镇守使，陆洪涛由陇东镇守使升任甘肃督军兼省长，马安良的三儿子马廷勳任凉州镇守使，形成了陇上八镇的分裂局面。而陕西革命军遭甘肃东征军攻打，长达五个月之久；宁夏起义被血腥镇压，黄钺独立被取消，黄钺本人被迫离甘南归，李镜清因反对武力征讨黄钺，要求弹劾赵惟熙和追纠马麒屠宁的罪责而遭刺杀，一些进步人士，如王之佐、水梓、邓宗等人均离散。辛亥革命在甘宁青经过共和与保皇、进步与守旧，革命与反动，起义与镇压等血与火的洗礼，最后仅以换了一面旗帜而告终。

奉天辛亥革命述论

武育文

一 革命前夜的东三省

东三省^①是中国北方的屏障，也是列强角逐的战场。其地域囊括白山黑水，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奉天（今辽宁）又是东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夜，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为四亿中国人民所不满。列强对东三省的侵略更加激起人民的痛恨。东三省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的贫穷和软弱，不在列强之强，而在清政府之弱。他们为了挽救中国的危亡，立志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朝政府。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分赴东北，建立革命机关，组织民众，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

东三省是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一旦爆发革命，势必危及京师，根基动摇。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极为重视对东三省革命运动的防范，在交通要冲派有重兵镇守。

东三省的反清革命活动，发端于日俄战争之际。那时，清政府可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在自己的领土上“一听交战国之蹂躏，绝无措置以为保存主权之方法”^②。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激起东三省人民的强烈不满，爱国之士纷纷奋起自救。1904年日俄开

武育文，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战，战火连天，遍及辽东，大好山河，惨遭破坏。爱国青年张榕、丁开嶂等人发起救亡组织，创立爱国机关。

张榕(1884—1912年)，字荫华，奉天府(今沈阳市)人。青少年时期，勤读文史，“兼耽骑射”^⑤，以图益世救国。他目睹甲午、庚子之役，中国惨败之状，救亡图存的思想逐渐萌发。1903年，张榕考入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习俄文^⑥。结识了丁开嶂等人。日俄战争爆发，他们弃学回到东北发起爱国救亡活动。

张榕发起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公开名称是：东三省保卫公所。他联络抚顺县王阁巨的乡团武装，“先从兴京(今新宾县)、海龙府属实行倡办”^⑦。关东自卫军发表宣言声称：“内则训练乡军，捍御侮患；外则折冲樽俎，挽回主权，保全生命财产”^⑧；“国土存亡，端赖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援”^⑨。张榕的爱国救亡活动，不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反而引起清政府的恐惧。清政府认为张榕这种举动，是肇起事端，“屡电盛京将军增祺查办”^⑩，勒令解散。张榕爱国壮志未酬，不得已避走北京。张榕到北京后，开始创办秘密刊物，用以鼓吹革命。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桐城人吴越，两人一见倾心，成了生死之交。1905年9月24日，吴越、张榕在北京前门车站炸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越当时以身殉难，张榕逃走。此案震惊中外，清政府派出大批警察进行搜捕，警察在吴越衣袋里搜到一张张榕的照片，追索10日，将张榕逮捕。经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审讯，未获“罪证”，而以过去张榕曾组织关东自卫军定为“叛逆罪”，判处终身监禁，关押在天津北洋监狱。张榕“在狱中四年，益刻意为学，博通群籍，而于兵符、政法尤宣，究得其精奥”^⑪。张榕在狱中，写出《行政法新义》等书，并在监牢的墙壁上题写了“一声霹雳困龙起，震灭人天诸不平”^⑫的诗句。他下狱后，和典狱长王璋(又名王绍臣)结成莫逆之交。王璋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豪侠之士，素有爱国之志，曾是义和团的首领。1908年夏，王璋带领张榕一起越狱逃亡到日本东京。到东京后，张榕会见了孙

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在东京他与奉天的同盟会机关时常通信联系，时刻准备返回奉天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和张榕同时从事爱国救亡活动的还有丁开嶂（1870—1945年），原名作霖，字小川。河北丰润县人。当日俄开战于辽东之际，他“愤帝俄之凶顽，乃化名开山，潜赴关外，联络绿林中有志之士，创抗俄铁血会，到处扰乱俄军，大小百余战，或负或胜，俄军病之，卒以败绩。”1905年，又“组织华北救命军于边外”^①，发表宣言，传檄国内，要求政府召回追捕之维新领袖，停止科举，革除弊政。该组织广泛吸收爱国群众参加，从河北至关外，声势很大，“北方之有革命武力实自此始”^②。张榕、丁开嶂发起的爱国救亡活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东北的萌芽。

二 宋教仁赴东北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香冲人，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1904年，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后因谋划湖南起义失败而逃亡日本，留学东京。1905年5月，他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不仅促进了同盟会的成立，而且还为发动革命做了大量组织和宣传工作。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被推举为执行部的庶务，宋教仁被选为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正式成立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移交给同盟会总部，不久改为“民报”社，成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宋教仁担任《民报》编辑。

宋教仁和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相比，他比较注重北方革命的发动工作。

宋教仁在1905年5月，曾撰写过《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一文，强调指出东北绿林武装“满洲马贼”可以成为革命力量。他认为东北因为“清政府不纲，国力削弱，不惜以祖宗巢穴拱手赠人，

遂使我数十万神明华胄之同胞流离转徙，无地可脱，无家可归，乃不得不效稗官野史中所谓宋江、吴用辈之仁义，与夫鲁达、武松辈之豪杰，以藏身而保命，其事甚奇，而其心亦甚苦矣”^④。

1907年春，宋教仁“见同志俱在南方运动，北方尚未动手，乃奋起偕白逾桓、吴崑及日本人末永节赴东三省，立辽东支部，运动马贼，谋占奉天，与南方响应”^⑤。宋教仁潜赴东北，试图从南北交攻，实行“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⑥这样一种战略决策。宋教仁这一决策，得到同盟会总部黄兴的支持，于是，宋教仁与日本人末永节、古河（即古川清）等，于1907年3月23日，自东京起程，取道马关，“由马关坐船至朝鲜釜山，再由釜山经京城往义州，渡鸭绿江抵安东县（今丹东市）而止。”^⑦4月1日早8时，抵鸭绿江口，“下午二时抵安东县，清检行李登岸”^⑧。4月3日，宋教仁写信致李逢春，派人送往大孤山。8日，“往大孤山送信之人夫回，携有李逢春之复信，拆视之，谓现因事不得来安，请余等往商云。余与古川遂拟日内即赴之”^⑨。宋教仁在4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与李逢春、朱二角，金寿山、王飞卿、杨国栋、孟福亭、蓝黑牙等书”。这封以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名义致大孤山马侠李逢春等的书信，是研究同盟会革命活动的珍贵文献。信中高度称赞他们“扶弱抑强，抗官济民”的侠义之风，鼓励他们把辽河东西、黑水南北的各地义军联合一气，指出“西渡山海关则永平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的战略地位。

宋教仁等代表同盟会表示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召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三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⑩。这里说的：“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实际是针对孙中山在南方发动边地革命屡遭失败而言的。李逢春接到信后，邀宋教仁等上山面谈，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愿意一致行动。

于是，宋教仁等即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

宋教仁等到辽东以后，便分头进行活动。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白楚香（即白逾桓）偕小长谷起行，往凤凰城去。……余等遂拟不日往大孤山一行”^②。又据黄一欧回忆：“白逾桓则赴凤凰城一带进行调查，搜集资料，经过一番筹备，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起义的机关”^③。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写道：“丁未春（1907年）、（吴昆）与宋教仁、白逾桓密赴关外，集合李逢春、金寿山诸马侠，设同盟会支部于辽东。”^④参证上述史料可以确定，同盟辽东部创建于安东、凤城县一带，始有同盟会辽东支部这一革命机关。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同盟会辽东支部设在大连^⑤，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建立，对关外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07年夏天，关外革命势力日益发展壮大，同盟会辽东支部乘势发动武装起义，“欲袭据辽宁，逼榆关，窥燕京”^⑥，但因白逾桓在碱厂（今本溪县碱厂堡）招兵起义，被清军击败。他“潜入沈阳举事，又被徐世昌所捕”^⑦。宋教仁鉴于辽东之役受挫，乃与吴昆等人密赴长白山一带作实际考察和联络革命党人，以作他日用兵的准备。

宋教仁到长白山下会见了韩边外（名显忠，号瑞臣）的孙子韩登举。韩登举继承祖父的联庄会首领之职，所辖地区以夹皮沟金矿为中心“东西长二百里，南北广百里，东以古洞河（界敦化县）为界，南以头道江南山为界，西以那尔轰大鹰沟为界，北以牡丹岭为界，面积约二万余里，人口约五万余”^⑧，并拥有武装数千人，宋拟运动其加入革命。“宋往见韩，韩待之颇殷勤”^⑨。宋与韩谈话获悉，日本政府见延边地带朝鲜人居多，欲将此地变成间岛，划归日本领土，乃由日本陆军参谋部策划组织侵华团体，一为“长白山会”，一为“黑龙会”。长白山会专门造假证据，以证明延吉为间岛，不属于中国领土。宋教仁认为此事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决定亲往延吉探其究竟。是时，“日本革命党人片山潜也在延

吉，宋与他在日本相识，由他函介，宋易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②“宋因而尽悉该会所造将延吉变为间岛之假证据，并拍照携归”。^③是时，吴禄贞正在延吉筹办边务。吴昆、白逾桓都是湖北留日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他们和吴禄贞关系很好，宋教仁等人此次东北之行，主要任务是联络“马贼”。运动新军，求得关禄贞等同盟会员的支持，谋划在东三省发动武装起义。关于这一情况，柏文蔚回忆说：1907年，“冬十月，吴昆来延吉。吴为宋教仁、白逾桓之同侣也。是时清政府正在大搜缉桃源宗介等。盖桃源中介者，宋教仁之化名也。余告吴昆，应注意避开，此间工作由余负责联络。筹资三百元，吴绶卿（吴禄贞号）亦赠五百元，交吴昆由海参崴转赴日本”^④。而宋教仁则取道朝鲜返东京。宋教仁等回东京后，同盟会辽东支部的工作转由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负责领导。这就是宁武说的“宋教仁以创办实业为名，于一九〇七年春在奉天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新军人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等是辽东支部的主要负责人”^⑤。

宋教仁在返日本的途中，“又赴汉城图书馆翻阅有关书籍，将证明延吉并非间岛之一切资料录出。复往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书籍，核对自汉城图书馆所获之资料。旋著成一书，名曰《间岛问题》，以确凿之证据，证明延吉为我国领土，对日人之侵略阴谋，为有力三揭露”^⑥。后来吴禄贞等办边务与日本谈判，日方所造的假证，都在宋著《间岛问题》一书予以揭穿，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三 奉天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

1911年秋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奉天（今沈阳），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异常恐慌。赵尔巽在1911年10月13日甫到齐齐哈尔视察，当天接到武昌起义的电报，慌忙于14日由齐返奉。

10月15日晚赵尔巽回到奉天，立即召集各司、道官员开会，

“磋商维持治安一切事宜。”翌日，发出“训切训谕”，称：“此次革乱关系重大，殊深珍念，若办事稍涉疏虞，恐贻误大局^⑧。”赵尔巽深知新军支持革命，一面严加防范，一面拉拢收买新军中的高级军官，传见第二混成协蓝天蔚、伍祥桢、标统聂汝清等，“面加勉励”。17日又将驻省城各协、标、营以上军官召至公署，亲自讲演，劝慰“军人宜知忠君爱国之大义”，“切勿轻听浮言，擅自无理之暴动”^⑨。讲演完，设宴招待，尽欢而散。

赵尔巽通令各地封锁消息，不许人民了解武昌起义真相。奉天《大中公报》发表了武昌起义的新闻报道，赵督以其“摇惑人心，扰乱治安”为借口，将该报馆封闭。并通告各地称：“报纸乱造谣言，万不可信，《大中公报》已封禁”，“通告人民万勿自扰”^⑩。黑龙江也因武昌起义，人心浮动，“禁止人民在各街粘贴各种报纸”^⑪。赵尔巽对东三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奉天省防范尤为森严，他给民政司、营口道的札文强调：“本省滨海临边，铁路轮船交通极广，难保无匪徒阑入潜谋，煽惑勾结，自应不动声色，广布侦探，防患未然”。^⑫

那时驻奉天北大营的新军第二混成协和潜伏在东北各地的革命党人，有响应武昌起义的举动。赵尔巽处境危急，心中惶恐，欲效忠清朝，又怕革命势力难以抵挡，于是召集亲信幕僚密议，征询对策。这时投机政客奉天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向赵督献上、中、下三策。

上策：整军保境，镇慑革命；袁金铠认为保皇派势力一定能压倒革命势力。根据是，“袁项城再起，统兵南下，以袁之久握北洋军符”，“胜负之分在指顾间耳”^⑬。“关外朝廷发祥重地，倘若沦陷，岂独为朝廷根本之忧，亦公负世代食禄之恩。为今之计，充实本兵（新编五路巡防营，赵尔巽为统帅），联络客军（指驻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使市面不惊，地方安谧，使革命党人无隙可乘，东省可保无虞。”袁金铠对五路巡防营的情况，分析道：“除中路由公自兼外，右路马龙潭系书生出身，城府太深恐不为我用”，

东边道又处山林地带，“更须镇慑，不能轻调。”“后路吴俊升系行伍出身，嗜利无厌，而洮南居近蒙旗，若不以重兵镇之，恐有蠢动^②”。前路张作霖、左路冯德麟，均系土匪出身，“脑筋简单，公但示以优遇，勉以忠义，必能出力。此二路距省较近，易于调遣，请公调伊等来省以资拱卫”^③。

中策：途作勤王，静观事变；

公可将巡防营集中省垣，公亲统之，进驻榆关，遥作勤王之师；后方令地方士绅倡办团练，保卫东土。倘袁项城得手，公以勤王之故，不失为忠臣，若民军得势，公可奏请朝廷东迁，可当偏安之元勋，不失臣节，策之中也。^④

下策：响应民军，甘居叛逆。^⑤

袁金铠的上策，被赵尔巽采纳，赵赞同说：“君之上策，尽可行之；但中策，距离尚远，可半行之，再次，非我所思矣。”^⑥

赵尔巽计策确定之后，立即采取措施，急令张作霖率部来省。张作霖认为这是争夺权力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亲率精锐五百骑兵，由驻地洮南日夜兼程，直奔省城。其余所部由依钦保率领，3日后也开进奉天。张作霖到省城后，经袁金铠介绍会见了赵尔巽，张向赵表白愿效犬马之劳。赵尔巽在危难之中，见张作霖忠心保护他，便引为护身符。不久，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以监视新军的动向。袁金铠伪装与革命党人合作，实际是给赵督探听消息，采取对策。

蓝天蔚与咨议局议长吴景濂联合密议驱逐赵尔巽，宣布奉天独立。事成后蓝天蔚为奉天都督，吴为民政长，袁金铠任副职。吴将此事告知袁，袁阳为赞成，暗中向赵督告密，因此，而有咨议局会议之事变。

蓝天蔚在北大营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发动第二混成协官兵进城占领督署，宣告独立；张榕拟通过政治手段，由奉天咨议局召集各界人士开会成立国民保安会，逼走赵尔巽，以期革命成功。但机密泄露，赵尔巽得到密报后，不动声色，在召开国民保安会的

前夕，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等人密商对策。确定以武力镇慑革命党人，逼蓝天蔚出走，拉拢和麻痹张榕，对革命势力各个击破。由赵尔巽发号施令，袁金铠、张作霖分头行动。

1911年11月12日（农历9月22日）下午，赵尔巽到省咨议局参加各界代表会议，“挟张作霖、袁金铠以自重”^④。张作霖带领一批打手随行，除了随从武弁外，又把当时在陆军讲武堂学习的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张作相、叶景全等亲信调来，共20余人分布在会场各处，以武力相威胁。开会时，张作霖紧跟在赵尔巽身后，首先由议长吴景濂说明开会的意义，接着赵尔巽讲话说：“东三省是处于日俄两强之间，稍有异动，深恐前途不堪设想”，主张“静观时局演变”^⑤。他的话还未讲完，同盟会员赵忠鹄、张榕等发言强烈反对赵尔巽的主张，要求“立即宣布独立”^⑥。正在双方僵持之时，张作霖跳上讲台，掏出手枪，恫吓说：“今日之会，我们一定要服从大帅的主张，如有反对的，即使大帅容许，我这支手枪是不允许的”^⑦。同盟会员和各界代表，手无寸铁，在武力威胁下，纷纷退出会场。会场内只剩下保皇派和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袁金铠以副议长身分宣布继续开会，在武力威逼下通过了“保安会”章程，选举赵尔巽为会长，伍祥祯（第三十九协协统）、吴景濂为副会长，张作霖任“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奉天国民保安会的实权都被保皇派所把持。第二天赵尔巽向东三省发布为成立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及通飭办理保安分会的札文：

“钦差大臣尚书衔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奉天巡抚事赵为通飭事：案照奉天省为维持公安，设立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业于本月二十二日（1911年11月12日）成立，公推本大臣为会长，所有副会长，公推伍协统祥祯，吴议长景濂，参议总长公推袁金铠，参议副长公推蒋方震、张榕。一切章程，并经议决公布，除通飭办理保安分会外，合行抄粘章程，札仰该道，即经查照，迅将分会成立，并将办理情形具报。此札。”^⑧这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文告，实际上是保皇派镇压革命派的法令。张榕、蓝天蔚原想成

立保安会宣布奉天独立，逼走赵尔巽，然而适得其反，保安会的大权被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所夺取。使革命党陷于被动。赵尔巽立即把成立保安会的经过情况报告清廷和袁世凯，并要求解除蓝天蔚的兵权，逼蓝出走。清廷和袁世凯复电照准。电称：“蓝天蔚著开去统领官，交赵尔巽差遣委用。”^⑧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玩弄软硬兼施的手段，委派蓝天蔚赴东南各省考察战事，并邀蓝到督署面谈，赵说：“奉省筹设国民保安公会，以尊重人道，保全中外民命财产，静待大局之定为宗旨。惟对于各省意见，必须考察明确，以供保安会之参考”；又说，蓝统领“志趣正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⑨。并劝蓝尽快起程，又赠旅费二千元。蓝天蔚就是这样被解除了兵权。赵尔巽逼走蓝天蔚，另委聂汝清任第二混成协协统。

蓝天蔚在关外革命党人中威望很高，公推他为关外大都督。但是他作事少主张，易为人所摇。蓝被逼走后，奉天革命党的势力削弱，士气低落，力量涣散。张榕为了挽回颓势，联合各方面力量与赵尔巽操纵的保安会作斗争。张榕与张根仁、柳大年倡建联合急进会。

1911年11月17日，“联合急进会”正式成立，各界人士踊跃参加，推举张榕为会长，张根仁、柳大年为副会长。该会的宗旨：“厚集势力，近遏赵尔巽辅清之谋，远窥北京，以促共和之成。四方豪杰入会者十余万人。”^⑩势力迅速壮大，东三省各地都有革命活动。但张榕等“联合急进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在奉天省城起义，误失良机。张榕与赵尔巽谈判，要求奉天独立，“速悬白旗，以静民心”，赵尔巽“始则含糊，终竟拒绝”。^⑪谈判破裂，奉天省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顿成剑拔弩张之势，急进会秘密议定，“分派同志赴奉天、吉林所属各县积极策动地方起义，以壮声势。遂推定商震、程起陆、祁耿寰等赴辽阳，孙祥夫、杨大实等赴开源，石巨夫、张寿仁等赴昌图，宋少侠、房怀远等赴法库，刘桐

阶、杨麟、赵元寿等赴长白、吉林；张根仁、柳大年等赴锦西、北镇”。^⑧还有许多会员分赴各地联络地方革命人士，争先发动，促成各县独立。张榕等人的设想，是先在各地举行起义，引诱赵尔巽等派军队出动“讨伐”，然后乘虚占领省城。只留下张榕等少数人居省调护，掌握机关工作。其余人员分赴各县运动军警，组织民军，策划武装起义。

四 张榕被害奉天革命受挫

赵尔巽窃取了“保安会”大权后，立即撕下中立的伪装，露出了镇压革命的真相。他以“保安会”会长名义发布号令，诬蔑革命党人为“扰害治安之公敌”，严饬各地军警“随时查拿，按律惩办，决不姑宽。”^⑨

蓝天蔚的兵权被解除后，聂汝清任第二混成协协统，从此，蓝天蔚所率领的这支军队，竟成为赵尔巽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了。蓝被迫离开奉天赴大连，又转赴上海。但东三省的革命党人仍以关外大都督蓝天蔚的名义发布文告，任命革命党人的职务，联络各地民军等。

1911年11月26日，关东大都督蓝天蔚发布檄文称：“本都督奉军政府之命，筹谋恢复关东一带，已经一月有余，一切布置，均臻完善。兵力到处，足以保护本国人民及外国人民之一切生命财产^⑩”。革命的目的是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当这份文告发布之时蓝天蔚正在上海招募民军，准备渡海北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深恐张榕和急进会在奉天省城起义与蓝天蔚里应外合，便召袁金铠密商对策，袁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对张榕施加压力，令其出面，遣散革命党人，“以和平劝谕，使之即去；另一个办法“用极严厉手段，出示晓谕，驱逐出境，稍有逗留，即行法办^⑪”。这种阴狠毒辣的诡计被赵尔巽采纳。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革命党人。袁金铠向张榕伪献殷勤，“榕年少性爽，坦然不疑，并以袁

可与同谋，遂委袁为急进党部参谋部长，所以党内机密袁尽知之”^⑩。另一方面，赵尔巽命令张作霖派军警严密监视张榕的活动。急进会机关设在张榕住宅沈阳北关容光胡同。赵尔巽发布告示称：“督宪以张某自组织该会以来，各县人士之入会签名者为数已众，与之反对者亦复不少，恐因之激起冲突，致生事端，故日昨飭警务局派警士在张某宅，昼夜加添岗位，安为保护云。”^⑪名为保护，暗中在严密监视党人活动。在赵尔巽指使下，袁金铠与张作霖密谋杀害张榕之策。此时，张作霖发表一通对时局的冠冕堂皇的谈话，略谓：“革命党中人，鉴于政府之腐败，故起革命之举动，以期改良政治，巩固国基，予亦深表同情。”又谓：“东省大局与内省不同，胡匪偏地隐伏，若革命一旦在东省起事，胡匪亦必乘机而起，大局不可问。故予不得不竭力严防革党起事，实为保全东省计也。”^⑫张作霖已表示与革命党誓不两立的架势。

1912年1月23日晚，袁金铠邀张榕、张作霖同到小西门德义楼赴宴。席散，袁金铠兴辞而去。张榕与张作霖同出德义楼，事先张作霖密令便衣侦探于文甲等，埋伏在外见机行刺。张榕行至平康里路口，被密侦开枪击中要害，张榕中弹后，大声怒斥赵尔巽等：“咄！鼠辈胡无信至此，吾竟以守约死矣。至死怒眦尽裂”^⑬。时年29岁。

张榕被害之时，正是革命军代表与清廷代表在上海议和之期。赵尔巽与张榕订约，东三省的事情，静待国会解决，在此期间彼此不得开战。张榕信守南北议和的停战协定，不搞军事举动。当时急进会交通部长洪东毅已组织四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准备在抚顺发动起义，因奉张榕电令而停止。

赵尔巽却背信弃义，撕毁协约，乘停战期间屠杀革命党人，镇压各地武装起义。张榕被害之夜，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搜查张榕住宅，将张榕之兄张焕柏刺毙，将家属逮捕，财物掠夺一空。同夜同时，有军警数十人，突入大东关宝崑住宅，时宝崑已

就寝，即由床褥中将其拖至楼下，用刀刺死。国民画报社编辑田亚宾，此夜宿在张榕宅内，也被杀害。张榕的受业之师，辽东宿儒张振声也在此夜被捕，怒骂不屈，被杀于万泉河畔，露尸三昼夜。一时间，奉天城内陷于血腥恐怖之中。

张作霖的军警在城内挨户搜查，滥杀滥捕，“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陈尸累累，惨不忍睹”^⑩。革命党人遭其残杀者不下数百人，无辜群众被杀者，则无法计算。

张作霖屠杀革命党人的历史，将永远受到正义的谴责。前不久在台湾病逝的齐世英曾评论说：“张作霖防卫省城，应付了兵变（指蓝天蔚起义）。他的前途也于此奠定。但是蓝天蔚是个革命党，如果从革命党眼光看，对张作霖当然是另一种看法了。这是东北鼎革之际一个关键性时刻。革命党人在东北起义人数很少，有些人被抓了，有些人被杀了，摆在那里，我亲眼见过。”

张榕被暗杀，奉天省城的革命力量遭到摧残，但各地起义军仍在活动，庄河革命军在辛亥年11月末宣布独立；辽阳刘二堡革命军准备攻打辽阳；凤城县联庄会与巡防军激战薛礼站；铁岭、开源、兴城、海城、营口等地都有民军起义。

1912年1月底，蓝天蔚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电令，进兵北伐。北伐军在庄河一带登陆后，于2月3日与庄河、复县民军会师，6日占领瓦房店，10日关外民军协统邵兆中率部攻占庄河厅，受到城内商民欢迎，悬挂白旗庆祝。其他各地民军也因蓝天蔚的北伐军登陆士气大振。而清军则“兵心瓦解”，陆军、巡防队、巡警多有“脱营逃亡”，甚至还有参加民军起义者，东三省民军实力壮大，正在准备向省城进攻之时，清朝皇帝宣统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革命党人不惜牺牲流血而争取的中华民国名义上总算实现了。但作为一场革命，实质上是失败了。

五 列强干涉奉天辛亥革命失败

赵尔巽、张作霖、袁金铠敢于以残暴手段屠杀革命党人，是与各国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暗中支持分不开的。武昌起义的革命烽火在东北大地点燃之后，列强表面上声明“严守中立”，实际上暗中支持清政府和赵尔巽。列强唯恐革命胜利，失掉它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列强对东北辛亥革命的干涉采取狡猾的两种手段，一种以经济的外交的手段支持赵尔巽，一种以武力威吓对付革命党。

1911年10月26日，赵尔巽秘密会见小池张造驻奉天总领事。赵言称，当地形势颇不平稳。革命党已潜入本地，正在进行某种策划。希望日本警察与清国警察合作，以防变于未然。拟尽可能不采取逮捕手段，仅从侧面加以威吓，以使彼等自行退去。日、清两国警察若能通力合作，彼等必不敢冒然采取行动。无论如何，希尽量予以协助。小池答应，在可能范围内给予援助。④

日本政府对小池张造与赵尔巽的密谈，极为关注。10月28日，内田外务大臣复电称：对于赵总督所提要求，我总领事答以尽力协助加以取缔，当然无何不可。但为清政府效劳而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如逮捕或引渡革命党人之类活动，我国政府不愿参预。希能按此精神适宜处理。但防止我铁路附属地以内及其附近地区发生扰乱，为我方自卫之所必需，自应向关东都督发出训会，使其设法增强当地警察力量。至于当地驻兵问题，现正准备在近日内以新兵接替原驻部队。未经训练之新兵，其实力当然不能与老部队相比，因此正在商讨推迟接替日期。我总领事可利用上述增强警察力量及维持现有兵力两项措施与赵总督适宜周旋。⑤

日本大资本家，大仓喜八郎由于经营本溪煤铁公司，在奉天曾向清政府捐款15万元。基此缘故，赵尔巽约定向大仓赠送勋章⑥。以上事实表明，日本朝野都在暗中支持东北地方的保皇势

力，但因中国时局不定，胜败谁属，很难预料，日本不愿涉足太深，所以对赵尔巽的支持也是秘密的有限度的。

赵尔巽在与日本领事保持秘密联络的同时，还与英国关系密切。英国对赵尔巽的支持主要是在经济上和出谋划策方面。

1911年11月9日，东三省官银号发生挤兑现象。英美烟草公司给予援助，缓解了金融紊乱状况。英国领事唯一希望赵尔巽能控制局势，尽力把革命风波平息下去。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赵尔巽当选为会长后，奉天海关税务司穆厚敦致函总税务司安格联写道：“总督（赵尔巽）间接地通知我说，他同意您提供给他意见，当前唯一明智的办法是稍微顺着革命运动的潮流走，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它约束在范围之内，不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总督还表示，在这紧要关头接到您的意见，他有说不出的高兴。……总督继续控制局势的发展，还大有希望，只要他的明智措施能够在这里实行，局势就可以平静地发展下去。”^⑤可见赵尔巽不仅有张作霖给他充当打手，而且还有帝国主义者做他的后盾。

穆厚敦在信中还写道：“总督要我尽可能随时把得到的消息通知他。我向他提起，您指示我秘密地征求他对大连汇解税款的意见。他表示了谢意，并且说，希望您指示大连关照常汇解税款，一部分给黑龙江作补助军费之用。”^⑥赵尔巽得到外国的经济援助，立即密令张作霖镇压革命党人，张就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暗杀了张榕等大批革命党人，接连捕杀了好几天。张作霖的暴行引起革命党人强烈愤慨。英国、德国、法国领事深恐这种残暴行动，招致革命党人的激烈反抗，而使局势恶化，便警告赵尔巽说：“如果总督不采取步骤，令出必行，禁止捕杀，安定人心，结果必将招致大祸”。^⑦欧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是消除日、俄两国对中国的武装干涉。防止日、俄再次瓜分中国领土。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互相牵制，致使日本不敢公开出兵干涉，另外，日本国内也有困难，“日本人民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很同情革命

党的。”^⑧

英国考虑到，辛亥革命的中心地区长江流域，恰恰是它的“势力范围”，它在这里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它不敢冒着丧失重大利益的危险，公开地站在清朝方面同革命党人为敌。

美国政府也从它的利益着想，也不赞成日本实行武力干涉，所以日本实行武力干涉的强烈欲望，遇到了来自英美方面的严重阻力。辛亥革命过程中，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日本乘机谋取独占性的侵略利益，曾再三警告东京当局，不得在中国采取单独的干涉行动。同时，美国也在德国支持下提出列强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来牵制日本。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羽毛尚未丰满，无论在财政上或国际政治上都还处处需要依赖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支持，与美国也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刚刚缔结的第三次英日同盟条约，对于加强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它决不敢因为在中国的冒险事业而轻易触怒这两个国家。法国忙于准备欧洲方面即将开始的厮杀，也希望在远东方面保持原来的“均势”。

当时唯有沙俄在干涉中国问题上，同日本的观点接近。

沙俄政府认为，“现在的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即令它们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无疑会有竞争，足以将它们削弱。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国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自由行动可能比现在大得多……。”^⑨俄国政府乘机攫取蒙古，煽动蒙古独立，反对革命运动。从俄国的史料中，也证实了这个问题。

“1911年7月，王公们在库伦聚会，决定在库伦呼图克图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并脱离中国。他们意识到自己分散和无力应付中国人，决定吁请俄国对他们打算从事的事业给予援助，并希望捍卫他们至今享有的那种独立地位。”^⑩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建立一个所谓新蒙古帝国，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当了俄国的傀儡蒙古的皇帝。这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12年2月16日）的事情。

不仅如此，沙俄还策动东蒙古诸王公宣布独立，以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扎萨克图郡王乌泰为首领，联合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扎萨克苏鄂公，喇什敏珠尔先后宣布独立。他们的武器弹药，完全由俄国供给，在1911年8月19日乌泰率蒙古骑兵五千余骑进占洮南。前蒙古马贼陶计陶率领蒙古军四千人支援，还有胜福、荣升、成德等人率领的外蒙古独立军也南下呼应。一时声势很大，北京政府急令奉天、吉林各省军队对乌泰实行讨伐，奉、吉两省军队迅速击退了蒙古军，并收复了洮南。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猛追穷寇，包围扎萨克图王府，乌泰于九月十三日越城逃走，携带他的家眷向索伦山中及呼伦贝尔逃走。以后由俄兵护送到库伦去。

在东蒙古闹独立的前后，俄国乘辛亥革命中国政局不稳之际，煽动呼伦贝尔独立。呼伦贝尔历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黑龙江省与俄国接壤的地区。1911年11月27日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等阴谋叛国，背后依靠俄国支持组织所谓蒙古独立军。1912年1月15日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额鲁特、陈巴尔虎两旗总管胜福，车和扎等，受俄国唆使暗助，占领海拉尔。宣布独立。2月1日，俄军暗助蒙人袭击呼伦贝尔地区庐滨府（今满洲里），未得逞。4日俄军马步炮兵约八百人，携同蒙人四百余人合围庐滨府，限当地驻军12小时内交出全部枪马，逾时即开炮轰击。当地清政府官员交涉无效，乃于是日午后4时，被迫将枪马交与蒙方。至此，庐滨府实际也为俄人所侵占。

综上所述，当时无论是国际形势或中国国内的形势，都迫使帝国主义无法对辛亥革命采取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行动。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虽具有深刻的反帝性质，但所采取的毕竟是国内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的形式，内部矛盾在当时表现特别尖锐。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自始就对帝国主义抱着妥协的态度，幻想因此获得它们对于革命政权的“同情”和“帮助”。以关外大都督蓝天蔚名义致驻奉各国领事的照会说：“武昌起事之后，全国响应，义师到处，行动文明，各友邦外交团，均先后宣布中立。本都督为

联合同胞，恢复关东三省，共图推倒清政府，辅助军政府，建立共和国；同时对于外交各邦，重敦睦谊，期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所有民国军对外行动，先时知照，免致误会。

(一) 所有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二) 所有外债，照旧担任，由各省按期摊还。

(三) 在军政府占领地域内居留之各国人民及其财产教堂，均一律保护。

(四) 各国之既得权利，一律保护。

(五) 此次照会后，清政府再与各国订结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概不承认。

(六) 各国如助清政府妨害军政府，军政府当以敌相待。

(七) 各国如供给战争物品于清政府，查出悉数没收。”^⑩从军政府这些条件来看，虽然具有一定反帝性质，但很不坚决。它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很明显的。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所有外债照旧担任，由各省按期摊还。这说明辛亥革命不敢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对列强的态度比较温和。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也感觉到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而不必采用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方式来达到破坏革命的目的。因此，侧重于政治阴谋活动的干涉形式，愈来愈为帝国主义所重视，而实际上列强破坏辛亥革命的重要手段，就是利用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在“中立”的幕布后面，暗中加紧扶植袁世凯上台，并通过它们精心策划的“和平”谈判，诱使革命党人向袁世凯交出已经得到的斗争果实。

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宣布下台后，过了两天，孙中山不得不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正如列宁指出的，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表现他是一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⑪奉天辛亥革命的进行也是不彻底的，正如当时奉天关税务司穆厚敦所说的“这里并没有真正发生政变。”一切权力仍然掌握在反动的官吏和军阀手里。

但从全国和中国历史来看“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

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⑧结束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正如列宁所说：“地球上1/4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⑨开始了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新阶段。

奉天辛亥革命，革命党人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由于组织松散，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最后被国内外的保守势力所绞杀，但辛亥革命烈士的功绩，将永存史册，激励人民为祖国的昌盛富强而英勇奋斗。

①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裁将军，设东三省总督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巡抚。此后，东三省即指奉、吉、黑三省。

②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7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张榕事略》，《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145—146页。

⑪⑫ 黄季陆主编：《革命人物志》，第32—33页。

⑬ 《宋教仁集》上第13页。

⑭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第1488页。

⑮ 张相文：《南园存稿》，卷八，《宋教仁传》。

⑯⑰⑱⑲⑳ 《宋教仁集》下，第722、725、726、727、726页。

㉑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42页。

㉒ 同⑭，第1654页。

㉓ 见常城《辛亥革命在东北》，《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5期，又见李时岳在1969年《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文章。

㉔ 《革命人物志》，第二集，第213页。

㉕ 白逾桓：《程家桢革命大事记跋》。

㉖ 《宋教仁集》上，第123页。

㉗⑳㉙㉚ 《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38—39页。

㉛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㉜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536页。

㉝㉞㉟ 《盛京时报》1911年10月17日、19日、24日。

㊱㊲ 《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42页。

- ③④⑤⑥⑦⑧ 《吉林文史资料》第4辑，第208—209页。
- ⑨ 《辛亥革命》(七)第390页。
- ⑩ 同⑨第547页。
- ⑪⑫⑬ 同⑨第51、59、60页。
- ⑭ 同⑨第49页。
- ⑮ 同⑨，第51页。
- ⑯ 同⑨，第147页。
- ⑰ 《盛京时报》1912年3月16日。
- ⑱ 同⑰，程起陆：《关外革命回忆录》。
- ⑲ 同⑱，第68页。
- ⑳ 同⑱，1912年12月5日。
- 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91页。
- ㉒ 同㉑，第212页。
- ㉓⑴ 同⑳，1912年12月3日、27日。
- ⑵ 同⑳，第147页。
- ⑶ 同⑴，第397—398页。
- ⑷⑸⑹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9、51、73页。
- ⑺⑻⑼⑽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1911年11月12日穆厚敦致安格 联
第19、20、21、27号函。
- ⑾⑿ 张蓉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437页。
- ⑿ 同⑿，第396页。
- ⑿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0页。
- ⑿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
- ⑿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395页。

吉林辛亥革命纪略

孙 邦 于海鹰

吉林省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民风朴实。由于与日、俄两强为邻，长期成为他们掠夺对象。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吉林遭到长达5年之久的蹂躏。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取代沙俄势力，在吉林省开辟商埠、建立银行、开发矿产、驻扎军队，继续疯狂掠夺。清政府为应付对外赔款，滥印滥发纸币，造成吉林省四种地方纸币大幅度贬值，人们气愤地用纸币糊墙，民谚“官帖糊墙，百姓遭殃”就是当时真实写照。而每垧地租却由原来420文，到1910年增为666文，官吏又趁机敲榨勒索，中饱私囊。长期匪患猖獗更加重了吉林人民的苦难。

1909年7月，松花江泛滥成灾，夺去上千人生命，淹没农田不计其数。1910年秋，全省鼠疫流行，仅哈尔滨（清末属吉林省）一地就死亡两万人左右。1911年5月18日，省城吉林市大火，将省城烧掉1/3，受灾达3000多户，数万人无家可归。列强的欺凌掠夺、清政府的横征暴敛及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使吉林人民一贫如洗，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1906年到1911年，吉林各地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民抗捐抗租的斗争遍及全省，标志社会危机空前严重的抢盐、抢粮风潮也相继出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吉林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首先觉醒，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面对财尽民穷、外强暴虐及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抗怒潮，连封疆大吏

孙邦，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于海鹰，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

也是焦头烂额，苦无对策。1907年9月，吉林将军达桂被清廷以“任用匪人”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日俄战争以后，清政府在吉林省的统治也如同全国一样，就好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

同盟会在延边的革命活动

1907年3月23日，著名的同盟会领袖宋教仁在孙中山及黄兴的赞同下，先到辽宁活动。大约在6月，宋教仁亲自访问了割据吉林省桦甸、敦化、抚松、安图一带的拥有数千武装的团练首领韩登举，在韩的驻地受到殷勤接待。这时传来了惠州起义的消息，宋教仁有心组织韩登举及东北绿林“袭据辽宁，逼榆关，窥燕京。”由于清政府举荐韩登举为参将，并授予南山一带团练总领，使宋教仁策动他反清失败。又因与宋教仁同来东北的白逾桓在沈阳被捕，宋教仁感到已无法完成联络东北“马侠”的起义任务，不得不离开东北。他化装成日本人，还取个日本名字叫桃源宗介。途经朝鲜清津结识了革命党人卞秉灿，并在清津对数百名被日本招来修建码头的山东籍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在他影响下，工人领头人陈启顺曾数次召开小组会，准备在吉林发动反清起义，同时渡过图们江与境内绿林武装及革命党人、边务处帮办吴禄贞取得联系。宋教仁在朝鲜大约居留两个月。^①

宋教仁在吉林期间获悉日本企图吞并延边，他回到东京后，夜以继日地埋头伏案赶写书稿，还常去帝大图书馆查阅资料，1908年7月终于著成《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的历史资料证明了延边历来为我国领土。^②

宋教仁走后，东三省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由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负责。

吴禄贞，生于1880年，湖北云梦人。1907年7月，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今沈阳）。8月，由于日本挑起了所谓“间岛问题”，

造成延边局势紧张，徐世昌派吴禄贞率周维楨等前往调查。吴禄贞先到省城吉林市查阅了有关资料，然后到延边实地考察，纵横行程2600余里，费时73天。时值盛夏，终日跋涉奔波于崇山峻岭，常露宿山林，蚊叮虫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测制了1/500000的延边地图。又历时4个月，搜集大量古今中外资料，于1908年4月编辑成《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为对日交涉准备了充足实证。考查途中，吴禄贞顺路拜访了韩登举，对他晓以民族大义，韩登举表示：“愿听从吴大哥的命令。”

1907年10月，吴禄贞到延吉，以韩登举的团练武装为后盾，与率兵入侵延边的日军中佐斋藤季治郎交涉，他据理力争，终于使日军后撤。曾为吴禄贞留日时教官的斋藤感慨道：“中国尚有人，如吴禄贞，不可欺也！”

1908年冬，吴禄贞遭吉林巡抚陈昭常排挤，离任回京。因与日交涉屡遭失败，清廷不得不再次起用吴禄贞，并任他为边务督办。1909年5月吴禄贞返回任所，1909年9月，日方最后不得不承认延边自古以来为中国领土。

吴禄贞在延边兴学校、办医院、建军营、经营农林牧矿等业，延边民众深受其惠。在他任职期间，不少革命党人进入延边地区开展工作，都得到他的悉心掩护，如廖仲恺、高宜权、孙师武、吴昆、方培良等。他们在吴禄贞管辖区域内，进进出出、四处活动，联系“马贼”，发展革命组织。清统治者虽未掌握真凭实据，但也认为吴禄贞有“革命嫌疑”，终以“经费支绌”为借口，撤销了边务公署，1910年2月17日，吴禄贞离开东北。

与此同时在延边从事革命活动的还有柏文蔚。柏文蔚，安徽寿县人。因谋炸两江总督端方，避祸东北，1907年随吴禄贞到延边。1908年冬，他到汉城从户部朴尚书之子处购得《大东舆地全图》，为对日交涉提供了证据。1909年冬，吴禄贞派柏文蔚到绥芬大甸子调查，准备在那里垦田屯兵，柏文蔚带200士兵踏雪前往。后因吴禄贞被调走，屯田营计划未能实施，推测此举也应与同盟

会北方起义计划有关。吴禄贞离开延边返京不久，柏文蔚也调到奉天督练公所参谋处任二等参谋。1910年冬，他沿中俄边境调查，并在哈尔滨会见绿林首领“天边羊”(姓赵)，去伯力访晤数年前震撼东北的抗俄武装首领“老刘单子”(刘永和)。此行所访绿林豪杰不下20余人，均表示待机揭竿反清。因经费困难，柏文蔚又赴呼兰向“天边羊”求助，“天边羊”慷慨赠卢布500元，帮助柏文蔚和革命党人解决了困难。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柏文蔚被陈英士召回南方。

大约在1907年夏，参与发起同盟会的程家桢不顾5月被清廷唆使日人殴伤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与白逾桓(白逾桓从东北脱险后回京)、程梦余来延吉。离北京前，程家桢对程梦余说：“青年人应该参加革命，在清廷作官是没有前途的。现在东北新建行省，那里的新军里有很多革命人物，其中力量雄厚、立场坚定的要数延吉边防督办吴禄贞。在那里清廷的控制力量薄弱，革命活动比较容易。”

程梦余随程家桢经奉天到延吉，不仅结识了吴禄贞、柏文蔚、辜天保、柳大年、刘艺舟等革命党人，而且他本人也经程家桢、柏文蔚介绍，在延边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决定辜天保、柳大年在延吉办《边事日报》，刘艺舟则专搞新戏。^⑤程家桢不久返回北京，程梦余与白逾桓也于1907年12月回北京办《国风日报》。

以上史料表明：1907年至1911年，吉林省延边地区曾是同盟会在东三省的重要活动中心之一。

同盟会在吉林、长春的革命活动

早在1906年同盟会即派有“革命党员三人由铁岭赴吉林”开展工作。1907年林伯渠被同盟会派往东北调查边疆、联系绿林，他通过姑夫汪德植，面见新任吉林巡抚朱家宝。因林伯渠是师范毕业，又曾留学日本，当即得到朱家宝的重视，并作为其随员同往

吉林。到吉不久，便以“学务精通”被委任为“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负责创办新学，同时主持师范传习所及四关小学。他常以查学为名，各处活动，并与绿林武装频繁来往。他曾去桦甸拜访韩登举，受到热情招待，并被介绍前往哈尔滨、长春等地找著名“马贼”首领接洽。他也积极参与反对日本吞并延边的斗争。在此期间，尽管接到妻子司马殿凤暴卒的噩耗，但他并未消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09年林伯渠视察伊通、磐石、桦甸等地学务，行程中日落无店可投便宿住民家，与乡亲们讲解教育的重要。10月他又到敦化视察，他向知县谢祖荫提出敦化教育存在的四个问题，并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在地方贤有司之善于提倡耳。”然后与谢祖荫一起订出《整顿敦化学务办法六则》，经他这次视察督促，敦化教育有了新的起步。林伯渠在吉林教育界任职4年多，1911年8、9月间，被召回湖南。1907年前后，在吉林政法学堂还有革命党人姚剑泉、张根仁、刘芳等任教，吉林陆军学堂中也有革命党人方剑飞、范国才充任教员。他们借执教机会，在广大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

1908年，同盟会领导的南方几次起义都失败了，孙中山设想组织北方起义。何香凝回忆：“1909年，他（孙中山）再派廖仲恺到营口及吉林秘密作策反的地下工作……并以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作翻译作为公开职业来掩护，仲恺与林伯渠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吉林时常过从的。”

除林伯渠、廖仲恺在吉林从事革命活动外，具有“关东三杰”之誉的商震、蒋大同、陈干也先后在长春、吉林活动。他们3人原以辽阳为基地，计划建立一个培植革命人才的中心，后遭官府忌恨，陈干、商震被诬而于1907年夏离开辽阳。

商震辗转到达长春，在东关龙王庙小学担任教员。所谓小学，学生也大多是接近成熟的青年，有的甚至年过20岁。商震也是满怀壮志的热血青年，尽管生活清苦，他还是披肝沥胆地鼓吹

革命。商震回忆：“那时候连饭也吃不上，有时一个烧饼分两半，你一块，我一块。”

1910年，在营救熊成基失败后，商震在长春街上遇见同乡刘锡侯，他对商震说：“你奶奶在家把眼睛都哭瞎了，无论如何你得家去一趟。”可年轻的商震却在锦州下车，继续投身革命。

蒋大同，名卫平，字大同，化名蒋健，河北滦县人。他离辽阳后，在中俄边境考察被侵占的国土时，一度被俄军逮捕，释后于1908年秋到长春，11月他联系房宾、高鸿飞、齐希武等人发起筹办《长春日报》，得到长春绅商周裕臣、毕维垣等39人的赞助，1909年4月3日《长春日报》正式出版，成为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一支嘹亮号角。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清政府压力，加上经费困难，只办了两个月被迫停刊，编辑徐竹平遭逮捕。不久，蒋大同也因熊成基一案被通缉，他不得不北上黑河，1910年8月5日被沙俄惨杀。身后留一孤女蒋光坤，1928年被商震收留并送其上学。

陈干（陈明侯）1907年离辽阳赴日，后回青岛办震旦公学。1909年初，他再次到东北，并以长春为活动中心，发起组织“旅长山东同乡会。”当时辽宁新民第二十镇山东籍军人甚多，陈干便寄去山东同乡会简章，二十镇军官王金铭等组织了新民山东同乡会，成为关外最具实力的革命团体，并在后来的滦州起义中充任先锋。陈干还曾结识朝鲜义士安重根。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之前，曾身怀炸弹作血书留影一幅赠予陈干。安重根殉难后，陈干题诗悼念这位伟大的朝鲜爱国英雄。此期间著名的同盟会骨干徐镜心在吉林创办建筑公所以掩护其革命活动。^④

革命党人仇鳌回忆：1909年他到吉林时，“党人赵燎、江海宗等也先后到达吉林，筹划在边远地区建立革命基础。这一计划本是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黄兴）所决定。”熊成基就是担负来东北联络绿林、建立北方活动基地的使命。这是继宋教仁等人之后，同盟会第二次派重要人物来东北活动。

熊成基是1908年11月19日震惊全国的安庆起义领导人，清廷

悬赏白银5千两缉捕他。1909年3月，熊成基第一次由东京经沈阳到达长春，就住在《长春日报》，他与商震、蒋大同等人商议决定，在人烟稀少的吉林省蜂蜜山（今属黑龙江省密山县）从事开垦、存粮购枪，建立根据地伺机起义，并联络新军、“马贼”。这是同盟会举行北方起义计划的一部分。可是由于缺乏经费，一时难以兴办，熊成基于当年6月返回日本东京。

在东京，同盟会从会员孙元（号竹丹）处得到了日本对俄军事行动的机密书籍10余册，决定将该书卖给俄国，一方面换得重金充作革命经费，同时期望激起日俄冲突，以便乘机举事。商议后，熊成基、孙元自愿承担此事，分别到吉林、北京联络售书。不少同志劝阻被清廷通缉的熊成基不要回国，但他不顾个人安危，踏上了归途。

1909年9月，熊成基第二次来到长春。他化名张建勋，住在长春臧贯三家里，不慎向臧泄露了真实姓名。当他去哈尔滨寻找俄人兜售图书时，见利忘义的臧贯三向清政府告密。1910年1月29日，熊成基在哈尔滨宾如栈被捕，1月31日押赴长春。吉林巡抚陈昭常为邀功请赏，捏奏熊成基欲谋刺海军大臣载洵，并不顾年关封印的规定，急令将熊成基转送省城。2月2日，长春巡警局用5辆大车将他押送吉林省城监狱，“由长春头道沟出南大门，观者塞途”，而熊成基却是“谈笑自若。”

审讯中，熊成基巧妙地回避了清官吏的深究，保护了其他同志。他痛斥清政府反动统治，畅谈个人革命胸怀。由官方笔录而成的《熊成基供词》虽只有7页，却是光明磊落、正气凛然。2月13日，他又亲笔写下《熊成基自书供词》，当陈昭常叫他在上按押时，他执笔写下“革命”二字代替手押。

1910年2月27日，熊成基被押赴吉林省城巴尔虎门^⑥外刑场，他不断向沿途群众申明：“诸君、诸君，勿疑我为盗为奸为杀人之凶徒，我固一慈善之革命军人！”并向大家说：“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矣。”

临刑前他仍然高声宣传革命宗旨，刽子手“使之跪，熊不屈，”就义时年仅24岁。

现存一幅熊成基牺牲前身负手铐脚镣、器宇轩昂的照片，那视死如归、慷慨赴义的神情，令人肃然起敬。熊成基的壮烈殉难，实践了他所说的“牺牲一身，以利社会”的壮志。

在熊成基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出后，活动在东北的同盟会成员曾多方设法营救。当时在陈昭常幕下当翻译的廖仲恺曾设法救助；商震等人计划劫狱未成功；革命青年钱来苏也曾密谋劫狱，被任吉林高等审判厅丞的父亲大杖驱逐出门。

以上史料表明：1907年至1911年，大批同盟会成员或受派遣、或避祸，抵达吉、长两市从事革命活动，使吉林、长春成为革命党人在东北重要活动中心之一。从而在吉林省内形成吉、长两市与延边地区遥相呼应，中心城市与边远区域的战略配合。

吉林省籍的革命党人及活动

众多外省籍的著名同盟会领袖、骨干身负危难、不畏苦寒、远走关外，渐次推动民主革命在吉林省的开展。而吉林省也不乏志士仁人投身革命，如松毓、金鼎勋、王赭人、文耆（杨策）等人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金鼎勋生于1878年，吉林省九台市二道沟乡金家屯。他从省立师范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并结识孙中山先生，不久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冬，由朱霁青、金鼎勋等人集资，在奉天创办了《乌报》，意在唤醒国人，奋发革命的决心。此期间，金鼎勋在吉林省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动，联络各界人士，为反清作准备工作。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在黄河以北一路的宣传工作，决定由王葆真和金鼎勋负责。他与王葆真在4月底由日本回国，在奉天创刊《国民报》，宣传民主革命、抨击清政府。金鼎勋是对吉林省辛亥革命颇有贡献的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

松毓，字秀涛，满族。生于1863年，吉林市温德河子人。曾被孙中山以“满人贤哲”相推许。松毓出身于没落官宦家庭，青年时曾是秀才，任过黑龙江省绥化兵备道、花翎二品衔吉林特用道，“善书法，喜交游，颇为上层人士所推重”。

在同盟会员的推动下，松毓联合文耆、庆康、庆山、孙树棠、李芳等热心维新的士绅和留日学生，于1907年1月6日成立了“吉林地方自治会”，松毓被选为会长，他还是第二任的吉林商务总会会长。1907年2月，松毓赴日和中国南北各省考察新政。回到吉林后，创办《公民日报》宣传维新思想，启迪民智，并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1908年夏，吉林爱国士绅、商民、青年学生组成了“吉林公民保路会”，公推松毓为会长，群情激愤地反对日本攫取吉长铁路的筑路权。他们集股筹款，各界热烈响应，“甚有闾阎之中，典簪脱珥，童幼之子，倒篋倾囊”。短短几个月中，筹集筑路股本210多万两，表达了吉林人民的爱国决心。

吉林自治会成立不久，入会者已达700余人，会员遍及全省，自治会的权力几乎与官府相近。1908年11月，新任巡抚陈昭常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指使，以“破坏政权”的罪名，免去松毓一切职务，并改为官办的吉林府自治局，吉林省的自治运动半途而废。

武昌起义后，1911年11月17日，为对抗赵尔巽与立宪派成立的“保安会”，同盟会辽东支部派赵元寿等人来吉林成立了“联合急进分会”，松毓任会长。1912年初，他致书孙中山，提出有关东北革命的策略。孙中山先生称赞松毓是“率一族人参加民族革命于旗下”的“满族豪杰”。

除松毓外，吉林另一位革命骨干文耆也是满族，这表明了广大满族人民拥护革命，奋勇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王樾人，原名树堂，又名荫槐，字樾人。1885年农历五月初八生于吉林市下二台子，1900年迁居海龙县山城镇。他出身书香

世家，十几岁随父到海龙府所属平安川（今属辉南县）兴办私塾。他目睹清政府勾结沙俄屠杀百姓惨状，愤然出走。先到北京东三省中学堂求学，后在天津结识著名的东北革命党人张榕。1911年秋，随张榕返回东北，在奉天与柳大年、张根仁等组织了“联合急进会”，准备武装起义。11月，他被派回海龙，名曰创办东三省保卫公所，实则创建“关东独立自卫军。”王樵人回乡不久，便在山城镇西南的杨树河发展乡军数百名，加紧训练，拟在兴京（今新宾）、海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以响应南方，牵制清军入关“勤王助剿”。谁知“出师未捷身先死”，他惨遭官府杀害。他的发妻梁氏夫人哀念亡夫，终生未再嫁。⑥

吉林辛亥革命纪略

大约在1908年前后，吉林省城的大街小巷，清晨经常出现一个手执木梆的人走到住户窗前，打下木梆后，说：“五更过去了，你们还沉睡呢，快快醒醒吧！”。还有一个手执铜铃的人，身背一方白布，布上歪写一个“国”字，下面画有一支棍撑着，他嘴里大声吆喝：“国要倒塌了，快快救国啊！”原来他俩是自治讲习所的宣讲员李六更（李敬修）、陈卓艇，当他们沿街宣传时，群众蜂拥围观，很受欢迎。这个“金声木铎”的事迹生动地反映了反帝反清斗争在吉林逐步展开，和吉林人民的日益觉醒。

1911年5月1日，吉林省城学生听到帝国主义酝酿瓜分中国的消息，由陆军小学堂学生发起，在北山庙里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会上学生代表纷纷演说，号召“为国而忧”。有的学生痛哭流泣，有的割指血书，观者无不感动，会场气氛颇为激烈。青年学生不顾清廷一再禁令，集会请愿，表现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态度。

吉林省1906年到1911年，自发的广大群众反抗风潮和觉醒的民族、民主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这一切都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大清帝国”的末日在吉林也为期不远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震动全国，吉林、长春等城的市民拒绝使用清政府发行的纸币，纷纷持币向钱庄、银行兑换现洋。革命党人、青年学生大受鼓舞，为响应武昌起义，实现吉林独立，积极进行宣传鼓动。10月中旬在省城就有人“倡言独立”，其后“附和者为数愈多”。

吉林巡抚陈昭常、驻军二十三镇统制孟恩远闻讯惊恐万状，一面向武昌等地派遣密探侦察情况，一面切断对外联系、封锁消息。同时又在交通要道加岗布哨，到客栈明查暗访，以防革命党人“潜行来东”。11月16日，陈昭常召集省城各界代表，准备仿照奉天模式，成立吉林国民保安会，以维护封建统治。遭到革命党人、青年学生坚决反对，强烈要求宣布脱离清廷的独立。双方争执不下，争辩激烈，学生代表慷慨激昂地说，“保安会学界绝不赞成，假使刎颈流血之祸，即在眉睫，非学界之所畏也！”但在反动派操纵的军队支持下，省保安会得以成立，部分府、厅、州、县也成立了保安分会。11月20日，省城各学堂学生一律罢课，以示反对。

1911年12月，革命党人段右军、朱霁育到长春与杨子厚密谋在长起事，因泄露而失败。1911年12月19日，驻长春第二十三镇军官庆恩（化名陶雨春）与日本人木村好太郎商议，联络西北荒“马贼”100余人，以长春府游击马队长李松山为内应，计划武装起义，因被告密而失败。

1911年12月初上海光复后，黄兴、陈英士密派李征五、臧士新由沪乘轮船抵达海参崴，找到同盟会著名骨干张西曼。经由张宗昌牵线，张西曼不顾艰险两次深入吉林境内绿林“刘单子”（刘玉双）的驻地，终于动员他率千余人分批乘轮悄然南下，支援关内革命军。遗憾的是这支武装在关内被张宗昌裹胁、整编瓦解，“刘单子”如失水蛟龙，郁郁以终。

1912年1月17日，吉林省城各街巷忽然贴出署名“民党”的传单，号召满汉各族人民参加“推倒政府”，“改革政体”的斗争，传

单写道：“共和目的，期达而已。南省联军，指日来吉。此间志士，五百有奇。正事布置，相机而起。君主威福，有朝无夕！”

可是，1912年1月23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指使张作霖派人杀害了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张榕。顿时东三省乌云翻滚，吉林省的革命党人也遭摧残和镇压。

1912年2月，在长春南满铁路附属地内，曾聚集了百数十人“分匿于各旅店，约期举事”，因遭官府勾结日本侵略者的压迫而被迫解散。2月18日，李贵、杨八等人率百余人占领公主岭，宣布独立，结果也被“给资遣散。”

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发生在哈尔滨，革命党人梁廷栋、梁廷樾与刘乾一、商震等密谋，以哈尔滨为根据地，从背后猛击清廷。他们率领由“马贼”和反正巡警组成的200余人起义军，于2月16日夜起义，占领了电报局、自治会。19日清军统带么佩珍率队围攻起义军，梁廷栋、梁廷樾、陶遇春、王泽臣、李范五等10余人壮烈牺牲。

1912年3月7日，驻吉林省山城镇巡防营管带李秀峰奉命围剿海龙县杨树河子村革命党人王樾人领导的乡军。3天以后以革命党的罪名，将王樾人刀砍于山城镇西门外。据在场人回忆：樾人殉难时，高呼口号，怒视敌军，人头落地，双目不瞑。时年28岁。

吉林省的武装起义虽都失败了，但也支援了全国的革命斗争。

3月15日，陈昭常就任民国的吉林都督，其他封建官僚多数也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达官显贵。“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在吉林省流产了。

吉林辛亥革命后二三事

作为辛亥革命的余波，吉林曾发生撵督事件。1913年2月23

日，在省城举行了熊成基遇害3周年的追悼会，400余人参加，孙中山、黄兴送来了挽联。会场上有东三省筹边使章太炎送的挽联：“早到三年也同成国事重犯，蠢尔元凶敢来吊革命先驱。”装模作样前来会场的吉林都督陈昭常看到挽联，在众人怒视下惶恐退场，不久便告退逃离吉林。

而章太炎满怀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工业、开发建设东北的热望，在内外压力下，不到半年便成泡影。他于1913年4月17日，悄然离开了设在长春的东三省筹边公署。章太炎这段短暂而失败的从政生涯，说明在帝国主义宰割之下、封建势力包围之中，单枪匹马要“筹”东三省之“边”，谈何容易！

对于辛亥革命，日俄两国都有乘乱瓜分中国的企图。1912年8月16日，沙俄煽动哲里木盟副盟长乌泰叛乱，使吉林省洮南地区蒙汉群众死难达2500人，被毁房舍500多间。而日本侵略势力，则利用封建余孽组织宗社党，策划“满蒙独立”，叛乱所及，也给吉林人民带来了苦难。

辛亥革命时，吉林省的作用和影响不能与南方相比，也不及辽宁。但辛亥革命在吉林省的深刻影响却是长远的，革命党人在吉林活动的事迹已成为吉林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另外，革命党人在边陲之地的吉林，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免遭外强吞并，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兴办实业、建设吉林等方面的不朽贡献，也是不应忽视的。

① 卞秉灿《辛亥革命亲历记》，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五辑，第46页。

② 黄一歌《辛亥革命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41—42页。

③ 程梦余《光复前后和反袁》，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五辑，第37—38页。

④ 黄季陆《陈明侯与辛亥革命》，载《青岛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42页。

⑤ 巴尔虎门：系吉林古城八座城门之一，“巴尔虎”是内蒙呼伦贝尔盟的一旗名，因该旗3000名兵甲于1692年曾驻扎吉林，故将城东北处之门命名为“巴尔虎门”。

⑥ 张福元《辛亥革命党人王懿人》，载《海龙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第1—2页。

黑龙江地区辛亥革命综述

辛培林

辛亥革命之前，即从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由于清王朝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东北及黑龙江地区到处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景象。与此同时，阶级矛盾也更加尖锐。清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革命的发展，搞起了假“维新”、伪“立宪”，“借维新之名，行苛政之实”。正因为如此，“政之名虽新，政之弊转烈”^①。从而，使清王朝到了末日来临而又不可收拾的地步。它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任何外力的支持都不可能使它免于倾倒了”^②。

1. 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这是清王朝末日即将来临的景象在黑龙江地区的突出表现之一。当时，发生了段芝贵为当黑龙江省巡抚而贿赂亲贵的“杨翠喜案”和黑龙江省民政司使倪嗣冲贪污案，并成为轰动全国的丑闻。这种腐败现象在黑龙江地区也不仅仅只有“杨翠喜案”和倪嗣冲贪污案，而是像东三省总督锡良所说的那样：“行省既开，投效人员联翩继至，非无超群轶类之才，而闾茸无能滥竽冗食者亦复不少，甚以市井齷齪之辈，不官不仕，钻营奔竞，差委滥膺，流品混淆，贤者沮气。”^③具体事例还有，汤原县知事列虞卿“性情贪鄙，于任内自领腴荒，转售渔

辛培林，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利，迭经被控”^④；候选知县朱建功“捏写帐簿，浮冒侵蚀”^⑤；候选知县熊恩溥查拿私烟，诈赃受贿^⑥；黑龙江省民政司使赵渊“刚愎任性，喜怒无常，遇事把持，奴隶属吏”，巡抚周树模责成他“督办防疫，遇事不和，稍加诘问，辄敢肆口谩骂”。周树模无奈，只好电奏朝廷，将其“即行开缺并交部严加议处”^⑦。

2. 自然灾害十分严重。清末，黑龙江地区自然灾害频仍发生。据历史档案记载，1910年入夏以后，阴雨过多，自6月26日始，“经旬累月，久不放晴”，致使嫩江水势暴涨，嫩江府、西布特哈、龙江府、大赉厅、肇州厅、甘井子、杜尔伯特旗等地沿江民房、田地均被淹没，为灾甚巨。大赉厅所属塔子城一带因积水过久，发生虫灾，蔓延五六十里，几乎将庄稼全部吃光。嫩江府所属地面也是连下大雨10余日，骤涨的嫩江水浸灌了一百五六十屯，大片耕地因被淹而未能播种。随之而来的是米价暴涨，小米一石一百十六七吊，饥民嗷嗷，困苦万状。瑷珲厅有67屯、1200户受灾、1万余垧土地被淹，年景不足2成。肇州厅位于松嫩两江合流之处，水涨3丈余，暴溢横流，势走如电，直灌厅城，冲毁房屋169间，受灾地亩5800余垧。其他地方的灾情也是如此。8月27日，黑龙江行省公署向清廷奏报各地水灾情形时说：呼兰府属被淹十余屯及地亩六千余垧，巴彦州属淹没地亩万余垧，木兰县沿江七八十里地方的田禾、房舍冲毁甚多；兰西县“雨猛山裂，呼兰河两岸二百余屯悉数被淹，灾民荡析离居；汤原县受汤旺河之患，居民数百家流离失所，惨不忍闻；龙江府因暑雨连绵，秋收亦复无望”^⑧。据粗略统计，全省被淹地亩30余万垧、淹死200多人、灾民15万余口。当时，黑龙江省“边荒初辟，设治仅二十余郡县，而先后受灾地方已逾强半，实为向来未有之巨浸”^⑨。在东三省中，也是“黑龙江各属被灾尤多”^⑩。

水灾之后，鼠疫接踵而至。1910年9—10月间，鼠疫在中俄边境地区首先发现，然后便迅速向内地蔓延。从10月24日至11月25日，满洲里死于此疫者315人。1911年1月末，染至哈尔滨一带，

死亡者达2600余人，并蔓延至双城、长春、扶余、宾州、阿城、呼兰、绥化等地。据黑龙江行省公署复美国驻齐齐哈尔领事的照会中说，疫死人数是：省城自1910年11月17日至1911年2月27日，共700余人，呼兰共1623人，绥化共378人，海伦共189人，总计2890人。这个统计数字是十分惊人的。然而，由于清政府对当时的疫情竭力隐瞒，所以这个公开的数目字也是大大缩小了的，很不可靠的。比较真实、准确的统计是昂昂溪铁路交涉分局专员王振铎奉命密查呼兰、绥化疫情后的情报：疫病自1月22日由哈尔滨传到呼兰，至3月7日，共死6427人；三天之后，即3月10日，呼兰府又报，共死7307人。绥化共死2000余人。1911年3月1日，黑龙江省防疫会副会长转呈省城江西区巡警第二分所绰绰立屯染病户口、死亡人数是：住户张常有全家12人，死10人；康成祥全家10人，死8人；康小根全家7人，死4人；褚扣德全家4人，死1人。另外，东兴镇旗户尹常俊由巴彦州购买年货时染病，全家五男三女相继而死。

对贫苦百姓来说，鼠疫固然可怕，然而，“死于疫者十之一二，死于被累、圈禁以至传染或饥寒者十之七八”^⑩。可见，人祸更甚于天灾。面对如此严重的天灾，清政府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开始，它掩饰疫情，认为“此种病原，实系由于天时感受，并非鼠疫百斯笃等病”，“相传为鼠疫为百斯笃病者，皆系谣言，确无实验”^⑪。后来，又文过饰非，1911年2月15日，黑龙江省铁路交涉总局在复德国驻齐齐哈尔领事的照会中说：“此种疫症流行最速，当满洲里发现之始，即经竭力防卫，设所检验，业已渐次消除。嗣后，哈尔滨疫气忽炽，延及江省省城、呼兰、绥化、海伦一带，遂于省城设防疫会、消防病院、卫生院、隔离院等处，由督抚宪特派大员筹划一切，遴委员绅分任其事，聘有中外医生诊治病人，责成兵警清查户口。其疫重者送入消防病院，轻者送入卫生医院，并将家属由隔离所留验七日，无疫方准放出。”^⑫最后，它则推卸罪责，以办理防疫“具报不实”为由将龙江知府黄

维翰革职。

在鼠疫流行期间，清政府视百姓性命如草芥，而为了保住京城皇帝、宗室、大臣们的性命却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如将吉林、黑龙江本年应进贡品一律暂缓呈进；所有东三省折奏均改为电奏等。

3. 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清末，国库空虚，入不敷出。1908年，“黑龙江岁不敷银七十万余两，吉林岁不敷银四十九万余两”^④。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黑龙江地区广大人民仍变本加厉地进行封建剥削。当时的《民报》揭露清政府在东北的苛捐杂税时说：“地租之额，既课余地，复课山荒。商货之率，既税出场，复加销场。酒户之税，征及烟突；船运之捐，算准帆樯。此外，如粮食税、牲畜税、山海税、斗秤税……店铺税、渔税、盐税、木税、矿税、猎税、参税、车税、农税、窑税。或新创名目，或提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可见，清政府对东北人民的剥削已经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了。然而，它在举办“新政”时，包括办学堂、设警察、修铁路以及查户口、订门牌等，每办一件都得要加捐派税。如对烟酒两税，就改章加征，尽征尽解，以充常备军正饷及办理一切新政之需，从1906年至1908年，“较从前额征之数，每年实溢征银六十余万两”^⑤。1908年的木税，“比较旧额，增至三十三倍”^⑥。至于“新创名目”，1908年，当时吉林省从原来的36增至66种；1909年，增至97种^⑦。这样，造成百物昂贵，物价飞涨，黑龙江省同吉林省毗连，苛政同书一辙，别无二致。1908年前，因清廷“需款孔殷”，便通过变更名目和计算单位的手段，使新征粮捐款竟为原捐的三倍^⑧。沉重的捐税负担，使黑龙江地区广大人民极端贫苦，“近山一带，小户多为菜色，甚至论斤购米，亦无售主，困苦情形，殊难言状”^⑨；“东南一带，嗷嗷待哺之灾民，为数尚多……乃日米粮价日高，饥民益多”^⑩。商业也随之萧条，省城齐齐哈尔“市面空虚”情状已达极点，“有群相倒闭，不可收拾之势”^⑪。

综上所述，清朝末年，在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黑龙江地区，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革命的发生已是必然的了。

二

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行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受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清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加剧，是全国人民自发的反抗运动形成的直接原因。在黑龙江地区也是“因灾滋事聚众、焚烧官署之案迭出”^②。其表现为抗捐抗税斗争和抢盐抢米风潮（即饥民暴动）。

1. 抗捐抗税斗争。1909年，墨尔根（今嫩江县境）地方当局不顾上年遭灾和屯民忍饥受饿、度日艰难的处境，又添人、马、房三种税，尚未实行之时，就又收“学费每垧440文、局费每垧950文，兼小照费50文，更有高等学堂费156文，兼屡屡严催，刻不容缓”^③。于是，屯长正顺传示屯众300余人于2月28日入城，请求免捐。然而，墨尔根副都统寿庆毫不体恤百姓疾苦，竟然升堂，要杖责屯长。屯民不愤，将屯长抢出，寿庆恼怒，用佩刀砍去1人发辫，拘捕5人。抗捐民众仍不畏惧，声称要赴省上诉。寿庆不得不将被捕5人开释，屯民才自行散去。这次聚众进城、“哄堂毆官”的斗争之后，反动当局虽说要“密查为首之人惩办”，但也不得不“暂缓收捐”^④。这种斗争此伏彼起。1911年11月，方正县佃户因“年荒无食，公田局照常催租”，为“求请赈抚”，“集民千余，拥至县署”，因知县“竭力劝慰”，又“请公田局暂缓催租，众始散归”^⑤。与此同时，五常府一带也是“民情不顺，屡起风潮，抗纳各项捐款”^⑥。太平山地方“众怒沸腾，将（营业税）分所窗

户、牌匾、家具砸毁，并殴伤书记王复东”^①，然后，又至德成东商号，将上年承办营业税之议董杜景春拖至街中，并宣称：“誓非窜通各镇于二三日内同时将营业局砸毁，不能罢休，势甚汹涌”^②。果然，在冲河，饥寒交迫的70多名屯民在南城子屯“尚有存粮之家”坐食后的归途中，听说冲河街内已设营业税分所，十分愤怒，他们说：“我辈饥饿待毙，官场不思筹赈，反向地方征税”，于是，联合本街乡民，共200余人，将营业税分所牌匾砸坏，“声称非将营业税撤去不能罢休”，并终于迫其停收^③。在山河屯，营业分所“亦因风潮迭至恐慌，未敢悬挂牌匾，认真征收”^④。其他各地分所书役也“均因毁所风潮丧胆，莫敢征收”^⑤。在抗捐抗税斗争的冲击之下，反动当局不得不将这些营业税分所撤回，其御用工具议员会议“亦不敢再议筹集款项之事”，而被迫提出了所谓“以补救民食、安抚民心为要点”的议案^⑥。

2. 抢盐抢米风潮。清政府为了维持其苟延残喘的统治，填补财政亏空，不惜竭泽而渔，借盐取利。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盐政为饷源所在，奏派四品京堂陆宗輿为三省盐务督办，设立局所”^①；同时，筹划官运，并先从黑龙江、吉林两省试办。这种食盐的“官运商销”，对清政府是“辟数百年来未见之利源，增数十万有著之巨款”^②；对广大贫苦百姓则是又一次的更大的搜刮。在“官运商销”的过程中，官府和盐商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不仅提高盐价，而且还往盐里掺砂土克扣分量，牟取暴利。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盐斗争。

1909年3月，在宾州地方，抢盐群众2000余人纷纷入城，捣毁盐局，同时包围了宾州府署，要求缓免旧房契税。接着，阿城、长寿（今延寿县）等地也发生了抢盐斗争。不久，因清政府规定，“凡商铺存积待价未售者，酌量补征盐课，为开办官运之资本”^③，黑龙江省大赉厅官盐分局委员凭借官势，“搜查私盐，滋扰骚扰，甚至有奸淫事”，群众“不堪其苦”，奋起反抗，开展了一场反对搜查私盐的斗争。在李锡功、李锡财的号召下，三四百名群

众聚集起来，冲向盐局，将其捣毁。

广大贫苦百姓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在抢盐斗争的同时，也掀起了抢米风潮。1909年11月，在宁安、宁古塔商会总理（即会长）孙彦卿凭借商会之权，依仗教会之势，以整顿钱法为名，“蛊惑众商关闭，以挟官作主，不使广成公之帖”，造成广成公钱帖200余万吊“阻滞民手”。5日，民众数千人持帖赴商会换钱，孙彦卿拒付，从而激起民愤，当即将商会门窗和办公用具砸毁；然后，转奔孙彦卿经营的华兴火磨买面，火磨非但拒用市帖，还用洋枪驱打民众。于是，“众心愤恨，蜂拥直前”，哄抢面粉20万斤、小麦2000余石。1910年7月、8月间，大地主、大粮户趁青黄不接之机运粮出境，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抬高粮价。齐齐哈尔饥民40余人不顾清兵阻拦，冲进省署，要求降低粮价。地方当局怕激起更大的民变，不得不做出让步，把兰西、呼兰等地粮食运往齐齐哈尔，并按每石20吊的较低价格卖给饥民。⑧

3. 资产阶级发动的收回利权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方面的调整，阶级关系及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其表现为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黑龙江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根据他们本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开展了具有鲜明的爱国救亡特点的收回利权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这对于促进民族觉醒、激发民众爱国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清政府也是一个冲击，因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斗争的一个部分。

帝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之后，黑龙江地区的有识之士和工商企业家利用各种方式鼓动并收回了被帝俄攫取的利权。如收回了都鲁河、观音山、漠河金矿和吉拉林金厂，驱逐了帝俄在呼玛尔金厂的势力等。1907年，清政府外务部与俄使交涉，后由吉林、黑龙江地方官员杜学瀛、宋小濂在哈尔滨与中东铁路公司谈判，于8月30日双方签订了在吉、黑两省展地、伐木、采煤等各项合同，取消了中东铁路公司攫取的种种非法“独擅权”。此后，帝俄

还不得不撤掉了设在临江州境内的拉哈苏苏俄关。

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上层人物还利用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时在各省设立的“咨议局”，作为讨论时政、指陈得失的讲台。在立宪派发起的“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黑龙江地区的一些资产阶级人物也很活跃，积极参加。黑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战殿臣在声势浩大的第三次请愿运动中，出席了在京举行的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长寿县绅民王炳辰等630人联名上书吉林巡抚，要求即开国会。由于清政府对国会请愿运动采取镇压态度，暴露了它的假立宪的真面目，使一些立宪派人物向革命方面靠拢。

三

在黑龙江地区人民自发进行反抗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斗争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开始了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们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进行革命的发动和准备工作。这是黑龙江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

1. 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并加强对东北及黑龙江地区的革命发动和准备工作。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出于东北物产丰富、清政府在一些地方统治薄弱，适合作为革命根据地的考虑；另一方面又特别鉴于南方起义连续失败的具体情况，而“想改在北方筹划起义”^①。为此，孙中山“计划在哈尔滨建立据点，指挥同志”^②；廖仲恺、宋教仁、商震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先后来到黑龙江地区。从此，黑龙江地区的革命运动同全国的革命潮流息息相通，遥相呼应，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

革命党人吴禄贞利用任吉林边务督办之机，进行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方面的准备活动。他“计划驻兵地点拟在绥芬大甸子（今东宁县境），屯兵五千以上”^③，并命任屯田营管带、革命党人柏文

蔚前去勘查。尔后，吴禄贞“即着手布置”^④。“不意冬十一月，清政府疑吴有革命嫌疑，将边务根裁撤。吴绶卿既去，余之屯田营亦即结束。吾人所经营与希望虽告停顿，而在吴绶卿之领导下，所有革命种子分散各地，以后在关内外革命中起到很大作用”^④。

策动绿林参加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准备的一项重要活动。柏文蔚离开屯田营后，又任奉天督练公所参谋处二等参谋。他趁“赴俄边调查俄人军事”之机，“沿东清线经哈尔滨、满洲里西抵伊尔库茨克，折回至伯力、驸马、虎林厅、海参崴、宁古塔、依兰、九站，回至哈尔滨”。途中，他“革命运动未有稍间，在伯力访晤老刘单子，在哈尔滨访晤天边羊，皆绿林之最有力者，其他如依兰东沟、宁古塔、虎林、驸马不著名之绿林，晤谈者二十余人，皆得机揭竿者也”^④。1911年，柏文蔚“对同盟会宣传组织工作更积极进行”，当同盟会经济困难、革命党人生活困苦之际，他又“亲往呼兰等处筹款接济”^④。

2. 匡一和同盟会黑龙江支部的建立。匡一，湖北省罗田县人，1905年8月30日参加同盟会^④。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黄兴为庶务，他任内务。当时，“克强行，则孙少侯（即孙毓筠）、匡一等更代之”^④。1908年前后，他来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担任了黑龙江省地方审判厅厅长。1909年至1910年期间，他和革命党人孟继周、管冰洋、关肖权等以齐齐哈尔中学堂为活动中心，联络革命党人，建立了中国同盟会黑龙江省支部。当时，“匡一被选为支部长，孟继周为推事，管冰洋、关肖权分别担任同盟会组织、宣传等职务”^④。他们在军政、邮电和学界中进行秘密活动，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宗旨，先后发展会员三十多人^④，其中有省立中学的邓觉民、刘圩伯、李铭新等13人，农业学堂的邓振镛，师范学堂的耿瑾文，以及李席珍、宋云相等。由于他们的宣传鼓动，革命之势蒸蒸日上，规模渐大。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黑龙江地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推动了革命的发展。然而，也暴露了他们在革命发动和准备

活动的一些致命的弱点：一是革命的发动和准备多是少数人的、孤立的、单枪匹马进行的，而没有大量地去作发动群众的工作，因此，没有群众基础，更形不成革命的群众运动；二是在组织上“各树门户，意志不一”^④；三是在行动上“无统一之机关，难期步骤之一致”^⑤，因此，分散、削弱了革命力量。这些弱点，是他们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因为这样，在反动势力的迫害和镇压之下，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对抗力量而被各个击破了。

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一消息迅速传遍黑龙江各地。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响应武昌起义，要求独立，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开始短兵相接，激烈拼搏，使黑龙江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急速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

1. 保安会与国民联合会的对抗。武昌起义的枪声，使东北当局十分惊恐。正在齐齐哈尔巡视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急忙赶回奉天坐镇。黑龙江省巡抚周树模一面委派补用知县王振铎、候补府经历余诚准速赴武昌侦探军情^⑥，一面下令“禁止人民在各街粘帖各种报纸”^⑦，妄图封锁革命消息，遏止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此，哈尔滨电报局还按照邮传部的指令，无论官商学报各界，凡关于“鄂乱”之电，一概不准接收，不准发送；对兵营来往的一切信函，亦严加取缔。11月2日，黑龙江省民政司使宋小濂又设立“侦探队”，严防“贼匪窜入”^⑧。

然而，革命潮流势不可挡。数省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东北三省革命党人也采取行动，要求独立。老奸巨猾的赵尔巽为了应付革命党人，控制局势，维持苟延残喘的统治，组织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并自任会长。黑龙江、吉林两省也照葫芦画瓢，如法炮制，于11月16日、17日分别成立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国民保安公会，“仍是旧日之行政官担任会事”^⑤，即由陈昭常、周树模担任会长。革命党人对竭力维持旧秩序的国民保安会十分不满，并作了坚决的斗争。张榕等在奉天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密派同志分赴东三省各地建立分会，发动起义。其中，“赵元寿以组分会名义赴吉游说。他如赵中鹤至海城，陈青州至营及黑，张亚馨至长春、京津一带，皆为分会作用”^⑥。这时，黑龙江地区的革命党人的斗争已由秘密转向公开。在他们的策动下，黑龙江省中学堂学生四处奔走，散发传单，并发动各学堂公举代表2人，于12月17日组成了“黑龙江省国民联合会”。次日，“即用全体名义，要求黑抚周树模宣告独立，并传知军界赞成”^⑦。接着，又“即开第二次会议，并拟定通告书及联合会简章，决计实行，无稍假借”^⑧。通告书中说：“为今之计，急宜合满汉回蒙及索伦达呼哩各族，化除私见，共矢公忠，要请巡抚，驰电郡国，宣告独立”^⑨。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秦广礼也奔赴齐齐哈尔，在被誉为“虎胆铁血英雄”的爱国人士文璞及省议会进步议员的支持下，联络各学校，选出代表，成立了“新民爱国委员会”^⑩，与保安会相对抗。

当时，黑龙江地区的革命党人谋求“独立”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但斗争是非常无力的。其原因是，他们害怕帝国主义、不相信民众，幻想通过不流血的和平请愿的方式来取得胜利。正像他们在通告书中说的那样：“江省地处极边，内有种族之猜疑，外有强敌之偏处，设有不慎，祸乱突兴，而胡匪乘之，而饥民乘之，而俄日乘之，则大祸重至矣。……吾人处此，诚不能不筹自全之策矣。”因此，毛泽东在批评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时指出：“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⑪他们的这些弱点，也是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黑龙江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无论其人数还是社会基础，都不及其他一些省区；与反动当局的力量比较，相差更为悬殊；加之，又面临着虎视眈眈的帝俄随时可能进犯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它的力量就更显

得弱小，弱点也暴露得更加突出了。

尽管如此，黑龙江省地方当局及一些官吏也非常害怕，他们一面纷纷送家眷逃离，“各衙署已将龙旗尽撤，以待音讯”^④；一面对革命党人大肆镇压。周树模不仅“密令士兵乘夜往捕”奉天联合急进会派到齐齐哈尔“扩充会务”的会员，而且还发出“晓谕”，称：省城“少数学生年轻无知，散布传单，倡言独立，当由保安会特开临时会切实开导，立时解散”；并以“筹办灾赈，公款无着”为名，“暂将各学堂停办三个月”，被遣散的学生“如有散布谣言，分送传单，鼓吹独立及其他秘密集会不法情事，扰害公安者，劝谕无效，准即拿送地方官，斟酌情形，分别处理”^⑤。在反动当局的高压之下，黑龙江“省垣外表似稍前安靖，然实则各界党人，日夜在各地集会私议，未曾绝迹，且与该处巡警等校联络一气”；省立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和中学堂等校学生“仍驻留省城，纵论政治，不知忌惮”^⑥。

2. 东荒起义和哈尔滨起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北方各省大都未能宣布独立，仍置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革命党人不断受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黑龙江省同盟会支部长匡一及孟继周等逃往京津，孟继周在北京被捕遇难。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决定北伐。在北伐之前，黄兴、陈其美就曾秘密派革命党人到黑龙江地区的中俄边境一带，说服并招募绿林队伍，将其编练为革命骑兵，为北伐作准备。当时，革命党人的“唯一目标就是大名鼎鼎而横行中俄边境大山中的刘弹子”，经过协商和黄兴、陈其美批准，“刘弹子等率同大队部属安全地分批搭轮南下上海了”^⑦。1912年2月，北伐民军在辽东半岛登陆，黑龙江地区革命党人在其鼓舞下，发动起义，又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东荒起义。东荒，指省城齐齐哈尔以东放荒拓垦地方，即今拜泉、明水等县一带之统称。革命党人在这一带联合“红胡子”

首领刘献芹，聚集千余人，举行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了拜泉县城。这支队伍接受革命党人领导后，“一举一动，大非昔比，到处受到商民欢迎”^⑧。清军中的革命分子也前往参加。它还得到“俄国之‘虚无党’暗相帮助”^⑨。最后，这次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哈尔滨起义。安徽同盟会会员梁廷栋、梁廷榘潜入哈尔滨后，曾和革命党人刘乾一、商震等密议，以哈尔滨为根据地，“密结军警为助，收编绿林为军”^⑩，进行发动起义的准备。因此，他们还“暗约著名匪首天边羊（即拜泉县境内‘匪首’张嘉徽）同时到哈举火起事”^⑪。这样，在起义之前，“有革命党人约四百名到达本地”^⑫。1912年，梁廷栋将起义队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傅家甸（即今哈尔滨市道外区）鼓动官军参加革命运动，并于当晚11时举事，“夺据滨江厅及电报、邮政各局所，假自治公所设立机关部”^⑬，还“以中华民国关东临时都督印章出示布告”^⑭，“其内容，与汉口方面所贴告示完全一致”^⑮；另一部分“革命党人约二百名，各以百名分成两队，于二月十六日分途向双城堡及阿什河两地进发”，并誓师攻打吉林。^⑯

起义开始之后，滨江关道李家鼐施“缓兵之计”，亲率滨江厅林也翰、巡警局长以及商民代表等到“议事堂（即自治公所）与革命党方面代表梁某举行会谈”，^⑰并“宣布共和各电，解释割切辩驳”^⑱，还“劝令革命党人解散，竭力麻痹、分化和瓦解民军。反动当局在做好武力镇压起义的准备以后，于2月19日9时，趁民军不备，突然包围其指挥据点。于是，双方展开激战。由于革命党人孤军奋战，弹尽援绝，梁廷栋、梁廷榘和自治会长王泽臣、田家烧锅巡长陶遇春等7人牺牲，13人被捕。民军失利之后，撤离傅家甸，退往柞树林及阎家冈一带；革命党人“被杀者不下三十余人”^⑲。

五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窃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最高

权力之后，东北三省旧官僚赵尔巽、陈昭常、宋小濂也乘机摇身一变，拥护共和，并被袁世凯分别任命为东三省都督和吉林、黑龙江都督。他们“官名虽更，职权照旧”^⑧。因此，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时尖锐指出：“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以成。而反对革命之人均变为革命之人，此辈之数目多于革命党，何啻数十倍，故其力量大于革命党。乃此辈反革命派即旧官僚，一方面参加革命党，一方面又破坏革命党，故把革命事业弄坏”^⑨。

这些旧官僚攫取政权之后，马上下令解散革命团体，遣散革命党人。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订出三条具体办法，并宣称：“今者政体已定，更无革命可言。建设方新，岂容秩序之紊乱？倘再意图破坏，扰害治安，即属国民之公敌，为天下所共弃。”^⑩他的这种态度是得到袁世凯支持的。宋小濂曾密电在京参加南北军界会议的黑龙省代表刘德权和寿庆，请示处置革命党人的办法。刘德权、寿庆向袁世凯报告了黑龙江省辛亥革命情形后，袁世凯说：“我曾屡次向党人恳切说过，国内各省都可以革命，因破坏以后还可以重新建设，惟独东三省不能破坏，破坏就不能建设啦。我就下令给你东三省，如有人企图破坏，便照土匪处理。我还要再向党人方面切实告诫，你们可以复电宋都督知照。”^⑪

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革命党人的下场是很悲惨的。“临时稽勋局为发给流离京师之关东起义诸人护照俾令还乡里事给赵尔巽的咨文”中说：“现在民国成立已近一年，侧闻贵属各地方官吏，尚多未除禁网，以致起义诸人流离四方，穷蹙无归者，在京师一隅，已闻有百人之多，长此羁旅，其情可悯，其志可悲。”^⑫

以上事实表明，黑龙江地区的辛亥革命同全国一样，没有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在革命过程中，连一个名义上的独立都没有得到；在革命之后，又随着清帝的退位和表面上的共和制的确立而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中华民国。

尽管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党在黑龙江地区进行的英勇斗争和

杰出贡献是不能否定的。“临时稽勋局为发给流离京师之关东起义诸人护照俾令还乡里事给赵尔巽的咨文”中说：“武汉起义，关东民军响应者，大不乏人。事虽未成，其苦心毅力，促成共和之功，要不可没。”^④

长期以来，清政府对黑龙江地区采取了种种反动措施，严加控制，使其成为它镇压人民起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据地。特殊的历史状况，给辛亥革命运动在黑龙江地区的开展带来了更大更多的困难。因此，在黑龙江地区，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薄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得晚，革命发动的规模小、广泛性差；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力图将其变为革命的指挥据点和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冲击也远不及其他一些省区。然而，革命党人却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战斗，表现了“以一腔热血，灌自由之花”^⑤的高尚革命情操和献身精神，给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的统治以沉重地打击，使它的“后院”起了火，变成了战场。于是，清王朝视为“安堵无虞”的“后遗余地”不复存在了，也“使清帝不敢东归”了^⑥，“蒙尘奉天”的图谋更化为了泡影^⑦；清朝的重臣赵尔巽“久欲率师西上，拱卫京师”^⑧的计划和张作霖等编“勤王之师”南下“助剿”^⑨的鼓噪，统统因其自顾不暇而无法实现。

六

综观辛亥革命及其在黑龙江地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因此，这次革命之后，又出现了军阀割据、内战不已、四分五裂、长期混乱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了革命运动。然而，不能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革命运动本身的弱点及其所导致的失败，就否定它巨大的功绩、影响和历史作用；要依据列宁所指出的：“不是根据

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来判断其历史功绩。辛亥革命恰恰是“提供了新的东西”。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赶走了皇帝，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人们的思想空前大解放，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了人心。历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不能割断。回顾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乃至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就会认识到，正是它“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并为之开辟了争取解放的道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我们在评论辛亥革命的时候，如果仅仅看到它的弱点，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失败了的革命，那就不对，有许多事情也会因此而不可理解”^④。所以，在任何时候，对它的伟大历史功绩都是不能低估的。同样，也不能低估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黑龙江地区的英勇斗争和流血牺牲及其为辛亥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更不能低估辛亥革命对黑龙江地区社会进步起到的巨大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⑤。同样，辛亥革命也是黑龙江地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它使黑龙江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辛亥革命之前，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及其他革命运动，都很少冲击到黑龙江地区；既或冲击到了，其冲击波也很小。就是与辛亥革命相隔不长时间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无论在规模上、影响上还是在社会变革方面所起的作用上，也都不如辛亥革命那么巨大、那么深刻。

1. 把民主、共和思想传播到了地处极边的黑龙江。这种思想既是当时攻击封建帝制的强大精神武器，又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开辟了道路。人们正是经历了这场革命并具备了这种思想之后，才提出了在此之前不能和不敢提出的问题，逐步接受那些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的先进理论了。黑龙江地区确实也像列宁对当时的中国所作的评述那样：“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涨正在汹涌澎湃的发展”。

民国初年，当袁世凯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时，黑龙江地区的“青年学生及血气方刚稍有知识者，……一念及共和莫不踊跃奋起，急思以身相殉，问其故则曰：现在世界之大势所趋，我国非实行真正共和政治决不能自立于二十世纪舞台之上也，故对于夫己氏（指袁世凯）之窃国莫不思啖其肉而寝其皮”^④。1916年2月12日，袁世凯虽已改元“洪宪”，但哈尔滨商民却纪念共和，反其道而行之。当时，“商民皆悬旗庆贺，而官府见之，大动压力，勒逼商家一律下旗，商民皆畏官府之威，不敢公然与之抗，然亦饮酒高歌，以伸贺忱，即此亦足见商民之心理矣”^⑤。

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禁锢下的人民所以能有这样较快的觉悟，溯其源，盖出于辛亥革命。因此，不能把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易帝制为共和、建立民国只看作是以往旧的朝代的更替和简单的招牌的更换。

2. 打破了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地权的转移，即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其表现，一是出现了“以民国改变为契机新登场的土地占有者”；同时，过去在皇庄、官庄和旗地里的大多数处于农奴、半农奴身份的人“自由”了。他们就是“在四民平等的法律伪装下的新兴地主与佃户”^⑥。二是豪强兼并，拥地自封，“出现了大土地所有形态”，从而“现出近代的面貌”。三是打破了土地买卖中对“经济之流通与地方之发达均不无障碍”^⑦的宗法关系。四是地租形态从分益地租变为定额地租，“显著趋势”是采取了“资本主义化方向”^⑧。

生产关系的另一个变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的上升、队伍的扩大和力量的增强。民国以后颁布的法令，反映并满足了他们的某些政治、经济要求。因此，他们“都认为革命的胜利就是新生活的开始”^⑨，纷纷组织发展实业的团体，掀起了振兴实业的高潮。黑龙江省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甘落后，于1912年4月27日在全国较早地成立了以“提倡民生主义，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宗

旨”^①的黑龙江省实业总会，会员达400余人。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完全新型的生产关系，但它引起的生产关系上的变化，同清代的那些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民国期间，黑龙江耕地面积较清代扩大一倍以上，农作物的产量有了较大的增加；民族工业发展迅速，近代新式工厂增设甚多；商业繁盛，仅哈尔滨一地就有大小商店万余家，华商则达7000家以上；水陆交通也日益发达，等等。

3. 打破了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长期实行的封禁政策，使文化水平、文明程度得到提高，民智未开、风气闭塞的落后状态开始改变了。民国以后，兴办了各类学校，教育大有进步；发展了近代新闻出版事业，以“改良风俗、进化社会”和“启发民智、促进民生”的报刊纷纷创办；在社会生活中移风易俗，人们不仅剪辫易服，而且还取消了一些封建等级观念和繁文缛节；更突出的是提倡五族共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满汉民族矛盾，“民族之见渐泯，……盖几乎同化矣”^②。

总之，辛亥革命冲破了黑龙江地区在社会发展上长期与世隔绝、格调不一的落后局面。在它的推动下，黑龙江地区的社会发展向前跨了一大步，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速度加快了，与内地的差距也缩小了，基本上跟上了整个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① 《北洋公牍类纂》。

②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2页。

③ “考察东省情形整顿内政以资治理折”，《清代吉林档案选编》上谕奏折，第154页。

④⑤⑥ 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

⑦⑧⑨ 《黑龙江志稿》大事志，宣统三年二月初八日。

⑩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爱辉兵备道档案，目录1，卷41。

- ⑪ 同上，黑龙江行省公署档案，目录3，卷49。
- ⑫⑬ 同上，黑龙江省铁路交涉总局档案，目录1，卷40。
- ⑭ “论中国财政支绌之原因宜亟筹补之策”，《龙沙麟爪》。
- ⑮⑯ “吉林巡抚陈昭常等奏请奖吉林经征烟酒木税出力各员折”，《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
- ⑰ “吉林巡抚陈昭常等奏吉林山海丁税迭届改章整顿情形折”，《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
- ⑱ 《宣统政纪》卷五，页8。
- ⑲⑳㉑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辛亥革命时期有关档案。
- ㉒ “论黑龙江省移民”，《龙沙麟爪》。
- ㉓ 《嫩江县志》（送审稿），第19页。
- ㉔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行省公署档案，目录3，卷284。
- ㉕②⑦⑧⑨⑩⑪⑫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
- ⑬⑭⑮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为吉省实行官运商销盐政折”，《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
- ⑯ “饥民骚扰之状态”，《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 ⑰ 何香凝：“我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 ⑱ “水野驻纽约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选辑》辛亥革命。
- ⑲⑳㉑㉒ 柏文蔚：“五十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 ㉓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
- ㉔ “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第179页。
- ㉕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86页。
-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56页。
- ③ 邹鲁：“东三省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
- ④⑤⑥⑦ 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黑龙江历史大事记》。
- ⑧ 《盛京时报》1911年10月24日。
- ⑨⑩⑪⑫ 郭幸成：“东三省革命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
- ⑬ 同上书，张根仁：“关东革命始末记”。
- ⑭ 《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82页。

- ②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8页。
- ②④ 《盛京时报》1911年11月31日。
- ②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行省档案，目录3，卷57。
- ②⑥ 《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2日。
- ②⑦ 张西曼：“辛亥招募革命骑兵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
- ②⑧ 《盛京时报》1912年1月7日。
- ②⑨ 《盛京时报》1912年1月28日。
- ②⑩ 筹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编，第1447页。
- ②⑪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第244页。
- ②⑫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第244页。
- ②⑬⑭ 同②⑪书，第242页。
- ②⑮⑯⑰ 同②⑫书，第34页。
- ②⑱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
- ②⑲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6页。
- ②⑳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为嗣后如有冒充党人希图侥幸者以土匪治罪等因通行札”。
- ⑲① 刘德权：“我所见到的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
- ⑲②⑲③ 《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第270页。
- ⑲④ 《熊成基谋杀载洵始末记》。
- ⑲⑤⑲⑥ 辽宁省档案馆藏：赵忠鹤给稽勋局的呈文。
- ⑲⑦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第119、121页。
- ⑲⑧ 同⑲⑦书，第70页。
- ⑲⑨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25页。
- ⑲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4页。
- ⑲⑪⑲⑫ 《民国日报》，1916年2月。
- ⑲⑬ 《满洲经济年报》，1934年。
- ⑲⑭⑲⑮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6—94页。
- ⑲⑯ 同⑲⑭书，第26页。
- ⑲⑰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省行政公署档案，目录1，卷46。
- ⑲⑱ 《呼兰县志》。

河南仁人志士在辛亥革命中

袁 蓬

河南属内陆省份，较沿海地区接受民主思想为迟，但在清末推行维新新政、特别是派遣士子东渡日本留学之后，也产生了一批投身改革的仁人志士，他们在推翻清廷专制、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写下了光彩耀人的篇章。

1902年，即光绪壬寅年，由于北京贡院被八国联军焚毁，以及辛丑和约规定凡毁教堂伤洋人的地方均罚停科考，故清廷补行之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会试改在河南省城开封举行，一时文士聚会，此为新文化输入河南之始。南书店街设立一家开明书店，败卖各种报章，如《政艺通报》、《时务报》、《新中国白话报》、《清议报》等，新书如《日本三十年维新史》、《法兰西革命史》等。从此河南士民知识大启。是年，刘积学（群式）、车钺（翰如）、朱炳麟（奋吾）等人在开封创办了一所半日半夜学堂，除讲授普通课程外，兼传播革命思想，密谋进行反清活动。

1904年，光山县人曾昭文（可楼）由北京练兵处考送日本留学，即参加兴中会，奔走革命极为热心，与孙中山、黄兴等交游甚密，与各省同志联系亦多。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开成立大会时，曾君为筹划者之一。^①豫籍留日学生最早参加同盟会者有曾昭文、朱炳麟、车钺、程克（仲渔）、杜潜等。杜潜原先在河南大学堂求学时名振亚，字扶东，因演说革命被开除，遂改名潜，继续鼓吹革命。像他这样用名字表示胸怀大志的爱国青年，当时不

袁蓬，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乏其人。同盟会总部成立后，河南人朱炳麟曾代理庶务之职^②。同盟会总部命各省籍会员组织本省支部，河南会员推举曾昭文为河南支部长，刘基炎（庄夫）、杜潜、刘积学等分任干事，以后刘积学代理过支部长。

1906年冬，萍乡义师起，刚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到开封的车铎，兼程潜赴江西参加义军，为清吏所捕杀。车铎在日本时，特意留发辮不剪，盘于头顶，对友人言：“留这条猪尾巴，以便来日混迹会党屠狗中，有所为也。”他常自誓愿为一无名革命英雄，虽牺牲性命，亦无所惜。车铎在赴江西之前，曾致函河南留日同乡会，长万余言，极言革命之不可稍缓，留日同乡大为感动，遂集资创办一杂志，名曰《豫报》，以为宣传阵地。

《豫报》出版至第4期，同盟会员鉴于社中杂有保皇党人，发表言论甚感不便，乃将《豫报》停刊，于1907年12月另行创刊《河南》杂志。该杂志由张钟端（毓厚）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潘祖培（荫甫）、曾昭文、王传琳、陈庆明（伯昂）、李锦公（纲斋）等分任编辑发行等事。《河南》杂志的《发刊之旨趣》宣称：“须思中国者非政府诸人之所专有，国民各个人俱其分子之一，政府特其执行者耳。政府之建设，非由于政府，实由于国民。政府之不良，国民应有改造之责。”鲁迅的论文《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裴彖飞诗论》与《破恶声论》，都是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称赞《河南》杂志“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留学生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河南》杂志出至第10期，清驻日公使以其言论过于激烈，特请日本政府勒令停刊，并将总经理张钟端拘留数日，使馆且电请清廷学部革除张钟端之留日官费学籍。

《河南》杂志之刊行，在财力方面端赖河南女界先进刘青霞女士之资助。青霞原姓马，安阳人，系先后任广西、广东巡抚马丕

瑶之女，翰林院侍读马吉樟之妹，嫁与尉氏县巨富刘耀德为妻，遂改姓刘。青霞自幼喜读书，能吟诗作文。其夫刘耀德不知读书，嗜鸦片，早死，青霞20余岁孀居，抱养耀德姊所生婴儿为己子，以支撑门户。时有尉氏留日学生潘祖培、罗文华、刘恒泰（刘耀德近支孙辈）回县，拜会刘青霞，谈及清廷腐败、国势衰弱、列强欲瓜分中国的形势，青霞颇为动心。适逢其兄马吉樟奉派赴日考察学务，青霞为开眼界，遂以“赴东洋调查女学堂及各项实业、学堂规则”名义，由马吉樟具呈学部转请外交部发给护照，于1907年下半年携子随兄东渡。到日本后，青霞将幼子鼎元送入幼稚园，自己家居两月，放足后始外出活动。留日女生朱珍吾、唐群英常到她的住所拜访。河南留日同乡曾开会欢迎马氏兄妹。青霞在日本游历考察，接受新思想，加入了同盟会。张钟端向刘青霞面陈欲创办《河南》杂志的宗旨以后，青霞慨然捐助白银1.5万两。刘青霞在日本还捐资7000元给别号炼石女士的燕斌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⑨，使之能按期出版发行。该杂志由燕斌、刘青霞任撰述和编辑，朱炳麟任发行人。以后同盟会河南支部派李锦公、刘醒吾、罗殿卿回开封开办大河书社，销售《河南》杂志及各种新书报，并作为革命联络机关，青霞亦捐有巨资。至1911年12月河南革命党人准备在开封发动武装起义时，刘青霞又捐银3000两，以助活动经费。刘青霞积极赞助革命活动的精神，堪与南方献身革命的鉴湖女侠秋瑾女士相辉映。

河南有过一位与秋瑾并肩奋斗并同时被逮牺牲的革命者，为修武县人程毅。程毅原名秀申，字翘轩，1906年在天津北五省师范学堂求学时结识思想激进之友人胡瑛，遂以联络同志，鼓吹革命为己任。程因自斩发辫，被罚退学，乃浮海抵沪，改入中国公学，并易名毅，以示坚不向恶势力妥协之决心。他在上海与革命党人于右任、秋瑾等相往还。1907年，秋瑾就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聘程毅任学监兼大通体育会教员。程毅协助秋瑾召集各会党首领密议起义准备工作，并令在体育会学习兵操，前后相继至者

有百余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之后，绍兴知府贵福微服赴省城杭州请兵掩捕秋瑾；大通学生劝秋瑾速避，秋瑾决心赴难，只令学生将枪械匿藏，并遣散最后一批同志，程毅等数人坚不肯去，甘同进退。程率学生抵抗清兵，因寡不敌众，与秋瑾等6人被捕。秋瑾慷慨就义后，清吏用各种酷刑对程毅拷讯，逼他供出同党；程被审讯17次，虽体无完肤，而坚不吐露秘密。经友人与同志营救，清吏本已允许以100家店铺作保（后又增至400家店铺作保）可释程毅出狱，而密告秋瑾谋反之绍兴绅士胡道南惧怕程毅出狱后报复，竟贿通狱吏在饭中暗置毒药将程毒死。东京《河南》杂志第8期载有《烈士程毅小传》。光复会领袖之一陶成章也为程毅作传，写下了“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程毅有焉！”的赞语。

河南与湖北毗邻，张之洞在湖北募练新军，南阳一带人前去应募，在营伍中充当下级军官与士兵者颇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时，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共进会联络员、炮队士兵徐万年与同志蔡汉卿等连夜拖山炮8门进城，占据凤凰山、蛇山与楚望台3处高地，向总督署开炮，轰击之声震动三镇。炮队参战后，不独起义官兵士气大振，各标营尚未反正者亦由党人率队前往会合。徐万年字寿亭，南阳人，曾在汉水上下游经商，所结识多豪侠少年，1906年经刘公介绍入共进会。徐在军中7载，鼓动革命，舌敝唇焦，倾囊倒篋不少惜。1911年夏，谭人凤到武昌，由徐万年集合各营同志商议起义计划。鄂军政府成立后，徐负责管理全军粮饷，后改任军令部调查科长。汉口炮战中，曾任临时指挥、前卫司令和督战长。④新野县人马云脚是第八镇士兵，文学社成员，为人果敢豪爽，在武昌首义之夜进攻总督署的战斗中奋勇当先，左臂负伤，负盛名。军政府成立后，黎元洪慰问受伤将士，向马云脚致意：“兄弟受苦了！”云脚答曰：“大丈夫死不惧，何惧小伤！”黎讶其慷慨。云脚又问黎：“长官和弟兄们可好？战局在握否？”黎感其不畏战，不患伤，唯虑军伍，是个人才，不久即委以

稽查长之职。时豫籍官兵以本省尚未归诚，特在中州会馆开会，决组河南旅鄂奋勇军北上。马云卿受任为奋勇军标统，筹军2000余众，由襄阳北上，与安襄郢荆招讨使季雨霖部在新野会师，人民壶浆相迎。云卿顺道至青羊村老家，在幼年住过的碾房与打谷场上过夜，以表明志向。清南阳镇总兵谢宝胜以办交涉为名，派人到奋勇军刺探情况，云卿训示来使：“你回去告知谢老道（谢宝胜曾出家做过道士），教他速把南阳腾了；若有迟误，我这开山炮十台有余，花眼机关枪一营，区区南阳，只须三炮，恐鸡笼无存。”谢慑于奋勇军威力，复疑部下不稳，遂逃至方城县自戕，奋勇军不血刃而光复南阳。^⑥另有河南信阳人李亚东，湖北将弁学堂毕业，曾充鄂军二十九标一营左队队官，以革命嫌疑被免职。继任某师范学校体操教官。1905年日知会成立即为会员，每逢星期日登坛演讲，慷慨激昂，听者动容。1906年谋响应萍乡起义被逮，下汉阳狱，对簿时，按察使梁鼎芬令鞭其背，而亚东抵死不屈。在狱中继续联络同志，组织湖北军队同盟会。党人常借探监为名向亚东请教革命活动方略。武昌首义之翌日，四十二标发难于汉阳，标代表胡玉珍、丘文彬派同志带队迎亚东出狱，公推为汉阳知府，以后又任革命军季雨霖部高等顾问，季部克荆州后，亚东代理荆州知府。^⑦经李亚东介绍入日知会之信阳学生刘化欧，武昌起义时任四十二标三营之文学社代表，曾组织本营士兵及铁路工人、农民、帮会弟兄计千余人在京汉铁路南段与清军作战，破坏交通，焚烧弹药库，阻扰清军南下，其事迹详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一文。

1911年10月22日陕西起义领导人中有张飏（伯英）者，系河南新安县人。其父先后任陕西郿州、乾州州判，飏十余岁随母到陕西父亲任所，先后入陕西陆军小学、保安陆军速成学堂求学，在保安加入同盟会，西安举义前任陕西新军混成协炮兵营右队排长。起义那天，他和同志党仲昭等首先带队冲进军装局（即军械库），使起义官兵夺到大批枪支弹药，复经一日夜激战，攻下旗

人聚居的满城。起义成功后，张钫任陕西民军东路征讨大都督，率部与西犯的清军在潼关和河南灵宝函谷关一带鏖战。东征军侦探队长李紫恒，是河南沁阳县人，原在陕西徽剧班里扮演武生，艺名小红，驰名豫西和关中。他听说张钫带兵东征，便带领几十个人赶至潼关，面见张钫，要求说：“我在戏台上打了几十年的假仗，今天来投军，要打真仗，显显本领！”并说：“豫西人都喜欢看我的戏，我对这里山川道路非常熟悉，我来投军打头阵，必能旗开得胜。”张钫命他当侦探队长，他便一面带人前进向民众宣传，一面侦探敌情，每到一处，必有一次报告，所报情况甚为清楚详尽。后来在保卫潼关的战斗中，李紫恒发现东征军防线上兵力不敷分配，他便请缨亲临火线对敌；敌方以十倍的兵力进攻，李紫恒和他所带的百余名士兵同敌人激战半日之久，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共和告成，三秦父老曾为李紫恒作传，并有诗词记述他殉难的情形。^⑦

11月18日上海起义之前夕，适有河南留日学生刘基炎、张国威等由日抵沪，陈其美力邀刘基炎等相助。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河南同志担任先锋，冲锋最为勇敢，张国威等曾以木棍解除守兵武装，深受人们称赞。接着又有河南留日陆军学生30余人抵沪，当时正值沪军都督府成立，故都督府中重要职务多由河南同志担当，刘基炎任参谋处长，潘祖培任军事科长，李捷生任军械科长，田辅基任军务科长。^⑧不久，山东民军请求同盟会总部派兵支援，陈其美派刘基炎为沪军北伐先锋队司令官，带领沪军3000名，随同代理山东都督杜潜乘招商局之海船前往，并由数艘海军舰艇护航。杜潜、刘基炎率部在烟台登陆，当地局势为之一变。张国威则担任北上援助河南革命之威武军司令。威武军之命名，系陈其美取张国威之名与字合成。国威字芳武，开封人，在日本士官学校求学时，参观靖国神社，曾愤而砸坏日人陈列之甲午战争胜利品，学校将他开除，而日人甚佩服张之勇敢行为，称他为中国男儿。威武军团长以下干部多半为河南人，士兵中河南

人亦多。

河南省内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在开封半日半夜学堂教习刘积学等人赴日留学之后，继之者有刘积学的同县人（河南新蔡人）刘纯仁在开封的活动。刘纯仁字粹轩，举人出身，任过省视学和开封师范学堂及河南高等学堂学监，博览中外历史、地理、宪法、理财等书，景仰孙逸仙之为人。他常叹西贤卢骚、华盛顿等辈，以一布衣，志之所至，使民权伸张，河山新造，为何吾侪中原男儿不能步其后？1906年，刘纯仁在省城联络同志，成立河南学会，密谋进行革命活动。适有东京之同盟会河南支部派曾昭文、杜潜回省建立国内之同盟会河南支部，众推刘纯仁为支部长。刘纯仁与刘镇华（雪亚）等于次年在开封南关设立中州公学，作为同盟会之秘密运动机关。该校初由刘镇华主持，至1909年又请杨源懋（勉斋）任监督。杨源懋是偃师县人，18岁中举，19岁成进士，分发法部任主事数月，愤于官场腐败，弃官回省办教育。杨源懋和中州公学学监暴式彬（质夫）、先后担任庶务的刘镇华、马静生、教习杨名西、段温恭等都参加了同盟会。开封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豫北汲县之河朔中学堂、豫西之洛阳中学堂、豫南新蔡县刘积勋（字芬佛，刘积学之兄）所办的学校，都成为革命联络点。

河南同盟会活动当时主要在学界进行。河南之新军不同于江南，学生当兵者甚少，同盟会在军界只联络有个别下级军官。1908年，同盟会员王庚先（协三）、周维屏（凌卓）谋在省城军警中建秘密团体，筹划革命，事被官府侦知，王庚先遭监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鄂军政府发布《檄河南文》，略谓：豫州古称文明之区，先祖先宗典章文教萃聚于此，自明之亡，每有会党揭竿起义，而大梁又为四战之地，京汉铁路交轨于湖北。“倘能与我同心协力，趁此时机，河南守其枢纽，湖北壮其声援，西则陕西，北则山西，东则山东、安徽，不难一鼓而应也。”河南革命党人为谋取河南独立，曾派人策动驻汴之陆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协统应龙翔（黎元洪的表弟）反正，应龙翔正在犹豫之际，被河南巡抚宝棻

软禁起来，派应龙翔部下一名标统代理协统。革命党人又四出活动，计划联络仁义会等会社组织及绿林武装，分别攻取省城以外几个州府，然后合力攻取省城，或趁省城兵力空虚时在省城起事。由于北洋军顺京汉路源源进入河南，在铁路线及各重要城市加强防守，以上计划未能实现。至1911年12月，河南党人以为清军在南边火烧汉口，在西边重新占领潼关，皆因河南未能独立所致。为声援秦鄂，尽豫人之责任，河南革命党人决定趁原任巡抚宝棻辞职、继任巡抚齐耀琳刚刚到任之际，组织敢死队，并联络巡警与会社组织，破釜沉舟，在省城大举，“成则促虏廷之命，败则为共和之魂”，以“稍洗河南之耻”。^⑩起义时间定在12月22日夜间。但这一行动计划被巡防营派遣之暗探侦知。当河南革命军司令部正在开封优级师范学堂发布命令，起义即将爆发之际，遭到巡防营掩捕。民军方面有数十人被捕。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张钟端、革命军敢死队总队长王天杰等11人在12月23日、24日相继遭到惨杀。他们在受非刑拷讯和临刑时俱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审讯官对张钟端讲：“你们引匪聚众，放火暴动，若不认罪，以大刑处之。”张钟端答道：“自由幸福莫不由流血换来，吾人不流血，谁复肯流血？”临刑时，张钟端执同志周维屏之手痛言道：“吾等今日系生离死别之时，愿君生一时负一时之责任，勿忘今日，我在九泉之下，当相助完成大业。”王天杰为敢死队总队长，受讯时，审讯官问：“敢死队作何事？”天杰答：“杀死汉奸，保全同胞，建立共和国。不幸被汝等拿获，唯有一死报河南。”1912年12月25日开封《自由报》（河南国民党人办的报纸）在纪念开封辛亥起义一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河南非无健儿也，非无豪士也，所可恨者，地处专制淫威之下，重兵压境，探谍綦严”，以致起义屡起屡仆。

在开封起义遭到镇压的前后，河南革命党人在省城以外也组织进行了几场英勇的斗争。

在豫西，由同盟会河南支部长刘纯仁和洛阳一带的同盟会员杨源懋、石言（又齋）、蒋峨（我山）、刘镇华、任境海、冉新甫、

吴沧洲等联络豫西绿林武装，与张钫率领的陕西东征军结合，同清军在潼关和函谷关一带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参加这场斗争的绿林武装，主要是在嵩县杨山结盟的“杨山十大弟兄”。杨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民间传说杨六郎曾在此出家，所以称为杨山。十弟兄中有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等，而众推结拜时排行老六的王天纵为首领。王天纵是嵩县鸣皋镇附近人，早年在鸣皋镇当团勇，为替朋友报仇杀了地方上一个大绅士，乃结伙上山当起“杆首”。王天纵对本杆有3条规定，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百里以内抢劫，只在远处官道上派精悍小股截劫官府钱粮和富商财物，三禁私吞财物。因此地方上对他没有恶感，倒还获得好评。王天纵精拳棒，枪法极好，人称“神炮王天纵”。一次他与南阳镇总兵谢宝胜作战，双方隔一条山沟，天纵高喊：“谢老道，你要明白，只因有我们弟兄在，朝廷用得着你，才有你的官位，你要知恩感德，不要逼我太甚。若再逼我，小心你的脑袋！”话音未落，砰的一枪，弹穿谢的风帽而过。王又说：“留你一命，交个不死的朋友，如还不服，举起你的马鞭试试。”谢果隐身举起马鞭，王又砰的一枪，把谢的马鞭击断。除王天纵等杨山弟兄外，刘纯仁等人发动的还有永宁（今称洛宁）县的丁老八即丁同升，宜阳县的赵长荣、王修己等股，合共万余人，枪有十之七八，马数百匹。丁同升到的最早，其余各股相继至。丁同升的营盘原在永宁西部深山中，他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得财不伤主”。他一向不在永宁西半部作案。他对穷人表同情，曾在积雪盈门时到古庙中给穷人送粮食。丁同升约束属下“不准采花撮朵”，即不准奸淫妇女。当地流传有“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这样两句话，丁同升有“戴花英雄”的美称。这几股绿林与陕西东征军会合后，张钫加以统一编制，合称秦陇豫复汉军，也叫秦豫联军，由张钫统一指挥，河南去的同盟会员刘纯仁任总参议，杨源懋任秘书长，其他人或司文牍，或作宣传工作，或办理粮草供应。绿林豪侠王天纵任第一标标统兼先锋官，其他首领分任标统、

副标统或营长，憨玉琨年纪最轻，任骑兵第二标标统兼童子军营长。他们作战都很勇敢。丁同升率部一到潼关，马未卸鞍，即参加东征军第二次攻取潼关的战斗，为攻下潼关出了很大力量。王天纵在攻打灵宝县城的时候，飞马直至函谷关山头上，指挥部队作战；他又上前将函谷关的关门开放，放一排枪后再退回隐蔽，稍停再上去放一排枪。事后他说，当了十几年的山大王，也没有攻打灵宝县这5天中打的子弹多。攻下灵宝之后，王天纵率张治公、憨玉琨等部追击毅军和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的兵，敌人慑于王天纵等的威名，在数日内败退400余里，一直退到洛阳才稳住阵脚。后来敌方增调援军，在人数和武器上都占压倒优势，秦豫联军始后退，但仍与敌人在豫陕边境相持一个多月，至南北和议告成，张钫同敌方将领赵倜、周符麟亦在潼关签订和约。在两军相持阶段中，同盟会河南支部长、秦豫联军总参议、议和代表刘纯仁被突然进袭的敌军俘获后杀害。⑩

在豫南，有新蔡县同盟会员阎子固、任芝铭、刘积勋组织的一支起义队伍，与安徽革命党人张孟介领导的一支武装配合作战，称为淮上北伐军，曾光复商城、固始，进入新蔡境，由于袁世凯派倪嗣冲率军乘虚攻占阜阳，威胁其后方，又适南北议和告成，乃罢兵。

在豫东，有鄢陵县同盟会员姚黄充当军师的黄道会起义。参加这支起义军的民众有千余人，以豫东黄道会首领查天化为大帅，麻天祥、曹金川为副帅，提出的口号是：“大户财物分净，良民丝毫不动，灭掉清廷鞑子，平分土地免征，黎民有吃有穿，天下永远太平。”行军作战区域达鄢陵、太康、杞县、通许数县。曾在几个大村镇分了富豪的财物，杀了民团的反动头目。义军的武器多是刀矛棍棒，终于被省城派出的洋枪队打败，义军大部战死。⑪

河南革命党人在南北和议达成之前，虽然未曾实现本省的独立，但他们联合各界民众进行的英勇斗争，确给革命的领导人孙

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18年，孙中山追忆辛亥革命时期的形势时，曾写下“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的语句^⑩。

① 《河南文史资料》第六辑，《曾昭文简历》。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第一节。

③ 开封市图书馆保存有《中国新女界杂志》，冯自由《革命逸史》及邹鲁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称《女界》，系简称。

④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76节《武昌之首义》，《河南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徐万年事迹》。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河南文史资料》第八辑《马云卿事迹》。

⑥ 《河南文史资料》第六辑，《李亚东事迹》。

⑦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陕西革命艺人李紫恒》。

⑧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光复之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贺开平等《威武军始末》。

⑨ 1912年1月18日、19日上海《民立报》载《河南失败痛史》。

⑩ 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一书中《秦陇豫复汉军东征记》，《中州大侠王天纵》，《河南文史资料》第十八辑张钫《陕西辛亥革命东路战役的日记及函件》。

⑪ 《河南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李国强《1911年豫东黄道会起义史实调查》。

⑫ 《孙中山选集》中《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之第六章。

直隶辛亥革命述评

杨小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使腐朽反动的清王朝顿陷风雨飘摇四面楚歌之中。革命的烈火很快燃烧到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直隶，这里是封建王朝苦心经营多年统治最为严密之地。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人民群众与革命党人就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为了响应武昌起义，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与垂死挣扎的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对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清朝末年，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为挽救其濒于灭亡的命运，对外卑躬屈膝，妥协投降，对内则加紧横征暴敛，压榨剥削。直隶地处京畿，为中外反动势力所盘踞，是清朝统治最为严密之地。但是直隶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蹂躏和压迫下，不断掀起反抗斗争，社会处于严重动荡不安之中。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各种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在这里逐渐兴起，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统治的宝座。

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自从《辛丑条约》签订后，直

杨小波(女)，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

隶人民受到更为严重的盘剥。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为偿还“洋债”和举办“新政”，将分摊到直隶省约3610万余两的巨额款项，全部以捐税名义摊派到直隶人民的头上。为此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手段，除对原有的田赋、厘金、盐税等旧税成倍加征课以重税外，新的苛捐杂税剧增，名目不胜枚举，以至“无物不捐，捐上加捐”，甚至添丁进口，婚丧嫁娶亦要上税。纳税人前往交税，竟成“换次站立，摩肩靠股”^①之状。更有贪官污吏借机搜括民财，中饱私囊，使人民的负担更为沉重，不堪忍受，不得不铤而走险。正如当时天津一家报纸所言：“政府就是明火大头目，督抚司道就是明火二头目，府厅州县就是明火小头目……小民没有别的办法，除去聚众造反，就是坐着等死了。”^②据不完全统计，直隶人民反抗苛政的斗争从1901年至1910年多达百次。在广大农村，农民们或是痛殴驱赶税官，或是成群结队冲进城里砸毁县署，赶走县吏，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其中以1902年广宗县农民景廷宾和巨鹿县农民赵洛珠反抗教案赔款起义规模最巨。他们高举“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旗帜，啸集三四万人马，袭击清军，捣毁教堂，活动遍及直隶南部24县，声威直震近畿，迫使袁世凯宣布免去广宗等州县的教案赔款。1905年，天津塘沽渔民无法忍受腹削刻剥的捐税，亦聚众暴动，进行反抗。1907年8月，愤怒的南宫县农民将知县痛打致死。1910年，良乡、涿县农民以“杀尽贪官污吏”为口号揭竿而起。凡此种种，表明了素有反抗剥削压迫传统的燕赵人民对清廷的离心离德，清朝统治的根基早已处于动摇之中。

在直隶民变激生的同时，直隶民族资产阶级也在艰难中崛起，向清王朝展开了争取经济权力和政治地位的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近代工业得到一定发展，相继办起了开平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井陘煤矿、临城煤矿等大型工矿企业，同时中小型企业亦纷纷出现。1903年直隶工艺局成立，进一步掀起了兴办厂矿的高潮。但是直隶的民族资本主义自始便面临着帝国主义

垄断资本的侵吞和封建势力的挤压，举步维艰，发展迟缓。1902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昏愦，英国墨林公司仅以5万两白银便将利润丰厚的开平煤矿骗占，后屡经交涉，才于1906年与北洋滦州煤矿合并。与此同时，洋货也以其物美价廉大量涌入，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市场，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严重威胁，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起而抗争。1905年以反对清廷与美国续订《华工禁约》为导火线，全国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潮，直隶民族资产阶级亦积极投入其中，商界学界一致行动，向民众揭露美国迫害华工的罪行，激发爱国热情，号召商店不卖美货，民众不买美货，码头工人不卸美货，以致美货大量积压，损失颇巨。同时大力宣传提倡使用国货，设法提高产品质量，以与洋货抗衡，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抵制美货运动在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同时，对于传播反帝爱国思想，唤起民众救国救亡意识的觉醒，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后，直隶民族资产阶级为进一步求得生存和发展，争取合法的政治地位，又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

1905年，清廷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极为恐慌，为消弭革命，分化欺骗资产阶级，宣布了“预备立宪”，而后又于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政局，这使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人士继续对清廷抱有幻想，希图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变革政治，救亡图存的目的，他们以请愿的方式向清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速行宪法。1907年，直隶士绅由清末状元刘春霖领衔，向清廷递交了请愿书。1909年顺直咨议局成立后，资产阶级立宪派便以此为阵地，进行激扬舆论，扩大政治影响，组织请愿的活动，将立宪运动推向高潮。1910年，顺直咨议局联合各省咨议局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直隶省请愿代表团以立宪派中坚人物、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联合绅商学界，连续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一再上书清廷提前召开国会，直隶各阶层及报界也给予大力支持和响应。但是请愿所得的结果，却仅仅是清廷将9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至5年的虚假允诺。这使得立宪派大失所望，

深感“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⑤，对立宪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年底，由天津学界和东北请愿团联合发起的第四次请愿活动遭到了直隶当局的镇压，领导人温世霖被拘捕，发配新疆。不久，清廷即成立“皇族内阁”，暴露其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还要继续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真实面目。请愿活动的失败，使部分资产阶级立宪派认识到清廷的冥顽不灵，要求立宪是此路不通，唯有诉诸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遂向革命派转化靠拢。顺直咨议局即于此时确定了要推倒现政府的斗争方针。

在清朝反动统治日益不得人心之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直隶日渐活跃发展起来。首发直隶革命之先声的是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的学生吴越，吴越早于1903年便联络南方革命志士杨守仁、赵声等人在保定密组“军救国教育会”，次年又组“北方暗杀团”，并著有《暗杀时代》一书，主张以恐怖暗杀手段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之前声。1905年初在保定创办《直隶白话报》，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启迪民智，宣传爱国。是年7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并派载泽等5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吴越认为这是“欲断送汉族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族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⑥，遂以暗杀手段阻其“立宪骗局”的实现，因炸弹提前爆炸，谋刺未遂，吴越也以身殉难。这次事件举国为之震动，孙中山先生曾评论此事“影响国内外人心者至大”^⑦。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发展，直隶以其地位的重要性引起革命党人的关注，一些南方革命党人秘密潜入京畿活动，以期实行“中央革命”，从根本上动摇清廷统治。而留日学生陆续归国，更对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05年中国同盟会总部在东京成立，直隶籍留日学生有35人加入，并成立直隶支部，派人回国指导推动革命。1906年直隶蠡县人陈幼云从日本弘文书院毕业，受同盟会派遣回到保定，建立了直隶第一个革命党人的组织同盟会河北支部。以此为开端，直隶革命汇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流。

在武昌起义前，直隶相继建立起一些革命组织，进行宣传发动工作。保定同盟会河北支部成立后，秘密输入《民报》、《革命军》、《天讨》等革命书报，除在学界培养革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外，还吸收保定各军事学堂学员多人入盟，这些人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对瓦解清军策动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以保定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外围组织实行会、共和会相继成立，1909年两会合并，是为保定共和会。该会主要负责人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学生胡鄂公，其宗旨为：“推翻满清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融合种族界限，发展全国实业。”共和会颇具规模，会员多达3000余人，并在京、津等地设有分会。共和会曾发起“断发学潮”，京津保学生起而响应，剪去标志清朝统治的发辫竟成为一时的风尚。以后又发动京津保学生共同罢课，积极参加保路保矿和国会请愿活动，扩大了革命影响和声势。在天津成立了同盟会外围组织克复会，并发行《克复报》，以排满复汉，唤起民众反清救国意识为主旨。除去上述革命组织外，尚有直隶第一个反清武装团体——丁开嶂的铁血会。1904年，丁开嶂愤于日俄战争竟然在中国领土上开火，遂广结绿林豪杰，成立抗俄铁血会，在东北袭扰俄军，日俄战后转而反清。1906年丁开嶂加入同盟会，在其家乡直隶丰润成立北振武社，以为北方革命党人秘密往来集会的场所，铁血会亦更名为“革命铁血会”，并在北京周围及关外广泛发展力量，在北方颇具声威。此外，革命党人的势力亦渗入北洋新军中，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即为同盟会会员，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也有革命党人的活动。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分散在天津、张家口、通州、石家庄等地，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反清斗争。如顺直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王法勤等即为同盟会员，以合法身份领导了立宪运动。

直隶革命党人的活动及革命组织的建立，将革命火种散播到直隶各地，虽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但却酝酿了日后辛亥革命的风暴。直隶各阶层人民连翩而起的反抗斗争，

预示了清朝统治末日即将来临。武昌起义前夜的直隶，对于清王朝来说已是危机四伏之地，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已是为期不久了。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或是起义，革命烈火很快燃遍半个中国。在历史激烈变革浪潮冲击下，直隶政局一片混乱，统治者惊惶失措，一些官吏纷纷携眷出逃或避入租界，大有惶惶不可终日之势。直隶人民和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极为振奋，分外活跃，各种革命团体应运而生，天津共和会、急进会、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连同原来的直隶革命团体，多达十几个。为了响应武昌起义策动直隶革命，革命党人公开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奔走于京津保滦张家口等地，或是发动地方民团武装，或是潜入北洋新军，积极筹备武装起义。10月16日，俄国驻天津领事向其上司密报说：“假使革命党人在此起义，天津立刻会到他们手里，因为居民完全站在他们那一方面。”^①说明了当时革命空气的高涨和人心的向背。

直隶革命这时虽呈高潮之势，但由于武昌起义事出突然，革命党人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尚无充分准备，缺乏统一领导和联系，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对此，革命党人也有清楚的认识，受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遣回国的王葆真，在武昌起义后以“直隶省革命力量最薄弱最困难，而关系革命成败最重要”^②，赶至直隶滦州，策动北洋新军起义。天津共和会会长白雅雨毅然表示：“拿破仑说过，英雄字典里没有‘难’字，北方革命的职责难道要别人来承担吗？”^③他抛妻舍子，不畏艰险，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在革命党人努力推动下，直隶响应武昌革命的斗争以北洋新军的滦州兵谏拉开了帷幕。

武昌起义爆发后，直隶率先作出反响的是号称清军精锐、清

「王朝的统治支柱北洋新军的一部分。10月27日，驻滦州的北洋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北方新军将领蓝天蔚、卢永祥、伍祥桢等人，发动了震动全国的滦州兵谏，以武力逼迫清廷实行立宪，抗拒清廷南下镇压革命军的调遣。滦州兵谏的发生不是偶然的。1911年春，当清廷决定于10月举行3年一次的秋操时，奉调参加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十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即有“私带子弹，相机起义”^①之密谋。张、吴、蓝3人不仅在北洋新军中有“士官三杰”之称，而且均为秘密同盟会会员^②。武昌起义爆发后，秋操取消，清廷急忙抽调各部组成大军南下镇压革命。张绍曾闻知第二十镇被调往前线后，即将所部屯于滦州，急返奉天，与蓝天蔚及第三镇统制卢永祥、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等商量对策。张绍曾明确表示：“武昌之变，为除专制，主共和，以此倡义号召天下，凡属同胞谅皆赞助。今吾辈所统各部队，半属北人，虽未预约同谋，应皆晓以斯义，倘冒然而往，胜则自残同类，负亦死无指名。”^③这时该镇革命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力促其乘清军南下，京师空虚之时，直捣清朝巢穴，但鉴于北洋新军中反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张绍曾在与蓝、卢等人商量后，决定采取“先向清室陈述国事意见，如不采纳，再行发动^④”的权宜之计，拟就立宪政纲12条，要求清廷废除皇族内阁，召开国会，赦免国事犯等。10月27日，他回到滦州，即命所部“均不前进”，同时派专人将立宪政纲送至北京，上奏清廷，并通电全国。震撼全国的滦州兵谏就此发生。此一期间，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武汉前线吃紧，清廷一日数电促其拔队南下，但张绍曾抗旨不遵，待机而动。

滦州兵谏发生后，立刻受到直隶及全国各方面的支持与关注。京津革命党人陈之骥、王葆真曾两三次前往滦州，敦促他速举义旗，直捣京师；东北革命党人亦派商震、李德瑚等前往策动游说，促其宣布独立，并推举张为“东三省督府都督”。各地函电也如雪片纷至，力劝其“扫除满清，光复汉室，组织共和，建立

民国”^⑤。顺直咨议局还专门召开50多人的会议，推王法勤、孙洪伊为代表赴滦州见张绍曾，表示“第二十镇如宣布起义，经过天津组织政府，顺直咨议局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⑥”。为了扫除滦军举义直捣京津途中的障碍，王葆真积极向天津外国领事团疏通，滦军如果进入天津，不以违背1902年撤销天津都统衙门时所订天津20里内不得驻有清军的条款对待。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更坚定了张绍曾举事的决心。

张绍曾在离京城近在咫尺的滦州拥兵抗命发动兵谏，强烈地震动了清廷，引起了清朝亲贵大臣的哗然与恐慌，经过紧张的计议，决定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前去“抚慰”。吴禄贞早有起事之心，但因第六镇革命力量薄弱，正感孤掌难鸣，此去滦州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于10月29日抵达滦州后，立即与张绍曾密谋组织“立宪军”，以要求入卫京师为名，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分由保定、滦州入京，打出“维护清室，革新政治”^⑦的旗号，控制中央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密议甫定，传来山西新军于同日起义宣布独立的消息。吴、张极感鼓舞，决定“联晋覆清”^⑧的方略，并给山西阎锡山写信要“共组燕晋联军”^⑨。派人火速送往山西，同时重新议定，吴禄贞在石家庄与晋军共组燕晋联军，张绍曾仍以立宪军的名义调蓝天蔚部来滦集结，双方准备好后，同时宣布独立进攻北京。而后，吴离滦赴京，向清廷报告张绍曾“并无异志”，要求亲赴石家庄“防剿”，31日，吴抵石家庄。

清廷此时应付南方革命军已尚属十分吃力，又在近畿面临京东有张绍曾以武力要挟，西有山西革命军的进逼，不得已同意滦州兵谏政纲，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继而宣布解散皇族内阁，拟具宪法重大信条19条，任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等，同时又连电张绍曾，声称已同意立宪，令其迅速开赴前线。但张绍曾未为所动，按照既定计划向清廷要求入卫京师，并电约蓝天蔚、卢永祥来滦。11月1日，他又扣留了清廷从东北运往武汉的军火，并分电

致武汉革命军政府，表示支持革命，揭露清廷“假行立宪”，“拥护专制”^⑧，清廷拟具的重大信条19条与原奏不符，袁世凯不是国会公选等。清廷对张绍曾的强硬态度极为恼火，对第二十镇官兵采取了威胁利诱，分化瓦解，加强防备等手段，逼迫张绍曾从速开拔，放运军火，但均遭到张的拒绝。张绍曾继续积极准备进攻北京的部署。

与此同时，吴禄贞在石家庄组织燕晋联军取得顺利进展。吴于10月31日抵达石家庄后，即命已进发到井陘的所部第十二协统领吴鸿昌停止前进，向清廷发电假称自己亲赴井陘“督师进剿”^⑨等军情，并派人入晋，与山西革命军取得联系。这时清廷已得密报，知其与张绍曾、蓝天蔚、阎锡山欲图起事之密谋，为稳住局势，布置对策，于11月3日任吴为山西巡抚，“令其迅速接任”，“以解除京汉中段威胁”^⑩，企图将吴调离石家庄，分化瓦解革命力量。11月4日，吴禄贞赴娘子关，会晤了阎锡山等人，态度明确地表示自己不仅决无做山西巡抚之意，而且愿与“晋军携手，共成推翻清朝之义举”^⑪。吴、阎遂商定组成燕晋联军，吴禄贞被推举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分别为副都督兼副司令，并决定于11月7日吴、阎、张同时分路起兵，会攻北京，一举推翻清朝。

吴禄贞返回石家庄后，即加紧进攻北京的部署，他先下令扣留了清廷运往武汉前线的军械辎重，而后再公开电奏清廷，弹劾在前线督师的荫昌“督师无状，纵肆杀戮”，应“严行治罪”^⑫，又以袁世凯为革命之劲敌，派人前往武昌与革命军联系，欲南北夹攻，阻袁北上进京，置其于死地。同时电告张绍曾：“联晋共图大举，希协同动作，以践前约。”^⑬张绍曾接电后即命滦军准备出发，电约蓝天蔚“协同前进”^⑭，并给吴回电告之：“我军整装待发，请即与山西起义军前来会师。”^⑮11月6日晚，吴禄贞拟好了给张的电报：“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⑯其时，山西革命军两营也抵石家庄，吴、张、阎联合准备夹攻北京。他们以为，颠

覆清室的时机已经成熟，革命大功告成即在眼前。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形势陡然逆转。吴禄贞扼住正太京汉铁路咽喉，西联晋军，东结滦军，欲阻袁世凯北上，夹攻北京，同时吴、张截军械、扣军火，南呼北应，对清廷形成致命的威胁。在这肘腋之变迭生的情况之下，清廷和袁世凯为扑灭京畿即将燃起的革命烈火，派人以重金收买了吴的卫队长兼骑兵营长马惠田，于11月7日凌晨将吴禄贞暗杀，同日又解除了张绍曾的兵权，令其“回津养病”。吴的被害，张的去职，使燕晋联军立即解体，夹攻北京的计划亦付之东流。由滦州兵谏引发的北洋新军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至此便告失败。

滦州兵谏和燕晋联军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吴禄贞及张绍曾虽身为革命党人，但作为清军的高级将领，与清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清廷抱有一定幻想，对其阴险狡诈缺乏认识和警惕，以至在整个密谋过程中事机连连泄漏，直接遭致清廷的破坏和镇压。此外，吴禄贞虽为第六镇统制，但由于任职时间短（1910年接任），未能真正掌握该镇实力，而革命势力也未能在该镇植根，以至在紧要关头被自己的卫队长所害，使即将到手的胜利功亏一篑。张绍曾虽有京津关外革命党人及镇中革命官兵的支持，但在吴被刺后即陷于软弱动摇，坐失革命良机。滦州兵谏及燕晋联军尽管失败了，但是它是发生在全国革命高潮中清朝统治心脏地区的革命斗争，对处于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牵制和打乱了清廷对革命的镇压和部署，有力地支援了武昌革命，对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滦州兵谏及燕晋联军对北方乃至全国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张绍曾发动兵谏，才有了吴禄贞燕晋联军夹攻北京密谋的制订，如果燕晋联军成功，那么清朝的倾覆便是指顾间事，辛亥革命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局。而由于吴的被刺，使袁世凯得以顺利入主中枢，以致演成日后南北和议、清廷退位，袁世凯任民国总统的结果。

滦州兵谏及燕晋联军的失败，使直隶一度高涨的革命形势骤

然低落，革命党人在“北洋之兵力，顿失重心”^②，保定革命党人原计划配合吴禄贞同时起事，发动各县举行暴动宣布独立，在吴被刺后以力量薄弱采取了“力持慎重”^③的态度，虽后来尚有为了阻止湖广总督段祺瑞南下而炸新乡黄河铁桥和唐河铁桥之举，但亦未获成功，不少革命党人分投京、津、张家口、包头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山西革命军亦放弃了直捣京师的计划，退回娘子关。革命情绪最强烈的第二十镇官兵，亦因张绍曾去职受到极大挫折。11月下旬，张家口举义又遭夭折。张家口举义酝酿于武昌起义之初，保定革命党人南琴轩、张雨岑等人以张家口位近京畿，是北方之重镇，对推动北方革命极为重要，与当地革命党人、铁血会成员李飞仙、秦宗周等建立联系。山西独立后，为配合山西起义军续西峰“出平型关，直捣北京”的计划，11月2日，他们成立张家口起义司令部，并派人到天津与革命党人王葆真、白雅雨会晤，商洽购买军火之事，得到大力支持，白雅雨亲将第一批军火运至张家口。11月27日，第二批军火由高志清等人前往运回，不幸在返回张家口的途中被清廷密探发觉，高等人被捕，张家口起义司令部遭到破坏，李飞仙、秦宗周等10余人被捕，李、秦等7人英勇就义。张家口起义未举便遭失败。

直隶革命力量的薄弱，反动力量的强大，使革命党人深感北方革命的不易，迫切需要支持和帮助。在吴禄贞被害以后，京津革命党人即派人到湖北军政府请援，得到军政府的极大重视，认为北方革命“目前实有迫切需要”^④，派代表胡鄂公、冷公剑等人携款北上天津，与直隶革命党人及各革命团体取得联系，协助北方革命的开展。在南方革命力量的支持和推动下，直隶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武昌起义爆发后仅一个多月，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全国大部分

省分宣布独立，清王朝陷入穷途末路之中。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在12月初先后与袁世凯达成了南北停战协定，进行了南北和谈，使得武昌起义后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渐趋于低落，中国政局呈错综复杂的局面。但是直隶革命却于此时异军突起，形成局部的高潮，对辛亥革命后期的进程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从吴禄贞被刺以后，善于投机的政治野心家袁世凯得以顺利入主中枢，就任了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他立即开始了谋取更高权力的活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稳定北方大局，以与清廷和南方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他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一方面伪装同情革命赞成共和，一方面加紧对京畿及北方革命的破坏与镇压。直隶总督陈夔龙乘其旨意，加紧了对革命的防范，“党人有煽动滋事者，一经侦察属实，拿获到案，严惩不贷”^⑩，北方形势更加险恶。继张家口举义失败，李飞仙等人被杀害后，11月29日北京革命党人陈雄、高新华、李汉杰的起义亦遭镇压，陈、高、雄等多人殉难。12月2日，革命党人、戏剧家王钟声在天津密谋起义事泄被捕，于次日被直隶当局按“行营拿获奸细论罪”处于死刑。在这种情况下，直隶革命党人为加快革命步伐，加强领导，统一各不统属的各革命团体，结束各行其是的状况，于12月1日及12月14日在天津相继成立了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和北方革命协会。

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以汪精卫和李石曾为正副支部长，曾发行《民意报》，鼓吹“中央革命”和“实现共和”，北方同盟会员初时以汪、李之革命声望，纷纷加入。但是汪精卫此时已被袁世凯收买利用，不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而以“北方事不易为”^⑪，以“联袁倒清”^⑫为主要手段和目的，以后又不遗余力地为袁世凯的南北和议的阴谋奔走。汪的作为，遭到多数革命党人的反对，决定另组新的机构领导北方革命。12月14日，在胡鄂公的主持下，北方革命协会成立，将直隶分散的10余个大小革命团体联合起来，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⑬为宗旨，坚

决反对南北和议，坚持动摇清廷和袁世凯之根本，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此前11月底至12月初，胡鄂公已与直隶革命党人策划了在京、津、保、滦、通等地发动起义的部署，并在各地分设起义总指挥部，确定了各部的人选。北方革命协会的成立，各革命团体的大联合，有力地促进了直隶武装起义的开展，将直隶革命推向了高潮。

12月18日，在北方革命协会成立后的4天，任丘、雄县起义爆发。南北停战后，袁世凯背信弃义，于12月8日派兵入晋镇压革命。次日，津、保革命党人紧急集会，决定在保定四周雄县、博野、高阳、蠡县、任丘等地举义，以牵制袁世凯的西进之军。12月18日革命党人耿世昌率起义军于任丘娘子村发难，一举夺取县城。直隶总督陈夔龙得报后，即从保定派出淮军两营前往镇压，耿世昌率军奋勇抵抗，突出包围至雄县与靳广隆领导的起义军会合，打出“北洋革命军”的大旗，继续浴血奋战，抗击清军。由于博野、高阳、蠡县等地起义计划均已泄漏，未能发动，任丘、雄县起义军陷于孤军作战，最后因寡不敌众而战败，耿世昌、靳广隆、冯杰等多人遇难，另有百余人被俘。雄县、任丘之役遂告失败。

在任丘、雄县起义的同时，北方革命协会也加紧了对滦州新军起义的策划。驻滦州北洋新军第二十镇官兵中，早在武昌起义以前就建有革命组织山东同乡会和武学研究会，官兵中反清革命情绪强烈。滦州兵谏失败后，武学研究会和山东同乡会的革命骨干即召开秘密会议，公推第七十九标第一营管带王金铭、第二营管带施从云、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冯玉祥主持滦军革命，并派人到天津与王葆真、白雅雨、孙谏声、王法勤等联系，谋划起义。直隶革命党人感到滦军起义对北方大局影响举足轻重，是直隶革命唯一可借助的武装力量，乃全力以赴，不断往来于津滦之间，加强联络。在雄县、任丘起义的同时，北方革命协会会长胡鄂公亦曾亲往滦州面见王金铭、施从云，策动响应，因当时尚未准备

成熟而决定延迟。天津共和会亦早派凌铨、于树德等人组成敢死队，潜赴滦州附近，与当地货栈主李棠结成“龙山十四郎”，并直接打入新军内部，探察动静，与革命官兵频频接触，鼓动革命热情。天津共和会长白雅雨是北方革命协会负责策动滦军起义的主要人物，先后两次前往滦州，与王金铭等谋划了起义的具体步骤。

此时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治在张绍曾去职后由反动将领潘榘接任，他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为严防革命的发生，除将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留驻滦州外，其余各标及骑、炮、工兵等部分调至秦皇岛及关外，以切断各部革命官兵的联系，同时禁止官兵自由往来，严密监视，给起义的发动带来极大困难。为此，王金铭亲赴海阳冯玉祥处，并派人到其他各部及山东、东北进行联络。在北方革命协会和滦州官兵的协力合作下，起义计划逐渐酝酿成熟。12月底，南北和议行将破裂，革命党人决定即时发动起义，以滦州新军七十九标三营为主，联合山东烟台民军、辽阳商震民军及冯玉祥等部同时发难，直捣京津。29日，白雅雨带领敢死队员潜入滦州城内，说服了警察所长张注东及知州朱佑保支持革命，滦州城内一时撒遍革命传单，“光复”之声四起。30日，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通电全国，主张共和，以为滦州新军起义之先导，并准备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宣布独立。

就在这起义一触即发之际，第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将起义计划通盘向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告发，王怀庆急电直隶总督陈夔龙并转报袁世凯商量对策。袁世凯借机以此要挟清廷，进行逼宫，同时电嘱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严防驻东北第二十镇各部响应，冯玉祥即于此时被软禁起来。而后又接受陈夔龙的计策，一面派王怀庆前往“抚慰”，化解革命，一面调集北洋新军第三镇一协至滦州雷庄集结，准备镇压。1912年1月1日，王怀庆抵滦州，不但未能进行“劝解抚慰”，反在革命官兵逼迫下，不得已伪称同意接受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一职，与此同时却在思谋脱身之计。次日，

当王怀庆随王金铭等人入城进行就职典礼之时，他在第三营管带张建功的掩护之下，策马而逃，急返开平，一面电袁世凯请求增援，一面将所部淮军布置于雷庄铁道两旁，并拆去铁轨一段，对起义军进行堵截。

王怀庆逃走後，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以事机全面泄露，事不宜迟，决定立即起义。1月3日，滦州新军宣布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举王金铭为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当日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独立。1月4日，起义军举行誓师大会，发表檄文，声讨清廷统治多年的罪行，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滦州新军宣布起义，使滦州人民极为振奋，“莫不鼓舞雀跃，咸庆重见天日”^④，代表清朝统治的龙旗被抛掷地上，清朝年号被废止，到处可见“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一月初三日大汉滦州光复”^⑤的标语。天津领事团派出代表至滦州观察动向，正式承认北方革命军政府为“交战团体”^⑥。

当日下午，起义军扣留火车，准备直上天津。不料第三营管带张建功突然叛变，据守滦州城向城内外革命官兵发动进攻，王金铭、施从云与之力战后，为避免贻误时机撤出战斗，带领一、二两营700余官兵登上火车西进。张建功遂指使部下在滦州城内大肆屠杀革命官兵，滦州城内外一时血流成河。王金铭等乘车西进至雷庄，与埋伏在此的清军发生激战，战斗正酣，敌军吹号停战，以“和谈”诱王金铭、施从云等前往，到后即被拘捕。次日王怀庆奉袁世凯之命，将王金铭、施从云等官兵30余人“就地正法”。王、施就义时“意态从容，谈笑自若”，大义凛然。几天后在雷庄突围而至古冶的白雅雨亦被清军抓捕，被王怀庆残酷杀害。白雅雨就义前表现英勇，曾赋诗一首表明革命到底的心志。

轰轰烈烈的滦州起义在袁世凯及刽子手王怀庆的镇压下失败了。这是北方地区辛亥革命时期最大的武装起义，卒使近畿摇动，清廷震惊，对于清廷的退位起了重要作用。

滦州起义后的10天，由北方革命协会和通州革命党人策划的

通州起义，在即将发动时事泄失败，蔡德辰、王丕承、王治增等7人被捕殉难。一次次起义的失败，大批革命志士死难，使直隶革命党人极为悲愤，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恐怖的手段对付正在垂死挣扎的清王朝和袁世凯。1月15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暗杀团成员张先培等人在北京谋炸袁世凯，未能成功，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被捕，被袁世凯下令杀害。1月26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军事部长彭家珍在炸伤清廷军咨使良弼的同时，英勇牺牲，良弼亦于次日死去。同日，天津暗杀团团长薛成华刺杀北洋巡防大臣张怀芝失败，薛成华被捕，于次日被凌迟处死。1月29日，在天津又发生了直隶辛亥革命期间的最后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胡鄂公从南京回来，奉孙中山“北方革命，固重于目前一切”的指示策划发动的。1月27日，北方革命协会开会，决定刻不容缓发动天津起义，对起义的目标、任务、时间等一一作了周密安排。1月29日晚，正当各路人马开往集结地点之时，负责燃放起义信号的起义人员误将时间看错，提前两个小时燃发了信号弹，致使起义队伍措手不及，部署被打乱，在仓卒中向督署发起进攻，结果很快便在清军的镇压下遭到失败，林少甫、韩佐治、何南屏等多人战死。

就在直隶革命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向着封建王朝发动一次次猛烈冲击的同时，南北妥协大势已成，孙中山表示只要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结束帝制，赞成共和，他即辞去大总统一职，让位于袁。袁世凯即利用京畿的革命斗争，加紧胁迫清廷退位。尤其是1月15日黄之萌等人谋刺未遂后，袁即托词不入朝，待良弼被诛，清廷内人人自危，惶恐不安，袁世凯趁机对庆亲王奕劻说：“近近畿迭出暴举，足证革命党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②清廷迫于大势已去，终于于2月12日下诏退位，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从此，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寿终正寝。

2月17日，胡鄂公召集北方革命协会各革命团体负责人，宣布

即日一律解散。不久，汪精卫亦携遣散经费，将各革命团体成员资遣回籍。直隶的辛亥革命就此结束。

辛亥革命期间，直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光复”和“独立”，但却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一方面反动统治严密，防范最甚，革命活动难以展开，易于遭到镇压，不可能形成南方革命那种蓬勃之势；一方面却对整个革命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直隶的革命斗争直接与清朝反动力量短兵相接，从内部瓦解了清政府的统治。直隶人民和革命党人不论是在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以后以及南北议和期间，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不畏牺牲，前仆后继，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兵谏、兵变、起义和暗杀活动的英雄壮举，都有力地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和垮台，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光辉事迹永载史册，为后人所敬仰追念。

- ① 丁国瑞：《竹园丛话》第12集，第48页。
- ② 同上书，第3集，第17页。
- ③ 《东方杂志》第7年第17号，《中国大事记》第157页。
- ④ 吴越：《遗书·自序》。
- ⑤ 张啸岑：《吴越烈士事迹》。
- ⑥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档案选译》，第340页。
- ⑦ 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01页。
- ⑧ 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辛亥革命》（六），第367页。
- ⑨ 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166页。
- ⑩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536页。
- ⑪ 张国焯：《辛亥革命史料》，第201页。
- ⑫ 同⑨，第168页。

- ⑬ 《张绍曾往来函电稿》(未刊)。
- ⑭ 同⑦, 第403页。
- ⑮ 同⑪, 第196页。
- ⑯⑰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第26、27页。
- ⑱ 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 第40页。
- ⑲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 第196页。
- ⑳ 同⑪, 第205页。
- ㉑ 山西文史资料《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专辑》(一), 第57页。
- ㉒ 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党史资料丛刊》(三), 第36页。
- ㉓㉔ 同⑪第202页。
- ㉕㉖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第480页。
- ㉗ 《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 第971页。
- ㉘ 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运动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第374页。
- ㉙㉚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辛亥革命》(六), 第272、290页。
- ㉛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第65页。
- ㉜ 欧阳云:《炸前清袁内阁纪实》。
- ㉝ 林能士:《辛亥革命时期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
- ㉞㉟ 凌铖:《辛亥革命起义记》。
- ㊱ 唐向荣:《滦州起义简述》,《滦县文史》(四), 第46页。
- ㊲ 冯自由:《彭家珍事略》,《革命逸史》, 第308页。

辛亥革命时期北京民主运动简述

侯宜杰

20世纪初年，在中国先进的人士中出现了革命与立宪两股思潮，正是这两股思潮汇合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巨流。革命派与立宪派尽管在救国道路与方法上存在着原则分歧，前者主张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者主张进行和平政治改革，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但二者的根本宗旨则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铲除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变贫穷落后的封建中国为富强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国。他们都是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一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开始即致力于革命排满的武装斗争，掀起一次次起义。但他们始终把发动的重点放在沿海沿边地区，从未注意北京。由于北京是清政府的所在地，为满汉亲贵大臣麇集之所，革命派在此进行暗杀的活动倒是层出不穷。武昌起义之前就曾发生过两起。

一是1905年吴樾谋杀清政府出洋考察政治5大臣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正在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1903

侯宜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副编审。

年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一新。不久读了《清议报》，又推崇康有为、梁启超，“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后又读了一些革命书报，思想又为之一变，“念念在排满”^①，成为革命者。从此与革命志士交往联系，宣传反清排满。

吴樾认为，排满之道有暗杀和革命两种办法，暗杀一个人就可担当，革命非群力无效，而且要靠暗杀播撒种子。他受俄国虚无党影响很深，声称20世纪上半期为暗杀时代，积极鼓吹，并欲冒险实践，确定下暗杀目标。1905年7月，听说清政府将派载泽等出洋考察政治，实行立宪，认为这是利用立宪欺骗汉人，以巩固专制统治，他“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②，决定剪除载泽等人。遂潜入北京，侦探5大臣行期，作暗杀的准备。

9月24日，载泽等5大臣率随员同时启程，各学堂师生、绅商、官员和驻京公使均前往送行，正阳门车站冠盖云集，锣鼓喧天，歌声震耳，观者如潮，煞是热闹。吴樾乔装官方仆从，怀挟炸弹，混入5大臣的专车。正值其准备投掷炸弹时，突然机车与列车相接，车身震动，引发炸弹爆炸，吴樾被炸得肢体断裂，当场牺牲，载泽、绍英仅受微伤。这次暗杀虽然使政府十分震惊，阻延了5大臣的行期，但考察宪政并未因之停止。

二是1910年汪精卫等暗杀宣统之父、摄政王载洋。自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发动了多次起义，其中不少是孙中山、黄兴亲自领导的，然而都失败了。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又告失败，许多人包括领导骨干均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③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危机。1907年同盟会内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炳麟等即利用广东起义失败和《民报》经费问题，要求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遭到拒绝。1909年陶成章等又公开在南洋、日本散发《孙文罪状》和《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和汪精卫。1910年陶等进而恢复了光复会组织，与同盟会的矛盾愈趋尖锐。这种状况也

使人感到前途茫茫，意气沮丧。

汪精卫，名兆铭，字秀新，号精卫，广东三水人，同盟会著名的理论宣传家。1907年见革命屡遭失败，他就有从事暗杀活动的打算。后来目睹起义旋起旋灭，革命阵营内部四分五裂，益觉“内地全无声响，不见于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④。因此便想“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⑤，入京进行暗杀，以鼓舞人心，并向清政府报复泄愤。汪精卫也是一个排满的狂热鼓吹者，认为满人不是中国人，满人入关，即是中国灭亡。中国立宪只有先将满人逐出中国之后才能实行，绝对不能拥戴“异族”君主立宪。“纵令满洲政府下令组织国会”，作为亡国奴的汉人也不应接受。他唯恐清政府立宪成功，革命难以发动，力主革命“持急进主义”^⑥。1909年，他认为“国人之迷梦”未醒，尤感实行暗杀刻不容缓^⑦。于是邀约黄复生、陈璧君、黎仲实、喻培伦由日本来京，以在琉璃厂开设守真照相馆为掩护，组织了暗杀机关。

汪精卫等最初计划暗杀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未能得手，继之准备暗杀海军大臣载洵和军咨府大臣载涛，亦未如愿，最后确定暗杀载沣。

1910年4月2日晚，黄复生、喻培伦前往载沣上朝必经之地地安门外鸦儿胡同附近的小桥下埋置炸药时，发现有人，以为事泄，急忙返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其他人离京，汪精卫、黄复生留下。次日当局接到一个居民报告，经过勘查，认为是革命党人谋炸摄政王，立即布置侦察。不久即将汪精卫、黄复生以及在吏部学制馆的罗世勋逮捕。由于同革命党人有些联系的民政部尚书善耆的回护，载沣也不愿激起更大的革命风潮，所以未对他们处以极刑，判处汪、黄终身监禁，罗10年监禁，给予政治犯的待遇。

在革命阵营中，有少部分人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经受不住挫折，犯有革命的急性病，很容易接受俄国虚无党的思想，热衷于搞个人恐怖活动，特别在对革命丧失信心后，更

想铤而走险，与敌人拚命。暗杀作为革命的辅助补充手段，有时可以除去个别敌人，然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能改变统治者的既定政策，因而原则上不应提倡搞暗杀活动。像汪精卫这样的骨干放弃革命运动，专门从事暗杀是很不妥当的。事实证明，暗杀无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

1910年，少数革命党人企图搞“中央革命”，陆续抵达北京，利用各种职业掩护，从事秘密活动。1911年春，田桐、景定成等创办的《国风日报》和《国光新闻》社，都是革命党人白逾桓、仇亮、冷公剑、程克、温楚珩、杨时杰等联络聚集的据点。后以《国风日报》为中心组织了同盟会北京分会。他们几次打算发动武装起义，均因力量不足而作罢。

二

1906年，在立宪派的强烈要求和世界大势驱迫下，为了维护统治，同时也为了自救，清政府宣布了预备立宪的基本国策。所谓预备立宪，就是实行立宪的准备阶段，或者由单纯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演变的过渡时期。一旦准备工作完成，即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实行立宪。既然如此，政府就不能禁止立宪派所搞的和平合法的运动。

清政府预备立宪是被迫的，最初没有宣布立宪年限。阶级地位的限制和切身利害的考虑使统治者确立了完全师法日本的指导思想，实行君主大权政治，仅对人民开放少许权利，一切循序渐进，速度尽量放慢，而且不时采取专制手段压制人民干预政治。资产阶级立宪派大都主张实行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君主徒有其名，大权归于国会，并由国会推举内阁总理，组织对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同时鉴于民族危机的严重，要求早日实现立宪。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发生矛盾冲突，从而引起尖锐斗争。如果说革命党人所从事的武装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封建主义的第一

条战线的话，那么立宪党人所开辟的合法斗争则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第二条战线，而北京就是这一斗争最直接最集中的地方。从第一条战线看，北京的地位显得无足轻重；从第二条战线看，北京又格外引人注目。

从1907年起，为了取得人民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将来制定民主宪法，立宪派就开始宣传进行国会请愿，并派人到京上书要求一二年内召开国会。1908年看到政府筹备立宪迟缓不力，在涉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妥协退让态度，以及颁布的种种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法律命令，立宪派深切地感到召开国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在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向政府要求政治权利的国会请愿运动。投入到这一运动中的有18省的人民、各立宪团体、留学生和海外华侨，国内签名者达15万之多，大部分省区都选派了代表到京向都察院呈递了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北京市民积极地参加了请愿活动。他们原计划与直隶省一起行动，后见直隶动作较缓，恐落后人，始作单独请愿之举。7月，工商各界联合千余人召开大会，公举电灯公司总理冯公度领衔，上书要求3年召开国会。京中的八旗士民受到很大鼓舞，为了尽到国民的天职，恒钧、乌泽声、常文、黄容惠、志恺等刊发传单号召，八旗人士踊跃响应，1600余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提出“以三年为国会之期，以国会为立宪之本”的要求^④。

此次请愿促使朝廷于8月27日颁布了《宪法大纲》，宣布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但因期限过长，《宪法大纲》具有浓厚的封建专制气味，人民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很少，斗争仍旧继续下去。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立宪派基本上控制了咨议局，有了合法阵地，又开始了同政府的较量。1年以来，立宪派深感政府无立宪能力，不足依恃，加之政府同日本签订新约丧失许多权利，列强统监中国财政消息的极大刺激，认为非开国会不能挽救危亡，由江苏咨议局发起，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朝廷速开国会。12月，16省咨议局代表齐集上海开会，决定成立请愿速开国会。

会同志会，由孙洪伊领衔，率代表团赴京请愿，要求1年之内召开国会。

1910年1月代表抵京，16日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

北京绅商学界和八旗人士分别3次召开大会，热烈欢迎请愿代表，提出设立后援会的建议，八旗士民还参加了请愿，予代表团以有力的支持。

1月30日，朝廷以筹备工作尚未完全，人民知识程度不齐，年内就成立资政院以树立议院基础为理由，加以拒绝。

代表团决定二次上书，在京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设立分会，发动人民签名。

2月12日，由黎宗岳、陈佐清等发起，北京各界人士成立了国会期成会，作为代表团的坚强后盾。继之，国会期成会通告各省咨议局组织分会，公举代表入都请愿。

6月16日，代表团80余人向都察院呈送了10份请愿书。请愿书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述了速开国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逐点驳斥了朝廷拒绝召开的理由。之后，代表分别谒见了军机大臣，上书载沣、政府和会议政务处。指出：人民之所以请愿，就是因为极其厌恶专制，极不信任官僚，争取人民应有的立法权。“政府既不授人民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将来起来造反，推翻政府，都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⑨。这次请愿全国有30万人签名。

清政府执迷不悟，竟然又加拒绝，并不准继续请愿。

二次请愿失败，全国人心愤慨，各省团体纷电代表团不要离京，作第三次请愿。在京参加朝考的留学生和举贡人员亦加入了请愿行列。

经过研究，代表团决定扩大原来仅限于咨议局议员的代表团，凡在京各界代表一律加入；各省府厅州县俱设分会，分头演说发动；第三次直接请愿定于次年农历二月，在此之前，代表团向10月即将召开的资政院上书，进行间接请愿，各咨议局和团体也向资政院上书，同时呈请督抚代奏。

正在准备之际，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7月4日日本和俄国签订了第二次日俄协定，并附有关系到中国主权的密约；二是8月22日日本吞并了朝鲜。立宪派震惊异常，代表团决定将原计划的间接请愿扩大，各省增派代表来京请愿；国会不开，各省不承认新租税；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第三次请愿通告书。

10月7日上午，代表们刚刚整好队、准备赴摄政王府上书，忽有青年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来到，交给代表一封信，信中写道：政府已不足依赖，“所赖者，我同胞激发热诚，以爱种爱国之心，出而理天下事”，“吾侪具有天良，何惜此少数之血液，洒书数字，以表示此次将以血殉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殉国会者之不足动我政府也。”^④并对代表说：“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言毕，赵振清、牛广生由袖中抽出利刃，欲自杀以明心迹。代表惊骇万分，抓住2人之手，苦苦劝解。代表稍为疏忽，牛广生立即割下左腿上一块肉，赵振清割下右臂上一块肉，在致代表信上涂擦数遍，惨不忍睹。代表感动得涕泪交流，誓死将请愿进行到底。次日又有两名学生将所断手指和血书送交代表团。代表团将请愿书送呈资政院。

全国人民给代表团以有力的支援，签名者远远超过前次，许多省召开数千数万人的大会，打着大旗，列队游行到督抚衙门请愿。

11月4日，朝廷被迫作出让步，宣布将召开国会的期限提前3年（1913年召开），再也不准更改，同时下令将代表团解散。

东三省和其他地区的立宪派仍不罢休，继续推选代表入京请愿。政府竟野蛮地采取强暴手段将奉天代表押送回省，把天津请愿领袖温世霖发配新疆，残酷地镇压了第四次请愿。

国会请愿期间，北京人民组织了几个团体，其中有鸿志、班吉本组织的八旗宪政研究会，文耀等组织的八旗宪政会，文质彬组织的八旗期成公民会，李播荣等组织的顺天宪政公会。反映了北京人民政治上的觉醒和结社观念的增强。

1910年10月至1911年1月，资政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常会。在统治者眼里，资政院不是立法机关，但民选的议员却竭力把它当作立法机关运用，通过了速开国会议案，弹劾军机大臣，要求开放党禁，赦免康梁和革命党人，极力争取民主权利，同政府的专制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11年春夏，立宪派出于更好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目的，在北京建立了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和宪友会几个政党。前3个都有资政院钦选议员参加，有的甚至起主要作用，唯独宪友会由民间的立宪派所组织，总部设在北京，支部遍及各省，势力最为雄厚。

同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庆亲王奕劻出任总理大臣，在13名阁员中，满人竟有9名，其中皇族又占7名，人称皇族内阁。依照立宪原则，皇族不能担任国务大臣。新内阁一成立，就副署了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诏令，同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凡此均足以令全国人民惊心动魄和愤慨万分。

为了筹划救亡大计，立宪派在北京提前召开了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首先确定中心议题是推倒皇族内阁，“期为政治上根本之改革”^①。后来代表谒见某些政府要员，知道要把皇族阁员全部逐出内阁实无可能，遂将斗争的锋芒指向总理大臣。6月6日，联合会上书指出皇族内阁违背立宪制度，要求取消内阁暂行章程，另简总理大臣。朝廷置之不理。联合会再上呈文，同时向全国发表报告书，痛斥新内阁执行的政策都是亡国政策、媚外政策，“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②，宣告政府已不可救药，号召人民为民主政治奋斗不息。

朝廷非但不接受正确的批评，反而于7月5日发布谕旨说，用人为主权，议员不得干预。斥责立宪派违反《宪法大纲》，“议论迹近嚣张”，气势汹汹地下令以后“不得率行干请”^③。

这道蛮不讲理、颠倒黑白的谕旨激起立宪派满腔怒火。联合

会代表对政府绝望，发表《通告各团体书》，直接把要说的话诉诸人民，公之于社会：“今日种种恶政治，皆我政府之所铸造”。皇族内阁不废，就无所谓改良政府，亦无立宪可言。接着严厉批判了谕旨，揭露了其“任政治腐败”，让人民“俯首帖耳”，不得指责攻击政府，不得谈论改良政治的险恶用心，撕破了政府专制独裁的画皮。

立宪派在北京开展的每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和反对皇族内阁的斗争，都无情地鞭笞了封建专制的黑暗，揭露了政府的腐朽守旧，宣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启迪了人民反对封建、争取民主的政治觉悟，使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对清政府产生刻骨仇恨，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崩离析。立宪派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首先推翻腐朽专制的政府，才能真正救亡图存，也才是真正的爱国，从此与政府分道扬镳，大部分转向革命立场，与革命派合流。所有这一切都使清政府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为辛亥革命的酝酿、爆发和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清廷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督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同时起用罢官在家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不久，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相继独立，革命烽火燃遍全国各地。清政府惊惶失措，11月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企图依靠他扑灭革命烈火。但袁世凯出山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窃取全国政权，既无意于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也无意于让革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他对南方革命军实行又打又拉的策略，一方面下令北洋军猛攻汉口，一方面屡次派人试探和谈。

武昌举义后，北京革命党人所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如何配合南方革命军采取行动，促进共和早日实现。但其力量十分弱小，北京又是清王朝的首都，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平时有重兵守卫，防范

之严、侦察之密均超过其他地方，现在戒备倍加严密，发动革命尤其困难。面对这种形势，北京同盟会推举冷公剑往武昌面见已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请求派人去北方主持革命。黎即委派胡鄂公前往天津组织革命机关，联络分散的各革命小团体，规划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今通县）的革命步骤。

11月6日，清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黄、罗立即离京，汪则应袁世凯电约留下。袁抵京后，汪即投靠袁，与立宪派的杨度共同组织国事共济会，宣言民主立宪党人与君主立宪党人的目的都是成立立宪国家，现在南北重兵对峙，必然造成民生涂炭，财力穷困，双方应该停战，召集国民会议，议决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问题。制造和谈气氛，以适应袁世凯篡窃国柄的需要。随后他到天津会见了胡鄂公，并成立同盟会京津分会，任会长。

由于有些革命团体怀疑汪精卫投靠袁世凯，不愿合并到同盟会，胡鄂公为团结革命力量，统一指挥，在天津设立总指挥处，于各地设立总司令部，选定钱铁如为北京总司令，邱寿林、李尧衢等9人为指挥，蔡德辰为通州总司令，王丕承、黄之萌等5人为指挥。12月14日又建立北方革命协会，协助革命军北伐，同盟会等革命团体悉入其中。

这时南方各省代表联合会已经同意与袁世凯和谈，汪精卫力主在停战期内不能武装起义，只能搞点必要的暗杀，妄图束缚革命党人的手脚。但北方革命党人多反对与袁议和，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又见袁捕杀革命党人，派兵进攻山西起义军，仍然积极谋划武装起义。12月27日汪精卫秘密接受袁世凯任务南下议和后，北京、通州的革命党人加紧策动驻守当地的禁卫军第四标和姜桂题所部毅军。1912年1月2日，驻滦州军队起义，遭到袁世凯残酷镇压，京津革命党人义愤填膺，决议刺杀袁世凯、良弼和载泽等人。

蔡德辰等认为，通州距京最近，出其不意起事，可寒清廷之胆，促议和成功，迫清帝退位，设起义总机关于张家湾。策动毅军工作大致就绪后，议定电请湖北军政府汇款接济，1912年1月17日起义，攻克通州后即趋北京，会合北京同志推翻清王朝。不料湖北军政府一再衍期，毅军中有人动摇，向姜桂题告密。姜立即派兵在15日包围了起义总部，捕去蔡德辰等7人，后被斩决，起义未发即告失败。北京也未发动起来。

对于袁世凯，许多革命党人都认为他是清政府的首脑，革命的最大障碍，为人阴险无信，早就想把他诛锄。只因汪精卫散布袁有实力，如加利用，“未始不可促成革命，若去袁则北方实力无统率者，更不易征服”^④，百般阻挠，刺袁计划一直未能执行。及至蔡德辰等被捕，旋又得悉袁次日将去早朝，革命党人遂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刺袁。

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分组布置在袁去故宫的路旁。中午近12点，袁乘马车出宫行至东华门大街，革命党人从酒楼上投掷炸弹，毙其护卫管带，袁侥幸未死，在卫兵簇拥下急忙逃脱。革命党人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被捕殉难。袁世凯吓破了胆，忙不迭派人向革命党人致意要“效忠革命，推翻清室”^⑤。暗杀对于袁世凯加紧逼宫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1月中旬，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部分满族亲贵激烈反对，军咨使良弼尤甚。良弼在亲贵中最有军事才干，立即组织宗社党，保卫清室，反对议和，主张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战时内阁，派铁良到南方讨伐，甚至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成为清室中阻挠共和实现的一大障碍。革命党人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奋然说：“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⑥慨然挺身而出，以刺杀良弼自任。后来良弼在别人劝说下，“知大势无可挽回，方拟游说亲藩，劝令和平了结”^⑦。但革命党人尚不知道。彭家珍写好绝命书，交代完其他事，1月26日乘着马车寻找良弼，直到晚上始遇良弼归红罗厂府

邸。良弼至门前下车，彭持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名片往谒，一边说来报军情，一边取出炸弹掷去，炸断良弼一条腿（第三天逝世），彭因弹片反射头部当场牺牲。彭家珍虽然牺牲，但其壮烈行动却使满族亲贵丧胆，纷纷逃匿，减少了议和阻力，促使清帝退位诏旨得以顺利颁发。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立宪派群起响应支持，在京的一些人也返回本省投入革命。但仍有部分人坚持君主立宪，逗留在京，有些参加了10月22日清政府召集的资政院第二届常会。他们一方面企图平息革命，一方面又利用强大的革命声势向清王朝施加压力。10月29日朝旨命将宪法交资政院协赞后，宪政实进会文斌等，宪友会黄远庸等，辛亥俱乐部隆福等，八旗宪政研究会恒钧等，预备立宪公会朱福诜等，宪政公会陆鸿逵等，即集合在一起讨论，认为时局阽危，亟应实行立宪，联合上书资政院，对制定宪法提出许多原则性建议^⑩。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资政院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他们打倒了违法违宪的内阁大臣和皇族内阁，促使建立了责任内阁，推翻了朝廷不准抗违的宪法钦定原则，取得资政院起草议决宪法的神圣权利，迫使政府取消了不准革命党人组党的专制禁令，答允早开国会。他们起草的宪法19信条彻底废除了君主权力，一切权力归于议会，实行英国模式的议会政治、虚君共和，在实质上达到了与民主立宪同等的程度，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资产阶级宪法纲领，把清王朝的预备立宪推向了顶颠。

尽管清政府在革命爆发后对北京人民控制得更加严密，北京人民还是表达了他们对共和的热烈向往。如赵士斌、李觉生等4700余人就成立了中华五大族共和联合会。他们的存在表明了人心所向，对清王朝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有利于共和的早日实现。

北京的情况比其他省区特殊，但也以其特有的方式为辛亥革命尽了一份力量，作出了一定贡献。

- ① 吴榭：《暗杀时代自序》，丛刊《辛亥革命》(二)，第374—375页。
- ② 《烈士吴榭意见书》，《民报》第3期。
- ③ 《孙中山选集》第206页。
- ④⑦ 《汪精卫与胡汉民书》，见《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1936年版。
- ⑤ 《汪精卫供词》，见《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
- ⑥ 精卫：《杂驳新民丛报》，《民报》第10—12期。
- ⑧ 《八旗国会请愿书》，《申报》1908年8月26—27日。
- ⑨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31—132页。
- ⑩ 《国民公报》1910年10月8日。
- ⑪ 《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审查报告”第1页。
- ⑫ 同上书，“记事录”第97—104页。
- ⑬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9页。
- ⑭ 张国焘：《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
- ⑮ 税西恒等：《记京津同盟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56页。
- ⑯ 《金堂县续志》卷十，第24页。
- ⑰ 《汪荣宝日记》1912年2月1日。
- 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政院档，2号。

辛亥革命与内蒙古政治

郝维民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妥协而失败了，但是，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对于内蒙古社会政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对于同盟会在内蒙古地区的活动和武昌起义后内蒙古西部的反清起义等，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搜集、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史学工作者也进行一定的研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在一些专著中也作了反映。对这方面的史料和革命活动，我没有新的发现，只想就辛亥革命与内蒙古社会政治有关的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试图为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而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内蒙古社会政治出现了较大的动荡。在这种动荡中，除了同盟会领导的局部活动外，主要是在蒙古民族中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民族运动。这一运动与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以及辛亥革命的关系怎样？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蒙古民族运动？这是研究辛亥革命与内蒙古政治必须回答的问题。

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内蒙古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朝政府逐步转变了它传统的对蒙政策，从历来的“满蒙联

郝维民，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合统治”和对蒙严格封禁、优待，最后通过推行对蒙新政、彻底废除禁令，以至形成了满汉官僚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和对蒙古民族的掠夺和压迫。在这一过程中，内蒙古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迅速发展，畜牧业日益衰退，商品经济的出现，商业集镇的增多，近代工矿实业、邮电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兴办，对于内蒙古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剧烈的冲击。20世纪初，清朝在内蒙古推行以放垦蒙地为中心内容的新政，对于蒙古民族的冲击最为严重，简直成了与民族生存相关的问题。

蒙古民族并不简单地反对发展农业，尽管清初以来对蒙实行封禁政策，但在清中叶以后由蒙古王公从内地招民私垦蒙地，农业日渐发展，丰富了蒙古民族的经济生活，这种顺应社会需求的自然发展，总体上讲对内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从1902年开始，清政府在内蒙古以“移民实边”为借口，强迫推行以放垦蒙地为中心内容的新政，全面废除禁令，从而引发了蒙古民族空前规模的抗垦斗争。怎样评述这一斗争，它与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个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在19世纪80年代，清朝政府的一些封疆大吏就开始议论由政府官垦蒙旗土地。当时的山西巡抚、黑龙江将军以及北京清政府的官员相继提出放垦蒙地奏议，但是一直没有被清政府批准。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山西巡抚岑春煊再次奏请放垦内蒙古西部各盟旗土地。1902年1月5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途中，迫不及待地批准了岑春煊的奏议，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后又任命为绥远城将军。是年春，贻谷上任并赴内蒙古西部督办蒙旗垦务。在绥远城设立督办蒙旗垦务总局，总揽蒙旗垦务；又设丰宁垦务局，办理察哈尔右翼各旗垦务；设张家口垦务总局，办理察哈尔左翼各旗垦务；设西盟垦务总局，办理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各旗垦务。清政府首先严饬蒙旗王公扎萨克向垦务局报垦。当遭到一些蒙古王公扎萨克的抵制以后，便采取高压手段，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报垦。经过

一番周折，各蒙旗扎萨克才被迫陆续上报放垦地段。从1902年到1905年，在察哈尔8旗清理了旧垦土地和新放垦了大批牧场，其中察哈尔右翼4旗放垦牧场约2.5万顷，左翼4旗放垦2万余顷。从1903年至1908年，在伊克昭盟以高压手段强迫蒙旗报垦23370余顷，除乌审旗由于“独贵龙”群众的反抗而未能丈放外，其他各旗报垦的牧场均丈放完毕。乌兰察布盟6旗蒙古王公扎萨克一直抵制到1906年8月，不得已联名报垦7840余顷。另外，放垦了大青山后绥远8旗牧厂地3700余顷，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旗境内的驿站用地7900余顷。同时，清丈“整理”了土默特旗、和林格尔一带原右卫8旗牧厂的大量熟地。这样，在清末新政的10年间，清政府除了清丈“整理”熟地之外，在内蒙古西部放垦牧场达88700余顷，共征收押荒银273万两。清政府的西蒙垦务达到了掠夺蒙旗土地牧场，搜刮押荒银，筹措庚子赔款的预期目的。但是，极大地激化了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是实行官放“蒙荒”。东蒙垦务是由管辖东蒙各盟旗的热河都统和黑龙江、吉林、盛京三将军分别督办。1902年至1908年，黑龙江将军管辖下的哲里木盟扎赉特旗、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共丈放蒙地145万余顷，吉林将军管辖下的郭尔罗斯前旗放垦21万余顷，盛京将军管辖下的科尔沁6旗，从1902年至1911年间，共放垦蒙地175.6万余顷；热河都统管辖下的昭乌达盟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札鲁特左右两旗，截至1911年共丈放蒙地16000余顷；呼伦贝尔副都统宋小濂也在中东铁路沿线及沿边卡伦一带大量放垦蒙地。在清末新政10年间，仅哲里木、昭乌达两盟共放垦蒙旗土地达330余万顷另1.6万余顷。到1908年，清政府仅从哲里木盟北部7旗征收押荒银达387万余两。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社会矛盾也急剧地激化起来。

清朝政府如此大量地放垦蒙旗土地，其直接目的就是対蒙古民族进行一场空前的经济掠夺和民族压迫，剥夺了蒙旗对牧场的所有权和蒙古旗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遭到蒙古族各阶层普遍的抵制，进而发展为大规模的抗垦斗争。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首先以伊克昭盟盟长、杭锦旗扎萨克阿尔宾巴雅尔带头，联合各旗扎萨克抵制报垦，明确表示强行招民垦种蒙旗牧场或丈放已垦熟地，是对蒙旗的歧视和压迫。乌兰察布盟6旗王公扎萨克、官员、台吉等也联衔表示对清政府放垦牧场的札文“断然不能遵行”。于是1902年9月光绪皇帝发出谕旨，责令蒙旗迅速报垦。直到1903年4月，阿尔宾巴雅尔才被迫派员到绥远城报垦，但拒不划拨报垦地段，伊盟各旗也尽行效法。1904年1月，贻谷奏请清政府革撤了阿尔宾巴雅尔盟长职务，任命实行全旗报垦的乌审旗扎萨克察克都尔色楞署理盟长职务。在清政府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伊盟各旗才被迫开始报垦。乌兰察布盟各旗扎萨克对于光绪皇帝的谕旨和理藩院的飭令不予理睬。直到1906年贻谷血腥镇压伊盟准格尔旗丹丕尔的武装抗垦斗争以后，在清室肃亲王善耆派大员前来催令下，乌盟各旗才迫不得已陆续报垦。

乌伊两盟蒙古王公上层虽然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陆续开始报垦，但是蒙古族人民却坚决反对放垦蒙旗土地牧场，进行了激烈的抗垦斗争。在伊克昭盟各旗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抗垦“独贵龙”运动。乌审旗扎萨克察克都尔色楞实行全旗报垦以后，蒙古族人民组成12个“独贵龙”，设立总部，誓死抗垦到底，驱逐垦务官员，烧毁垦务档册，致使该旗垦务无法进行。杭锦旗以扎兰章京厂汉卜罗为首，全旗组织13个“独贵龙”，并与达拉特旗的“独贵龙”联合起来，上千人进行武装抗垦，击败垦务局300余人的武装护垦队。扎萨克旗的蒙古族群众，在该旗活佛旺丹尼玛的领导下，也组织了“独贵龙”，赶走垦务官员，捣毁垦务机构。郡王旗也在1904年爆发了额尔德尼格尔勒台吉领导的“独贵龙”，多次围攻垦务官员，驱逐地商，并与达拉特旗的“独贵龙”联合起来，杀死了一个前来承租土地的地主，而且力促该旗扎萨克郡王特古

斯阿勒坦呼雅克图向贻谷呈诉阻垦理由，收回了该旗官员私自租放的大部分土地。准格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领导的武装抗垦，把伊克昭盟乃至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抗垦运动推向了高潮。1904年，该旗在门肯吉雅等人的领导下，组织“独贵龙”，阻止放垦。同时由于对汉族农民久经垦熟的土地也要重新丈量，以搜刮押荒银，于是引起汉族农民反对。1905年夏，贻谷在该旗设立了3个垦务局，全面推行垦务。8月间，蒙汉群众联合起来围攻垦务局，驱逐垦务官员，焚烧垦务公文和帐册。随后，为了对付垦务当局的报复，丹丕尔将抗垦群众集中到他家住地胡鲁斯台（即南坪），挖壕筑堡，准备武器，并联络乌审旗“独贵龙”，进行长期的抗垦斗争。10月间，贻谷调遣清军，并强迫该旗扎萨克派官员和士兵相配合，包围胡鲁斯台，以炮火轰击。丹丕尔率众撤出驻地，与清军周旋作战数月。1906年初，清军偷袭丹丕尔驻地喇嘛洞，丹丕尔被捕押解到归化城，2月间，贻谷杀害了丹丕尔。准格尔旗各界群众将丹丕尔遗骨接回其家乡安葬，并将其画像供奉于寺庙，以供人们瞻仰祭奠。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抗垦斗争，最早爆发于苏鲁克旗。以白音大赉领导的抗垦武装，于1904年在彰武、靖安、洮南一带阻抗放垦，打击地方官府和地主团练，声势大振。1906年，在郭尔罗斯前旗又有陶克陶领导的武装抗垦发生，并向科尔沁右翼前旗、中旗，左翼中旗，扎赉特旗发展，袭击垦务人员，打击包租土地的富商大户，攻占醴泉、青阳等集镇，捣毁了垦荒局等官署，1907年还打死由清军护卫的日本测绘人员，成为声势最大的抗垦武装。另外郭尔罗斯前旗还有白音吐斯领导的抗垦武装，除了武装阻垦外，还打死5名日本特务。不久，白音吐斯被清军捕杀，余部并入陶克陶的队伍。在科尔沁右翼前旗还有牙什发动的抗垦斗争。他们建筑村寨，武装阻垦，并与陶克陶，白音大赉等抗垦队伍相配合，形成更大的抗垦力量。在扎赉特旗有绰克大赉领导的抗垦武装发展到三四百人，他们毅然杀死该旗主持放垦的梅令哈

丰阿，捣毁了放荒局。武装抗垦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抗垦斗争的主要特点，斗争激烈，规模宏大，影响广泛，使清政府大为震惊。1907年，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遣大批清军入蒙镇压蒙古族人民的抗垦武装。清军统领张作霖带十几个营的步骑清军，首先镇压白音大赉的抗垦队伍，白音大赉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科右前旗西北部的索伦山。张作霖接着在吉林、黑龙江两省清军和蒙旗武装的配合下，围剿陶克陶的抗垦武装，经数月激战，陶克陶也率部撤入索伦山。1908年2月，张作霖又进军索伦山，追剿这两支抗垦队伍。陶克陶率部转移到哲里木盟北部和中部各旗流动作战，白音大赉撤入牙什的村寨。7月，张作霖以重兵围攻牙什村寨，牙什和白音大赉先后被捕遇难。之后，张作霖以主要兵力追剿陶克陶的抗垦队伍，直到1910年4月，在清军和蒙旗王公武装的联合追剿下，被迫撤入俄国境内。东蒙蒙古族人民以极大的牺牲抗击了清政府的放垦蒙旗土地，压迫蒙古民族的暴行。这些斗争在东蒙各旗产生了巨大影响，唤起了蒙古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意识。以陶克陶为代表的东蒙蒙古族人民的抗垦事迹，被编为生动的传奇故事，以说唱形式流传至今。

20世纪初，内蒙古蒙古民族的抗垦斗争，不仅是内蒙古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应给以适当的地位。过去在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中很少提及，甚至根本不提这一历史事件。我认为不仅应当提及，而且应当给以准确的评价。

清末内蒙古蒙古民族的抗垦斗争，从表面上看，只是为了反抗清政府放垦蒙旗土地，似乎比较单纯。但是，如果把这一斗争放在当时中国社会总体中去考察，把它从蒙古民族问题的角度去探讨，就有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各种形式、不同内容的反抗斗争。据当时公诸报端的资料统计，到1909年各地发生的人民反抗斗争达130多起，到1910年增加到290余起。这些斗争的内容有抗税抗捐、抢米济荒、收回路矿利权、抵制美货、反对洋教等，参

加者有工人、农民、市民、学生。这虽然属于自发的反抗运动，但对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联合建立同盟会以后，从1906年开始领导发动了江西、湖南等省农民、矿工起义；1907年和1908年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了6次起义；1907年还在浙江发动了起义；1910年在广州发动了新军起义；1911年4月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就在这样的时刻，在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虽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活动并不多，但是爆发了遍及内蒙古的蒙古民族的抗垦斗争，在清朝统治全中国的后院着火了，对于清政府是个很大的震动。这场斗争表面看起来是反对清政府放垦蒙地，实质上是反对清朝在内蒙古实行所谓新政，反对清朝对蒙古民族的民族压迫。它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即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是相一致的，即使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应当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也是近代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标志。它不是局部的单纯的孤立的反抗斗争，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并与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一脉相承地发生、发展起来的。

二

如上所述，20世纪初，在蒙古民族中已经产生了反抗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的意识，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以抗垦为中心内容的反清斗争。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内蒙古地区有所影响，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也有所发展，但是在蒙古民族中反响极小，参加者更是屈指可数。于是出现了与蒙古民族上述反清斗争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在区内外或海内外读书的内蒙古青年首先接触到了民主革命思潮，并通过他们向内蒙古地区传播。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时候，也曾拟定在其

北部支部下设立蒙古分会，但是一直没有成立起来。不过同盟会已经注意到了在内蒙古发展工作的问题。最早由山西分会派王建屏、李德懋等来内蒙古西部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开展工作，主要在清军汉族官兵、地方绅士和青年学生、乡村会党势力以及破产农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发展会员。在归绥、包头、五原、丰镇、萨拉齐等城镇发展了一批同盟会员，开展了一定的革命活动。但是在蒙古族中加入同盟会者仅有云亨、经权等极少数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在沈阳读书的一部分哲里木盟的蒙古族学生，曾以蒙文学堂的代表参加过奉天省的学生代表大会，请愿召开国会。他们还在寒暑假回到家乡宣传民主进步思想，表露了反清意识，但无大的举动，也没有发现有人参加同盟会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北京等大城市也有部分就学的内蒙古青年，他们也接触了民主进步思潮。但是，他们在内蒙古的活动也极为有限，影响甚微。

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员云亨、王定圻、杨云阶等相继从北京、太原等地回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组织这里的同盟会员和革命力量，积极筹划反清起义。11月9日，清朝驻归绥以汉族官兵组成的口外8旗后路巡防，在同盟会的影响和策动下，由哨官张琳、曹富章等领导发动了兵变，沿大青山向西开往包头东北的石拐沟。这时，云亨、王定圻、杨云阶、郭鸿霖、经权等也到达包头，一方面在萨拉齐、包头、五原一带策动反清起义，一方面设法迎接归绥起义军进驻包头。当义军进入包头以后，五原厅同知樊恩庆及当地军政官员佯装欢迎革命军，于12月24日以宴请革命军为名，设置鸿门宴，杀害了张琳、曹富章、郭鸿霖等，云亨等少数人侥幸脱逃。这样绥包起义失败。与此同时，晋北地区的起义军，在革命党人弓富魁率领下进入大同。丰镇一带的农民军受同盟会的影响，并按弓富魁的指示，在农民军首领张占魁、武万义（蒙古族）、马有才（回族）带领下，于隆盛庄附近宣布起义，12月初向丰镇进军，12月16日攻入丰镇。23日，大同清军赶往丰

镇，24日清军占领丰镇，大批革命党人和起义者惨遭杀害。起义军撤出丰镇后仍到农村流动作战，但已失去革命党人的领导而归于失败。与此同时，在陶林、兴和、凉城等地虽然也发生过一些反清起义，不久也被清军和蒙古马队镇压下去。1912年1月，山西革命军在太原受挫，阎锡山率革命军撤出太原，经晋北、陕北展转进入内蒙古西部。丰镇、包头等地的革命党人前来加入山西革命军。1月12日，王定圻、李德懋等引导山西革命军进入包头，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遂成立管辖包头、后套、伊盟地区的临时性政权机构包东州，使内蒙古西部的革命形势略有好转。1月15日，革命军占领了萨拉齐，26日乘胜东进，拟取归绥。但在革命军东进途中，在刀什尔村与清军遭遇，经过激战，革命军受挫，遂撤到托克托厅。2月下旬，阎锡山放弃攻取归绥的打算，率军返回太原争夺山西督军位置。至此，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反清起义全部失败了。

同盟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在武昌起义后又发动了几起规模不等的反清起义，使内蒙古地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和辛亥革命有了积极的反映，这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对此，史学工作者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基本上弄清了史实，并作出了合乎实际的评述。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内蒙古地区的活动是极为有限的，其影响也是微弱的。其原因除了内蒙古地处边疆，比较闭塞，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弱点等等之外，在内蒙古地区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蒙古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无论从理论上、实践上或政策上，没有注意民族问题，或者说不懂得民族问题。这一时期，蒙古民族对于清政府对蒙新政表现出那样强烈的反抗，形成巨大的反清潮流，按理说这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参加者极少。武昌起义后，除了极少数蒙古族革命党人外，蒙古民族不仅没有参加反清起义，反而参与清军镇压革命军。山西革命军在刀什尔与清

军激战受挫，主要是遭到土默特旗蒙古武装的强烈抵抗。蒙古民族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表现的冷淡，没有投入他们领导的革命活动和反清起义，这与同盟会革命纲领中的民族主义内容不无关系。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里的“鞑虏”是指满族。而“鞑虏”一词是从“鞑靼”一词转化而来。“鞑靼”并非专指满族，在蒙古兴起以前，系古代北方部落名称，蒙古灭鞑靼之后，有时也称蒙古一些部为鞑靼。在广义的应用上，鞑靼有时成为中国北方诸民族的总称。因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蒙古民族中引起误解，认为要驱除蒙古。这大概是蒙古民族不能完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边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华一词当时实际上指的是汉族。当然，作为汉族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不过这也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族问题上显得过于偏狭。本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随后被孙中山先生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推翻满族贵族的政府。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在蒙古民族中宣传解释，实际上也没有把蒙古民族工作放在应有的日程上。这就是辛亥革命没有在蒙古民族中得到广泛响应，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内蒙古没有得到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三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内蒙古没有发展起来，尤其是已经具有强烈的反清意识的蒙古民族没有卷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这并不等于内蒙古地区是平静的。相反，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族运动潮流。1909年，清政府在外蒙古推行新政的时候，引起外蒙古蒙古族僧俗各阶层的不满，早已图谋外蒙古的沙俄也从中煽动，于是在1911年7月，外蒙古的王公上层举行会盟和秘密会议，决定外蒙古脱离中国而

独立，并派代表团赴俄国寻求支持和援助。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乘中国政权更迭之机，在沙俄策划下成立的蒙古“临时总理国务衙门”，于11月30日向清政府库伦办事大臣公署递交了“独立”文书，并限令清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务于3日内带文武官员离开外蒙古。12月28日举行了“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哲布尊丹巴“登极”仪式，以“共戴”为年号，正式宣布“大蒙古帝国”的成立。以后，在沙俄的全面支持下，占领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城镇，控制了外蒙古。接着又在1912年11月签订了《俄蒙协约》，实际上把外蒙古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

外蒙古的“独立”在内蒙古引起了动乱。正在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在沙俄的煽动下，呼伦贝尔各旗总管和官员会议，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提出脱离中国的5条要求，结果被清政府拒绝。这时，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名义，电告呼伦贝尔封建上层，要求他们响应外蒙古“独立”，沙俄驻呼伦领事乌萨蒂也进行策动。1912年1月间，呼伦贝尔封建上层举兵叛乱，进攻呼伦城、肱宾府，驱逐清朝当地驻军和官员，宣布呼伦贝尔独立，成立呼伦贝尔自治政府，隶属于所谓“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还任命呼伦贝尔叛乱头目胜福为“参赞大臣”、“大蒙古国”驻呼伦贝尔“总督”。俄国通过贷款、训练军队、支援武器、签订经济合同等办法，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控制了呼伦贝尔“自治政府”。这是沙俄企图吞并内蒙古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沙俄经过长期的策划，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培植了该盟副盟长、科右前旗扎萨克郡王乌泰为其发动“独立”“自治”的力量。1912年初，乌泰派特使到外蒙古联络，表示要联合哲盟10旗响应外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不仅赞同，而且给以武器弹药的援助，并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总司令”。乌泰经过一番准备，于8月间发动了所谓“东蒙古独立”运动，发表“东蒙古独立宣言”，明确表示反对共和，脱离中国，加入“独立”的外蒙古。乌泰发动武装叛乱，在东蒙制造了动乱。奉天都督赵尔巽派军队平息叛乱，乌泰等带残

部败逃外蒙古，东蒙古“独立”宣告破产。其他盟旗的王公上层虽有一些响应外蒙古“独立”的念头或举动，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足够动作的力量，对内蒙古没有形成全局性的影响。有些王公上层只身逃到外蒙古，参加了外蒙古的“独立”活动。当俄国和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团煽动内蒙古叛乱未成后，1912年底和1913年初，派军队分3路向内蒙古窜犯，企图以武力吞并内蒙古。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赶走了外蒙古叛军，粉碎了沙俄分裂内蒙古的阴谋。

外蒙古“独立”和内蒙古的动乱，与蒙古民族在20世纪初以来所产生的反清意识不是没有关系的。它虽然也包含着反清的因素，但也反对民国，反对共和，主张蒙古“独立”。这无疑是一场反动的民族运动。它既无民主的色彩，又无民族解放的意义，而是沙俄帝国主义长期策划下分裂中国的活动。对于蒙古族人民来说，既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统治，又要陷入沙俄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因此，这次的蒙古民族运动是蒙古封建上层在沙俄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发动的，与前述反垦斗争为中心的蒙古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不能相提并论。不过它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纲领及它们对待蒙古民族问题的态度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的偏狭和历史局限性，对于蒙古民族起了排斥作用，至少也成为蒙古封建上层和沙俄侵略者煽动“独立”的借口。虽然孙中山先生1912年1月1日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立场，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流产而无法挽回在蒙古民族问题上所造成的失误。这也是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意义的同时，应当予以总结的历史教训。孙中山先生以后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的正确主张，形成了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纠正了以前在民族问题上的偏颇与局限。

当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以后，袁世凯在蒙古问题上采取了与其维护封建统治相适应的政策。袁世凯竭力笼络蒙古王公贵族，以稳固其在内蒙古的统治。1912年8月19日公布《蒙古待遇条例》，其主要点：蒙古与内地一样，不以藩属待遇；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内外蒙古汗、王公、台吉世爵名位号，照旧承袭，其在本旗所享有之特权，亦照旧无异；蒙古王公的世爵俸饷从优支給。以后又采取了加进赞助共和之蒙古王公札萨克爵位等措施，并于1912年和1913年分别召开东西蒙王公会议，以软硬兼施的手段，使与会蒙古王公声明反对外蒙古“独立”，拥护共和政体，政府也答应保证蒙古王公固有的特权。同时对于参与叛乱的蒙古王公上层和旗民，只要来归，保护其产业享有，恢复其爵位。袁世凯政府的一系列笼络蒙古王公的措施，是为了稳固其在蒙古地区的封建统治，而且在与蒙古王公上层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合了起来，维护了蒙古封建王公制度，这自然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政府，为了维护它在蒙古地区的封建统治而对蒙古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而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就是说，不管哪一个政权要确立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和管辖，必须要有符合其政权性质的对待蒙古民族问题的相应政策。如袁世凯政府必须采取笼络蒙古封建王公上层的政策，相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应当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民族政策。总之，在内蒙古对一个革命的阶级来说，蒙古民族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采取正确的政策就可能成功，相反就必然失败。这就是辛亥革命与内蒙古政治为我们提供的启示。

辛亥革命与台湾人民

徐 萌 山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台湾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但是台湾人民奋起抗日，在祖国人民的支援下，官民一致地进行了顽强的抗日战争以阻止日军接收台湾，失败之后，又进行了3年的游击战争，直到1901年被残酷镇压以后，到辛亥革命前的10年间，出现了暂时平静、沉寂的状态。但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1915年的4年间，都连续爆发了9次武装反日斗争。后来由于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具备，因而台湾人民采取了组织政党、工会，“农民组合”、“文化协会”等团体进行了反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在整个50年中台湾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抗日爱国斗争，牺牲死难者共有65万之多。这就是50年台湾抗日爱国斗争的概况。在这个过程中，祖国的存在，祖国人民的支援，辛亥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 孙中山与台湾人民

孙中山先生是非常关怀台湾人民的命运的。他曾于1897年派兴中会会员陈少白到台湾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陈少白到台北后，首先找了老兴中会会员杨心如，并吸收了五六个会员，成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秘密进行了宣传和组织活动，并筹集了

徐萌山，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台盟中央评议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一笔革命经费。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认为“时机不可失”，决定发动惠州起义。他于9月28日抵达基隆，在台北新起町（今长沙街）建立起义指挥部。他在台湾筹措军械，指挥起义，并且经常与兴中会台湾分会同志接触，在台湾播下了革命种子。当时《台湾日日新报》也刊载了革命活动的报道，指出惠州起义的首领是孙逸仙。由于起义未成，中山先生在台停留42天后只得离开了。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8月5日，1918年6月14日，他又两次到过台湾。1924年11月离黄埔北上时，又曾停泊基隆港过夜。据随行记者回忆，“这时我们的总理有一个计划，就是到台湾，想和台湾同胞见面，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义，唤起民族意识，鼓舞爱国精神。”^①由于台湾总督府的多方阻挠，愿望无法实现。尽管如此，中山先生生前4次过台，在台胞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病危时，尚“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注意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②。孙中山逝世时，台湾同胞与全国人民一起沉痛哀悼。当时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在挽联中表达了悲痛心情及决心：“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③在上海的台籍同胞于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天，在发给台湾民报的《哀悼中山先生》的通讯中表示：“中山先生虽死，中山主义决不死；中山先生虽亡，民众运动决不失败。”^④在台北，爱国台胞冲破日本当局的种种阻挠，于1925年3月24日，隆重举行了2000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在悼词中号召：“中国的同胞啊！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啊！”^⑤第二年，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逝世周年纪念大会，由著名反帝爱国政治活动家蒋渭水先生支持，最后他宣传孙中山先生临终时的遗愿时连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这表明孙中山对台湾同胞的影响及台湾同胞对中山先生的崇敬是非常深刻的。

二 辛亥革命在台湾的具体体现——罗福星等领导的“光复台湾”运动

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予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影响和鼓舞，仅仅在1912年至1915年的4年中，较大规模的抗日运动就有9次，而这9次抗日斗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斗争目标都是“驱逐日寇，收复台湾”，并且每次斗争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辛亥革命有联系。

其中，罗福星为首的抗日运动是在同盟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罗福星是广东省镇平县高恩乡人，少时随祖迁居台湾，在苗栗牛桐湖庄居住。罗曾在苗栗公学校读过书，因不堪日人歧视和压迫，于1906年回到祖国大陆，在厦门加入同盟会，之后被派去爪哇、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担任中华学校校长并组织华侨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与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胡汉民、赵声等过往甚密。1911年黄花岗起义时，他从南洋赶往广东参加，在进攻广东督署时左手受伤，脱险后与胡汉民等前往南洋活动。辛亥武装起义时，他接到黄兴通知，要他在南洋招募义军回国，他招集了2000人率领回国，经过广州乘战舰北上到苏州，因南北议和而解散，自己转任为一所乡村学校的校长。1912年，他接受孙中山等人的指示回台组织抗日活动。在苗栗通过同学旧识罗璧壬、罗庆庚、邱义质等，开始在苗栗台北等地秘密发展革命组织。先后发展苗栗的谢德香、黄员敬、傅清凤、江亮能和台北的黄光枢为骨干，通过这5个主要骨干及谢阿鼎、梁芳、刘温通、简金山等人为招募员，分别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党各种名义，招募党员，并以江亮能为司令军长，下按旅、团、营、队、排、班进行军事编制。在苗栗设立支部，并在台北、桃园、彰化、台南、基隆及宜兰等地设立分部。他还令吴觉民在台北大稻埕大瀛旅馆设联络总站，作为同盟会指挥中枢。罗福星自己时

常往来中北部。当时，台胞深受辛亥革命的鼓舞，革命党人又以“驱逐日人、光复台湾”为号召，于是革命组织发展很快。据罗福星称，由彼募集者，总计1500余人，被捕时从他身上搜出的党员名册合计231人。黄兴还先后两次派人到台湾了解革命活动进行情况。

1912年11月间，罗福星在台中县东势角徐香家中，设革命机关，命徐香为募集员，共招集陈阿荣等85人，准备继续扩充实力，预定于12月间举事，先攻占南投，策应南北各地抗日革命起义。以事机不密，陈阿荣等重要干部遭日警逮捕，革命运动因而失败^⑥。

1913年3月15日，罗福星为扩大台湾抗日民族革命，在苗栗召开各地抗日志士大会，发表革命宣言，痛陈日本治台的虐政和台胞所受的痛苦，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配合辛亥革命，举行全省大起义，赶走日寇，收复台湾。宣言发表后，随即积极开展行动，受到台湾人民的拥护和响应，据说参加革命组织的达到9万余人。4月间，策动张火炉在台中组织革命机关，派黄炳贵、纪炯等为募集员，在大甲、铁砧山脚、下罕兰、大湖、南湖一带展开活动，募集志士，联络山胞，准备由台中厅之大甲和新竹厅之大湖同时发难，呼应全岛共同推翻日本暴政。不料被人告密，致第二次革命行动又失败。

同年4月，罗福星更于台南策动李阿齐组织革命机关。并以五甲庄为基地，招募同志，结合山胞，参加者甚多，预定在农历十月举事，计划经关帝庙向台南进攻，罗福星则发动中、北部同志响应，预期一举推翻日人的统治。终因事机泄露，日警先发制人，将李阿齐等主要人物逮捕，以致抗日民族革命运动再次失败。

罗福星虽连遭失败，但并不气馁，继续在台中策动赖来发动民族革命。赖来在1912年曾和谢金石到上海停留数日，看到祖国革命成功，非常兴奋，是年回台湾，加入罗福星所领导的革命组

织，暗中在台中进行抗日活动。1913年12月1日，赖来等数百人在葫芦墩（今之丰原）起义，由赖来任指挥，詹墩任副指挥，向东势角支厅进攻，砍死了2个日警，但赖和詹都先后阵亡，第四次革命行动又告失败。

台湾总督府得讯，异常震惊，下令逮捕革命党人。是年12月18日，罗福星在淡水被捕，同时被株连的达1200多人。1914年3月3日罗福星等革命领袖在台北监狱英勇就义。在他被捕时为敌人搜去的《手记》里充分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情绪，如“为国家雪耻，为同胞报仇”；“今我为革命而死，何妨杀身碎骨，我一人虽死，尚有十二志士为我报仇，可断言，今后日人无宁日也！”在就义那一天，他神色不变，从容高歌《祝我民国词》和绝命词，其《祝我民国词》内容如下：

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国体苞桑气运昌。
孙直国手著先唐，逸乐丰神久既彰；
仙客早传灵妙药，救人于病身相当！

此词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为“中华民国孙逸仙救”。^①

三 辛亥革命影响下台湾同胞再次 掀起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辛亥革命对台湾一般老百姓的影响是很大的。当台湾人民获悉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著名台湾爱国学者陈文彬教授曾经说过，当时上海发行了对开的和四开大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画像和武昌起义的图片，在台湾城市和乡村都很畅销。他说当时他8岁，在家里看到一张彩色图，他母亲告诉他：“唐山起革命，清朝已经倒了，咱祖国没皇帝了，是个共和国了。”并说了孙中山的故事，“这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半个世纪后还能明显地回忆起来”。台湾文化协会

领导人王万得先生也说过：当时台湾社会各阶层人民，连一般家庭妇女和儿童都知道辛亥革命了，人们把这个重大事件概括成三句话：“唐山发生了革命，‘漩桶’已经退位，孙逸仙做了大总统。”“漩桶”和“宣统”二字谐音，是“尿桶”的土语。台湾人民故意把“宣统”读成“漩桶”，以表示对清朝统治者的痛恨和蔑视。他还说台湾的中文私塾小学生很喜欢念上海新出版的《新三字经》。这书开头四句是“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不仅对台湾一般人民的鼓舞很大，而且对于台湾此后几次较有组织的反日武装起义更有深远的影响。

从1911年到1915年的4年间，打破了过去10年的暂时沉寂的状态，连续爆发了9次武装反日斗争，即1912年3月，刘乾领导下的林杞埔起义（竹山）；同年6月黄朝领导下的土库起义（嘉义），1912年10月到1914年3月，罗福星领导下的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即苗栗事件）；1912年11月以陈阿荣为首的抗日活动（台中南投）；1913年4月张火炉领导下的太湖反日活动（新竹）；1913年6月，李阿齐领导下的关帝庙反日活动（台南）；1913年12月赖来领导下的东势角起义（台中）；1914年5月罗阿来领导下的六甲起义，1915年7月余清芳为首的噍吧嘍起义；同年7月，又爆发了响应噍吧嘍起义的杨临新庄反日活动。此外高山族同胞也参加了这个时期各地人民的反日斗争。所有这些斗争再一次形成了武装反对日本、收复台湾的新高潮。

与辛亥革命直接有关的罗福星及同他有关的五次起义事件在前面已作介绍，现将间接有关系的起义事件分述如下：

（一）刘乾领导下的林杞埔起义

1907年北埔起义之后，经过5年的革命低潮，终于1912年3月又爆发了林杞埔起义。领导人刘乾，是南投厅沙连堡羌仔寮庄人，因受辛亥革命成功之激励，决心从事革命，与林启祯结合乡民数百人于3月23日袭击距林杞埔（今南投县竹山镇）约10里

之顶林派出所，杀日警3人。终因日警搜捕，刘乾与林启祯等8人被捕处死。

(二) 黄朝领导下的土库起义

黄朝，嘉义大牌头庄人，与同志黄老钳同为受人雇佣的苦力，早有结合同志推翻暴政之念。辛亥革命成功，立刻把他们的革命行动向前推进一步。1912年6月27日，黄朝鼓动信徒起事反日，不幸因被人告密而败露，黄朝等遭日军逮捕，后被处以死刑。

(三) 罗阿头领导的六甲起义

罗阿头（又称臭头），嘉义县店仔口支厅南势庄人，素具民族意识，仇恨日人，与罗狮、罗陈兄弟及陈条荣等结盟，募集同事，准备于1914年农历7月起事，不幸革命行动为日警侦悉，罗阿头以事急乃于5月7日夜率同志进攻六甲支厅，途中与日警发生枪战，终因弹尽援绝，自杀于山中，被捕者多人。

(四) 余清芳、罗俊、江定领导的西来庵起义（噍吧嘽起义）

余清芳，原是阿缙（今屏东）人，家道清贫，少年时代曾当学徒挣钱奉养母亲，后来一度任过日本的巡查补（即下级警员）。因受到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又亲身体验到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人民的野蛮统治和残酷奴役，于是愤然辞职，搬家到阿公店（今冈山）后乡居住，和一些同志们密谋驱逐日寇，光复台湾。他的主要同志有台南竹头崎庄江定、由大陆回台的罗俊（接受辛亥革命影响，带6人回台）、台南苏有志、大潭庄郑利记、阿店程庄张重三，还有苏登科和苏东海等人。经过长期的酝酿，于1915年2月，余清芳和江定才正式拟定了起义计划，除由罗俊、苏有志、郑利记出面，以修建台南市的“西来庵”为名，向台湾各

地的“菜堂”(即斋堂)募捐,作为起义军费外,并发动台湾人民群众,准备和日寇斗争。余清芳被推为大元帅,以“大明慈悲国”的大元帅名义,并暗中以孙中山先生为最高领袖,秘密发表文告。文告发表后,台湾各地,特别是台南、台中、南投、嘉义、阿猴等地人民,纷纷参加起义组织,声势浩大。1915年5月25日,因苏东海身份暴露,为日警逮捕,接着罗俊在嘉义山中被捕,余清芳得此消息后,立即带领同志们到台南东北部山中噍吧哖(今玉井)提前发动起义,进袭日警支厅和派出所,毙日寇近百人。起义军占领了噍吧哖附近的虎头山高地与日军对战,终因武器不如,形势不利而失败。据日本殖民主义者发表的材料中说,余清芳等被处死刑者达866人,但实际不只此数。日寇竟然惨无人道地把噍吧哖附近的20几个村3000多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加以屠杀,死状极惨!此役义兵死难者达万人以上,系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所发生的一次最惨烈的抗暴斗争。这也是台湾同胞永远不能忘怀的一次起义斗争!

四 台湾志士在祖国大陆参加辛亥革命

台湾同胞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不仅在台湾与日本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同时也十分关心并积极支持或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运动。

(一) 黄花岗起义时出钱出力,而且流过血。

在台北的同盟会员林薇阁、蔡法平关注大陆的革命。1910年同盟会第十四支部部长林文(时境)应黄兴电邀,决定率领19名同志由日本前往广东参加起义,但无旅费,乃派人前往台湾请林、蔡二位同志设法,林薇阁立即捐献日币3000元,有了这笔款,林文、林觉民等志士才如期赶到广州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黄花岗起义。

除了捐款之外,台籍志士并奋勇参加革命战斗。根据已发现

的文献资料证实，最少有2位志士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一位是罗福星；另一位是台南籍的许赞元，他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的次子，著名作家许地山（笔名落花生）的胞兄，当时22岁的许赞元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被捕后得救出狱，被称为“黄花岗生还的义士”。

（二）武昌起义后参加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当时在日帝统治下的台胞非常兴奋。（10月19日）澎湖渔民章吉辅最先驾危舟，突破日军游弋耳目，渡海投效祖国革命。其后继之而投效祖国者，日有数起。

罗福星在黄花岗起义脱险后转移到南洋，在武昌起义时黄兴通知他从南洋召集义军回国报效，他很快地召集了2000人，并率领回国，但到了苏州后就奉命解散了，他后来回到台湾组织抗日爱国斗争，于是而有1913年的苗栗事件发生，详情见前述。罗福星确实是个对辛亥革命有较大贡献的台籍革命英雄。

（三）武昌起义后，黄兴在南京发起“国民捐”，台盟同盟会员翁俊明等号召台籍同志慷慨解囊很快捐到了2000元。1913年，翁俊明偕杜聪明北上，计划毒毙袁世凯。事虽未成，却显示了台胞对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热烈响应。

（四）林祖密与护法运动

林祖密是台湾台中望族，雾峰林家子弟，当日帝占领台湾后，他登舟内渡，回到了祖籍福建漳州。此后他一方面创办华封疏河公司，为地方建设作贡献；另一方面秘密赞助革命运动，如对辛亥福建的光复及“民四讨袁”之役，均曾有所赞助。1917年，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州，倡导护法，各省响应。林祖密决意在闽南响应。经过联络，孙中山正式委任他为闽南军司令，负责闽南护法军事的进行。林受命后即设秘密机关于鼓浪屿，派人到各县布置，组织民军，并组织了两个县的起义，使粤军进军闽南建立了新的革命基地。1921年林被调任为大本营参议，随孙中山入桂，参与戎机。1922年林祖密被任为福建省水

利局长。后辞职回国养病。1925年7月2日，由于他是坚贞的革命信徒，被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下张毅围捕，于同年8月23日慷慨就义。

林祖密虽是为革命捐躯了，但他的子嗣继承了他遗志，继续参加了革命的行列。“一门忠勇”的革命世家，正是伟大爱国精神的反映。

(五) 有些回到大陆定居的台胞参加了各地的革命活动，有的还加入了各地同盟会。如日本占领台湾后迁回厦门的徐明山加入了同盟会，在厦门同文书院任教的徐屏山，由于“受他哥哥徐明山的影响和鼓励，有意识、有计划地在编写讲义、讲课，甚至与学生接触时，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并积极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学生运动^①。厦门的台湾同胞郑友福、泉州的台籍同盟会员陈春木，以行医为掩护，积极参加当地革命活动，民国初年还积极参加了反袁斗争^②。

(六) 台湾爱国史学家连横与爱国诗人丘逢甲，在宣传反清爱国思想方面也起了一定的影响，有人认为他们“都对同盟会的活动作了桴鼓之应”^③。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后，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是互相支持、战斗在一起的。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台湾与大陆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

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之际，回忆起当年台湾人民响应辛亥革命的号召，发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为“驱逐日寇，收复台湾”，为祖国强盛而前仆后继，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确实令人敬佩，深受感动。现在驱逐日寇、光复台湾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尚未完成，我们相信在台湾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一定会继承先烈们的意志，在今后的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作出新的贡献。

^① 戴季陶：《孙中山与台湾》见黄季陆：《有关台湾与中国革命史料》。

《传记文学》11卷第五期27页。

- ② 庄政,《国父与台湾》,台湾《中央日报》1980年3月17日。
- ③ 《国民革命与台湾光复图辑》,《近代中国》19期,第36页。
- ④ 李云汉:前引书61页。
- ⑤ 李云汉:前引书62页。
- ⑥ 《国民革命与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第21页)。
- ⑦ 《国民革命与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第26页)。
- ⑧ 丘彦竟,《辛亥革命在厦门》(原稿本)。
- ⑨ 丘彦竟,《闽南倒袁运动记》(未刊稿)。
- ⑩ 同④,第23页。

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

刘蜀永

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不能不提到香港，因为香港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之地，是孙中山及其战友建立革命组织、筹集革命经费、从事革命宣传和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基地。孙中山及其战友在香港的革命活动，是香港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绚丽篇章。

一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地

1883年11月，孙中山17岁的时候，他到香港拔萃书室读书。第二年4月转入中央书院。在中央书院就读期间，曾前往檀香山半年。他于1886年秋离港前往广州，到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科学学校学习。1887年秋，他返港进西医书院就读，1892年7月毕业。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的时间包括中学2年、大学5年，合计7年。这7年时间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

1883年孙中山因在家乡香山县毁坏庙内偶像，招惹乡绅愤怒，被其父送往香港读书。当年11月他进入拔萃书室(Diocesan Boy's Home)。该校由香港首任维多利亚会督司蔑(George Smith)创办，后来成为香港一所著名的英文学校。孙中山在该校读书时间不长，仅一个月即辍学。

1883年底或1884年初，美国纲纪慎会传教士喜嘉理牧师

刘蜀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Rev. Hager)在香港为孙中山及其好友陆皓东施行了洗礼。孙中山在教友登记簿上署名“孙日新”，取日日更新之意，出自《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后来其师友区凤墀牧师又为其起名“逸仙”，是“日新”二字的广东话读音。

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转入香港著名的官立中学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就读。他注册的学号为2746，姓名为孙帝象，住址为必列者士街(Bridges Street)2号，年龄18岁。^①中央书院创办于1862年2月，1889年改称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改称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后一校名沿用至今。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何启、胡礼垣、谢纘泰、王宠惠、陈锦涛等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中央书院的学习内容原来是中英文并重，但到孙中山入学时，在高年级课程中已取消了中文。该校课程中对西方历史、特别是英国历史的介绍比较深入。该校1886年参加剑桥大学初级和高级考试的试题中，要求学生说明处死查理一世是否正确，詹姆士二世为何丧失王位等问题。^②可以判断，中央书院的教材中包含了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情况的介绍。这种教学内容对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一定产生过积极影响。

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读书期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当时香港的中文报纸《华字日报》、《循环日报》、《香港中外新报》、《维新日报》等一致谴责法国的侵略行径，对战况不断有详细的报道。孙中山得知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捷报频传的情况下，清政府竟签订和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葬送了胜利成果，又耳闻目睹香港中国工人拒修法国军舰、拒卸法国货物的爱国行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后来回忆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③说孙中山当时已有创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志向，可能有夸张的成份，但说他萌生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思想是可信的。

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肄业之后，曾经考虑学习军事，这可能与

中法战争的影响有关。但由于国内马尾船政学堂被毁等原因，他未能如愿。孙中山认为“医亦救人之术”，因而选择了学医。经喜嘉理牧师介绍，他于1886年秋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科学学校。孙中山曾回忆说：“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④这所英文医校即著名的香港西医书院(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系五年制医学院，1887年10月1日由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等一批外籍医生在何启参与下创办，目的在于培养华人医生、护士，在中国传播医学。

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设置与英国各医科学学校相似。该校第一学年设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物理学及临床诊察等课程。第二学年除继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外，增设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等。第三学年实习增多。第四学年增设法医学、公共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第五学年则注重医学、外科、产科之深造。西医书院的教学尽量配合实践活动。学习植物学时，学生多次前往植物园参观。学习化学课时，教师通过实验进行演示，暑期学生还亲自到化学实验室动手操作。西医书院的教师大部分是在香港的外籍医生，获得过博士或硕士学位，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临床经验。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首批学生之列。他天资聪敏，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1887年同时入学的12人之中，到1892年能够毕业的仅剩孙中山、江英华两人，而孙中山的成绩又大大超过了江英华。他在12门功课中，“H”(Honours，即优良成绩)10门，“P”(Pass，即合格成绩)2门，而江英华的成绩为“H”6门，“P”6门。孙中山在医学、产科、卫生与公共健康学等课程的考试中皆名列第一。

孙中山的求知范围广泛，除了课本知识，他很早就注意救国利民的其他有用知识。1890年，他在给郑藻如的信中曾说：“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

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⑥他在西医书院的同学关心焉回忆说：“总理[孙中山]在院习医科五年，专心致意于学业，勤恳非常。彼于日间习读医学，夜则研究中文，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但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后乃知其思想受此二书之影响为不少也。”^⑦

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进步哲学思想，与其在西医书院受到的严格的科学知识教育不无关系。他在论证其“知难行易”学说时，曾举十例为证，而在“以饮食为证”时，涉及到的生理学、医药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等，皆为他在西医书院认真研讨过的学科。^⑧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曾在香港大学发表讲演。在回答他“于何时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这一问题时，他说：“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至于如何得之，则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则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在回答该问题时，他还谈及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他说：“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⑨

外国学者卡梅伦曾对孙中山的这次讲演加以评论说：“他的讲话表现出他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他显然没有注意到，香港华人的状况不是有保障，而是没有保障。对大多数华人而言，在不同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竟来源于他对香港发生的事情莫名其妙的错误理解，这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时候，香港在很多方面大概与中国本土一样腐败，而且表面上的秩序井然实际上是少数人对没有发言权的多数人进行的地地道道的殖民控制。”^⑨卡梅伦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孙中山的讲演在某些方面脱离了历史实际，存在片面的溢美之词。从香港历史上看，贪赃纳贿是长期困扰香港社会的严重问题。以1897年6月2日破获的私开赌博大案为例，就有英籍帮办、警官、书记官以及警察、通事一百余人因受贿被判刑或革职。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孙中山的讲演在某些方面又反映了历史实际。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22岁时“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⑩康有为对香港的印象与孙中山的认识非常接近，这说明香港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在当时已经获得相当成就，使身临其境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把香港的进步与发展与封建统治下中国内地的停滞和落后加以比较，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城市建设和管理角度反映出的香港的发展和进步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英国通过对中国内地的侵略和榨取积累了财富；一方面是由于采取了比较开放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香港的发展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比的进步性，对中国近代史上仁人志士的思想触动很大，使他们立志学习西方，改造中国，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奋起斗争。这种客观的历史作用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十分明显。

二 香港兴中会

香港兴中会的建立具有较好的思想和组织基础。该革命团体建立以前，香港即有两个爱国政治小团体。一个是以“四大寇”为中心的小团体，一个是辅仁文社。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已充满革命言论。同学关心焉之母黎氏在雅丽氏医院任英文翻译，平素善待孙中山，常邀其到家中与儿辈同游共食。关母见孙中山言论激烈，曾问道：“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中山回答道：“不！”“想做钦差吗？”又答：“不！”“然则想做皇帝吗？”孙中山则答道：“皆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做皇帝更高更大了。”^⑩ 陈少白曾回忆说：“他进校以后，天天谈革命。”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洪秀全”。“因为孙先生平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⑪

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尤少纨）、杨鹤龄等3人当时人称“四大寇”。孙中山回忆其大学生活时说：“数年之间，每于学课馀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⑫ 关于“四大寇”名称的由来，陈少白解释说：“初杨鹤龄与尤少纨同学，既至港，在杨处识予，后由予介绍之于孙先生，每遇休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盖有慨乎言之也。时孙先生等尚在香港医学堂肄业，而时人亦以此称之……”^⑬

陈少白(1869—1934)广东新会人。本名闻韶，字葵石，后因服膺家乡先辈、明代著名哲学家陈白沙，易名白，别名少白。他是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第一期学生。他因事去香港，经区凤墀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两人一见如故，谈时局，谈革

命，意气相投。后来孙中山劝陈少白学医，并介绍他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他俩在校拜盟为兄弟。孙中山对同志称“吾弟”的，只陈少白一人。

尤列(1864—1936) 广东顺德人，别字少纨。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祖、其父著述甚丰。尤列早年曾加入洪门会党。在广州算学馆毕业后，历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中文秘书等职。一日尤列前往杨耀记商号访杨鹤龄，遇孙中山等友人在该处。孙中山高谈时事，意气激昂。尤列指着孙中山说：“诸君未见洪秀全。此人之头脑即与洪秀全同样矣。”孙中山亦指着他说：“你是游开智。”游开智当时为广东巡抚，尤、游同音，孙中山故出此谑言。次日孙中山路遇尤列，邀至威灵顿街杏燕楼西菜馆小叙。孙中山说：“昨日之言，幸暂守秘密。我前在檀香山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开通，无从著手，今幸相遇，便是同志，彼此次第斟酌进行可也。”尤列说：“既如此，我只望成事，谁居其功不计也。”^④

杨鹤龄(1867—1934) 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家世豪富，性情豪放不羁，喜戏谑。因与孙中山同村，两人结识最早。杨家在香港歌赋街8号开有杨耀记商号。杨鹤龄曾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的场所。孙中山亦曾下榻其间。杨耀记商号实际上成为“四大寇”等革命青年的政治俱乐部。

与“四大寇”一起谈论国事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王孟琴、何隆简、杨迺安等人。陆皓东(1867—1895)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孙中山少年时代同学。后在上海任电报翻译生，但每次由沪返粤途经香港，总要与“四大寇”聚谈。郑士良(1863—1901)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字弼臣。少年时代从家乡父老练习拳技，与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来，渐具反清复汉思想。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科学学校与孙中山同窗，两人谈论革命，十分投缘。他曾表示，他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可为孙中山罗致会党以听指挥。孙中山赴香港西医书院就读后，两人来往仍很

密切。孙中山曾说：郑士良“时来加入四大寇之列，及交愈稔，始悉彼为三合会头目之一。于是赖以得知中国向来秘密结社者之内容，大得为予实行参考之资料。然予由谈论时代入于实行时代之动机，则受郑君所赐者甚多也。”^⑩

辅仁文社是一个爱国进步团体，该社的英文名称为Chinese Patriotic Mutu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中华爱国互助促进会)。该社1892年3月13日在香港结志街百子里1号二楼设立总部。辅仁文社的纲领共有6条：1.磨砺人格、臻于至善；2.不得沉溺于当世之恶习；3.为未来中国青年作表率；4.以多途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5.精通西学；6.以爱国者自励，努力扫除吾国出现之乖误。^⑪该社的座右铭是“尽心爱国”。谢纘泰在《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说：“我在皇仁书院念书时，我结识了一些校内的有出息的爱国年轻人。这使我开始醒觉到，计划组织一个中国亿万人的革新运动，一个驱逐满洲鞑鞑篡夺者的运动正是时候了。”“在我的十六个朋友中，取得我的信任并且知道我的秘密的主要是杨衢云、陈芬、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和刘燕宾。对其余的都仍保守秘密，因为，当时公开鼓吹革命是太危险了，而且在香港这块殖民地到处是广州清政府的谍探人员。”^⑫《辅仁文社序》称：“兹我同志七人，以此社名曰辅仁文社，……”^⑬尤列在1927年撰写的《杨衢云略史》中说辅仁文社社员为16人，社长杨衢云。^⑭尤列本人与辅仁文社社员交往密切，他的记述也值得注意。从上述史料分析，可能辅仁文社创办时仅有社员7人，即杨衢云、谢纘泰、陈芬、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和刘燕宾，后来逐渐发展为16人。杨衢云、谢纘泰是该社的主要人物。

杨衢云(1861—1901) 福建澄海(今龙海)人，原名兆春，字合吉，号衢云。祖父杨福康曾任广东肇庆府经历，署理新兴县知县，因读《荆驼逸史》，有所觉悟，弃官出国，居槟榔屿。父亲杨清河生于槟榔屿，16岁回原籍补习汉语，21岁至香港，历任巡理厅及辅政司通事、书院教员等职。杨衢云自幼随父读书，14岁

入铎也船厂学习机械，不慎出事故，遂转学英文。20岁毕业后，先后任圣约瑟书院英文教员、招商局书记长和新沙宜洋行(David Sasson, Sons & Co.)副经理。新沙宜洋行是英商在香港开办的一家轮船公司。

1892年秋，罗文玉在上环寿而康酒楼设婚筵，辅仁文社同仁皆至，尤列亦应邀出席。尤列与杨衢云倚栏交谈。杨衢云谈论政治改革，并谈及祖父读史弃官出国之事。尤列说：“得之矣！君所尝发挥者，政治之改革耳。乃令先祖读史弃官之意，君知之乎？”杨问：“何如？”尤列说：“不有种族问题在耶！弃官者，不为满清奴也。”杨豁然省悟：“我亦得之矣，如梦初觉矣！”待酒阑人散，杨衢云询问尤列寓所。尤列答道：“歌赋街杨耀记杨君鹤龄所，与孙君同居。”杨即随尤列同归，与孙中山相见甚欢。此次杨尤、杨孙会见是辅仁文社与“四大寇”建立政治联系的开端。此后杨衢云常至杨耀记商号或西医书院与“四大寇”聚谈，至则抵掌而谈，达旦不倦。②

杨衢云为人仁厚和蔼，但任侠好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关心焉在回忆杨衢云与“四大寇”的交往时，对杨的见义勇为、抱打不平有生动的叙述：“有杨衢云者，在招商局任英文书记职，每夜亦必来谈话。其人善拳术，好打不平，固一纠纠武夫也。当时大马路上酒巴林立，常有海陆军人醉酒闹事，每凌辱殴打中国人。衢云见之，辄挥拳愤击醉兵，无不应手而倒。屡被警察执送警署，则又辄自称‘自卫’而得免罪。每遇事一次，被释后必来医校详细报告，慷慨激昂。常云，外人待我不平，同胞必须发奋图强。其所以致此，皆因满胡压逼汉人，不能致中国于强盛，故受外人欺侮也。于是每谈必申述《扬州十日记》等惨史。听者莫不义愤填膺，而他们几个人的革命情愫愈为紧张了。”③

谢纘泰(1872—1937) 广东开平人，字圣安，号康如，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市。其父谢日昌在澳洲经商数十年，是泰益进出口商号老板。其母郭氏是在南半球登陆的第一位中国妇女。谢日

昌隶三合会籍，立志反清复明。谢纘泰约12岁时，其父即向他讲述满族统治者残暴征服中国的故事，使他立下誓言，长大以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推翻清朝统治。他在澳大利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并在当地格腊弗顿中学接受教育。他1887年15岁时随母亲回国，至香港定居，入中央书院读书。1890年结识杨衢云，两人志同道合，以开通民智为号召，发起组织辅仁文社。

1893年初冬，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南园内之抗风轩，孙中山与其同志秘密聚谈，有尤列、陆皓东、郑士良、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魏友琴等出席。孙中山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人皆表赞成，但未制定会名。次日尤列返港，向杨衢云谈起此事，杨亦表示赞同。^④但成立团体之事，当时并未实际进行。

1894年6月，孙中山抵达天津，投书李鸿章倡言改革，未获接见。上书失败，又在京津目睹清政府之腐败，使孙中山义无反顾地走上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何宽、李昌、邓荫南等20余名华侨出席了成立会议。孙中山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痛陈“庸奴误国”、“列强环列”的危急形势，呼吁“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声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⑤

1894年冬，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接连失利，日军攻入辽东腹地，并占领了大连、旅顺。孙中山好友宋耀如认为出现革命良机，函促孙中山迅速归国。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抵达香港后，即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人，筹建香港兴中会。孙中山与辅仁文社杨衢云早有交往，素知杨衢云、谢纘泰等平日宗旨相同，与之商议，他们欣然同意建会。辅仁文社社员入会的还有周昭岳。初期陆续入会的还有黄咏商、区凤墀、余育之、徐善亭、朱贵全、丘四等数十人。香港兴中会会员包括

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商人和会党分子，他们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

1895年2月21日，香港兴中会举行成立会。《香港兴中会章程》规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因而，香港兴中会亦被称为香港兴中会总部。该会会所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外悬“乾亨行”商号招牌做掩护。“乾亨”二字系黄咏商所定。黄咏商系广东香山人，其父黄胜为香港立法局议员，与何启有戚谊。何启介绍黄咏商与孙中山结识，黄因而加入兴中会。黄好读《易经》，研究甚深。他认为，物极必反，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清朝皇位覆亡在即。“乾亨行”命名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义。

《香港兴中会章程》比《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周详和深刻。《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强调外患的严重：“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⑤该章程对清政府的揭露却比较简单和笼统，仅有“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寥寥数语。《香港兴中会章程》同样强调外患的严重，但对清政府的揭露却比较具体和尖锐：“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⑥《香港兴中会章程》把矛头鲜明地指向朝廷和官府，实际上是发出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号召。香港兴中会会员入会时，须高举右手对天宣誓。其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⑦他们秘密宣读的誓词明确反映出他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体现出兴中会的革命性质。

香港兴中会成立时，由黄咏商担任临时会长。1895年广州起义前选举正式会长时，孙中山一派与杨衢云一派发生纷争。孙中

山顾全大局，将会长职务让给杨衢云。1899年冬，孙中山派毕永年、史坚如等赴汉口，邀鄂、湘两省哥老会各龙头赴香港开会。郑士良亦号召广东三合会首领到会。当年11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代表12人在香港聚会，成立兴汉会，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并派宫崎寅藏赴日将总会长印信送给孙中山。杨衢云闻讯后，为避免革命队伍分裂，主动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此后兴中会会长一职即由孙中山担任。

三 兴中会时期的武装起义

香港兴中会的成立使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由谈论革命阶段进入实际行动阶段。革命党人以香港为基地，发动过多次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从1895年香港兴中会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间，孙中山直接策划的南方10次武装起义，就有6次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的。此外，兴中会会员谢纘泰策划的洪全福广州之役也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的。兴中会时期在香港策划的武装起义计有乙未广州之役、庚子惠州之役和洪全福广州之役。

乙未广州之役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不久，革命党人即着手筹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1895年3月13日、16日和21日，孙中山、杨衢云、谢纘泰、黄咏商等多次在“乾亨行”秘密聚会，讨论攻占广州城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得到改良主义思想家何启、《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homas H. Reid)和《士蔑西报》编辑邓肯(Chesney Duncan)等人的支持。8月29日，孙中山、杨衢云、谢纘泰、黄咏商、陈少白、何启、黎德等在杏花楼酒家聚会，讨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政策，决定由何启担任发言人。黎德答应争取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0月9日，黎德和英人高文(T. Cowen)代

起义者起草致列强宣言，由何启和谢纘泰加以修改。

兴中会总部决定当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阳历10月26日)举事，利用广东重阳节扫墓的习俗，使起义人员得到掩护，顺利进入广州城内。起义准备工作分两头进行。孙中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在广州建立兴中会，设立秘密机关，联络绿林、民团、会党、防营及水师，还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杨衢云、黄咏商、谢纘泰等在香港筹措军饷、制造舆论、购运枪械与招募会党。孙中山本人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陆皓东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旗帜。起义战士每人领红带一条、警哨一个作为标记，口号是“除暴安良”。

孙中山特别倚重的是汕头起义士兵和香港特遣队。他曾回忆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完全取决于汕头士兵能否越野行军一百五十多哩前来和我们会合，从香港来的一支特遣队又能否及时赶到。”^②倚重汕头部队的原因在于，汕头与广州相距不远，但两地语言不同。万一其他起义部队中途溃散，此军特征明显，在广州难以存身，只能背水一战。至于香港特遣队，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两广总督李瀚章广招士兵有关。停战后他遣散3/4的军队，并未妥善安置，许多士兵沦为盗贼。兴中会乘机活动，将若干士兵收为己用。散居于新安县深圳、盐田、沙头等地的退伍士兵200名，全数加入了兴中会，由朱贵全带领在九龙集中，构成了香港特遣队的骨干。

10月26日，参加起义的绿林首领、军队首领和民团首领纷纷前往广州农学会总机关领取口号、命令，但孙中山已于25日收到汕头部队领导人电报：“官军戒备，不能前进。”他临时决定改期，并电阻香港特遣队勿来。此时起义的消息已通过多种途径泄露出去。清廷驻港密探韦宝珊已将朱贵全在港集合队伍的消息电告粤吏。此外，兴中会会员朱淇之兄、举人朱湘恐受连累，亦向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两广总督谭钟麟闻讯立即调集军队回省防卫，并于27日派人前往革命党人设在王家祠、咸虾栏等处的机

关，捕获陆皓东等6人。

在香港方面，接到孙中山电报时，枪械已装入5个水泥桶伪装货物交省港班轮“保安”轮待运。若将其起回，反易败露。杨衢云只得复电孙中山：“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27日晚，朱贵全、丘四率香港特遣队400人登轮启程。启碇后，他们发现船上货物移易位置，藏匿枪械的水泥桶被许多杂货箱积压，一时无法取用。28日保安轮抵达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及缉捕统带李家焯已率兵在码头严密截缉。起义士兵手无寸铁，失去抵抗能力。先登岸者45人当场被捕，后登岸者毁弃标志，得以逃遁。

此役殉难者有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他们成为最早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身的烈士。其中陆皓东表现尤为英勇。面对清吏的严刑审讯，他仍在供词中痛陈清朝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和外人之阴谋窥伺，慷慨悲壮地宣称：“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此次举事失败后，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布告示：“现有匪党，名曰孙文。结有匪党，曰杨衢云。起义谋叛，扰乱省城……”广东提刑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衙门悬赏缉拿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16名革命党人，其中孙中山的赏格达花红银1000元。^②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被迫经香港逃往日本，杨衢云则逃往南非。香港英国当局也于1896年3月4日向孙中山发出“解票”（即驱逐令），宣称：“孙逸仙危及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自给票日起计，以5年为期，不准在本港及所属地方驻留。”^③

乙未广州之役虽然失败了，但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当时日本报纸上出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等字样，孙中山逐渐成为国内外的知名人物。

庚子惠州之役

惠州距香港不远，且地处东江交通要冲。得惠州以取广州，

有高屋建瓴之势。兴中会将其作为第二次起事的地点。1899年末和1900年初，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等在香港联络绿林、会党首领，筹划惠州起义，工作颇有成效。1900年4月26日，杨衢云东渡日本，与孙中山商议大举。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如火如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孙中山认为“时机不可失”，遂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乘法轮印度号(Indus)离开日本，于6月17日抵达香港。因港英当局未取消驱逐令，孙中山不能上岸。当日他只得在船旁一小舟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衢云、陈少白、谢纘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会议决定郑士良率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协助杨、陈、李等办事。会后孙中山乘原船赴越南西贡活动。

1900年7月17日，孙中山乘日轮佐渡丸抵达香港。孙中山原拟偕日本志士潜入内地，亲率郑士良等发动起义。因香港水警监视严密，无法登陆，未能成行。次日夜，孙中山在船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此次起事由郑士良任总指挥，原楨、杨衢云为参谋，福本诚为民政总裁，平山周、玉水常次、野田兵太郎为副总裁。④7月20日孙中山离港赴日。

惠州起义的根据地为惠州府归善县三洲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两广总督德寿后来在奏折中曾写道：“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党出没之处，非派营勇面面顾到，难期迅速扑灭。”⑤郑士良是归善当地客家人，又是会党中人，在当地发动群众如鱼得水。他很快在三洲田聚集了600名起义壮士，但枪械仅得300枝，子弹每人仅30发。1900年7月孙中山抵港时，命令固守三洲田山寨以待后命。

郑士良、黄福静候数月，军粮渐缺，只得将部属分散到附近乡村，仅留80人守山寨。为防止走漏风声，附近村民误入山寨砍柴放牧者，皆予以拘留。一时谣言四起。两广总督德寿据各方警报，命水师提督何长清抽拨新旧靖勇及虎门防军4000人于10月3日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驻扎镇隆，堵塞三洲田出路。郑士良以战机日迫，致电孙中山请求接济。孙中山复电：筹备未完，令暂解散。复电尚未到达山寨，何长清已调前队200人进驻新安县沙湾，哨骑已达黄冈，将进犯三洲田。起义军决定先发制人，振己军气，破敌之胆。1900年10月6日，黄福率寨内80壮士夜袭沙湾，斩敌40人，夺枪40枝、弹药数箱，擒敌30人。其余清军惊骇溃逃。

惠州之役打响后不久，起义军即以归善县会党名义，致函香港英文报刊，宣布他们的政治目标是“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呼吁英美日三国“守中立之义，且或资助之”，不要重蹈当年英国支持戈登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之覆辙。^⑨

起义军原准备10月7日乘胜追击，与新安、虎门同志黄江喜等集合的数千人会合，共同攻打新安城。此时郑士良从香港带回孙中山电报：“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⑩当时孙中山正在台湾活动。台湾总督、日本人儿玉源太郎有占领厦门、控制福建的侵略计划，阴谋利用孙中山的力量。儿玉指派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谈判，答应起事以后，给予援助，其中包括默许起义军抢夺台湾银行厦门分行数百万元巨款，怂恿革命党人攻占厦门。孙中山亟需经费接济起义军，因而采纳儿玉和后藤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行动计划。

起义军在郑士良指挥下，改向厦门方向挺进，先后转战镇隆、永湖、崩岗墟、三多祝等地，连战连捷，所向披靡。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被擒，陆路提督邓万林中枪堕马狼狈逃窜。起义队伍由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一万余人。当年10月23日，孙中山在致曾原传的信中极其兴奋地写道：“举旗至今十余日，连克大敌，

数破坚城，军威大振，人心附从，从来举事成功之速，未有及此也。”^⑤两广总督德寿在奏折中也不得不承认：起义军“横厉无比”，各路会党“云集响应”。^⑥

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战斗不断进行，急需补充大批枪枝弹药。孙中山致电宫崎寅藏，请其将菲律宾独立军借给的军械，由日本运往惠州沿海。岂知由于日本政客木村弥六贪污混骗，购买的这批军械全系废品，根本无法使用。此时又逢日本内阁发生更迭，新任首相伊藤博文奉行保全清政府的对华政策，严格禁止日人与中国革命党来往，并取缔武器秘密运送。

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孙中山致书郑士良称：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⑦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及同志数人携带此信，乘船到香港，经海丰抵达三多祝前线。郑士良接信后忍痛解散起义军队伍，与黄福、何祥等起义军首领于当年11月初退往香港。另有四五百名起义士兵也陆续退往香港，得到香港兴中会的妥善安置。^⑧

兴中会的第二次武装起义惠州之役失败了，但革命党人的英勇行动逐渐唤醒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孙中山曾颇有感触地说：“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⑨

洪全福广州之役

谢纘泰因不满孙中山取代杨衢云担任兴中会会长，早在1900年2月即有单独行动、夺取广州的想法。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特别是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在香港被清吏派人暗杀之后，谢纘泰

满怀对清吏的仇恨，着手单独组织夺取广州的战役，即洪全福广州之役。

此役重要人物洪全福，号春魁，字其元，系洪秀全三弟。参加太平军后，转战湘鄂皖浙间，晋封左天将、瑛王，人呼三千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洪全福避走香港，充外轮厨师。航行近40年，始隐居香港悬壶行医。他与谢纘泰之父谢日昌志同道合，时相过从。谢纘泰闻洪全福说太平军旧事，知其有丰富军事经验，并在会党中有潜势力，遂与父亲商量，动员他参与夺取广州。

此役另一重要人物李纪堂，原名李柏，香港富商李升之第三子，1900年4月22日加入兴中会。当年6月孙中山乘船赴港，任命他为驻港会计主任。他曾为庚子惠州之役和维持中国日报社，提供大量经费。谢纘泰策划洪全福广州之役时，李纪堂刚接受父亲百余万元遗产，慷慨允应承担此役全额军饷50万元。

1901年10月30日，谢纘泰、洪全福、李纪堂举行会晤，讨论夺取广州并建立临时政府的计划。会后他们立即分头进行准备。

谢纘泰负责对外联络和舆论宣传。他先后得到《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G. E. Morrison)、伦敦《香港日报》肯宁汉(A. Cunningham)、史密斯(D. W. Smith)、《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 H. Reid)、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程度不同的支持保证。肯宁汉协助谢纘泰起草独立宣言和致列强呼吁书，并帮助秘密印刷。谢纘泰希望容闳在起义成功后担任临时政府总统，并通过李纪堂与他取得了联系。1902年9月21日，容闳从美国来信，表示支持他们起义：“一方面我将自己作好准备，另一方面，我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⑩

洪全福负责军事行动。1902年夏，他在香港中环德己立街(D' Aguilar Street)20号设立革命机关，名曰“和记栈”。他又委任兴中会会员梁慕光、李植生在广州设革命机关20余处，委任

宋居仁、苏焯南等联络各地会党。广东官府惯例，每年旧历除夕天未明时，广州城中文武大小官员相率齐集于城南万寿宫行礼。洪全福决定利用这一时机，于1903年1月28日晚(旧历除夕)起事，纵火为号，炸毁万寿宫。同时占据军械局、焚烧火药库，分头占据各衙署。此外，又派人组织惠州同志举义响应，牵制陆路提督之兵；运动绿林好汉刘大婶(男姓)控制广州北路。1902年12月27日，洪全福和谢缙泰之弟谢子修前往广州召开起义领导人秘密会议。次年1月25日，洪全福、谢子修经澳门再次前往广州，领导实施起义计划。

起义所用枪械，由李纪堂向沙面陶德洋行订购，已交定金十几万元。该洋行届期不能交货，企图吞没枪款，便向捷字营管带杨植生告密。因此，1月25日洪全福等离港后不久，广东官府密探周某即带领香港警察搜查和记栈，拘捕留守人员。周某将搜出的文件抄送两广总督德寿。

在事机泄露的危急关头，洪全福仍千方百计设法补救。他请澳门同志用舢板两艘，满载枪枝以煤炭覆盖运往广州。梁慕光又向沙面洋行秘密购买快枪200枝，用小艇运出。可惜上述行动皆未成功。清军在广州各起义机关和港澳轮码头大肆搜捕，抓获起义志士20余人，搜获大批军械、旗帜、食品。梁慕信、陈学灵等十余人就义。洪全福改名为浮萍，剃掉胡子，化装逃走。谢日昌因忧虑患病，不久即去世。

为了动员会党群众参加，洪全福广州之役是以大明顺天国的名义发动的。但此役和清初会党反清起义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洪全福等在起义告示中明确宣布他们的宗旨是：“专为新造世界，与往日之败坏世界迥乎不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④这说明洪全福广州之役和兴中会发动的其他武装起义一样，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目标在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洪全福广州之役不是兴中会总会发动的，但此役重要领导成员谢纘泰、李纪堂、梁慕光、李植生均为兴中会会员。此外，李纪堂曾托陈少白将此役准备情况转告正在河内的孙中山，并称一切宗旨与兴中会相同，可勿过虑。待夺得省城时，即迎中山先生返粤。^④

四 香港同盟会

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之后，孙中山暂时停止国内军事行动，集中精力联络海外留学生和华侨，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拓更广泛和坚实的基础。1905年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同盟会总理。《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该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计划在国内设5个支部，国外设4个支部。国内的南部支部设在香港，负责云南、广东、广西、福建4省革命事务。但实际上最初在香港建立的同盟会组织不叫南部支部，而叫香港分会。

孙中山十分了解香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地位。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仅两个多星期，1905年9月8日孙中山即委托会员冯自由、李自重前往香港、广州、澳门等地联络同志，“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接收”。^⑤

当年9月冯自由抵达香港后，即与李自重、陈少白、郑贯公等筹备组织同盟会香港分会。工作进行过程中，孙中山乘法国邮船由上海经香港前往越南西贡。10月16日船过香港时，冯自由与陈少白、李自重、郑贯公、李纪堂、容星桥、黄世仲、陈树人等登轮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当即亲自主持同盟会宣誓仪式，陈少白等一一举手加盟，虽是兴中会会员仍须填写誓约。为了隆重起见，数日之后，又在《中国日报》社四楼举行了正式的加盟仪式。会员们选举陈少白为香港分会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

书记。除冯自由、李自重是在东京加盟的以外，计第一次在香港加盟的有陈少白、李纪堂、邓三伯、郑贯公、黄世仲、卢信、容星桥、潘达微、陈元英、陈树人、伍汉特、史古愚、李自平、邓警亚、李孟哲、李伯涛、王斧、杨肖欧、温少雄、廖平子、李景芬、梁扩凡、黄大汉、黄耀庭、王光华、崔通约、陈典方、孙眉公、张树清、李煜堂、黄鲁逸、陈春生、洪孝允、林直勉等，约有百人之众。④香港分会是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以外建立的第一个分会，会所设在《中国日报》社长室。

1908年秋，冯自由接替陈少白，任香港分会会长。此后会务工作进展较快。1907年在香港及广州入会者有数百人，目前有姓名可考者67人。⑤按同盟会规例，只会长一人有权接收会员，派往各地扩张会务的皆称代理主盟人。1907年香港同盟会派往广东、广西、福建和澳门的代理主盟人及军事联络员有43人。派出人员中，以许雪秋、邓子瑜运动惠潮会党及张谷山、姚雨平运动广州军学两界成绩最为显著。⑥

1909年以前，香港同盟会忙于军事活动。为了保守秘密，不便大张旗鼓吸收会员。1908年4、5月间河口之役失败后，同盟会元气大伤，军事行动停顿一年有余，遂得专心党务，采取开放主义，广收会员。1909年春，香港分会辟新会所于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门某楼，对外称其为“民生书报社”，会员开会亦不如以前秘密。当年港粤两地加入同盟会的有2000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倪映典在新军士兵中发展的。因会所过于狭窄，当年冬季“民生书报社”迁往中环德辅道捷发号四楼，并易名为“少年书报社”。1910年春冯自由前往加拿大《大汉日报》社任职，香港分会会长由谢英伯接任。谢于1911年夏赴檀香山后，由陈逸川代理会长。

随着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香港分会的任务越来越繁重，香港同盟会会员因而开会建议成立南方支部。1909年秋，同盟会南方支部宣告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汪精卫任书记，林直勉任会计，会所设于黄泥涌道。最初开办经费由林直勉捐助。香港分会

向例兼理西南各省党务军务，以及南洋、美洲各地交通事务。南方支部成立后，香港分会仅负责港澳方面会务，西南各省工作则移交南方支部。

军事活动是香港同盟会的一项重要工作。香港分会直接策划了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之役和同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的防城之役和1908年的钦州马笃山之役是孙中山在越南河内亲自指挥的，但香港分会承担了军用品供应工作。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之役和1911年4月的广州“三·二九”之役，则是由南方支部在香港策划的。

同盟会香港分会建立后，香港充当革命运动后方基地的作用更为明显。把香港作为联络地点、退守基地和中转站的革命党人与日俱增。各方同志来往港、粤、沪、桂、日本、南洋、欧美各地，常把中国日报社作为暂驻之地。分会还先后在宝庆坊、坚道、兰桂坊、湾仔进教围、摩礼臣山道、皇后大道马伯良药店四楼等处设立招待所。此外，革命党人在结志街25号开办的实践女校、湾仔东傍海街76号冯自由住宅、李纪堂、邓荫南分别在新界青山开办的农场等，也常被用作招待所。每年各方来港同志络绎不绝。以1907年为例，各方同志过港登记者，就有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孙眉、居正等百数十人。④1909年秋，革命团体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因事赴港，曾前往中国日报社拜访冯自由，通报湖北有共进会组织，如粤有事，鄂必响应。冯动员他办理宣誓手续，加入了同盟会。

冯自由曾经做出这样的评价：“香港同盟会实为清季西南各省革命军之大本营”，其主持的党务、军务、报务，“与中华民国之肇造，关系绝巨”。⑤

五 同盟会时期的武装起义

潮州黄冈之役

黄冈城是广东东部重镇，属潮州府隆平县，商务繁盛，为闽粤交通孔道。清季在此驻有协镇都司守备、左右城守、同知巡检等文武官员。

黄冈之役主要领导人许雪秋(1875—1912)系华侨富商，广东潮安人。1904年，他曾与同志数人联袂归国，在故乡联络会党头目余既成、余通、陈涌波等，准备举行反清武装起义。1906年，他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负责在广东东江各地相机发难。当年冬季，他到香港会见冯自由，介绍同行的余既成、陈涌波加入同盟会，并要求电告孙中山，起义条件渐臻成熟，请派人回国相助。孙中山接电后，曾先后派廖仲恺、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张煊、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赴港协助。

许雪秋决定丁未正月初七(1907年2月19日)分头大举，进攻潮州府城。届时因“风雨大作”，影响队伍集合，未能成功。许雪秋亲往香港，向冯自由报告起事中途变化情况。孙中山接冯自由请示后，复电指示今后举事应与惠州及钦廉义师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令雪秋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许雪秋因此留驻香港兰桂坊，联络惠州、钦廉各地同志，并静候指令，而由方汉成、方次石等继续驻在黄冈筹备一切。

5月初余既成、陈涌波前往香港报告，黄冈同志被清吏捕去2人，各同志拟克日举事，以便营救。许雪秋亦跃跃欲动。冯自由、胡汉民再三劝阻，令余、陈2人回黄冈制止。同月21日，潮州镇总兵黄金福派守备蔡何宗带兵40名进驻黄冈。当晚商民演戏，防兵恃势在台前调戏妇女，群众起而干涉。蔡何宗不仅不约束防

兵，反而借故拘捕张善、丘保等两名革命党人。清军并拟搜查设在泰兴杂货店的起义总机关。黄冈同志群情激愤。此时恰逢余既成、陈涌波由香港经汕头携款归来。他们主张立即举事，迟则为人所制。陈涌波并说：事发三日内，香港方面，军械财政，自有接济，各属必能会师潮汕。④

5月22日晚，余既成等聚众700余人在黄冈城外连厝坟侧誓师，随后主攻协署，并分兵攻打城内其他衙署。酣战之中，天忽降大雨。起义军枪械多为旧式鸟枪，弹药受潮，扫射无效。陈涌波纵火焚毁协署左侧昭忠祠，在熊熊火光中，手持青天白日旗，冲锋陷阵。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了黄冈城，都司隆启、守备蔡何宗被迫投降。起义军在旧都司署成立军政府，推选陈涌波、余既成为正副司令。

5月24日许雪秋在香港得知起事确讯，次日即赶赴汕头。因清军在汕头附近布防严密，他无法赶到战地督战。起义军主帅乏人，对下一步行动计划发生意见分歧，贻误了战机。清军援师四集，义军械劣弹乏，不堪再战，只得于5月27日宣布解散。余既成等由海道逃往香港。

惠州七女湖之役

孙中山原计划潮州、惠州同时举义，以分散清军兵力，因而指派许雪秋、邓子瑜分途发动。邓子瑜系惠州归善人，与家乡会党关系密切，深得众心。他参加过庚子惠州之役，后逃往新加坡，在牛车水开设旅馆。1905年冬，孙中山至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分会，邓子瑜与尤列等率先加盟。

邓子瑜在香港获悉潮州黄冈之役开始后，即向冯自由领款1200元，令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赴归善、博罗、龙门3处分路举事。他信心十足地宣称，每路只需经费400元，随处有清军防营枪械可取而利用。陈纯等潜入惠州后，因博罗、龙门两处会党不易会合，便在归善县七女湖集中了百数十人。1907年6月2

日，他们在这距惠州府城仅20里的著名墟场起事。当地扒船营勇抗拒，被击毙8人，尽缴其枪械。义军进攻泰尾、杨村、柏塘等地，所向披靡。各乡会党起而响应，声威大振。清吏胆战心惊，归善、博罗两县城门紧闭。6月12日，东路巡防营管带洪兆麟带兵至八子爷地方，林旺率义军敢死壮士50人，从山后邀击。洪中枪堕马，所部死伤甚众。清军其他各路亦连吃败仗。两广总督急电水师提督李准，将进攻潮州黄冈之师，从汕头调往惠州。邓子瑜在港购置弹药，原拟亲自押送，从间道入惠接济。此时闻知黄冈义军已败，遂令部属相机解散。义军将枪械埋藏地下，然后解散。此役邓子瑜事前仅领军费1200元，事后仅领善后费用800元。仅用区区2000元，即获得十分可观的战果，实属难能可贵。

此役主将陈纯等事后避居香港。冯自由因广东密探环伺左右，便将他们安置在新界青山李纪堂农场藏匿，后又出资将其送往南洋谋生。邓子瑜被港督勒令出境，重返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

广州新军之役

革命党人最初若干次武装起义主要依靠会党群众。经过多次失败，他们逐渐认识到：“革命起义，不可专恃会党，今宜采取入虎穴得虎子之法，取得新军，始可成事。”^⑩新军是清政府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编练的近代化陆军。广东新军始建于1903年，1905年左右已建立一个混成协（混成旅）。新军下级军官多为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将弁学堂和学兵营毕业生，其中不少人倾向革命。1908年起，香港同盟会逐渐把运动新军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倪映典、朱执信、姚雨平、张赓村等在新军官兵中做了大量发动工作。

倪映典（1885—1910）字炳章，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1908年在安徽任炮兵管带时，曾与熊成基共谋举行武装起义。后因躲避端方缉捕，易名南下。他到香港中国日报社访问

冯自由，正式加入同盟会。此后他返回广州，经赵声介绍入新军，任炮兵见习排长。

1909年夏，倪映典、朱执信等在白云山能仁寺召集革命党骨干会议，推举干事员，决定分工。倪映典在天官里寄园巷5号设立机关，负责联络新军。他拟定了《运动军事章程十条》，还从香港中国日报社领取《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等小册子万数千册，在军队中广为散发。新军士兵大都识字，感化最易，收效甚大。每逢假日，则与同志一起在白云山濠泉寺演说革命，新军士兵趋之若鹜，掌声如雷。他又由香港中国日报社取得同盟会小盟单万张，与同志们一起，吸收士兵宣誓加盟，组织发展空前迅速。

1910年1月，倪映典前往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商定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发难。他随即返回广州。南方支部电请孙中山筹款2万元应急，并电邀黄兴、谭人凤来港共策进行。黄、谭先后来港，孙中山共汇款8000元，不敷发难之用。同盟会员李海云毅然将所营合股商店存款2万余元全部献出，解决了经费问题。革命党人士气高涨。他们有的在广州增设机关加紧活动；有的租赁房屋，预备起事时纵火接应；有的在冯自由住宅赶制青天白日旗，藏于卧具密运广东；有的准备密运炸药、子弹；有的协助民军首领，准备起事时与新军相呼应。

农历除夕(2月9日)，新军二标士兵因定制名戳、名片细故，与店主发生争执。巡警上前干涉，与新军发生殴斗。巡警拘捕新军8人。倪映典闻讯急往香港报告，并且说：“余料新军运动已成熟，经此事故，勿论如何，殆难抑制，应提前改期，勿待元宵。”^⑩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反复磋商，决定提前至初六起义，届时他们将亲赴广州指挥。

2月10日(初一)，二标士兵数百人持械入城，捣毁警局多处，伤警吏多人。清吏惶恐不安。协统张哲培等密收士兵子弹，并下令取消士兵年假。驻防八旗兵运炮登城防御。2月11日(初二)晨，

一标士兵对取消年假不满，又传言警兵派大队攻营，纷纷闯进炮、工、辎各营搜寻枪械、子弹。下午，守城旗兵在东门射伤出面调解的陆军小学监督黄士龙，新军士兵愈加激愤。

农历初一，港轮不开。倪映典乘初二夜班轮由香港返回广州，发现局势发展已十分严重，决定立即起事。他对军中同志说：“此时兵士纠合，此等机会，虽有钱亦买不来”，“只管放心放手做事，香港即时就有接济”。^⑧12日(初三)晨，倪映典进入炮、工、辎营，新军士兵欢呼雀跃。八时，炮营管带齐汝汉发表演说，煽动士兵“尽忠报国”，为清廷卖命。倪映典连开3枪，将其击毙。倪映典被大家推为司令，率领新军起义士兵向省城进发。

当日晨，水师提督李准、统领吴宗禹率防营士兵2000余人赶至牛王庙设防。新军驻地在燕塘。牛王庙为燕塘至省城之要隘。倪映典身穿蓝袍，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驰马督师前进。吴宗禹部管带李景濂(同盟会员)为邀功请赏，设计诱杀倪映典。他假意请倪到该部动员士兵反正，待倪退出该部，即用乱枪将其射死。^⑨防营与新军激战约1小时，新军阵亡百余人。新军起义士兵每人仅分得子弹7粒，并无法得到补充，纷纷向燕塘溃退。次日，新军起义士兵退守白云山、石牌、东圃一带，清军四出搜剿。新军起义士兵先后被捕百数十人，逃往香港百数十人。广州新军之役至此宣告失败。

广州“三·二九”之役

从1905至1910年，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了数十次武装起义，都被清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从血的教训中，他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彼起此伏、各不相谋的军事行动，力量分散，不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而牺牲了不少的优秀同志，消耗了革命的实力，实非善策。”他们因而主张：“集中全党力量，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一举而颠覆清朝政府。”^⑩

获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旧金山，取道檀香山、

东京，至南洋的槟榔屿(庇能)。1910年11月13日，他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重谋大举”，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及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同盟会代表出席。孙中山鼓励大家“为破釜沉舟之谋”，“举全力以经营”。^⑤会议决定动员全党人力、财力，全力以赴。以“教育义捐”名目筹款10万元。挑选同志500人任“选锋”，任发难之责，领导军队及民军起义。夺取广州后，兵分两路，一路出湖南、趋湖北，一路出江西、趋南京。

庇能会议后，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先后返回香港进行准备。此次战役规模宏大，起义人员来自各省，战略目标为广东及长江流域数省，有必要建立一个统筹全局的机构协调行动。1911年1月底，统筹部成立于香港跑马地35号，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下设8个课：

调度课：掌运动新旧军人人事，课长姚雨平。

交通课：掌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交通事，课长赵声。

储备课：掌购运器械事，课长胡毅生。

编制课：掌草定规则事，课长陈炯明。

秘书课：掌一切文件事，课长胡汉民。

调查课：掌调查敌情事，课长罗焯扬。

总务课：掌其他一切杂务，课长洪承点。

当年2月初，各地爱国华侨捐款陆续汇往香港。有了经费，统筹部即着手在香港、日本、越南等地购买军火。由国外购买的军火，皆先运往香港，然后转运广州。因为炸弹杀伤力大，造价也低，革命党人将其当作一种主要武器。他们在香港摆花街设立实行部，专门制造炸弹，由李应生、李沛基、徐宗汉等负责。喻培伦、方声洞曾在日本研制炸弹，亦前来香港参加制造，并在九龙海边荒滩进行试验。参战选锋初定500人，后以不敷分配，增为800余人。其中来自闽、苏、皖、蜀各省及南洋、越南等地的，陆续前往香港集中。革命党人还分头进入广州，陆续设置起义机关

40余处，用以办事、联络、住人、藏军械和制炸药。在新军、防营、警察、海军和民军中的准备工作亦在进行。

各项准备工作大体就绪之后，统筹部于4月8日在香港总机关召开发难会议，议决分10路在广州发起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此外，增设放火委员，入旗界租赁房屋，以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发难计划确定后，由香港向广州运送军火的工作更加紧张地进行起来。革命党人在香港鹅颈桥开设一家头发公司，在广州设两家分号，用小包饰为头发运送子弹。西贡到港枪械，藏在铁床装台及花盆运往广州。杨光汉伪装巨商，多次携带枪械闯关。王鹤鸣、杜凤书等人还发明用颜料罐报关运械的办法。

发难日期原订为1911年4月13日。但是，美洲捐款尚未到齐，荷属东印度捐款尚未汇到，从日本、越南购买的枪械多数尚未到港。加上4月8日发生温生才枪杀副都统孚琦事件，军警加紧搜巡。在广州的革命党人决定将发难日期改为4月26日。

4月23日，黄兴离港前往广州，住小东营5号起义总指挥部。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后，他决定再延缓一日，定于4月27日发难。25日，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调巡防2营回广州，以其中3哨助守龙王庙高地。胡毅生、陈炯明、宋玉琳等怀疑有奸细混迹党内，敌人已有准备，建议改期。黄兴勉从众议，并命外省同志居多的赵声部先行回港。前后退离广州的选锋达300余人。当时曾有喻培伦、林时爽找到黄兴，痛陈利害：“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的钱，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于今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个大骗局，堵塞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户口，人枪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败，也可以我们的牺牲作宣传，振奋人心。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⑩在喻、林的激励下，黄兴决定集中三四十人攻打督署，杀张鸣岐以谢国人。26日，陈炯明、姚雨平报告说，李准由顺德调来巡防营

3营，泊天字码头，内多同志，欲趁机起事。其哨官10人，内有同志8人。黄兴认为起义可望成功，决计按原订日期发难。

当晚，胡汉民在港接黄兴来电：“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这是要求同志赴粤参战的隐语。当时在港选锋300余人，多数无辫。省港早轮只有1艘，晚轮则有数艘。乘早轮赴省城，恐不便登岸。因而赵声、胡汉民决定，次日宋教仁等少数同志乘早轮，他们与多数同志乘晚轮赴省城，并发电报要求展期1日。

黄兴将原订的10路进攻改为4路进攻，分别由他本人、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指挥。岂知发难时，陈、胡犹豫畏缩，姚领械受阻，3路皆未出动，黄兴1路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半，螺号声声，黄兴率选锋130人，向督署发起猛烈进攻。经过激烈枪战，击毙督署卫队管带金振邦，攻入署内。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放火离署，遇李准亲兵大队迎头冲来。突围中，林时爽等6人中弹牺牲，黄兴右手受伤断两指。黄兴将所部分为3路：一路出小北门，拟与新军接应；一路攻督练公所，他本人带一路出大南门，拟与防营接应。黄兴一路行至双门底，路遇同志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台的防营士兵。因对方未缠白巾做记号，发生误会。方声洞将温击毙，对方亦将方打死。混乱中黄兴所部被冲散。其他两路同志在街巷中奋勇作战多时，终因众寡悬殊，未获成功。次日晨，赵声、胡汉民率留港选锋200余人到达广州，起事已经失败。因城门紧闭，胡汉民与众同志不得不分别折回。黄兴欲与清吏拚命，在赵声等同志劝阻下，化装返回香港。

起事失败后，香港同志派人赶赴省城处理善后：抚恤烈士遗属，延医给费治疗受伤志士，设法保存未被发现的军械，迁易旧时机关等。到港起义志士亦酌发川资分散。

此次广州起义发生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因而被称为广州“三·二九”之役。此役被捕后就义者29人，战死者一时无法知其确数。事后收殓烈士遗骸72具，由同盟会员潘达微安葬在广州

红花冈。其地潘为之易名黄花冈，因此有黄花冈72烈士之称。后经调查，又陆续发现烈士14人。故此役牺牲烈士至少有86人。

广州“三·二九”之役可以说是武昌起义的前奏。此役在清朝统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两广总督张鸣岐在审讯被捕革命党人时，被他们慷慨陈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镇慑。他在奏报朝廷的电文中哀叹道：“人心如此，天意可知。”^⑤孙中山给予此役极高的评价。他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⑥

六 革命宣传重地

香港曾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宣传重地，革命党人创办的第一家报纸《中国日报》即诞生在这里。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国外。后来，陈少白认为他们两人皆留在日本活动，似无必要。他要求回香港开办一家报馆，一方面可以“用文字鼓吹革命”，同时还可做“革命总机关。”^⑦1899年秋，陈少白回到香港，通过何启、区凤墀等了解到，对孙中山的驱逐令尚未满期，他则可不受拘束。他于是租定中环士丹利街24号为报馆发行所，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定报名为《中国日报》，英文报名为China。印刷机器、铅字由孙中山在横滨购办运往香港。1900年1月25日（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日报》正式出版。该报先后成为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初期的宣传机构。辛亥革命后报社迁往广州，1913年军阀龙济光攻占广州后，该报被其封禁停版。《中国日报》创办初期陈少白任总编辑。先后参与过报社工作的有陈春生、郑贯公、冯自由、黄世仲、谢英伯、朱执信等人。

《中国日报》创办之初未敢公开宣传革命反清。半年之后，由于义和团运动使港英当局对反对清王朝的活动采取比较宽容的

态度，该报言论才逐渐激烈起来，引起中外人士注意。《中国日报》创办之初缺乏宣传资产阶级新学的人才。1901年春，孙中山介绍郑贯公任《中国日报》记者。郑由日本归来后，在该报撰文介绍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阐发新思想、新名词，持论新颖，大受读者欢迎。

《中国日报》刊载过不少文章正面阐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该报曾译载孙中山1904年撰写的《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历数清政府的十大罪状，断言“满洲政府之推倒，不过时日之问题而已”，明确提出“改良满洲往日专制政体，变为中国共和之政体”^②。该报1907年9月28日刊载的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文告宣称：“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该报同年9月30日刊载的钦州革命军致海内外同胞布告公开号召同胞投身革命：“革命则国家之根本大计也。我同胞既为祖国兴利，则当务其大者。利之至大，孰有过于革命者乎？”

《中国日报》多次投入论战，批驳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例如，1903年1月洪全福广州之役失败后，广州《岭海报》主笔胡衍鸷大放厥词，诋毁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中国日报》陈诗仲、黄世仲等严词批驳。双方笔战逾月，广州志士纷纷投稿声援《中国日报》。因此次论战，革命书报在广东销路大增。又如，康有为门生汇编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竭力非难革命，在海内外造成极大思想混乱。1903年《中国日报》率先发表黄世仲撰写的《辩康有为政见书》，力斥其非，其时间早于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书》。又如，1904年康有为命徐勤在香港创办《商报》，提倡扶满保皇，《中国日报》曾痛加还击。广州“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商报》乘机排斥革命，鼓吹君主立宪。《中国日报》根据法理事实严加驳斥，文章多出自朱执信手笔。

《中国日报》对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有详细报道，有

时还印发号外，广为宣传。《中国日报》建立了战地记者制度，在萍乡之役、安庆之役和镇南关之役等多次武装起义中，该报都派有特约从军访员，用电报拍发战地实况至报馆，消息迅速，远驾其他各报之上。^⑩

《中国日报》上揭露清廷腐败的短新闻俯拾皆是。例如，该报1907年2月27日的“本报特电”专栏中，就载有“清国警兵行劫”、“清官又妄毙民命”等新闻。《中国日报》还通过一些生动活泼的形式鼓吹革命思想。1909年该报曾举办过一次征联活动，海内外应征者极为踊跃，初评入选者即有2000名左右，最后取录200名。入选各联多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革命性。其中冠军联为“将到毛长又剪清”，亚军联为“横扫腥腥独立旗”，殿军联为“一洗辨污大革新”。此外，还有“饱载腰缠尚剥民”、“擅弃膏腴曰媚夷”、“厚敛脂肥假振华”等联。^⑪

中国日报社还出版过十日刊一种，定名《中国旬报》。《中国旬报》与《中国日报》是同时创办的。旬报是以日报为基础汇编而成的，但议论方面较日报为优。旬报附有“鼓吹录”，专以游戏文章歌谣杂俎讽刺时政，这是中国报纸设置谐文歌谣之嚆矢。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不久，《中国旬报》即告停刊，其“鼓吹录”移往《中国日报》继续刊出。

1907年7月，中国日报社经销东京《民报》特刊《天讨》。该特刊印有清帝破头插图。香港华民政务司认为该刊有煽动暗杀的嫌疑，后经冯自由依法抗辩，卒以没收所存《天讨》了事。当年10月，港英当局颁布1907年第15号法例《禁止煽动性出版物条例》，宣称：凡在本港发行之报纸、书籍、文字、图画，流入中国内地而能使全国发生叛乱的，本港政府为顾全邦交起见，得加以取缔，判处罚款不过五百元，监禁不过两年，或罚款与监禁并施，在监禁期间是否服劳役，须待高等法院裁定。这显然是针对《中国日报》等革命报刊采取的限制措施。但中国日报社的革命党人并未屈服。他们利用英国人只禁谈“革命排满”的情况，易

以“民族主义”、“光复”等名词，继续宣传革命。

《中国日报》在社会上产生过极大的政治影响，享有很高的声誉。《民报》的一则广告推荐说：“香港《中国日报》为中国革命的机关报之元祖，自己亥年创始以来，其间经历几许大风潮，屹然不少变动，其名誉其价值久为一般社会所称道不值，无俟赘述矣。本年该报更大改良，言论之精辟，资料之密丰，均臻绝顶。其尤著者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万余言，受社会最大之欢迎，等于洛阳纸贵，诚空前之杰作也。其他如对拒约及粤汉铁路各问题，均能实事求是，摘伏惩奸。”^⑧

《中国日报》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甚至在清吏中也拥有其读者。1902年冬，广东两名知府庄蕴宽、姚绍书出国参观博览会，经人介绍在河内与陈少白相会。庄、姚2人得知陈为《中国日报》主笔，惊喜不已，坦言他们日读《中国日报》，“未尝间断”。庄还当场背诵该报社论一两篇。他们与陈纵谈革命，并称他们以官为食，欲罢不能，他日革命军到羊城，他2人当先引领受戮，必无悔也。^⑨1911年11月上海、苏州先后光复。庄蕴宽以参加义举，在程德全辞职后，曾被举为江苏都督。他能参加义举，与早年《中国日报》对其影响不无关系。

《中国日报》对海外其他革命报纸亦有极大影响。1904年新加坡出版的《图南日报》、1907年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1910年加拿大温哥华出版的《大汉日报》等，均有香港《中国日报》派出人员充任编辑。《中国日报》还经常与海外其他革命报刊互通声气。例如，东京《民报》第四号与旧金山《大同日报》即转载过《中国日报》所载冯自由长篇论文《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⑩

辛亥革命前在香港出版的革命报纸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等。这些报纸是郑贯公陆续创办的，但存在时间都不长，其影响无法与《中国日报》相比。

七 革命经费筹集和转汇之地

香港曾经是革命经费筹集和转汇之地，在财政方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亦不可低估。香港一些爱国商人曾经倾家荡产，支持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有的甚至因此家道中落，生活陷入困境。此外，正是由于香港一些爱国商人慷慨资助，革命机关报《中国日报》才得以渡过多次经济危机，顽强生存十余年，为革命宣传作出重大贡献。

孙中山曾说：乙未广州之役“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共不过万余耳”。^⑧这里所说“香港一二人”，是指黄咏商、余育之2人，但实际资助数目要大些。黄咏商售其苏杭街洋楼一所，得款8000元，充作军费。日昌银号东主余育之亦曾捐助军饷万数千元，密约杨衢云、黄咏商至红毛坟场交款。^⑨余育之捐款事系秘密进行，在革命同志中也鲜为人知。

孙中山在谈到惠州之役经费时说：“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经营接济，所费不下十余万元，所助者只香港李君出二万余元，及一日本义侠出五千元，其余则我一人之筹获而来也。”^⑩这里的“李君”即李纪堂。李纪堂自己回忆说：“迨至惠州失败，交我之二万元不够，我垫去十八九万元，办理善后。因其时先父方去世，我分得遗产不少，所以有款可垫。”^⑪陈少白则说，1900年李纪堂在香港轮船上与孙中山见面时，“捐出三万元，亲交孙先生，为革命的补助费”。^⑫以上几种说法皆是当事人多年后的回忆，未必完全准确。孙中山所说的“十余万元”与李纪堂垫出的“十八九万元”是否同一回事，亦不清楚。但综合上述资料分析，李纪堂1900年捐助的革命经费很可能不只2万余元。

李纪堂捐资最多的一次是洪全福广州之役，他承担了全部军饷50万元。在筹备此役时，他曾馈赠旅费1万元；请陈少白带给远在河内的孙中山，待事成后即请孙中山回粤。经过此役之后，

李纪堂家道逐渐中落，日形拮据之象。

冯自由在《革命富人李纪堂》一文中写道：庚子至丙午（1800—1906年），“此七年间香港革命机关之党务报务，均由陈少白负责主持，而其经费皆仰给于纪堂。而纪堂对于少白所请，有求必应，毫无吝色。故纪堂对于革命事业之贡献，亦以此七年间为最伟大，可以谓之庚子至丙午时代兴中会之中流砥柱。”^⑧冯自由的这种评价是否贴切，尚可商议。但李纪堂的资助对香港兴中会和香港同盟会曾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李纪堂在家道中落之后，仍为筹集革命经费绞尽脑汁。冯自由写道：“丁未戊申二年，为香港同盟会军务最活动时期，而饷糈奇绌，实为屡次蹉跌之原因。纪堂目击进行困难，无以为助，忽发奇想，向朱执信、胡毅生及余等献策，谓其亲族某，为富不仁，其父枢厝于广州北门白云山脚某寺多年，为迷信风水，久不埋葬。若使会党中人密迁枢于近地，然后向其家勒索，可得巨款，倘此策不成，则其家于每岁清明，必遣其独子扫墓，届时亦可于途中绑票。各同志多赞成之，遂如言进行。卒以无人负责，事皆不谐。是可见纪堂筹饷之尽力无微不至矣。”^⑨

广州新军之役需款2万元。待新军运动大体就绪，殆有一触即发之势时，孙中山仅从美国筹得8000元。香港同盟会机关诸人焦虑万分。此时李海云在港任远同源号经理，经营港、美两地汇兑业。他获知同盟会筹款缓不济急，毅然下极大决心，尽提远同源号现款2万余元，献给同盟会机关，以充军用。远同源号本为海云父佑谱、陈元英父赴贤与同族某等之合股公司，李海云委为金银业失败亏空公款，转求父执李煜堂、同志陈元英代向股东说项。股东察知真相后，皆表谅解，答应不向法院诉追。^⑩

香港《中国日报》开办之初，资本概由孙中山拨付。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孙中山无力顾及宣传机关经费。1900—1906年7年间，维持《中国日报》之经费大都取自李纪堂一人。1905年初，中国日报社与香港印刷业著名企业文裕堂合并，定名文裕堂股份

有限公司。1906年秋，文裕堂以营业不佳宣告破产。幸亏事前1个月，港商李煜堂应陈少白、冯自由之请，慨然斥资5000元，从文裕堂承购《中国日报》，使该报避免被拍卖之厄运，此革命喉舌得以保全。这5000元中，原有3000元为文裕堂对李纪堂所负之债。李纪堂志愿将此债权转为《中国日报》新股，以支持报社工作。购回产权后，中国日报社长改由冯自由担任。冯接办后，前后所集资本仅得商股9000余元。当时有同盟会新会员林直勉，系富家之子，与其叔父争产兴讼得直，获资2万余元。他随即认购《中国日报》新股3000元，使该报得以渡过经济难关。同盟会南方支部开办经费，亦是林直勉所捐助。

香港作为革命经费转汇之地的作用，在同盟会时期尤为明显。海内外筹集的革命经费源源汇往中国日报社代为处理。以冯自由保存的《丁戌二年之革命收支帐目》为例，1907、1908两年，他在中国日报社先后收到孙中山多次汇款36000余元，以及新加坡、上海、檀香山、暹罗、美国巴士杰埠等地同志汇款，合计48000余元。他将这些汇款分别用于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接运军械及其他革命活动。^④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同盟会将李煜堂经营数十年之金利源药材行改为交通机关。广州“三·二九”之役以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所有海外汇输的革命经费，皆汇往南方支部指定的香港文咸东街金利源药材行转李海云收。李海云即南方支部会计主任。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李海云曾遵命将南方支部收存之款30万元汇往上海，作为大总统就职日赏犒军士之用。

① 罗香林：《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第14页。

② 吴伦霓霞：《孙中山早期革命运动与香港》，载《孙中山研究论丛》第3集。

③④⑬⑭⑮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235、242页。

⑯⑰⑱⑲⑳㉑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19、21、549、201、286页。

- ⑥ 《广东文物》中册，卷六，第431页。
- ⑦ 参看《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一章“以饮食为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169页。
- ⑧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15—116页。
- ⑨ Cameron, N., *Hong Kong, the Cultured Pearl*, pp. 136—137.
- ⑩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 ⑪⑫⑬⑭ 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广东文物》中册，卷六，第432，] 436、437、431页。
- ⑮⑯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第5、83页。
- ⑰ 同上书，第127页。
- ⑱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30—31页。
- ⑲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84页。
- ⑳㉑ 贺跃夫：《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关系辨析》，载《孙中山研究论丛》1984年第2集。
- ㉒㉓ 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92、315页。
- ㉔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9页。
- ㉕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18页。冯自由认为檀香山兴中会创立时即有此誓词。美国华人学者薛君度认为，此事还不能从文献或参与者的著作中得到确证。立誓词一事可能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时就有此誓词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中国学者袁鸿林、耿云志等同意薛君度先生的看法，但认为在香港兴中会时可能已有这一誓词。
- ㉖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册“革命（甲）”，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60—661页。
- ㉗ 英国殖民部档案C·O·129/283，第138—139页。
- ㉘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第672页。
- ㉙⑳㉑㉒㉓㉔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242、128、244、241、324页。
- ㉕ 《士蔑西报》1900年10月10日，同上书，第241—242页。
- ㉖ 英国殖民部档案C·O·129/301，第522页，江亚二供词。
- ㉗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102—103页。
- ㉘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21页。谭永年主编，甄冠南编述。

《辛亥革命回忆录》(香港, 1958年)上册, 第265—266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 第224—225页。

⑥⑦ 同上书, 第225—227页。

⑧ 同上书, 第248—249页。

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 第534页。

⑩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编, 第1325页。

⑪ 《胡汉民自传》, 见《革命文献》第三辑, 第32页。

⑫ 《花群丛报》第六册(1910年), 《新军叛变本末》, 供词二。

⑬ 陈景吕:《庚戌之役倪映典遇害真相》, 《辛亥革命回忆录》(二), 第300页。

⑭⑮ 熊克武:《广州起义亲历记》,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第130、131页。

⑯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494页。

⑰ 陈其尤:《黄花岗起义与炸毙凤山亲历记》,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第315页。

⑱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 第1—7页。

⑲ 陈三井:《香港〈中国日报〉的革命宣传》, 载《珠海学报》第13期。

⑳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第190—191页。

㉑ 广告:《代理中国日报》, 《民报》第5号, 1906年6月。

㉒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第126—127页。

㉓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第69—70页。

㉔⑳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第420页。

㉖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第6、45页。

㉗ 《访问李纪堂先生笔录》, 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九册, 第680页。

㉘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第102页。

㉙⑳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 第159、162页。

㉚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第216、217页。

㉛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 第232—233页。

孙中山与澳门

陈树荣

一 孙中山在澳门的早期活动

澳门是孙中山从小就熟悉的乡土。澳门以往隶属香山县(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易名为中山县以资纪念),不少乡人常来往澳门与香山。澳门离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只有30多公里的路程。孙中山的父亲,年轻时在澳门的板樟堂街当鞋匠(还有一说孙父年轻时在澳门还当过裁缝)。

孙中山从小常随父母往来澳门与家乡之间。1878年,孙中山12岁,第一次离开故土,随母亲到美国檀香山,是经澳门出国的。

孙中山此次出国,有的资料称,是由澳门转往香港漂洋过海的。也有的资料说,是直接由澳门乘洋船而去的。

1883年,孙中山17岁,再次往香港读书,也是离开家乡经澳门而去。及至在港学医的5年间,澳门更成为孙中山来往香港与家乡翠亨之间的必经通道和居留地。

孙中山在港学医期间,常来往港澳,发表反清言论,公开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结成小集团,被人称为“四大寇”,经常大胆议政。其时杨鹤龄在澳门的“杨四寇堂”,也常常成为孙中山在澳门时的重要活动地方。

如今《孙中山全集》开卷第一篇《致郑藻如书》,1892年发表在澳门的报纸上。孙中山还常为当时的澳门《镜海丛报》写评论,参

陈树荣,《澳门日报》副总编辑,澳门中山学会顾问,澳门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与编辑工作，在该报刊登“孙医生”的广告。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期间与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时有往来，孙受郑的思想影响不少。与孙中山同乡的郑观应(1842—1922)，香山雍陌人，世居澳门，如今的澳门下环龙头左巷，尚存郑氏百年前兴建的“郑家大屋”。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郑观应蜚居澳门，编著《中外卫生要旨》，于1891年出版。孙、郑两人，既是同乡，又同在钻研中西医学，加上郑氏的改良思想影响，大家志趣相投，常有来往。

1892年春，郑观应在澳门编成5卷本《盛世危言》，初刊于1893年。孙中山其时写的《农功》一文，经郑观应润饰而收入《盛世危言》中。

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郑观应特地为孙中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盛宣怀，请盛氏为之推荐。孙中山这篇《上李鸿章书》，其中的一些主张，郑观应在1892年已经提出，孙受郑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还值得一提的，《上李鸿章书》写成于1894年1月，孙中山先回家乡起草，实际上完成于澳门，其时孙中山正在澳门。《东西药局启事》中有“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之句。亦即1894年2月5日春节前的1月底，孙中山是在澳门。

二 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活动

澳门行医，是孙中山行医济世的第一站，也是孙中山走向社会工作的首端。

1892年，26岁的孙中山(当时称为孙逸仙，1896年流亡日本时才有中山樵之名)，在香港雅丽士医院附设的西医学堂毕业。7月23日获得毕业文凭，9月份来澳，应澳绅何穗田等人的邀请，到镜湖医院出任新设的西医局的首任义务医席，免费赠医，开创镜湖医院西医之先河，并获得澳绅吴节薇等人支持、担保，于

同年12月向镜湖医院借款1444两，在草堆街80号开设“中西药局。”由他在镜湖医院“自愿赠医”，替病人治病，然后由他“西药赠送”，亦即西药由他的中西药局赠给病人，作为支付借款的利息。此事在孙中山向镜湖医院借钱开办中西药局的“揭本生息赠药单”上有此说明。

孙中山为什么要来澳门行医？与孙中山一起毕业的同学江英华，曾有一段回忆录，叙述二人毕业后，曾受港督罗便臣驰书推荐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已被接纳，“可来京候缺”，但赴广州领牌晋京时，却受总督李瀚章诸多为难，孙中山气怒而返港。此段忆述，见于郑子瑜《总理老同学江英华医师访问记》，该文刊于1940年1月26日香港《华侨日报》。

孙中山在港学医5年，常常返乡，来往港澳间，曾应澳绅曹子基、何穗田等人之邀，治好了他们久病未愈的家人。孙中山的医术精明早已驰誉濠江，当孙中山在西医学堂行将毕业，澳绅已多次殷切邀请孙中山来澳行医济世。因此，孙中山赴京不成，便即来澳，受聘于镜湖医院当义务西医师，其时该院已开办20年。

关于孙中山应邀来澳行医的史实，在1935年广州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印的《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由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距今已近百年，留下的史料很有限。有关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活动，包括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时间、年份、医馆地点、医疗活动及其影响等，以往史料记载甚少。几年前，笔者从中、葡文《镜海丛报》中发现了有关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活动的几段消息、5则广告。这些新史料，有助于了解、研究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活动。笔者当时陆续写成了《孙中山澳门行医史料新探》、《孙中山医术精湛镜湖耀彩》、《孙中山当年来澳门行医寄寓议事亭前地14号》等文章，刊于《澳门日报》上。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有多长时间？以往的史料，较多的说法，是孙中山自1892年秋起在澳门行医，因医术精明，业务蓬勃，受

葡医所妒而被排挤，只在澳门行医数月，便离澳赴穗，先后在广州和香山石岐开办新的中西药局。

但新发现的5则有关孙中山澳门行医的广告，分别刊登于1893年7月至10月，可以说明孙中山当时还经常在澳门活动。

这5则广告的刊出，始于1893年7月。其中一则广告《神乎其技》，通篇颂词，赞颂孙中山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此则广告，7月份刊登了，9月份再刊登。另一则由6位澳门知名人士联名“同启”的广告《香满镜湖》，则开列了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时间、地点、诊金、办法、治病形式等。此则广告，刊于1893年的9月、10月。而另一则由“中西药局谨启”的《中西药圣》的广告，甚至每周登报，达1年之久，且广告行文一字不改。倘若孙中山当时已不在澳门行医了，还有必要陆续刊登这几则广告吗。

从《香满镜湖》的广告，可知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有几个突出的地方。

一、固定诊症的地点有3个，除了镜湖医院，还有“草堆街中西药局”和“仁慈堂右邻写字楼”，即孙中山来澳的寓所，位于“议事亭前地14号”，为居澳葡人民间慈善团体仁慈堂的物业，租与孙中山，称之为“孙医馆”。

二、精力非常充沛，时年27岁的孙中山，晨早7时至9时，在中西药局诊症；由10时至12时，则在镜湖医院免费赠医；1时至3时，在仁慈堂14号“孙医馆”诊症；3时后，还常应邀外出诊症；“礼拜日10点钟至12点钟”，还在写字楼“孙医馆”接受种牛痘。

三、业务相当蓬勃，每日诊症时间安排紧凑，并设“成年包订，每人发送医金50元；全家眷口不逾五人者，发送医金百元。”

四、医德高尚，热心公益，“先生原不欲酌定医金，过为计较”；“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凡外间延请，报明急症，随时速往，决无迁延。”

五、医术高明，除了诊治各种常见病，并延往救治难产及吞食服毒药，还专医奇难怪病，做一些外科、整形手术，包括“补

崩牙、崩耳、割眼膜、癰疮、肿瘤、淋结等症。”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事迹。1893年7月18日的中文《镜海丛报》创刊号的“镜湖耀彩”新闻中，已有刊登，全文如下（原文无标点，亦无分段）：

“陈宇，香山人，六十一岁，患沙麻八年矣，辛楚殊常，顷在医院为孙医生割治，旬日便痊精健倍；

“昔又西洋妇某，胎产不下，延孙治之，母子皆全；

“又卖面人某，肾囊大如斗，孙医用针刺去其水，行走如常；

“又大隆纸店两伴，误为毒药水焚炙心胸头面，势甚危殆，孙医用药敷之，旬时就愈；

“又某客栈之伴，与妻口角，妻于夜半吞洋烟求死，次晨八点钟，始有人抬到孙馆，如法救之，亦庆更生；

“又港之安抚署书写人尤其栋，患血症多年不愈，华医束手，亲造孙医求治，一月奏效。”

此段文字，虽仅200余字，但欲描述生动，很有可读性，为研究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仅从6个病例，足可见27岁的孙中山在澳行医时，医术精湛，远近驰名，洋妇也来求治，港人也跨海而来。“孙医生”的名声远播，“孙医馆”名扬四方。

当时，孙中山的名字是孙逸仙，而一般人皆称之为“孙医生”，孙中山在《镜海丛报》刊登广告，亦署“孙医生”之名。盖当年澳门镜湖医院已办了20年，在华人社会中颇有威望。而孙中山则是镜湖医院首任西医，以其医术精明而令“镜湖耀彩”，至众人皆知镜湖医院有位“孙医生”。

三 孙中山与《镜海丛报》

《镜海丛报》是孙中山早年在澳门活动时，在葡人好友法连斯哥·飞南第支持下，合作创办的中文周报，创刊于1893年7月18日（即光绪十九年癸巳六月初六日），结束于1895年12月25日（光绪

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历2年多时间，共出版了130多期。

《镜海丛报》以16开张印刷，51×34公分，出纸1.5张，共6页，铅字排印，标题大字相当于1号宋体，内文小字则相当于4号宋体。采用通栏排印，长行直排，由上而下，不另起行，文言体裁，没有标点，版面古朴，每页可容1700多字，与今日分栏排印的报纸迥然不同。

《镜海丛报》虽然尚没有每日电讯新闻和电版图片，但内容还较为丰富，大概可分为3大部分。一为论说（即社论），二为新闻，三为广告。新闻又分4类，包括刊登国内外新闻的“中外报”，广东省和香港新闻的“省港报”，澳门及香山新闻的“本澳新闻”，还有选登各省辕报、上谕、京抄奏报、文武升迁消息的“官样文章”。每项新闻分二三段不等，每段前都冠以4个字的小标题。此外，还刊登一些诗词，相当于今日报纸上的副刊。

在编排、印刷、内容、风格上，《镜海丛报》虽然远不及今日的报纸。但在90多年前，这小小的报纸欲远销中外各地，“代派纸之处”（分销处）却有17个，包括“氹仔、湾仔、前山、石岐、省城（即广州）、佛山、香港、星架坡、福州、厦门、上海、北京、横滨、小吕宋、旧金山、大西洋（即葡萄牙）、地打埠”，影响颇远。

《镜海丛报》是怎样创办的？以往的资料显示，是由居澳葡人印刷高法连斯哥·飞南第支持孙中山合作开办的。报主飞南第原已创办和经营葡文周刊《澳门回声》（《ECHOMACAENSE》）。中文《镜海丛报》的东主是飞南第，孙中山则主理编务。

飞南第的好友诺巴特（曾任澳门氹仔市政厅官员）的后人劳拉·诺巴特，1986年11月在里斯本接受《光明日报》记者访问时，也证实当年飞南第与孙中山甚为友好，孙中山为针砭时政，宣传进步思想，与葡印刷商飞南第合作创办《镜海丛报》，社址在飞南第祖屋旁的“下环正街3号”。

孙中山当时在澳门开办的“仁慈堂右街孙医馆”和“草堆街中西药局”，被列入《镜海丛报》订报和收广告的地方。而孙中山在石

岐开设的“西门外中西药局”和在广州的“省城双门底圣教书楼”，以及孙中山在香港就学时经常读书的地方“香港文武庙直街文裕堂”等，亦成为《镜海丛报》的“代派纸之处”。于此可见孙中山与《镜海丛报》的密切关系。

《镜海丛报》的社论，特别是早期的社论，大都抨击时弊，措词激烈，颇为符合孙中山青年时的心态与作为，所署“黔上味味生”的笔名，或许是孙中山早期的笔名。

《镜海丛报》的许多新闻，大都夹叙夹议，借题发挥，针砭时弊，有的很可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

孙中山早期的医务活动，亦反映到《镜海丛报》。其中，有的新闻涉及孙中山的行踪，颂扬孙中山的医术高超。广告中亦有多篇刊登“孙医生”的医务活动。

还值得一提的，《镜海丛报》“新闻纸第三年第十六号”，刊于1895年11月6日，正是孙中山在广州首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抵澳的第二天。报上刊登了是次武装起义的“电讯”，在“社论”《是日邱言》中，加以类似今日“编者按”的文字，并全文“特录”经修订过的孙中山的“农学会序”。这一期《镜海丛报》，很可能是由孙中山负责主理编务的最后一期了。

有关孙中山与《镜海丛报》的史料还很缺乏，很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而从现有的史料、文献等来看，孙中山自己完全没有谈及《镜海丛报》，这或许是出于早期革命工作的需要，孙中山不便于透露，以防清廷耳目。正因如此，更增加了研究孙中山与《镜海丛报》的困难。

四 孙中山与葡人飞南第

葡人飞南第，是“FRANCISCOH·FERNANDES”中文译名，刊载《镜海丛报》报名下。

《镜海丛报》由“下环正街镜海丛报飞南第刊印”。澳门下环正

街3号，是《镜海丛报》馆址，同街1号，是飞南第的祖屋。

1892年9月12日出版的《镜海丛报》“新闻纸第一年第九号”，其中的社论《此批论》中，称飞南第是“世袭相承之报主”。

葡人法兰斯哥·飞南第，是几代居澳的葡人，他的葡文全名为FRANCISCOH·FERNANDES，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1960年11月8日，法新社从澳门发出一段消息：86岁的澳门老居民乌苏拉·飞南第，在其澳门祖屋——下环街1号去世。消息说她是澳门葡人飞南第家族中最后一人，又称她与哥哥是孙中山生前的好友。

孙中山在香港读大学时，认识了飞南第。那时，飞南第在香港法院任翻译。鸦片战争后，香港开埠，澳门有不少葡人、葡人士生仔，往港经商或当公务员，香港电话公司最早的接线生，多是澳门土生人士。由于飞南第在澳门出生、长大，对华人熟悉，懂讲广州话，为与孙中山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堂大学毕业后，来澳行医，为取得合法执照，曾委托飞南第代为申请。孙中山虽因没有葡国毕业文凭未能领到西医生执照，但却加深了与飞南第的友谊和了解。孙中山离开澳门行医之时，曾把在澳行医的有关用品及碗碟、医疗器皿等，赠与飞南第一家。这些孙中山遗物，后来由飞南第的妹妹转送还给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现还有其中几件，陈列在澳门“国父纪念馆”——昔日卢夫人长期定居的“孙公馆”。

孙中山与飞南第的友谊长进，尤为突出表现在合作开办《镜海丛报》。当孙中山在广州策划首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逃抵澳门，《镜海丛报》还刊登有关消息，在头版刊登孙中山在起义前发表的《农学会序》，并加上类似“编者按”的评述，介绍孙中山的事迹，赞扬孙中山“习知外译事态语言文字并精西医”、“盖亦聪颖绝伦之士”、“所志甚大”，文中且“深叹其才之不用”而为之可惜。

在这份中文《镜海丛报》出版的3天后，飞南第主办的葡文《澳门回声》报，又刊登介绍孙中山事迹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在澳门

行医时，曾寓于“议事亭前地十四号”，这是仁慈堂的物业，记录在仁慈堂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议事亭前地十四号这座房子，曾租给中国人孙逸仙，租期一年，月租金十二元，担保人是中国人叶来新。”这份会议记录，刊登在这一期《澳门回声》报上。

在孙中山落难之时，飞南第仍赞扬孙中山，两人的深厚友谊可见一斑。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逃抵澳门后获飞南第安排脱险。

孙中山抵澳后，即去下环正街找到飞南第。飞南第当时已从澳门政府官员中获得消息，清政府正在通缉孙中山。飞南第毫不理会个人安危，想方设法将孙中山藏匿起来，并通知孙中山尽快离开澳门。为求完全计，还陪孙中山一起去香港。据居澳葡人历史学家、汉学家高美士记述，当时孙中山还男扮女装，由飞南第陪同，乘船往港，才避过了清政府的耳目。

这样传奇性的事迹，令人想到孙中山在早年的反清革命活动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外国友人，除了曾在伦敦蒙难中营救他的英国康德黎博士外，还有这一位葡人飞南第，而且飞南第悉力机智营救孙中山，是在孙中山伦敦蒙难之前一年。飞南第是拯救孙中山的第一位外国人。

孙中山与飞南第的友谊既深厚且长存。当孙中山于1912年5月下旬抵澳返乡，受到澳门中葡知名人士100多人的热烈欢迎，欢迎者中，自然有飞南第一家了。

回顾孙中山与飞南第两位中葡人士之间的友谊，是饶有意义的。只可惜留传下来的资料尚少，而收集较多的是居澳葡人历史学家、汉学家高美士。他是孙中山的崇拜者，也与飞南第一家熟悉，他掌握的史料颇有可信性。

30年代后期，澳门虽仍属葡人管治，但实际上已是日本“皇军”的世界，生活艰难。飞南第的遗孀，生活非常困难，要将一束仅存的《镜海丛报》中葡文版平价出售，为高美士得悉，购买到手，保存迄今。这一束《镜海丛报》，虽缺失较多，远非全套，但现

在已是非常难得的资料，属于澳门的文物性的资料了。

高美士在其撰写的孙中山与澳门的事迹的文章中，谈到几件事，很有价值。一是1910年葡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致函飞南第表示祝贺；二是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当时身为澳门市议事公局委员的飞南第，建议庆贺获接纳，市政厅升旗庆贺；三是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拟聘请飞南第当顾问，而飞南第则以年事已高婉言谢绝。飞南第在30年代后期在澳门病逝。

五 孙中山与曾居澳的亲属

孙中山与澳门关系密切，澳门是孙中山安置家人的地方，不少亲友曾在澳门居住。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长女孙璇、幼女孙琬和女婿戴恩赛博士以及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均先后在澳门病逝。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也经常来澳门，唯一的侄儿孙昌，也在澳门读书长大。

1952年9月7日，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1867—1952)，以85岁高龄在其寓所“孙公馆”与世长辞。卢太夫人笃信基督，为澳门浸信会会佐。卢夫人病逝后的第3天，即9月9日，澳门浸信会为卢太夫人举行隆重的葬礼。礼成后，安葬在澳门大西洋坟场，由孙科及其两子同立牌石纪念，至1973年才迁葬于氹仔孝恩墓园。

卢太夫人病逝之时，孙中山在澳门的亲属尚多，参加葬礼的“孙老太之亲属”，据一张照片所见，计有孙中山的次女孙琬、外孙女戴成功(孙琬之女)、次孙孙治强(孙科之次子)和前妻，孙中山的侄孙孙满、孙乾等以及孙中山的其他亲友。

卢太夫人自1913年春来澳门定居，至1952年9月病逝，有近40年时间在澳门生活，其旧居于1958年开放为“国父纪念馆”。卢太夫人的次女孙琬与女婿戴恩赛和女儿戴成功一起，也长期在澳门居住，侍奉卢太夫人。卢太夫人逝世后3年，其女婿戴恩赛也在澳门病逝，终年62岁，下葬澳门旧西洋坟场，后来迁葬香港。

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1894-1955),广东五华县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深造,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1915年取得硕士学位,191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国,在“广东省政府”外交部任职,受外交部长伍廷芳博士委任为外交部秘书,翌年晋升为外交部的政治组组长。后来,戴恩赛成为外交人员,1930年曾出使南美洲巴西任公使,1932年回国,1936年任粤海关监督,1938年在澳门“中山纪念中学”任代校长。

戴恩赛与孙科留美认识,返国后在穗是邻居,又同在广东军政府共事,因此结识了孙琬,成为孙家的乘龙快婿,1921年在澳门“孙公馆”结婚,婚后第2年在香港育下女儿戴成功(名字由孙中山定的),1923年又在香港育下儿子戴永丰,以纪念孙中山在当年遇险的“永丰舰”事件,戴永丰于1952年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患急病早逝。

戴成功事母至孝,长期在澳门侍奉母亲孙婉,今仍健在澳门,为广东省政协委员。

孙中山的次女孙琬是卢夫人初次抵檀香山与孙中山相会后翌年所生。孙琬1896年11月12日在檀香山出生,刚好与父亲同月同日生,全家甚为高兴,尤其是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只有独子,很喜欢女孩子,说这是“金不换”,拟给她改名为金琬(音碗)。但孙中山嫌“金”字俗气,故只用“琬”字,而给爱女的信则将“琬”字改为“婉”字,更为女性化了。

孙琬在美国加州大学取得文学士学位,于1979年8月10日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终年83岁。生前为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孙琬与母亲卢夫人的墓地,均在氹仔孝思永远墓园。

孙琬在兄妹3人中最长寿,比哥哥孙科还多活了1岁。孙科1973年在台湾病逝,享年82岁。孙科从小随母亲卢慕贞生活。由于母亲长期在澳门定居,孙科与澳门关系密切,常来往澳门。澳门浸信会的“浸礼名单”上,亦有孙母及孙科兄妹入教“受浸”的名字。1938年10月“中山纪念中学”从翠亨村迁澳,由孙科任校长。

抗战胜利那一年，孙科参加澳门同胞的庆祝会，曾在平安戏院演讲。1947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卢太夫人80大寿，回翠亨村度过生日，在中山纪念中学欢宴全村男女老幼上千人，孙科与陈夫人偕同儿子治平，治强等赴会，场面甚为热闹。孙科的女儿孙穗英等，也曾在澳门居住。

孙科的妹妹孙璫(孙琬之姐)，1895年生于香山故乡，1岁那年，因父亲被通缉，随母与兄一起离乡赴檀香山，长期在异乡长大。1912年夏，孙璫与兄妹嫂子一起赴美读大学，翌年不幸身患重病。1913年6月，年仅18岁的孙璫，在澳门病逝。孙中山闻爱女病讯，特从上海赶来澳门探望。

年半后，1915年初，孙眉在澳门鹅眉街寓所病逝，终年60岁。孙中山当时未能及时赶来澳门送殓，甚感哀恸。因为，在孙中山的成长及革命生涯中，哥哥孙眉长期给予鼎力支持，起了重要的作用。

孙眉只有一子孙昌(又名孙振英)，从小在澳门长大，曾入三巴仔教会学校。孙中山对孙昌这唯一的侄儿关怀备至。

孙昌追随孙中山革命，20多岁任参谋，曾随孙中山参加镇南关攻打督师衙门役。1917年，孙昌在广州黄埔殉难，时年34岁。孙中山闻讯甚为痛惜，亲自为之题词“为国捐躯”。孙昌的两子孙满、孙乾，曾在澳门居住，现尚在美国。

至于陈粹芬，乃为孙中山的陈夫人，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称陈四姑，广东清远人氏，比孙中山年轻六七岁，据说是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来澳门认识的，早已结合。陈氏后来对孙母照料甚为殷勤，与孙家人和睦相处，与卢夫人姐妹相称，为孙家认同，其养女与孙中山的侄孙结婚，更为亲上加亲。抗战之后，先居澳门，其后曾回石岐，向由孙中山的侄子孙乾(曾任中山县长)供养。

陈夫人为人豪爽，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孙中山流亡日本横滨之间，得陈夫人鼎力支持。陈夫人在横滨时，常为同志洗衣、做饭、传递消息；在南洋时，伴随孙中山左

右，亲自印刷宣传品。陈夫人以英勇、勤劳著称，乃是对革命有功之士，不应被埋没。

六 孙中山民初两次来澳门

辛亥革命后的两年间，孙中山两次来澳门，作短暂逗留。首次是1912年5月下旬，借回到阔别17年的家乡之行，顺道访澳3天。第二次是翌年6月，来澳约一周。

1912年5月孙中山澳门之行，时间虽短，但甚为隆重，受到澳门中、葡人士的热烈欢迎，并留下在卢园拍摄的几张珍贵的合照。

孙中山此次来澳门，是取道澳门重返阔别17年的香山故乡翠亨村，也是孙中山1895年的重阳首次广州武装起义失败经澳逃亡海外17年后，首次涉足澳门。因此，孙中山对此行感到特别亲切，澳门各界人士亦特别隆重欢迎。

孙中山此行，可追溯至当年年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29日，卢夫人偕两女孙珽、孙婉、侄女孙霞、佣妇阿清一起由邓泽如护送，由南洋槟城抵达南京，与孙中山团聚，在南京居住20多天，3月25日，孙眷离宁返粤。不久，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4月起，访问鄂、粤、港、澳等地，孙珽、孙婉与当时出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爱琳（宋庆龄姐姐宋霭龄，后来成为孔祥熙夫人）随同，于5月下旬，经澳返乡，5月27日返回离别17年的故乡，与卢夫人和孙眉兄和父母团聚。

孙中山在当年4月25日抵广州，陆续参加了报界、商界、医学界和耶苏教联会以及几十个街坊社团联名的欢迎会。5月16日参加了全粤各界追祭黄花岗72烈士大会，由孙中山主祭。

5月20日，孙中山由穗到港，寓英皇大酒店，接受了《士蔑西报》记者的访问，谈了有关中国不得不借用外债进行实业建设和兴办教育等问题。并否定了“欲隐居澳门”，表示“在澳门建屋，是兄居非予居也”。当晚出席了香港筹饷局在石塘咀陶园的公宴大会，

会上燃放烟花,宾主尽欢,又畅论国民银行与国民捐事办理事宜。孙中山此行往港,主要是与华商面商补救粤省财政方法。而当时香港正在鼠疫流行。

澳门商界、社会知名人士获悉孙中山已抵香港,即派代表往港,迎候孙中山来澳。

5月24日孙中山偕女儿孙婉和秘书宋霭龄等人抵澳,先往萧瀛洲府第(即今日百老汇大厦现址,昔日为萧家大屋),然后下榻卢园春草堂,与园主卢廉若(大赌商、澳门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等人合照。

孙中山此次访澳,除了重访镜湖医院,最大的对外活动,乃是在澳门三大名园之一的娱园(又称卢园),应邀出席澳门中葡各界人士隆重的欢迎大会,与澳督、主教、大律师、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等100多人合照留念,迄今尚留下1张1公尺阔的珍贵照片。

孙中山结束澳门访问后,26日离澳,视察了香洲新埠和山场,接受了乡亲的欢迎,然后乘船到崖口登陆,27日回到翠亨村,28日前往邻村左步头乡祭祖,受到乡亲们隆重、热烈欢迎。29日离乡返抵广州。

此次访澳,《民立报》在5月28日报道:“孙中山先生往澳门调停王和顺、孙眉、关仁甫、杨万夫等意见无效。顺道受香洲埠、山场等欢迎后已回乡。”而《民立报》在5月24日则曾发一段“广东电报”:“省城连日下令戒严,遍搜军火,水陆皆然,大兵云集,哄传王和顺等进省起事。”这两段消息提供的资料,是值得研究的。

孙中山1913年6月澳门之行,有其特别的意义,但以往史料记载甚少,而翻阅《华字日报》、《民生日报》、《申报》等,还可发现一些资料。

孙中山此行来澳之前,曾于同年的2月11日由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了一个多月,直至袁世凯指使凶徒枪杀了宋教仁,孙中山大为气愤,于3月25日由日本返上海,准备策划倒袁运动。

孙中山为什么要从上海经香港赶来澳门?主要是因长女孙璇

病危。《民生日报》6月23日报道“孙中山返澳”：“孙中山此次返澳，系因其女公子患病濒危，由美洲回家，闻病必不起，一日数电先生一来抚亲。故先生偕同行者三数人，由沪乘英国邮船抵港，即径赴澳门，与其女公子相见，先生素精医学，一见即知其病不能治，为之惨然。”

孙珽病重(据说是肾病)，于1913年春，由美洲华侨伍平一请医生与护士伴送回国，乘“蒙古”轮由美洲抵达香港，接着来澳门医治，准备返乡一行。可是，由于病情太重，医治无效，于6月25日在澳门病逝。孙中山对子女很疼爱，百忙中也抽时间返澳，但所见爱女，已经昏迷不醒，“为之惨然”。

据《华字日报》所载，孙中山是于6月16日下午与眷属乘瑞泰轮船来澳门的，约于24日离澳门往香港。在澳门约一周，住龙嵩街其兄寿屏之家。而孙科则亦赶来澳门，与父母妹妹团聚。

孙中山对此次澳门之行，据《民生日报》载：本来“不过了却儿女索缠，绝不与闻政事”，然而，“此次孙中山返里，踵门叩谒者络绎不绝，二十号午，新任粤督陈炯明乘座江汉兵船，由省启行，至下午八点钟抵澳，随命人请孙中山下船谈话，孙赴兵船，约谈数点钟之久”。

而据《华字日报》报道，此次孙陈谈判，“下船谈至深夜两小时，乃别。而陈亦即命启轮返省。闻谈者，是陈因胡汉民之事难以接受，且胡已于十七日乘宝璧轮抵港，故请教于孙如何办法。至于中山之如何指教，则未闻也”。

孙中山此次来澳，与陈炯明在军舰上会晤，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但此举却有重大意义，经在舰上商谈“讨袁”事宜，促陈同意了“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导致其后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力斥袁世凯违背共和主张。而翌日，福建也宣布独立，与袁世凯北方政府脱离关系。

七 孙中山继续关注澳门

民初孙中山两次来澳后，据说孙中山还在1917年7月之后，来澳探望过卢夫人，但资料甚少。许崇智的女婿潘岩曾写过一小段回忆录：“一九一七年间，许崇智曾随孙中山先生到澳门文第士街探望卢太夫人。卢太夫人对我岳父说：我一家之生活，一向艰苦，现住之屋，虽是租赁而来，但能得住于此，已很不错了。后来我岳父出资白银三千元将此屋买下，赠给卢夫人。”

1917年后，虽然未闻说孙中山再来澳门，但他仍继续关注澳门，并利用澳门开展革命工作。

在此之前，孙中山曾于1914年至1916年间委托得力助手朱执信多次来澳门，策划“讨袁运动”，筹款，买军火，印刷传单等。

1919年，粤军决定回师，孙中山着孙科回澳门以特派员名义成立办事处，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孙科在澳门鹅眉街10号设办事处，接洽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并多次传达孙中山催促广东各部队发动起义的意见。

1920年初，孙中山特电在澳门策划起义的孙科，催促广东省内各部革命队伍先行发动起义。7月15日，江大舰起义，从广州驶抵澳门南湾被发觉，在路环九澳湾搁浅，是次起义终因对敌麻痹、措施不周而失败。

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聘请当时在澳门定居的杨鹤龄（“四大寇”之一）为总统府顾问。1923年又委派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

1921年10月2日，孙中山为澳门葡兵越界枪击中国军队并在事后拒绝广州政府抗议一事。饬令海军派军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

1922年6月2日，孙中山接见澳门工会代表，支持他们在澳门“五·二九事件”中，反抗葡兵枪杀华工的斗争，次日，广州政府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最后警告，并派陆军和炮舰赴前山一带，

支持澳门华人。

1923年2月5日，对孙中山革命鼎力支持的兴中会值理邓荫南在澳门去世，孙中山闻耗后即发布明令：“邓荫南为国尽瘁，老而弥坚，今忽溢逝，殊深震悼。邓荫南着授陆军上将，并给银一千元治丧，所有应行议恤事宜，大局底定即由陆军从优拟议。”1924年10月，在孙中山的关照下，人们将邓荫南的遗体，从澳门运回广州，葬在今先烈路青龙坊口。

孙中山一生与澳门关系密切，澳门同胞支持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后，全澳曾多次捐款，由镜湖医院转交。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噩耗迅速传遍全国，神州震动，各地纷纷举行悼念大会。澳门各界人士也于3月29日，冒雨集中镜湖医院，隆重追悼孙中山。当时澳门人口只有10余万人，参加者却逾2万，反映了澳门同胞对“手创民国之大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深切悼念，寄托着同胞们的哀思，爱国情怀感人至深。

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作用

方 雄 普

8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海外华侨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孙中山先生曾有过一些评述。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颁发菲律宾中国国民党分部的训词中说：“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① 1923年，孙中山先生写《中国革命史》，在总结辛亥革命前的起义经验时指出：“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②

孙中山先生对华侨的高度评价，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不过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华侨为革命之母”^③这句话了。据说以这个题词制作的匾额，还曾挂在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社里^④。

当然，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和主要力量在国内而不在国外，不过由于华侨思想开通较早并对革命建树良多，孙中山先生用这句话来概括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作用，倒是颇有道理的。

那么到底华侨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呢？海内外一些研究文章已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了，将这些成果加以综合概

方雄普，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秘书长。

括，大体有以下4个方面。

第一，在组织上，建立兴中会，首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第二年初，他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随后陆续在南非、台湾、河内、旧金山等地建立分会。兴中会会员总数不满500人，不过有名籍可查的约300人左右。据有关的统计资料，1894和1895年参加兴中会的178人中，华侨占了79%。^⑤显然，兴中会是以华侨为主体的。

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章程》是一篇激烈的救国宣言，面对“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这样深重的民族危机，华侨发出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呐喊^⑥。这是掷地有声的声音。

那么国体如何维持，中华怎样振兴呢？尽管兴中会章程没有交待，不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句会员入会的誓词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1903年，孙中山先生将兴中会的誓词修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在成立同盟会时，他又一字不改地将这16字变成同盟会的会纲。可见，“创立民国”源于“创立民众政府”，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所谓“合众政府”是指美国式的联邦政府，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种形式。因此说，兴中会的誓词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中国的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举世无双的。不过，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农民起义的英雄们提出的只是类似“均田、免粮”一类的口号，即使《天朝田亩制度》中所描绘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不过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已。兴中会不仅与历史上旧式的农民运动组织有根本的区别，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团体所提出的纲领或口号也有所不同。华兴会只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科学补习所则主张“革命排满”，光复会的“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也没有更多的新意。显然，海外华侨的视野，比起他们的先辈和同时代国内的许多同胞来说，要开阔得多。

第二，在思想上，积极参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为革命鸣锣开道。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亡日本。他们在那里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第二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将其活动中心转到美洲。据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的记载，保皇会后来的总部设在澳门，它的海外支会共有103个，其中美洲86个。

康、梁早期鼓吹变法维新，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当人民起来要求推翻清王朝的时候，他们却大搞“勤王”，这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海外林立的保皇会是改良派的大本营，不冲破这种羁绊，革命就不能前进。

辛亥革命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过两次激烈的论战。第一次是1903年至1904年，第二次是1905年至1907年。前一次论战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后一次论战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在这两次论战中，尽管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后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将论战引向深入的却是在华侨中间进行的。

早在19世纪50年代，海外已经出现了华文报刊，后来，随着民族意识的抬头和华侨经济的发展，华文报刊发展很快。在海外，由革命派主持或创办的华文报刊参与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的不少，例如檀香山的《檀山新报》、《自由新报》，旧金山的《大同日报》、《少年中国晨报》，新加坡的《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温哥华的《大汉日报》，曼谷的《华暹新报》和仰光的《光华报》等，有数十家之多。

《檀山新报》是同盟会成立前檀香山最早的华文报纸，该报先

后发表了孙中山先生撰写的《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这两篇战斗檄文，指出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不能混淆，东西不能易位，宣传了“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别无挽救之法”的道理，给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对改良派的斗争日益深入。檀香山取“言论自由，革旧迎新”之意而创办的《自由新报》，不仅“高谈排满革命，无所顾忌”，而且还先后编印了《自由言论》、《人道》、《革命真理》、《扬州血泪》等4书行世。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的前身是《美洲少年周报》。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后，宣统继位，醇亲王摄政，缅甸仰光的《天南新报》曾就此事拟出“摄政王兴，摄政王亡，清国兴亡两摄政”的联文征对，《周报》则刊出“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的对句^①，太平洋两岸的华文报刊，遥相呼应，以多种形式提倡革命，攻击清政府。加拿大为保皇会的发源地，《日新报》是温哥华保皇会的机关报。1909年温哥华洪门聘请香港《中国日报》社长冯自由任主笔，筹办《大汉日报》。冯到任主笔1年有余，《大汉日报》与《日新报》之间，“彼此驳论至二百余篇，为海外两党最持久之文战，而侨胞知识亦缘是具长足之开发”^②。在新加坡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与改良派的《南洋总江新报》的论战，实际上是过去《民报》与《新民丛报》在东京所进行论战的延续。汪精卫、胡汉民为助战出任《中兴日报》的编辑，甚至孙中山先生本人亦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为《中兴日报》撰稿。所有革命派在东京参与论战的《民报》的旧班底，在1907年之后，几乎全部移到了新加坡^③。

同盟会成立前后，经过两次激烈的论战，革命派终于战胜了保皇派，这是继戊戌维新以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海外的斗争，不仅促进了海外华侨的觉醒，而且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斗争。正如檀香山的《自由新报》所说：“文字收功之日，还我山河；英雄应运之秋，荡平丑虏。”^④海内外民主思潮的劲风吹拂，预示着辛亥革命狂飙的到来。

第三，在经济上，捐资输财，筹集巨额革命经费。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捐资，大体可以分为武昌起义之前和武昌起义之后两个阶段，前者主要为多次武装起义募集资金，后者则为新建立的革命政权服务。在此期间，究竟华侨一共捐了多少款项，人们不易得出精确的统计，不过就以下一些大项来说，还是可以看出基本轮廓来的。

从兴中会成立至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曾直接领导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这就是1895年的广州乙未之役，1900年的惠州之役，1907年的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1908年的钦廉之役、河口之役，1910年的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的广州“三·二九”之役。这10次起义所花的经费约60万元（大多为港币），其中90%为华侨所捐献。^①

华侨不仅捐款筹划武装起义，而且在办报、印刷书刊宣传革命方面也不遗余力。冯自由在日本合印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共10万册，分寄海内外同胞；新加坡的陈楚楠、张永福将《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印刷2万余册，在海内外广为宣传。他们所花的都是华侨的钱。甚至连中山先生数十年间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的旅费和个人生活费，也都是由华侨和留学生资助的。如果没有广大华侨的支持，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就会寸步难行。

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迅速土崩瓦解，随着地方的光复，中央和地方都在组建新的革命政府，但他们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孙中山先生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头一天，还身无分文，他风趣地对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说：“你如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②当时因为缺乏粮饷，南京政府的军队有哗溃之势，陆军总长黄兴急得寝食俱废，甚至口吐鲜血。由此可见财政对革命政权建设的重要。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全世界各地的华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海外有的学者不完全的统计，从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的4个月中，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约合238万港元，^③这些款项，分别寄往南京、上海、广州、

福州等地。关于华侨支持地方政权建设还有一些统计资料。据曾任福建临时政府交通司长黄乃裳的记叙，光复后的福建省新政府共收到华侨汇款70多万元^④。另据《广东财政司收支报告总册》记载，从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5月31日，广东省政府收到海外华侨捐款284054.34银元，海外华侨借款1474645.20银元(所谓借，很多后来实际是没有还的)^⑤。

华侨踊跃捐款的精神十分感人。越南华侨关唐，以挑水为主，每挑一担水只获得一文钱的报酬，尽管如此，他却将自己一生积蓄的3000元悉数捐献。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匹兹堡时，有一位洗衣工人到旅舍去拜访他，送他一个麻袋，未留下姓名就走了。麻袋里装的是这位工人的全部积蓄^⑥。在马来亚锡矿的华工，每人月薪一般是8至9元，除去生活及贍家费用，每月能节省下1至2元在手已经很不错了，但他们常常一下捐20至30元；有的华工甚至先写名字于捐款簿上，然后等发下工资再付款^⑦。至于华侨商贾，踊跃捐资的也不乏其人。在法国经营古董的张静江曾与孙中山先生相约，以后从事革命活动如果缺少资金请拍一封电报，电报上无需写具体内容，只写ABCDE几个字母即可，这几个字母便代表1万、2万、3万、4万和5万元，张静江就会如数汇去。有一次，孙中山先生让人拍了一封有E字的电报去，张静江果然汇来5万元^⑧。1911年，光复后的福建“库空如洗，民心动摇”，新加坡以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为会长的保安会即汇去捐款20万元。不久，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陈嘉庚又以个人名义直接汇给孙中山先生5万元捐款^⑨。新加坡华侨林受之，原是一个有几十家橡胶店的富商，他多次赞助革命经费，其中捐助潮州起义经费2万余叻币，最后甚至连两位夫人的积蓄也都献出，以至“儿女众多，无力使之一一完成教育，只得分散在南洋各地，自食其力佣工为生^⑩。”

第四，在军事上，冲锋陷阵，积极回国参加武装起义。

兴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先生随即携带华侨的捐款，回国策划1895年的广州乙未之役。当时，檀香山的华侨邓荫南、宋居仁，

澳洲华侨谢纘泰等积极参与了策划并做了不少工作。

1906年以后，孙中山先生以新加坡的同盟会为中心，依靠侨胞，联络国内的会党，在中国的南部直接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他的设想是先取广东，次取广西、云南，占领南部7省，然后北出长江。在这些起义中，许多华侨青年积极参与。1907年5月的广东黄冈之役，攻打县城，建立地方军政府，起义军发展到最多时有五六千人，这是由新加坡的华侨富商许雪秋具体策划的。1907年6月，孙中山先生派新加坡华侨邓子瑜前往发动广东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9月的广西防城之役，实际的指挥则为辗转香港、越南多年，然后加入同盟会的王和顺。1908年3月，钦州、廉州、上思之役，以黄兴为总司令，组织了有200余人的“中华国民军南路军”，他们大多是云南旅越的青年。1907年12月的广西镇南关之役和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之役，也有许多越南华侨加入起义的行列。

华侨参与起义人数之多，他们所表现出的英勇壮烈，莫过于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黄花岗之役集中了各省的精英，准备与清王朝作最后一搏，在辛亥革命中，它的地位“与武昌革命之役并俦”。为了策划这次起义，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黄兴、赵声、胡汉民之外，还有美洲及南洋华侨孙眉、吴世荣、黄金庆等多人。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黄兴率领120余人组成的“选锋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由于孤军奋进，经一夜激战，除黄兴、朱执信等少数人受伤化装逃脱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事后，人们将捡收的烈士遗骸72具葬于黄花岗并修墓立碑，这就是有名的黄花岗72烈士墓。后经多次审查证实，黄花岗之役牺牲的烈士共86人，能确认其身分为华侨的有29人^②，占了1/3。这29名侨居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地的华侨烈士，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仅18岁。其中工人15名，商人3名，其余则为学生、记者和传教士。

在黄花岗之役为国捐躯的华侨烈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篇章。许多人在起义前就写下了绝笔诗、绝笔信，以示一去不归的决心。15岁加入同盟会、18岁参加广州起义的马来亚霹雳埠的华侨余东雄给友人写信，表示假如“敌众我寡，万一失败”，即使自己“受千枪百剑，手无寸铁”，也要“奋臂杀敌，死而后已”。后来，他果然壮烈献身了。还有一些华侨烈士是受伤被俘，然后就义的。槟榔屿的华侨李雁南，在攻打总督衙门时不幸受伤被捕。审讯中他说：“中国要有救，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清朝。可恨我现在身中两弹，不能战斗了，我唯一的请求就是尽快将我处死”^②。行刑前，他不愿下跪，从容地走到空地对警兵说，“请用枪从口击下”，说完便饮弹而死。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确实令“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③。

二

辛亥革命是一场有许多阶层都参与的伟大社会变革，如果在这场变革略加考察，人们就会发现一生按常理不易解释的现象。比如说，明清时代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可是为什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没有产生在中国本土，而且诞生在远离中国4000余哩，孤悬在太平洋中心的檀香山？又比如说，辛亥革命前后，华侨仅占全国人口的2%左右，可为什么这2%的人口，却负担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经费的90%？在黄花岗烈士英名册上，为什么华侨占了1/3？

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清朝末年，海外华侨分布广泛，人数激增，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人侨居外国的历史很长，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距今已有1000多年了。不过从宋代经济重心南移至明代海禁开放的600多

年中，华侨仅有几万人，就是明代海禁开放到鸦片战争的300多年中，华侨也只有十几万至100多万人^②，那时他们大多集中在东南亚一些商贸中心城市或水陆交通孔道上。

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劳动人民难以谋生；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开发殖民地而不择手段地掠夺廉价劳动力，这样就出现了19世纪中国人向外移民的高潮。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海外的华侨，1879年300万，1899年400万，1903年增至730万，1905年已达760万了^③。这时候的华侨，不仅人数激增，而且分布渐广，他们从东南亚扩展到美洲、澳洲、欧洲和非洲，凡是通水域的地区，几乎都有华侨。今天遍布世界五大洲3000多万的华侨、华人，其基本格局是在晚清时期确定的。

值得指出的是，晚清时期，海外的华侨资本已经形成。关于这一点，清政府的不少外交官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的笔记中均有记载。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他们在那里立足较早，经济基础也较好。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中写道，越南的南圻，“出产以米为大宗，商务亦以米为关键”，在那里，“米市之利，华商独擅之”，以至法国人在谈论南圻时，有“舍粟米无出产，舍华人无生意”之说。在新加坡，“铺户、房产、田园足称饶富，除英官衙廉公产之外，华人实业八成，洋人不过二成”。缅甸的仰光，“华人在此者三万有奇。英、德两裔最大，华裔次之”。华裔可以与欧洲的洋裔相提并论。在泰国的曼谷，“华民约有30万人，商务枢纽大半归之”^④。美国华人历史较短，不过他们也很快渗透到了许多经济领域中去。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曾经有过描述，例如提到华侨餐馆业的时候说，“纽约市三百余家，波此(士)顿、费城等市各数十家，芝加哥有一家，而投资十万金，皆用中式装饰，门如市焉”^⑤。

清末的华侨，不仅在海外发展经济，而且也回国投资。据统计，从1862年至1911年，华侨在国内投资总额折合人民币约

5500余万元，共兴办350余家企业^⑩。今天看来，这些数字微不足道，但它在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1872年暹罗华侨陈启源在南海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开端。据《清史稿》记载，清代官办铁路共12条，大多借外债修筑，而商办铁路只有5条。5条商办铁路，有3条主要是依靠侨资兴办的，这就是印尼华侨张煜南创办的潮汕铁路，美国华侨陈宜禧倡办的新宁铁路和由印尼华侨等出资兴建的漳厦铁路^⑪。显然，华侨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人数及其力量已经不容忽视了。

其次，寄人篱下，倍受欺凌，爱国思乡之情十分浓烈。

过去，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极浓，他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因此，早期的华侨，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帐，特别是清朝末年那些“生入地狱之门，死作海岛之鬼”^⑫的契约华工。据中国学者估计，从1800年至1900年的100年间，出国的契约华工共计235万人^⑬。这些被人贩子用船装运海外的华工，许多人在途中就病死、饿死、闷死或因反抗而被打死。有人把贩运华工的船只比作浮动地狱。仅据1847至1873年输入古巴、秘鲁、美国、圭亚那、巴拿马4个国家的78船次的统计，共装华工31143人，其中海上死亡11766人，按死亡率计算，去美国的最高，达64.21%，最低的为巴拿马，也达22.34%^⑭。

那些经过九死一生而到达彼岸的华工，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也不是洒满阳光的大地。终年辛劳，收入低微且不去说它，他们还要遭受许多的凌辱和迫害。由于政治与经济文化等原因，世界许多地区都接二连三地爆发排华事件。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曾5次对华侨进行大屠杀，其间遭杀害的华人数，1608年2万余人，1639年至1640年22000余人，1662年至1663年4000余人，1686年数百人，1764至1765年6000余人，5次合计55000余人^⑮。这真是骇人听闻！1740年，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城（今天的雅加达）发生了红溪河惨案，荷兰殖民当局在华侨居住处纵火劫掠，城内被屠杀的华侨近万人，侥幸逃出的只有150

人^⑧。19世纪中叶以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曾先后制定过排华法令，即使在标榜自由平等的美国，华侨也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当美国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就有人把中国人称作“庄重的、温和的、勤劳与令人可敬”的“老大哥”，并把移民的大门敞开着，而一旦那里金矿挖净，铁路铺成，沼泽地变成良田的时候，就有人出来污蔑华工“面孔冷淡”，“吸食鸦片”，“会传染麻风病”，并高喊“中国人必须滚出去”的口号。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此后，排华骚乱，多次爆发。

解放前，人们常常把华侨称作“海外孤儿”，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贫弱而致使侨胞在海外被视为二等公民，受尽了凌辱。孙中山先生“报兴中华”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他们的愿望。

再次，华侨身居海外，能够触摸到世界的脉搏，较早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是站在世界前列的，可是明末以后便渐渐落后下来。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更是被列强任意宰割。爱国救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条主线。然而靠什么去救亡呢？是靠过去那套旧学吗？显然这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高度赞扬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那些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并深刻阐明了，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关系^⑨。向外国学习，当然可以通过翻译著述以及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等途径，然而这总比不上长期生活在海外那样便当。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同时也是华侨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生两位叔父是早年的华工，后来一位死在上海附近的海面上，一位死在美国加州的金矿里。孙中山的哥哥孙眉是檀香山的富商。孙中山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这对他革命思想

的形成和开展革命活动关系甚大。

1878年，12岁的孙中山远航檀香山，投靠他大哥孙眉，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祖国到海外，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与故土迥异的世界。后来他在自传中说，此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⑧。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就读3年，1915年，他在一次讲演中曾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⑨可见西方的教育对他影响之深。伦敦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曾在欧洲考察政治风俗，结交朝野贤豪。后来他在自述创立民国的经过时说，在欧洲的“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⑩类似孙中山先生这样的经历和感受，是许多华侨都曾有的。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期间，华侨在组织、思想、经济、军事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与他们所处的特殊处境颇有关系。在海外，华侨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的美德，凭借当地的有利条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业绩。他们既熟识中国，也了解外国，由于聚集东西方文化优点，因而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传播先进思想方面往往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国强我荣，国弱我辱，祖国的命运与侨胞是紧密相连的。不管命运把他们抛向哪一个角落，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强盛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我们了解了华侨这些特征之后，那么对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就不难理解了。

辛亥革命过去80年了。80年来，由华侨首先提出“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一直激励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海外华侨一定会

发挥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

- ① 香港时报社编印《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页。
- ②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41页。
- ③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2年版，绪言，第3页。
- ④ 香港时报社印《华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页。
-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至64页；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 ⑥ 兴中会章程，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 ⑦ 温雄飞：《回忆辛亥革命前中国同盟会在美成立的过程》，近代史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至202页。
- ⑧ 冯自由：《革命开国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04页。
- ⑨ 颜清滢《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07至208页。
- ⑩ 蒋永敬：《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112页。
- ⑪ 蒋永敬：《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第44至47页。
- ⑫ 《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64页。
- ⑬ 颜清滢：《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354页。
- ⑭ 福建省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华侨志》（下），第8页，1989年征求意见稿。
- ⑮ 洪丝丝等著《辛亥革命与华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 ⑯ 洪丝丝等著《辛亥革命与华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至55页。
- ⑰ 颜清滢：《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第322至323页。
- ⑱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南洋与中国革命”一节中的第3页。
- ⑲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 ⑳ 《新加坡一百五十周年》第657页，转引自郑民、梁初鸿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第164页。
- ㉑ 孙健：《辛亥“三·二九”起义中牺牲的华侨烈士》，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上），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51至254页。
- ㉒ 邹鲁编《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94

页。

⑳ 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转引自洪丝丝等著《辛亥革命与华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㉑ 陈碧笙《关于华侨史分期的几个问题》，郑民、梁初鸿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8至70页。

㉒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民国28年版，第10页。

㉓ 福建师大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36至41页。

㉔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三七，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第249至250页。

㉕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至6页。

㉖ 《清史稿》第16册，第4442页。

㉗ 彭玉麟：《海国公余辑录》，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第1页。

㉘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同上引书，第169至171页。

㉙ 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华工的掳掠》，同上引书，第207页。

㉚ 黄滋生、何思兵著《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9、137、156、161、194页。

㉛ 温广益、蔡仁龙等合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㉜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74至1475页。

㉝ 孙中山《答霍尔斯教授书》，转自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㉞ 孙中山：《非学问无以建国》，转自台湾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编革命开国（一），国立编译馆1985年版，第142至143页。

㉟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6页。